文选

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

A READER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HINA

李彬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

李彬　主编

涂鸣华　李漫　姚遥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李彬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302-17570-4

Ⅰ. 中… Ⅱ. 李… Ⅲ. 新闻事业史—中国—文集 Ⅳ. G21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4376 号

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

责任编辑:纪海虹
装帧设计:曲晓华 韩 宇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王秀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鑫河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240 印张:36.5 字数:748 千字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49.8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8487-01

前　言

本书初衷在于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提供一部原典或经典的专业读本，类似文学专业的“作品选”、“文论选”等。说起来，新闻史与文学史都不离两类研究，一类是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一类是文选，如《昭明文选》。如果说专著相当于人的骨骼，那么文选就好比人的血肉，至于贯穿其中的思想则恰似人的生命或灵魂。

若以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里的长文——《上海报业小史》（姚公鹤）为起点，中国新闻史研究已逾90年历史，即使从1927年戈公振先生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算起，这门学科也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代新闻史学者孜孜探求，默默耕耘，使这片学术园地日益成为新闻学的大后方和根据地，为整个学科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更是取得一系列突出进展，涌现一大批厚重之作，不仅得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嘉许，而且也引起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注。以新闻研究最高荣誉奖“吴玉章新闻奖”为例，获奖著述多半为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成果。

当然，中国新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发展也不平衡。以高校的教学为例，新闻史专著就远远多于新闻史文选，据说仅仅冠名“中国新闻史”的教科书就不下百部。与此相对，学生急需的“文选”却极度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莘莘学子和芸芸读者的需求。大略统计一下，目前的新闻史文选真是屈指可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1981）；

方汉奇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1982）；

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1987）；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1987）；

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文选》（1998）；

……

这些文选虽为当时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随着学科发展和时代变迁，其中的遗憾也越来越凸显，大略说来有三点。其一，所选文本基本截止于新中国成立，此后近60年的发展往往付之阙如；其二，选材的范围比较单一，多以报

业为主，既缺乏其他新闻媒体内容，也较少涉及相关社会背景，对当今的学子和读者来说未免陈旧，难覆所用；其三，这些著述也早已脱销，无处寻觅。所以，不管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方面讲，还是从满足读者现实需求的角度看，重新编选一部中国新闻史文选都可谓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正是面对这种窘迫局面，我们才不揣浅陋编选了这部文选，以应教学之需和学生之急。之所以称为“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也是为了同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版）相配套。这部文选上迄先秦，下至当代，共遴选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原典或经典文献约150篇，此外还有只列篇名未录正文的100篇“存目”。为方便读者了解有关背景，我们为每篇文章都撰写了“题解”，如《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的题解：

>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史，也称《春秋外传》，杂记西周及春秋时期八国的人物、事迹和言论，旧说为左丘明所著，司马迁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据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目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或新闻，左丘明就是略早于孔子的一位著名瞽矇。瞽矇讲述的历史或新闻被后人记录，整理成文，就称为《语》，按照国别区分有《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选自《国语·周语》。文中记述周卿士邵穆公规劝周厉王的一段谈话，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一个重要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对于人民的言论，执政者应该疏导而不应该堵塞。

再如为“草原英雄小姐妹”报道所写的题解：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蒙古族小姑娘为保护公社羊群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的故事，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伴随新闻报道，她们的名字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从此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当时，“草原英雄小姐妹”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艺术作品，编入小学课本。另外，由刘德海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同管弦乐《红旗颂》（吕其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占豪、陈钢）、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交响诗《嘎达梅林》（辛沪光）以及音乐会组曲《红色娘子军》（吴祖强等）等，一同构成新中国最美的音乐篇章与红色经典。

不言而喻，任何学科的任何文选都不是纯粹的“资料汇编”，其中无不体现着特定的意图或旨归，从而才有选什么、不选什么的裁量。正如孔子编选《诗经》不只在于含英咀华，更是张扬一种“真、善、美”的社会价值和伦常观念，也就是《论语·为政》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于文选及意义，鲁迅先生曾写道：

>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取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集外集·选本》）

那么，这部《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的意图或旨归是什么呢？

一方面，首先自然是为新闻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提供一部有用、有益并有趣的专业参考书。从读者角度着想，我们在编选过程中主要考虑如下因素。一是全书篇幅适中，即选材方面既不过于庞杂，也不过于简略，一册在手，精华在握。过于庞杂，对一般人来说显然没有必要，徒增阅读压力和经济负担；过于简略，则难以反映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全貌和时代风云，无法使人尽情领略其间的万千气象和新闻魅力。二是将经典性与可读性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希望选出中国新闻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里程碑式的文献，以体现“参考、借鉴和启发”等价值；而且希望选出的文字对普通读者也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不只是有利于专业学习及其研究。虽然新闻史文选不可能都像文学史文选那样具有可读性，但在不影响经典性或权威性前提下，我们也尽可能兼顾文章的多姿多彩、有滋有味。三是将新闻史内容与社会史视野有机融合，尽可能体现新闻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另外，本书还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拓展。在时间维度上，本书上迄先秦的《春秋左氏传》，下至21世纪的进展。在空间维度上，力求包罗广泛，除了报业领域，还涉及广播、电视、网络、期刊、新闻思想、新闻制度、新闻教育、新闻法规等。

另一方面，这部选本的意图或旨归更重要的还在于正本清源，弘扬一种新闻精神或新闻理想。换言之，这部文选欲使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进一步感触新闻的“精气神儿”。提出这样的话题，是因为随着当今市场化、商品化、世俗化的潮流汹涌漫溢，随着各种新潮理论和时尚观点的起伏流行，新闻的“精气神儿”似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变异。一次，某名校出版社请我“鉴定”一套丛书的出版价值。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套冠以“新闻”的丛书不仅与新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恰与新闻的“精气神儿”相抵牾，五花八门的选题多是广告、公关、媒介经营、传媒研究等。看到这些貌似新闻的东西，不由想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士·W.凯利（James W. Carey）几年前的有名批评：

> 面对“传播”一词的四处泛滥，面对在“传播”旗帜下广告、公关、传媒经营管理、平面或音像传媒制作、网络媒体制作等等的冲击，新闻尚未认清自己面目，已处在了四面楚歌之中。（转引自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

针对这种“群雄并起，天下混战”的乱局，这位美国新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2000年发表了一篇引起热议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译文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以砥柱中流之势提出新闻的三项原则：

> 原则一：新闻和新闻教育绝不等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介研究、公共关系或广播。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成型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绝不可与其他相关但不同的社会实践相混淆。新闻与那些活动既不可在教学中混淆，也不可在新闻实践中等同。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作为独特的现象来关注。
>
> 原则二：新闻作为独特的社会实践不可与传媒和传播相混淆。传媒是新闻

得以发生的组织和官僚机构，是新闻使用的技术；传播是意义传递的一般过程，但是它们都不是新闻。新闻实践可发生在或大或小的组织，可由实践者个人或群体共同操作，可以使用声音、书写、印刷媒体或电视摄像机。新闻在哪里及如何生产是重要的问题，但如果将新闻混淆为传媒或传播，无异于将鱼和鱼的故事混为一谈。

原则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其实，不管新闻有多少种定义、多少种解读，在钟爱新闻的人眼里，新闻总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一种理想的追寻、一项值得献身的事业，一句话，新闻总有一股子“精气神儿”。因为，说到底新闻同千家万户的身家性命联在一起，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联在一起，同诸如“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人道理想”等字眼联在一起，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始终是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学生们发现，“光荣与梦想”是我常挂嘴边的一个词语。的确，这个出自美国名记者曼彻斯特的名作《光荣与梦想》的词语，也传神而凝练地体现了新闻的“精气神儿”，体现了古今中外一切新闻人的永恒追求。新闻虽然表现为明确的世俗关怀，但其核心却体现为强烈的精神冲动，犹如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追求一样。一切真正的新闻人，骨子里其实都是诗人。记者穆青的“勿忘人民”，不也正是诗人艾青的情怀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这样说有点玄虚，那么看看这部文选的名家名作就不难理解了。这些作品本身，已经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人。什么是新闻人？新闻人就是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徐铸成、朱启平、范长江、邓拓、斯诺、白修德、爱泼斯坦等。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西行漫记》（斯诺）、《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万里神州驯水记》（郭超人）、《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范敬宜）、《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罗开富）、《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段连城）、《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张严平、田刚）等。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新闻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恰似鲁迅笔下的“民族脊梁”——舍身硬干、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

诚然，新闻界泥沙俱下，新闻人鱼龙混杂，正如军旅中有勇士，也有懦夫；有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之辈，也有滥竽充数、见利忘义之徒。而且，即使勇士也难免这样那样的缺陷，也不见得一生勇敢、一世壮烈，但用鲁迅的话说，有缺陷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正如完美的苍蝇毕竟还是苍蝇。何况，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不明白，不能由于新闻行当有“坏人坏事”，自己就有理由不做“好人好事”，不能因为新闻行当里有些败类，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背弃新闻的理想。古之圣贤不是提出，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吗？那么，本书也是为一切有

志于新闻理想的人，为一切如邵飘萍所言愿为新闻伟业奉献终生的人而提供的一部见贤思齐的样本。

本书的编选是由笔者提出原则和思路，并由博士生姚遥同学进行初选，再由笔者补充和定夺。初选之后，又由博士生李漫同学组织 9 位新闻学研究生分头撰写题解初稿，再由笔者修改定稿。最后，涂鸣华同学又组织这些同学分头校核原文，依据一手文献逐段逐文检查，以确保准确与权威。参与撰写题解和校核原文的同学是韩璐、朱一彬、罗有晗、杨科、刘锐、李强、康雯萱、章炳捷、郑亦心、秦珍子等，他们的工作值得特别书写一笔。

在编选过程中，业师方汉奇先生、同门学长郭镇之教授都曾给予热心指教，在此谨致谢忱！当然，本书的所有问题均由笔者自己承担，而且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各种纰漏和缺憾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提出批评与建议，以利我们修改与完善。

李　彬

2008 年 5 月于清华园

目　录

附录

春秋左传·长勺之战[1]

【题解】《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 年）的历史大事，相传为孔子所修订，以擅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著称，但由于文字简略，也曾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后人对之多有诠释，其中“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与《穀梁传》在所有诠释中最为著名。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末年鲁人左丘明所著，实际成书当在战国中期。传（zhuàn）者，传（chuán）也，即为了更广泛传播而对典籍的注解。后人多将《春秋》的文字合编入《左传》，作为其中“经”的部分，新增解释部分则称为“传”。本文是《左传》的名篇之一，成语“一鼓作气”即源自于此。

经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迁宿。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

---

[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1]

【题解】《战国策》是记录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与权变故事的汇编，由西汉末年刘向编订成书。从传播学视角看，本书可谓中国古代人际传播和话语传播的经典，语言精练，逻辑严密，形象鲜明，说理透辟。这里所选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2]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

[1] 刘向编：《战国策》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也有版本作"形貌"，据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原文当为"形貌"，而"身体"乃后人对"形貌"的误改。

晏子春秋·晏子使楚[1]

【题解】《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晏婴言行的典籍。晏子为齐国正卿，与管仲齐名，执政五十余年，以机敏聪慧著称于时。本文通过描写晏子从容应对楚国君臣的刁难，体现了晏子的睿智以及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行文流畅，记述生动。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邪？"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1] 《晏子春秋》第6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吕氏春秋·察传[1]

吕不韦

【题解】《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政治家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著作，又名《吕览》，成书于秦王正八年（前239年）。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取其顺应客观的思想，去其消极避世的成分，兼采儒、墨、法、兵及阴阳家之长，意在汇合先秦各派学说，为当时秦统一天下和治理国家提供理论体系，属于杂家的代表作。其中保存了许多逸闻，具有史学价值或新闻价值。《察传》一篇讲述“辨察传言”的问题，主张“疑似必察”，对新闻传播颇有启发。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

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

[1] ［战国］吕不韦著，［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第2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1]

【题解】《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史，也称《春秋外传》，杂记西周及春秋时期八国的人物、事迹和言论，旧说为左丘明所著，司马迁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据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目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或新闻，左丘明就是略早于孔子的一位著名瞽矇。瞽矇讲述的历史或新闻被后人记录，整理成文，就称为《语》，按照国别区分有《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选自《国语·周语》。文中记述周卿士邵穆公规劝周厉王的一段谈话，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一个重要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对于人民的言论，执政者应该疏导而不应该堵塞。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2]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1] 《国语·周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原注："国"下，《公序》本有"人"字。

史记·李将军列传[1]

司马迁

【题解】司马迁既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记者"，他的《史记》既是中国历史撰述的巅峰之作，也是不朽的文学名作，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人物的"报道"一向脍炙人口，而对人物的"评论"同样精彩纷呈。史记每篇传记后面的"太史公曰"，其实就是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古代"记者"对某事某人的评论。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的名篇之一，塑造了西汉"飞将军"李广这一悲剧英雄，把李广的智勇双全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文中也不隐讳其缺点，如杀霸陵尉一事，借用《汉书》作者班固的评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因如此，李广的形象才显得更加丰满，更有魅力，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最受崇敬的英雄之一。至于篇末的"太史公曰"即对李广一生的评论，更是画龙点睛，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令人回味不尽，感慨万千。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

[1] [汉]司马迁：《史记》卷109，北京，中华书局，1959。

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侯，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

以为勇。当户早死，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广死军时，敢从骠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壖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

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世说新语·四则[1]

刘义庆

【题解】《世说新语》是记述魏晋人物逸闻趣事的杂史，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组织编纂，梁朝刘孝标作注。书中所载均属真人真事，虽然个别事实不尽确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世说新语》行文凝练，意味隽永，寥寥几笔即使人物及其神情跃然纸上，形神毕现。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上卷上·言语二》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中卷上·雅量第六》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下卷上·容止第十四》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下卷上·容止第十四》

---

1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经纬集·读开元杂报[1]

孙樵

【题解】孙樵（约唐宪宗至唐僖宗时期），字可之，又字隐之，关东人，韩愈的再传弟子。《读开元杂报》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唐代官报的文字记载。其时孙樵在湖北襄汉地区，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孙樵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杂报”并无现存实物，今人推测可能是唐代开元年间的官报。

樵曩於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寮行大射礼於安福楼南。某日安北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寮廷争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敌兵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从甓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址。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所仰给耶？敌兵惊扰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警於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齚舌相戒，况宰相陈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诤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於外者。”樵後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云。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事，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正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

[1] ［唐］孙樵：《孙可之集·读开元杂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南楚新闻·一则[1]

尉迟枢

【题解】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新闻"一词最早出现于《新唐书》。据《新唐书》记载："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唐代诗人李咸用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中写道："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其后，唐代文人段成式著有《锦里新闻》三卷，唐末尉迟枢则有《南楚新闻》传世，其中记述了当时南方民间的一些风俗习惯、奇闻异事等，颇似当世之社会新闻。如这里所选的故事，就曾被传统戏曲改编传唱。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贾易往来者。乾符初年，有一贾者在京都，久无音信，郭氏子自往访之。既相遇，尽获所有，仅五六万缗。生耽悦烟花，迷于饮博，三数年后，用过太半。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都无舍宇，访其骨肉，数日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舍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犹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壖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樜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工，拽母（母原作舟，据陈校本改）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疾，数日而殒。生慞惶，驰往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共篙工之党无别矣。

---

[1]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东京梦华录》序[1]

孟元老

【题解】《东京梦华录》是一部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风貌的笔记,宋人孟元老所撰。孟元老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父到东京汴梁,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下,在开封共生活二十余年。晚年追忆昔日旧京的繁盛:"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由于怀念当年的锦绣生活,也为了保留历史记忆,于是写成此书,为后人了解宋代的社会历史,包括中国报纸问世的社会背景留下珍贵资料。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然以京师之浩穰,及有未尝经从处,得之于人,不无遗阙。倘遇乡党宿德,补缀周备,不胜幸甚。此录语言鄙俚,不以文饰者,盖欲上下通晓尔,观者幸详焉。

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孟元老序

[1] [宋]孟元老等撰:《东京梦华录》,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海陵集·论禁小报（节选）[1]

周麟之

【题解】《海陵集》为南宋兵部侍郎周麟之所著。这里所选的一段文字，是关于中国古代小报的重要史料。

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都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臣不胜至，愿取进止。

[1] ［南宋］周麟之：《海陵集·论禁小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4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谕中原檄[1]

宋濂

【题解】 宋濂（1310—1381），字景濂，祖籍浙江金华潜溪，后迁至浦江（今浙江义乌），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主修《元史》，被时人称为“太史公”。1367 年 11 月，朱元璋北伐中原，命宋濂草拟了这篇著名檄文。《谕中原檄》大声疾呼“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指斥元朝的罪恶，安抚中原的民心。檄文是古代常见的一种传播方式，多用于战争、起义、造反、平叛等，犹如现代的传单。

丙寅，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根；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既灭，

[1]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 2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

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明季北略·丙寅五月初六纪异[1]

计六奇

【题解】《明季北略》是记述明代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著作，由清初无锡人计六奇撰写。作为明末遗民，计六奇为了寄托故国之思，入清后撰写《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两书。《明季北略》共二十四卷，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东北，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本文记述的是北京城发生的一场奇异灾变，被时人收入《天变邸抄》。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数万间，人二万余。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至通州，北至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裂，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

钦天监周司历奏曰："五月初六巳时，地鸣，声如霹雳，从东北艮位上来，行至西南方，有云气障天，良久未散。占曰：'地鸣者天下起兵相攻，妇寺大乱。'又曰：'地中汹汹有声，是谓凶相，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贤谓妖言惑众，杖一百，乃死。

后宰门火神庙栋宇巍焕。初六日早，守门内侍忽闻音乐之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众内侍惊怪，巡缉，其声出自庙中。方推殿门入，忽见有物如红毬，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俄，东城震声发矣。哈哒门火神庙庙祝，见火神飒飒行动，势将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爷，外边天旱，切不可走动。"火神举足欲出，庙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间，而震声旋举矣。

张家湾亦有火神庙，积年扃锢不开，此日锁俱断。

[1] [清]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原标题为《丙寅五月初六纪异（北京天变邸抄）》。

屯院何廷枢全家覆入土中，长班俱死。屯院内书办等持锹镢，立瓦砾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应！”忽应声：“救我！”诸人问曰：“你是谁？”曰：“我是小二姐。”书办知是本官之爱妾，急救出，身无寸缕，书办脱大襬裹之，身无裙裤，骑驴而去，不知所之。

皇上此时方在乾清宫进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内侍俱不及随，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极殿槛鸳瓦飞堕，此近侍脑裂，而乾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异矣哉！绍兴周吏目弟到京才两日，从菜市口遇六人，拜揖尚未完，头忽飞去，其六人无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动，椅桌倾翻，妻妾仆地，乱相击触。逾时，天渐明，俱蓬跣泥面，若病若鬼。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坠下者约二千人，俱成肉袋。

郎中潘云翼母居后房，日持斋诵佛。雷火时，抱一铜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动，得生。前房十妾，俱压重土之下。《颂天胪笔》云抱佛者云翼之妻，非母也。

北城察院，此日进衙门，马上仰面见一神人，赤冠赤发，持剑，坐一麒麟，近在头上，大惊，堕马，伤额。方在喧嚷间，东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时，东城有一赤脚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

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长班，于响之时，鬃帽、衣裤、鞋袜，一霎俱无。

有项姓，因压伤一腿，卧于地，见妇人赤体而过，有以瓦遮阴户者，有以半条脚带掩者，有披半边褥子者，有牵一幅被单者，顷刻得数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一相公夫人单袴走出街心，相公从阁内步奔回救，得免。

都城隍庙中，初五夜，道士闻殿中喧嚷叫呼，绝似唱名之声。

初六日，王恭厂一小太监，早至厂，见团团军马围住，听得内边云：“来一个缚一个。”监奔归，响声震起。

五月朔，山东济南知府往城隍庙行香，及门，官吏舆从俱各昏迷。有一皂隶之妻来看其夫，见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庙管门。前夫曰：“庙里进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册。”

四月廿七日午后，有云气似旗，又似关刀，见在东北角上，其长亘天，光彩初白色，后变红紫，经时而减。

五月初三日，又见于东北方，形如絳，其色红赤。初四日又见，类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变幻，总一物也。”

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大木飞至密云。石驸马街有大石狮子，重五千斤，数百人移之不动，从空飞出顺城门外。

圆弘寺街有女轿过，一响，掀去轿顶，女人衣饰尽去，赤体在轿，竟亦无恙。

震崩后，有报红绌丝衣等俱飘至西山，大半挂于树梢。昌平州教场中衣服成堆，首饰银钱器皿，无所不有。户部张凤达使长班往[illegible]，果然。

予闻宰相顾秉谦妾单裤走出街心，顾归见之，赤身跣足，扶归。余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众。又闻冯铨妻坐轿中，被风吹去落下，只剩赤身而已。又石臼飞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呜呼！熹庙登极以来，天灾地变，物怪人妖，无不叠见，未有若斯之甚者。思庙十七载之大饥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举朝犹在醉梦中，真可三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传教歌谣

【题解】《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创办人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等,号称中国第一份近代化报刊。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免费发送给东南亚地区华侨。这里所选的"传教歌谣"宣扬神权至上、因果报应的宗教观,语言简单直白,体现了近代宗教刊物传播教义灵活多样的特征。

上帝降灾非偶然,都因世人慢神天。
但愿众生遵神诫,灾害必定离汝前。

世人蒙昧似癫狂,不拜真神拜假偶像。
邪淫嫉妒相谋杀,损人利己常说谎。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新闻纸略论[1]

【题解】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一译郭实腊,1803—1851),普鲁士在华传教士。1833年,他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成为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新闻纸略论》发表于1834年1月,是中国近代较早的新闻学文章,论述了近代西方报纸的起源、现状及新闻自由等话题。

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其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

[1] 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

香港船头货价纸 · 新闻三则

【题解】1857 年，香港孖剌报馆创办《香港船头货价纸》。作为英文《孖剌报》的中文版，该报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商业报纸，内容以船期、商品价格、商业行情为主，1864 至 1865 年前后改名《香港中外新报》。这里所选的三则报道分属不同的消息来源：外地报刊、别处来信和道听途说。

兹接到上海新闻纸云，现在，湖北武昌府与汉口镇复被长毛攻破。又闻钦差调宁波亚柏督卒水勇前往攻击南京云云。

兹接到省城二月二十七日信云，省内官宪现议设洋行二十一家与外国人交易。

闻说湖南长毛贼由桂阳入粤，于二月二十一日攻破韶府乐昌县，现在韶关各铺搬迁货物，长毛逼近韶关，但未闻胜败如何。若韶关一失，则西南佛山危矣。

弢园文录外编·论日报渐行于中土[1]

王韬

【题解】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后改名韬,江苏吴县人,思想家、报刊政论家,被林语堂誉为"中国记者之父"。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是较早宣传改良主义思想、鼓吹变法的报纸之一。《弢园文录外编》为王韬的政论文集,收录在《循环日报》发表的政论及各种序跋,由香港印务总局排印。《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发表于1874年,是中国近代有作者可考的第一篇新闻学论文,介绍了东西方近代报纸的起源和发展。

泰西日报,约昉于国朝康熙时。日耳曼刊录最先,而行之日盛。他国皆厉禁。凡关国事军情,例不许印;妄置未论者,辄寘诸狱。后禁稍弛而行亦渐广,英、法、美各国皆继之而兴,僻壤偏隅无不遍及,而阅者日众。然法国所刊闾阎隐密报,法廷闻之,立加禁斥,诫以日报之例,不得讥刺人之隐事也。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美国日报,一日至颁发十万张,可谓盛矣。大日报馆至用电报传递,以速排印。夫岂第不胫而走也哉。

华地之行日报而出之以华字者,则自西儒马礼逊始,所刻《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也,时在嘉庆末年。同时,麦君都思亦著《特选撮要》,月印一册;然皆不久即废,后继之者久已无人。咸丰三年,始有《遐迩贯珍》刻于香港,理学士雅各、麦领事华陀主其事。七年,《六合丛谈》刻于上海,伟烈亚力主其事,采搜颇广。同时,有《中外新报》刻于宁波,玛高温、应理思迭主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中西杂述》,英人麦嘉湖主其事。嗣皆告止。近则上海刊有《教会新报》,七日一编,后改为《万国公报》,林君乐知主其事。而《中西闻见录》亦刊于京师,艾君约瑟、丁君韪良主其事。顾此皆每月一编者,兼讲格致杂学,器艺新法,尚于时事简略。惟香港孖刺之《中外新报》,仿西国日报式例,间日刊印,始于咸丰四五年间,至今渐行

[1]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

日远。其他处效之者，上海《字林之新报》，广州惠爱馆之《七日录》，又港中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相继叠出。三四年间，又益之以德臣之《华字日报》，而我局之《循环日报》行之亦已二年。上海则设有《申报》。自《申报》行而《字林之新报》废。去岁春间，粤人于上海设有《汇报》，旋改为《彙报》，近数月间，又有所谓《益报》。闻福州亦设有日报，但行之未广，未得多见也。港中日报四家，上海日报两家，皆排日颁发，惟于星房虚昴四日则停止耳。日报之渐行于中土，岂不以此可见哉。

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

盛世危言·日报上[1]

郑观应

【题解】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买办。虽然侧身洋行，但是关心时政，研究时务，19世纪末形成维新改良思想。1893年刊行的《盛世危言》一书，系统探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主张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效法西方，对宣传变法、传播新知影响显著。《日报》一文提出报纸可以"通民隐、达民情"，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报纸功能的认识。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开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者，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及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十四卷本增：夫强民读书，而民莫之应；不劝民阅报，而民自乐观。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洗而空。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亦泰西民政之枢纽也。]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十四卷本增：大报馆为国家耳

[1]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日报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目，探访事情。每值他邦有事，与本国有关系者，即专门聘博雅之宏通之士，亲往远方探访消息。官书未达，反藉日报得出其先声。]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现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訚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十四卷本增：惟禁报馆妄言，以肃观听。英、美、比三国无禁报馆言事之条。]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设法保护，札饬有体面之绅士，倡办以开风气。如英国《泰吾士日报》馆主笔者，皆归田[十四卷本增：之]宰相名臣，自然无勒索人财，亦名驰中外矣。

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制作之良窳，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诈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讬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十四卷本增：借公事以报私仇，藉巧词以纾积忿，]逞坚白异同之辨，乱斯民之视听者，则[十四卷本增：迹同秽史，罪等莠民，可]援例告官惩治。[八卷本增：中国现在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当道因噎废食，则外国报颠倒是非，任意毁谤，华人竟无华报与之争辩也。故将英国、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奉请选定颁行，准人开设，俾官商各有所遵守。]如谓当道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则常变经权，操纵在我。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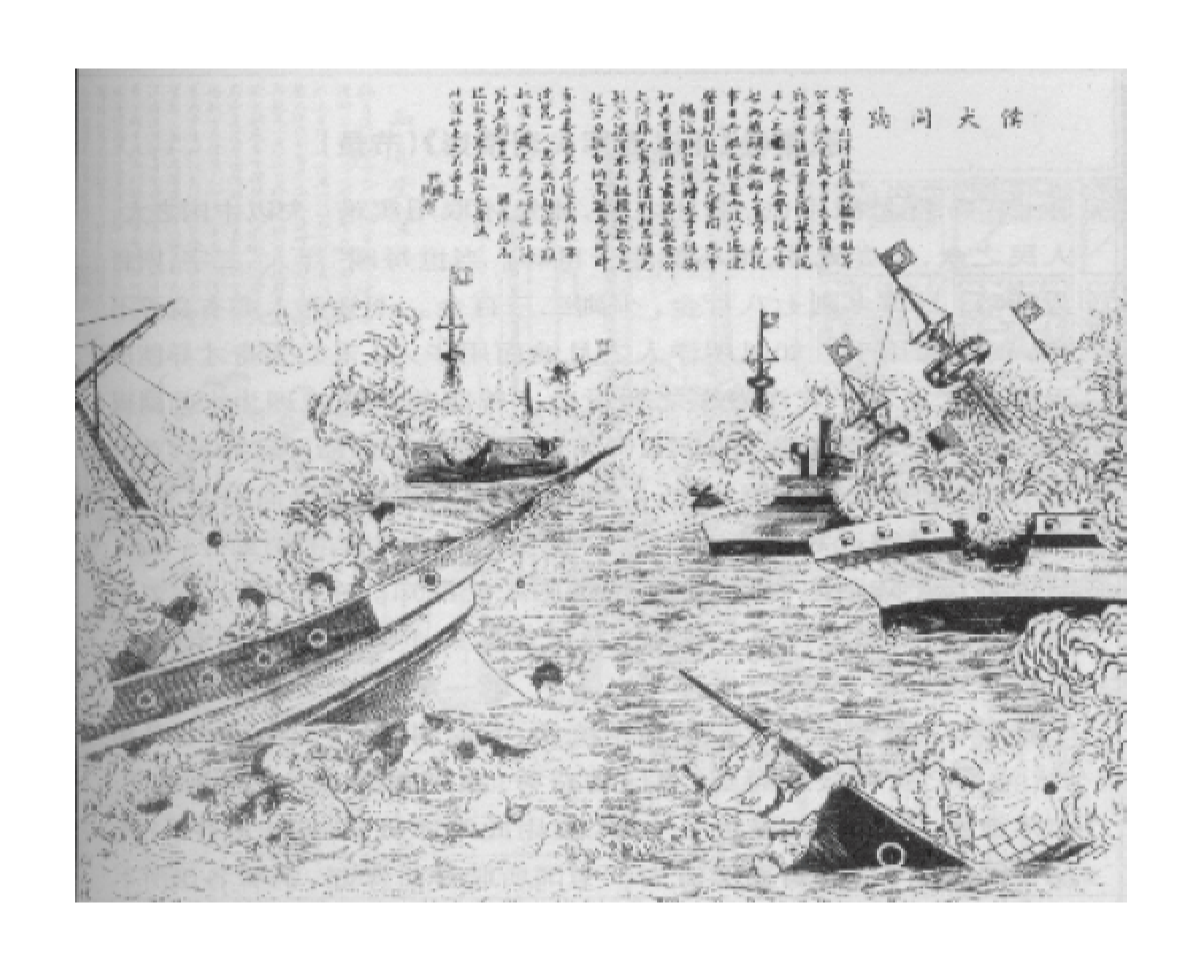
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❶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而奈何掩聪塞明，箝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庞然自大，施施然甘受他人之陵侮也！

❶ 原注：卷八本将“卓”改为“蔚”。

点石斋画报·仆犬同殉[1]

【题解】《点石斋画报》为中国最早的旬刊画报，创刊于1884年，停刊于1898年，由上海《申报》附送，每期画页八幅。画刊共发表四千余幅作品，包括大量时事和社会新闻内容。所谓“爰倩精于绘事者，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月出三次，次凡八帧，俾乐观新闻者有以考证其事，而茗余酒后，展卷玩赏，亦足已增色舞眉飞之乐”[2]。《仆犬同殉》记载了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水师“致远号”舰长邓世昌壮烈殉国的英雄事迹。

管带北洋致远兵轮邓壮节公，粤海人。去岁中日大东沟之战，督率该船首先陷敌，轰沉日人巨舰一艘，并击沉鱼雷船两艘。嗣以他船不肯冒死从事，日兵船又环集而攻，公遂连发数炮，赴海而死。事闻九重，赐谥“壮节”，追赠太子少保衔，知其事者，罔不肃然起敬。当公之殉难也，有义仆刘相忠随之赴水，携浮水木梃授公，欲令之起，公力拒勿纳，骂敌而死。同时有所豢义犬尾随水内，旋亦沉毙。一人忠义，同类感孚，虽奴仆之贱、犬马之顽，亦知殉节。是则世之受国厚恩而临敌畏葸不愿效死者，诚此仆、此犬之不若矣。



❶ 陈平原、夏晓虹编著：《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❷ 《点石斋画报》创刊词。

时务报·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

梁启超

【题解】梁启超不仅是近代思想家、学问家，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而且也是近代首屈一指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对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做出非凡的贡献。中国新闻史鼻祖戈公振先生评价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这篇刊发于《时务报》创刊号的新闻论文，与其《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均为他在新闻理论方面的重要文献，其中提出的“去塞求通”思想以及“耳目喉舌”等观点，都对中国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𬨎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𬳶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

[1] 《时务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

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蛾附羶。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秦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国，或于报馆有谗谤之律，有惩罚之条，则又何也？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券，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蝥贼，目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西国人数、物产、民业、商册，日有记注，展卷粲然，录副印报，与众共悉；中国则夫家六畜，未有专司，州县亲民，于其所辖民物、产业，末由周知，无论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数故，则西报之长，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致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

备矣。

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劝百讽一，裨补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蚊虻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清议报·少年中国说[1]

梁启超

【题解】本文集中体现了梁启超所概括的"时务文体"或"报章文体"、"新文体"的三个突出特征：即"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笔锋常带感情"。比如，"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等。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

---

[1] 《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一(1900 年 2 月 10 日)。

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萃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

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

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作者附识

义和团揭帖[1]

【题解】“揭帖”有两种含义，一指明朝的一种进呈文书和清代沿用此名的随本揭帖，二指私人或民间团体所散布、张贴的署名或匿名的启事。“是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和鸦片战争以后的反侵略运动用以宣传群众和打击敌人的重要手段。”[2]下面这张揭帖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广为流传，以民谣形式介绍了义和团的兴起缘由、指导思想和斗争手段，“是义和团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是许多义和团揭帖中最重要的一件”。由于是口头流传，该揭帖产生多个版本，这里收录的是张守常先生依据各种版本校勘整理的版本。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行奸，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说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萧然。
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锦江山。

[1] 张守常：《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载《历史研究》，1997(3)。
[2] 陈振江等编：《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革命军[1]

邹容

【题解】这部小册子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苏报》主笔章士钊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1903年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同时问世,后来合刊发行,销量超过百万,对传播革命派思想产生明显效果,同时引发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不文以生,居于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扬子江,旅上海;以壬寅游海外,留经年。录达人名家言印于脑中者,及思想间所不平者,列为编次,以报我同胞。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欤?虽然,中国人,奴隶也。奴隶无自由,无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自以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吾不计。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吾但信郑成功、张煌言,诸先生于地下有灵,必笑曰:后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

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原文缺)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第一章　绪　　论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籲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

[1] 邹容:《革命军》,上海,民智书局,民国十八年四月(初版民国十七年九月)。

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于胸中，角触于脑中；而辨别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识，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此犹指事物而言之也。试放眼纵观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谛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掏摝过昨日，历今日，以现现象于此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虽然，亦有非常者在焉：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七百八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风潮所播及，亦相与附流会汇，以同归于大洋。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宝物哉，革命也！吾今日闻之，犹口流涎而心痒痒。吾是以于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千余万方里之地图，问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否因之而有感矣，否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奸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氈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旛，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示。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

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此吾所以倡言革命，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勖，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苟不欲之，则请待数十年百年后，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命？吾先叫绝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悞：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无种性，无自立之性！近世革新家，热心家，常号于众曰："中国不急急改革，则将蹈印度后尘，波兰后尘，埃及后尘，于是印度、波兰之活剧，将再演于神州。"等词，腾跃纸上。邹容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何忽染疯病而为是言欤？不知吾已为波兰、印度于满洲人之胯下，三百年来也。而犹曰"将为也"何故？请与我同胞一解之。将谓吾已为波兰、印度于贼满人，贼满人又为波兰、印度于英、法、俄、美等国乎？苟如是也，则吾宁为此直接亡，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实其文明程度高于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呜呼！明崇祯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

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洲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使贼满州人而聪明也，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要皆为吾教化所陶镕。

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与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今试游华盛顿、巴黎、伦敦之市，执途人而问之曰："汝国中执政者为同胞欤？抑异族欤？"必答曰："同胞，同胞，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又问之曰："汝国人有参预行政权否？"必答曰："国者，积人而成者也，吾亦国人之分子，故国事为己事，吾应得参预焉。"乃转信我同胞，何一一与之大相反对也耶？谨就贼满人待我同胞之政策，为同胞述之。

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于朝野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馀。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和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都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余，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搢

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隐衷也。是六部满缺司员，几视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也。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理藩之事，惟满人能为之，咄咄怪事！）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国子监，銮仪卫，诸衙门缺额，未暇细数，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

故常有满、汉人同官，同年，同署，汉人则积滞数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纵曰满洲王气所钟，如汉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绵延数百年，定为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才，至于斯极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来，其手奏中兴之绩者，非出自汉人之手，则各省督抚府道之实缺；其不为满人攫尽也几希矣。又使非军兴以来，杂以保举军功捐纳，以争各部满司员之权利，则汉人几绝于仕途矣。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以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官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兼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呜呼！我汉人最不平之事，孰有过此哉！虽然，同种待异种，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至乃于各行省中，择其人物之骈罗。土产之丰阜，山川之险要者，命将军都统治之，而汉人不得居其职。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另为内城以处之，若江宁，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广州，若镇江等处，虽阅年二百有奇，而满自满，汉自汉，不相错杂。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且试绎"驻防"二字之义，犹有大可惊骇者，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而羁束之如盗贼乎？不然、何为而防，又何为而驻也？又何为驻而防之也？

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又试读其历朝圣训，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臣，奖借逾恒，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汉人中虽贤如扬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其余抑扬高下，播弄我汉人之处，尤难枚举。

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宗室人员，红带子，黄带子，贝子，贝勒者乎？甫经成人，即有自然之禄俸；不必别营生什，以赡其身家；不必读书响道，以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大人，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尚书侍郎，殆若天职，反汉人而观之，夫亦可思矣。

中国人群，向分为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读书人。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即无人不为士子，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士子，曰读书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

读书人。

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学而已，士之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而贼满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羁之，多方贼之，待其垂老气尽，阉然躯壳。而后鞭策指挥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摺，俾之穷年矻矻，不暇为经世之学。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时无坐位，待人如牛马。）俾之行同乞丐，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汩之者何？汩之以科名利禄，俾之患得患失，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羁之者何？羁之以庠序卧碑，俾之柔静愚鲁，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贼之者何？贼之以威权势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牵连之狱，开创于顺治，（朱国治巡抚江苏，以加钱粮，诛诸生百余人。）文字之狱，滥觞于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语，征诛天下，群臣震恐。）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学士所视为拱璧连城之大类书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康熙开千叟宴数次，命群臣饮酒赋诗，均为笼络人起见。）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笔废书而叹曰："朔方健儿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好手段！好手段！吾不禁五体投地，顿首稽颡，恭维拜服，满洲人压制汉人，笼络汉人，驱策汉人，抹煞汉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国士人，又有一种岸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于众者，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曰名士。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为六级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束身成名，立于东西庑上，一瞰冷猪头。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姹紫嫣红之滥调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此四种人，日演其种种之活剧，奔走不遑，而满洲人又恐其顿起异心也，乃特设博学鸿词一科，以一网打尽焉。近世又有所谓通达时务者，拓腐败报纸之一二语，袭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骥尾于经济特科中，以进为满洲人之奴隶，欲求不得。又有所谓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义，言破坏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败之现象如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尽吾国士人之丑态，而曰："复试者，几桌不具，待国士如囚徒。赐宴而尘饭涂羹，视文人如犬马。簪花之袍，仅存腰幅，棘闱之膳，卵作鸭烹。一入官场，即成儿戏。是其于士也，名为恩荣，而实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髫龄入学，皓首穷经，夸命运、祖宗、风水之灵，侥房师、主司、知音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时大都在强仕之年矣。而自顾余生吃着，犹不沾天位天禄毫未忽厘之施，于此而不鱼肉乡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词讼，或顾廉耻而不打抽丰，其何能赡养室家，撑持门户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为中

国士人之透物镜，为中国士人之活动大写真。（即影戏）然吾以为处今之日，处今之时，此等丑态，当绝于天壤也。既又闻人群之言曰："某某入学，某某中举，某某报捐"，发财做官之一片喊声，犹是嚣嚣然于社会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滥野鸡；如是如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国之腐败士人。嗟乎！吾非好为此尖酸刻薄之言，以骂尽我同胞，实吾国士人，屠毒社会之罪，有不能为之恕。《春秋》责备贤者，我同胞盍醒诸？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垅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若辈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满洲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而某吏及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嘻！一国之农为奴隶于贼满人下而不敢动，是非贼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

不见乎古巴诱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华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谓工者乎？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迫，葬身无地。以堂堂中国之民，竟欲比葺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至此极哉！然吾闻之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倡言自由之说，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有合全国工人立一大会，定法律以保护工业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今一一转询中国有之乎？曰：无有也。又不见乎杀一教士而割地偿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则满洲政府殆盲于目，聋于耳者焉。夫头同是圆，足同是方，而一则尊贵如此，一则卑贱如此。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闻之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吾见夫吾同胞之不与之计较也自若。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敲吾肤，吸吾髓！"

以言夫中国之兵，则又有不可忍言者也。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驱而使之战，不聚歼其兵而馈饷于敌，夫将焉往？及其死伤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旌恤之典，尽属虚文；妻子哀望，莫之或问。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似此残酷之事，从未闻有施之于八旗驻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惨毒！始也欲杀之，终也欲杀之，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杀不尽，不尽不快，不快不止。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残杀我汉人！"

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必登新闻数次，甚至数十次不止。司法官审问案件，即得有

实凭实据，非犯罪人亲供，不能定罪，（于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见夫否同胞，每年中死于贼满人借刀杀人，滥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几，贼满人之用苛刑，于中国言之可丑可痛。天下怨积，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设会审，如御虎狼。乃或援引故事虚文，而顿忘眼前实事，不知今无灭族，何以移亲及疏？今无肉刑，何以毙人杖下？今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至若监牢之刻，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不及，而贼满八方行其农忙停讼，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悲夫！

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藉，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

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又岂当日贼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二耳，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贼满人铁骑所至，屠杀掳掠，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动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

《扬州十日记》有云："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载簿，不过八日，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

吾人为言以告我同胞曰："贼满人入关之时，被贼满人屠杀者，是非我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被贼满人奸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扬州十日记》云："卒常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读此言，可知当日奸淫之至极）记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义，故子不能为父兄报仇，以托诸其子，子以托诸孙，孙又以托诸玄来仍礽。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若有灵，必当不瞑目于九原。

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也。曲阜孔子庙，又人人知为礼乐之邦，教化之

地，拜拟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也。乃贼满人割胶州于德，而请德人侮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教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教化而等伦于野蛮；是谁之罪欤？夫耶稣教新旧相争，犹不惜流血数百万，我中国人何如？

一般服从之奴隶，有上尊号，崇谥法，尊谥为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者，故在黑暗之时代，所号为令主贤君，及观《南巡录》所纪，实则淫掳无赖，鸟兽洪水，泛滥中国。（乾隆饮食黄角蜂，让张家口递至扬州，三日而至，于此可见其奢侈。）嗟夫！竭数省之民力，以供觉罗玄烨（即康熙）、觉罗弘历（即乾隆）二民贼之行止，方之隋炀、明武为比例差，吾不知其去几何？吾曾读《隋炀艳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兽之行，暴著天下？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不已，喜得其酷肖之神也。

主人之转卖其奴也，尚问其愿不愿。今以我之土地送人，并不问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不与之计之较之，反任之听之。若台湾，若香港，若大连湾，若旅顺，若胶州，若广州湾于未割让之先，于既割让之后，从未闻有一纸公文，布告天下。我同胞其自认为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满洲人大忠臣荣禄所以有"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马也，牛马何以受治于人。必曰："人为万物之灵，天下只有人治牛马之理。"今我同胞，受治于贼满人之胯下，是即牛马之受治于牧人也。我同胞虽欲不自认为牛马，而彼实以牛马视吾。何以言之？有证在。今各州，府，县，苟有催租劝捐之告示出，必有"受朝廷数百年豢养深恩力图报效"等语，煌煌然大贴于十字街衢之上，此识字者所知也。夫曰"豢养"也，即畜牧之谓也。吾同胞自食其力也，彼满洲人抢吾之财，攘吾之土，不自认为贼，而犹以牛马视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满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践土，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贼满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不待辨别而自知。贼满人之为此言也，抑反言欤？抑实谓欤？请我同胞自道之。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此言也，不出于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诸于满洲人之口，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耶？山海关外之一片地曰满洲，曰黑龙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贼满人所谓发祥之地，游牧之地乎？贼满人因当竭力保守者也。今乃顿首再拜奉献于俄罗斯。有人焉，已不能自保，而犹望其保人，其可得乎？有人焉，不爱惜己之物，而犹望其爱惜人之物，其又可得乎？

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 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センチセンボツ（译言施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吾播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

贼满人入关所下剃头之令，其略曰：

"向来剃头之制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臣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并限旬日,尽行剃头,若惜发争辩,决不轻贷。"

呜呼!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同胞同胞,吾愿我同胞,日日一读之。

娼妓之于人也,人尽可以为夫,皆为博缠头计也。我之为贼满人顺民,贼满人臣妾,从未见益我以多金。即有入其利禄诱导之中,登至尚书总督之位,要皆以同胞括蚀同胞,而贼满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呜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秽壤,其人则膻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毳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闯入中原,盘据上方,驱策汉人以坐食其福。故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则满人享之。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攻汉,山尸海血,所保者满人。甲午战争之起也,以汉攻倭,偿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满人。"团匪"之乱也,以汉攻洋,流血京津。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同胞,同胞,毋引为已类,贼满人刚毅之言曰:"汉人强,满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愿我同胞当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满洲人之对待我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择乎?夫犬羊啮骨,犹嫌鲠喉,我同胞受此种种不平之感,殆有若铜驼石马者焉。然而贼满人之奴隶我者,尚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达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笔不能宣之。今召发一誓言以告人曰:"有举满人对待我同胞之问题,以难于吾者,否能杂搜博引,细说详辩,揭其隐衷微意,以著于天下。吾但愿我身化为恒河沙数,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发一一音,以演说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之惨状于我同胞前。吾但愿我身化为无量恒河沙数名优巨伶,以演出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之活剧于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有二千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处温带,人性聪明,物产丰饶,江河源富,地球各国所无者,我中国独擅其有,倘使不受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诸恶贼之蹂躏,早脱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屏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吾恐印度也,波兰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亦题中应有之目耳。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红巾,(上海用印度人为巡捕)非洲黑奴,吁,可惨也!噫,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满洲人亡我乎?抑我自亡乎?古人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昨日之中国，譬犹昨日死；今日之中国，譬犹今日生。过此以往，其光复中国乎？其为数重奴隶乎？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自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于世界之理，我同胞速择焉。我同胞处今之世，立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然达人有言曰：“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如是如是，则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二百六十余年之奴隶犹能脱，数十年之奴隶勿论已。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嘻吁嘻！我中国其革命，我中国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国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波拿里，为国民增祸乱。

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

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底源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试问吾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是则革命者，除祸害而求幸福者也。为除祸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当顶礼膜拜者也。为除祸害而求幸福，则是为文明之革命，此更吾同胞所当顶礼膜拜者也。

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虽然，欲行破坏，必先有以建设之。善夫！意大利建国豪杰玛志尼之言曰：

“革命与教育并行。”

吾于是鸣于我同胞曰：“革命之教育。”更译之曰：“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

今日之中国，实无教育之中国也，吾不忍执社会上种种可丑可贱可厌可嫌之状态以出于笔下，吾但谥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闻法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邻邦等。美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英人等，此兴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我国擅其有也。

不宁惟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上自议院宪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于兵连祸结之时，举国糜烂之日，建立宏猷，体国经野，以为人极。一时所谓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其道德，其智识，其学术，均具有振衣昆仑顶，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华盛顿，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何如？一拿破仑何如？其有逾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识之学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颅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国，固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济也，然必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乎有济。吾见有爱国忧时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为华、拿者，若而人其才识之逾于华、拿与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无量无名之英雄，则归诸冥冥之中，甲以尊诸乙，乙又以尊诸丙，呜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专标斯义，相约数事，以与我同胞共勉之——

一，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而如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一，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寇，钜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思汗、觉罗福临等，以游牧贱族，入主我中国，以羞我始祖黄帝于九原，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 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政治者，一国办事之总机关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机器，各机之能运动，要在一总枢纽，倘使余机有损，则枢纽不灵。人民之于政治，亦犹是也。然人民无政治上之观念，则灭亡随之；鉴于印度，鉴于波兰，鉴于已亡之国，罔不然。法律者，所以范围我同胞，使之无过失耳。昔有曰："野蛮人无自由。"野蛮人何以无自由？无法律之谓耳。我能杀人，人亦能杀我，是两不自由也。条顿人之自治力，驾于他种人者何？有法律之观念故耳。

由斯三义，更生四种：

一曰养成上天下地，惟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

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辟之气概。

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已，尽瘁义务之公德。

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第四章　革命必剖清人种

地球之有黄白二种，乃天予之以聪明才武，两不相下之本质，使之发扬蹈厉，交战于天演界中，为亘古角力较智之大市场，即为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夫人之爱其种也，其内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产历史之大原因也。吾黄种，吾黄种之中国之皇汉人种，吾就东洋历史上，能相结相排之人种，为我同胞述之，使有所观感焉。

亚细亚黄色人种，约别为二种：曰中国人种，曰西伯利亚人种。

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更详别为三族：

第一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

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尔，泥八剌及缅甸一带地方，殷周时之氐，羌，秦汉时之月氏，唐之吐蕃，南宋之西夏等，皆属此族。

第三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即云南、贵州诸省，而蔓延于安南、暹罗等国，此族在古代，似占据中国本部，而为汉族所渐次驱逐者，周以前之苗民、荆蛮，唐之南诏，盖属此族。

西伯利亚人种，自东方亚细亚北部。蕃殖北方亚细亚一带，今更详别之凡四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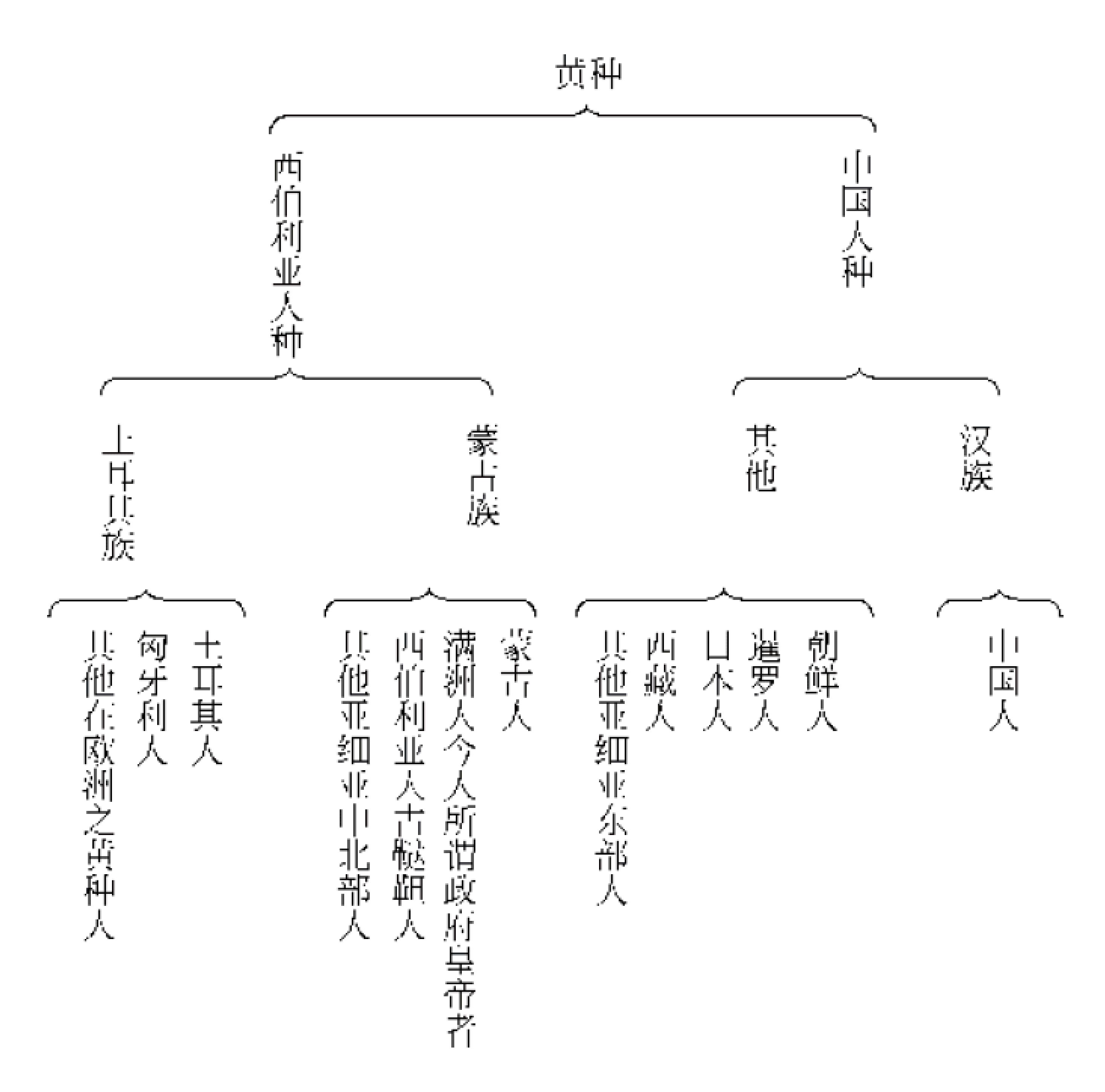
第四蒙古族，原蕃殖于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东边一带，其后次第南下，今日乃自内外蒙古，蔓延天山北路一带地方，元朝由此族而起，将统一欧亚。印度之莫卧尔帝国，亦由此起。

第五通古斯族，自朝鲜北部，经满洲而蔓延于黑龙江附近地。秦汉时之东胡，汉以后之鲜卑，隋唐时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真等，皆属此族。今日入主我中国之满洲人，亦由此族而兴焉。

第六土耳其族，原蕃殖于内外蒙古地，后渐西移，今日则自天山南路，凡中央亚细亚一带地方，多为此族占据。周以前之獯鬻，犭严狁，汉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纥等，皆属此族。今东欧之土耳其，亦此族所建。

今就今日人种之能成立者，列表如下页：

由是以观，我皇汉民族，起自黄河东北一带之地，经历星霜，四方繁衍，秦汉之世，已满布中国之全面，以中国本部为生息之乡。降及今日，人口充溢四万万，为地球绝大蕃多，无有伦比之民族，其流出万里长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达一千余万之多。更进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龙江之左岸俄界，或达南方，进入安南，交趾，柬蒲塞，暹罗，缅甸，马来半岛，更入太平洋，侵入布哇，美洲合众国，加拿大，秘鲁，伯拉，逾南洋侵入吕宋，爪哇，浡泥及澳洲，欧洲者，亦不下三四百万。无资力者，孜孜励精，以劳力压倒凌驾他国人民。有资力者，拥数十百万之资本，与欧美之富商大贾，争胜败于商场中，而不相下。我汉族之富于



扩张种族之势力者有如此，即以二十世纪世界之主人翁，推尊我汉族，吁！亦非河汉之言也。

呜呼！我汉种是岂飞扬祖国之汉种？是岂独立亚细亚大陆上之汉种？是岂为伟大国民之汉种？呜呼汉种！汉种虽众，适足为他种人之奴隶；汉地更广，适足供他种人之栖息；汉种汉种，不过为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汉种汉种，又由满洲人介绍为欧美各国人之奴隶。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其享升平盛世，歌舞河山，优游于满洲人之胯下。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其为洪承畴，为细崽，为通事，为买办，为幺绖于地球各国人之下，吾悲汉种，吾先以种族之念觉汉种。

执一人而谓之曰："汝亡父，非真汝父也，为汝父者，某某也。"其人莫不立起而怒，以得其直而后已。又一家人，父子，夫妇，兄弟，相居无事也，忽焉来一强暴，入其室，据其财产，又奴其全家人，则其家人莫不奋力死斗，以争回原产而后已。夫语人有二父而不怒，夺人之家产而不争，是其人不行尸走肉，即僵尸残骸。吾特怪吾同胞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举国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能忍受之事，举族忍受之：悲夫！满洲人入关，称大清朝顺民；联军破北京，称某某国顺民；香港人立维多利亚纪念碑曰"德配天地"；台湾人颂明治天皇功德曰"德广皇仁"。前之为大金，大元，大辽，大清朝之顺民既去矣，今之为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国之顺民者又来。此无他，不明于同种异种之观念，而男盗女娼，羞祖辱宗之事，亦何不可为！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贡九州，今日之十八行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黄帝之子孙，神明之胄裔，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之名

誉乎？中国华夏蛮夷戎狄，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满洲人与我不通婚姻，我犹是清清白白，黄帝之子孙也。夫人之于家庭，则莫不相亲相爱，对异姓则不然，有感情故耳。我同胞岂忍见此莫大之奇辱，而无一毫感情动于中耶？爱尔兰隶于英，以人种稍异，故数与英人争，卒得其自治而后已。谚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我同胞其三复斯言！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涌大海洋之水，以洗洁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盗女娼之大耻大辱乎？

第五章　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曰国民，曰奴隶：国民强，奴隶亡；国民独立，奴隶服从。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谓其为国民乎？吾敢谓群万万人而居者，即具有完全之奴颜妾面，国民乎何有！尊之以国民，其污秽此优美之名词也孰甚！若然则以奴隶畀之、吾敢拍手叫绝曰："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

印度之奴隶于英也，吾人非欲英隶之，印人自乐为奴隶也。安南之奴隶于法也，非法奴隶之，安南人自乐为奴隶也。我中国人之奴隶于满洲，欧美人也，非满洲、欧美欲奴隶之，中国人自乐为奴隶耳。乐为奴隶，则请释奴隶之例。

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者，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获异宝，登天堂，夸耀于侪辈以为荣；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至极其鞭扑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无怒色，无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几不复自知为人；而其人亦为国人所贱耻，别为异类，视为贱种，妻不以为夫，父不以为子，弟不以为兄，严而逐之于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隶之公同性质，而天下之视奴隶者，即无不同此贱视者也。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

且夫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或谓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吾不解忠君之谓何。吾见夫法、美诸国之无君可忠也；而斯民遂不得等伦于人类耶？吾见夫法、美等国之无君可忠，而其国人尽瘁国事之义务，殆一日不可缺焉。夫忠也，孝也，是固人生重大之美德也，以言夫忠于国也，则可，以言夫忠于君也，则不可。何也？人非父母无以自生，非国无以自存，故对于父母

国家，自有应尽之义务焉，而非为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所得冒其名以相传习也。

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凡一千七百余年，中国全土为奴隶于异种者，三百五十八年；黄河以北，为奴隶于异种者，七百五十九年。呜呼，黄帝之子孙，忍令卒率嫡亲之同胞，举其世袭之土地，为他族所奴隶者，何屡见而不一！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纡青拖紫，臣妾骄人；二圣青衣行酒会，九哥白马渡江来，忠君忠君，此张宏范、洪承畴之所以前后辉映也，此中国人之所以为奴隶也。

曾国藩也，左宗棠也，李鸿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谥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当道名人所推尊为中兴三杰，此庸夫俗子所羡为封侯拜相，此科举后生所悬拟崇拜不置者。然吾闻德相毕士麻克呵李鸿章曰："我欧洲人以平异种为功，未闻以残戮同胞为功。"嗟夫！吾安得起曾、左而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前之曾、左，而共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后之曾、左，上自独当一面之官府，下至不足轻重之官吏，而亦共闻是言！夫曾、左、李三人者，亦自谓为读书有得，比肩哲人也，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其他焉足论！吾无以比之，比之以李自成、张献忠，吾犹嫌其不肖，李、张之所以屠戮同胞，而使满洲人入主中国也，李、张因无学识，不读书，又为明之敝政所迫，而使之不得不然，吾犹为之恕。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为汉种也，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某氏谓英人助满洲平太平天国，亡汉种之罪，英人与有力焉。呜呼！是又因乌及屋之微意也。

曾、左、李者，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也。曾、左、李去，曾、左、李来，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之奴隶，二千年以前，皆奴隶，二千年以后，亦必为奴隶，同胞乎！同胞乎！法国议院中，无安南人足迹，英国议院中，无印度人足迹，日本议院中，无台湾人足迹，印度人之为奴隶也，犹得绕红布头巾为巡捕立于上海、香港之十字街头上，驱策中国人以为乐。然吾试问我同胞，曾否于地球面积上，择一为巡捕之地，驱策异种人以为乐。面包一块，山芋一碟，此固非洲黑奴之旧生活也，同胞同胞，其重思之。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肢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洲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他，能自认为国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竞如是，有国民之国，群起染指于我中土，我同胞其将由今日之奴隶，以进为数重奴隶，由数重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陆，绝无人烟之沙漠也。

近人有乐府一首，名《奴才好》云：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要奴才。他开矿产我做丁，他开洋行我细崽，他要招兵我去当，他要通事我也会，内地还有甲必丹，收赋治狱荣巍巍。满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传入脑胚，父诏

兄勉说忠孝，此是忠孝他莫为。什么流血与革命！什么自由与均财！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强那肯就范围？我辈奴仆当戒之，福泽所关慎所归，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国号已屡改，何况大英大法大美国，换个国号任便载。奴才好，奴才乐，世有强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九分猾，世间何者为龌龊？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间风云多反复，灭种覆族事遥遥，此事解人已难索。堪笑维新诸少年，甘赴汤火蹈鼎镬，达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败相继仆。但识争回自主权，岂知已非求己学。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

第六章　革命独立之大义

与贵族重大之权利，害人民营业之生活，擅加租赋，胁征公债，重抽航税，此英国议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倡革命之原因也。滥用名器，致贵贱贫富之格，大相悬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赋敛无度，此法国志士仁人，所以不辞暴举逆乱之名，而出于革命之原因也。重征茶课，横加印税，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驻兵民间，此美人所以抗论于英人之前，遂以亚美利加之义旗，飘扬于般岌剌山，而大倡革命，至成独立之原因也。吾不惜再三重申详言曰："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辱，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倡革命独立之原因也。"

自格致学日明，而天予神授为皇帝之邪说可灭。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聪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赋之权利可享；今日，今日，我皇汉人民，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盖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嗟予小子无学，顽陋不足以言革命独立之大义，兢兢业业，谨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约为数事，再拜顿首，献于我最敬最亲之皇汉人种，四万万同胞前，以备采行焉——

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中国。

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

所有服从满洲人之义务，一律取消。

先推倒满洲人所立之北京野蛮政府。

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

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人及本国人。

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

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

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

全国男子有服兵之义务。

人人有承担国税之义务。

全国当致忠于此所新建国家之义务。

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各人权利必要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赋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认，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

若建立政府之后，少有不洽众望，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因非新建国家之道。天下事不能无弊，要能以平和为贵，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则与其颠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权利，毋宁平和之为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放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自重之义务哉？我中国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极矣。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得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

定名中华共和国，（清为一朝之名号，支那为外人呼我之词）

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

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

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之事，悉准美国办理。皇天后土，实共鉴之！

第七章　结　　论

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尔毋自暴，尔毋自弃，尔之土地，占亚洲三分之二；尔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尔之茶供全世界亿万众之饮料而有余，尔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无不足。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神族之势力。尔有政治，尔自司之；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尔须自挥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国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

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青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俄事警闻·时局图[1]

谢缵泰

【题解】 兴中会革命志士谢缵泰创作的《时局图》，是近代最有影响的一幅以反帝为主题的政治漫画，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也成为后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经典作品。作品背景是一幅中国地图，列强被画成一群虎豹豺狼，正在恣意瓜分中国，而腐败无能的清朝官员竟然麻木不仁。漫画的寓意“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直观地引发思想冲击。



[1] 《俄事警闻》1903 年 12 月 25 日创刊号，与原图略有不同。

民报·发刊词[1]

孙中山

【题解】本文原载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号。文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另外，作为革命派的主要喉舌，《民报》曾与改良派的舆论重镇、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革命还是改良进行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报刊论战。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夸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

[1] 原文发表于日本明治38年(1905年)11月26日的《民报》创刊号上。本文据影印本《民报》第一号，北京，科技出版社，1957。

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曼。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民立报·炸弹[1]

于右任

【题解】 本文是于右任为《民立报》写的社论。于右任(1899—1964),陕西三原人,革命家、报人、书法家、诗人。辛亥革命前,主办《神州日报》和"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为革命派大造舆论。《民立报》是中国同盟会在国内最有影响的大型日报,1910年创刊于上海,编纂人员均为同盟会骨干,包括宋教仁、叶楚沧、张季鸾、马君武、邵力子、陈其美、章士钊等。

今年之中国,炸弹之中国也。东一炸弹,西一炸弹,轰轰烈烈,防不胜防也。

革党之炸弹,使官场防不胜防;官场之炸弹,使国民防不胜防。

革党之炸弹,人人知之,推其用意,不过仅炸官场而已。官场之炸弹,则救国其名,而炸弹其实,稍稍不慎,则炸中国而有余。

前四国借款也,后四国借款也,日本借款也,英国借款也,一而再,再而三,东轰西击,为炸弹制造家者,则盛宣怀也。呜呼,中国!

[1] 《民立报》第二百十九号,辛亥年四月廿六日(1911年5月24日)。

大清报律[1]

【题解】《大清报律》为中国第一部新闻法，两次颁行。第一次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颁布。因报界抵制，遂由民政部修改，交资政院议决，1911年（宣统二年）重行颁布。正文42条，另有附则3条，共计45条。民国初年尚有援用《大清报律》者，1914年《报纸条例》颁布后始失效力。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

第一条　凡开设报馆发行报纸者，应开具下列各款，于发行二十日以前，呈由该管地方官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存案。

一、名称；二、体例；三、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履历及住址；四、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地址。

第二条　凡充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者，须具备下列要件：

一、年满二十岁以上之本国人；二、无精神病者；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第三条　发行、编辑得以一人兼任。但印刷人不得充发行人或编辑。

第四条　发行人应于呈报时分别附缴保押费如下：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银五百元；每月发行三回以下者，银二百五十元。其专载学术、艺事、章程、图表及物价报告等项之报，免缴保押费。其宣讲及白话等报，确系开通民智，由官鉴定，认为毋庸预缴者，亦同。

第五条　第一条所列各款，发行后如有更易，应于二十日以内重行呈报。发行人有更易时，在未经呈报更易以前，以代理人之名义发行。

第六条　每号报纸均应载明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姓名、住址。

第七条　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

[1]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3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第八条　报纸记载失实，经本人或关系人声请更正，或送登辨误书函，应即于次号照登，如辨误字数过原文二倍以上者，准照该报普通告白例，计字收费。更正及辨误书函，如措词有背法律或未书姓名、住址者，毋庸照登。

第九条　记载失实事项，由他报转抄而来者，如见该报自行更正或登有辨误书函时，应于本报次号照登，不得收费。

第十条　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一条　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二条　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三条　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四条　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

第十五条　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

第十六条　凡未照第一条呈报，遽行登报者，该发行人处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十七条　凡违第二、三条及第五条之第一项与第六、七条者，该发行人处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罚金。

第十八条　呈报不实者，该发行人处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

第十九条　第四条末项所指各报，其记载有出于范围以外者，该编辑人处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条　违第八条第一项及第九条者，该编辑人经被害人呈诉讯实，处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一条　违第十、第十一条者，该编辑人处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二条　违第十二、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第四款者，该发行人、编辑人处二十日以上、六月以下之监禁；或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三条　违第十四条第一、二、三款者，该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处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但印刷人实不知情者，免其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第十五条第一项者，该发行人、编辑人经被害人呈诉讯实，照所受贿之数，加十倍处以罚金；仍究其致贿人，与受同罪。

第二十五条　违第十五条第二项者，该发行人、编辑人经被害人呈诉讯实，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六条　违第十五条者，除按照前两条处罚外，其被害人得视情节之轻重，由发行人、编辑人赔偿损害。

第二十七条 违第十二、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第四款者，得暂禁发行。

第二十八条 暂禁发行者，日报以七日为度。其余各报，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以四期为度；三回以下者，以三期为度。

第二十九条 违第十四条第一、二、三款者，永远禁止发行。

第三十条 违第十二条致酿生事端者，得照上条办理。

第三十一条 呈报后，延不发行或发行后中止逾两月者，如不声明原委，即作为自行停办。

第三十二条 违犯本律所有应科罚金及讼费，逾十日不缴者，得将保押费扣充，不足再行追缴，仍令补足保押费原数。

第三十三条 禁止发行及自行停办者，准将保押费领还，注销存案。

第三十四条 凡于报纸内撰发论说、纪事、填注名号者，不问何人，其责任与编辑人同。

第三十五条 报纸以代理人之名义发行时，即由代理人担其责任。

第三十六条 除第一条第三款及前两条所指各人外，所有报馆出资人及雇用人等，应均无涉。

第三十七条 凡照本律呈报之报纸，由该管衙门知照者，所有邮费、电费，准其照章减收，即予数送递发。其未经按律呈报接有知照者，邮政局概不递送，轮船、火车亦不为运寄。

第三十八条 凡论说、纪事，确系该报创有者，得注明不许转登字样，他报即不得互相抄袭。

第三十九条 凡报中附刊之作，他日足以成书者，得享有版权之保护。

第四十条 凡在外国发行报纸，犯本律应禁发行各条者，禁止其在中国传布，并由海关查禁入境。如有私行运销者，即入官销毁。

第四十一条 凡违犯本律者，不得用自首减轻、再犯加重、数罪俱发从重之例。

第四十二条 凡违犯本律者，其呈诉告发期限，以六个月为断。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律自奏准奉旨文到之日起，限两个月，各直省一律通行。

第四十四条 本律施行前发行之报，均应于三个月内遵照补报，并按数补缴保押费。

第四十五条 本律施行以后，所有前订报馆暂行条规，即行作废。

大江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

黄侃

【题解】 黄侃，字季刚，国学大师，被称为章太炎门下第一高足，同时也是革命先驱之一。1911年，由武汉新军和各界的革命中坚组成的革命团体“文学社”成立。同年7月25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笔詹大悲设宴款待同乡黄侃，席间黄侃针对当时改良派的“和平改革方案”，愤然提笔为《大江报》撰写了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翌日发表于《大江报》，引发新闻史上的“《大江报》案”。本文激发和鼓舞了各地革命义士的精神，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1] 《大江报》，1911年7月26日。

申报·纪大总统莅位大典[1]

申报记者

【题解】得悉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立刻由美返国，并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月3日，《申报》发表《纪大总统莅位大典》，记述了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历史事件。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旧历十一月十三日）为孙大总统赴宁履任之期，各省代表及文武兵官与男女学生计有四五万人聚集下关欢迎。约五时许，大总统莅宁，各炮台及兵舰均申二十一炮，大总统在车上与前往欢迎之各领袖一一握手为礼，随原车由宁省轨道入城。至清督署车站停车，换乘扎花马车，偕各代表同进总统府。即接见欢迎官员。及晚十时，各代表公请大总统至大堂行莅任典礼。是时，总统府前遍悬五色电灯，各国领事亦皆诣府道贺，门外观者不下数万人。欢呼万岁之声震动天地。此诚中国自古未有之盛举也。

大总统莅任典礼秩序单

一、奏军乐，二、代表报告，三、大总统宣誓，四、代表致欢迎辞上印绶，五、大总统盖印宣言，六、海陆军致欢迎辞，七、大总统答辞，八、三呼万岁，九、奏军乐。

[1] 《申报》，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三日（1912年1月3日）。

远生遗著[1] · 外交部之厨子

黄远生

【题解】黄远生(1884—1915),江西九江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辛亥革命后,任《申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以新闻采访和通讯写作著称于世,后在美国被革命党人当作袁世凯御用报人误杀。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远生遗著》,收录其通讯代表作,其中《外交部之厨子》一文对民国初年的政局和新官僚的丑态,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和辛辣犀利的嘲讽。另外,他对记者提出的"四能"要求,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今天仍被奉为新闻人的行为准则。

- 奇怪之北京社会
- 厨子与前清西太后及恭亲二王及李鸿章之关系
- 狗窑之外务部
- 陆子欣君之大功绩

自前清恭王管理总理衙门时代至于今日之民国外交部,其间易若干管部亲王,易若干尚书侍郎,易若干司员,至于今日又将易若干总长,而始终未脱关系者,则余厨子其人也而已。此厨子之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亦在奕劻涛洵之间。其所管家产,有民政部街之高大洋房一幢,有万牲园中之宴春园,有石头胡同中之大和玉,皆京中之巨观也,此厨子在满清时代,连结宫禁,交通豪贵,几另成厨子社会中之大总统,庚子变后,西太后及光绪回[2]銮时,西太后研究媚外主义,乃大宴各国公使夫人及在京东西洋贵妇人,耗资巨万,人所共知也。其时议和大使李鸿章,以世界外交之雄才,参与樽俎之事,已为西太后雇一著名西洋厨夫,以备供奉。既已得面许可次日入御,至于次日,西太后忽谓李鸿章曰,我看明日请客,还是用外务部的厨子罢。此厨子运动力之大,乃至能力回[3]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其他可知,厨子以此,亦所赢不资矣。

---

[1] 黄远生:《远生遗著》,本文据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二编 V.99,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0。

[2] 编者注:原字"囘"。

[3] 编者注:原字"廻"。

余厨子自前清恭王时代，已入外部，凡各亲贵及外部尚侍。有宴会喜庆诸事，厨子无不极力供奉。此诸王公者，亦待厨子以殊礼，以平等主义待之，故诸公家有大庆典时，厨子亦公服掌招待之职，与王公贵人及其时搢绅先生之流，分庭抗坐。此厨子虽号称厨子，其所隶部下，固不止一标一营。厨子固不躬亲七鬯，而其身则以其家产之千分一，捐取得前清候补道花翎二品衔也，此等王公贵人，既屡受厨子馈进，固亦待以友礼，厨子之公子，一赫赫捐纳之外部司官也。以厨子之力，得本部管库差事，全部财政出纳之权，实在其手，而厨子实间接以供刀俎上之鱼肉，又稍以其余沥沾溉司员中之有势力者而为之垫款焉，或小借款焉，司员中或预支薪水，厨子之子奉承父命，无不为之周转。故各司员中之无耻者，则待厨子以丈人之礼，称为老伯。见厨子则鞠躬如也，汪大燮氏自外部司员历跻侍郎，未尝受此厨子分文馈进，故厨子稍惮之。一旦汪赴贺庆望之宴，方及门，遥见厨子方辉煌翎顶，与众客沧济于一堂，愕然不能举步。厨子见汪大人来，则亦面发赧而口嗫嚅，仓卒中避入侧室，汪亦未遑久留，退而告人，谓今日余厨子尚是给我面子，可为荣幸。北京旧官场中传以为笑也。

奕劻管部数年，为余厨最得意之时代，顾其人亦颇能谦撝守分，不敢为十分高倨之状。于本部司员，则竭力笼络之，其时外部衙门，最称阔绰。司员日在署一饭，而额定饭银每人八钱，故外部恒食一席之费，盖六两四钱，司官既贵倨已甚，辄颦蹙谓衙门饭不能吃，故常家食而后上署，于是此等饭银为厨子中饱一半，以此故。则司员需索极多，或临时换菜，或全席都换，或饭不吃而另索点心，厨子无不一一供应，盖厨子之能有今日，其处世哲学固亦有不易学者在也。

外务部之厨，暴殄既多，酒肉皆臭。于是厨子乃畜大狗数十匹于外务部中而豢养之，部外之狗，乃群由大院出入，纵横满道，狺狺不绝，而大堂廊署之间，遂为群狗交合之地。故京人常语谓外务部为狗窑子，京中语谓妓院也。

余厨之历史甚多，记者居京未久，所得特其大事记中之一节耳。自民国成立后，终胡总长之任，人惟求旧，故厨子之盘踞于民国外交部也，如其在满清时代之外务部时，暨最近陆征祥君到任。厨子谨遵常例，送一份绝大礼物于此新到任之陆总长，其礼单未之见，要之决非寻常火腿海参之类。在厨子之意，以为今昔之国体虽异，而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匪今斯今，未尝开罪也。不料此欧洲政治家派之陆子欣君，见所未见，震怒异常。次日到部，乃令司官查明昨日送礼某人，系本部何等人物，此系新总长之一种政治手段。及司官回[1]复，系此光禄寺大夫余君，陆君大怒痛词申斥，即立意开除。厨子震恐，以此项饭碗非寻常饭碗可比，乃遍奔走运动于各司官，求其缓颊。但凡稍有声势者之家，皆有厨子之车辙马迹，其中固有受者有不受者，卒以陆总长之毅然绝然与诸司官之全体一致赞成开除，于是此二十年内盘踞外交部中之厨子声势与王公大人比隆者，也随其旧日恩主之名字以俱去。虽然，以厨子之力，犹可辇致巨金储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厨子之姓名待考，北京人但称为余厨，故余亦余厨之而已。

[1] 编者注：原字“囘”。

新青年·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

陈独秀

【题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是一面思想旗帜,在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时,遭到各方守旧人士的抵制。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这篇文章,回应了对《新青年》的各种非难。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像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

[1] 《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本文据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大公报·平和会议之光景[1]

胡政之

【题解】 胡政之(1889—1949),四川成都人,著名报人,曾任"新记"《大公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大公报》记者胡政之作为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之一,发回一系列相关消息和通讯,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直接影响。这些报道体现了极强的新闻敏感性与政治敏感性,日本欲得山东之野心和英法等国袒护日本之嘴脸昭然若揭。

平和会议与新闻记者

予于一月二十三日自美抵法。甫五日,即大病,荏苒四星期,迄未大愈。久未通信职是之故。今特扶病作书,精神未复,语焉不精,是不得不望读者之原恕也。

法兰西本民主政治之国家,于舆论界素所重视。其首相克列们梭[2]、外交总长毘松均出身报界,故于新闻记者尤好结纳。此次平和大会,除各国代表及代表随带人员得许与会外,吾侪新闻讯者亦得入场旁听。法政府且特派委员为外国新闻记者设一俱乐部,房室之美比于宫殿,设备之周无殊旅馆。计各国报界为平和会议事来法者,美有二百数十人、英有二百人、意有百数十人、日本有三十余人,吾国以纯粹新闻记者资格前来者惟予一人,此外则有谢君东发(谢,江宁人,生长巴黎。其父业商现年七十二岁,乃华人来法之第一人,其母及妻均法人。谢君系法学博士、文学士,近年又习医)与法国报界素有联络,予特邀其以新闻记者资格同入俱乐部,俾为予之助。未几,张君嘉森来,亦以记者名义活动。吾华之新闻记者在法者仅此而已。(未完)

(编者注:1919年4月20日)

平和会议之真相如此

吾述平和会之真相,先欲为国人告曰:立国于世界,当务修养实力,期能自强。盖公法

---

[1] 《大公报》,1919年4月20~24日,巴黎特约通讯。

[2] 克列们梭,今译克列孟梭。

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试观比利时，牺牲几何为协约国之助也几何，使比国任听德国侵其中立假道攻法，则法国早为德属世界，形势岂堪设想？以比功绩之大、损失之巨乃平和会议中其初仅能有代表二人，比于三等国；经比人力争，乃加一人，得入二等国之列。而平和会议之大势，悉为英法美意日五强国所主持。日本对于欧战初无大功，特以其国力之强与在外外交官之运动，竟能与于最强之列，此为比利时塞尔维亚等国所至不平者。予屡闻于比塞诸国新闻记者，所言皆类此。然世无公道，固莫如之何也。凡平和会议之事项，悉由五强代表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二三等国家固无可否之权也。惟五强国之中情形各别，大抵英日结托颇深、步调一致，法国亦多与英勾结，意国则但求增进自国权利利益而已，独美国抱高远公平之思想，殊为弱小国谋利益，在五强中殆似孤立。然威尔逊之背后各二三等国无不赞助其意见也。美国对于我国尤为挚厚，如各分科委员会之委员十九国仅能选出五代表，我国本不易当选，乃威尔逊氏预先示意南美各邦为中国帮忙，故顾维钧、王正廷两君得被选为委员，实赖美人之助。此今日平和会议之真相也。

平和会议即完全由五强操纵，外人称之曰干部，又曰十人会议，盖五强各以代表两人列席会议一切也。凡各国代表全体列席之大会议，盖不常开。两月以来，仅止三次。吾侪新闻记者，惟能赴大会旁听。至平常五强会议及各分科委员会则概属秘密，但由当局者公式发表其议题与大要结果而已。予以二十三到巴黎，二十五日适值大会，因往旁听（旁听时由法外部发券）特纪其光景如次，以见一斑。（未完）

（编者注：1919 年 4 月 22 日）

平和会议之光景（续）

大会会场即在法外交部。地方殊不大，光线亦坏，白日须燃电灯，会场布置当中横置长桌一排。法首相克列们梭中坐为主席，美总统威尔逊、英首相路易乔治分坐左右，更次则英美其他代表之席；后竖置长桌两排分列左右，为各国代表之席；此两排后又分置长桌两排，各代表所带随员之位；更后则为新闻记者席。会场座次中国代表与日本代表正对，惟中国仅有两人，日本则有五席而已。论其上下均在最末也。时届午后三时，主席宣布开会，朗诵五强代表决议案，系主张平和会中设下记五分科会：

一　国际大联合

二　战争责任问题（即研究此次战事应由何人负责与其惩治之法）

三　损害赔偿问题（即研究各协约国因战事所受损失准备向德奥求偿）

四　国际劳动问题

五　国际口岸铁路水道问题

以上之五分会，应由五强国各派代表两员、另由到会之十九小国推举代表五人，共合十

五人组织之。随即宣读五强所派各代表之名氏，并请威总统说明提议组织国际大联合之主旨。此会系用英法两语。语法语者由秘书译为英语，重述一遍；语英语者转译如法语，以告会众。威总统起立演说十五分钟，调之优美、态度之殷挚、练句之精警实为予生平第一次所闻。方其演说至要点处，目光四射于听众；若见听者未大动容，则以下续发警句，必使听者之精神为所吸动而后已。当威氏演说时，全场肃然静听，克列们梭、路易乔治两氏以手支颐目视威氏不稍息，及其语毕，新闻记者席中忽有一人拍掌，此本非会场所许者，其人盖忘其所以而如此，亦足见威氏口才感人深矣。（未完）

（编者注：1919 年 4 月 23 日）

平和会议之光景（续）

继威氏而演说者为英相乔治。其人短而肥，面貌似中国梁士诒氏，所说不外赞成威氏意见，特其态度辞句多激昂悲愤之观而已。嗣则法意诸代表先后为赞成之演说。我国陆专使征祥亦手执原稿朗诵中国赞成之意，旁听席中颇有人赞其法语之纯熟者。随即有比国代表外交总长亥蒙氏起立，谓诸君议论均极是，惟办法究当如何，因责难以十九国选五代表办法之非是；继之者有塞尔维亚、波兰、希腊诸代表赞成比代表之说，要求各派代表加入分会；我国陆专使亦起立发言，主人凡一问题有关系各国得随时派员赴各分会发表意见。诸张语毕，主席起而致答，克列们梭以七十八岁之老人语气态度强毅无与伦比，其人面貌极类袁世凯，法人有以法国袁世凯称之者，以其行事专制也。克氏答辞强横异常，意谓与德国战争者胥五强之力，今兹因有组织国际大同盟之思想，故多招各小邦到会，否则一切径由五强决之可也；又曰，方今协约军之在前线者尚有十二兆人，和议亟应早成，若人多讨论必致多延时日，妨碍进行，好在五强已有委员十人、各小部即不推举代表亦与分会办法无碍云云，态度坚决，比代表数次与争几类口■[1] 最后克氏硬行宣告闭会。强国专制之实况，予竟得亲见之，发予深省不少矣！特告读者知国之不可不自强也。（已完）

（编者注：1919 年 4 月 24 日）

[1] 编者注：口■为报纸原文未破解之电码，原文亦未加标点。

《新闻学》序[1]

蔡元培

【题解】中国新闻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第一部理论专著为徐宝璜的《新闻学》。徐宝璜，江西九江人，中国第一位新闻学教授，被誉为"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和"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然后赴美留学，主修经济学与新闻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1918年10月14日，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蔡元培被推选为会长，徐宝璜和《京报》社长邵飘萍被聘为导师。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新闻学》即为该会的第一项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于去年新设"新闻学研究会"，请文科教授徐伯轩先生为主任。先生草《新闻学》一编，一年以来，凡四易其稿而后定，并征序于余。

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未电通信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然则我国固早有史学矣，何需乎特别之新闻学？

虽然，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已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

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树艺畜牧之业旧矣，积久而始有生物学若[2]农学；思想辩论信仰之事旧矣，积久而始有心理论理宗教诸学；音乐图画雕刻之术旧矣，积久而始有美学。以此例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事业，在欧美各国，均已非常发展，而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Joseph pulitzer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

[1] 此文写于1919年11月17日，原文无标点，现标点系编者自加。此文据徐宝璜：《新闻学》（北京：国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同文印书局印刷，中华民国八年十二月一日初版）之"蔡序"。

[2] 编者注：原文有"若"字，疑为讹误。

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游学北美时，对于兹学，至有兴会，归国以来，亦颇究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今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大意》一编，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甚愿先生与新闻学研究会诸君，更为宏深之研究，使兹会发展而成为大学专科，则其稗益于我国新闻界，宁有涯涘欤。

民国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蔡元培序

晨报·俄都纪闻[1]

瞿秋白

【题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莫斯科采访报道。刊于《晨报》的《俄都纪闻》一文，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作了详细准确的描述和翔实全面的反映，向读者展示了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成为现代新闻通讯的典范之作。与此同时，还完成了《俄乡记程》、《赤都心史》等著作，这些都成为了解十月革命后苏俄历史的名著。

记者到此，以前所写通信，均为较有系统的，原是因为交通不便，通信到京太迟，所以系多日搜集材料，稍加编辑后，才寄回国内，使国内人看了容易明白有头绪些。然而因为一人精力有限，工作太多的时候，所见材料往往疏忽遗忘，所以如今另辟“俄都纪闻”一栏，随得随记，一则做记者自己随后研究编辑时的底稿，二则仍先寄回国，做国人参考的资料。

一、毛类课税令烟草课税令

劳农政府从下食粮税令之后，经济政策渐渐不得不采适合于小农经济国状况的办法，所以协作社问题、工资问题等都在紧要关头。如今又下两令，其内容如下：(一)毛类课税令。以前毛类亦完全由国家公卖，每年收一百二十七万四千六百蒲[2]，此次命令规定改用课税法，废止公卖，每一骆驼年收毛四俄斤(四十俄斤作一蒲——抵中国三十斤，下同)，每羊一头最多年收一俄斤又八分之五，最少一斤的；每年收税分两期，春季毛产于七月十五日开始收纳，秋季毛产则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依此税额每年国家收入毛类当减至六十五万蒲。(二)烟草课税令。烟草公卖办法亦概行废止，另定课说法，每一俄亩(Desiatine)马花烟收二十蒲，雪茄收十五蒲，葡𦰡烟收十蒲。凡秋季额售卖烟草者当交纳课税定额取得售烟执照。由政府另订专称，交易烟草，归协作社经理，每年收入总额尚未能定。

---

[1] 此文写于1921年5月19日，原载1921年5月31日之《晨报》，署名瞿秋白，本文据《瞿秋白文集》之《政治理论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 蒲，今译普特。

二、全俄职工联合苏维埃第四次大会及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

职工联合会问题已在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上有相当的解决。现值实行议决案之期，正在召集职工联合会及国民经济苏维埃，所谓一方是工人组织，一方是国家机关，同时开会，将讨论最近之经济政策——甚为重要。职工联合苏维埃第四次大会之重要问题为食粮政策问题及依照工资上之"物产报联合"，协作社所当任之职务问题。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当磋商食粮课税令之实行办法，及提倡社会主义的工业问题，此数问题之意义当待开会时，始得详悉。然渐就经济大势观之，不外两点：（一）当确实研究规定办法，使企业之大小适合于劳农政府现有材料之数量——现时多数工厂每日工作仅二三小时，因燃料缺乏故。（二）欲使工人生产力增长当速改订工资率。其次则当设法使现在劳农政府之社会主义企业，利用自由的经济交易时，所受种种障碍一概消灭。此数层近日俄报上讨论甚多，列宁曾曰无产阶级有政权、运输权、大工业权，故虽有小商业，而殊不惧资本主义之发展，而反常利用之。只须努力以适当之法提倡大工业而已。

（此两会已于五月十七日开幕）

三、俄罗斯之面包问题

今已届夏季食粮问题非常紧急。据俄报云：（一）因去年收成不好储粮太少，（二）因耕种田地较战前少四分之一。然食粮委员会之分配法尚能对付供给城市工人。每年春季辄有危机，今春尤甚，故至夏初遂有如此窘急之象。其原因乃在今春各地白党暴乱纷起攻击运粮车辆，烧毁库栈，一方面又因食粮课税法公布后，农民渐愿多耕，播种较多而存粮更少。现时由西伯利亚运来者每日食粮一百车，由高加索来者每日七十车，新与乌克拉共和国[1]订约每日由南俄运入四十车，皆归中央政府分配，然尚不足。当局已正设法组织协作社，以备开始与乡村农民交易云。

四、西伯利亚之金矿

俄自与各国订约通商以来，需用金币、生金之量日增。西伯利亚原有金矿，战前一年可得一千五百蒲生金。其地富庶，如即日恢复，一切机器皆尚可用，工人当地可招，食粮问题

[1] 乌克拉共和国，今译乌克兰共和国。

亦不甚困难。雅古次克州(Yakutskaya)[1]有牛油、肉、蒭草,工人甚多,与远东通商可由"远东共和国出口",即能易得茶叶,手工业品,技术品,布匹,镜子,锤子等。此问题甚大,对于东北西伯利亚之经济关系非鲜浅也。现劳动国防苏维埃及国外商业委员会正当讨论办法。

五、劳农政府之行政问题

劳农政府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公报社论云,苏维埃政府之各地方机关有不胜任而不克举政者,有道德堕落者,前在军事时代政府无暇及此。至今积弊甚多,往往有工人农民相率弹劾攻击地方官之事,此须急切设法,不然人民怨毒当局危矣。今军事时代已终止,当移全力以整顿之,此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责任。不日第三次期会中当有处置此等不法行为之办法,而以慰人民之望云云。

六、赤 俄 小 闻

- 白良史克铁道工厂(Briansky)第一次试验以电力掘地,用六齿犁掘深七寸,比煤油机器功效数倍。
- 据俄报前数日自中国运来蚕茧甚多,行经西伯利亚严寒之时幸尚未死,蚕蛾破茧而出,从此俄国亦有中国蚕种矣,于俄国科学界及工业界均有兴味也。此蚕已运南俄,莫斯科亦有。俄教授溪霍美洛夫(Tihomiroff)曰,此蚕仅在高加索及南俄能生存,高加索本有蚕也,然该教授以为中国野蚕无用养护,丝之生产因此或可更廉云。
- 库尔斯克省科学学院发见该省指南针颤动,前莱史德教授(Leisr)掘地一百俄丈,今已至六百俄丈,果发现极大之"磁石层",深数丈。
- 交通委员会出令准人民每人带五蒲食粮乘坐火车。莫斯科苏维埃令残疾者及孕妇得免费坐电车。
- 亚尔哼葛史克[2]之外商部已备十万蒲石棉出境交易及各种机器,伊库次克[3]亦备二十万蒲面。

莫斯科　五月十九日

[1] 雅古次克州,今译雅库茨克州,属俄罗斯联邦。

[2] 亚尔哼葛史克,今译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属俄罗斯联邦。

[3] 伊库次克,今译雅库茨克。

晨报·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1]

李大钊

【题解】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10年,团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倡导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其间,不少青年团体如新潮社等都请李大钊作导师。1922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提倡研究"活的问题"、"真的问题";新闻记者于纪述事实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知识;新闻记者要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等。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仍然不乏启发意义。

我今对于我们北大同学,发起这个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刚才胡先生[2]说新闻事业,是要研究"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不希望诸位替人家做那"充篇幅"的事情。我现在更希望诸位对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点也特别注意。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现在我们北大同学从事新闻事业的,如此之多,将来必能"改造"、"提高"新闻界。因为大学是一个最高的学府,所研究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故由大学出身的人,必有比较的多方面的知识,或有与多方面的知识界接近的机会,希望诸位同学出其所学,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新闻记者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胡先生说,新闻宜注意活的问题,不应单讲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等死的学说。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他变成活的。譬如平日登些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人便全不注意,若当接到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那一天,把他的历史,他的学说,写出来贡献在社

[1] 此文原为李大钊在1922年2月12日发表的演说,后登载于1922年2月14日之《晨报》,本文据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编者注:此为胡适。

会上，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注意了。又如但丁的历史和他的文学，在平日登出来，充充篇幅，实在于一般看报的人没有多大的意味，若在去年，有为他作六百年纪念的事实那一天登出，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兴味来。又如今天高师为达尔文一百十三周年诞生纪念，开博物展览会并讲演会，北京的报馆若有在今日把达尔文的历史、肖像和他的学说的概要登出来的，岂不是格外有趣吗？又如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自治团，在平时写出来，人并不十分注意，若在去年三月十八、九日恰恰是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把这一段历史纪载出来，登在报上，岂不是绝好的材料吗？可见死的材料，若是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若作平日充满篇幅之用，因为他与现实的生活不相关联，于阅者亦丝毫不发生兴趣。照这样子做去，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例如新疆、甘肃发生地震，我们便去访问地质学家。太阳忽然现出红光，我们便去访问天文学家。某种政治问题发生，我们便去访问政治学家，请他就此事实为学理上的说明。此外如有各国学者来华，亦当随时访问，叩其意见，以转为介绍于社会。这是新闻界对社会灌输知识的职分与方法，这点诸位要注意的。

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的〉[1]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但是现在新闻界，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这是旧习惯未退尽的一个最大的表现，也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这一点也希望诸位同学注意。

我们北大同学，在新闻界的人发生这样一个团体，是一件很有关系的事。胡先生说，不希望主张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发挥个性固然不错，但是有了这个团体，总可以藉此情谊，立在同一的、知识的水平线上，常有机会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遇有国民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总可以定一大目标，共同进行，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民的宣传的责任。

敬祝北大新闻同志会的进展无涯！

---

[1] 编者注：原文如此。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

毛泽东

【题解】《政治周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政治刊物，1925 年创办于广州，由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兼任主编。从第 5 期起，由共产党人沈雁冰（茅盾）等接任主编，萧楚女、杨开慧助理编务。这篇发刊词阐述了革命报业的两大原则，一是服务革命，一是注重事实。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晦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

---

[1] 《政治周报》第一期（1925 年 12 月 5 日），本文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合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京报·飘萍启事[1]

邵飘萍

【题解】邵飘萍，浙江金华人，民国初年名记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据罗章龙证明，邵飘萍曾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邵飘萍因开罪北洋政府遭到通缉，被迫避居使馆。4月22日，邵飘萍在其创办的《京报》上发表平生最后一篇文章，即《飘萍启事》。两天后，邵飘萍被北洋政府诱捕杀害。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

[1] 《京报》（1926年4月22日），本文据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社会日报·官僚之运气[1]

林白水

【题解】林白水，福建闽侯人，民国初年著名报人，1921年创办《新社会报》，1922年更名为《社会日报》。就在邵飘萍遇害的同年8月5日，林白水在报上发表《官僚之运气》，揭露政客潘复与军阀张宗昌狼狈为奸的丑闻，将号称张宗昌"智囊"的潘复比附为"肾囊"，"终日悬挂于裤间"。于是，当晚即遭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枪杀于天桥，成为当时又一位因言贾祸的记者。由于林白水与邵飘萍的遇害相隔百日，故被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1985年，被民政部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吴佩孚毕竟是大人物。客自长辛店来者言：吴每日在车站车上办公，如此炎暑，车中斗室，人所难堪。而吴办公点钟，自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始回寓休息。近来酒亦不多饮，暇时惟观书、浇花，以资消遣。日间起居动作皆有定时，颇与清代中兴将帅相似，惟性颇执拗，颅脑简单，不谙政治，其思想陈腐，意见执滞，与合肥极相类。最近张子武往谒，谈次颇以中枢乏人，意欲为梁燕孙道地：闻未来总揆，以梁为宜。吴应之曰：是卖国党也，梁卖了国，又想再做总理耶？吾闻久住北京者，必为官僚政客所包围，立变宗旨。君住北院，为期亦不少矣，云云。子武碰此软钉，黯然而退。夫梁虽为交通系首领，而卖国则并无故实，吴此语亦不过随便道之。然为大人物，则不宜如此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足见其脑筋之简单。中央政治若长在吴大帅指挥之下，恐终须弄得一团糟，然也足见梁氏做总理之运尚未到来！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袴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袴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经某君极力斡旋，垂即提出国务会议矣。因先期宴客，以语某军阀，意欲讨好，不料某军阀大不谓然，且云某某无必须畀以某缺之必要，随便与以督办之名可矣。于是变更前议，派一剗池子差事，肾囊大为懊丧，复向某军阀噜苏。闻昨

[1] 《社会日报》(1926年8月5日)，署名白水，本文据林伟功主编：《林白水文集》(下卷)，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刊行，2006。

日政府又接到某军阀来缄，盖为某某进言者，且云前日所谈，并未指明刳池子一事，奈何真使某某刳池，未免过于难为他矣。以后某缺如乏人，仍望为某设法。当局得信，难于置复，有人谓此亦不过当面敷衍肾囊先生，并非某军阀之真意，可以不必作答，遂搁置之。可见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求为督办，终不可得，结果不免于刳池子之玩笑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某外交总长，自合肥卸职后，日抱不安。适某大军阀至津，即托人介绍往谒。某大军阀一见，即下一番教训，弄得面红耳赤，懊丧而归。介绍人对之甚为抱歉，复进言某大军阀，谓某虽无状，究系中央特任官吏，宜稍加优礼，不妨请他吃一顿饭，以示优容。某大军阀允之，即下请柬，约翌日下午吃饭。及期，某去，某大军阀假以辞色，口称"总长"不置。饭罢，即命左右安排场面，请"总长"入场推牌九。某辞以未带现款。某大军阀云：此无妨，即命左右到账房拿钞票十万来，借与总长作赌本。某至此，无法拒之，只得听命，赌未及半，赢得数万金，方私自庆幸，而某大军阀忽下大注，未及一小时，而某已将十万本钱，输去九万八千。某大军阀略昂其首，一声呵欠，谓时已不早，请"总长"即在此间安歇一番。即有一副官来，引入一室，此时账房先生踵至，问"总长"十万欠款，可否即开支票，以便归章。某云：深夜无处告贷，请宽至明日，当为设法。账房先生有难色云：适闻以大帅之命，不得不将军饷先行挪借，明晨即须支付，务请"总长"及早设法，免于未便。某颔之，一夜苦思，不能成寐。天甫破晓，见室外监视之兵不下十余，知难脱身。乃以电话向某同乡告急，借得十万付与账房，始狼狈而还。如某者，可谓自投罗网，讨一没趣，亦时运该当倒霉耶！

大公报·本社同人之志趣[1]

张季鸾

【题解】《大公报》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02年创办到1925年停刊；第二个时期，为所谓新记《大公报》；第三个时期，则是新中国以来在香港的发展。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出“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报业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军权压力，重逾万钧；言论自由，不绝一线。而全国战兴，百业俱敝，报纸营业，遂亦大难。通观国中，除三数社外，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也。然察民国以来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其原于环境者半，原于己身者亦半。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俾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而事实上能之者几何？

况国事败坏，报纸实亦负有责任。是以特殊势力之压迫言论，固足彰少数人之罪，而不必即反映言论界之功；国民虽痛愤强权之非，而不必即谓报纸之是。一言蔽之：舆论亡矣！国民即欲审利害、定国是，将焉赖乎？本社同人投身报业率十余年，兹复以言论与国民相见，识浅力微，无当万一，仅举四端，聊以明志。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

[1] 《大公报》，1926年9月1日，原文署名“记者”。

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以上四者，为吾人志趣之大凡。至于注重社会经济，详论国际潮流，总期勉尽现代报纸应尽之职务，以抒其服务社会之诚。虽然，其志则然耳。当兹神州鼎沸之秋，凡我全国同业所受有形无形之压迫，吾人宁能独逃。尤痛者，法律失效，纲纪不存，而独愿发扬清议，享现代国家报界普通之权利，宁不奢乎？荆棘满地，冥夜长征，吾人惟本其良知所诏示，忍耐步趋，以求卒达于自由光明之路。各界人士，南北同业，其同情吾人而有以助之乎？不胜馨香祝之矣！

良友画报·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1]

【题解】1926 年，伍联德在上海创办《良友》画报，成为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一份综合性大型画报，先后聘请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为主编。《良友》以摄影照片为主，兼有绘画、漫画等艺术作品。它报道时事新闻敏锐快捷，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诸如西安事变、淞沪会战、延安生活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等均有反映，同时对欧美等地新闻也予以关注和报道，刊有斯大林画传、罗斯福画传、希特勒画传等专题。1926 年孙中山诞辰 60 周年前夕，《良友》杂志发行了《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以 54 页的篇幅进行集中报道，体现了其关注国计民生的办刊理念。



---

[1] 《良友》，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初版（1926 年）。编者注：本期为《良友》1926 年第 10 期之号外，原为彩版。

中央日报·从军日记（节选）[1]

谢冰莹

【题解】谢冰莹，湖南新化人，记者、作家。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随叶挺将军讨伐北洋军阀杨森、夏斗寅，将途中见闻与感受写成日记体文章投寄《中央日报》，得到副刊主编孙伏园赞赏。文章连载发表后，引起各界反响与赞誉。这些日记体报道以热烈的情感和流畅的文笔，记录了大革命时代的历史风云，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

我真高兴，无论跑到什么地方，看见的都是为主义为民众战斗的革命军，都是含笑欢迎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车停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有许多百姓围拢来安慰我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真是辛苦很了，你们坐下歇歇，吃吃茶罢。"他们的诚恳，他们的殷勤，真是形容不出，他们见了我们的快乐，是从心坎深处发出来的，我们一定难于想象他们那种眉开眼笑的样儿，也许有人知道吧。

一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的车停在土地堂了。我们奉师长的命令在宣传队里派二十人去当看护，这些看护是要选从前预备出发河南救护的同志，于是我当选了。听说昨天我方的战士本来有许多可以不死的，因为没有人救护，打伤了的和打死了的通统丢在路旁，任他们怎样痛哭，怎样哀号，没有人理会他们，因此误死的很多。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难过得很，所以今天派我们去救护，我们是很愿意的。除了从前的救护队外还有二十余人愿意参加，因为只需要二十人，所以她们都落第了。

在铁道旁边的草地上我看见了三个受伤最厉害的战士，其中有位左腿和腹部受伤的同志，满身血淋淋的，而且除了上身一件小领褂外都是赤裸裸地浸在鲜红的血液里。他的呻吟，他的"哎哟"声，无论谁听了，无论是个什么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伤心，也会流泪，更会鼓起自己的勇气，蹈着死者的血迹，继续伤者未完的工作，努力去与敌人奋斗！我这时真要挺身上前线了！真要赴流血牺牲的战场去了！然而为了要救护他们受伤者，我只得暂时藏起我的热情，很细心的去做间接杀敌的工作——因为救一同志，即杀一敌人。

[1] 《中央日报》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连载，本文据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谢冰莹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土地堂全体的百姓都跑完了，屋子里都是空洞洞的没有一点东西。我跑去找一位五岁的小朋友，进门时除了一个守门者外看不见一个人，我问那人道："这家的主人哪里去了？"

"通通都走了，你家！"

"为什么我们革命军来了，他还不回来？"

"他哪里知道呢？他跑到离这里六十多里的乡村里去了。"

在这条街上驻着的都是第二军第六师的军队，我们救护队就住在我的小朋友陈文宪家里。我们跑到一位姓董的家里和几个老百姓讲话。他们都是听说革命军到了才回来的。我们同他们随便讲话，妇女们很了解我们的军队是革命军，是帮助他们打敌人——军阀——的革命军，尤其是两位"男家"很明了主义，原来他们都是加入了农协的。董海云的哥哥是农协会的常务委员，他的妻子有位S贼的土匪想强奸她，她两手紧抱着她的儿子，那万恶的土匪就把小孩撕做两块，好伤心呵！好残忍呵！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一定会切齿痛恨军阀的横蛮，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替无辜遭惨死的小孩滴几点伤心泪，尤其说给做母亲的听了，她一定会特别感到伤心，会特别多滴些伤心泪，同时她也会特别感到"打倒军阀"的必要。董海云说他的哥哥时常介绍书——革命的书——给他看，所以他对于主义很明了。他知道自己的贫穷，不是"天赋之命"，而是军阀，土豪劣绅，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剥削使然，他连祖宗的神位都丢了。他说了一句很令我惊奇的话，因为我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为普通人说不出的话。他说："我这里是个祠堂，但现在我们要消灭家族观念，所以改为十区三分部的会址了。"他又说这次是S军捣毁了农协的，因为有几个土豪劣绅在勾结他们，唆使他们行凶。我当时和王继宗同志要求他说出那些王八蛋的土豪劣绅的狗名来，他不敢说。后来经我们解释我们是来做农运工作的，是来惩办土豪劣绅的，这时他才说出一个名字。后来我们要求到极迫切的时候，他才带着继宗到他那又小又黑的房里去，他告诉了好几个土豪劣绅的名字，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发表，因为这个与董同志有关系的，而且这时那些军阀的走狗们已走了，不然，我们把他活捉过来弄死就没有事了。

董同志的哥哥已逃走了，此刻还没有回。他说明天一定去找，他有一个要求，对于农协要求发枪，因为有了武器可以"杀敌救已"。他说这次假若农协有枪，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这一点我们当然承认他是有价值有必要的要求。"工人武装"，"农民武装"，"学生武装"，这几个武装问题，的确要马上解决的。

四点钟了，我的肚子还是凹得像"什么"一般，早晨虽在肚子痛的时候吃了几口饭，然而此时肚子好了，饭也想吃了，但是哪里有充饥的食品买呢，连药店里的红枣都没有了。唉！可怜的老百姓，该死的恶军阀！

大公报·蒋介石之人生观[1]

张季鸾

【题解】蒋介石与张季鸾、国民党与《大公报》的关系错综复杂，可谓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识。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次日，张季鸾发表了这篇有名的评论，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等。文章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为新闻评论之经典。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男女，人之大欲也。其事属于本能的发动，动物皆然，不止人类。人生得真正恋爱，固属幸事。然其事不可必，且恋爱对象，变动不常，灵魂肉欲，其事难分。自生民以来，所谓有美满之姻缘鲜矣。然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专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或者非洲生番如此，中国不如此也。夫文明人所认为之人生意义，一言蔽之，曰利他而已。盖人生至短，忽忽数十春秋，与草木同腐，以视宇宙之悠久，不啻白驹之过隙。然而犹值得生存者，则以个人虽死，大众不死故。所以古今志士仁人之所奋斗者，惟在如何用有涯之生，作利人之事，而前仆后继，世代相承，以为建筑文明改善人类环境尽力。行此义者，为人的生活，不然为动物生活。得恋爱与否，与人生意义无关也。或曰：此言固是。然得恋爱，始能工作，失恋爱则意志颓然，蒋氏之意仅在是耳。然此亦大误。盖在有道德观念知人生意义之人，其所以结构一生者，途径甚多，不关恋爱。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记，成中国第一良史；美国爱迪生，一生不娶，发明电学，裨益人类，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

目蒋氏之言，若即此而止，犹可不论，盖人各有志，而恋爱万能之说，中外皆有一部分人持之。蒋氏如此，亦不足责。然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

[1] 《大公报》，1927年12月2日。

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十八世纪以来之革命潮流，其根本由于博爱而起。派别虽多，皆为救世。故虽牺牲其最宝爱之生命而不辞者，为救恶制度恶政治下之大众，使其享平安愉快之生活故也。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连哉？呜呼，常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

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或曰：天下滔滔，何严责蒋氏？曰：果蒋氏自承为军阀，为官僚，则一字不论，其事亦不载。而蒋氏若自此销声匿迹于恋爱神圣之乡，亦将不加以任何公开之批评。今之不得不论者，以蒋氏尚言革命之故耳。吾人诚不能埋没古今天下志士仁人之人生观，而任令一国民党要人，既自误而复误青年耳。岂有他哉？

新生周刊·闲话皇帝[1]

艾寒松

【题解】艾寒松(1905—1975),江西高安人。曾加入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该刊被国民党查封后,又参与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1935年5月,艾寒松在《新生》周刊发表杂文《闲话皇帝》,其中有一段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结果招来日本的寻衅抗议,引发著名的"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无理要求下,于当年6月查封了《新生》周刊,逮捕了杜重远。新中国成立后,艾寒松曾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汉高祖刘邦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看见秦始皇的出巡,声势威赫,臣仆如云,他这时候不禁从旁叹口冷气道:"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这一句话活画出历代野心家想做皇帝的一般心理。他们的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决计不是为了什么救民于水火,那不过是漂亮的幌子,实际上是怀抱着一种做皇帝的罗曼司。所谓三宫六院,佳丽三千,谁不想享受!也许过去历史上的传说把皇帝的享受描写的过火了一点儿,我们未敢置信;然而就在现今的中国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皇帝所享受的遗迹。你如果是到过北平的,而且又曾去参观过清朝的许多什么宫什么殿的,当你跑进那巍峨的宫殿的时候,看见了各种各样的古董珍物,高高的金銮殿,与皇帝的宝座,登时可以想象到当日皇帝的尊严。你是有野心的,或是一个富于敏感的人,我想:你的潜意识里一定也要发生"大丈夫不当如是耶"的感触了。真的,皇帝是可为而不可为。有人说,袁世凯之所以做到大总统还觉到不舒服,总大概是为了大总统还不够威严,因为大总统是所谓"人民的公仆",而皇帝则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就是讲起见面礼来,皇帝是必须要朝拜,三呼万岁。袁世凯原是清室的大臣,亲自要过这一套的,难怪他定要过一过皇帝之瘾而后快了!

可是做着皇帝,不一定都是幸福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倒霉的皇帝: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捉去了,叫他们穿上了青衣站在一旁侑酒,这算是可怜之至了;有些皇帝被奸臣逼得自尽的也有;"曹操逼宫"的这出戏,我们总都看见过了罢,汉献帝被曹操逼得那末的可怜!还有,有一个好佛的帝王,却被他的臣子逼得活活地饿死了,这就是梁武帝饿死台

[1] 《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四日出版(1935年5月4日)。

城的一个故事；此外有些末路的帝王，竟向天祈祷，愿来生来世，不再投生在帝王家。这可见做着帝王又是如何的苦恼，像欧洲法国的皇帝还有上断头台的。

虽然这样，我们中国的皇帝算是取消了，然而现世界却是还存在着不少的皇帝，这可又怎么去解释呢？像现在：英国有皇帝，意大利有皇帝，日本有皇帝，南斯拉夫有皇帝，暹罗也有皇帝。这种过时代的古董各国为什么要保存它，不把它送进博物馆里去呢？这自然是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的。现在的皇帝可是大不同于从前的皇帝了。从前的皇帝，能干点的，真是一日万机。忙的个不得了，威权当然也是高于一切，"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就是糊涂一点的皇帝，三天两天的朝是要坐的，大小的事情还是要问过他一下，方才敢做。现在的皇帝呢？他们差不多都是有名无实的了，这就是说，他们虽拥有皇帝的名儿，却没有皇帝的实权。就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意大利与大英帝国内的皇帝所尽的作用也是这样。在意大利，我们平日只知道墨索里尼是意大利唯一的独裁者，意大利皇帝的消息，报上是不大看见的。大英帝国呢？除了去年英国皇子结婚，轰动闹热了一下，使我们知道英国尚还有皇帝，平常的日子，皇帝只好深处宫中，有时候看看戏或打打猎罢了。名义上他是印度的皇帝，加拿大的皇帝，澳洲的皇帝，及英伦三岛的皇帝，(King of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这是一个多么尊荣的名称啊！但英国人却老实不客气的把他们的皇帝当作一种高贵的装饰物(Figure Head)，也许还有一点保存古董的意思，不过事实上因为现代真正统治者的傀儡则一，所以我们称现在各国的皇帝叫做傀儡皇帝倒很名副其实。并不像日本那样将天皇捧的神圣不可侵犯。

读者有不相信我的话的吗？我可以再举出两个傀儡皇帝来。一个是南斯拉夫的国王彼得第二，一个是登位不久的暹罗新君安那达。这两个国王可说是现世界上年纪最小的国王。彼得第二不过只有十一岁，原来在英国好好的读着书，只因为去年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到法国去的时候，在马赛被人打死了，于是这位年仅十一岁的小孩，不得不坐上皇帝的宝座上去。尽管报纸上说得他如何的聪颖绝伦，有异常儿，我们不相信他能够统治着南斯拉夫，如果没有旁的人来帮助他。暹罗的这位幼主呢？他的命运也和彼得第二一样，年龄据说不过只有九岁，较彼得第二还要年幼，书固然读不成，自己日常的生活尚不知道怎样去应付，

却要叫他来做一国之主，这不是有点近乎开玩笑么？不是，现在的皇帝本来都是傀儡，不要说是九岁，就是再小一点，他还是可以做皇帝。

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还要数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做现在的皇帝，本就等于傀儡，而溥仪更是傀儡的傀儡，自然益加感到做皇帝的悲哀，如同过去所有的末路皇帝一样吧了。

大公报·鲁西流民图(节选)[1]

萧乾

【题解】1935年夏季,鲁西、苏北发生严重水灾。时为《大公报》记者的萧乾与画家赵望云共赴灾区采访报道,萧乾写作,赵望云写生,其文章和画作先由《大公报》随时发表,后辑为《流民图》。《流民图》描述了当时灾民的悲惨景况,其中运用文学语言及修辞手法,增强了报道的生动性,成为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的名篇。

大明湖畔啼哭声

济南城里到处淙淙的流着小溪,也流着成群低声叹息的难民。大明湖又荡漾起秀逸的秋色了,风吹得尖长的蒲叶摇摇动撼。青簇簇的千佛山依然迎面耸矗着,湖畔可失却了它往日的宁静。张公祠,铁公祠,汇泉寺,一切为文人雅士吟诗赏景的名胜都密密地填满了人。这样狼狈褴褛的人当然不是游客。他们不希罕可餐的湖色,远山的倩影。他们直直瞪着饥饿的双睛,张着乞援的胳臂,争吞着才领到的黑馍馍,嚷着要挡冷的衣裳。和幸运的同类一样,他们也曾有过房住,有过田耕,有过家来温暖他们劳作的身心。但跋扈横暴的黄河红眼了。它夺取了他们所有的全部,并还逼上门框,逼上炕沿,逼上屋顶墙头甚而树梢,威胁着要他们的命。他们不服:连着几个昼夜,老少合力担土负石,拼命想堵上决口,为生存而抵抗自然。但人力已属有限,孤单散漫的人力就愈发微弱了。终于,他们张着两只泥污空空的手,溃退了下来,落魄到这大城里。

拐过一个土墙角,我听见了一片嘈杂的啼哭声。我正猜想是丧事祭奠呢,引路的友人说:"这里便是收容所!"

时候是大早,深秋正用澈骨的冰冷提醒着人们寒冬的将至。收容所门前挤满了才逃上

[1] 这组系列报道以"本报特派员水灾视察报告"为名在《大公报》上刊出,包括《鲁西流民图·济南车站之素描》(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山东之赈务》(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大明湖畔啼哭声》(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八日)、《苏北灾区流民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九日)、《邳县的防灾工作》(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宿羊道上》(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和《宿羊山麓之哀鸣》(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等。

来的难民。他们几乎颤抖成一团，胸上写着号码的白布条迎风吹动着，也随着那些瘦弱身躯颤抖。完全受着本能支配的孩子们无力地跺着小脚丫，“冷呀，冷呀”地嚎啕着。那声音是有传染性的。一个孩子可以哭醒了许多缩在避风角落里的孩子们。哭，发泄了他们内在的要求，却更增加了冷意。

一个中年妇人手拉着个裸体的幼孩，走在人丛的前列，向我大声絮絮地数落着：“先生，你给俺们想个办法罢。水是半夜来的。俺孩子光身逃出。俺想秋后水必然退了，可是已九月了，家还在水里泡着。俺这孩子——”说着，她抱起来竟挡着我的去路：“俺就剩这么一个了！他爹前年给土匪毙了——”

引路的友人用省府已在筹办着冬衣的话劝止她。许多随在她后面的难民交换起各种眼色来。

我迈过收容所的门槛，即刻一种难堪的味道扑向我来。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和两厢都躺满了裹着破蓝布的人。充满了我耳边的还是哭喊声。迎门，一个年纪近八十的老太婆正和一个小女孩争着一片破军毡。老太婆由脚步声觉出有人走近，就用她瞢瞆红肿的双眼寻找。她颤颤地嗫嚅着：“你小丫头子，俺七十八了，俺夜夜冻得睡不着。你抢啥！”

我踩着残破的席角向里走，多少期盼的眼睛由各角落扑来。作母亲的忙堵上孩子啼哭的嘴，因肚囊空虚而昏睡着的老媪也微微抬起了头。我很惭愧，因为我听到一个低微的私语：“乖，放赈先生来了，俺们明儿就有被盖了！”

天真无邪的孩子！适才还哭闹着呢，听了她妈无稽的安慰，就又玩起自己耳环来。她会哭，可不懂得愁。愁的却是不肯大声哭出的母亲。我听到她们的交语了，她们是在互相劝慰着。她们劝慰最好的材料，便是自身遭遇的凄惨。

“唉，俺他爹有水臌症，俺弄不动他。爷一共留下了二三亩地，这回给天淹个净。水来了，俺说不逃，死就死在一块，他爹非叫俺上船。俺这时也不知道他的死活——”妇人眼圈已经发红。她像后悔逃到这大城里来。这里人多，但寄居在陌生人丛中，她越发怀念那朝夕聚在茅舍下，有时打她有时疼她的丈夫了。

“大娘，可哭不得！孩子哭得够惨了，俺们可别凑。愁有啥用呵，大娘，俺还不是一样！俺他爹上关东卖烟叶子去了，水来时亏了俺舅舅照应。都是命！——命呵！”劝慰着别人的，这时却也垂下头叹息起来。

靠着圆胖的柱，蹲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虽然涂满泥迹，她有一张清秀的脸，身上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衣裳。那必是一件由世界某角落施舍来的。一件成人的短衫作为她的长褂，虽还太长了些，但原来的施与者却绝想不出一件旧衣可以使这女孩引起多少嫉妒，使这小小生命显得如何活泼。

我俯身看她：两只削瘦的手正盘旋在一头蓬乱的苍发丛中。躺着的是一个患病的老太婆。她仰起头，用没有牙齿的口告诉我：“痒得慌，俺这孙女孝顺，她给俺拿虱——”

靠着门框，一个中年妇人怀里抱个孩子迎上我来。她硬由孩子嘴里拔出正在吮吸着的

瘦奶，搬过孩子的脸瓜给我看。我不忍定睛看了。遍满了那脑瓜的是黏黏的脓疮。“俺这孩子是捡的！”妇人告诉我。大水来的时候，她男人把她们都弄到墙头上。她曾经失手把那孩子丢在水里。她哭着摸呀摸呀，水仍在涨，天落着滂沱的雨。孩子过后自己漂上来了。用力把小肚肚里的水挤出，孩子竟活了，可是头上满了脓疮，脸庞黄瘦如饥猴。

门后面藏躲着一个少妇。我心里正猜想她藏躲的原故，因为她身上居然有一件齐整的长袄。我把问别人“你哪里人？”的话问她，她背过身去了。适才抱着脓疮幼儿的妇人指着她插嘴说：“大爷，这也是俺庄上的。她出阁才两天就闹起大水，她想她娘家的妈——”我端详一下这新娘子，她耳叶挂着的新镀环圈颤动着，这时候她已有些呜咽了。

我托着一颗沉重的心，踱出收容所的门槛。也许母亲们又撒开了堵在孩子嘴上的手，一片“冷呵，冷呵”的啼哭声由我后面紧紧地追来。秋风吹得蒲叶呼呼地响，湖面似飘着一片愁苦的灰云。（十月四日乾寄自济南）

苏北灾区流民图

在全苏北八十万灾民里，邳县被灾人口占五十万。最近专员公署为整理灾区善后而训练的百二十指导员中，计铜山三十人，沛县三十人，丰县三十人，邳县五十人。这分配的比率说明了邳县灾情在苏北之惨重程度。该县分七区，共辖百十八乡镇。这水祸害苏北最厉害的不老河，恰经邳境，东流入县境西南之运河。自从微湖黄水经不老河两路夺运以来，全县有六区土地尽被洪水浸淹。站在宿羊山头四瞩，再看不到青葱的田庐。昔日的村墟，如今成为一片汪洋，只剩下一簇簇半浸着的树顶留着太平时候的残迹。

苏北居民惯于在春夏之交，将棉衣拆开，留待秋天缝做。目前宿羊山麓收容所里的灾民，日夜唤着“冷不起！”邳县冬季主要农产物是大麦。因为土质关系，水纵使在两月里可以退落，运河南岸也无望种麦了。往返船只，时常有耕牛驴骡运出售卖。一只能推磨能代步的健驴，两块多钱就可以买到。因为推磨已经没有了粮食，遍地尽是水，船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了。比鲁西侥倖，苏北农民虽收割了高粱，但棉花和芝麻却全淹没了。如今下游为了宁淮工程，水无处宣泄，上游缺口未堵上，黄水仍滔滔灌来。秋麦的无望，使多匪的邳县治安更可虑了。截至今日，股匪虽尚未发现，绑案却已屡见迭出。一年来，在秦县长坚毅缜密的努力下，邳县在治安和生产上皆获到可惊的进步。在民众刚有些安静日子过的时候，水来了；一切建设皆遭到毁灭。保甲制度，合作组织，社会改革，一切计划都随了田庐一并沉沦。在整个的混乱局面下，局部自强不息的努力是这样悲惨地受着无从避免的挫折呵！

一

我哪里是在乘火车！两边车窗外尽是白洋洋的水，坐在陇海路的车里，我竟有跨海渡

洋的幻觉了。大湖站以西，还只是轨道北面汪着无际的大水，水里斜卧着坍倒的草屋；浮着狼狈的小木筏。南面干土上却还有牛车满载着新割的禾稼。草垛上坐着衔了烟袋的农夫，成为一幅水陆与悲喜的绝妙对照图。车过大许家站，大水便已浸溢到轨道的两边了，不再看见干土，漂在水上的尽是逃难的木排和小船，上面堆满了由一间农家茅舍搬出的零星什物，坐着一簇表情呆痴的逃荒人。我俯首向车窗外探望，陇海干线的路基虽还稳固，横暴的水正在不甘休地用猛浪击撞着护路的木桩和石块呢。

在运河站下了车，我们便向县城出发了。承熟人指示，我们决定沿运河大堤北行。本来三十五里的旱路，这下要多走出十余里。如果忘记当前的残迹，我应当称赞这大好的江北风光，河堤两岸蹒跚地游着芦鸭，伴了泊船的倒影，堤坡上坐着戴竺帽的老渔夫。境界美到如画了，但这渔夫见了我们就微微直起腰来，苍白的胡须上淌着两串老泪。他指着面前的水，喃喃地说："先生，这是我祖上三代留下的一点薄产，二十天以前还长着绿庄稼！"

堤身是黄土堆成的，坡底有高粱秸护卫着。走在上面，大水不时由两边卷起白白的舌叶，吐着愤怒的泡沫。据路人说，水势到如今仍是涨落无定，刮东南风就退些，刮西北风就涨，八月节那晚一阵暴风雨几乎捣毁淹没了全县。为了避免拔堤惨剧，堤旁的大树都被锯断。折垂的树身披满了干黄的枯叶。堤沿残破的树和水中残破的村舍遥相喟叹。时常在水浅的地方，有被水冲出的棺村[1]露出。由棺身为水浸透的情状，可以想象里面泡着的尸骸是怎样地怕人。天上盖满了灰云，静穆的水面上漂着几只逃难的船。孩子哭着，大人向轨道南方指。可怜的人，我才由南方来，南方也已没有了一片干土！

走过运河与不老河汇集的徐塘，塘东渐有干地透出。在水还未退尽，地仍松软如浆的田上，勇敢的农夫又开始劳作了。河堤上行人也渐多，有担了黄米黑糖赶集的乡老，有云游四方的化缘和尚，也还有逃上干地的难民车，车上挤满了水瓢土盆，红椒黄豆。这边伸着雏鸡的长长脖颈，那边垂着孩子的小腿。愁容满面的妈妈抱着吃奶的孩子坐在中央，一个粗壮的农夫在后面推。凭两条耕地筑堰的胳臂，要将他的妻孥推到不可知的安全地方。（未完）

宿 羊 道 上

时间不允许我们走遍邳县全部，于是我们想参观一下宿羊山麓邳县黄灾区域难民救济委员会所办的收容所。该所自九月四日开办以来，已收容近五千难民。宿羊山位于邳县西北距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程。我们不敢耽搁，次晨随了升旗号角就爬起来。承该县府公安科科长张田君陪我们同行。重新端详一下，这小城整洁街道，整洁的土屋后，我们就又钻出

---

[1] 编者注："棺村"，《大公报》上原文如此，应为"棺材"（参见《人生采访》，收录于《萧乾选集》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北门的低矮城洞，登上一只席篷小船。船离岸时，县长适乘骑出门视察。他在马背上向我们打招呼，然后影子就消失在长桥的北端了。我望着他那副英勇的背影，忆起昨晚灯下他关于生产和教育的一般计划，对民族前途我萌起乐观信念来。心里焦熬，不知道在这苦难日子中，我应怎样在转移民族的命运之轮上，出一份力气。

这是一条悠长而异样的路。宿羊山虽遥遥在望，但它的倩影却永远那么辽远得不可捉摸。我们是用极复杂的心绪向它趋进。论景色，在山水平凡的江北，那也算够幽美的了。运河沿岸常有似巫峡形势的土丘，造成曲折蜿蜒的航路。船平稳地航着，偶尔有不知名的水禽擦着席篷掠过。宇宙一切对两月来这角隅人类的遭遇都似淡漠无介于怀。秋风仍慵懒的吹着，远地似有盲卜者的铜钹声叹息着厄运之无助。立在船头四瞩，周围真地是秋水共长天一色！宿羊山永如贵妇隐在远树的帷幔后面。

但几日来惨痛的经验使我们不敢为这外界的美所诱惑了！我们知道那片涟漪秋水下面淹没着千百户人口的食粮，我们也明白宿羊山麓等待着我们的不是采药的童子，不是灿烂的晚霞，却是一群嗷嗷待哺的灾胞。岸上踟蹰徘徊着的老人，在山水画家看来也许是可羡慕的风景配奏，但那老人却是在追悼着他沉沦了的田园。

船到黄庄，便为不老河北堤挡住。我们下船沿堤向西北行。堤上常遇着由宿羊山遣回的灾民，身边带着遣散时所发的四天粮食，沿着河堤漂泊着。据说收容所因经费不足，已收容不下他们。我遇到坐在堤坡上的一家，一个老婆婆带着她的寡媳和三个孙儿。

老妇人低垂着脖颈，累得不息地喘气。穿着破花布袄的小女孩在旁边尽哭着“我要丸子！”我有些不懂。妇人待孩子哭得太久，才把一粒指头大的灰色丸子塞到她嘴里去。我问她那是什么，妇人忙藏到怀里去，然后告诉我说：“先生，这是渡命丸！一位善人舍的。”我向她要来看看，她怎么也不肯。她说每人一天吃三粒就可过活。她们一家五口；临走才发了八十粒。她们现在逃荒要逃到滁州呢，实在不能分把我这走路的人。

我听了感到神秘，又觉好笑。三年前我看过一个荒唐的影片：“五十年后之世界”，其中就有这种以丸代饭的梦想。眼前这难妇竟握有这仙丸，它引起我莫大的好奇，等我到宿羊山时一打听，连负责发放的人对这丸粒的实效也都不敢轻信。在区分所仓库里，我看见墙角堆着五六麻袋，里面满装着这仙丸。我尝了一粒。

区长又戏向我袋中塞了几粒。除了一般药丸味以外，还微微带点甜枣味。据说有人不知道这丸子的妙用，连吃五六粒也不理会；晓得它的灵验的，吃三粒就真地觉得肚子有点膨胀了。

这仙丸的捐助者据说是哲学研究会徐州分会，第一批运到计二百担。丸粒的成分是大枣糯米和黄豆。这方剂应请国内科学家来化验。如果是偏方仙丹一类东西，实际效果不见，反增灾民一分妄信，我们实在对不起那些将生命交托给我们的灾胞。以一个庸凡人的想法，我看这二百担仙丸终不如换成几口袋黑馍中用。我这担心并非过敏。宿羊山麓收容所里就已经有仙医出现了。记者询问一个眼疾患者郭君受治的情形，据说那位仙医先用手

掌在他眼前晃五分钟,然后给他一叠印了"佛"字的黄表纸,要他放到水里浸湿,贴在眼上。我们不能不称赞这些热心善人施助动机的纯良,他们对灾民的确具深切的同情。但负责当局对各方施救的策略也应加以指导。内地民众对官府诚实驯顺得可怜。中国是陷在贫弱愚各种坑阱里。当我们搀扶民众由一个阱口爬出时,切不可把他再推到另一个阱口里去。

宿羊山麓之哀鸣

清早我们由邳县城出发时,护送我们登船的除张科长,一位黄衣警察,一位卖烧饼的老人外,还有的是飘在船篷上的几朵灰云。船一解榄[1],老人便走向别处寻找主顾去了。船靠近一个村落时,警察也登了岸,但那几朵灰云却总愁苦地紧紧跟踪在我们后面,永那么阴森,悒郁,像是大地受难者呼出的一股叹息。过黄庄,沿堤走不上几步,头上的云朵竟如耐不住委屈的孩子般落下冰凉沉重的雨点来。愈落愈密,把我们淋的透。隔着湿渌渌的头发,我们看到宿羊山了。一个光秃黯黄的小山,坡上蠕动着密匝匝的一群,无助的在雨中颤抖。由同行的朋友知道那便是浩劫后的一簇残生,收容所的灾民。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走进碎石小道的宿羊镇了。我们走过富户的门前时,在灯光辉煌中,有极畅快的笑声荡漾着。幸福的人们,他们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着炮垒,上面日夜株守着巡逡的人。这次邳县成灾,县长亲去到各富户府上为穷人请命,募集红粮。慷慨解囊的虽然也有,但面现难色的也颇不少。这些富户多拥有五六百顷地,一家便占据一整个村庄。庄丁平日打杂,遇到佃户抗租或歹人袭击时,那些壮实汉子便是机关枪小钢炮的操动者了。胆小的地主远躲在上海租界里,留在庄上的,便以藏书种菊一类雅事安闲地消磨他们无可挂虑的日子。我望着那森凛凛的朱红大门,吞进一口冷气。内地的中国社会依然逗留在水浒时代吗?

次晨雨仍在淅沥落着。我们托区长借了两把伞,就向收容所走去。泥泞的路,脚踝时常陷下去拔不出来。两只冰凉的脚在湿湿的鞋子里发出吱吱的叹息。我似乎体味到流亡者的心情了,他们才真正踏着泥泞的路,陷到无从自拔的地步!

我们刚走出镇口,便已听到一片嘈杂的哭喊声了。随着我们登山的步伐,那声音也愈变响亮。拐过一个土坡,那声音不再是无形的了,呈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排排用高粱秸搭成的尖尖窝棚,里外都蹲着为秋雨打成一团的人。棚顶多飘着避瘟的粉色小旗,棚前堆着由水里捞出的农具,和就地用土块,搭成的一座座临时炉灶。雏鸡黄狗和花衫小孩都在迷漫的炊烟里跑来跑去。棚分每十座为一排,各形成窄隘的小巷,有门牌,有甲长,十字路口也常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忘了饥寒的苦,集拢着玩耍。

我们踏着泥泞又遍地屎迹的路,走进那些窄隘小巷里了。窝棚里传出各种凄惨的声

[1] 编者注:"榄",原文如此,应为"缆"。

音：有老妇人竭枯无力的咳嗽，有刚落生的婴儿脆弱的啼哭，杂着耐性的母亲们拍哄的哼声。这些无告的灾民都缩在窝棚里，咧着嘴，蜷卧在湿湿的草堆上。有男人的，窝棚顶还能自抹些泥土；孤老病弱的就眼巴巴守着冷雨由高粱秸空隙中落向他们单薄的身上。

当我们走过那些窝棚时，个个棚口都有头探了出来。老妇人枯干的眼，小孩子惊奇的眼，少妇含羞的眼，一齐射向我们。他们是各种集团，有寡母孤子，有老婆少媳，有少夫少妻，也有无儿无女的老翁，和丈夫未在身畔的少妇。那真是不堪设想的排比！就在这苦难的小集团里，幸福也如雨量分配得那么不均衡！那些孤苦零仃的人，独卧在窝棚里，只隔一道高粱秸便能听到依依的小儿学语，夫妻亲昵的缠绵，儿女温存的劝慰。一个披了件破蓑衣的老人，淌着一眼热泪，张开无助的臂向我说："先生，我啥都没有了！"我不忍看他那和善的白须，我急忙掉过了头。

对面却是一张同样愁苦的脸，一个缺齿破唇的老妇人用双臂支着身子，向我叩起头来。她比那老人还强，还有陪伴她的一条狗。她恶狠狠地骂那弃她远逃的儿媳，"不如一条狗啊！"她喃喃地嘟囔着。像是会意似地，卧在棚里的小黄狗即时用前爪向老妇人怀里凑凑，嗅了嗅那只筋条毕露的手，就又把瘦弱的身肢盘起，响响地嘘起气来。

隐在小手车下，一个小家庭在举行他们的早餐了。妈妈喂着怀里的娃娃，作爹的和大儿子并蹲在两旁，各抱着一只粗碗，贪婪地吞喝着热腾腾的稀粥。讲礼貌的中国人呵，看见我们，那可爱的农夫还要欠起身来，举高粗碗向我让。不幸的人，半个多月他们都是这样露宿着。他们逃来较晚，窝棚里已没有地方安插。那男人指着大小两个孩子，口口声声求着"科长慈悲慈悲！"孩子拿碗的手已冻得有些战栗了，但他吞喝得那么匆急，恨不把头伸进碗口里去。可是好奇心又不容他不腾出一双眼睛，由碗缘向我窥视。

我打开了摄影机预备拍照。这是太新鲜的玩艺了，即刻招引来许多小朋友。其中有的是适才不肯回答我的询问的，这时也羞怯怯地立在厚厚的人丛中，争看起我手里的怪匣。当我把换下胶片的黄纸盒抛到地上时，他们一起都屈下腰去，伸手争抢那仅见的玩物。年幼的被压在下面就大声嚷叫。窝棚里探出母亲的头来，吆喝着她们的孩子："没心的烧猪呀，饭都没的下肚，抢那东西啥用！"她们无法了解孩子欲念的单纯。

走尽了这些窝棚小巷时，我身上已湿透，鞋跟沾的泥土已高厚得如旗装的木底鞋了。于是，我们又向宿羊山顶走去，想由高处环视邳西被灾的概况。

雨仍落着，窝棚可缺乏原有的谧静；几十个孩子都尾随我们向山顶蜂拥走来。巡警虽用极严厉的声色驱逐着他们，但是山太大，人太多了，孩子们竟分散着由另一个方向跟来。

弥漫的云雾遮住我们的视线，围着宿羊山的都只是白亮亮的一片，偶尔露出一丛半没的树枝。那斜倾的姿态呈现出暴风雨猝击时的猛烈。大地一切都盖在汪洋一片的下面。

孩子们在我身后挤着，还喳喳地有所低语。我突然掉过身来，握住挤在最前列一个孩子的小手。即刻他脸涨红了，把头钻回人丛里想跑开。

我拉住他问："指给我看，小孩，哪里是你的家？"

他回过身来，眨着两只小眼睛向山的四周环视。所有的孩子都不再向前挤了，他们各自回过去，在那汪洋一片里寻找他们的家。

寻视了好久，许多小脑瓜失望地转过来了。一个个皱着小小眉毛，一个个频频摇头。即被我拉着的孩子仰起了脸蛋来，他眼睛已蒙上一层湿渌渌的泪了。他重新看看四周，又环视小同伴们忧愁的脸，然后用颤微微的声音说：

“先生，家早给大水冲丢了！”（乾）

光明·包身工[1]

夏衍

【题解】夏衍，现代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包身工》和剧本《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包身工》发表于“左联”机关刊物《光明》创刊号，是作者经过几个月实地考察完成的。作品真实描述了旧中国包身工的苦难生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势力压榨童工的行径，对不人道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控诉，成为新闻史和文学史的一部经典。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人们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叫喊。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钝感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女人们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

[1] 《光明》创刊号（1936 年 6 月），本文据夏衍：《包身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们所指骂的“懒虫”和“猪猡”，所以，除出“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还住着二千个左右穿着破烂衣服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玩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悔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了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讫，“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阔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东洋厂家将这些红砖墙围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价租给“带工”，“带工”就在这鸽子笼一般的“洋式”楼房里装进三十几部没有固定车脚的活动机器，这种工房没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门”，它们的前门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门一样。每扇前门楹上，一律钉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上面用东洋笔法的汉字写着：“陈永田泰州”、“许富达维扬”等等带工头的籍贯和名字。门上，大大小小地贴着褪了色的红纸春联，中间，大都是红纸剪的元宝、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图像。春联的文字，大都是“积德前程远”、“存仁后步宽”之类。这些春联贴在这种地方，好像是在对别人骄傲，又像是在对自己讽刺。

四点半之后，当没有影子和线条的晨光胆怯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朝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

一般的空气里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拗执地粘在她们头发上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样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中午的饭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可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菜的叶瓣，用盐卤渍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人吃粥的地位，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头舐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下一些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的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时间，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的“机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营原则和经济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子吧（其实，这样的事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不能挣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

子的角上，缩作一团，尽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很快的一个打杂的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白相人”，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自由的权利。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举起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很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后来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了起来，于是在门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出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他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或者“养成工”。试验工的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的期间那就表示了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几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里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

五点钟，第一回声很有劲地叫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就像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家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对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人的衣服多少是整洁一点，有人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她们有时爱搽一点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青莲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条的裤子。长头发，

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而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也许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轻别人，这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候着它的滋养物了。印度门警把守着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粘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之后，内外棉摇班（罢工）了，可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厂的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了。——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中国厂当然没有，英国厂，譬如怡和，工人进厂的时候还可以随便带个把亲戚或者自己的儿女去学习（当然不给工资），怡和厂里随处可以看见七八岁甚至五六岁的童工，这当然是不取工钱的“赠品”。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到杨树浦去的电车经过齐齐哈尔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一种“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一进厂，猛烈的骚音，就会消灭——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轧轹……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没有使你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纺纱间里的“落纱”（专管落纱的熟练工）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日本人叫做“见回”），命令工人的时候，不用言语，不用手势，而用经常衔在嘴里的口哨，因为只有口哨的锐厉的高音才能突破这种紧张了的空气。

尘埃，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纺粗纺的空间，肉眼也可看出飞扬着无数的“棉絮”，扫地的女工经常地将扫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样地推着，一个人在一条“弄堂”（两部纺机的中间）中间反复地走着，细雪一般的棉絮依旧可以看出积在地上。弹花间、拆包间和钢丝车间更可不必讲了。拆包间的工作，是将打成包捆的原棉拆开，用手扯松，拣去里面的夹杂成分；这种工作，现在的东洋厂差不多已经完全派给包身工去做了。在那种车间里，不论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儿就会一律变成灰白。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的在室中飞舞的花絮，“无孔不入”地向着她们的五官钻进，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纱花寄托的场所；要知道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觉，那你可以假象一下——正像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勉强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而使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纱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〇·一五克的花絮！

湿气的压迫，也是沙厂工人——尤其是织布间工人最大的威胁。她们每天过着黄霉，

每天接触着一种饱和着水蒸气的热气。按照棉纱的特性，张力和湿度是成正比例的。说得平直一点，棉纱在潮湿状态比较不容易扯断，所以车间里必需有喷雾器的装置。在织布间，每部织机的头上就有一个不断放射蒸气的喷口，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他人！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者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人”所能想象的了。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劳，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时候，打瞌目充[1]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锟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拿莫温”（工头）和“小荡管”毒骂和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的讲，殴打的事实已经渐渐的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的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不当场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起码人”，他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做了“烂污生活”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欢喜他们采用殴打这一种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给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卑屈地讲：

“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是不要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要在洋东家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寻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的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迭个（这个）小姑娘坏来些！懒惰！”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皮带盘心子顶在头上，就不会打瞌目充[2]！”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而招致带工老板的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

[1] 编者注：“目充”为一字，瞌“目充”的意思是困极小睡。

[2] 编者注：同上。

饿饭、吊、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么客气，因为除出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办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的工作，所以外头有些工人就被迫用送节礼的办法来巴结拿莫温，希望保障自己安全。拿出血汗换来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人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的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的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织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东洋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科学管理和改良机器，粗纱间过去每人管一部车的，现在改管一“弄堂”了；细纱间从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个锭子），现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机间从前每人管五部布机，现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象论货计工，产量增多就表示了工资的增大，但是事实并不这样简单。工钱的单价，几年来差不多减了一倍。譬如做粗纱，以前每“亨司”（八百四十码）单价八分，现在已经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车子，工作十二小时，从前做八“亨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现在管两部车做十六“亨司”工钱还不过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钱的多少，和她“本身”无涉，那么当然这剥削就上在带工头的账上了。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劳动，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于和钢铁造成的机器不一样的，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检察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

“让她扎一两根油线绳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怕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怕梦的！有人觉得太难看了，对她的老板说：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瞪了她一眼。

“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做了两年，带工老板在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了二百三十块了！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她熬不住这种生活，用了许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里，偷偷地托一个在补习学校念书的外头工人写了一封给她父母的家信，邮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个月，没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许她的父亲会到上海来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手里了。散工回来的时候，老板和两个打杂的站在门口。满脸横肉的老板赶上一步，一把扭住她的头发，踢，打，掷，和爆发一般的听不清的轰骂！

“死婊子！你倒有本事，打断我的家乡路！

“猪猡，一天三餐喂昏了！

“揍死你，给大家做个样子！

“谁给你写的信？讲，讲！”

鲜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发抖，这好像真是一个榜样。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楼里吊一晚。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断气的呻吟一般的呼唤之外，绝没有别的声息，屏着气，睁着眼，千百个奴隶在黑夜中叹息她们的命运。

人类的身体构造，有时候觉得确实有一点神奇。长得结实肥胖的往往会像折断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芦柴棒一般的却偏能一天一天地磨难下去。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还有韧性地在那儿支撑。两粥一饭、十二小时骚音、尘埃和湿气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规则地反复着，直到榨完了残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鸦，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的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的捕鱼，买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的虐待，因为船户总还得养活它们，喂饱它们，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的被饲养者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强榨着的生物，好象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

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一九三六，四，上海。

生活星期刊·新闻检查[1]

邹韬奋

【题解】邹韬奋，记者、出版家，以主持“生活”系列报刊闻名。1936年，他在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政策。由于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年11月邹韬奋与其他六位救国会领袖被捕，酿成“七君子事件”。1944年，邹韬奋因病在上海逝世。毛泽东评价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93年，中国记协设立“韬奋新闻奖”，与同期设立的“范长江新闻奖”一同构成中国记者的最高荣誉奖，两年一评，每届各十人。2005年并为“长江韬奋奖”，每届二十人。

谈起香港的新闻检查，却有它的饶有趣味的别致的情形，虽则在我们主张言论自由的人们，对于新闻检查总觉得是一件无法欢迎的东西。

香港原来没有什么新闻检查处，自从受过海员大罢工的重大打击之后，惊于舆论作用的伟大，害怕得很，才实行新闻检查，虽明知和英国人所自诩的“法治”精神不合，也顾不得许多了。据我们的经验，香港新闻检查处有几种最通不过的文字，其一便是关于劳工问题，尤其是关于提倡劳工运动的文字。香港的新闻检查原在吃了工潮苦头之后才有的，他们最怕的当然是直接或间接和劳工有关系的文字。例如陶行知先生的《一个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诗，说什么“一家肚子饿，没有棉衣过冬，破屋呼呼西北风，妈妈病得要死，不能送终！”这些话是他们所最怕听的！至于那首诗的末段：“骂他他不痛，怨天也无用，也不可做梦。拳头联起来，碰！碰！碰！”那更是他们听了要掩耳逃避的话语！所以这首诗在香港完全被新闻检查处抽去，后来我们把它带到上海来，才得和诸君见面（见《生活星期刊》第十二号）。

他们不许用“帝国主义”，所以各报遇着这个名词，总写作“××主义”，读者看得惯了，也就心领意会，知道这“××”是什么。我们知道，在上海各种日报上还可以把这四个字连在一起用，这样看来，香港新闻检查似乎更严厉些；其实也不尽然，例如在上海有许多地方

[1] 《生活星期刊》，1936-09-20，本文据《韬奋文集》第三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为着“敦睦邦交”，只写“抗×救国”；在那里，这“抗”字下的那个字是可以到处明目张胆写出来的。中国人在那里发表抗敌救国的言论倒比上海自由得多。这在我们做中国人的说来虽觉汗颜无地，但却是事实。《生活日报》开张的第一天，香港的日本领事馆就派人到我们的报馆里订报一份，好像公然来放个炸弹！但是我们后来对于抗敌救国的主张还是很大胆地发表出来。

他们不但检查新闻，言论同样地要受检查。有些报纸上的社论被他们完全抽去，因为夜里迟了，主笔先生走了，没有第二篇赶去检查，第二天社论的地位便是一大片雪白，完全开着天窗，这是在别处所未见的。有一天看见某报社论的内容根据四个原则，里面列举这四原则，但是在(一)下面全是接连着的几行××，在(二)、(三)、(四)各项下面也都同样地全是接连着的几行××！这篇东西虽然登了出来，任何人看了都是莫名其妙的。《生活日报》的社论还算未有过这样的奇观。我每晚写好社论之后，总是要等到检查稿送回才离开报馆。有一夜因检查搁置太迟，我想内容没有什么“毛病”，先行回家，不料一到家，踏进门口，就得到报馆电话说社论被删去了一半！我赶紧猛转身奔出门，叫部汽车赶回报馆，飞快地写过半篇送去再试一下，幸得通过，第二天才得免开一大块天窗。其实我所要说的意思还是被我说了出来，不过写的技术更巧妙些罢了。不论他们删除得怎样没有道理，你都无法和他们争辩，都无法挽回。有一次我做了一篇《民众歌咏会前途无量》，结语是：“我们希望民众歌咏会普遍到全中国，我们愿听到十万百万的同胞集体的‘反抗的呼声’！”这末了五个字是我引着香港青年会发起这歌咏会的小册子中的话，但是他们硬把“反抗的呼声”这几个字删去，成为“×××××”，我看了非常的气，尤其是因为检查处的人也都是中国人，但气有什么用？

有时因为检查员没有看懂，有的话语也可以溜过去。据说某报有一次用了“布尔乔亚”这个名词，检查员看不懂，立刻打电话给那个报馆的主笔，查问这究竟是个什么家伙，答语说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应该是大家敬重的，于是便被通过了！

广告虽不必检查，但报馆要依检查处的禁例，自己注意。例如登载白浊广告，“浊”字要用□的符号来代替，和生殖器或性交等等有关系的字样都要用□的符号来代替。据说他们的理由是：凡是你不可以和自己的姊妹说的，就不可以登出来。这理由可说是很别致的！说来失敬，帝国主义和白浊竟被等量齐观，因为在各报的广告上(大都是属于书籍的广告)，也只可以用□□来代替“帝国”两个字。

大公报·中国的西北角(节选)[1]

范长江

【题解】范长江,一代名记者。1935年,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后来辑为《中国的西北角》。这些通讯第一次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揭示了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西北的黑暗现实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内容充实,学识渊博,分析透辟,笔墨生动,显示了高超的新闻专业素养。1993年,中国记协设立"范长江新闻奖",与同期设立的"韬奋新闻奖"一同构成当代中国记者的最高荣誉奖,两年一评,每届各十人。2005年并为"长江韬奋奖",每届二十人。

三圣宫天主堂

后套中一大特色,即为天主堂,总堂在三圣宫。临河西境乌拉河至磴口之间,尽为天主堂势力。甚有"天主国"之称。此间种地农民,非入天主教不能种地。事实上(非法律上)这一带的居民尽为教徒,教堂为唯一可以指挥民众之机关,神父为最有支配民众力量的首领。一般农民只知有天主堂,而不知有政府,只知有神父,而不知有官吏。教堂于宗教之外,兼办水利、农业,以至于保安等工作,三圣宫教堂所在地,外围以深壕及高厚之城垣,集居民数百家于中,有城门,有炮楼,俨然正式之"城国"(City State)。

原来这里是阿拉善旗的土地,天主堂在七八十年前即来后套传教,势力尚小。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教堂亦曾受相当扰乱。和约缔结之后,此间教堂亦要求赔偿,遂定由阿拉善旗赔损失五万两于教堂。当时阿拉善旗王爷是现在达王之祖父,已现交二万两,尚欠三万两,于是遂将三圣宫一带土地作抵,归入教堂手中。经其数十年之经营,遂造成今日之特殊现象。

记者以为宗教之伟大,在于"感化",上帝之所以要宗教之存在,乃在使此等"先知先觉"的,肯"牺牲一切"的宗教领袖们,来劝化"顽顽的众生",所以如果"顽顽众生"有侵犯宗教之

[1] 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印行,本文据《民国丛书》第三编V.70,历史地理类,影印本,上海书店,1991。

处，当更加努力宣化，使其“觉悟”，教堂当无凭借本国军事政治力量而要求赔偿之理。本来是精神感化的“神圣事业”，这样要求赔偿，岂不成了通常的市侩行为。又在清代的银价说来，一个教堂里的东西，无论如何计算，二万两已经足够赔偿。如果有生命损失的话（当然没有），那正是“为宗教而牺牲”，不必在金钱上找代价。再则到对方无力再赔的时候，应该本“上帝的仁慈”，不再追收，何必要土地来抵押？就传教事业本身来说，教士只能以“宣扬教义于民众”这一任务为止，其他经济、政治、教育的事情，绝对不应该过问。中国政治紊乱，它自己会寻求出路，中国经济落后而破产，它自己会有解决的途径。如果你们觉得在中国有安全的危险，或者贫困的压迫，那么你们很可以回到你们自己“先进国家”去过日子，不必在我们中国造成些特殊势力，增加我们“自我改造”的困难。

比方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表面上很好，令我们感激。但是你看看教的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明白。记者在三圣宫时，看过他们的“国语教本”是他们教会自己编印的。里面虽然是汉字，但是有两种思想让人看了不懂：第一，它说中国之所以穷，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由于大家“懒”，即是“不知振作”，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试问天津、上海破了产的工厂，是不是因为我们工人整天在工厂里睡觉弄糟的呢，还是因为关税在外人手里，保护不了自己幼稚的工业，活活的被外国工业品打倒的呢？第二，它说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那么宇宙是有定的，人生是有定的，总逃不了造化主的定型。像我们这样被人压迫的民族，也是造化主事先定好了的，我们大可以安心被人压迫，被人欺凌，不必起来作什么反乎天意的解放运动！

诚然思想自由，我们不反对，信仰自由，我们也赞成。但是那是对青年以上的人说的，这些乡村儿童，智识本来简单，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信什么的，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因此，我们以为目前中国，自对于宗教问题，最低限度应如此做法：第一，确实保障成年人信仰之自由，排除一切干涉宗教自由信仰之力量。第二，教会（无论何教）绝对不能在“宣扬教义”一事之外，以教会或教士资格做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第三，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上述办法，如与不平等条约抵触，则根本取消不平等条约。上帝的心是公平的，对于取消不平等的条约，他一定能赞成，这一点我们敢于相信！

二十八日住补路脑，屋内臭虫太多，屋外又无帐幕，我们就到大车里过了一夜。次日发补路脑，旋过乌拉河，即入绥远临河境。

临河境内公路与桥梁工程，皆甚良好，仍荒地太多，人烟稀少，将来一定可以供大规模屯垦之用。行五十里至黄杨木头，民间有烟瘾者异常普遍。为中国前途着想，记者以为：“宁可使财政破产，鸦片绝对不可再蔓延！”

黄杨木头与临河之间，亦大半为上等良田，中间有一段蒙古水草地。蒙古女人之放牧者，一面放牧，一面缝织衣服，有小沙窝处，间或露出蒙古包，不减塞外风色。

临河五原至包头

到临河即可以感到浓厚的"山西味"，机关里、商店里、客栈里，很少不是说山西腔调的，偶尔有人哼几句，也是"山西梆"。一切一切，显示出山西同胞，经过数代的辛苦，在塞外开辟了这样的成绩。临河城垣系新筑，临河城中人家惟近东门处较稠密，余则大半为空地，商业繁盛之区在东关外，市场景象已充分带内地风光。

从临河起改乘大车赴五原。大车在不平的路上摇荡前进，铁皮车轮与坚硬的辙道互相撞碰，使人不久即为之昏迷。记者在西北最怕之三事，即坐大车、睡热炕和盘腿。后二者已有避免之方法，而大车之苦恼，直到快要离开西北时，始得加以亲尝。

大道的西北方，狼山的形象渐渐接近我们的眼帘，大道所经，全为沃土，六十里至天台桥，有蒙古女子冒充汉人为妓女者。似乎经济恐慌已震裂了蒙古人常态的生活，而逼出相当的变态来。

此后常有残破的村落，为过去数年土匪摧残者，今已寂无人烟。北风时作，牧羊者尽衣皮裘，较之宁夏，暖冷相去甚大，三十日行一百一十里，宿吴家集。

吴家集离五原只七十里，我们仍然微明动身。这时各家的小学生也和我们一样清早的出来，走向他们的学校，短短的身体，小小的制服，三三五五的，牵着手，并着肩，活活泼泼的。通过这小小集镇的街市，不但这个市集因他们的早起而活跃，中国困苦艰难的前途，也因为他们这样生气蓬勃，而显得有无限的光明！

这以后的大路，因为水淹未退尽，绕行乱草地中，车身东倾西倒，人坐其上，苦痛如受重刑。四十里至满过苏，打尖，店主人看到我们宁夏带来的萝卜，深为惊讶，她惊讶宁夏天气之热，萝卜已经成长得如此其大了。

从石嘴山出发到现在，我们吃饭都没有筷子，只有临时用树枝折成的东西。满过苏的小店中，筷子又和我们再见，让人发生一种渐即于光明的快感。又三十里至五原城。

五原有新旧两城，一为县府所在，一为商业区域。冯玉祥先生在游俄回国重新整刷国民军之后，有名的"五原誓师"，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五原有路可以通外蒙，当时苏联接济冯玉祥的械弹，就是从外蒙用汽车运到五原来的，这里不但与国民军有不可分的关系，与中国近三十年军事史上，也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商人总喜欢标榜奇怪或距离遥远地方的物品，来刺激顾客们的好奇心，借此推销他的货物。五原城里有人立着"四川仁丹"的大牌，"四川"哪里出"仁丹"？恐怕全四川人没有一个会知道！

五原距包头四百里，这里每天有长途汽车来往，七八个小时可到，我们的旅行，从此方便得多了。只是这里的汽车有些奇特，根据"进步的赶走落后的"这个原则，日新月异的汽车，不断的添到都市来，过时的破旧汽车，自然被赶到内地小都市去，越是交通幼稚的地方，

越是汽车老朽的地方，这是不足怪的。令人奇怪的是：轿式客车的票价，既然比货车收得高了百分之五十，而客车里面的前半段，即坐着不甚颠簸的几个坐位，却完全只堆货物，把客人一齐挤在末尾上，这不知哪里来的新章？包五公路大体尚好，有几段新修不平的地方，车尾颠起了来，把客人们的头一齐送到车顶上，接了一个切切实实的重吻！

车由五原东行数十里，道即随大青山南麓行，触目荒地，农牧前途皆尚待努力。二百里至八庙子，休息。因未带粮食，幸而买到白饭两碗，白盐作菜，白水为汤，饿后食之，亦觉可口，庙中驻有蒙古游击骑兵一小队，似为维持治安者。其中过半有鸦片嗜好，成吉思汗的子孙啊，那是万万不能再吸的啊！

大青山南部地方几已完全汉化，纯粹的蒙古风味已不多见，现在山北还是纯蒙古生活的地方，但是汉人在山北之开垦与建造房屋，已经不为蒙古人所许了。

将近包头，村落渐密，人口渐稠，乡村妇女喜着鲜红色衣裤，似为这塞外无极的旷野，铺点几朵红花，别饶风韵。

午后三时，一架有太阳徽号东来的军用飞机，和我们的汽车同时到达包头。（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 上海）

中国的战歌（节选）[1]

史沫特莱

【题解】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28 年来华，完成《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等新闻作品，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与埃德加·斯诺、路易·安娜·斯特朗并称为“3S”。1984 年，在北京成立以邓颖超为名誉会长和以黄华为会长的“中国三 S 研究会”，即“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SMEDLEY-STRONG-SNOW SOCIETY OF CHINA）。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CHINA SOCIETY FOR PEOPLE'S FRIENDSHIP STUDIES，简称 PFS）。1936 年，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前往延安，其间爆发西安事变，本节文字以一个亲历者和外国人的视角记叙了这一历史事件。

第四篇　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1936—1937）

十六　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遇到一个刚从西北来的作家。他是工农红军的代表。参加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朱、毛红军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行程二万五千里路，时经冬夏春秋，走过平原村庄，跨过千山万水。

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充满了艰险苦难和百折不回的画卷。人们难以相信，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当他讲到在那雪海茫茫，风雪交加的川康藏边的大山丛中漫步前进时，他这样说：

“人们精疲力尽，渐渐支持不住了，自自然然地蹲下来，那样软弱再起不来。几千人冻死了。我们几个月只吃青稞，许多人消化不了它，拉出来的青稞，别人捡起来，洗干净，又吃它。过一次肠道再排泄它一次。”

当我们这些幸存者终于出现在甘肃草原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贫苦的当地少数民族的

[1] 《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时候,我们伸开手臂,团团把他们抱住,又哭又笑又欢乐,又打又闹又歌舞。有的穿着羊毛捻的毛线衣,有的披着羊皮剪的老羊皮,破破烂烂,奇奇怪怪瘦的像个鬼,几千人有病,夜里的咳嗽声此起彼落互相呼应发出回音。甘肃是那样的苦,我们总是吃狗、猫和老鼠肉。甘肃是那样的穷,妇女藏在寒窑里,一家人往往仅有一条裤子,男人穿了女人就没穿头。民国以来二三十年的兵荒马乱,干旱饥荒,天灾人祸,加上苛捐杂税,老百姓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连衣服都没有。最遭殃的是军阀的队伍还带来梅毒病菌,许多妇女不生育,有些地方看不见十五岁以下的儿童。

这个作家跟我说,红军部队的医药物资非常奇缺。自此之后,我同两个外国医生开始为红军筹集资金购买药品,可以这样说吧!我们成了红军采购药品的"走私商人"。

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打手们横行霸道、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少帅自从当上东北王以来在性格上发生了许多变化。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打破了他过去对法西斯主义五体投地佩服的迷信。他受到司令部里一批青年军官的影响,成为一个作风民主的军人。他戒掉了抽大烟的习惯,并且极力克制改掉青少年时代耳濡目染的封建军阀的习气和影响。全国各地民族救亡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省市地方受到取缔,但在他的地盘内得到保护。他无视国民党政府的训令指责,许可全国各界联合救亡爱国运动委员会在西安召开,他反抗国民党政府对到达陕北的红军继续围剿的命令,当日寇占领东北入侵绥远、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和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打内战,残杀自己同胞的想法。

有一个红军代表在少帅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他为我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大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摇篮,许多伟大的朝代在这里兴起,交替成长,西安是大西北的中心,我希望在西安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我住在华清寺。这是公元八四七年至八五九年统治中国的唐玄宗皇帝的宠妃杨贵妃在这里游玩的地方。我望着杨贵妃当年逍遥赏玩过的亭台楼阁,走廊石桥,使我记起了有一回我听过一位中国老音乐家用五弦琴演奏长恨歌谱的情景,他的音乐犹如小管弦乐队合奏的歌声满屋激荡,绕梁不绝。长恨歌是一首古诗,叙述唐玄宗多么怀念杨贵妃,他上穷碧落、下穷黄泉,苦恋相思,想见一面。而住在海外仙山上的太真仙子给皇帝报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相爱私语。

这里探微穷究,尽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就在这种气氛下我研究中国历史并把时断时续的汉语练习重新捡起。我的健康状况日渐好转,经常穿过平原村庄前往始皇陵漫游。公元前二五五年秦始皇建立了秦朝帝国。他雄图大略灭六国,亡诸侯,废封建,设郡县,想砸烂当时的封建制度。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鞭挞天下,威震四海"。就是他,征调全国的老百姓,家家户户一男一丁去修筑防止北方野蛮民族入侵的万里长城,就是他,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治驰道,车同轨,一法度,书同文,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都咸阳"。西安古名长安,就是秦朝的首都咸阳。秦始皇把咸阳建设成为当时大秦帝国称雄世

界规模最大的城市。秦始皇焚书坑儒，厚今薄古，想消灭和销毁当时“逆古害今，危言乱实”传播封建思想的孔家学派的儒生经书。人们指点临潼西南五里那儿有一个山谷就是秦始皇当年大乱天下焚书坑儒的坑儒谷。

秦始皇穷奢极侈，纵欲放浪，老而怕死，梦想长生，以为东海有蓬莱，方丈，嬴州三座神山上有不死药，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传说数万家男女开拓了日本，毫无疑问这是荒唐的传说，他们过海漂洋没有回来倒是真的。始皇陵在临潼外郊的骊山下高大如一座小山，据历史工作者考证始皇陵下埋藏了一座宫殿和中国古代许多珍贵文物和无价之宝。“以铜为椁，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上以明珠为日月，列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具山川五岳九州地里之势”。山上的花岗岩石曾被一个军阀盗卖给一个英国人，但陵墓原封未动仍埋在地下。

回到临潼华清池庙里，我动手写我的一本新书。只有在西安的朋友带来新的消息和安慰我的寂寞的时候，我的写作才停顿下来。朋友里面有一位红军方面的同志，他总带来一些使人不安的消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正在同侵入内蒙的日寇作战。日寇已经占领了山东省的青岛。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抵抗日寇的入侵，反而集中其强大兵力在胡宗南的指挥下围剿陕北的红军，通达这个战争舞台中心的公路上沿途成立了兵站，战事极其激烈，胡军损失惨重，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国民党政府围歼红军的命令。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装备最新式，他的部下官兵一致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联席会议拒绝服从围剿红军的命令，相反的是结成了西北抗日军事同盟。它包括红军、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其他军队的代表，以及本年五月持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的代表，已经抵达西安磋商参加抗日军事同盟的谈判。

几百名平津学生，上了张学良少帅的军事学院。西安蓝衣社头子叶道光的党羽们把这一切进展情况向主子打了报告。蒋委员长非难少帅军事学院里窝藏共产党分子。少帅的答复是，他判断学生的唯一标准没有别的、仅看他们的抗日热情，并且补充说了一句：“奉告委座千万不要听日本特务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月，有三个刚到西安的学生就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三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有些消息扰乱了我隐居生活的平静。十月二十日，一个同住华清池庙内，看来不问政治的女友来到我的房间里没精打采地说：

“我们中国人损失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又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来了，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逝世了。”

我在不久前才得到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我悲伤，深感遗憾。鲁迅的死，对我说来不仅是个人的悲伤，且也是民族的不幸。他活着奋发有为，并非漫无目的的活着，也不想争权求名，发家致富，财权位根本不在他的眼里。在中国知识界中，他对知识青年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共同的善良美德，忧国忧民，刻苦奋斗、积劳成疾是他短命的原因。

而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死亡本身。

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方面发表了鲁迅逝世的电讯，这是对他唯一解除禁令的报道。上海举行了安葬鲁迅的殡仪。学校的师生走出课堂，商店的店员走出店铺，工人们走出工厂，贫寒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参加了他的葬礼。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在送殡的行列里，送他到最后的安息地。

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共产党人士无不尊敬他的渊博学识和斗争精神。后来共产党圣地延安成立了第一个鲁迅图书馆。我作过外文图书管理员并把我在中国搜集到的图书赠给该馆。稍后共产党人士又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由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指导学习，这是创作生动活泼战斗作品的艺术学院。

西安的朋友们在鲁迅逝世第二天来到临潼的时候，华清池庙的长老也走进房来同西安来人坐在一起议论鲁迅。这个长老是一个四大皆空、接待方外的办事员。听他谈话可以看出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方丈也熟悉鲁迅的生平和鲁迅作品。“检查制度能起什么作用呢？”我想。

我的写作不时为其他发生的事件所打断，十一月底我听说少帅不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他们之间又有一次冲突。蒋指责少帅不执行剿共命令。少帅回答说：“我和我的官兵多年来对委座效忠服从命令，相信你领导我们抗日的诺言，时机还不太晚。现在我请委座给我们一个驱除日寇还我山河的权力和机会。必须报告委座，我已无力控制我部军官士兵提出的这个要求了。”

几天后，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华清池成为蒋委员长和他的侍卫官卫队的居住处，并作为十二月七日开始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的地址，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我和我的中国女友乘车到西安去。公路上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伕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员。显然这是一次非同平常的剿共军事会议。老百姓也成了怀疑对象。我在西安市唯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几天之内耳闻目睹西京招待所住满了蒋委员长的高级参谋人员、几百名蓝衣社分子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曾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现在是蒋委员长的秘书，他在西安有卫队并指挥全市警察部队。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临潼军事会议开始，西安气氛异常紧张。我每天听到有关蒋委员长一一召见东北军高级军官进行个别谈话的报告，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他们为他卖命，改变效忠少帅的立场，这就是说要他们死心踏地跟他继续打内战。东北军官的答复是，他们的家乡被日寇侵占，他们自己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只有跟着少帅打回老家去。然后转身回来向少帅作了报告。

一天早晨，我的红军朋友来向我借手枪和子弹。“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他说。

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西安市大中小学的几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唱救亡歌曲，散发传单呼吁民族统一，停止内战，声援绥远傅作义抗日，向蒋委员长提出请愿，邵力子奉蒋氏手谕下令警察对游行队伍开枪镇压，学生中间有两个东北高级军官的子女受伤，全市气氛顿时紧张异常。

过了几个小时，一个蓝衣社特务来找我的麻烦。他既不肯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愿出示任何证件，硬要看我的护照和居留签证，并且一再盘问我为什么要照相，要拍学生游行的镜头。我把签证拿出给他看了，对他说法律并无禁止照学生的像的条文。他气冲冲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跑到公安局找给我签证的科长，打了科长一耳光，撕下了他的领章，并撤了科长的差事。这个蓝衣社特务听科长说我的签证是西安市政府指示办理的，接着他跑到市政府办公大楼去大吵大闹，结果被市政府官员训斥了一顿赶了出来。他又回西京招待所，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地宣称，招待所经理要是不把我撵走，他就要亲自动手了，并且要“找她算总账”。

当天晚上我向东北军军部的一个副官和红军代表作了报告，讲了蓝衣社特务找我麻烦的经过。他们非常愤慨并指示我道：“就在这里住下去，同蓝衣社特务对着干！他们如果对你下手，就会成为一起国际纠纷事件！这样一来就会暴露出他们对日寇不放一枪而对美国友人进行迫害的面目。”

就是这样，我等待着一个国际纠纷事件的出现！

次日，招待所经理收到限二十四小时把我赶出招待所的最后通牒，我拒绝离开，经理哭丧着脸说：“不走的话就会遭殃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夜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详细情况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这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同所属高级军官彻夜开会。黎明前孙鸣九营长率一营人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打死了蒋的侄子侍卫队长蒋孝先和三十多个警卫兵。蒋委员长身穿睡衣，逃到了山上，藏到了岩洞里面。孙鸣九搜山抓到了他，蒋对孙说他是总司令。孙营长回答：“你是总司令，也是活俘虏。”

蒋委员长的脚摔伤了，孙营长把他背下山，并送到西安张、杨那里听候发落。

这天夜里我不能入睡，没有脱衣服，通宵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站在窗前望着黎明前的破晓，晨光熹微，我听到一阵机关枪的达达声和步枪的劈拍声大作。“好家伙，真干开了！”我想：“蓝衣社特务分子按既定方针行事了！”听到招待所里一阵飞跑的脚步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接着是喊声叫声大作。步枪射击声就在附近的地方，门窗破裂声，玻璃哗啦声，大祸临头，临死前的哀号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

门外面有人在用枪托捅门。坐以待毙，我心不甘，我刚退到墙角里，就飞进三颗子弹，破门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门扇通开了一个洞，我听到几声“日本鬼子”的喊叫声，使我恐怖异常。“我的上帝呀！他们借口我是日本鬼子来杀我了！”

一个士兵的头从门洞里出现，鼓着眼睛，东张西望，我拼命用中国话喊：“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美国人！”

背后有人把他踉踉跄跄地推进室内。一群年青士兵跟在他后面，手里端着步枪蜂拥入室，有的冲进洗澡间，有的捅破更衣室的门。接着又一窝蜂似的走出房间去敲打隔壁经理住的那间房门。但有两个兵留在房子里不走。

留在室内的两个兵开始在房里转来转去，突然间一个兵用枪托顶住我的肚子，逼我后退，靠墙而立，另一个兵把梳妆台的东西都翻出来了，见啥拿啥，把我的眼镜盒、手电筒、电池等直往口袋里装，手舞足蹈地收拾我的羊毛衫和毛线衣。

逼我靠墙而立的那个兵随手掀开我床上的枕头，我的钱包和所有的钱都在那里，他们两个欣喜若狂地扑过去抓住钱包就地分钱。一个兵拿我的水笔，一个兵拿我的铅笔划了一阵，之后把战利品塞进口袋，各人又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飞跑下楼而去。

我相信他们只是趁火打劫一心在于抢东西，于是我摇摇晃晃地走进洗澡间拧开水龙头洗脸，然后坐下来，听到招待所里和附近一带不绝于耳的奇怪的吆喝声。兵大爷逢人冲杀横行霸道的事我在书本上念过，但在这里一场西安事变中我才亲身体验了丘八胡来的滋味。这时，恐惧心理被好奇心战胜的我，颤惊惊地向大厅偷偷地看了一眼，然后又到隔壁房门外看了一眼，房间里两口大皮箱开着，衣服扔了满地。我喊了一声：“经理先生，他们是抢东西的！”

然后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答应了一声，王经理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他满头大汗，一身灰尘，脸色苍白，还有点发抖，动手收拾衣服。“他们把皮大衣抢走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把东西抢光了！”他向客厅瞥了一眼，最后安慰我道：“现在用不着害怕了，我会收拾残局的！”

他跑下楼在大厅里一晃不见人影，很快又上来，背后跟着一个手提自动步枪的青年军官，看来也情绪激动有点吓昏了头脑似的。一个兵冲过去了，那军官喊了一声命令，用手枪指着那个兵，那个兵立即止步，转身立正站在那里。军官对士兵开始训斥，气势汹汹，狠狠臭骂了一通，接着又扬言他再敢让什么人进我的房间就唯他是问，不死也要脱一层皮！经理先生找来一张纸，一枝毛笔，请军官写通知，军官大笔一挥，写了：“不准进入此室，违者枪决！”

他签了字，经理先生得意洋洋作了好事似的把纸条贴在我的房门上。军官和经理一走，那个老兵等着不见他们人影的时候便伸长脖子、探头探脑地朝房间乱堆的衣物方向走去，顺手翻了一阵，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他瞧了我的手表一眼，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扯下手表，转身朝楼下一道轻烟似的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望着龙飞凤舞的军官手令，不见一个兵停下来瞧它一眼。即使止步，不识字的兵也看不懂它。识字的兵也不会服从命令！

西安市内和招待所里的枪声逐渐稀落，军官们终于把士兵们赶到院子里去了。我和经

理站在招待所的门口，注视着院子里两个军官在一队横眉怒眼的士兵前面来回跑着，把兵士口袋里的战利品、衣物等东西掏出来放在地上。两个军官破口大骂，如江河溃堤一泻千里，经理的脸色一阵发白，非常难看。我从那些伤人恶语中搜集到不少兵大爷的祖宗三代老祖母的浪漫题材资料。

楼上的电话铃声一直在响，没有人接。现在我们才听到了招待所服务员们的喊叫声，经理先生冲上了楼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道："上边一个人快断气了，流血不止，你能帮忙急救一下他吗？"

我记起了床下的旅行袋幸好没有动过。赶忙上楼找出我的急救箱，跑下大厅。一眼见到一个矮子躺在那里，满枕头血，一嘴仁丹黑胡子，活像一个日本人，我和经理先生急忙对这矮子实行抢救。与其说他是中弹负了伤，不如说他受惊掉了魂，一颗子弹洞穿双颊，竟没有触及牙齿，也许他正在打哈欠时一弹飞过。经理煮了一杯浓咖啡，我把矮子嘴上的血迹收拾干净，帮他穿好衣服，喂了他一调羹咖啡，他从头到尾向我和经理赌咒发誓说他不是日本鬼子。

救护车把矮子送走后，经理把他的大小皮箱搬到我的房子里，他对我解释道："兵油子们还会来的！你是外国友人，你的房间比我的房间要安全，我不收你的房费了。"

一辆卡车开进了院子，一批东北军的青年军官接管了西京招待所，大厅里面放了一张桌子，一个青年军官会说英语，他接待旅客们的申诉，他填了一张失物丢失清单，他告诉我，肇事部队的负责长官杨虎城会赔偿我的损失。（我没有收到一文钱的损失赔偿费。事过三年后，杨氏军部的一个参谋告诉我，当时一个秘书奉命拿了一笔款子送给我，但那位秘书饱了私囊，也许他以为外国人都富有中国人都很穷吧！）东北军青年军官给了我一份宣言，这是西安事变有名的通电八项主张：改组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各党派在内的共同负责救国的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上海七名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证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权利。废除一切镇压爱国抗日运动的非常法令。与同情中国独立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我读完这八项声明，身受打砸抢遭遇的不幸一扫而空，无论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中国将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可以断言。

这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一个军界的朋友跟我打电话。好几个小时电话刚才接通，他告诉我这不是一次蓝衣社分子在闹事，是一次政变。西安现在张、杨的手里，市警察局、市党部、蓝衣社活动据点均已经占领，电台、文件、连同黑名单均已查获。两个被捕的学生也从蓝衣社总部里找到了。围剿红军的一百架飞机没收了，蒋委员长现在西安已成少帅的俘虏。胡宗南剿匪兵站所有物资均已接管过来。少帅发布了一项声明，明天可能召开群众大会。他听到西京招待所遭劫的消息非常吃惊，向我提出警告：

"不要到外面去，已经宣布戒严，街上死伤的人很多。"

"慢着！我要去救护伤者，想办法帮我弄一张军用通行证吧！"我在电话里大声向他

喊道。

我的朋友和招待所的东北军军官通话商谈过后，我得到一张通行证。于是我背起急救箱到浸礼会医院弄了些外科用的纱布绷带，在西安市转了一整天。救护伤者，送入医院。

第二天下午。西安市召开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我有幸在场。十二月十六日，张学良少帅在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讲了话。他回顾了日寇侵占东北，政府不抵抗，他和蒋委员长中间发生过许多“违反民意”的政策上的矛盾，他宣称：

“我希望和全体武装同志并肩一致，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共赴国难，团结奋斗。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我们的满腔热血，一定要洒在保卫祖国打败日寇的战线上！”

西安市贴满了抗日的标语，受过特殊训练的东北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全国抗日爱国联合会，以及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在街头巷尾举行小型集会，并派出宣传小队到郊区附近向农民进行宣传，组织和武装西安市的市民和工农群众。

政治犯得到释放。里面有三百名工农红军战士，五十名红军女战士和三十三个红军小鬼。战士们发烧，伤口化脓，感染的有百多个，我只懂一点急救方法。尽力跑医院为重病号找床位，给轻病号弄到药品。他们躺在冷冰冰的砖石地板的草垫子上，有一床薄棉被的战士为数不多。过了一个星期才来了一位医生接替我的护理工作。杨虎城将军最后送来了两千块钱作为替病员们买毯子和食物的用费。

见到红军，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他们是四川来的红军，都是贫苦农民，年龄在十五岁至五十岁之间。看到他们，使我联想起历史上描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人物形象，他们一双眼睛赤肿发炎，许多人没有鞋穿。一双农民脚板，一道道化脓流血的裂口。我第一次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紧盯着我。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穿着讲究的“女洋鬼子”。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我怀着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的奇特感觉观察时局的发展。一架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下午飞回来了，在西安城头低空慢慢地盘旋过后徐徐降落在西安机场。飞机请来了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红军代表抵达西安的第二天，我见到了他们一行。九年内战过去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九年内战的浩劫中牺牲了生命，国家的财富资源消耗殆尽，军事装备物资浪费无存，多少工农红军指战员家破人亡、骨肉失散。但是，从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叶剑英和我的谈话中，使我感到他们此行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报仇雪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

西安事变第二天，出现了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联合委员会的报纸。接连半个月时间内又出版了另外两份报纸和一种学生刊物。学生和演员组成第一批流动剧团为部队和老百姓演出活报剧。南京国民党广播电台疯狂报道蒋委员长已被枪毙，红军占领了西安，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等等谣言。西安一家日报的编辑发表中文电讯广播稿进行驳

斥，我担任英语广播。发表了我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

我的访问报道很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头痛生气。几个月后，我从美国记者那里听说美国驻南京上海的领事官员们甚至宣称他们已经作出驱逐我出境的决定，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发言人接见纽约时报记者的访问时，宣称“我的讲话与政府既定政策方针抵触，为统一战线思想方案辩护”。这个发言人对于基督教美国青年会总干事发表严重歪曲事实真相的南京报道的广播则不表态。平心而论，我讲了实话。

对中国的未来起危害作用的消息纷纷传来了。第一个消息是有关汪精卫的报道。前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自从遇刺受伤后即侨居德国养病。他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赶赴柏林和希特勒开黑会，然后乘专机回国，醉翁之意显然是要上台执政。

日本侵华司令长官也在华北召开黑会，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警告，声称必须粉碎西北军队结成联合战线。军政部长何应钦多年来同汪精卫沆瀣一气，互相勾结。他以设法营放蒋委员长为借口，组织讨伐军，命令部队进入陕西省境内向潼关集结，挑起了内战的威胁。我写了一篇警惕内战的讲演稿，广播前提请东北军和红军的代表审阅过，我在讲演中把何应钦及其一伙比作是明末清初反复无常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的贰臣反动派吴三桂。

张学良少帅天天和蒋委员长进行谈话，劝说敦促他停止内战，抵抗民族公敌，我听得人家说少帅读了蒋委员长的日记，相信蒋委员长确有抗日到底的最后决心和意图。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她的兄弟宋子文博士以及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很快飞到西安，商谈释蒋及其参谋人员的问题。

蒋委员长于圣诞节这天秘密获释，老百姓一无所知，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先一天西安当局放出风来，说英勇保卫绥远的傅作义将军于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同盟。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机场上打着旗子去欢迎他。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不见傅作义飞来，只见张学良飞去，人们大惑不解如入五里雾中。等到真相大白时才知道，他们到机场名为迎傅、实是送蒋，给蒋一个众人爱戴他的印象。

一小时后，西京招待所里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和抗日救国会领袖奔走相告闹翻了天，群情愤慨大骂这是一个政治骗局。人们停下来对我讲：“我们被出卖了！红军还劝说少帅放了老蒋！”一个青年军官蔑视一切大声说道：“少帅满脑袋瓜子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吧，那还有他的自由了，他永远回不来了！”

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不放蒋就讨伐挑起内战进行威吓，几星期内继续在潼关集结兵力，前线发生了战事，飞机轰炸了西安沿线的车站。抗日同盟坚决主张迎头痛击。少帅行前指定负责东北军的高级军官同何应钦进行秘密谈判，其他军官则在东北军内进行派系活动。

青年军官怒火满腔非常气愤，坚决要求释放少帅，实现民主抗日的八项主张。红军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条件，在西安事变时而急转中，为了打破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挑起内战的阴谋，红军两个师开到西安附近形成了一道防线以防万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新西兰人詹姆贝特兰到了西安，帮助我发表对外广播，搜集新闻报道，出席城乡群众大会发表演讲。他的讲话录音第一次播放出来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说，西安电台现在的播音员是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

有些外国人把中国人看作是任人宰割，唾面自干，打不还手，决不抵抗的冷血动物，他们要是见到了东北军，肯定会改变他们这种糊涂的看法。对国民党政府在日寇面前妥协求和的不抵抗政策，积压在心头的愤怒，像爆裂的炸弹在西安事变中炸开了。东北军官兵深深感到自己被赶出了他们的家乡，被当作兄弟阋墙亲痛仇快的炮灰。我亲眼见到了两次空前的游行示威，一次军事示威，一次军民游行，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头戴皮帽、身穿皮领大衣的东北骑兵队伍。他们高大结实威武雄壮。紧接着是东北军的步兵。我第一次听到东北军队伍步伐整齐、高唱《打回老家去》的雄壮歌声。青年军官们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法西斯卖国政府！""释放少帅！"

一直受压的学生、妇女、工商各界等民众团体以及公教人员，现在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游行队伍中，有人高举着一幅法西斯走狗汪精卫同希特勒握手的漫画，被禁止的《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人们起来战斗的歌声响彻云霄，西安古城在震撼世界！

西安渐渐的平静下来了，少帅在南京被软禁以劫持统帅的罪名受审讯。本刑立即受到特赦，但蒋委员长却以"严加管束"的名义把少帅关在奉化的蒋家。岁月流逝，张学良成为蒋介石的笼中囚。他的命运激起了东北爱国人士的怒火，他的部队分散解体，参与西安事变的僚属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西安事变以地方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在迟迟分娩、阵阵阵痛中诞生。我们很快得知国民党军队要打过来了，西安即将失守。抗日救亡委员会的爱国领袖们闻讯纷纷离开西安，分赴全国各地，他们知道国民党是从来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的。

我知道要是我留在西安就会被捕，受到中国爱国人士一样的命运，一月十二日早晨我离开了西安。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四周和十字街口正在赶筑沙包防御工事。城头上隐约传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口号怒吼声。墙壁上张贴的八项声明的标语在严冬的寒风中沙沙作响。

我在飞机场附近寒冷冰冻的路边等了四个钟头，终于过来了一部卡车，一个红军战士跳下了车，命令一个坐在司机旁边的战士让座。我上了车，车上坐了一车学生，各人脚上放着一个背包卷。我们一言不发，心向陕北。汽车朝古城咸阳，经过周秦汉唐历代陵墓，向三原红军驻地开去。

红星照耀中国（节选）[1]

斯诺

【题解】《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作。1936年，斯诺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大量一手材料完成了这部名作。1938年该书在上海出版时，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更名为《西行漫记》，成为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经典作品。全书内容实在，语言平实，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斯诺一生热爱中国，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去世后部分骨灰埋在他曾经执教的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

二　彭德怀印象

我在八、九两月访问前线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方面军有八个“师”当时驻守从宁夏的长城到甘肃的固源和平凉一线。一军团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向南向西移动，为当时领导二、四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肃南部突破南京部队纵深封锁的朱德开辟一条道路。预旺堡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现在成了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我在这里找到了该军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开始的，他当时在多妻的军阀省主席何键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领导了一次起义。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众，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同士兵委员会商量。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惨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

[1]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军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十日，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

不久之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

彭德怀过去既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前面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韩吃瓜的”这样一个美名。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像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像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

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像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室即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那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个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

“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像他那样投奔红军。

三　为什么当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里。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人。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

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轻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这位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残酷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

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人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这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

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了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二百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在饥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闩上了大门。

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上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像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像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陈独秀的《新青年》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女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拂，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四　游击战术

这里我要报道一下我访问彭德怀，了解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的一次极为有兴趣

的谈话。我记得我们是坐在预旺堡前县长的公馆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有栏杆围着的阳台。坐在阳台上，你可以越过宁夏平原眺望蒙古。

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我们从一边望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清洁的院子，回族妇女在舂米做饭，另一边晾着衣服。远处一个空地里，红军战士在练爬墙，跳远，掷手榴弹。

彭德怀和毛泽东虽是湖南同乡，在成立红军以前却没有见过面。彭德怀说话南方口音很重，快得像连珠炮。只有他慢条斯理地讲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能听懂，但他总是很不耐烦慢条斯理地说话。在这次谈话里，北京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我的翻译，他的英语很好。我希望他仍活着，总有一天会读到我在这里对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谢。

“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开始说。“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它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的。苛捐杂税，加上日本侵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帮助下加速了农民破产的速度。农村中的豪绅的滥用权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失业现象普遍。穷人阶级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斗争。”

“其次，游击战得到了发展是因为内地的落后。缺乏交通、道路、铁路、桥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

“第三，虽然中国的战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这种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

“第四，大革命（一九二六——二七）年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城市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许多革命者拒绝屈服，寻求反对的方法，由于大城市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联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于在开始的时候缺乏一支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个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回到农村地区去领导农民起义。无法容忍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所需要的只是为这一农村群众运动提供领导、方式和目标。”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当然，这些道理说得很简单，没有谈到其中更深刻的问题。”

“除了这些理由以外，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但是至于游击战的具体任务，你问到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发展很快，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别的地方却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镇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

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它宣传的诺言。”

“其次，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需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领导品质，游击战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在反动派的进攻下一定会衰亡。”

“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只有立即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发展游击战。这意味着必须迅速解除剥削阶级的武装。”

“游击队决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地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这些话使人感到很有兴趣，而且无疑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红军的军事指导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使得他们成为装备比他们强大好几倍的南京军队的劲敌。凡是读到过一些关于劳伦斯上校及其战役的人，无不把红军的战术同这个英国运动战伟大天才的战术相比。像阿拉伯人一样，红军在少数几次大规模阵地战中战绩平庸，但在运动战中却不可战胜。

张学良少帅所以开始尊重红军（这是他被派来摧毁的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对他们这种作战方法的熟练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终于相信，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来打日本的。他同红军达成休战协议后，就邀请红军教官到他在陕西为东北军办的军官训练班讲课，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就迅速扩大。张学良和他的大部分军官坚决抗日，他们相信，在对日战争中，中国最后必须依靠优势的机动和运动能力。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红军在十年内战的经验中学到的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所有知识。

关于这几点，我原来问过彭德怀，是否可以归纳一下“红色游击战术的原则”？他答应过给我总结一下，并且写了一些笔记，现在他念给我听。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他叫我去看毛泽东写的一本小册子，是在苏区出版的，但是我无法弄到。

彭德怀说，“如果新发展的游击队要成功的话，有些战术原则必须遵守。这是我们从长期经验中学习到的，虽然视具体情况而异。我认为背离这些原则一般都会造成灭亡。主要原则可以归纳为下列十点：”

“第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

“第二，游击队如果领导得好，所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因此在长期的阵地战中敌人据有一切有利条件，总的来说，游击队获胜的可能性与作战时间长短成反比例。”

“第三，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特别是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游击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

“第四，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一乡的民团不解除武装，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

“第五，在与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红军的许多‘短促突击’都是用几百个人的兵力对成千上万的敌军进行的。这种突然进攻要完全成功必须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断、计划周密，挑选的是敌人最薄弱又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高度有经验的游击队才能取胜。”

“第六，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每一单位必须有可靠的干部，充分能够代替在战斗中伤亡的指挥员。在游击战中必须大大依靠下级的随机应变。”

“第七，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在中文中，这种战术叫做‘声东击西的原则’”。

“第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环节。”

“第九，必须提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员在敌人前进时应避免集中在一个地方，应该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一天或一晚上两三次。游击队行动神出鬼没是要取得成功所绝对必备的条件。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

“第十，除了优势机动以外，游击队由于同地方群众不可分离，在优势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农民都是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每走一步，游击队就无不事先知道。应努力保护敌情渠道，并建立好几道辅助情报网。”

据彭德怀司令员说，这就是红军力量所系的主要原则，每次扩大红区都要运用这些原则。他最后说：

“因此你可以看到游击战要成功，需要这些基本条件：无畏、迅速、计划周密、机动、保密、行动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缺一项，游击队就不能取胜。如果在战斗开始时，他们没有决断，战斗就要拖延时日。他们必须迅速，否则敌人就能得到增援。他们必须机动灵活，否则就会失掉运动的有利条件。”

“最后，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如果没有武装农民运动，事实上就没有游击队根据地，军队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只有实现群众的要求，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

彭德怀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书的桌子边上时就提出一个论点。现在他突然停下来，沉思地回想。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

“我记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队在湖南只剩下二千多人，还受到包围。国民党军队把方圆三百里内的所有房子都烧掉了，抢去了所有粮食，然后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布，就用树皮做短衫，把裤腿剪下来做鞋子。头发长了没法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

“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白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粮食。甚至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在同地主老财作斗争了，因此他们欢迎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他向我转过身来，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文汇报·上海并非孤岛[1]

徐铸成

【题解】1937 年 11 月，上海陷落，租界沦为“孤岛”。翌年，严宝礼在上海以英商名义创办《文汇报》，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新闻界的一面旗帜。《大公报》名记者徐铸成应聘主持《文汇报》，《上海并非孤岛》即为他所撰写的第一篇社论。

从华军撤退后，上海又成了一切堕落颓废者的乐园。租界上表面的繁荣，又恢复了原状；歌场舞榭，满坑满谷，其他消费的场所，也多忙于接应；这两天正值春节，一片熙攘往来的街景，使人不信这里曾有过战事，更不会相信数百里外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拼性命流热血，为大家的生存而苦斗。“上海是一个孤岛”，这一句话，成了三百万市民的口头语，仿佛一切罪恶，一切良心的谴责，多因此赦免了！

上海究竟是不是一个孤岛？请大家平心静气的想一想。

战事的确已暂时离开了上海，但战神的魔手是否已放弃了上海呢？我们且慢看租界以外的一片断墙残壁和租界以内五十万冻馁失所的难民，单就租界内暂可苟安的一般民众来说，你们那一件事能不为上海以外的环境所影响？你们的祖宗坟墓在哪里？你们的亲戚故旧现在又成了什么景象？上海的生命，本来全寄托在内地的农民身上，现在环境已成了一片焦土，上海的繁荣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你们的职业、生活，究竟能不能长此不生问题？不错，你们目前是安全的，但这两个月来，哪一天没有人在那里苦心孤诣，制造事实，制造恐怖，想把你们的安全加以危害呢？

现在的环境，已不是鲁滨逊神话时代的环境了！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四周的巨浪，随时可以把你们吞没；天空的铁鸟，随时会震伤你们的心弦；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你们所处的地位；为了你们自己，不应该再这样苟安逸堕；为了你们的子孙，更应该时时有所警惕。

一个人的奢靡，足以丧失了多少人的生活，古人说：“安不忘危”。在苟安的环境里，千万不要忘了离此不远的地方，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受苦受难。

上海并非孤岛，大家应该紧紧把握住自己的灵魂！

---

[1] 《文汇报》(1938 年 2 月 1 日)，本文据徐铸成：《徐铸成新闻评论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晋察冀画报·白求恩大夫[1]

吴印咸

【题解】诺尔曼·白求恩(Dr. Henry Norman Bethune),加拿大共产党党员、国际著名外科医生。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他于1938年来到延安,同年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带领流动医疗队活跃于前线。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人民的极端热忱,使他赢得根据地军民的尊敬与爱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里,盛赞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幅发表于《晋察冀画报》的照片,表现了白求恩大夫在前线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的场景。照片拍摄者吴印咸是著名摄影艺术家,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



[1] 《晋察冀画报》(1939年),本文据《吴印咸摄影集》(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82幅摄影作品《白求恩大夫》(1939 晋西北)。

新华日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1]

周恩来

【题解】1941 年 1 月 4 日，蒋介石策划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为了揭露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并向世人揭示“皖南事变”真相，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一诗。诗中“江南一叶”指在江南领导抗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同时借曹植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控诉国民党同室操戈的行径。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新華日報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一月十七日夜
周恩来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周恩来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题词

[1] 《新华日报》，1941 年 1 月 18 日。

大公报·我们在割稻子[1]

王芸生

【题解】抗战时期，重庆《大公报》社址屡遭日机毁坏，病中的张季鸾请王芸生写篇社评，题目就叫《我们在割稻子》，以表达抗日军民不屈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这篇社评运用象征手法，描写农民面临敌机轰炸，依然从容不迫收割稻子的情景，显示了中国民众面对强敌的镇定自若和坚毅果敢。读来仿佛看到辛勤劳作的人民，热爱生活，坚信未来，嘴边挂着一缕对日寇轻蔑的微笑，产生了鼓舞士气抗击敌寇的强大精神力量。

早稻已熟，农村正忙收割。今春本有旱征，入夏连得透雨，迄今乃获丰登。正在这时候，敌机频频来轰炸我后方城市。据敌人广播，自上月杪以来，内地天气不良，迄本月八日据报内地天气恢复，于是乃于昼间或月光之下，空袭重庆数十次云云。如此说来，敌机来袭与天气的良劣有直接关系。就在敌机袭扰重庆最繁之时，市民们每天的大部时间在防空洞内生活，我们曾问一个市民："下雨好吗？"他连连回答："要不得！要不得！我们在割稻子！"这匆促之间的答复，真是理智极了，也是正确极了。重庆市民的理智是：宁自己忍受防空洞里的避难生活，而不希望老天下雨。因为雨天虽能阻止敌机来袭，而田中待割之稻却不免因霉湿而发芽。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

在这一段空袭期间，东京各报大肆宣传，以为是了不起的战绩。然事实证明，敌机尽管卖大力气，也只能威胁我少数城市，并不能奈何我广大农村；况且我少数城市所受的物质损害，较之广大农村的割稻收获，数字的悬殊何啻霄壤？由福建两广赣湘黔滇以至四川，这广大区域的早稻收获，敌机能奈之何？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天气晴朗，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于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敌寇真是无聊！它原是小本经营，侵华四年，已甚蚀本，现在又入轴心之伙，想做大生意。它为了配合盟兄的需要，于是占越南，窥泰国，作南进之势，以牵掣英美；调兵东北，作北进之势，以威胁苏联。但经英美警告，止于顿兵泰边；苏军在西线既能力阻强德，它的北

[1] 《大公报》，中华民国三十年八月十九日(1941 年 8 月 19 日)。

进之师亦遂趑趄不前。那么，它将全力侵华吗？其实它已将较强的部队抽调出去，去点缀南进北进的姿态，而把国内老弱预备役调来中国填防，所以也没有进攻的力量。近来各战场之无大战事，就是这种原因。如此说来，敌寇南进不得，北进不成，西进也无力，那不是吊起来了吗？敌人的确吊在这种景况之下。但是它要表示还有力量，还在作战，就只有调遣这些架烂飞机来空袭重庆及其他后方城市，藉此作东京登报的材料，以欺骗人民，夸耀国际。所以我们说敌人这一向的空袭攻势，是“政治的帮闲，军事的自杀”。就这一有限的本钱，为点缀场面而消耗，看它将来怎了？

讲到敌机对于城市的威胁，说穿了也不过这么一回事。敌人说它这次空袭重庆是“疲劳轰炸”，我们是生活在重庆的，经过敌机三年轰炸，还不照样在做我们的工作？最近的所谓“疲劳轰炸”，的确疲劳了体质较弱的妇孺，有的妇人坠了孕，有的小孩着了凉，更有许多平民失掉了住居。残暴而无耻的敌人，你所给予我们的损害不过如此而已！至于一般壮汉，他们谁也未曾少做了一丝半点的工作。三年来的经验，已使重庆人学会怎样在敌机空袭中生活，人们既不曾因空袭而停止呼吸，而许多工业照样能在防空洞中从事生产。就拿本报的情形来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常挥笔，工友照常排版，机器照样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

话说回来，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反对党八股[1]

毛泽东

【题解】本文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的讲演。讲演针对"文风"问题，论述了党八股产生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指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及其危害，阐明反对党八股的意义，同时倡导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些思想对今天改进新闻报道，推动"三贴近"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

[1] 此文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本文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

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工”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

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 ABCD，小 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

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

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解放日报·致读者——《解放日报》改版社论[1]

《解放日报》编辑部

【题解】《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最重要的机关报，地位犹如现在的《人民日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解放日报》也随之进行"改版"。这次改版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由此确立的一系列理论、方针、原则、作风等等，无不深刻影响着后来中国新闻的发展历程。

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献在读者面前，我们愿乘此机会来总结一下过去十个月来的工作及提出今后本报的方向。

什么是党报？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必然会想起"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斯大林）这一类名言。但是试问报纸到底如何才能成为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集体组织者呢？究竟怎样才能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呢？那末，必须：第一，贯彻着坚强的党性。这里不仅要"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见更其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负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愿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又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第三，洋溢着战斗性。党报必须是为着党的革命方针和路线而奋斗的战士；报纸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事变而进行热忱的鼓动，而鼓动的成功，则极有赖于明朗锐利的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尤其在思想战略上，报纸应进行经常的坚持的思想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潮，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同时，报纸亦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

[1] 《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摘，帮助其克服和改正。第四，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的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底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

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去检查我们十个月的工作，实在是惶恐得很，应该说，解放日报是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解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对于我们工作的缺点，没有严格的揭露和帮助其改正，对于边区中所进行的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我们还没有具备党报所必须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一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中没有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能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余毒。我们在党报上未能对于整顿三风加见应有重视与地位，蔚成风气，形成潮流，重要的党的新闻消息放在极不显著的地位，有些解释的论文评述，或则浮泛空洞，辞严意宽，或则挂一漏万，损害原意，或则夸夸其谈，见八股反八股。同时，要成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先锋，本身首先应该成为模范者，唯有模范者方能成为先锋。而在我们篇幅上，主观主义（如对苏德战争前夜苏土协定的估计等）、宗派主义（如对某些稿件的取舍，未能免除狭隘的观点等）及党八股（如某些社论、专论和副刊）都是俯拾即是。因此，亦就不能在思想革命改造全党工作中起其应有的功能。

在检讨我们过去的工作之后，我们认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我们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别的利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报纸变成全国抗日人民和抗日党派的共同的论坛，我们欢迎一切抗日人士和党派利用我们的篇幅来创造一切有利抗日团结的主张、办法，消灭一切阻害抗建大业的障碍。

十个月来，我们在工作中，曾受到读者的许多鼓励和批评。鼓励增加我们的勇气，批评

促使我们反省，我们统致无限的感谢！当此改革之始，我们愿引一句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以为自励：

“如果没有办得很好的报刊，那末健康的、巩固的党和苏维埃的建设，便是不可想象的。”

并又愿意，模仿地添一句：

“没有广大的读者的赞助和鞭策，则报纸要办得好，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诚恳地期望着，读者们给我们一切援助和批评，使我们的报纸能够成为真正的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

解放日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

陆定一

【题解】本文是《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最有影响的文章之一，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其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对后来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均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新闻的本源和新闻的真实性等新闻学核心命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论述，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在先，报道在后，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与唯心论在新闻学上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更成为一个经典的新闻定义。陆定一，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领导人，遵义会议后主编《红星报》，1942年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4年任中宣部部长，建国后，长期担任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领导职务，晚年曾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别的阶级，因为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够彻底老老实实的，或者是干脆不老实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地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或减损，不但这样，而且它能够反对一切不老实，反对一切曲解。

在新闻事业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开始从事自己的新闻事业时，就有了的。抗战以来，党的新闻事业是大大的发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到这部门事业中来。吸收新的血液，乃是事业向前发展中必要的和必有的步骤。但随此以俱来的，则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

[1]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头版。

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懂得它的谬误在哪里，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四月改版才开始，这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了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这一个斗争的结果，现在已经可以把它在理论上作一个初步总结，这对于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今后的发展，是会有点好处的。本文的目的就在这里。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第一　新闻的本源

新闻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由于对于新闻的本源理解不同，一种人对于新闻是什么，作了唯物论的解决，另一种人则作了唯心论的解决。

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

新闻学理论中的唯心论，是很早就有的。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Quality theory）。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总而言之，唯心论企图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的唯物论定义，而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的本身，脱离开了某种“性质”就不成其为新闻。

这种唯心论的“性质说”，其错误在哪里呢？初看起来，它似乎是对的，因为不论从哪一条新闻来看，都会是合于或似乎合于某一种“性质”的，例如有些新闻就有“一般性”，有些就有“趣味性”等等，而且主张新闻应有某种“性质”的人，也总能讲出一些片面的道理来的，因而，许多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就会被它迷惑。但是，新闻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我们回答道：是由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来决定的。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关于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事实完整了，写出来就成为完整的新闻，事实尚未完整，报道这个事实的新闻也只能不完整。事实很“文艺性”，报道也自然会有“文艺性”，否则就相反，例如宣布政府或党的公告的新闻，有什么文艺性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说明：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事实的报道）有什么决定

作用。唯心论的“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照此做去，必致误入歧途。新闻界中的下流坯，提倡所谓“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岂不是以“趣味性”做招牌的么？借口“文艺性”而把地上的事实夸张成为神话一般的事，在新闻界中岂不也是数见不鲜的么？

这种唯心论的“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闻说得神乎其神，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业还起了消极作用，因为如果相信了这种“性质说”，天天去玄而又玄地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就一世也不会有结果，必致流入脱离事实，向壁虚造，无病呻吟，夸夸其谈。

这里，我们要专门来讨论一种特别重要的“性质说”，这种“性质说”认为：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

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蒂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这是对的，那么，如此说来，这种“政治性”的“性质说”岂不是正确的么？乍看起来，这的确像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一想，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

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有什么害处呢？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就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

所以，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哪怕装得像很“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

最近几年，大后方反动派特务崽子们，在提倡所谓“三民主义的新闻原理”，这就是德意日法西斯“新闻理论”的变种。在这种“原理”之下，特务们提倡“合理的语言”，公然伪造民意，压制舆论。例如河南大灾荒不准报道，西安特务开了九个人十分钟的会就“报道”说西安“文化界”主张“解散共产党”等，就是他们的“新闻大杰作”。

总结上面所说，我们可以明白，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线，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

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反动的阶级，为什么不能尊重事实，必定要曲解事实，而且要闭着眼睛造谣呢？因为他害怕事

实。有些人为什么不能彻头彻尾尊重事实呢？因为他们对反动派有所畏惧，有所迎合。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也无所迎合，因此就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

第二　新闻如何能真实

我们的新闻工作，既然尊重事实，那么我们不但与专吃造谣饭的法西斯不同，而且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不同。只有我们，才能实行一个方针，这个方针使我们的新闻十分真实。

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也讲到怎样求得新闻成为事实的真实报道的问题。例如，最初步的新闻学，就说到每条新闻必须有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新闻中有了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才算是新闻。再例如资产阶级的新闻学主张记者报道新闻时必须亲自到发生事件的地点去踏看，而且主张摄影的报道等。

资产阶级新闻学中这些主张，我们认为是对的（理由不必多讲了），但我们同时要指出，要想求得新闻十分真实，这是非常不够的，所谓新闻五要素，所谓新闻记者亲自踏看和摄影报道，还是形式的。这些形式是必要的，但如果以为这便是一切，乃是大错的。

先说“新闻五要素”。报道一件具体事实的新闻，必须要有此五要素，缺一不可，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有了这五要素的新闻，是否一定就是真实的呢？那就未必。《解放日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叫做“郿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织声”的新闻，后来查起来，那时郿县城内原来连一架纺织机都没有。去年征粮时，报上又曾登过一条消息，说延安乌阳区首先完成入仓任务，后来查明，乌阳区在延安征粮中是最落后的一个区，记者写那个消息时，入仓工作还未开始呢！上述两个，是不真实的新闻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查出来，品质不好的分子常常写这种不真实的新闻，想来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但是，这些新闻，就形式而论，则五要素件件具备。

再说记者亲自踏看，这也是对的，而且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采用的方法。但是否亲自踏看就一定可以得到真实的新闻呢？那也未必尽然。因为：第一，记者既非参与此事内幕的人，他即使亲自踏看，难免主观主义，更难免浮面肤浅；第二，有时亲自踏看的记者，为了某种原因，仍旧作不尽不实的报道；第三，每件事都要记者亲自去踏看，则势必没有办法，或是记者太少，或是时间不对。

摄影报道，这是最足信任的办法，要在高度发展的技术条件下才办得到，但甚至这种报道，都还可以伪造。

由此可见，上面这些办法，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只要技术条件具备，派记者亲自踏看和摄影报道都应该采用的。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些，就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还是得不到真实的新闻。

要怎样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呢?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

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地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身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一方面,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们,要做学生又做先生。做学生,就是说,要恭敬勤劳,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的真相,尊重他们用书面或口头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以他们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做先生,就是在技术上帮助他们,使他们用口头或书面报告的事实,写成了完全的新闻,经过这种结合,报纸就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了。

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就是《解放日报》的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只有共产党的党报,才能这样建设自己的报纸,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乃是人民的先锋队,因为它有共产党组织可以依靠,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基本骨干乃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并且是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

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对于建设一个好的报纸,有头等重要性,比之讲求新闻五要素,记者亲自踏看等重要得好多倍,虽然后者还是仍须讲求而不可偏废的重要的方面。

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

任何一个报纸不能与我们竞争,因为它们有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有的虽然要为人民服务但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也没有共产党这样先进的伟大的组织可以依靠。

这条路线,这个方针,我们行之一年了,结果是得到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还必需将它继续贯彻下去。为了以后顺利地贯彻,有三点还必须提出来谈谈:

第一点,必须赞成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的路线,而反对那把二者分裂开来的路线。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那批反共特务,他们企图对新闻工作者灌输一种反动的思想,使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叫他们与人民远远的分裂开来。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那批特务,捧新闻记者为“无冕之王”,为“先知先觉”,甚至曲解历史,说中国自有报纸以来,报纸和新闻记者就是“革命”的(其实,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是帝国主义者办的,目的为了侵略。后来官报盛行,目的是为了便于统治人民,再后来民间起来办报,其中才有些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才是革命的。但在反动统治之下,民间的报纸反动的也很多),另一方面,则对新闻工作者施以法西斯的残酷压迫,不给新闻工作者以与人民接触的机会,不给他们以替人民说话的权利,而且用手枪和活埋,强迫新闻工作者出卖

灵魂，去当法西斯特务，袁世凯、曹锟只枪毙几个记者，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变本加厉，简直是要窒死全体新闻界，枪毙整个人民言论自由！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使新闻工作者形成一种“报阀”，甚至成为一群丧尽天良的特务，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而还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这样好甘心情愿给反动派新专制主义者当作反革命的工具使用。

第二点，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

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是学了些新闻技术的，但万勿以此自满，看不起人。另一方面，我们做专业的新闻工作的人，却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你对于你所报道的事实，没有感性知识，无论如何不会像亲身参加那个工作尤其是领导那个工作的人知道得那样透彻、了解得那样亲切的。所以在你作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请教那亲身参加或领导这件工作的人，细细地听，好好地记，写成之后还要请他看过（或听过）和改过，写得不好就要听他的意见重新写，以便真正求得忠于事实。

对于亲身参加或领导工作的人的投稿，要知道他们写作技术不好乃是应有的事，你的任务，是要一方面向他学，尊重他所写的事实，一方面要做他的先生或者“理发员”，帮助整理修饰。你要用最大的热情去奖掖和鼓励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去轻视和排斥他们。

第三点，我们办党报的人，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群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这对于办报毫无例外。不错，他们是没有技术的，但技术是可以提高的，这需要长期的不倦的教育。我们既然办报，我们不尽这个责任，倒叫谁来尽这个责任呢？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还需要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出来。

解放日报·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1]

孙犁

【题解】本文是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也体现了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的宗旨，即追求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风格。作者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人，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抗战期间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任编辑。1944年赴延安，在“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与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杆铁笔”。《荷花淀》由于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被公认为孙犁的代表作和“荷花淀派”的主要作品。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为背景，生动再现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战斗情景，表现了中国人民积极勇敢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时也抒写了英雄儿女含蓄而深沉的爱情与亲情。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

[1] 《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

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

“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

“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苇尖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

“那是真的,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进去唱,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我就傻想:该低下头了吧。你猜人家干什么?用白粉子在我家影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托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

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唉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

“快摇!”

小船拚命往前摇。她们心里也许有些后悔,不该这么冒冒失失走来;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么也别想了,快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

大船追的很紧。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的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

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后面大船来的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

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

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忽然从她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得那是区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

"你们干什么去来呀？"

水生的女人说：

"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小队长开了个玩笑，他说：

"你们也没有白来，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可是，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去晒晒衣裳了。情况还紧的很！"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

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噘着嘴说：

"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她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可是：

"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淀里跑，在大淀里就和鬼子干起来！"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再深点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

“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大公报·毛泽东先生到重庆[1]

子冈

【题解】子冈即彭子冈(1914—1988),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期“大后方”新闻界最活跃的女记者之一,与杨刚、浦熙修、戈扬齐名,被誉为当时新闻界“四大名旦”。国民党曾把中国共产党描绘得野蛮横暴,如洪水猛兽,而这篇特写却显示了共产党领袖伟大而质朴、亲切而平易的风貌,使国统区人民对共产党产生真切的认识和好感,发表后轰动大后方,至今仍不失为新闻写作的范例。

人们有不少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不能不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先生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这也许可以作为祥和之气的开始吧。机场上飞机起落无止尽,到 3 点 37 分,赫尔利大使的专机才盘旋到人们的视线以内,草绿的三引擎巨型机。警卫一面维持秩序,一面也没有忘了对准了他的快镜镜头。美国记者们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中国摄影记者不多,因此倒强调了国际间关心中国团结的比重。塔斯社社长普金科去年曾参加记者团赴延安,他也在为“老朋友”毛泽东先生留像。昨日下午 6 时有重庆对莫斯科广播的节目。普金科看看表,欣慰地笑了。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 9 个人。毛泽东先生,52 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 9 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这里有邵力子、雷震两先生,这里有周至柔将军,这里有张澜先生,这里有沈钧儒先生,这里有郭沫若先生……多少新交故旧,他都以极大的安定来迎接这个非凡的情景。“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纸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们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吧”,赫尔利却与毛

[1] 《大公报》,1945 年 8 月 29 日。

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儿是好莱坞！"于是他们作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张部长在汽车旁力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毛、张、赫、周四个人坐了美大使馆 2819 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 2823 号的篷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 50 号了，侍从室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记者像追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他和郭先生仔细谈着苏联之行，记者问他对于中苏盟约的感想时，他说："昨天还只看到要点，全文来不及看呢。"我以为他下飞机时发表的中英文书面谈话甚为原则，因此问他："你这谈话里没有提到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这次洽谈是否仍打算在这两件事上谈起呢？"他指着中文书面谈话说："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见怎么样。"对于留渝日期，他说不能预料。他翻看重庆报纸时说："我们在延安也能读到一些。"他盼望有更多的记者可以到延安等地去。张部长报告蒋主席电话里说：8 时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先生等稍事休息后再赴宴，作世界所关心的一个胜利与和平的握手。

大公报·落日：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1]

朱启平

【题解】朱启平(1915—1993),名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大公报》派遣,前往美国太平洋舰队任随军记者。1945年9月2日,参加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仪式,亲眼见证了永载史册的那一场景,写成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通讯《落日》。这篇被誉为"状元之作"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浓烈的爱国之情,深深打动了千万中国人,也因此成为名彪史册的经典。晚年,朱启平谈及写作《落日》的情形时说:"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有各国记者参加受降仪式。我想我必须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感情来写好这篇报道。"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天刚破晓,大家便开始准备。我是在七点多钟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的。"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走动不开。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卡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海面上舰船如林,飘扬着美国国旗。舱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苏里"号舰注视着。小艇往来疾驶如奔马,艇后白浪如练,摩托声如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陆地看不清楚,躺在远远的早雾中。

签字场所

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签字用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舰

[1] 《大公报》,1945年9月3日。

“乔治五世”号借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案，因为太小，临时换用本舰士官室一张吃饭用的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绿呢□（编者注：此字在原文中遗失）布。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放一把椅子，桌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柜门，如同装饰着织锦画一般，装着一面有着十三花条、三十一颗星、长六十五英寸、阔六十二英寸的陈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还是九十二年前，首次来日通商的美将佩里携至日本，在日本上空飘扬过。现在，旗的位置正下视签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靠外的留给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将排列美国五十位高级海军将领，右方排列五十位高级陆军将领。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给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摄影记者们专用。其余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将领指挥室的上面和各枪炮的底座上，都被记者们占住了。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厘米口径的机关枪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离开签字桌约两三丈远。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紧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着水兵乐队和陆战队荣誉仪仗队，口上又排列着一小队精神饱满、体格强壮的水兵。

白马故事

八点多钟，记者们都依照预先规定的位置站好了。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官，“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因此从来客的立场讲，他是主人。这时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握手寒暄。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到了，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走入将领指挥室，舰上升起尼米兹的五星将旗。海尔赛以前曾在向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阅兵时骑的那匹白马。他说，想等击败日本之后，骑上这匹名驹，参加美军在东京街头游行行列。他还说，已经有人在美国国内定制了一副白银马鞍，准备到那时赠他使用。一个中士也从千里外写信给他，送他一副马刺，并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时扶他上马。我还想起，第三舰队在扫荡日本沿海时，突然风传“密苏里”号上正在盖马厩。现在，马厩没有盖，银驹未渡海，但日本代表却登舰签字投降来了。

乐队不断奏乐，将领们不断到来。文字记者眼耳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笔记。摄影记者更是千姿百态，或立或跪，相机对准各处镜头，抢拍下这最有意义的时刻。这时候，大家都羡慕四五个苏联摄影记者，其中两个身穿红军制服，仗着不懂英语，在舰上到处跑，任意照相。可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点，听候英语命令，无法随意挪动。这时，上层甲板上的人渐渐多了，都是美国高级将领，他们满脸欢喜，说说笑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高级军官。

代表到来

八点半，乐声大起，一位军官宣布，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到。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动身

来的。顷刻间，从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随后，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这时，记者大忙，上层甲板上成了一个热闹的外交应酬场所。一时间，中国话、英国话、发音语调略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话、荷兰话、俄国话，起伏交流，笑声不绝。身移影动时，只见中国代表身穿深灰黄军服；英国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裤制服，并穿著长袜；苏联代表中的陆军身穿淡绿棕色制服，裤管上还镶有长长的红条，海军则穿海蓝色制服；法国代表本来穿著雨衣，携一根手杖，这时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黄卡叽制服；澳洲代表的军帽上还围有红边……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八时五十分，乐声又响彻上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到。他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陪他进入位于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舰上升起他的五星将旗，和尼米兹的将旗并列。军舰的主桅杆上，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上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五十位海军将领和五十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这时有人说，日本代表团将到。我急急翘首望去，只见一艘小艇正向军舰右舷铁梯驶来。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甲板。入口处那一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后，即放下手立正。乐队寂然。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登梯时有人扶他。他头上戴着大礼帽，身穿大礼服，登上上层甲板就把帽子除了。梅津美治郎随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他们一共十一个人，到上层甲板后，即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对桌子列成三行，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这时，全舰静悄悄一无声息，只有高悬的旗帜传来被海风吹拂的微微的猎猎声。重光一腿失于淞沪战争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阅兵时，被一位朝鲜志士尹奉告投掷一枚炸弹炸断。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著名的《何梅协议》日方签订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仪 式 开 始

九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

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这时是九时十分，军舰上层传来一声轻快的笑声，原来是几个毛头小伙子水兵，其中一个正伸臂点着下面的梅津，在又说又笑。但是，在全舰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很快也不出声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接着回身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魏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潘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第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共享了六支笔签字。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这时我转眼看看日本代表，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人。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安闲，中国最严肃，英国最欢愉，苏联最威武。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投降书脏了

按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由盟国保存）离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将军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给日方的，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板着脸和日本人说话，似乎在商量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后来看见苏赛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晌，日本人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事后得知，原来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顺着签错了地方，随后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所以才和麦克阿瑟商量。苏赛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干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离去。在他们还没有离舰时，十一架超级堡垒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飞到"密苏里"号上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

机声中，我正在数架数时，只见后面黑影簇簇，蔽空而来，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飞机，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顷刻间都到了上空，然后向东京方向飞去。大战中空军将士厥功甚伟，理应有此荣誉，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参加敌人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二十岁满脸孩子气的水手，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同伴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1945 年 9 月 3 日写于横须贺港中军舰上

延安一月（节选）[1]

赵超构

【题解】赵超构（1910—1992），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笔名林放，浙江瑞安人。1938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发表系列通讯《延安一月》，被誉为中国版的“西行漫记”。解放后长期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中国记协副主席。

毛泽东先生招宴，是在6月12日下午6时，那天早上便发来了浅红色的请柬，招待人同时说明，希望我们在下午4时就去，为的在晚餐之前可以先和毛先生作长谈。

对于一个中共领袖的宴会，我们是没有理由敢于迟误的，大家都准备好了。上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郑重，而颇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人坚决的保证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渡过清浅的延河，驶行了十分钟，在山谷中露出一所长方形的洋式建筑，那便是中共办公厅和大礼堂了。再驶近一看，环绕着这建筑的山腰，排列着无数的窑洞，那是办事人员的住宅，车子一直驶进大门。门口站着两名卫兵，是我到陕北来所见到的最整齐的红军。

我们被引导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这个客厅，也是延安最漂亮的了，又长又宽，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可以坐40个人的丁字形桌子，洁白的桌布，摆着鲜花。壁上除了四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两边，一幅是史丹林委员长，另一幅是毛氏本人的。

客人们纷纷到来，各找着“对手”谈话。我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他们的领袖，这颇使我安心。因此，我也就坦然靠在沙发上，依着我的习惯，伸着赤裸裸的一双脚，点上一支此间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解除了所有做客人的局促与矜持。

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进来。

由周恩来先生介绍，毛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

[1] 原载于《新民报》，1945年10月，本文据赵超构著：《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谈话会大约继续了三小时之久，先由毛先生说一段话，再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90分钟的话，如并作一句话讲，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认为唯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统一，也唯有民主的政治，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议论本是我所预料的，我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异。使我觉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词句异常的审慎平易，语气虽坚决，可不像一般延安朋友那种"张脉偾兴"的样子。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事实上，对于民主的原则，我们任何人几乎没有什么异点可资辩论，至于民主的程度，以及这一党对于那一党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样的估计，那就难说了。

一边想着，一边倾听，日色渐渐向晚，通红的夕阳映得满堂辉煌。我一眼看到毛先生背后的油画上，史丹林委员长左手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摊着掌心，眉飞色舞地面对我们，似乎在雄辩，又似乎在向我们说教。

这时候，一种思潮蓦然在我脑海中起伏。史丹林不是一个伟大的坦白的现实主义者么？他从来不创造什么空中楼阁的漂亮议论，他的议论一贯是为现实的斗争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对于承受史丹林作风的中共领袖们的议论，与其从议论本身去了解，实在还不如从他们环境的需要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易于接触真相吧！

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

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鱼(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

对于平剧缺少修养的我，这四出戏，算是比较能够理解一点的。在开幕前的锣鼓声中，我静坐在最前一排，胡乱在思索着这四出剧是否也有共产党的宣传意味，"打渔杀家"之为革命剧，大概是无异议地可以通过了。"鸿鸾禧"是否表现恋爱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古城会"有没有强调关羽精神？而"草船借箭"是否有类乎此间所传说的游击战故事？

用这类的眼光来看戏，本是大杀风景的事；以这样的观点来评戏，实在也是很幼稚的，但在当时，却无论如何驱逐不了这样的思考。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现坐在我右侧，和我并

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

一时，我有点感到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了。因为此时见到的毛先生，并不是今日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大概是吃了几杯酒吧，两颊微酡，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

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的发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

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

散场时，已深夜 11 时，毛先生以微笑送客。在归途上，缺月衔山，清光似水，朋友问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印象，我明快的答道：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在这里，不妨带便谈一谈我对于毛泽东先生的印象。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泽东说一声“组织起来”，于是通过干部，通过报纸，以至于无知识的乡农都说“组织起来”。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自然，单从宣传的作用上去理解毛氏的权威，这是不公道的。在造成毛氏权威的因素中，他本身的特点也决不能抹煞。他本身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曾以这个问题就教于许多共产党人，同时自己也冷眼的观察，综合起来，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舶来品，在过去所有的共产党领袖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原版翻印共产党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社会来。在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这种作风的不受欢迎，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则不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据说，从中学生时代起，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尊重传统的力量，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此外，再加上共产党所有的组织宣传，以及列宁史丹林

的经验，毛泽东成功了。

边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上面的论断。这个有机会时再说，我现在先提一两件小事为例。

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的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与旧形式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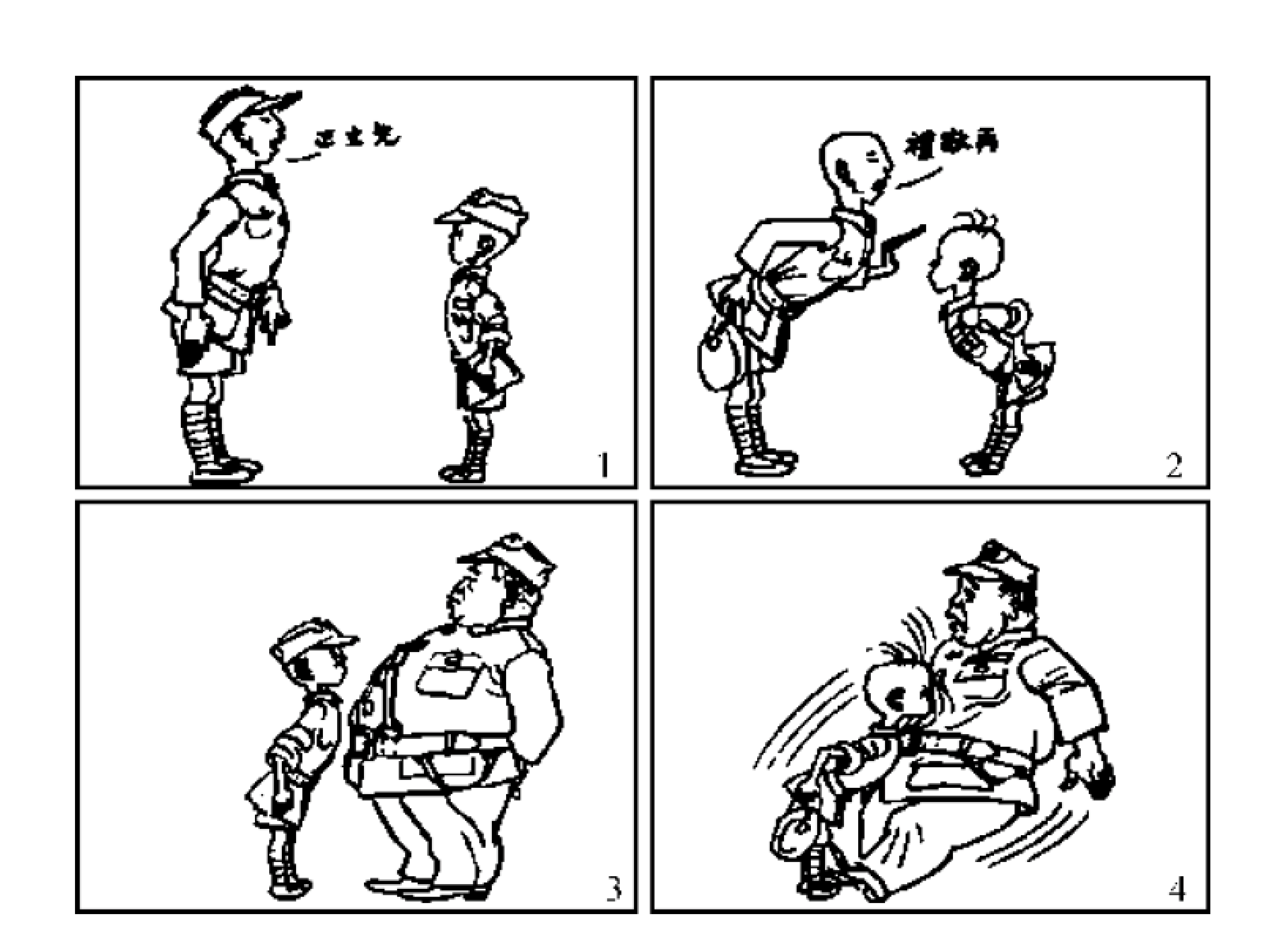
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功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功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我无意介绍共产党党员对他们领袖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批评或者有溢美之处。我也不想在这里判断毛氏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因为这是颇费口舌的工作。我现在只分析了毛氏比他们的一般干部有什么特别优长之处，这是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们所应该知道的。

申报·三毛从军记(节选)[1]

张乐平

【题解】张乐平(1910—1992),漫画家。抗战期间曾组织"抗战漫画宣传队",任《前线日报》副刊"星期漫画"主编。因创作三毛系列漫画,被称为"三毛之父"。《三毛从军记》描述三毛在国民党军队里的生活,讽刺和抨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黑暗,《申报》连载后,引起轰动,并被拍成电影。次年,《大公报》又连载其《三毛流浪记》,同样引起热烈反响。



[1] 《申报》,1946 年连载漫画。

大公报·可耻的长春之战[1]

王芸生

【题解】在中国新闻史上,《大公报》一向为各界瞩目,其复杂面向也莫衷一是:褒之者誉其为自由主义宁馨儿,贬之者又称其为国民党独裁专制之"小骂大帮忙"的喉舌。至于其在新闻专业上的建树,则可圈可点,成果斐然。本文与下面的《可耻的〈大公报〉社论》是解放战争时期两篇著名评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此也可略见《大公报》之复杂面向。

复杂的东北问题,半在外交,半在内政。现在苏军已保证于本月末以前撤尽了,且正在撤退之中。外交一面,可谓业已顺绪。但在苏军纷纷撤退之际,在东北的内战形势却在加剧的进展,且已在许多地方纷纷的打起来了。内外消长,令人心情起落不宁。

尤其可耻的,是长春之战!这两天,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初报苏军于十四日午前撤离长春,嗣报长春防守司令就职,紧接着就报告共军三万众分路进攻长春。我们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报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这是八年抗战胜利后应该有的现象吗?长春是什么地方?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强割我领土傀儡"满洲国"的都城,是苏军参战后进入我东北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所在地。这地方,曾为日伪窃据了十四年,曾被苏军统治了二百多天。现在抗战胜利了,日阀崩溃,伪满烟消,中国的东北,应该归回中国,苏军也根据中苏盟好条约纷纷撤离东北。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国的地方,现在应该光复了,却灾难愈深;那里的人民都是中国的儿女,现在应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却在斫斫杀杀,流的都是中国同胞的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

虽然,东北的事还并未绝望。三人会议曾有调处东北冲突的协议,执行小组已经进入东北,三人小组代表秦德纯等也已经由沈飞平,马歇尔特使正在返华途中。这都在说明东北的和平有希望。但天下最难缠的事,是:一切皆过程,永远无结论。我们的事情,恰恰如此。当停战令下的时候,谁不眉飞色舞,以为中国从此赢得胜利后的和平了。但是,停战令

[1] 《大公报》,1946年4月16日。

尽管下了，而大大小小的战事仍是此起彼落，打个不停。等到执行小组赶到各地去调解，调解了这儿，那儿又闹起来，扑灭了此处，那边又燃起来，请屈指算算，停战令下了四个多月，可曾真个停了战？停战令明明是一个结论，谁知却只是一段过程。又如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五大协议之时，谁不衷心喜悦，以为国事真已获得解决而民主团结在望了。但是，协议尽管协议，墨迹未干，就又吵吵嚷嚷起来。非但一条协议也未实行，感情反倒更恶劣了。政协的协议明明是一个结论，谁知却只是一段过程。东北的事，也是如此。三人会议的协议，本已甚为脆弱，到东北的执行小组工作尚无从着手，而在苏军撤退之际，军事冲突的范围更在扩大。说起来真是令人伤心。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世界水平已进步到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东北是国家的，东北应该由国家在抗战胜利中收回，以恢复国家的完整。这一点，苏联盟邦受盟约拘束，法理与事实，苏军俱必须把东北交由国民政府接收，共产党何以必要争夺？若说民主，则必不可割裂国家；再说民主也必不可以军队争夺，以军队争得的，那必然不是民主。谁都承认英美是民主国家，而英美的民主都不是以兵争得来。英王查理一世之判死刑，不是兵争；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国家统一，是走的妥协协商的路。停战令，政协协议，整军方案，实在是和平理智之路；应该是解决当前国事的结论，而不可把它当做一种风云变幻的过程。在东北，我们尤其祈祷先停战，先实施整军方案。我们谨为国家祈福，谨为生民乞命，请快停手吧！敌人降了，盟军撤了，我们自己却打起来，实在太可耻了！快停止这可耻的长春之战吧！由长春起，整个停止东北之乱；更由东北起，放出全国和平统一的光明。

新华日报·可耻的《大公报》社论[1]

陆定一

重庆和上海的《大公报》，前昨两天，登载了题目叫做《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这是《大公报》一篇可耻的社论。我们读了，实为《大公报》惜。

这篇社论，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承认东北的内战令人伤心，承认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没有实行。但是谁不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谁破坏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国人民，中外人士，都知道这就是由于马歇尔将军所说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作祟。《大公报》不但不敢说出这种浅显的真理，反而借长春战争为题，含沙射影，归罪于中共和中国人民。这样来替顽固派开脱罪名，并替顽固派帮凶，真是可耻极了！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至少也有七个月了，在东北进行内战，也有五个多月了，拿了美国的枪炮，屠杀自己的同胞。今年一月以来，攻营口、攻建昌、攻阜新、攻盘山、攻辽中、攻台安、攻抚顺、攻辽阳、攻铁岭、攻海城、攻鞍山、攻大石桥、攻开原、攻法库、攻昌图、攻本溪湖、攻盖平、攻四平街，攻了那么多地方，破坏了一月十三日与三月二十七日两次停战协议，却一直没有听见《大公报》对这些罪行说过一句“可耻”。到现在“长春之战”，《大公报》忽然说这一战是“可耻”的了。对于《大公报》的社论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残害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情，哪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有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

《大公报》社论作者说，“东北是国家的”。很好。请问你说的是什么国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么？还是中国人民的民主国家？在前一种“国家”之下，接收人员“五子登科”，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特务暴行层出不穷，那里发生所谓“胜利灾”，饥民数目超过欧洲三倍，民族工业关门大吉，人民啃着树皮草根，汉口十个妇女中有一个妓女，广州人肉市场“便宜”到只值一支香烟。“东北是国家的”，东北难道是这种“国家”的么？全国人民受尽了这种“国家”之苦，难道东北人民受了十四年亡国惨痛之后，还应该服服贴贴来受这种“国家”之苦么？中国可以有个好国家，其雏型已见于各解放区，如果政协决议实现，全国就可以慢

[1] 《新华日报》，1946年4月18日。

慢照此雏型，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新国家，真正人民有主权的国家。不说别的，解放区里至少没有"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没有官僚资本，没有特务暴行，没有饿死的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难道东北人民和长春人民，一定不许没有这几件一党专政的"国家"的"宝贝"，一定不许得到自己的解放，否则就算不"是国家的"了么？

《大公报》社论最无耻的，就是居然写得出这样一段："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堆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之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好的，我们也请问《大公报》社论作者，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你说"进攻的战术"，含沙射影，当然指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进攻长春的战术而言。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用这样的战术？拆穿了说，除了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以外，除了从国民党"素有经验的特工同志"办的报上抄来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战术。《大公报》为了污蔑东北人民的民主联军，不惜写出这种话来，把自己降低到一个特务报纸的地位。你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大公报》为什么忽然登出这样的社论来？大家记得，当二月里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策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公"的《大公报》，首先在社论上大肆反苏，做法西斯进行最残暴无耻的特务暴行之先锋。事后，许多被这个反动的报纸欺骗了的青年学生，才觉悟其中的鬼把戏，大呼"上了《大公报》的当！"《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以便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讨得一点恩惠，舔一点喝剩的血，啃一点吃剩的骨头。《大公报》社论作者暴露其原形，不止一次。这一次，《大公报》社论作者又把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了！人民必须严重警惕！

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的时候[1]

孟启予

【题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inhua Radio Broadcast Station in Yan'an)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标志着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在延安播音,呼号XNCR。由于设备简陋,无线电器材缺乏,播音时断时续。1943年春,暂停播音。1945年8月中旬恢复播音。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7年3月迁至陕北子长县(瓦窑堡)的山沟继续播音,并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延安(陕北)台的广播,立足解放区,面向全中国,而以国统区民众和国民党官兵为主要对象,被国统区听众称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1949年3月,延安(陕北)台迁北平,改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进行了现场实况广播。同年12月,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孟启予,原名陈元,福建长乐人。1941年在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曾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建国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负责筹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广播部。1957年参与筹建第一座国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并任副主任。1978年,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国人民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恢复播音了。

李慕琳同志比我先一个月调到广播电台参加播音工作。我们在来解放区以前曾是抗日救亡宣传战线上的战友。

小毛驴把我送到盐店子。这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左边有座秃顶的小山,从山脚到山顶至少得走十几分钟,那儿孤零零地立着一座小平房,周围竖立着许多电线杆子,电线纵横。我们的发射机房就设在这儿,机器把这间小房子塞得满满的,四面的墙壁却是透风的,空气和阳光倒很充足。播音室设在下一层窑洞里。窑洞外面就是老乡的庄稼地,播音的时候碰上牧羊人赶着羊群在附近走过,就可能把羊叫声也给播出去,如果你知道当

[1]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北京,广播出版社,1983。

时的情景也就不足怪了。

我们住在半山腰的一排窑洞里，晚上播完音就得麻烦机务员同志送我们一阵，因为那一带的狼多是出名的。每逢下雨下雪，我们就免不了摔跟头，虽然摔不到崖底下去，但是也会溅你一身泥浆，好一阵子也爬不上去。

大家也许想象不出来，一个广播电台没有音乐会成个什么样子。当时我们就是既没有留声机，也没有一张唱片，每到播音开始，我们就呼叫它两分钟，来代替前奏曲。一两个钟头的节目就这么一口气地播下来。逢到节日，或者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从二三十里路以外把延安的文艺团体接来，就在山头上露天播唱，请听众们欣赏一番新鲜的延安文艺节目。

我们就这样干巴巴地播了好几个月。到新年初，在五里路以外裴庄的一个枣树林旁边造好了我们的播音室，一间大的，一间小的，安着明晃晃的玻璃窗，垂着土布窗幔，墙上和地上都铺挂着陕北产的羊毛毡。文工团也不用露天播唱了。比起山头上的播音室，我们真是心满意足了。

以后，我们从解放了的张家口，从国民党统治区陆续买来了一架留声机和几张唱片。有一张《渔光曲》唱片，是中央领导同志送给电台的，我们就选它作了人民广播电台前奏曲。

说起我们和编辑部的关系来，大家也许不相信，我们是进了北京以后，才在一块儿工作的。在延安的时候相距二十里，中间还得过两次河，我们的广播稿都靠通讯员送过来。逢到连雨天，延河水涨。牲口过不去，通讯员就得用油布密密层层地把稿子包好，顶在头上浮水过来。冬天严寒的季节，通讯员沿着冰凉的延河，在大风雪的田野里，骑着马飞驰而来，衣帽上洒满雪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把稿子交到我们手里，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从没有耽误过播音时间。

当时，常常耽误时间的是我们的发电机，播着播着就发生了故障：不是电压不稳了，就是锅炉又漏水了，有时干脆就停电了，刚刚恢复不到几分钟，又出毛病了。有时候，我们向听众道歉的话甚至比播的稿子还多，有时候故障超过半个钟头，为了免得让听众再等下去，我们只好声明请听众原谅，这次播音暂停。

这是由于我们的技术太差吗？固然不错，不过当时我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无线电专家，他们是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和技师。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只能靠着一些旧的汽车头啦，破锅炉啦，改改装装、补补钉钉地搞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不让我们得到无线电器材，我们的设备很难获得多少改善，但是，我们的声音毕竟播出去了。广播电台的同志废寝忘食，想尽各种办法为减少故障而奋斗，到一九四六年秋天，我们总算安装了一座蒸汽发电机，电源基本上稳定了，各地都反映说：声音清晰。大家都非常高兴。

讲到我的播音吧，开头也是挺可笑的。我是个南方人，在小学校念书的时候学过普通话，平常还凑合，当个播音员就得口齿流利、声音准确，这头一着就使我为难了。加上刚播音，沉不住气，在播音前把字音纠正了，念得好好的，一坐到话筒前面，心里一发慌，就忘得

精光了。什么语气啦,情感啦,根本就谈不上了。播完音下来,面孔发烧,手脚冰冷,自己觉得对不起听众,心里很难受。虽然如此,同志们却总是安慰我,鼓励我,耐心地帮助我。除了慕琳同志以外,发报的、搞机务的同志都热心地帮助我克服困难,帮我准备稿子,纠正字音,查字典,仔仔细细地收听我们的播音。哪儿语气不合适啦,情感不够啦,速度快啦,或者重点不明显啦……等等,都记下来和我研究。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常来信鼓励我们,经常寄来各种参考材料,帮助我们分析政治形势,加强我们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政治理论的修养。

我就是在党和同志们的热情而具体的帮助下,对播音工作建立了信心,培养了兴趣,得到了进步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刘善本以及和他同机起义的同伴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来广播。他告诉我们,他们早已熟悉了我们的声音,自从每天收听我们的广播以后,更坚定了他们飞来解放区的决心。同一时期,我们陆续地收到了各地听众的来信,其中有一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用巧妙的方法通过国民党的封锁、检查而辗转投送到我们广播电台来的。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们,自从收听了延安的广播以后,他们仿佛在黑夜里望见了灯塔,听到了真理的召唤,来自解放区的声音给了他们最大的勇气和鼓舞。对于我们,再没有比听众们接受了我们的广播,因而更加坚定、更加充满信心地去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斗争,更能鼓舞我们的了。

晋绥日报·不真实的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1]

晋绥日报编辑部

【题解】解放战争时期，由《晋绥日报》发起，解放区新闻界普遍开展了以维护新闻真实性为目的的教育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反‘客里空’运动”。所谓“客里空”，原是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惯于弄虚作假的战地记者。1947年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发表《前线》剧本，并以《不真实的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为题，编发读者的有关反映和报社的调查材料。该文发表后，新华社和各地报纸纷起响应，对革命报业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从“女游击队长李桂芳”谈起

在我们编辑工作中，存在着极严重的缺点，首先就是在处理稿件上，不够认真负责，不够严肃慎重，缺乏反复研究的精神。因此，虽然有许多新闻通讯，编辑确实是很难判断其真伪的，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粗枝大叶，有不少的“客里空”或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被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有不少新闻通讯，是被编辑改错了的，以致使真实新闻变成不完全真实的。这使我们的读者受了骗，使党报遭到很大的损失。

女游击队长李桂芳，原是一个拆烂污的女子。把地主张顺鸿的女儿，吹嘘为纺织生产模范。

去年五月二十六日本报副刊，刊登了一篇“女游击队长李桂芳——绥远人民抗战故事”，这一天的报纸到达绥蒙之后，幸经当地党委，将其扣留未发。这是一篇完全撒谎的通讯。这篇通讯的作者成青昭，在某旅工作，现在尚给战斗报写稿，他把一个拆烂污的女子，竟报导为女游击队长。这事发现后，我们曾寄信追究过，但始终未得到回信，这也许由于当时战争原因，函件遗失，但我们却再未追究下去。这说明了我们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为什么要这样颠倒是非？最近我们又写信去问，希望作者向党报有负责的声明。就有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的同志，也希望能告诉我们！

[1] 《晋绥日报》，1947年6月15日。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拿对人民、对党报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对待这一问题，对“客里空”或比“客里空”更坏的严重性重视不够，这以后，虽然在“通讯研究”上，不断的揭发与号召揭发不真实的新闻，但报上依然登了不少的不真实新闻，而且有些是同“女游击队长李桂芳”一样的十分严重。如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本报二版“临县张家湾抢收”一讯，作者艾柏，当时在临县县委任宣传干事，是本报的通讯员，现在太岳某纵队当记者；这条消息中，对地主张顺鸿的女儿张焕爱吹嘘了一番，说那女子“一边织布，一边看场，织机一停就又跑到场上摆起”。这次土地改革中，该村老乡供给工作团同志的材料，揭穿了艾柏这一报导，其动机是恶劣的。据说：艾柏被派到张家湾，调查所谓“侵犯中农”的情形，他一去就住在地主张顺鸿家里，帮助该地主夺回群众清算斗争果实，硬说该地主是一个“中农”。他之所以尽力帮助地主，反对群众，就是因为他看中了地主女儿张焕爱，要和她结婚，以后因群众反对结婚才作罢。而这天的报纸到达该村，引起群众对报纸很大不满。

李宏瑞原为日特恶棍，竟表扬为人民的英雄。

四月二十一日本报一版，“李宏瑞当众伏法”一讯，当我们接到后，非常吃惊。李逆为汾阳昌宁宫人，曾充日寇警察，便衣特务。于日寇投降后，混入我地方武装，杀人抢劫，强奸妇女，破坏革命，罪恶昭彰，三月二十七日，经七分区机关部队及驻地群众公审后枪决。

但我们的报纸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十二月二十七日四版，曾发表过对李逆表扬的通讯，第一篇题目是：“李宏瑞和他的武工队。”另一篇是：“李宏瑞又建奇功”，把李逆写得好像一个人民英雄。我们立即写信给作者“谷曼”——吕梁新华分社记者，谷同志已回信，对此已有所检讨（原信另发表）。这又是如何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事啊！

最近对于“客里空”与比“客里空”更坏的人，已引起了读者较普遍的注意，并已收到不少口头和书面的揭发材料，有的正在作必要的调查研究，有的准备写专文发表。下面先发表一批，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大胆的揭露，不管过去的或现在的，如果能将其不真实的原因，及其动机或“客里空”式的思想作风，一起详细揭发出来，更为欢迎（编辑改错的亦希尽量揭露）。今后报纸拟陆续刊出这些材料，以引起大家的警惕注意。

关于杨椿：“地主杀人要偿命”的来信

编者同志：

六月十四日晋绥日报四版上署名杨椿的“地主杀人要偿命”一文，其中有两件事情是不符合事实的报导：（一）按该文第十二行“……带到旧兴县政府（按指阎锡山旧县政府）后，旧兴县县长即判这六人为抢刘浩生主犯，除放回刘子仁、刘拖儿外，其余王竹、贺占贵等四人都被枪毙在临县城北门外。”真实情形不是如此，按刘子仁、刘拖儿两人当时确被枪毙并未放回；另郝家坡群众被枪毙四人，除刘子仁、刘拖儿外，尚有王竹、薛东生二人，其中并没有贺占贵，贺系当时被捕人之一，但未被枪毙，现在还健壮的活着，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

工作。

（二）又按该文中第十八行：……并把这个杀人犯刘浩生送民主政府依法惩办，要他偿命。按该恶霸地主刘浩生经群众斗争后已扫地出门，暂时送往县民主政府扣押的不是刘浩生而是他的儿子刘荣昌，因刘荣昌是杀人主谋凶犯，现暂扣押政府，静候群众公断及民主政府的判决。这种对群众对党报不负责任，不真实的报导，硬把活人"枪毙"，却把死人"放回"，又错误的报导群众对地主恶霸的处理，损害着党报在郝家坡及附近村庄群众中的信仰。群众看报后，有来工作团质问者，且以为这篇稿子是工作团发的，我们曾予以解释说明。最后，希望你们将此信，迅速登出。予该文以更正，并向郝家坡与贺占贵本人及读者致歉意！

敬礼

郝家坡工作团

六月十六日

编者按：本文作者杨椿系战斗剧社的，担任何种工作不详，他曾两次寄来同样的稿子，第一次编者怕有误未用，第二次稿作者并附信说明此材料是他听了工作团某负责同志的报告后又经过访问而写的。我们希望杨椿同志见报后向本报负责说明，并希剧社负责同志对杨椿此事予以检查。最后，我们请郝家坡工作团代我们向郝家坡群众与贺占贵深致歉意。（待续）

忻县消息连错三条还有一条是改错的

编辑同志：

最近报上登了一些忻县的消息，这些消息中有不合事实的，有过分夸大的，也有把人名、村名闹错的，举几个例子：

一、四月二十三日一版头条消息"忻县某村得地农民组织翻身游击队，保卫土地、抢耕抢种"（编者按：作者是纪希晨，雁门新华社记者），消息中讲得地农民如何组织翻身游击队，就与事实不合，据我和该村农会秘书及农会干事等干部谈话，证明这并不是由得地农民组织的翻身游击队，而是县上从七区和五区抽调的干部民兵组成的参战队，该村只有少数干部和民兵参加。事实上，该村民兵基干队，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脱离群众、对敌斗争不积极等现象。消息中还说该村"实行劳武结合、抢耕抢种"，"三天内浇地三千亩……"；而事实上，当时敌人正盘踞在奇村一带，离该村很近，该村群众情绪有些不安，据该村农会秘书说，顶多浇了二千亩。

二、四月二十五日一版消息："共产党员、农会秘书蔚巨福英勇就义"，原稿本来是我写的，并没有说他是共产党员，当时记者希晨同志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告诉他不是，但报纸上却不知怎样说起他是共产党员来了。

三、四月三十日一版消息："忻县边缘区两个区群众组成七支游击队，反抗阎顽暴行"（作者也是纪希晨），其中说到南高村小商"冯福智"被阎军三十九师抓住用刺刀刺死；事实上，被刺死的是在奇村卖饼子的赵有治，三十二岁，不是冯福智，冯是敌"治村"村副，政治上很反动。

四、五月五日一版消息："忻县军民围困爆炸下，奇村等地重获解放"，其中有两处都与事实有出入，一处说到阎军九十余"进到东南高村（实系东高村），忽遇武工队鸣枪射击，阎军仓惶找坟堆隐蔽，武工队预埋之地雷立即爆炸，阎军中队长及一士兵毙命"，事实上该中队长及一士兵只是受了重伤，并未毙命。（编辑按："原稿并肯定写是重伤，而且炸的头破腿断。"）又一处说到忻口等地阎军出动，"返到南铺上，触地雷三颗，炸死敌连长以下三名"，事实上该三人也都没有毙命，而是连长重伤，两名士兵轻伤。（编者按："原稿写炸死顽连长一名，伤士兵两名"；改为"炸死伤连长以下三名"，因粗心将"伤"字掉了未校正。）

还有把人名地名闹错的也很多，如五月四日"侵占奇村顽军抢掠屠杀惨暴异常"消息中，就把"孙天彪"错成"孙天虎"，"温村"错成"混村"，"明望村"错成"明生村"。（下略）

李玉明

五月二十日

编者按：

（一）李玉明同志所举出的例子，都是雁门新华社的来稿，我们曾电告雁门分社予以查究，据来电：关于翻身游击队的报导，确是"有些夸大"，关于蔚巨福是否共产党员，据称曾问过忻县县委副书记，说是共产党员，记者没有把握，只在电文后面附了一句"蔚巨福是共产党员"，编辑部则是根据这一附注在正文里加进去的。

（二）我们深感雁门分社的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许为了电报字数限制所致。见报后，望该分社深入检查，关于第一与第三点，并须由纪希晨同志来函向报纸读者作公开的负责的声明与自我检讨。

（三）第四点，重伤误为毙命，系电讯科改稿同志改错了的。据说是笔误。最后关于地名、人名闹错的，系译电之误，因为电码稿已不存，系发译或收译错的，已无法稽考。

关于胡、康报导下川坪分配果实问题

三月二十四日登载保德下川坪分配斗争果实一稿，于四月初旬又前后收到本报记者梁明和通讯员张连国、张正学同志对该村分配斗争果实的两则批评报导。经三稿对照，发现三月二十四日的报导与事实全部违背，该稿是胡辅邦、康溥泉两同志合写的，胡是保德四区区委，康为通讯干事。报导说：该村分配斗争果实的是贫苦军属，农民以每口四垧地计算，好坏搭配，不足者补齐，并照顾受害深重的贫苦群众；分配中并进行了"农民一家人"的教

育，克服了“谁受害谁分”的错误意见，使群众接受了统一分配的原则；最后在民主讨论下，使三家贫苦军属、四十四户贫农获得了土地和大部粮食，九户中农分了四石粮。在分配中又纠正了干部郝拉生给中农郝仲明分好地要私情的偏向。

后来的两稿主要内容则说：该村分配原则是头头有数，以公粮反比例计算法来分配的。全村四十五户中有三十九户分了斗争果实（缺黄金山村材料），六户未分的是高家封建富农，但在三十九户中尚有高登几、郝锦谋两户富农也分到果实。因为分配原则错误，干部和群众都互争果实，逐渐形成小派别，互相攻击，吵得几乎打起架来，而领导该村工作的胡辅邦同志未能即时制止这种纷争，害怕惹人，放弃了对群众的教育，使正派农民在会上不敢抬头，认为“谁能说话谁就能多分”，造成干部和群众之间严重的不团结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胡辅邦同志眼见再分不下去了，未等土地房窑分配完毕，就离开了下川坪。事后县上又派张正学同志前往纠正，把不应分果实的富农和二流子所分得的重新退还群众。

为此，报社曾向通干康溥泉去信查询，但至今尚未获答复，目前正继续研究中。希康、胡二同志见报迅速向党报负责说明真实情况。

究竟谁的意见是事实？

邱文山、杨培德两同志关于河曲一区民兵配合部队击退朱匪七次进犯的来信——

一月三日见报二版刊载河曲一区民兵配合部队击退朱匪七次进犯的消息后不久，就收到独五团亲自参加楼子营战斗的邱文山同志来信，提出该消息有六处与事实不符：（一）给部队带路的在十日晚上选来十来个人，并没有七八十个。（二）大□（编者注：此字在原文中遗失，下同）村民兵给指挥所往返火线送信仅仅是民兵由大□到树儿梁送了几次信，大凹民兵只到前方抬伤兵，并没有往火线送过信。（三）云梯只是民兵借梯和绳子，有的还是部队自己借自己绑；抬云梯也并没有抬到城下。（四）九日晚朱顽六十余人偷渡赵家口“民兵沉着迎战，打了五个手榴弹，击伤一敌人……”也不确实。（五）杨大队长亲自率领几组民兵袭入大□，打了二、三个钟头；实际上大□根本没有敌人，顽只在黄昏时刻到大峪村抢劫，天黑民兵去袭扰了一下，顽匪即向楼子营逸去。（六）民兵在六十里河防上岗哨林立戒备朱顽进犯，事实上是在二十四日晚上敌人过来抢了南园群众的三条牛等，民兵当时没有发觉。

对以上各点，河曲宣传部长章哲同志接到报社去信后进行了调查，并由作者杨培德（保德二区区大队长）写信给报社，对邱同志所提六点不实之处说明如下：（一）八日战斗开始，我亲自带了七八十名民兵给部队带路，准备到河畔和部队取得联络，因部队已出击，就把民兵分散担任了警戒和抬运伤兵工作。（二）大□叶中队长带六七个民兵和团指挥所相跟，仍配合通信员在火线上送过信，可由团部参谋作证。（三）绑云梯由大峪村民兵绑四架，是我亲自领导的，贾参谋当时指导过辛家坪绑三架。有七架云梯是民兵抬到城附近，辛家坪民兵一架云梯抬到城下。（四）朱匪偷袭赵家口由我民兵排长秦民同志打了五个手榴弹，打伤

一名顽军，是由罗圈堡一个老太太亲自看见的，我问过那个老太太，关于民兵沉着迎击确是写得有些夸大。（五）原稿是袭击大峪，而报社误写为袭入大□。（六）六十里河防岗哨林立，实际上民兵沿河的岗位也不算少，唐家会至梁家碛就有河防哨二十五处。南园敌人偷渡没有发觉是事实，但民兵哨位并不能把每一个地方都派上岗哨；后来也是民兵发觉的。

在章哲来信中，也认为字句上夸大，如"岗哨林立"；但对具体事实尚认为确实。但这两个信都同时出于"亲自参加"的同志写的，而事实上完全不一样，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张保宏帮六个复员军人成家的新闻是夸大的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本报一版"河曲曲峪村村长张保宏帮助六个复员军人成家"的消息发表后，贺司令员于三十日特致函张保宏表示谢意，该函刊登于二月四日本报。二月十九日本报又刊登了张村长函复贺司令员的消息。

最近我们得到口头反映说，张村长帮助复员军人并非如消息中的那样，真正由他帮助结婚的只有一人，并非六人。这个报导系本报派往河曲的记者梁明写的，据梁明同志谈：去年腊月他从河曲五区往县上路过该村，住了一天，和该村工作已一个月多的区干部老乡及区大队长住在一起。当时问他该村选举劳模情形，老乡说得票最多的是第一名张村长，第二名是中队长（复员军人）。当天就请中队长谈话，中队长特别说到张村长帮他娶过两个女人，并说他村还有五个复员军人的老婆都是村长帮助娶的；当夜即约定中队长和村长第二天都到老乡那里。第二天早晨，村长、中队长、民兵指导员、分队长王根照都去了他那个房里（这时区大队长走出去了，光有他和老乡）；他就很快要村长谈他如何帮助六个复员军人娶了七个老婆，要顺序先帮谁后帮谁一个一个的往下谈，他一边掏出笔记本子，并向大家说了一句："若村长有记不确的地方你们可随时帮着补充材料"，一边叫老乡也提上意见。接着村长从头至尾的报告开了，他一边记一边不断的发问，只是中队长和王根照插话补充了些材料，多是订正结婚时间和女人的名字，其余在场的人指导员、老乡都没说什么。把材料收好，他就走了。

这件事情的经过究竟是否如梁明同志所说的那样，希望河曲五区同志和老乡等给本报来信。而张村长给贺司令写的复信是张村长自己写的，还是谁写的，我们想写这封信的同志也应该对这件事有所说明，该信系由河曲通讯干事朱椭同志寄给报社的。

怎样把凶手李宋瑞报导成英雄的？

编辑同志：

来信收到了，问我关于我去年前后两次对李宋瑞稿子的采访经过和我自己的检讨，写在后面。

去年十月二十五汾阳城工部在昌宁宫村召开武工队会议，我赶到该村后听到×××部长谈武工队的活动，引起我的注意，并从他那里得到新闻线索，我乘他们休会便去找了李宋瑞，由李谈了他们两次作战情况，其他组员补充。几个组员都说李厉害，白天就敢空手向碉堡要子弹，这有点象童话，我怕材料不够，第二天又和李谈了一次，作过思想上的了解，于是就动笔写了。当时领导上也认为他打仗打得不错，我就相信这材料是可靠的。

第二篇稿子是去年十二月写的，那时环境吃紧，写他的动机是因为他的武工组在滨汾公路上阻击敌人，拦获了二辆自行车，写信给政委被我看见了。恰好武工队有个同志来县委领东西，我和他拉拉杂杂谈了一次就写了。

就这件事情我想了一想，检讨了自己：(第一)采访工作没有走群众路线；从×部长那里得到新闻线索后，我就只在李和他的队员中去搜集材料；其中忽略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把这些材料和几个武工队员仔细斟酌，可能他们当李的面说几句奉承话，背了面或者会吐出真情来，另一方面没有到群众中去了解，看看群众对他们的反映。没有这样经过深入正反的参证，就把假象当做真实了。(第二)对李的本质认识不够；我写的时候是想从一个人的英勇事迹来鼓励和号召更多的人去英勇斗争，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英勇建筑在那个基础上(个人或群众)，并忽略了对李的本质的了解。由此得到相反的结果，造成了对党报的损失。

以上仅就个人的回忆而写的，等×部长回汾阳再检讨一下后告你们吧。

谷曼

六月七日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

毛泽东

【题解】1948 年春，毛泽东赴河北平山县途中，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发表了这篇有名的“谈话”。谈话阐述了党报理论的核心思想——诸如党报的作用与任务、办报的路线与方针、记者的学习与修养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当时和新中国的新闻实践均产生持久的影响。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摩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

[1] 毛泽东讲话，1948 年 4 月 2 日，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这些问题有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我们的报纸要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你们现在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这样很好。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经过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以后，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

刘少奇

【题解】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为顺应形势发展需要，1948 年秋，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办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刘少奇应邀为学习班做了讲话，即《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讲话阐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与任务，提出新闻记者必备的“马列主义修养”等四个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新闻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文献之一。

同志们：

很久以前，就想和你们做新闻工作的同志们谈一次话，我过去只和新华社同志谈过，和多数同志没谈过。谈到办报，我是外行，没办过报，没写过通讯，只是看过报，因此，你们工作中的甘苦我了解得不真切。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向你们提点要求。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

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磨擦。因此，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历史的处罚。

新闻工作很重要，党很重视这个工作。党历来的文件、书刊都曾说明党报的重要性。《联共党史》说了党报的重要性，说明它组织和团结了群众，起了指导革命的作用，而且说它是“中心”。俄国在创立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列宁认为，要首先搞清思想界限，宣传党应该如何建设，方针是什么，路线是什么，然后再来建党。原则问题没搞清楚，建党建不好。如何把原则性的问题搞清楚？办报，办全国性的报纸，使报纸起中心一环的作用。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美帝国主

[1] 1948 年 10 月 2 日，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义，我们是从来不怕的，原子弹，我们也是不怕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手无寸铁，就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分析的结果，知道它们要死亡的，无产阶级硬是要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的。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因此，我们到处宣传这一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不断地巩固扩大这种联系。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

我们所说的和人民群众联系，主要是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而且我们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

这是讲联系群众的重要性。那末，怎样联系群众呢？怎样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呢？

列宁说，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是的，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军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人民代表会、合作社等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没有这些桥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断了，党和人民之间就有了鸿沟，因此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

报纸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有的同志说，做新闻工作没有兴趣，没有味道，担心是不是有前途。很明白，这是不懂得你们工作的重要性，自己轻视自己。当然，除了新闻工作，还有别的重要工作，打仗、生产都是重要工作。不能这样讲，“只有我重要”。要了解，除开前方有军队打仗，后方有人办工厂，有人做党的工作等，还需要你们，这是必要的社会分工。

党是依靠你们的。党怎样领导人民呢？除了依靠军政机关、群众团体领导人民之外，更多更频繁的是依靠报纸和通讯社。现在我们铁路不大通，邮政也不大通，和广大群众通点消息，就靠新华社、广播台了。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

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人民想和中央通通气，想和毛主席通通气，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许多人不会写字，邮路不通，电报不通，见毛主席很难见到。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可是办不到。你们记者是要到各地去的，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

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

我们的报纸现在有几十种，将来全国会有几百种，如果能比较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那不知会起多大的作用。你们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真正的情绪和要求，看他们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要求什么，把这些东西反映出来。不相关的人看看也许就算了，相关的人就会好好注意，就得到了你们的帮助。我们要了解群众，向群众学习。不经过和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不经过人代会，不经过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危险得很。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

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因此，你们做得好，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不好，帮助就不大；如做错，来个“客里空”，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因此，这是个很严肃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要对党对人民有很大的责任心。搞“客里空”是会受处罚的。有些资产阶级的记者是靠拍马屁吃饭的。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喜欢别人吹拍的戈尔洛夫呢？有的。你批评他，他不高兴，你给他吹吹拍拍，他高兴了。因此，“客里空”还有点地位，因为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影响，“客里空”还能靠这点残余吃饭。不过这不可靠，哪一天一说整党，就糟糕了，靠资产阶级影响得彩的“客里空”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是他们应该有的前途。不靠广大人民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的事业就靠不住。如果你的事业建筑在人民利益与真理上面，那才是可靠的。这样，即使你批评了别人，吃了人家一顿骂，也不要怕。只要我们的工作建立在党的路线、方向上，即便一时不得彩，也不要怕，要能坚持，要有点硬劲，要有点斗争性，要像鲁迅那样有骨头，没有骨头，是硬不起来的。为了人民的事业，你们要经得起风霜，要经得起风浪，要受点锻炼，要学得经验。你们不受多次波折，怎么能锻炼出来！

你们就要出去了，要到群众中去了。听说你们在这里学习后，把握增大了，信心提高了，这很好。又听说你们感到知道的东西很少，担心下去会碰到困难，把握还不够，信心还不高。你们还年轻、幼稚，还不成熟，还不能自立，这些党是看到了的。怎么办呢？要不断学习。你们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看国民党的报纸，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人家有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甚至还好些。如果你们的工作完全建立在这三个星期的学习上，那是不够的。你们要看一看，做新闻工作需要些什么条件，需要些什么知识，自己必须独立学习、努力学习。这样，你们就有了主动性。

你们的工作还没有上路，我的估计是这样子的。你们的工作还有些像豆芽，还在生长的阶段，但是生命力很强，将来是会上路的。那时你们对工作就会是熟练的、顺手的了。党老早就办报了，办报的人还没有上路，这是不是估计过低了呢？如果估计过低，那就对不起了，如果估计得对，你们就警惕。

为什么说你们还没有上路呢？这是有理由的。共产党办一件事情，要重新创造，要积累经验，一时办不好，并不奇怪。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比资产阶级落后。资产阶级办报是经

过好多年才上路的，把办了几十年的《申报》和刚办的《人民日报》比较一下，我们进步并不慢。说我们进步不慢是不是就要骄傲呢？不是的。你们是给人民办报，是人民的记者、通讯员，人民给你们的任务，是否都已办好了？还没有，还没有上路。我是就这个标准来估计的。

你们要有主动学习的精神，独立地把你们的事业做好。这三个星期的学习，当作一个开始。你们要根据这个方向努力学习，创造条件，增加知识，把工作做好。

你们过去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曾经犯过错误，在人民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可是我们没有责备办报的同志，更没有责备你们，因为这怪不得你们。依照你们现有的条件，还不可避免地犯些错误。这怪我们没有把新华社、报纸掌握好，我们是批评自己的。但是应当向你们讲清楚，你们过去做错了许多事。过去的责任不追究，要追究的话，我们负责。

我们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成熟起来，我作为一个读者把这个要求提出来。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

为了把工作做好，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

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你们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人民包括各阶层，要加以区别。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看各阶层人民有什么困难、要求和情绪。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精”，就不是拉杂，“彩”，就是漂亮，挂点“彩”，读起来爱读。你写得不“精”，人家看不了那么多，你写得不“彩”，人家不愿意看。所以要拣重要的写，重要的就是“精”的。要做到真实，就要全面，缺一面就不是真理。

你们写东西要考虑对象。这就是说每写一篇稿子，就要考虑这篇稿子大体上是写给谁看的。要区别全国与地方。你写给新华社的稿子，是面向全国的，包括蒋管区，而且还有外国人。你们就要考虑，他们需要什么，哪些东西多了，哪些又少了。如果你写一篇太行的通讯，要给各解放区看，就要估计到他们对太行需要知道些什么，怎样写才使他们更有兴趣。如果是报道经验，就要考虑太行的某一经验有无一般性。各解放区都适用的经验，哪怕只是一个村的，他们也要看的。有的经验并没有一般性，只适合太行用，那就不要详细介绍，人家不看，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这个问题。

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添加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

的，但是还有缺点，也要提出来。这是不是不相信党的政策呢？不是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马列主义的领导，应该如此。因之，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当然，有的是不宜发表的。你们要从各方面去考察，用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自己的判断。第一是真实，不要过分，再就是全面、深刻。

说到全面、深刻，应该说，不深刻不会全面，提不到理论高度，是不会全面的，那只能是零碎的、现象的、无系统的。全面，就要综合，要总结，要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提不到理论高度，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的东西就是要“透”，不是光说明现象、皮毛，而且能说明内部的联系。

要全面，就不要笼统地讲，得分析。一个政策在执行时，要看各阶级、各阶层有什么意见，各种人有什么意见，看这个政策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怀疑。如果该拥护的却反对起来了，就要看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各方面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下判断。考察不清楚，就没完成任务，你的通讯人家就不会相信，因为没有材料，没有分析。问题不在于人家是不是相信，而在于你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清楚。你们应敢于说：“相信我的通讯吧，不会有危险的。”你们要负起这个责任。

你们去访问，不论访问什么人，要得到群众的真心话，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新闻记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很少有人对他们讲真话。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记者，所遇到的不会这样了。但即使如此，如你问群众，今年的公粮怎么样，所得的回答是“很好很好”，你就报道个好，这不一定真实，因为你听的是表面的话。你们要和群众深谈，要从各方面考察，找出普遍现象，否则，这种反映就不真实。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群众就会拥护你们，你一到那里，群众就会找你反映情况。那时，记者在群众中威信高的、低的，影响大的、小的，就看出来了，现在还看不大出来。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党和群众会报答你们的。但是，这是结果，不能当作目的去追求。如果你着急，马上想搞一个全国出名，那只能是“客里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你们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

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凡不愿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你们要切记这一点。艰苦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人家叫你们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行的。你们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就要到处去看，去问，就要读马列的书，做许多研究工作。光靠在这里学习三个

星期，下去还不能把事情做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比方说，有时从群众中听到一句话，这句话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意思，下个判断并不容易。没有经验，没有理论上、方法上的修养，就没法判断。有的同志说，过去走了“干部路线”，现在要走群众路线，只提倡群众当家，反对干部当家。哪里会有不要干部的群众路线？那只能变成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群众怎样当家？总要选派代表吧，不能几百万人一齐当家吧，干部还不就是他们的代表。许多同志认不清这一点，把群众当家和干部当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独立的思考，不能在分析之后加以正确的判断。

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做马克思主义记者，却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

有的同志在北平时写得很多，很有人看，可是一到我们这里，写不出来了。他们说没有“自由”，一篇稿子改来改去，把“创造性”给限制了。不是的，如果你写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当然要限制，必须限制的吧。比方，你写一篇文章，倒是生动活泼，但内容却是只要群众当家，否定干部的作用，这种“创造性”是要限制的。问题在于你当了党报的记者，不是在北平墙报上、不是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这一点要搞清楚。在蒋管区写东西，有百分之三十的马列主义，群众就欢迎，呱呱叫；在我们的报上如果有百分之三十的非马列主义，就得挨骂。

你们缺乏经验，特别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看问题不是马列主义观点，而是别的观点，比方小资产阶级观点等，这样，写东西的盲目性就很大。

因此，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你们学习这些，不是看一遍书就行，而是要不断地学，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那时，写东西就自由了。不熟悉马列主义，就不自由，你们现在还没有获得这种自由。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在这方面，你们特别缺少。所以，要继续学习，不只要三个星期，要三个月、三年、三十年，努力把马列主义学好。

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自己不懂的问题，应当勤问，可以写信问你们的上级。不懂得党的路线，是搞不好工作的。你们还要懂得两条路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办报。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这是基本的方法，马列主义的方法。不否定左和右的谬误，就没法肯定真理，要确定真理，就得否定谬误。

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这里就表现出你们的创造性了。你能了解群众的真正情绪，他就不能；你能有力地宣传党的政策，他就不能；你写得真实、精彩，他就不能；你能发现党的政策的缺点，他就不能。你的创造性就表现在这里，党不是限制而是鼓励这种创造性。但是，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任其泛滥。写这些东西的人说是发展他的个性，其实是发展他那

个阶级的党性。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个性，如果你有接近群众的个性，有全面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心理之个性，这是好的。如果你讨厌群众，有喜欢反映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之个性，那是不行的。

具备了以上四个条件，工作就可以做好。但是，你们现在还不够，还要学习。当然，如果感情还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那里，那就不只是学习问题了，不过学习也会好些。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有点地、富、资产阶级观点，也是不自觉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改造自己，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学会接近劳动人民的本事，加强马列主义的修养，熟悉党的路线政策，不怕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把人民的新闻工作做好。

新华社·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

毛泽东

【题解】本文是毛泽东为中原和华东野战军起草的广播稿。广播稿开头即指明对方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后分析了我强彼弱的形势，结尾几句“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姿态从容，语气自信，视对方如草芥，玩敌军于掌中，不愧为大手笔。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

[1] 此广播稿原播出时间为 1948 年 12 月 17 日，本文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新华社·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1]

毛泽东

【题解】作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生，毛泽东一生酷爱新闻工作，他说自己最想做的工作一是教师，一是记者。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稿，不仅成就了自己的新闻志向，也构成中国新闻史的一道独特风景。消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只用精练的二百余字，就概括了一场大战的全貌，用语生动，气势雄壮。如"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场面栩栩展现在读者面前，成为报道解放战争的新闻名篇。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

[1] 新华社，1949年4月22日。

新华社·别了，司徒雷登[1]

毛泽东

【题解】本文和《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四篇文章，都是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而为新华社写的新闻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破除了国内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幻想，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阐发。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驻在中国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一个具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击溃欧洲。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就是美国侵略计划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

[1] 新华社北平 1949 年 8 月 18 日电，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有所修改。

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直接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是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规模还不算很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占领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临时，美国面临下列对华的可能的三种抉择：（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主权，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量避免内战的发生。”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一途，我相信，那时美国的民意也如此感到，无异在美国从事有助的坚定的努力以前，放弃了我们的国际责任及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政策，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途，在理论上可能吸人心目，回顾之下，也可能如此。但是不能实行的。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没有能力摧毁共产党。大战后，如前所述，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国民党文武官员在收复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声望。在他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则较它过去更为强大，且已控有华北的大部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无效能，这点后来可悲地表现出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军力才可以逐走共产党。美国人民显然不会答应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后让我们的军队负担如此巨大的义务的。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途。”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击毁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传统的对华友好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可能吸人心目”。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不会答应”。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愿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

为中国形势，美国形势，还有整个国际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晦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及欧洲人民及各国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似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中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罢，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三年中，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六〇炮，八二迫击炮，火箭炮，十五榴弹炮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

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唤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及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努力地善意地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纪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大公报·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1]

杨刚

【题解】杨刚，名记者，原名杨季征，笔名杨刚，曾任《大公报》副刊编辑、驻美记者，擅长国际问题报道，解放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49 年 10 月 1 日，杨刚以新闻界代表身份出席开国大典，写下这篇通讯，生动再现了新中国诞生时人民的欢欣喜悦。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

我必须把这篇通讯直接写给你们，才能够把这一次首都人民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的一切，尽可能真实地传达给你们。说尽可能真实是容易的，要做到，可是很难。因为十月一日这一天是太伟大，太丰富了。甚至在今天，二十四个小时之后，它的余风还在。街上还是红红绿绿的跳舞队、秧歌队、游行队。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依然满街都是红旗，都是锣鼓。从湖北来的老先生、老太太摇头赞叹，说昨天那一场大会是"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从上海来的老先生说："啊，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见到了！"从华北来的人激动得发不出声音，只是连续地、低低地赞叹："啊，好伟大呀！好伟大呀！"从华南来的人也说："这是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啊！"上海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晓得陈毅市长。昨天，陈市长望着天安门前红旗的大海激动地说："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这是确实的。昨天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完全具体地表现了一个初诞生的新国家的气象和本质：伟大，庄严，团结，民主，尤其是领袖与人民的融合一致。它使人人相互亲爱，使人人要求向上，要求自己学好。

广场是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的一个大十字。全场容量有的说是二十万，有的说是三十万人。新造的旗杆在广场内正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地点在旗杆以南。在开会以前，向筹委会登记要参加庆祝大会的人数太多，筹委会怕广场不能容纳，再三限制下来的结果，光是从旗杆到中华门，即十字形垂直线的下半截，那一部分所登记的人数已经是二十万人。十字形的横臂那一部分，除了一条马路之外，御河内外以及马路外边全是队伍，军队还不算在内。因为军队是四个师，根本就不在广场里面。广场外面两边街道上还有没能入场的群众队伍。即便是经过了限制，广场果然还是容不下

[1] 《大公报》，1949 年 10 月 6 日。

这么多人。群众要求带锣鼓音乐队也不能办到。因为如果是几十万人都在场上打起锣鼓、扭起秧歌来，大会也就无法开了。事实上，到后来，群众自己的呼喊，已经大大地补足了锣鼓的声音。

队伍从早上六七点钟就到了广场，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农民队伍是四五点钟就从乡下动身来到天安门，参加这个他们第一次能够参加的大会。远远望去，整个广场上红旗翻卷像红海奔腾。在红旗下面，一片片的是穿了各种颜色衣服的队伍。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浅蓝色，有的是浅黄，有的是灰色，清清楚楚好像是精工规划的花圃一样，丝毫不相混杂。广场前面，白玉桥两边搭起了两座台：一座指挥，一座是昨日早上刚刚到北京的苏联代表团。再前面就是天安门楼上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位领袖。

红旗飘卷，队伍静候。正在这时，城楼上面主席台前忽然发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庄严声音，山鸣谷应，四处都响起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于是广场上的欢呼声，立刻翻江倒海地爆发，与城楼上互相呼应。这时候，按照预定程序，主席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是经过电流来操纵的。城楼上有一个电钮开关，按相反方向写好了"升""降"二字。主席把电钮拨向"升"字，我们的红旗就顺了旗杆自己向上飞升。主席看着旗子，说："升得好！"主席说出了我们千千万万翘首瞻仰旗子的人心里的话。我们的旗子从此是端庄而稳重地向上升了，它升得好！

接着礼炮惊天动地震响起来。每一炮所发出的巨大震响，据说都是由五十四尊大炮同时发出来的。这五十四尊炮的数目据说是用以代表政协五十四个单位。五十四炮同时发出二十八响礼炮，那声音真是山摇地动，象征全国人民坚强而雄伟的团结力量。

掌握着人民坚强而雄伟的力量，主席向人民、向全世界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确定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整天想封锁中国、扼杀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将是个难题，会使它头痛又头痛。

转眼就是阅兵了。四个师的部队全在广场外面东边等候。总司令下令阅兵时，四位野战军的将领分列左右，站在总司令旁边。第一野战军是贺龙将军，第二野战军是刘伯承将军，第三野战军是陈毅将军，第四野战军是罗荣桓将军。阅兵令下，就由原来在广场东端站在指挥车上的聂荣臻将军引导，四个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由东而西，缓缓入场，一个接一个地从主席台下白玉桥边走过去。队伍的服装、颜色、队形、行动完全整齐一致。每一个方阵都像一个人一样行动。甚至于连马队里所有马的腿脚都是一出一进完全一致的。所有成排的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地前进，绝无任何参差，使一字显得没有丝毫歪曲。当阅兵进行的时候，整个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广场屏息无声，只有军乐队奏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雄壮的乐声和整齐的步伐声配合，在大地上动荡。正在这时，十四架飞机飞临上空，广场爆发了如雷的掌声。飞机里除了我们的空军外，还有诗人马凡陀。

当广场上的人民队伍分队出发时，已经开始黄昏。星星点点，灯笼火把接二连三地燃了起来，很快，整个广场在夜色中透明了，并且颤耀着红的星星，黄的星星，紫红的，大红的，金黄的，橙黄的，愈向夜，广场愈益像大地自身活了一样，遍地灯笼火把颤颤跳荡，像人民无边无际的欢乐和希望化身，在我们面前跳跃。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向外出动。蓝色的拿着紫色灯笼的队伍，黄色的拿着大红灯笼的队伍，灰色的拿着金红色火把的队伍，浅蓝的拿着深桃红灯笼的队伍，还有黑色的拿着黄色灯笼的队伍，蜿蜿蜒蜒，交互环绕，像一幅巨大的活动的织锦，各按各的方向走出会场，丝毫也不发生混淆或者紊乱的状态。队伍行动时唱着歌，但更多的是喊口号而且时常是连续不断地喊着：

“毛主席万岁！”这使得广场不但是以颜色和光辉活跃着，同时它还在连续不断地发出巨吼！地面这时又从许多角落放起了无数五彩照明灯球，像整个开了灿烂的光明的花朵。

毛主席一直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主席一直是站在城楼边上盯着眼睛望着下面的群众。他的脸上时而庄严，时而微笑，他的手几乎永远是高举起来，向群众有力而迅速地摆动，时时刻刻听见他向着群众高呼，这是一种人民共同的呼声。他的半个身子时常是伸出栏杆外面去，举手招呼群众。在这里，完全看出主席是怎样全心全意地热爱人民，他的这些动作，完全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强烈的、阶级的爱情，使他自自然然就会这样随时不断满含着召唤地高呼，使他的手老是要举起来招呼人民，使他像母亲一样地向人民把身子伸出栏杆外面去，要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广场上川流不息的群众，最初似乎没有看到城墙上自己的领袖在招呼他们，因为城楼上的灯光并不是很强的。他们一面呼着口号，一面走到面对城楼的时候，就要站住，更高地呼喊。当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主席就从播音器里面高呼：“同志们万岁！”并且时时用亲切的呼声和群众的呼喊相应合。很快，群众就发现了自己的领袖还在他们中间，并且用高呼和他们说着最亲切的言语，他们立刻就要求打破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而要一直朝北过白玉桥向天安门城楼走来，然后再由白玉桥上转出去。他们的要求成功了。于是一条条红色的火龙似的群众都向主席走来，他们挤在桥上，挤命从肺腑里发出呼喊：“毛主席万岁！”主席从楼上回答他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有人害怕主席会疲倦，但主席丝毫也不觉得，放了椅子在他背后，他也不肯坐下去。这时候，领袖和人民完全融合一致是具体显现出来，一种伟大的、严肃的、温柔的幸福之感，贯穿着人们的全身。有人哭了。有人暗暗地赞叹不已，说：“怎么知道中国还有这一天呢！”

这时候，原来已经出了广场的许多人听到这样情形，又回来了。他们是很早就出了广场参加了游行的。他们的队伍已经散了，但是又集合了走回广场来。是队伍，就自己在广场上重新摆起方阵，奏起军乐。是一般人民，就集合了走到桥上来大声喊口号，大声唱歌，尽情欢乐地跳跃舞蹈。大会指挥在播音器上再三劝告他们回家去休息，才逐渐地散去。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我不能不把这个伟大的日子这样繁琐地报告你们。这是由于我无能的笔，没有法子把像昨天，乃至于毛主席领导建立国家的这十天以来的历史时刻，恰如其分地向你们转述。但是我确信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日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来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庆祝大会，就是保障。

八十年来家国[1]·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日子

赵浩生

【题解】赵浩生,著名美籍华人、新闻记者,四十年代便活跃于新闻界,1948年作为南京《东南日报》特派记者前往日本,采访报道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等。《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日子》选自其晚年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以记者的视角追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闻界的历史。

一、特殊的"外人"

……

抵达东京后,我先到美军总部新闻处办理了记者登记,领了一套身份证,其中包括记者证和PX卡。这两个证件代表着我在盟军占领下的日本享有特殊身份。记者证表明我是盟军总部记者,PX卡可以保证我以美军身份享受所有的购物免税优惠。没想到这些优惠条件竟对我在日本的生活大有好处。

当时驻日本的中国记者共有九位:中央社的宋德和、曾恩伯、沈承怡、李嘉,《大公报》的高临度,《新闻报》的谢爽秋,台湾《中华时报》的卢冠群和《自由中国》月刊的苗剑秋。有家眷的人可以分到一幢盟军占用的日本豪华宅第或特别为美军修建的军眷特区小楼,里边家具、佣人一应俱全,这在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我们这些单身记者都住在"外人记者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东京市中心丸之内区的一幢大楼里,原为日本大企业财阀聚会的会馆。当初美军轰炸时,特地保留了市中心的若干建筑物以便给将来日本投降后的占领军使用,这个俱乐部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有餐厅、住房,房价十分便宜,接待周到细致。最特殊的是这里的酒吧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开放,而在东京其他地区的酒吧间必须在十二点以前关门。

这些特权虽然给了我种种的方便,但是我要有一笔最起码的开办费才能生活下去。进俱乐部首先要缴纳一笔会费,这一下就把我带来的钱用去了四分之一。头几天,天天有人

[1]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

请客,吃饭不花钱,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有一天,我一个人跑到"新桥亭"中华料理去吃了一盘蛋炒饭,花掉了五角美金。我计算着,如果我天天吃蛋炒饭,一日三顿,我大概只能支撑一个月。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生活安排妥当后,我就借着刚到日本的新鲜感受撰写了大量的报道文章寄往上海《东南日报》和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岛"对我的东西非常重视,每篇都刊发在最显著的位置上,这对我来日茫茫的心情是一大鼓励,不久我就正式出任《星岛日报》驻东京的特派员。

……

就这样,东拼西凑地总算可以在东京活下去了,我就开始着手了解战后的日本。1948年的日本,从东京到横滨,经过美军地毯式的轰炸,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当时的日本人个个衣衫褴褛,很少看到穿皮鞋的。即使在商业中心的银座和最拥挤的东京车站,也只是见到男男女女提着破皮包或布包低头疾走,听不见人声笑语,只有一片沉重的木屐声。他们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显得低声下气,在街上一看到插着中、英、美、苏四国旗帜的车辆就鞠躬哈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真的无条件投降了。对于这种情况,一些了解日本人民族性的朋友分析说:日本是个非常讲究现实的国家,胜了,它就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败了,它便俯首称臣。当时我在日本看到的表象的确如此。

作为占领者的中国人在东京有几大集团:代表官方的是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最初是留美学军事的朱世明将军,我到日本的时候已改为了商震将军。商做过河南省政府主席,对我这个河南人格外亲热;其次是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审判战犯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梅博士个子不高,留着一撮小胡子,和其他战胜国的法官们一起威严地坐在国际法庭的审判席上。梅法官在当地知名度很高,他的照片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每天审判之后,没有别的事可做,又不便寻欢作乐,生活未免有些单调、乏味,于是他就成了我们这些身份不受限制的记者们的好朋友。我们常拉着他一起去茶馆或舞场,他也乐于参加,但向我们提出了几个条件——一不谈工作,二不写新闻,三不要称他"梅法官"。我们郑重允诺,他也慨然戴上大墨镜和我们进出同乐。

当时日本的最大新闻是审判一级战犯东条英机。梅法官给我们讲了许多背景知识,但绝不泄露任何机密新闻。直到有一天凌晨五时,驻日本的中国记者忽然接到代表团新闻官的电话,通知我们商团长要在七点钟和我们共进早餐,发表重要新闻。我们已预感到此事与战犯问题有关,如时来到代表团餐厅。商团长出现时,脸色阴沉,表情严肃,坐下后郑重地宣读盟军远东最高统帅部的公告,宣布日本一级战犯东条英机已于当天晚十二时在东京战犯监狱,由中、美、英、苏四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验明正身处以绞刑。商团长回答了我们几个问题后就抱歉告退了,请他的副官继续陪我们吃早餐。我们十分理解这位老将军此时的心情,亲眼目睹东条英机受刑,即使对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二、扶桑人物

离开中国的前夕,我已经预感到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将到来。到达东京后,日本报纸的

头条上每天都是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为了了解时局，我特地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每天按时听广播。北京解放的消息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解放军一进城，原先的电台广播呼号由“北平广播电台”变成了“北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广播中我可以听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和歌唱声。南京的解放也是一个震撼性的大新闻，“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照片以头版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在日本的各大报纸上。更令海外中国人振奋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在收音机里，我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阵阵欢呼声此起彼伏，令人热血沸腾。

那一天，我呆在房间里听了一整天的广播，晚饭后我独自来到皇宫前的松林散步。想着中国的巨变，想着自己的前途，我有点儿后悔在这个巨变前夕离开了中国，我觉得还有机会补救，我要回到中国去……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想到自己虽然在日本可以对付着活下去，但我不能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要活着就要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活着，我不能没有根，不能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不知飘落到何方才是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日本只是凭借着战胜国的特权身份生活，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日美签订和约，占领状态结束，一切就会立刻烟消云散，我必须要有选择，我对新中国虽然一无所知，但我相信新中国是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一定会接受所有热爱祖国的中国人……

我决定开始探索回国的路。

在日本，一般的地方看不到中国报纸，我就天天到日本报社去翻看《人民日报》，寻找着回国的途径。我觉得自己是以记者身份出国的，也应该以记者的身份和新政府的新闻机构取得联系。我在新成立的一系列中央政府机构中找到了新闻总署，署长是胡乔木，通信地址是国会街一号。我决定写信给胡乔木先生，介绍自己的背景，说明我回国的愿望。

信写好以后，我又用笔名写了一篇通讯稿一起寄往北京。

不久就接到北京的回信。信不是胡先生本人写的，而是由《中国建设》杂志日文版一位叫康大川的编辑出面，说明收到了我的来信，附上我的稿子已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剪报。他还建议我经常剪寄日本报纸，他可以给我寄《人民日报》，以此作为交换，但是对我要求回国的事却只字未提。我意识到回国的事情已成泡影，心里感到很失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但在我本人的内心深处激起层层涟漪，而且也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中曾发生了所谓“挂旗事件”。据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驻法外交官凌其翰在大使馆首先挂起了五星红旗。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中也传出了“二吴”、“二谢”鼓励朱世明团长效仿驻法使馆悬挂出五星红旗。所谓“二吴”，就是指代表团高级官员吴文藻、吴半农，“二谢”就是谢冰心、谢南光。吴文藻是冰心的丈夫，他和吴半农都是朱世明团长留美时的好友。谢南光原籍台湾，是日本问题专家。据说他们曾向朱世明建议有所行动，被派驻日本的一排中国宪兵压制下来。

我对这个传说不十分相信，我和冰心夫妇经常有来往，和另外的一吴一谢也认识。朱世明虽然有点自命不凡，但此人绝不是一介武夫，他知道在麦克阿瑟元帅管制下的日本绝不会容许亲共活动。此一传言出现后，冰心和“二吴”都辞去了代表团的公职，谢南光也偷渡回到了北京。朱世明则奉调回台湾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但他不敢回去，因为他清楚这是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回去一定凶多吉少。于是他自动辞职，退隐到日本的叶山苟全性命，最后孤苦伶仃地客死在叶山，遗体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冰心的丈夫不久以后就由外交官改为记者身份，继续住在东京。有一次我到帝国饭店去理发。碰见吴先生，他一边理发，一边在看《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并建议我也看一看。

后来我在 1973 年第一次去北京和吴谢二老再次见面时，特地向他们询问起当年的“挂旗事件”。谢先生说，他们当时在代表团组织过一个读书研究会，专门研究新中国问题，结果被人认为是共产党的活动。除学习外，他们确已决定回国，他们先把孩子送回了北京，不久他们也绕道香港回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

留日四年，我看到战败后的日本，也看到日本复兴机运的到来。1950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专门供占领军使用的游泳池边和朋友喝茶、聊天，忽听俱乐部的扩音器里播出紧急通知，要所有的美军人员立刻到各自的单位去报到。一声令下，俱乐部里的美军一下子都走光了。我赶快跑进汽车里打开收音机收听美军电台的广播，这才知道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开赴前线，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的新战争开始了。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

邓小平

【题解】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时代对新闻工作提出新的要求。1950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做报告，集中论述了新形势下的新闻工作，指出办好报纸要具备“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个条件等思想，这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依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

[1] 邓小平讲话，1950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要办好地方报纸。《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当然，需要办大报的地方（大城市）必须办大报，但不是都要办大报。

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以前则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这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

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这里要九百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人。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作准备，也为今年减租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家都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

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东北画报·斗地主[1]

齐观山

【题解】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全国展开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著名摄影记者齐观山在北京郊区深沟村拍下这张新闻照片,从一个具体角度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一巨大变革,折射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

[1] 《东北画报》,1950。

人民日报·谁是最可爱的人[1]

魏巍

【题解】 魏巍，河南郑州人，记者、作家，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美援朝期间三次赴朝，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报道，书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曾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誉为“朝鲜战争新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名作”，周恩来总理赞扬这篇作品“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作品饱含深情，将叙事、抒情、议论巧妙融合，用语精妙，朗朗上口。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也许有的人在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哩。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丰盛细致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你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因此，你没有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个子似地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

[1] 《人民日报》，1951年4月11日。

这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崩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聚歼了敌人。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鼓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胡传九、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岗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稍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不过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显得稍为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退净。他原来是炮兵连的，在有一天夜里，他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出去一看，是一个朝鲜老妈妈，坐在山岗上哭。原来他的房子被炸毁了，又在山里搭了个窝棚，但窝棚又被炸毁了。……回来，他马上到连部要求到步兵连去，因为步兵连的需要，就批准了他。我说："在炮兵连不是一样打敌人吗？""那，不同！"他说："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着打得解恨！"

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火了，火又盛，烟又大，不敢到跟前去。这时，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穿过浓烟到近处

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倒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到屋门口，可是屋门口的火苗呼呼地已经进不去人，门窗的纸边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那浓烟滚滚地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不进去吗？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朝鲜人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我就用脚踹开门，扑了进去。呀！满屋子灰洞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的像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一摸摸着一个大人，拉了拉没拉动，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一个小孩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子呀。他穿着个小短褂儿，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乱跳着，哇哇地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哩！’这时候，火更大了，墙上的纸也完全烧着了。我就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进去了。一拉那个大人，她哼了一声，再拉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她脸上的血，已经把她胸前的白衣流红了，眼睛已经闭上。我知道她不行了，才赶忙跑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遛跶，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地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哩！”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哩，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啦？’我怎么答对呢？我说‘朝鲜半边红，半边黑，这算什么话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呀。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

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新华社·毛主席的队伍进入拉萨[1]

赵慎应

【题解】1951 年 8 月 1 日，新华社西藏分社在昌都成立，9 月，解放军进驻拉萨，随军记者赵慎应采写的这篇报道成为新华社从拉萨发出的第一篇新闻稿。新闻描写了拉萨藏族同胞迎接解放军进城的盛况，从藏族同胞的着装、欢呼到端详战士们吃饭洗脸等细节，反映了他们对人民解放军的拥戴和对新生活的期待。由藏族服饰引申到文成公主入藏等点睛之笔，更强调了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历史情谊。作者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九月九日，暖和的太阳照耀着拉萨平原，布达拉宫上面的金顶，映射出灿烂的光芒。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的先遣部队翻越了千山万水，这一天，在人民的夹道欢迎中，进入了西藏地方政府所在地拉萨城。

当人民解放军进抵距拉萨城十里的拉萨河边时，拉萨城内的人民都急不可待地成群结队跑到河滩解放军的帐篷前参观。他们认真地观察指挥员和战斗员们的一切举动，仔细端详着战士帽子上的"八一"帽徽，甚至连战士们吃饭洗脸时也都好奇地围着看。他们要看看毛主席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样子。

西藏地方政府在郊区设立了欢迎站，搭起了巨大的白色帐篷。九日清早，穿着红黄色锦袍的噶伦以下几十名官员，以及穿着红色服装的三大喇嘛寺代表已到欢迎站迎候，市内的人民像流水一般从各处拥向城郊。人们都穿上白色服装，打着各色的花伞，妇女们穿上绿袍，袍上面还套上各种彩色的背心，腰中束着精致的带子。这美丽的服装，据说还是唐太宗时文成公主入藏时传来的。拉萨人民就穿起这美丽的服装，来欢迎自己的军队。当整齐雄壮的部队进入城内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及三大寺的代表立即向解放军王其梅司令员敬献哈达。大街上被拥挤的人群阻塞了，许多树木茂密的林卡（公园）的园墙上，也已挤着成千的穿着盛装的藏胞。这时正是拉萨菊花盛开的日子，拉萨城显得格外美丽，各家方形平房的顶上窗口，都排着无数的各色菊花，在盛开的花朵后面也挤着无数的人群，他们都争先地望着通过大街的队伍，目不转睛地瞻仰着队伍前面的五星国旗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

[1] 新华社拉萨 1951 年 9 月 27 日电。

巨像，他们都欢呼着毛主席的队伍来到拉萨。

当部队通过繁荣的环城巴阁街时，战士们唱起“东方红”的歌子，街旁的人群中有人用藏语与战士们合唱起来。在昌都解放后，拉萨人民就学会了这个歌颂自己领袖的歌子。藏民们都称赞着说：“从来没有见到这样整齐雄壮，纪律严明的队伍。”他们大声的喊“解放军牙堡热”（拉萨语”很好”的意思）。

毛主席的队伍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无限喜悦，当部队通过市区到兵营住下时，门前还是挤着观看的人群，直到傍晚街头还有大堆的人争着看解放军张贴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新华社·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1]

李慎之

【题解】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首次参加日内瓦会议，商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在会上百般阻挠中国、朝鲜、苏联等国提出的和平协议，本文对此做了深入报道。其中没有过多议论，而是记述会议的进程，直接引用中国代表团长周恩来与西方16国代表据理力争的对话，以表明中国的诚意，使读者了解美国等如何打着"和平"旗号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面目。作者李慎之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延安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解放后历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等。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的下午，对于许多人说来是一个难忘的下午。

在这个下午，在日内瓦的旧国联大厦里，人们看到为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和平生活，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曾作了怎样卓绝的努力；人们也看到由这些努力而产生的美丽的希望怎样马上被活生生地绞杀了。

人们看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

一切如同白天和黑夜那样截然不同，那样分明。人们因此更加懂得了，什么叫做是与非，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怯懦。

最重要的是，人们更加懂得了爱与憎：爱戴和平的斗士，憎恨和平的敌人。

和往常一样，会议在三点钟开始。今天的主席是英国代表艾登。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南日外务相、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周恩来外长、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外长是会上最初的三个发言人。

每一个都提出了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建议。

南日提出了关于保证朝鲜的和平状态的六项重要建议。

周恩来提出了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以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的建议。

[1] 新华社日内瓦1954年6月15日电。

莫洛托夫提出了与会各国发表宣言，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的建议。

在连续了一个半钟头的发言以后，现在有三个重大的建议摆在会议的面前。

人们注意到今天会场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座上没有打盹的，没有看报的。

不可能不理会这样重大的建议，它们代表着朝鲜人民的希望，亚洲人民的希望、世界人民的希望；它们后面有朝鲜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的坚决支持。

谁要是拒绝，先得盘算后果。

这样，在莫洛托夫发言完了以后，会场上忽然出现了一霎那奇异的沉寂。

谁都知道，西方十六国的代表今天上午已经拟好了发言稿，推定了发言人，但是主席艾登现在却说："在我的名单上现在没有要求发言的名字了。"

突然，菲律宾代表加西亚在和坐在他后面的美国代表交头接耳了一阵以后，忽地站了起来，他建议暂时休会。在五十多天的会议中，人们第一次看见这种式样的临时动议，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位先生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张的。

主席说："原来两个人想的是一回事，我要建议休会一个短短的时候。"

这个"短短的时候"足足有四十分钟，比正常的休会长了一倍多。平常在休会时显得拥挤得很的休息室，今天却显得冷清清，几乎看不到那些经常在这里悠闲得很的西方的代表人士了，他们三三五五地乘电梯到楼上开会了。

原来十六国的代表们在紧张地开"战略会议"。

长长的四十分钟，容许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期待。在走廊上有人在说："也许不会拒绝"；也有人在想，"多少总应该表现一些和解的精神吧。"

十六国举行的会议的目的不难理解，凶手们要动手了，为首的现在要"拿言语"来给伙计们壮胆——"不许心软"。

五点二十八分，艾登又坐上了主席台，他请美国代表史密斯发言。

是得他来开刀。

史密斯的话很短，他说：如果说到要维持朝鲜的和平，那么已经有了停战协定；至于莫洛托夫的建议，那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的用辞要"更正式更确切得多"。这样，他就拒绝了所有建议。

接着发言的是澳大利亚代表凯西、菲律宾代表加西亚、比利时代表斯巴克以及李承晚集团的卞荣泰。既然史密斯已经亲自定好了弦，谁还能希望听到新的曲子呢？而且这些都不过是闹场锣鼓。

他们之中的一个公开宣布：一个没有人羡慕的角色已经指派给了那位泰国的亲王，这就是由他来宣读破裂朝鲜问题谈判的十六国宣言。

这个简短的宣言比起四十八天以前杜勒斯四月二十八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的结论是"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

的结果的”。

南日的建议、周恩来的建议、莫洛托夫的建议，他们连再看一看都不，提一提都不，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切按照原定计划动手：绞杀朝鲜和平会议。

这时候会场外面警卫部队的指挥车上的扩音器响了：“注意！注意！马上散会了，把车子开过来。”

汽车像一条长蛇似地开到了代表团进出的国联大厦第四号入口。

从“新闻大厦”来的人们，手上已经有了油印的十六国宣言；有人在今天上午已经拿到了这个。

在那里的黑板上，有人在会议开始前就写下了一句话：“朝鲜问题最后一次会议，全体记者请来验尸。”

一切都预先布置好了，好像一切都可以如意地结束了。

然而，坐在会场里的并不是只有美国代表和它的随从，坐在会场里的还有强大的和平力量的代表。他们是如此地忠实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要把为这个事业而进行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他们是如此地善于揭露和平的敌人，直到揭破和平的敌人的最后一层皮。

莫洛托夫发言了。他的声音安详、镇定、有力，一直打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会场的空气陡然变了。

莫洛托夫从头分析西方国家反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莫洛托夫最后指出：朝鲜、中国、苏联提出的建议将受到朝鲜人民的广泛支持。“我们将循着这一方向继续奋斗。我们将为朝鲜人民的利益、为统一这个国家的利益，最后是为全世界和平的利益而继续奋斗。”

接着是周恩来发言。

周恩来说：“十六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

周恩来说：“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对于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获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愿望应该是共同的。”

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通过下述决议：

“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当周恩来说到最后的一句话的时候，会场上没有一个人能不感到它的分量。

似乎每一个人的上身都向前倾侧，朝着周恩来。

南日接着发言。

南日指出，日内瓦会议中断的责任应该由西方十六国的代表负担。南日最后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忠于它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并将继续为和平统一朝鲜而奋斗。

连续的三个发言，以完全的权威对西方国家破坏会议的责任作了历史性的判决。天地间找不到任何一种理由，可以推翻这样一个正义的判决。

刚才以莫大的欣幸代表十六国读了那份宣言的那位亲王，现在只说得出一句话："莫洛托夫先生说那些宣读了十六国宣言的人们主动破裂了会议，我对此断然加以拒绝。"

光是这样拒绝是不行的，会场上现在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谁敢来拒绝。

下面是随此发生的一连串攫住人心的对话记录，用不着注解与说明，这段记录本身将告诉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的力量和影响。

比利时代表斯巴克："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建议与十六国宣言并不矛盾。我们不同意，只是因为它们的精神已被包括在朝鲜停战协定与十六国宣言中了。"

中国代表周恩来："斯巴克的说法没有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并没有如我们建议的规定。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

斯巴克："我说的是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其他的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周恩来："如果说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末，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斯巴克："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对于这一段对话，莫洛托夫来做结论。莫洛托夫说："我们就要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单方面的宣言来结束讨论，也可以用一个表示一方或另一方意见的宣言来结束讨论，还可以用一个表示我们大家意见的宣言来结束讨论。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莫洛托夫问道："我们是不是准备发表一个代表我们大家的意见和愿望的宣言呢？"莫洛托夫说："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在日内瓦开会的目的。因此我无保留地支持刚才比利时代表支持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

主席说："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上出现了短时的沉寂，没有人发言反对。在通常的情况下，主席就将宣布大家达

成协议了。

有人看到，在主席发言的时候，李承晚集团的代表卞荣泰悄悄地溜出了会场，他害怕他自己也许会被拖入参加哪怕只是表现一点点和平愿望的决议。

卞荣泰的去席，使得坐在他后面的美国代表史密斯的活动完全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全场现在只有美国代表团最忙。史密斯手里在起稿，嘴里在说话，其他的人乱成一团。

对于史密斯来说，这是最紧急的一霎那。会议的主席很快就将认为无人反对，而通过一个共同决议了。

史密斯急忙发言了。他说："我不懂得中国建议的范围与实质。因此，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一个副国务卿，一个受命参加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目的的国际会议的全权代表，他没有权力对一个和平的愿望表示同意，但是他却有权拒绝就这个愿望达成协议。

这样，美国死心塌地反对达成任何一项协议的凶恶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了。

接着，主席艾登发言。他说："我们没有投票的规则。我们在这里是靠共同协议来行动。我们现在不能在任何一个文件上达成协议。我想建议会议，同意只是把这些发言记录下来，作为会议记录的一部分。"

莫洛托夫要求会议也应该把刚才美国代表的发言载入记录。

接着，周恩来总结了会议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周恩来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当周恩来缓慢而沉重地逐字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会场静得叫人心跳。人们永远忘不了这一时刻。

人们的眼光不期然地转向坐在会场左后侧的史密斯。史密斯眼睛看着桌子，两手拳在胸前。

周恩来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现在，只有在史密斯发言以后又感到安全而已经溜了回来的卞荣泰，鼓起勇气来卫护被判决了的史密斯了。

卞荣泰说："十六国方面已经作了一个宣言；要作一个共同宣言是不对的。本代表团认为比利时并不能代表十六国方面的全体国家，至少比利时不代表我们。"

澳大利亚代表凯西表示，他也要"说几句话来支持美国代表的立场"。凯西说："出席这个会议的本方十六国没有单独身份，因此我不认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的第二段是对的。它只能使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一个各国间一般的联合，其中有些可以一致有些可以不一致。"

这就是说，既然已跟着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就该跟着美国走到底，不该再要有表示独立意见的自由。

凯西最后表示，虽然这次会议不是联合国召开的，但是他却相信将来会议的任何恢复必须在联合国范围之内进行。

大家都感觉得到会议是接近尾声了。达成最后一点点协议的希望已被破坏无余，为了这个目的已经应用了最野蛮的丛林法律。

莫洛托夫起来保卫主权国家在国际会议上自由表示独立意见的权利。他说："必须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的比利时代表的发言载入记录。我相信，我们的会议应该记录表示个别意见的发言。"

其发言受到各种解释的斯巴克接着说话。他说："我想我必须澄清我到底说的是什么。我支持中国代表表示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并非最后终止的希望的建议。我必须使我自己同意对这种希望的表示。我不能想象，任何人会以在朝鲜问题上将不再有任何讨论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希望。"

周恩来最后以有力的警告，揭破了那些所谓将在联合国内恢复朝鲜问题的讨论，以掩盖实际上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之立场的虚妄谎言。周恩来说："对于有些代表所说的话，是否可解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排斥在将来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谈判之外？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认为将来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诸位先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剥夺了它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和应有地位。"

主席在裁决所有这些发言都将载入会议记录以后，宣布会议闭幕。

时间是八点三十六分。

当每一个人走出会场的时候，仍然不能不感到周恩来最后发言的声音仍然在耳朵里回响。

在国联大厦第四号入口，早已散掉了的汽车，重又聚集拢来迎接走出会场的代表。汽车亮着灯，因为天已经黑了。这是五十一天来的第一次，人们在场内并没有感到时间过去得那样快，因为那里进行着紧张的战斗。

会场门口今天显得有点不同。摄影记者们重又活跃起来了。他们站在高高的架子上，第一次用灯光给最后一次走出这个会场的人照相。

摄入镜头中的，有为人民的和平愿望进行了忠贞不渝的斗争的刚毅坚强的人，也有刚犯了罪而心头还在发颤的人。

读者一定为在这一个下午所发生的一切深深感动。

从这里，中国人民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与伟大的和平力量在一起，为和平的事业进行了卓越的斗争。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里，我们代表着力量，代表着和平，代表着善良的希望。

中国人民懂得鄙视那一小撮孤立的老鼠一样的人。

有人说，日内瓦会议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记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记录在历史上；铁案如山，任凭什么也不能磨灭它。因为它铭刻在世界人民的心上。六月十五日

新华社·上海最后两辆人力车送交博物馆[1]

新华社记者

【题解】这篇消息以小见大，富于寓意，从一个具体小事入手，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生活的变化，成为新中国的新闻名篇。作品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纳丰富的内容，有关历史背景的穿插进一步充实了新闻的社会蕴涵。

上海市交通局今天把上海的最后两辆人力车送给了博物馆。原来的人力车工人曾为此自动集会庆祝，感谢政府替他们挖掉了穷根，帮助他们走上新的生活。

人力车最初出现在日本。远在1874年，上海也有了这种交通工具。解放前夕，上海约有五千多辆人力车，七千多人力车工人。解放后，政府在发展公共交通建设的同时，就有计划地帮助人力车工人分批转业。有些人力车工人已经被训练成为汽车驾驶员或技术工人。有的回到农村参加了农业生产。没有劳动力又没有依靠的老年工人进了养老院。六十三岁的老工人姜威群，拉了五十多年人力车，穷得一直不能结婚，现在他正在养老院里安静地度着晚年。

[1] 新华社上海1956年2月25日电。

新华半月刊·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1]

徐中尼

【题解】1956年，上海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为了解答国内外人士的疑惑，时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的穆青决定派记者采访一位有代表性的资本家，于是就产生了这篇颇具特色的报道。文中，荣毅仁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国家的变化谈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除了少量描写，多数篇幅都用直接引语，颇具现场感和说服力。报道播发后，轰动上海滩，影响海内外，被视为“对上海社会主义改造最精彩的诠释”。

在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的前夕，记者访问了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

荣毅仁的住宅很幽静，住宅的客厅陈设雅致，透过乳白的纱窗帘，可以看到一片花木修剪得很整齐的园地。靠窗斜摆着一架他的女儿们所喜爱的钢琴。当记者去访问的时候，荣毅仁在外面开会还没有回来，他的夫人正在准备带第3个女儿去少年宫，那里，少先队员有一个集会，邀请她去讲话。两个在高中学习的大女儿，明天要期终考试了。一个在初中念书的儿子刚刚结束考试，欢跃地走进来，迎着他妈妈说他们的学校就要由私立改为市立了。

不久，荣毅仁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了。这位在中国八个主要城市里拥有24个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家族的代表，今年40岁了。作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副主任委员，他一个多星期以来就为公私合营的工作而忙碌着，经常忙到很晚才回家。

当记者向他提出“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

“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1] 《新华半月刊》，1956(4)。

“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业，听到了我谈的经历和体会，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我带到中国来的疑问可以说是解决了。’”

荣毅仁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柔软的沙发里，开始了过去的回忆。

他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大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稍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的父亲和伯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创办和发展了自己的企业。这些年代，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我父亲一辈子，梦想着办工业，救国图强。当战争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连年内战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的企业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父亲一辈曾经把希望寄托给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对我们的第一手，却是无端通缉了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 10 万银元。1934 年，当申新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以价值三四千万元的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签订借款五百万元的合同。当时官僚资本的头子宋子文想乘机挤垮申新，吃掉我们的企业；当银行只付了 280 万元时，他就强制停止继续付款。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还把我 70 岁的父亲荣德生绑去 40 多天，勒索了 20 多万元美金的赎金，还给所谓‘破了案’的警备司令部送了更多的酬劳。”

荣毅仁接着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马路上美国兵横冲直撞，北京的女学生被强奸。我父亲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就是我的爱人，虽然当时所想的只是如何过安乐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容忍外国兵对自己同胞姊妹的污辱吗？那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而蒋介石国民党只会给祖国带来更多的屈辱。”

荣毅仁说道：“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

他接着说：“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下来了。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 40％以上，从 1951 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 年的盈利就达到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

产了。”

“重要的还在于解放以后6年来，国家强盛了。这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果，棉花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我们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帝国主义的畏惧。接着，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哪能有今天！”

这时，记者插断了荣毅仁兴奋的谈话，要求他谈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荣毅仁接着说：“我受了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1952年我到了莫斯科，还访问了苏联其他几个城市。我亲眼看到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但不比我国一般资本家差，而且还要好得多。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人，生活过得比我还好。单从个人物质生活来看，社会主义对我们中国的资本家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相反还值得羡慕。再从生产上看，我们用不着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跟资本主义时期的盲目投机和互相倾轧来比较，只从工厂取消了对工人的搜身制一件事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取消搜身制以后，工人的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几年来就极少有工人带东西出厂的事情发生。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工人劳动热情大大提高，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过去用罚、用开除的压迫手段做不到的事，改革了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就办到了。仅仅从这些方面，我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非消灭不可。”

记者进一步直率地问：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思索了一会，很快就答道：“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荣毅仁在将要结束自己的谈话的时候说道：“消灭剥削，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他指着坐在一起的孩子们笑着说：“他们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他们的前途，用不到我拿金钱去买。谁都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才能够强盛繁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替我们安排了出路，经过一个公私合营的过程，培养和锻炼我们的技术和业务能力，支持我们有利于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得到很好

的照顾。只要自己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当记者问到他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打算时，他笑着说：“几年来我从企业得到的利润收入，如果要我自己花掉，我实在没有办法花哩。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在记者告辞以前，荣毅仁的全家人又围坐在一起，他把记者的谈话记录念了几段给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听。

人民日报·致读者[1]

《人民日报》编辑部

【题解】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是继《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党报的又一里程碑事件。这次改版实际上是从战争年代的"革命报纸"，向和平年代的"执政报纸"转变的初次尝试，由于当时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而不了了之。《致读者》说明改版的三方面内容，即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等，既是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后来值得反思的事项。

人民日报从今天起改出八个版。同时，在编辑工作上也有一些改变。我们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改变谈一谈。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以来，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点。在最近，我们将着重从以下三方面改进我们的工作。

第一，扩大报道范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在过去，我们的篇幅比较小，不能容纳很多材料，这是一个困难。我们所以在目前纸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扩大篇幅，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但是问题并不尽在于此。我们没有努力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在报纸改出八个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在题材上也将尽量扩大范围，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

第二，开展自由讨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

[1]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

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首先，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事实决不是如此。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虽然不提倡无休止的讨论，报纸的篇幅也不允许对于任何问题都去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是作得很不好的，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今后我们希望力求改进。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不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的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形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无论问题是由于一种观点战胜了其他的观点而解决，或者是由于不同观点在争论中互相接近而解决。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事实，编辑部都力求经过调查证实，但是有时某些问题（特别是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在个别细节上不容易很快地查得一清二楚，却有必要及时地发表出来，以求迅速解决，那末，编辑部也将加以发表，而让它们的某些细节在实事求是的讨论的过程中弄清。这也是希望大家谅解的。

第三，改进文风。报纸是每天出版的，它每天都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因此，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古人说得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际上，文风不好，不但读者不愿意看，而且还会造成有害的风气，不利于思想文化，也不利于政治经济。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我们希望努力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编辑部自己努力以外，我们请求作者们在给我们稿件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报纸是给几百万人看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这一点也特别希望作者们能跟我们合作。

报纸改出八个版以后，版面一般地是作这样的安排：第一版还是要闻，跟以前没有多大分别；第二、三版的内容是国内经济，大致第二版着重工业和交通，第三版着重农业和商业；第四版的内容是国内政治，包括党的生活，此外还有一栏首都新闻或者地方通讯；第五、六版是国际版；第七版是学术文化版；第八版上半是带文学性的副刊，下半是广告。原来的读者来信专页取消了，读者来信将分别登在各版上。当然，报纸的版面是很难一成不

变的（例如今天的报纸第二、三版就都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文件），我们现在简单地介绍一下，只是为着让读者心中有个数罢了。

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在我们研究编辑工作的改进的时候，很多读者曾经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但是报纸的改进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几项要求也不容易马上完全实现，我们期待全国广大的读者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批评和指示！

新华社·当你们熟睡的时候[1]

新华社记者集体采写

【题解】1956年，伴随《人民日报》改版，新闻界也出现钻研业务的风气，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一篇佳作。作品从平凡的生活、身边的小事入手，选取一个普通的首都之夜，一些普通的劳动者，报道了他们辛勤工作、服务人民的故事，读来亲切动人。全文走访了十来个岗位的劳动者，如保育员、投递员、售票员、司机、医生、护士、厨师、报社编辑、印刷工人等，勾画了一幅首都之夜宁静而紧张的别样图景，令人耳目一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吗？当你们熟睡的时候，全国有多少人为了你们幸福的生活和明天的工作，在通宵紧张地劳动着。看吧！下面就是在18日夜里北京很多夜间工作着的人们。

守候在孩子床边

柔弱的灯光笼罩着南魏胡同托儿所孩子们的卧室。保育员们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挨着每个小床轻轻地来回走动。两岁半的女孩子曾珊珊在睡梦里把白色的小被揉做一团，像抱洋娃娃似地把它抱在怀里。保育员房黎轻轻松开了她的小手，又把被子替她盖好。甜睡着的孩子们有的把小腿跷在床栏杆上，有的把小手垂在床沿下，有的趴在小床上睡觉。保育员们都把这些不大好的姿势纠正了，使孩子们睡得更舒适。

深夜两点多钟，保育员宋作芳发觉一岁半的男孩康宏陆大便在衣服上，她立刻细心而又熟练地给他换去了脏衣服，而这个孩子并没有醒。宋作芳在记录孩子生活情况的本子上作了记录："康宏陆夜间大便一次，发现消化不好，请白班的阿姨注意他的饮食，其他的孩子睡得很好。"

为了明天的乘客

夜里把最后一批乘客送回家休息以后，北京市电车公司、汽车公司的检修工人、调度

[1] 新华社北京1956年7月21日电，《人民日报》，1956年7月21日，以《在首都》为名发表于第4版。

员、司机、售票员……还在紧张地劳动着。他们中有的在检修回厂的车辆，有的在收集车上的抹布、水壶等清洁用具，准备清洗。电车公司第一保养厂调度员万世俊在登记售票员从车上收集的乘客遗失物：扇子、雨伞、手帕……，准备天明招领。

深夜两点以前，公共汽车的调度员已经把市内和通往郊区的二十五路的几百辆汽车调配好了。汽车司机和售票员们已经等候在各个街头，在三点钟他们就乘着接班汽车来到保养场，准备在四点三十分出车把人们送往工作、学习的地点。在夜间工作已经四年的保养场车间主任张锡恩说，夜间工作是辛苦，可是当我们知道一天没出任何机件事故的时候，快乐就代替了一切。

急救病人

十一时四十五分，北京市急救站值班护士拿起响着急促铃声的电话听筒，重复了对方一句话："休克"。语音未落，在隔壁房间和衣而睡的汽车司机张鑫铎已站在桌前，接过听话筒，详细询问病人的住址。刚从清河镇进行急救工作归来的女大夫殷瑰琦提着急救包，立刻和司机一块跑步奔向汽车房。

在急救车上，殷瑰琦大夫迅速做好了临床急救的一切准备。

四十五分钟以后，这个急病患者已经在北京市第一医院苏醒过来了。

北京市急救站设在首都的市中心，有九位大夫、三位护士日夜轮流值班，到城郊各区急救病人。二十七个医院每天向他们汇报空床位的情况，以便急救中可以迅速地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

这个急救站从 1954 年 11 月成立到现在，已经使两千多个病人脱离了危险的境地。

黎明时的电报

四点二十七分，北京市电报局报务室收到了一份山东滋阳发报人徐燮四点钟交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在十一分钟以后缮译完毕，交给送报员，四点五十分就送到了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收报人徐焌拆开电报喜形于色地说："这下可好了！"原来他一连三天到车站去接他的八岁的妹妹，都没有接着。这份电报上写着："今天下午四时接妹。"

这是这一个夜里很多电报中的一份。如果不是经过了静悄悄的东长安街才走进灯火通明、大门敞开的北京市电报局的话，你真会忘记这时已经是午夜以后了。营业员们依然在柜台里随时等待着交发电报的人。报务室里电传打字机嗒嗒地响着，报务员们全神贯注地收发着电报。传送带一份接一份地把收来的电报送到来报室缮译，送报员们随时都在准备出发。

通宵运蔬菜

当天快亮的时候，菜市场和副食店的营业员们已经结束通宵的劳动，把供给首都人民的二百多万斤蔬菜准备好了。

在全市最大的广安门菜站，郊区农民赶着满载蔬菜的马车来了，他们把刚从田地上摘割下的新鲜蔬菜连夜送进城来。著名的四季青、东方红等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蔬菜丰收了，白天黑夜在这里都能看到他们送菜的马车。菜站的收购人员经常从深夜忙到白天，一收就是一百多车菜。早晨五六点钟，交易员就同时向九百个左右的零销点和机关团体批发调运。全市二十一个菜站每个夜晚也都是这样的紧张地劳动着。

拍《祝福》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如同白昼的摄影棚里，导演、演员、摄影师及其他工作人员们正在拍摄由鲁迅的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祝福》”。演员白杨扮演的祥林嫂走出化妆室，被人引导第一次进入了鲁四老爷家的厢房。这时，十多个照明灯的巨光马上集中过来，站在厢房旁边的导演桑弧说了声“好，拍”，摄影师钱江紧张地拍下了这个镜头。

该拍鲁四老爷知道祥林嫂是寡妇的那种厌恶表情的镜头了，摄影师拿着测光表一次又一次的测量着，导演不断地纠正曾饰《虎穴追踪》影片中特务头子崔希正的演员李景波的姿势，叫他把拿着水烟袋的手抬高些，眉头要皱起来。在照明灯下面对着镜头的李景波，满脸出汗。年轻的女化妆工作者胡宏华不断地用棉絮沾去他脸上的汗水。这个一刹那的表情，连续拍了四次。

将近黎明了，制片车间的工人还在用从绍兴运来的古老花瓦赶制鲁家大门楼的布景，他们要争取这部影片在今年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上映。

洒 扫 全 城

深夜，清洁工人们驾驶的一百多辆汽车，穿行在全城的大街小巷，把八千多个垃圾集中站里的两千多公方垃圾，运到城外七个垃圾处理场。

在这个时候，五辆大型的洒水车在宽阔的东、西长安街上，冲刷灰尘。四百个扫街工人，在打扫着王府井、南河沿等二百多条街道。

东方发亮，各条街道上又出现了二十多辆洒水汽车。人们通过这些干净、湿润的柏油马路，走向他们工作、学习的岗位。

为了千百万读者

午夜，在沉寂的王府井大街上，人民日报社大楼的许多房间里依然灯光通明。三楼上夜班编辑组的电话铃不断地响，经常打断了编辑们赶编最后几条重要消息的思考。忽然，驻在云南、安徽等地记者用电报发来了急稿，总编辑室主任看看表已过截稿时间——十二时，只好把这些消息割爱。一点多钟，编辑们带着苦心设计出来的版面样跑到排字车间，和工人们商量拼版。工作的高潮由办公室卷向印刷车间。这里，在紧张拼版的老排字工人都有十多年的工龄，他们正在和时间战斗。他们用十分熟练的技术，根据改稿三番五次地改换排字，争取尽早把版送去打纸型。同时，在检查室和校对科里，一批头脑清醒的人们正在拿着红笔细心核对每篇稿件和每一个字，他们为消灭报纸上的每一个错误而努力。

两点五十九分，四部高速度轮转机转动了。一分多钟后，工人们争先拿起了今天的报纸，检验自己和编辑们彻夜劳动的成果。邮政局的汽车从这里装满了新出的报纸，立即送到火车站和全市去。和这同时，报纸的纸型又赶送到西郊飞机场，由专机和班机送往上海、昆明、重庆、兰州、乌鲁木齐和沈阳等八大城市，让这些地方的千百万读者也能当天看到北京的人民日报。

夜　宵

首都人民都非常喜爱在他们夜间工作之余来到夜宵摊上吃些东西。

西四牌楼的夜宵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它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19 日一点多钟，占有半条街的夜宵摊还是灯光通明，人们正忙得热火。这里有美味馄饨，有北方特有的肉汤煮烧饼，有油煎肉馅饼、炒饼，还有各色酒类和下酒菜。在阵阵凉风的夏夜里，在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在这里吃到这些可口的夜宵，谁都会感到非常愉快和轻松。

在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市的夜宵正在有计划地发展。前门外华北楼饭店现在就通宵营业，据这个饭店的工人说，他们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开始实行通宵工作以来，在日夜二十四小时内，常常要接待两千个左右的客人。

零点二十八分接婴儿

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产院的住院处六十四岁的服务员王志，已经上了二十二年夜班了。18 日夜里他在给产妇张美德办完住院手续的时候，像一个有经验的大夫一样地判断说："今晚你一定会生的！"

在产房里，五六个值班大夫和助产士轮流在张美德旁边守护着，不时地听听胎心的跳

动。她们对产妇说："你放心，孩子挺好！"

零点二十八分，婴儿"哇"的一声诞生了。助产士小心地扎好了脐带，擦好微红的小身体。当年轻的妈妈看到自己胖胖的儿子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当产妇张美德正在喝红糖茶的时候，大夫亲切地对她说："好好的睡觉吧，天明我们就给孩子的爸爸打电话，告诉他大人、婴儿都很好！"

光明日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节选）[1]

储安平

【题解】1957年"反右"前夕，中共中央统战部曾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发表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批评所谓"党天下"。1957年6月2日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篇发言稿，成为"反右"期间最有影响和最为典型的右派言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由此开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

[1] 《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融融其乐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人民日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

毛泽东

【**题解**】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鸣放中出现的各种言论。面对众多意见，他认为事情的性质出现变化，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应该予以反击。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社论，成为"反右"期间新闻战线的一篇重要文献。

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

[1]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

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 6 月 14 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哪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新华社 ·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记[1]

周定舫

【题解】1958 年 4 月 22 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以“纪念公元 1840 年以来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当天，新华社记者周定舫瞻仰了这座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文。文章向读者介绍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全貌，条理清晰，描写生动，以质朴平实的文字展现了纪念碑庄严肃穆的形象，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了。近日，我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瞻仰了这座巍峨雄伟、庄严的纪念碑。

我从东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刚进入广场就望见纪念碑像顶天立地的巨人一样矗立在广场南部，和天安门遥遥相对，在远处就可以看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碑的北面是广场，四周是绿色的草坪，南面是葱翠的松树林。我越过广场，踏着刚铺成的橘黄色花岗石石道，徐徐走到纪念碑台阶前，从近处来仔细瞻仰纪念碑。

纪念碑工地负责人贾国卿，向我介绍了纪念碑的兴建经过。他说，这座纪念碑是根据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兴建的，当天傍晚，毛主席率领全体政协委员为纪念碑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奠基礼，毛主席亲自执锨铲土，为纪念碑奠定基石。从 1952 年 8 月 1 日动工兴建以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和关怀。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第一座最大的纪念碑。它从地面到碑顶高达三十七点九四公尺，有十层楼那么高，比纪念碑对面的天安门还高四点二四公尺。纪念碑是用一万七千块坚硬的花岗石和洁白的汉白玉砌成的。它象征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标志着全国人民对先烈的怀念。

我踏上花岗石铺成的台阶，到了第二层月台。碑身四周围绕着双层汉白玉栏杆，栏杆的形状和天安门前玉带桥的汉白玉栏杆一样，美观朴素、洁白耀眼，使挺拔的碑身显得更加庄严、雄伟。碑的正面（北面）在一块六十吨重、十四点七公尺长的碑心石上，雕刻着毛主席

[1] 新华社北京 1958 年 4 月 22 日电。

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这八个字是碑的主题，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在碑身背面，一百五十个镏金字整齐地排列着，这是周总理亲笔写的碑文。碑文的正文是：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身东西两侧上部，刻着以红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光辉永照”的装饰花纹，象征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万年长存，永远照耀着后代。大、小碑座的上、下四周，雕刻着以牡丹花、荷花、菊花等组成的八个大花圈，这些花朵象征着品质“高贵”、“纯洁”和“坚忍”，表示全国人民对英雄们的永远怀念和敬仰。碑顶是民族传统的建筑形式，是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瞻仰整个碑型后，使人们感到既有民族风格，又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

十块汉白玉的大浮雕，镶嵌在大碑座的四周。这几天，雕刻家和石工们一起，在精心地作最后一遍修饰。负责领导纪念碑美术设计的雕刻家刘开渠，正在细心地检查每幅浮雕的画面。我请他介绍了有关浮雕方面的情况。他说，这些大浮雕高二公尺，合在一起共长四十点六八公尺。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久八百年到一千年。每幅浮雕里有二十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他们的面貌、性格、思想、感情和姿态形象都不相同。

从碑身东面起，按着历史顺序往下瞻仰。第一幅浮雕是“焚烧鸦片烟”，记述鸦片战争前夕，1839 年 6 月 3 日，群众在虎门烧毁鸦片的事迹。浮雕上，愤怒的群众正在把一箱箱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运到海边，倾倒在放有石灰的窑坑里焚烧，一股股浓烟从石灰池上升起。人群后面，有炮台和千百只待发的战船，准备随时还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画面上人物的形象，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东面的第二幅浮雕，是描写 1851 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太平天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口号，严重地动摇了满清皇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在这幅浮雕上，一群拿着大刀、梭镖、锄头、土炮起义的汉、僮族人民的儿女，正风起云涌地从山坡冲下来，革命的旌旗在迎风飘扬。

往南转到碑身的后面，看到的是 1911 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庄严画面。深夜，起义的新军和市民，摧毁了湖广总督门前的大炮，正向总督府里冲去。总督府内熊熊的火焰冒向天空；总督府的牌子，被打断在阶前；撕碎了的清朝的龙旗，被践踏在地下。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接下来的一幅是“五四爱国运动”。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浮雕的画面显示出学生们齐集于天安门前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的情景。一群男女青年学生举着废除卖国密约的旗帜，慷慨激昂地来到天安门前，人群高处，一个男学生正在向围着他的群众演说。梳着髻子、系着长裙的女学生，在向市民们散发传单。愤激的青年演说者，怒形于色的人群，使整个浮雕充满了痛恨

国贼，激动人心的气氛。南面的第三幅是“五卅运动”。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群众一万多人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国主义大示威，英国巡捕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五卅惨案”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促使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的爆发。这幅浮雕表现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界人民坚强不屈地向帝国主义斗争的情景。画面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市民举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小旗，冲破英国巡捕的沙袋、铁丝网英勇地前进；商店关门罢市，戴着礼帽的商人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被打伤的工人，在战友们搀扶下，继续勇往直前。人群后面隐约能看到外滩的海关和银行大楼。

碑身的西面，第一幅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浮雕。画面从一个连队的角度来表现这一伟大起义的情景。1927 年 8 月 1 日早晨，一个连队的连长，挥着右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士兵们举着起义的信号——马灯，光辉的红旗举起来了，战马在呼啸，劳动人民正在帮助搬运子弹，战士们激昂地高呼着。从这时起，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展开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斗争。紧接着的一幅是“抗日敌后游击战”，浮雕上显现出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敌后游击战的场面。远远望去，在一座雄伟峻峭的半山腰里，游击队员们正穿过高大的树林和茂密的青纱帐，去和敌人战斗。画面上，青年男女农民拿着铁铲背着土制地雷；白发的母亲送枪给儿子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年青小伙子站在指挥员身旁，等候命令，准备随时投入消灭敌人的战斗。

我们来到碑的正面，看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浮雕，这是十幅浮雕中最大的一幅。国民党认为不能逾越的天堑长江，被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胜利地渡过了。浮雕上，号兵吹起冲锋号；指挥员右手高举，连连向高空发射信号弹，已登上敌岸的战士，踏着反动派的旗帜，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城冲去。背后，数不清的战船正在波涛中前进。在这幅浮雕的两旁，是两块装饰性的浮雕。左边是渡江前夕，工人抬着担架、农民运送军粮、妇女送军鞋等热烈支援前线的场面。右边的一块表现全国各阶层人民举着红旗和鲜花，双手捧着水果，欢迎解放军、慰劳解放军的情景。

看完了所有的浮雕，陪我参观的人都忙着筹备揭幕典礼去了。我又重新瞻仰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和碑文，我绕着碑座走了几圈，细细地瞻仰着浮雕。几年以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两旁，将要兴建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这里将成为一个瞻仰革命先烈的地方。人们从这里将可以了解到中国革命所经过的艰苦道路，先烈们的光辉榜样，中国人民为了取得自由、解放，曾经付出的巨大代价。当我走下月台，离开纪念碑的时候，又一次向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默默致敬。

北行三语·台湾海峡问题[1]

曹聚仁

【题解】曹聚仁(1900—1972),记者、学者,解放前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撰稿,1950年赴香港,任《星岛日报》等报刊编辑。其间,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台湾之间,发表了许多关于大陆的报道和时评,辑为《北行小语》等文集。《台湾海峡问题》写于1959年,是关于两岸问题的经典时评。作者以纵贯古今的开阔视野分析了两岸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中国'的春梦是造不成的",至今读来依觉意味深长。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辛稼轩:摸鱼儿

一、从炮轰金门说起

记者自来不爱写内幕新闻,因为坊间流行的所谓"内幕新闻",都是捕风捉影的文字,一些根据也没有,说了等于不说。此刻所写的,乃是对于台湾海峡问题的剖视,或许可以供海外人士的参证。

解放军炮轰金马的军事行动,始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迄今已将五个月。这事件震动了全世界,列为一九五八年国际大事件之一。海外论客,对于这事件,所发议论最多,也最可笑,几乎没有人搔着痒处的。而今,"事件"虽说没有终了,"情境"却已有了变迁;记者且借重"井底天文",作为剖解的依据。

究竟解放军炮轰金马,怎么一个来由呢?据说去年春间,台湾当局已经决定从金门调回胡琏将军,同时也决定"国军调防"。(胡琏防守金门,他的部队,乃是陈诚的主要军力;陈氏不愿意让第十八军的主力消耗在第一线上,那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去年八月初,这一决议已经见诸实际行动。驻台美军事顾问团也赞同这一决定,愿为之协助撤退。(美军一

[1] 本文写于1959年1月13日,原载《北行三语》,1960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口答应海上运输线，由第七舰队负责。）八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开始炮轰金马，虽引起国际间的焦虑，却也达成国军换防的最好助力；华盛顿方面也就迫着要台方撤去金马各岛的国军。到了九月底边，金马撤军，可说已成定局了。

既已如此，何以突然有了变化，解放军忽于十月初，先有一周的停轰，又继停了二星期，后来又改为双日停轰呢？如国防部彭德怀部长告台湾军民书所说的，“以利国军固守”呢？其因乃在于北京方面进一步的看法。北京当局看穿了华盛顿方面的用意，美国要达成“两个中国”的阴谋，迫台方撤出金马国军，正是孤立台湾，迫蒋氏就其范围的一种手段。解放军如取得了金马，却失去了台澎，因小失大，那是不合算的。北京方面，就让金马留在国军之手，让蒋氏有固守抗美的力量，这便是台湾海峡的新情势。北京方面的观点是：要回来，必须金马台澎整个儿回来，不能让美国去分割的。（上月，杜勒斯招待记者也就提到这一点。）这是坐在井底的海外论客们所不曾看到的“天”。

解放军炮轰金门，我们从侧面推测，他们并不是没有安排的，中共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沿海一带，事前已经完成了军事上的一切准备。记者所说的“一切准备”，包括飞弹作战在内。北京方面，一直就把美第七舰队及冲绳岛美陆空军估计在一起；战事一发生，并不是对台军作战，而是对美台军共同作战。同时，布置了“空对空”、“空对海”、“空对陆”的飞弹战斗；战事一扩大，使用飞弹，不独台湾的大中型城市全部毁灭，美第七舰队也必同归于尽的。台方曾经尝试着空对空的战斗，我们看了在北京展览的响尾弹的残骸，相信台方在战斗中，即非惨败，也必处于劣势的。美空军某小队队长因此受了处分。台湾当局原以为美第七舰队会牵入台湾海峡的军事漩涡，美军某将领也曾有冒险的打算。但美空军派机在中国大陆高空侦察摄影以后，知道解放军有了飞弹作战的准备，（中程飞弹，可以远及冲绳岛）便缩手而退，不敢介入这一场战斗了。这也是海外的论客所不曾理解的。（美国防部长在国会的报告，曾证实了这一点。）

炮轰金马以后，华盛顿的反应是微妙的。贝谟在华沙，急于要和中共大使王炳南商谈，那是世所共知的。但，当贝谟提出了台湾海峡首先停火的要求，王氏问他：“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开了火？”贝氏便哑然无从作答了。王氏每一回要贝氏说明以什么资格来代表台湾，贝氏也期期艾艾，无以为辞的。华沙会议，一直这么拖延着，就因为北京方面理直气壮，美方代表，心中虽有某种打算，却又不便于摊出来理论的缘故。其间最微妙的，是台方一直不知道华沙会议的内情，而台北与北京之间的神合貌离，又是华盛顿所猜不透的。所以，“炮轰金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到今天还是一个谜。

二、台湾问题的追叙

记者在这儿先作简短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追叙。台湾原是我国先民开辟的境土，隋唐年间，海上交通，远及琉球日本，基隆已经成为船舶聚集之所。到了宋元两代，台湾属于福建的建置，今日的台中、嘉义，便是当时的府治。先民经营台湾，都是以台中为基点，再向台

北、基隆、台南、高雄两端发展开去。在先民意识中，台湾正是福州、厦门的外府，无论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宗教神像，都是福建文化的延伸。“台湾”乃是中国领土，这已经是常识，不待推证的了。

台湾卷入了世界漩涡中去，那是从十八世纪便开始的。那时，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发展世界殖民事业的帝国，已经完成了分割的蓝图。荷兰，这个继起的帝国，她初到东方来，穿过了葡西的夹缝，先在台湾两端立了脚，这便是“福摩萨”这一名称的来由。郑成功围攻安平城一年，终于把荷兰势力逐出了。（荷军投降，遣返苏门答腊，荷兰就这么退出西太平洋地区，就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另谋发展，便在印尼地区生了根。这是世界殖民史上的另一页。）十九世纪以后，日本的南进政策，以台湾为第一个目标，那是显然的；到了马关条约订立，便实现了他们的企图。可是，抓住了安南的法国，一直对台湾有兴趣；直到美国的势力伸到了太平洋西岸，才转变了情势。日本军阀，以台湾为基点，伸展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地区去，其意在逐出英法荷的东方势力；她的触须一伸到了安南，便和美国正面冲突，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了。二次大战的结局，虽说把台湾主权恢复到中国手中来；但罗斯福的本意，只是要把台湾当作美国在太平洋西岸的踏脚石，并没有尊重中国的主权的意思。（开罗会议中，邱吉尔一开头就说不让中国触及安南主权问题，他是明白罗斯福答应把台湾还给中国的用意的，对于这一点，并不反对。）

美国方面，一提到台湾问题，便称之为“福摩萨”。其意即是说，这一岛屿，乃是西方人的。从美国观点说，这是西太平洋防御线，（从日本——冲绳岛——台湾——菲律宾群岛，这么一连串的岛链。）杜勒斯便公开对记者们说：“我们只是从美国利益来考虑台湾地位的，我们无所爱于蒋某的政权的。因此，我们回看一下过去十年间美国的远东政策，其中颇耐寻味的。今日华盛顿当局对于承认新中国政权、靳而不予，自以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实，大陆初解放，新中国建立那一年，华盛顿方面急于要和中共当局建立外交关系的。司徒雷登留南京一年，便是痴汉等婆娘，想尽方法向北京送秋波。他们通过间接路线，对北京当局表示，只要中共肯和美国携手，美方愿意无条件贷款五十亿美元的。那时华盛顿方面发表了白皮书，其中对于蒋氏的国民党政权的谴责，不仅是露骨，而且十分刻毒的。（白皮书，已有外交部中文译本。董显光所作蒋氏传，中卷下卷，几乎都是针对美国白皮书而作的辩正文字。）北京人民政府的外交路向，一开头便是独立自主的，不仅“自主”，而且处于主动地位。司徒雷登蛰居一年，黯然归去，华盛顿当局无可奈何，才重新扶起蒋氏的政权来。

华盛顿方面，对于流徙到台北的蒋氏国民党政权，一开头就十分冷淡的。一九四九年年头，华盛顿当局通过司徒雷登之手，迫着蒋氏下野归隐溪口以后，不希望蒋氏到台北去的。（见司徒雷登所作《在华五十年》。）五月初，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南进，迅速推进到闽浙东岸，眼见渡海取台岛如拾芥。美方为着避免卷入漩涡，他们对驻台的美国军政人员，曾明令通告：军事情势到了台海阶段，所有美国军民，一律从台澎军区撤退。这一通

告，一直保持有效。去年，解放军炮轰金马，驻台美国军民，便奉令准备撤退，曾引起台方当局的忧虑，即其明证。解放军南攻粤桂阶段，蒋氏把国军一部撤至台湾，美方大不高兴。当时，曾建议由美军防守台湾，并愿运国军到海南岛去，替蒋氏来防守海南岛。蒋氏却要把军队运回台湾放弃了海南岛，美方也只好望洋兴叹。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美国一部分军人，如麦克阿瑟辈，原想和蒋氏携手，有事于颠覆在大陆中国的中共政权的。华盛顿方面，（当时，还是民主党执政时期。）并不如此打算，他们不仅限制着解放军的渡海，也限制着国军的反攻大陆。同时，也并不让台方派军队参加在朝鲜的战争。美方的说法如此：台方要反攻大陆的话，美方可以在运输上来协助，但美方为着防守台澎，得派军队来接防的。美军最了解台军的战斗力，一场反攻大陆的战斗，就可以把蒋氏的主要军力消耗掉的，那就可以让美军久住台澎了。这几年，蒋氏一直反对美军协防台澎，便是这个缘故。（美方的用意，蒋氏也是很明白的。）

近十年来，蒋氏的军队以及台湾的财政，依靠着华盛顿的帮助，那是显而易知的。军援和经援的总额，在美金五十亿元之数。美国当局，当然不会有这么慷慨，也不会这么傻蠢的，当然，耽耽逐逐，有他们的大欲存焉。（炮轰金马以后，美方就花了三亿元左右的军费。）他们要化台湾为美国的一个州，从蒋氏手中挖出台湾的主权去。他们要把军事顾问团的力量伸到营级的底层中去，他们要使蒋氏成为虚君，把军权移到亲美派军人的掌握之中，同时，由美国所抚育的政治力量来主政。这便是美蒋矛盾的实情。美蒋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已经路人皆见皆知了。

三、“两个中国”的打算

世界上，相反而实相成的例子是很多的，政治本来不一定合乎逻辑的，许多事，事后才恍然大悟的。北京与台北，都认为“台湾海峡的战事”乃是内战，不容外人干涉，那是相同的，双方都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

经过了朝鲜战争以后，华盛顿当局认识了解放军的力量，新中国突然站在太平洋的西岸，那是他们所心惊胆寒的。他们只能祭起了“两个中国”的法宝。（他们对于“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的分裂作用，表示得意，因此，又着手来分化中国。正如杜勒斯所说的，我们不能让北京当局称心如意地统一起来。）“两个中国”的打算，并不自今日始，解放军渡江前夜，华盛顿方面已作南北分治的打算；那时，他们想扶植李宗仁的力量，划江而治。后来美方又想扶植西南军人的地方势力，阻解放军于五岭之北，都被蒋氏所个别击破。解放军那么迅速席卷全国，蒋氏也有相反而实相成的作用。

今日中共政权，统一了大陆中国，蒋氏政权，统一了台湾，这和帝国主义者所要分化中国的阴谋是相违反的。华盛顿当局，虽说在宣传上，不妨夸大大陆内部矛盾的传说；但实际上，不能不面对新中国团结统一的事实，因此，分化手段只能向台湾去下工夫。解放军炮轰金马以后，所有华盛顿方面卵翼的所谓“民主”力量，都先后回到台北来了。华盛顿方面，

要蒋氏让出政权来，第一步要建立所谓“民主派”的台湾，要造成联合国托管的局势；再进一步，当然变成美国的一州，有如阿拉斯加一样。

华盛顿当局，表示美国只能从美国的利益来考虑台湾问题，他们明白表示无所爱于蒋氏政权。但是，新中国的力量，太强大了，“两个中国”的春梦是造不成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三日

中国青年报 ·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1]

王石

【题解】1960年,《中国青年报》刊登王石采写的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轰动一时。这篇经典报道后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并被拍成影片,陪伴几代人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报道采用纵横交错的蒙太奇笔法,叙述了北京和山西平陆两地为抢救61名食物中毒的民工所做的种种努力,结构紧凑,高潮迭起,主要人物性格饱满,现场描写真实感人。作者王石改革开放后曾出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1960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
现在,整整是下午四点钟

在首都王府井大街,车水马龙,热闹繁忙,商店穿戴着节日的盛装,人们满面春风地东来西往。就在这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路东,有一家门市很小的国营特种药品商店。这时候,营业员们在笑盈盈地答对顾客,办公室里,算盘珠山,快下班了,正忙着结账。忽然,有人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大把红红绿绿的票子:

"同志们,今晚政协礼堂有精彩晚会,首都商业职工春节大联欢!"

"好哇!"大伙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原来,在春节放假的日子里,我们大家都休息,可商业职工却还忙在柜台上,为了让我们在假日里买到称心的东西,可真是忙得脚不沾地。所以,这个有首都著名艺术家表演、内容十分精彩的大联欢,只好推到正月初七才举行。大家分到了票子,更是欢喜地忙工作,只等下班以后,带上全家老少,去尽兴欢度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

陡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十分急促的铃声,戴近视眼镜的业务员老胡,一把抓起听筒:

"喂,哪里?"

"长途!我是中共山西平陆县委,我们这里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急需一千支

---

[1] 《中国青年报》1960年2月28日。

‘二巯基丙醇’，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听筒里的声音十分响亮而焦灼。

“我们立刻准备药品！”很怕对方听不清楚，老胡几乎喊起来了：“我们马上设法把药发到太原！”

“不行！太原距平陆尚有一千余里，而且要翻山越岭，交通极为不便，请设法空运……空运！！”

六十一个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一千支注射剂，非得空运！……每一个字，都好似一颗钉，颗颗钉在人们的心上！就在老胡抓耳搔腮地和对方通话时，大家已经都围上来了。商店里好一阵紧张，人们的心里，早已把“精彩晚会”丢得无影无踪。党支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全力以赴办好这件事。发动大家想办法，立刻请示领导。于是，全商店的人，把心拧成一股绳，把精力全都集中在这一连串的悬念，一连串的困难上了……。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亿万劳动人民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一根红线贯穿，颗颗红心相连，大家同呼吸，共甘苦……

事情原来是这样发生的：

2月2日，在山西省平陆县

一座新落成的红色大楼里，灯火辉煌。中共平陆县委扩大会议，照常进行着。与会者心神振奋，讨论的是1960年跃进规划。

七点钟时，县人民委员会燕局长匆匆奔进会议室，找到县人民医院王院长说：

“一小时前，风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名民工，不慎发生食物中毒，请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抢救！……”

他们的话还没说完，坐在主席位置上的中共平陆县委第一书记郝世山同志，也已晓得了这紧急情况。这位五十来岁的老书记，立刻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把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果决地说：

“同志们，现在要全力处理一件急事，会议暂停！”

说完，郝书记一甩手，披起那件旧棉大衣，立即召集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当机立断，全力抢救。片刻，大卡车就载着负责同志，载着县医院全部最好的医生，在茫茫的黑夜里，翻山越岭，向我们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身边奔去！

这平陆县与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只隔一条黄河。县北五十里外张村一带，正在修建一条从芮城风陵渡到平陆南沟的省级公路，这条公路是山西全省支援黄河三门峡伟大建设工程的交通命脉。筑路民工都是人民公社社员，干起活来，真叫干劲冲天，有个叫侯永胜的，一个人一天就挑了几百担土。他们展开了对手赛，改革了一系列工具，工效步步提高。更在春节期间，自愿少休息，打了个开门红的大胜仗。谁想竟发生了这偶然的不幸！这是六十一个多么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的生命有危险，我们能不心疼吗？

县里的汽车来到张沟工地以前，张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薛忠令，亲率公社医院二十多名医护人员，早已来到。他们正在忙着给病人洗身、洗脚、消毒。县里的医生跳下汽车，立即插手诊断，立即治疗！

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

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

给患者又注射了吗啡，仍然无效！

……无效！无效！

紧张，无比的紧张！空气窒人，医生、护士挥汗如雨。县人民医院负责医生解克勤等同志，经过紧张详细的会诊后，断定：

“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必须在四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效！赶快派人去找！”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县委会里，不安之夜。

我们的郝书记，不停地吸着烟，守在电话机旁，他嘴角上的皱纹，更加深陷了。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自个生病（他现在还患着关节炎），好像没那么回事，可乡亲们一有个头痛脑热，他就记着放不下，非想个法帮你治好心里才舒坦。何况，现在这六十一个同志，有的是生命危险！郝书记更加坐卧不安了。……这时候，他们接到了患者急需“二巯基丙醇”的电话，马上就派人去找。县人民医院的司药王文明和张寅虎，这两个小伙子连厚衣服也没顾得穿，两步并做一步走，跳过一道道深沟险壑，到三门峡市去找药。你看，这才叫真正的“司药员”，药房里没有的，他愿意经历千辛万苦，跑遍天涯海角，也要给你找到！

他们来到了黄河茅津渡口，在微微的星光底下，只见那黄河翻滚着巨浪，只听那河水拍打岸头，声声震人心碎。这两个小青年，明明知道夜渡黄河容易翻船落水，极其危险，但是，为了挽救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在这重要的时刻，就是天大的险，他们也心甘情愿去冒！他们毫不犹豫的去敲船工的门。船工从鼾睡中醒来：

“敲门干什么？”

“请摆我们渡河！”

“黄河渡口，自古以来，夜不行船，等天亮吧！”

“不能等！为了救人今夜非过河不可！”

当船工们听说是为了挽救六十一个祖国建设者，老艄公王希坚，不顾今晚正发喘，猛然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跳了起来，系上搭褳，吆喝一声：“伙计们，走！”后面王云堂等几个人紧紧跟上。来到岸边，二话不说，驾起船，直奔河心。凭着与黄河巨浪搏斗了几十年的经验，凭

着一颗颗赤诚的心，终于打破了黄河不夜渡的老例，把取药人安全送到了对岸。

可是，三门峡市没有这种特效药！

这已经是2月3日的中午了。时间啊，你停滞一会吧！你为什么老是从人们的身边嗖嗖地急驰而过，想挽也挽不住你……

郝书记急切而坚定地指示："我们还是应该就地解决。向运城县去找！向临汾县去找！向附近各地去找！"

就在这时，张村公社医院又来了电话："如果明晨以前拿不到'二巯基丙醇'，十四名重患者，将会有死亡！"

找药的电话，不断头的回来了：

运城县没这种药！

临汾县没这种药！

附近各地都没这种药！

郝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于是，这场紧张的抢救战，在二千里外的首都，接续着开始了……

人心向北京，北京的心立刻和平陆的心一起跳动……

2月3日，下午四时多，在卫生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一所四合院里，药政管理局的许多同志，都停下了别的工作，忙办这件刻不容缓的事。药品器材处长江冰同志，在接到平陆县委打来的电话后，就一面叫人通知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赶快准备药品，一面跑去请示局长和正在开党组会议的几位部长。徐运北副部长指示：一定要把这件事负责办好，立刻找民航局或请空军支援送药！

现在，处里胖胖的老吴同志，头上汗水津津，正在紧张地向特种药品商店催药，共青团员冀钟昌正在与民航局联系；电话里传来的是不均称的呼吸。显然对方也在焦急：

"明天早晨，才有班机去太原，那太迟了，太迟了！……对啦，请求空军支援！"

真急人，电话一个劲占线。当小冀接通了空军领导机关的电话时，空军已晓得了这件事。原来民航局先一步为此事打来了电话。这时，值班主任向小冀又进一步了解了卫生部的要求，立即跑去请示首长。首长指示：全力支援，要办得又快又好！于是，像开始了一场战斗一样，有关人员各就各位，研究航线，研究空投，向部队发出命令……这一切都办得十分神速，这一切都贯注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都贯注着对人民极其深沉的爱！

阶级友爱，情深似海。在我们中间，一个人发生困难，就有上百、上千、上万个素不相识的人，热切地向你伸出手，不遗余力地帮助你……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从首都广安门外到八面槽的遥远路途中，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川(原文：穿)流不息的车辆，走过大街走小巷，一位三十来岁的工人，正冒着数九天的寒风，拼命地蹬着一辆载货自行车飞驰。

“同志们，闪道，闪闪道！”

他不断地向行人呼喊着。这车上拉的就是“二巯基丙醇”。骑车的叫王英浦，是位先进工作者。你看，他把车轮蹬得飞转，三十华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就赶来了。干嘛要从三十里外运药来？这其中还有段小故事：

这“二巯基丙醇”，原本是由国外进口的，算是一种稀有药品。可是去年大跃进中，我们的国营上海第一制药厂的工人，创造性地揭开了它的秘密，现在已能大量生产供应了。它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它的身价，已经从特种药品降为普通药品，所以特药商店刚刚把它送到库房去，准备发往各地普通医药公司经售。谁知现在又突然需要它，因此又拉了它回来。

且说王英浦这时正喘吁吁地把药品搬进屋来，大家忽地围住他：

“老王，你真是两条神仙腿呀！”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我们的特种药品商店里，党支部书记田忱和共产党员何思鲁，正拿着电筒，伏在地图上，照啊，找啊，他们干什么呢？屋里明明亮着太阳灯，往常，针掉到地上都可以找到，可是今天却怎么也不够亮，噢，他们在找：平陆在哪？他们在想：到底如何运送？这些，迄今还都是悬案！

正在这急死人的节骨眼上，卫生部又来了电话：

“空军已热情支援，保证今夜把药品空投到平陆县城！请你们快把一千支药品装进木箱，箱外要装上发光设备……”

有飞机啦！人们的心眼里，真像是久旱逢甘雨，兴奋得都跳起来了！但紧跟着又是一个困难：这发光设备可怎么解决呢？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时间，一秒，一分，……一闪而过。现在距离四日清晨已经没几个小时了。

在张村公社医院里，空气仍然异常紧张！张村公社的社员们，给自己的弟兄送来了大

量豆腐、粉条、蔬菜、糖、细粮……这些东西堆在那里，有谁能吃呢？我们的弟兄还在危险中！山西省人民医院、临汾人民医院在听到这项紧急消息后，也都迅速派来了医生。现在，四十多位医护人员，头上冒着一串串的汗珠，他们已经二十来个小时没合眼，为了延续这六十一条生命，土法、洋方，各式各样的招，都使尽了，可是病人还不见有何好转！！

突然有人报告："同志们，县委来电话说，中央已决定今晚派飞机送药来！"

这是真的么？是真的！病人们那绝望的眼神，忽地亮了，人人的眼里，都饱含着无限感激的热泪……

现在，时间将近晚上七点

特药商店里，药品箱都快装好了，可是发光设备却还没个着落。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猛地把辫子一甩说：

"我找五洲电料行去！"这人名叫李玉桥。

她飞也似地来到了五光十色的五洲电料行。吓，这里真是顾客盈门，共青团员贺宜安在忙着给顾客拿这拿那。李玉桥简短地把情况跟小贺说完，问他：

"给你三十分钟，能不能办好？"

"放心吧，李大姐，坚决保证！"

李玉桥帮他搞营业，小贺抬腿就去找人。半路上正好碰见了王明德，小王是北京市的先进生产者，更是一位热心肠的小伙子。他俩急中生智，连跑带研究，真是一个踉跄一个智慧，他们想用四节电池焊在一起，接上灯泡，可亮半个多小时；又研究出用十六节电池、四个灯泡，把药箱的四面都装上灯，空投落地时，这一面的摔灭了，保险那几面的还亮着。说着说着，他们就干起来了。这时，正好门市部主任老杨从外面开会回来，一听说这是急事，也帮他们忙活起来。过了一会，李玉桥又来催：

"时间紧迫，不能超过三分钟啦！"

"我们保证两分半钟就弄好！"

果真，李玉桥头脚走回商店，小王就带着焊好的发光设备，一溜风地踩着她的脚跟，也钻了进来，真是二分半钟啊！

现在，是七点半钟以后

一辆胜利牌小轿车，从卫生部大门里急驰出来，奔向特药商店。

车子来了。这时候，正像老何事后所描绘的：也不知那一箱子药品，到底是怎么拿出去的。只见大家一拥而上，生怕误了一分一秒的时间，生怕有个拿不住摔到地上，许多只手擎着这一千支"二巯基丙醇"，挤出商店的那狭小的门，轻轻地把它放在胜利牌小轿车最好

的席位上！

胜利牌轿车载着一千支“二巯基丙醇”，正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在静谧的京郊林荫大道上，响着喇叭，箭也似地向机场疾驰。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平陆县邮政局的电话铃声一阵疾响。从下午三点开始，平陆——北京的长途电话已经成为一条极为敏捷的专线，这电话又是空军领导机关打来的。亲自守护在电话机旁的邮政局长董鸿亮同志，忙把电话接到县委会。郝书记接过电话，只听见：

“请赶快物色一块平坦地带，要离河道远些准备四堆柴草。飞机一到，马上点火，做为空投标志！”

“好！立即准备！”

于是，书记、县长亲自指挥，有线广播站里传出来了最宏亮声音，向县城附近的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向几千几万群众，发出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最紧急的号召。声音所到之处，正在学习拼音文字的干部们，撂下了书本跑出来，学生们从温课的教室里涌出来，老人们拄着拐杖走出来，新婚夫妇从温暖的新房中走出来，建设局的工人们，拖着废木碎柴往城外空地上跑；圣人涧那面的山坡上，又有一大群红旗公社的男女社员，抱着大捆大捆的棉柴芦苇，向这块平坦地势上奔来……

眨眼间，岗尖岗尖的四大堆柴草已经准备好了！

几千人林立在这块名叫“圣人涧”的空地上。人们满怀急不可耐的激动心情，向茫茫的夜空，向东北方向，不，向我们伟大的首都，了望着，了望着；人们的心早已经穿过了云层！曾经在部队上做过通讯工作的孙治勤同志，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凭着他的经验，凭着他一双能听出十里以外的耳朵，倾听着飞机的动静……

这是一场共产主义风格大发扬的胜利战斗。舍己为人、友爱互助精神万岁！

现在，是夜里九点零三分

北京，繁星满天。一架军用运输机，满载首都人民的深情厚谊，冲向银光闪闪的夜空，向西南方向风驰电掣地飞去。卫生部的陈寅卿同志随机前往。

这是一次十分困难的飞行。夜间空投，在平陆空投场没有地面指挥和对空联络的情况下，加上地形复杂，山峦重重，空投的又是水剂药品，而且要保证做到万无一失。……部队领导对这次空投任务极为重视，政委、大队长、参谋长亲自研究，特别选派了最有经验的机长、领航长、通讯长和机械师，并且是一架飞机，派了两个机组同时前往。就在起飞之前，他们还选择了最好的降落伞，把药箱加了重，一切都筹划得最有把握，大家满怀着信心。

一个飞行员十分激动地请求机长:“为了使药箱确保及时送到,我请求批准我跟着药箱一起下去!”

机长说:“首长已经指示,人不要下去,我们要保证把药品准确投到!”

现在,我们的雄鹰正在高速航行。下面是茫茫大地,祖国到处是不夜城,繁星与万家灯火交相辉映,这时候,有多少人,还在辛勤地为祖国劳动着!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二十三分

“请平陆准备! 准备! 飞机再有七分钟就到你县,马上点火!”

董局长把这空军领导机关的电话通知,立刻传给守候飞机的人群,不知是谁,向每堆柴草上泼了一些煤油,火苗冲天而起,大火把天空和大地都照红了!

这时,飞机已越过黄河,来到平陆上空。现在飞机的高度是二千七百米,为了空投的准确,必须降低,越低越准! 机长周连珊压了压操纵杆,飞机迅速下降,二千、一千五、一千……五百米,巍峨的山影从机身旁掠过,好危险哪! 这是一场勇敢加技术的搏斗!

飞机上的全部人员,双眼睁得彪圆,心情极不平静! 机长突然兴奋地命令:

“准备空投!”

保伞员、机械师还有小陈,早就把药箱上的电灯接亮了,只听电铃一响,他们嗖地一声准确地把药箱推出机舱,一千支“二巯基丙醇”带着降落伞,向预定空投地点坠下去,坠下去! ……由县委打电话向北京求援,到神药从天而降,这其中牵动了多少单位,牵动了多少人,可是这全部复杂辗转的过程,却只用了八个多小时,这是多么惊人的高速度!

我们不是常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么,这一箱从天而降的神药啊,盛满了首都无数人的最美好的感情,它比泰山还重!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在平陆县城外的圣人涧,四大堆火越烧越旺。人流如春潮,数不清的手电光点缀着夜空,活像国庆夜首都天安门的探照灯光。郝书记、郭县长等都亲赴现场来了。

“看,天上有个亮灯下来了!”突然谁叫。

“那是降落伞,那是神药!”

几千双手高高地举起来,谁都想把这一箱药擎住! 人们向飞机、向降落伞此起彼伏的欢呼!

降落伞带着闪闪的亮灯向下飘落! 人流追踪着降落伞飘落,跑啊! 跑啊! 郭逢恒县长向降落伞跑去,劈面碰见了蒲剧演员杨果娃,这是个 16 岁的女孩,唱小旦的。她的脸上还抹着红红的粉,戏装也没卸,全是舞台上那个打扮呢!

“果娃！你怎么也跑来啦？”郭县长问她。

“看戏的人都来啦，我怎么不来，来接毛主席送来的神药哇！”说着她又赶忙向降落伞跑去。

降落伞带着药箱安全地着陆了，安在药箱四角的电灯闪闪地亮着，寨头管理区的社员最先抱住了药箱！几千人簇拥着这一箱药，你刚扛了两步，他抢过去又扛在肩上……

交通局派来的一辆最好的汽车，最好的司机沈宽亮，早已等在县委会门口。药箱放在车上，车就大开油门，向五十里外的张村医院飞奔。俗话说：平陆不平沟三千，这里的山路狭窄崎岖，极端难行，汽车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抛锚。沈宽亮早把汽车做了最好的检修，可是他还在想：

“万一出了毛病，我就扛着它送去！”

2月3日，深夜

盼！盼！——在张村公社医院的大门口，社员们，医护人员们正焦急地盼望着……

汽车开来了！——好！

马上拿下药箱，

马上注射。

注射剂十分灵效，立竿见影，病人立时止住了疼痛，恢复了神智。医生原来规定，药品不能迟于四日黎明找到，但这药品却在黎明之前就送到了。我们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化险为夷了。他们新的更强壮的生命，是党给予的，是同志们用阶级友爱救活的。狂喜从人们的心底里迸发出来……

不仅仅是这六十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不，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党用它思想的阳光，帮助我们消除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思想毒菌，抚育我们成为全新的人。

2月5日

红日高照，春光灿烂。

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郭逢恒及县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代表县委会和全县人民，率领着县文工团，携带着慰问品，来到了张村公社医院。他们亲自到床边抚慰病人。郭县长见病人已恢复了健康，打心眼里高兴。民工们紧紧地拉住了郭县长的手，不知说啥是好。

民工周满禄，眼眶里噙满滚热的泪，他说：

“万恶的日本鬼子打瞎了咱一只眼，没人管；国民党阎老西杀了咱多少人，苦水往肚里咽！今天，咱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中央就派飞机救咱们，党和毛主席真是咱贴心的人啊！”

张店公社的老汉吴进喜，从八十里外赶来看他的儿子吴广新。这时他激动得浑身抖

动，拉着儿子：

“小子，在咱这偏僻山沟子里，我想你是没救啦！谁想毛主席在北京比咱老汉还关心我儿！小子，毛主席才真是你的亲爹娘！”

当场，大家都再也躺不住，纷纷爬起来，向郭县长请求：

“为了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首都人民的支援，我们明天就上工！”

郭县长慰抚他们说：“你们要听党的话，好好休息几天！”

第一连连长怎么也按不住心里的那股冲劲，攥着两只粗大的拳头，代表全连的民工向郭县长表示：

“我们一连全体向党和毛主席保证：鼓起最大干劲，把第三连的工全部包下来！”

紧跟着，大家在公社医院的里里外外，在工地上，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表决心；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更像雪片般飞来……

民工们真是说到做到，他们一上工，就由过去每天挖十五方土，增加到挖三十方，工效提高一倍。有的人，更是一天干了三天的活！大家决心提前三个月修好这条支援三门峡伟大建设工程的公路，无数的奇迹在创造着！……

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筑路民工，不，十二万平陆人，不，六亿五千万中国人，人人心里都燃着一团烈火，这团烈火越烧越旺：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沉热爱，化做无穷无尽的力量，人们正在用它加速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干劲冲天地、高速度地建设她吧，这是咱们的靠山，这是咱们永远幸福的保证！

北京晚报·林白水之死[1]

马南邨(邓拓)

【题解】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在其副刊《五色土》上开辟杂文专栏《燕山夜话》,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先后发表杂文152篇。这些文章旁征博引,引人入胜,融知识性和思想性于一体,集结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广为流传。邓拓,名记者、名报人。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以"八匹骡子办报"著称。1949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1957年,当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文科院士)。"文革"初期,因"三家村"冤案不幸辞世。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这封来信对于林白水的为人和被害的原因,都提出了询问。来信人写道:

"辛亥革命以后,报馆的主笔如林白水,他被杀死是不是由于他反抗军阀、主持正义呢?我不大明白真相。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呢?希望你能把他的不白之冤,公之世人,使死者在地下也能含笑长眠。我曾亲眼看见林白水死后陈尸天桥。这样的惨死在当时还不止他一人。"

据我所知,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少泉,又名万里,号宣樊,笔名有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晚年又号白水,福州人。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

[1] 《北京晚报》,1962年8月26日"燕山夜话"专栏。

代表人物。

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〇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〇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到处写文章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而且进行了其他的实际行动。例如，当时清朝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主张把中国主权出卖给外国人，当他路经上海的时候，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和万福华谋刺之于"一枝春酒馆"。据说，林白水也参加了那一次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他看到行刺不中，急速跑进四马路的梅福里，将情况报告给黄克强等人，立即转移，才免于被捕。虽然，这种脱离群众的暗杀行为，并不值得称道，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毕竟也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促使的。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一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那末，他后来为什么被杀了呢？原来当鲁系军阀头子张宗昌统治北京的期间，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人是清朝的举人出身，诡计多端，为鲁系军阀的策士，特别为张宗昌所器重，当时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在许多场合对潘复大加讽刺，有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把这个"智囊"叫做"肾囊"。潘复阅报大怒，派了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社，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就被逮捕了。潘复下令立即将林白水押至天桥南大道枪毙。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这不过是张宗昌、潘复之流的军阀、官僚反动统治的无数罪证之一罢了。

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

新华社·伟大的战士雷锋[1]

新华社记者

【题解】1962 年,“伟大的战士”雷锋不幸因公殉职,年仅 22 岁。翌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从此,憎爱分明、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以及雷峰精神,便成为新社会的道德楷模,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新中国的社会风尚。新华社记者撰写的这篇人物通讯,以翔实的材料和饱满的感情,展现了雷锋的成长历程和光辉事迹,呈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班长、五好战士雷锋,以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广大青年正在传诵着雷锋同志生前的事迹,广泛地开展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

雷锋 1940 年 11 月诞生在湖南长沙县(原望城县)一个贫农家里。自幼成为孤儿,饱受饥寒交迫之苦;解放后,党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他对敌人——压迫者和剥削者怀着刻骨仇恨,十岁就参加了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十六岁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二十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在党的教育下,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永不忘本;他事事以党的利益为重,处处从革命需要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艰苦朴素,克勤克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严格要求锻炼自己,好学上进。1962 年 8 月 15 日,他不幸因公殉职。

雷锋的童年是一部血泪史。四岁时日本侵略者杀害了他的父亲,剩下了母子四人。不满十二岁的哥哥在工厂当徒工,机器轧断了胳膊,被资本家踢出工厂,活活疼死在妈妈怀里。小弟弟又饿死在床上。妈妈带着他忍气吞声到一个姓谭的地主家里当了佣人,不料又被地主奸污,饮恨悬梁自尽。雷锋这个六岁孤儿就给地主当了猪倌,住的是猪栏,吃的是霉米。冬天同猪崽挤在一起,偎着母猪肚子取暖。一天,他打了地主的狗,被地主在左手上连砍三刀,赶了出来。小小的雷锋开始了悲惨的流浪生活。有时进山砍柴到村中换碗饭吃,有时乞讨度日,夏天蚊虫咬烂了全身,冬天在破庙里冻得难熬,连续两年的非人生活,把他

[1] 新华社沈阳 1963 年 2 月 6 日电。

折磨得瘦骨嶙峋，满身脓疮，濒临死亡。

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故乡解放了。农会主席，后来的人民政府乡长彭德茂，在破庙里找到了他，送他进医院，治好了满身的脓疮。当彭德茂接他出院，给他换新衣服的时候，他热泪盈眶地叫彭德茂“救命恩人”！彭德茂告诉他：“我们的救命恩人是毛主席，是共产党，是解放军。”从此，雷锋苦尽甜来。他怀着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深仇大恨，投入反封建的斗争，用被地主砍伤的手，揪着害死妈妈的恶霸地主问罪。他亲眼看到人民政府枪决了那个地主，为他、为千万个穷人报了仇。

人民政府和农会免费供雷锋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先学会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第一批参加了少年儿童队，带上了红领巾。他热心帮助同学，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有时还给学校砍柴，成了一名好学生。1956 年，当他的家乡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十六岁的雷锋激动地从学校走上了农业生产第一线。他先当了记工员，以后又当了会计。他常常白天和社员们一块下地干活，晚上休息时间记账，把账管理得有条有理。不久，他被调到中共望城县委会当公务员，县委书记很关心他，时常给他讲共产党员和革命先烈的故事。有一次，讲到一个共产党员被捕后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却宁死不屈。雷锋十分感动，他说：“我也要做这种人。”在党组织和县委书记的教育下，雷锋进步很快。1957 年，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县委决定在团山湖开办一个农场，组织上调雷锋去学开拖拉机，他学习了几个月，就成了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1958 年秋天，鞍钢派人到湖南招收工人。渴望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的雷锋，又报名到了鞍山，驾起了推土机。他驾驶的“斯大林八十号”，车大体高。一位老师傅怕累坏了他，要给他换个小型机车。他说：“开大车干大活，再困难我也能够克服。”不久，鞍钢为了发展生产，化工总厂要扩建新厂，动员一批工人去搞基本建设，他又第一个报了名。有人对他说，那里吃没好吃的，住没好住的，劝他不要去。他听了很生气，回答说：“正因为那里是这样，我才情愿去！”在工地上，他一直是什么活重干什么，而且干得都很出色。在鞍钢一年多，他三次被评为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十八次被评为标兵，五次被评为红旗手，出席过鞍山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几句话：“一滴水只有放在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经过工人阶级队伍的锻炼，他的视野更宽阔了，革命责任感更强烈了。1959 年 12 月 3 日，他听了征兵报告之后，第二天一早，就到征兵站报名应征。检查身体时，他的身高、体重都不合格。当医生又发现他身上有许多伤疤的时候，他流着眼泪跟医生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他说：“记起过去的仇恨，我非参军不可。”医生很同情他，要他到兵役局谈谈。他找到来接新战士的荆营长，诉说了自己过去的一切。他说：“想起过去，想到咱们国家周围还有美帝国主义，我的心就催促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他讲着讲着哭了，荆营长也流下了眼泪，收下了这个新兵。

入伍第一天，雷锋在新日记本的第一页上贴上了黄继光的照片。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热情倾泻地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和誓言："渴望已久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想实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的心就像大海的浪涛一样，好久不能平静。我，一个在旧社会受苦受罪的流浪孤儿、放猪娃娃，居然成为一个国防军战士——我真不知说什么好……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和期望……克服一切困难，发扬长辈的革命优良传统，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投降。我一定要向董存瑞、黄继光、安业民等英雄的战士学习。我一定要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好战士。我要把我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军事训练开始了。练手榴弹掷远，雷锋费了全身力气也达不到标准。他练得胳膊肿了，还不及格。这时候，指导员给他看了报上登的一篇讲向困难作斗争的文章，并且鼓励他只要认真体会投弹要领，继续勤学苦练，一定能练好。当夜，同志们都睡了，他悄悄到操场上，迎着北风，忍着胳膊疼，拼着全身的力气，投了又投。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浑身骨节像针扎似的疼。可是，第二天拂晓，他又悄悄地爬起来，向操场奔去，到了实弹打靶时，终于取得了优异成绩。他就是这样不管严冬盛夏，一直以坚强的意志，苦练着杀敌本领。

在党的教育下，雷锋更快地成长起来了。在他入伍十个月之后的十一月八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入了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哪怕高山、大海、巨川。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火海进刀山，我甘心情愿，头断骨粉，身红心赤，永远不变。"雷锋入党以后，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1961 年 6 月，他当了班长，他所领导的班一直保持了四好班的荣誉。他总觉得身上有用不完的劲，不满足于仅仅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连队里的各项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当俱乐部的学习委员，热心地帮助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买书、借书给大家看，用开饭时间给大家读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事；文化学习时，他主动请求担任兼职教员，在业余时间备课，批改作业；学习驾驶和保养汽车的技术时，他又当上了技术学习小组长；连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教大家唱歌；他利用午休，跑到理发馆去学会了手艺，抽空给大家理发。他还当了驻地附近小学的少年先锋队辅导员，经常利用节日、假日和休息时间给孩子们讲自己悲惨的童年和革命故事。对他来说，工作越多越好，只要是对党、对人民、对同志有利的事，他都热情地去做。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辛苦一点，多帮助别人做点好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战士乔安山的母亲病了，请假回家探亲。他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钱，买了一包饼干把乔安山送到火车站。当乔安山回到家中，打开饼干包给母亲吃时，发现里面还放着十元钱。全家人都为班长的一片热心万分感动。一天晚上紧急集合，战士韩玉臣的棉裤被汽车电瓶里的硫酸烧了个窟窿，回来后，人很累，他倒下就睡着了。雷锋却拆下自己的帽里子给他把破洞补起来，补完又轻轻地盖在韩玉臣身上。一个星期天，该轮到他休息，他自己的事一点没做，却给班里的同志洗了五床褥单，帮一个战士补了一床被子，又帮助炊事班洗了六百斤大白菜，还打扫了室内的卫生。

春节，雷锋想到了服务行业的职工们，他对连长说："每逢过年过节他们最忙，我去给他们帮忙吧！"连长同意后，他直奔火车站。正好一列火车进站，他见一位老太太包袱重，走得慢，急忙跑过去，接过老太太的包袱扶她上了车，又给她找好了座位。车开走了，他又到候车室扫地，给旅客倒水喝……另一天，他外出到沈阳换车，看到一位从山东来的妇女，急着要到吉林探亲，可是车票丢了，他二话没说，掏出钱给这位妇女买了车票，又带她上了车。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疼，到卫生连看病回来路过一个建筑工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吸引了他。他跑到推砖场，推起一辆小车就干起来，完全把自己的病忘掉了。这天晚上，工地上的工人们敲锣打鼓，给连部送来一张表扬他的大字报。这时，大家才知道雷锋参加了义务劳动。

雷锋没有个人打算，他所打算的是国家和集体的事，又全都从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做起。按规定部队每年发两套军服，而他从 1961 年连续两年却只领一套，他说："一套就够穿了，破了可以补一补，给国家能省一点是一点。"他用的脸盆，漱口杯很多地方的瓷都脱落了，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几乎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他平常除买点牙膏、肥皂和学习用品以外，一个钱也舍不得花，全都存到银行里。可是，同志们有了困难，他就拿出来了。当抚顺市望花区成立人民公社时，他把自己的全部存款二百元钱都取出来，送给了这个公社，公社同志不肯收，经他再三要求，收下了一百元。当他听说辽阳遭受水灾的时候，又把公社退给他的一百元寄给了辽阳市。有人说他是"傻子"。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祖国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

雷锋总是以最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随时随地探索革命的道理，拿最先进的人物做自己的榜样。他孜孜以求地学习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安业民、杜凤瑞等的英雄事迹，从他们身上吸取精神力量。雷锋所以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做到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有个书包，里边装的全是毛主席的书。他是汽车兵，经常在外边执勤，这个书包便成了他的无价之宝。几年来，他抓紧一切时间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其中许多文章他反复阅读过许多遍。他说："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在他读过的毛主席著作上，都圈画了学习重点，写下了学习感想、心得和体会。例如：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里，他用红铅笔圈画了这段话："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雷锋又用蓝铅笔把这段话逐字地划上符号，并且注上"牢记"两个字。毛主席的著作给了他无限力量。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懂得了不少道理，脑子里一豁亮，越干越有劲，总觉得这股劲永远也使不败。"

雷锋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他所做的都是一件件平凡的事情。就在这些平凡

的事情中，表现了他那高贵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品德。党表扬了他，给了他荣誉。他入伍不到三年，荣立了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节约标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于 1961 年 1 月发出了关于学习雷锋同志的通报；沈阳部队工程兵党委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的称号。他出席过沈阳部队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还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起来。1962 年 8 月 10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又认真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著作，其中有两句话对我教育最深，主席教导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过去我在一切言论和行动中按主席的教导做了，因此我进步了；现在，我仍然牢记了主席的这一教导，坚决努力，要求自己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就在这以后的第五天——8 月 15 日，雷锋同志出车刚刚回来，等不到休息就要把车子开出车场去进行保养，他站在泥泞而狭窄的路上指挥助手倒车，不料车子拐弯打滑，后轮碰倒一根木杆子，恰好砸在雷锋的头部，当场出血晕倒，经急救无效，不幸牺牲。雷锋同志因公殉职的消息，引起了全军指战员和广大青年的无限悲痛，但是他的伟大的普通一兵的光辉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正如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题辞中说的："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一厘钱”精神[1]

李峰、余辉音

【题解】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63年，新华社发表通讯《“一厘钱”精神》，提醒人们在经济好转的情况下保持勤俭节约的精神。通讯以“一厘钱”、“一分钟”、“一根火柴”、“一个真理”为题，选取不同角度的生动实例，逐步深化主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一厘钱，最勤俭的家庭也早已不放在眼里，可是却有手经百万元的厂长、会计、供销人员和长年给国家创造财富的工人，为少花一厘钱，给国家多积攒一厘钱，算盘打了又打，潜力挖了又挖。

这儿写的，都是工业生产中的这类一鳞半爪。但是，它闪烁着社会主义建设真理的火花。

一 厘 钱

用过高级“北京墨水”的人，也许以为，制造这种第一流墨水的费用，会比包装费用大得多。其实相反，包装墨水的费用比制造墨水的费用大三倍。因此，要当好墨水厂这个家，给国家多积累资金，大头是降低包装材料的成本。可是墨水不能不用瓶装，商标不能不贴，纸盒不能不用。而且还要分量准，包得牢，外观美。更难的是，这些包装材料，墨水厂不产，全靠外厂加工。一个小小的墨水瓶盖，去年是由北京、太原和淮阴等地的十一个工厂加工的，今年还要六个厂加工。墨水瓶盖里面的纸垫，也要由上海生产。如果北京墨水厂说自己无法降低成本，那也很难怪它，可是这家工厂的包装成本，去年减少了，今年又减少了。

他们是用珍惜“一厘钱”的精神减少的。

那是在去年春天，厂长李健刚提请党支部委员会讨论他打算在全厂提出的一个口号：

[1] 新华社北京1963年3月23日电。

每件包装材料降低一厘钱。

为什么提降低一厘钱呢？我们将在最后回答。

厂长的提议被支委会通过了，接着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正式提出。于是全厂行动起来了。

管瓶盖的供应人员，把十一个制造瓶盖厂的代表请来，把十一个厂造的瓶盖摆出来，把天津造，上海造，美国造，德国造的墨水瓶盖也摆出来，同各厂代表一起，比质量，称重量，算成本，评美观。他们把十一个厂瓶盖的十七项费用指标排成队，逐项比较，精密计算，彼此取长补短。这些似乎是“份外”的工作，促使一些厂把瓶盖的成本降低了，全厂购买每个瓶盖就少花了四厘多钱。就在这小小的瓶盖上，去年节约了十万元！

管纸盒的孙树德，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摊开一大张纸，拿来一个印好未糊的装墨水瓶的盒，左比右量。他眼前出现了希望：几年来只裁十五个盒的那种纸，有可能再多出一个。他抱着这种希望到东家印纸盒的工厂，找工人商量；到西家印纸盒的工厂，向厂长“游说”。他的希望在四个月前终于变成了现实。原来每张纸裁十五个纸盒，要废掉一小块。经过他和工人们研究改了裁纸方法，每个盒盖插进盒里的那个“舌头”比原先短一韭菜叶，一张纸就多出了一个盒。这样，每个盒的纸张费用就减少了一厘钱，全厂一个月节省了八令纸，不！还有，裁盒方法一改，印盒效率也提高了，每个盒的印刷费用又因此从刀缝里减少了一厘五毫钱。一年要用近两千万盒呢！

厂长也早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设了“关卡”。他告诉回收废瓶子的老人，发现废瓶中有好瓶，要立刻向他报告。一天，那老人果然在车间交回去的废瓶中发现有两个好瓶子，忙去报告了厂长。厂长立刻叫上班组长，叫上科室人员，来到现场。他拿起那两个瓶子说：“丢一个瓶子国家损失六分钱，没人拣，为什么自己掉个一分钱的小‘钢崩’、就赶紧拣起来呢？”这种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真能打动人心，从此瓶子的损失率大大下降了。

工人和参加辅助工作的工人家属也行动起来了！常用北京墨水的人，你也许没有留意，在瓶盖同盖里涂有蜡和蓝漆的纸垫之间，还有个小小的黄纸片。每个纸片才值一厘一毫钱。过去垫这个纸垫的工人家属和管理纸垫的人员领发无数，丢多少不知，计成本照例按百分之十的损失算账。现在，她们手缝里掉下一片，也要拣起来，遇到废片，也交回工厂。

“一厘钱”精神，使北京墨水厂改变了原来的亏本状况，为国家积累了大批资金。“一厘钱”的精神，也在有关工厂发生了连锁反应。如果这种精神在全国每个企业都发生连锁反应，该能为国家积累多少资金啊！

一　分　钟

时间是财富中最贵重的财富。劝人们珍惜岁月的人，曾用古今中外伟人名家爱惜时间的范例和训导，写成过各种各样的”时间篇”。

我们在北京市制药二厂，看到了普通工人用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写成的“时间篇”。这也可以说是利用工时的“一厘钱”精神。

这是一个原有二十七个人的包装组。如果说这些工人和最普通的工人也有点不同，那就是“啰嗦事”多。全组有二十五个是女工。她们之中有二十一人是一至七个孩子的母亲。全组女工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们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她们诙谐地自称是“老太婆”组。曾有一个时期，她们组的缺勤情况在全车间占“优势”。这算是这个“时间篇”的背景材料吧！

从去年四月开展创财富竞赛起，情况不同了。职工们算了个账，如果每人浪费一分钟，这一分钟不仅没有给国家创造财富，还给国家浪费三分钱（包括设备水电等各种消耗和工资开支）。这么一来，像一厘钱那样不被人放在眼里的一分钟，在工人们心里，同个人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发生了联系。

全组为充分利用每一分钟而动员起来了。

那位组长共产党员赵玉珍，同工人们商量，建立了工时利用账。她们用这个观测全组工时潜力的“显微镜”一看，全组每天占用非生产时间的名目有十几种。赵玉珍根据这种观测，改进了生产的组织工作。工人生产的潜力常和思想、生活相连。星期天，她又常出现在家务事多的姊妹们家里，谈谈私下里话，帮助安排安排生活，巩固小组的“后方”。

那位做事不吭声的李庆珍，家离工厂远，坐汽车也得走四十分钟。可是无论刮风下雨或奇冷天，她总是第一个到车间，把全组用的浆糊调拌好，把包装纸、说明书摆在每个人的工作台上，把地下扫干净，为的是每个人每天多利用几分钟。

那位七个孩子的妈妈江玉华，家庭收入少，家务事情多，可是她安排得巧，每天也总是坐在工作岗位上听着上班的铃声响。

那位钉箱男工刘凤祥，任务是往装满药品的木箱上封口钉钉子。他钉完钉子，就给全组当义务服务员。这个要喝冷汽水，他去拿，那个要喝茶，他到茶炉上去冲，为的是让每个人多利用停工取水的三两分钟。印好字的药瓶供不上包装了，包装工人也不再等，主动给印字的人当辅助工。印字工人上厕所了，包装工人也赶紧接过机器，不让机器停。

一分钟长短对谁都一样，可是每人每分钟如何使用不相同，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也不同，关键在劳动的态度和技能。从去年四月起，赵玉珍小组每月出勤率最低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全组多数工人的技术也有了提高。今天，她们的每一分钟比过去的每一分钟就“长”多了。同样的设备同样多的任务，原来二十七个人干，现在十八个人干，多数人月月还拿超额奖。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大厦归根结底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盖起来，那么像赵玉珍小组，领导者用一分钟这个时间概念去组织生产，劳动者用一分钟这个概念计算自己的劳动，这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起点。

一 根 火 柴

北京火柴厂第一季度有一个奋斗目标：每盒火柴里减少一根废火柴。这件事又是“一厘钱”精神在提高产品质量领域里的再现。

一根废火柴(工厂叫废支)的标准有八条：无头、小头、破头、双头、半支、牙签，等等。在北京火柴厂，一根火柴从它的母胎大树里脱生出来，要经过三个车间，四十多道工序，走将近一里长的路程。机械化程度不高，木材又不理想，它每移动一步，每经过一道工序，都有出废支的可能。去年上半年，每盒火柴的废支曾达到百分之十左右。

于是，减少废支的严重斗争展开了。车间里，挂起了“为减少废支而奋斗”的大字标语，贴上了防止出废支的操作规程，时刻鼓舞和督促着工人。机器旁，增加了扫把，工人们不时清扫脚下，以减少踩断的火柴梗。主要工序设了关卡，警觉的质量检查员每小时都要抽查。下班了，工人们减少废支的心事还放不下，他们聚拢在一起，评比本班减少废支的成绩，检查生产中发生的问题。不利于减少废支的操作技术在改，不利于减少废支的设备也在革新。

减少废支的斗争并不只限于技术领域。排梗工段长陈凤林说，他们干的活，是把火柴梗排立在一块块的加板上，排一块板，拿一块板的钱。在以往，有的加板上火柴梗倒一片也没人管，为的是多拿计件工资。现在，加板上那三千支火柴梗倒几根，工人们就宁肯不拿这份工资，也要把整块板当“废品”剔出来，防止在下一段沾不上药头，出废支。一百多个装盒的女工也是“拿计件”。她们装一盒(一百支)火柴用五秒钟，剔出一根废支的时间同装一盒火柴的时间相比，当然就显得不太短。可是，每天下班时，她们手边那放废支的纸盒里，总是有五六百支。可以看出，党的思想工作在这场减少废支的斗争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这场斗争从去年七月持续到今年一月，每盒火柴的废支由十根左右减到了五根。这同轻工业部规定的两根半这个指标还相差一大段。厂里的干部也承认，他们还有不少工作要抓紧干。

斗争在继续着。二月中旬我们来厂访问的前两天，生产报表统计每盒废支的那一格里写的数字，已接近四根。

斗争不能不继续。接待我们的副厂长说：“每盒火柴多一根废支，全厂一年等于把几百万盒废木棍卖给了人民，这就有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拿国家的木材国家的钱，造出那么多废木棍，这又是个对国家资财的态度问题。”

何止一根火柴，每个人生产的产品，每个人做的工作，何尝没有这个问题！

一 个 真 理

平凡的事物常常包含着真理。正如北京墨水厂厂长李健刚所说：“一厘钱，是个精神，

因为工厂家业大，产品多，所以更要从小处打算盘。”是的，这是一种非常讲实际的精神，是能够动员所有群众行动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工厂、人民公社、商店和机关的理财之道，也是做好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理。不是吗？要实现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要有这种“一厘钱”精神，从节省一厘钱做起，从提高每一分钟的劳动效率做起，从提高每一件产品、每一项工作的质量做起。

“一厘钱”精神显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伟大的事业要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亲爱的读者，当你抱着雄心壮志要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你就从自己经管的一厘钱、一个产品和自己的每一分钟做起吧！

新华社·西藏木犁即将绝迹[1]

郭超人

【题解】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由于历史原因和资源条件限制，西藏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一直相对落后，木犁的长期使用就是真实写照。在国家支持和援助下，铁质农具开始源源入藏，西藏的耕作技术由此发生改观。1963 年，新华社记者郭超人以这篇报道，介绍了西藏农业的历史性飞跃。报道篇幅不长，但追古论今，详略得当，平稳凝重的叙述中蕴涵了深沉的思索。

在西藏土地上保持了多少世纪的木犁，现在即将绝迹，藏族农民普遍用铁制农具代替了这种极为落后的生产工具。这一巨大变化，标志着西藏在摧毁封建落后的农奴制度以后，农业生产力正发生历史性的飞跃。

到目前为止，国家已向西藏农民供应了七十多万件铁制农具。民主改革后在拉萨、昌都、日喀则、江孜、泽当和林芝等地新建的小型农具厂，每年也向农村输送数以万计的铁制农具。据西藏农业部门的调查，现在西藏农民不仅普遍使用铁犁铧，连镐、锄、铲等农具都已普遍改成铁质。

早在公元七世纪，炼铁术便传到了西藏，但由于农奴制度的束缚和缺乏钢铁，许多地方用木犁耕地和木制工具劳动的状况，一直继续到 1959 年民主改革以前。那时，许多农民劳动时在腰间插一把长刀，劳动一会儿，便把木制工具削一削，工效极低，耕作极其粗放。

在崇山起伏的林芝专区，10079 户农户中，民主改革前有铁制农具的农户不到 1/10。近四年来，国家通过商业部门把 46000 件铁犁铧、铁锄、铁铲等农具出售给农民。这里的农具厂还根据山区人民的生产习惯和山区地形、土质的特点，制作了两万多件经过某些改进的铁制农具，受到山区人民的欢迎。现在，这个专区平均每个农户有各种铁制农具 6 件以上。

在喜马拉雅山的勒布地区，4 年多以前还找不到一件铁制农具，人们长期用木棍撬土插种，西藏农奴主们把这里叫做“野人区”。现在由于国家大力扶助，这个地区 100 多农户

[1] 新华社拉萨 1963 年 11 月 17 日电。

都有铁犁铧，每户平均还有五件小型铁制农具。

随着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西藏农村的耕作技术发展了，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过去无力秋耕的地区，现在有的秋耕三四遍；过去没有中耕习惯的地区，现在也开始松土、锄草。许多过去亩产 100 斤粮食的土地，现在亩产 400 斤到 500 斤。西藏全区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在民主改革后的五年中增长了 25%以上。

人民日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节选）[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题解】20世纪中期，以苏共“二十大”及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为背景，中苏关系日趋恶化，最终双方就斯大林的错误、国际共运等问题爆发了一场大论战。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史称“九评”。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竟是要的什么花招呢？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

[1] 《人民日报》，1964年2月4日。

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他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列宁：《再论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页。）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辨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场大论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调动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新华社·两个蒙古族小姑娘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保护了羊群[1]

赵琦

【题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蒙古族小姑娘为保护公社羊群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的故事，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伴随新闻报道，她们的名字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从此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当时，“草原英雄小姐妹”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艺术作品，编入小学课本。另外，由刘德海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同管弦乐《红旗颂》（吕其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占豪、陈钢）、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交响诗《嘎达梅林》（辛沪光）以及音乐会组曲《红色娘子军》（吴祖强等）等，一同构成新中国最美的音乐篇章与红色经典。

在内蒙古北部草原上，最近有两个蒙古族小姑娘冒着暴风雪昼夜保护羊群，险些付出了生命。这两个小姑娘由于受到集体主义的教育，敢于舍己为公，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她们动人心弦的英雄事迹，在草原上到处传颂。

二月九日早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新宝力格公社蒙古族牧民吴添喜要外出帮人刷屋，没空放羊，他的十一周岁女儿龙梅和九周岁的玉荣便要求母亲允许她们出去放牧。临行时母亲再三嘱咐不要远走。龙梅、玉荣一心想把羊群放好，见附近牧草稀疏，就往远处走去。

翻过一座雪坡快到中午时，天气突然变化。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发出尖厉的吼声，卷着大片大片的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拼命逃窜。姐妹俩飞奔上前拦堵，可是羊群不听她们指挥，两人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很快便消失在无边的雪海中。

这时候，气温已降到零下三十七度。姐妹俩踏着深雪跟着羊群艰难地走着。妹妹玉荣的小脸已经冻肿了，但她依然倔强地跟着羊群奔跑。约摸走了三四个钟头，天色渐渐黑下来，不远处现出三间被雪封盖着的房子。姐妹俩担心社里羊群走散，一个也不愿进屋暖暖身子。两人商量好，当天夜里就住宿在野地里，决心不离开羊群。

[1] 新华社呼和浩特1964年3月11日电。

她们正跟着羊群继续前行，忽然发现一只母羊掉队，看样子快要冻死了。龙梅想背上羊走，背不动，放下吧，又心疼。“羊死了也得交到公社去。”她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把那只母羊放到一座高坡上，打算回去时再带走。

又走了一段路，风稍微减弱了些，两人把羊群拦在一片低洼地方，坐在雪地上休息，想等风雪平静下来再赶羊回家。这时，姐妹俩又看到一只老鹰爬在小羊身上，龙梅抡起羊叉子劈头一击，打死了想啄羊的饿鹰。由于极度的疲乏，姊妹俩慢慢阖上眼，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

深夜，雪时落时停。龙梅冻醒了。睁眼一看，羊群不见了，妹妹也不见了。她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叫玉荣，没有一点回声。她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怕天黑再走失散，就肩并着肩，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羊群继续前进。她们就是这样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经走出了七十多里。

第二天拂晓，北风怒吼，大雪纷飞，两个小姑娘依偎在石坡上酣睡着。

火车一声长鸣，龙梅被惊醒，她这才知道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便连忙喊醒玉荣。这时她忽然发现玉荣的一只毡靴丢了，光着的左脚插在雪里。十一岁的姐姐疼爱妹妹，刚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玉荣却颤抖着催促姐姐说：“羊又走远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快去拦羊，咱俩一起往回赶路呀。”这时龙梅的身子也冻僵了，她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往车站方向走去。

在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在风雪中看到一个蒙古族小姑娘艰难地跨过一道铁轨，浑身哆嗦着向他走来。他连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揉搓两只冻僵的手。刚进门的守车整备员张仁贞，看到这情况也急忙参加抢救。龙梅渐渐暖和一些，断断续续说：“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

张仁贞立即用电话通知值班员，接着铁路职工们便四处去寻找孩子。在同一个时间里，白云鄂博邮电局的职工又主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矿区党委书记巴彦都荣（蒙古族）。党委书记连忙找区长伍龙商量，决定火速组织力量救人。就在这个时候，许多机关工作人员闻讯赶来了；矿区卫生所副所长张培谦，背上药箱奔往车站；矿区粮食局的人们套上大车，装上草料，驰向茫茫雪野，抢救冻饿的羊群。

在同一个时刻，张仁贞、王振山已经越过两座雪坡，在离乱石坡不远处发现了俯伏在雪地里的小玉荣，她的下半身已经被雪盖住。张仁贞连忙上前轻轻拍掉孩子身上的浮雪，把她抱到怀里。两人急忙轮换背着玉荣跑回车站。

龙梅、玉荣那天出去放牧以后，她们的母亲呼达古娜一直放心不下。暴风雪来临时，呼达古娜心里越发不安，跑去找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单斯楞。单斯楞不在家，他的妻子阿迪娅听说龙梅、玉荣牧羊未回，便不顾自己的病还没有痊愈，连忙跳上一匹被狂风吹散的马，迎着狂暴的风雪向那无边无际的雪野飞驰而去，而且一路放声呼唤。

龙梅、玉荣和一群三百八十四只羊失踪的消息，惊动了生产队冬营地上的每一个牧民。

人们纷纷向着茫茫雪原奔去。可是，一昼夜过去了，两个孩子仍然不见踪影。人们对两个孩子不幸的遭遇，都感到痛心，孩子的妈妈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正在大家万分焦虑的时刻，公社党委书记龙涛骑马赶来告诉大家："两个孩子得救了，正在矿区医院里，三百八十四只羊仅仅冻死了三只。"牧民们闻讯之后，个个喜出望外。新宝力格公社干部立即骑马前去矿区医院慰问。在龙梅、玉荣住院期间，矿区党委还几次派汽车把她们的父母接来医院探望。老夫妻俩看到两个女儿得救，他们噙着激动的眼泪对医生们说："要是在旧社会，两个小闺女早就没命了，她们的生命是党和毛主席救活的。"

最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党委，通报表扬了这两个蒙古族小姑娘舍己为公的高尚风格。在白云鄂博矿区，学习小英雄的活动正在热烈展开。

新华社·大庆精神大庆人[1]

袁木、范荣康

【题解】袁木，原新华社记者，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兼发言人，著有《袁木文集》10卷等；范荣康，原《人民日报》记者、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兼职教授，著有《新闻评论学》等。1964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本文就是第一篇报道大庆石油会战的新闻，展现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抛掉贫油帽子奋力拼搏的事迹。《人民日报》"编后话"指出："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

列车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奔驰着。它掠过一片片田野，越过一条条河流，穿过一座座城市，把我们带到了向往已久的大庆。

大庆，不久前人们对她还很陌生。如今，人们在各种会议上，在促膝谈心时，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谈论着她，传颂着她。有机会去过大庆的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这个几年前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现在已经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石油企业；描述着大庆人那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没有经受过革命战争洗礼和艰苦岁月考验的年轻人说，到了大庆，更懂得了什么叫做革命。身经百战的将军们，赞誉大庆人"是一支穿着蓝制服的解放军"。在延安度过多年革命生涯的老同志，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说：到了大庆，好像又回到了延安，看到了延安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

我们来到大庆时，这里还是严冬季节。迎面闯进我们眼底的，是高耸入云的钻塔，一座座巨大的储油罐，一列列飞驰而去的运油列车，一排排架空电线和星罗棋布的油井。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现代化石油企业的壮丽图景。同它相对衬的，是一幢幢、一排排矮小的土房子。它们有的是油田领导机关和各级管理部门的办公室，有的是职工宿舍。夜晚，远处近处的采油井上，升起万点灯火，宛如天上的繁星；低矮的职工宿舍里，简朴的俱乐部里，不时传出阵阵欢乐的革命歌曲声，在沉寂的夜空中回荡。到过延安的同志们，看着眼前的一切，想到大庆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建设立下的大功，怎么能不联想起当年闪亮在

[1] 新华社大庆1964年4月19日电。

延水河边的窑洞灯火哩！

但是，对于大庆人说来，最艰苦的，还是创业伊始的年代。

那时候，建设者们在一片茫茫的大地上，哪里去找到一座藏身的房子啊！人们有的支起帐篷，有的架起活动板房，有的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丢弃了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有的人什么都找不到，他们劳动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大地上一躺，几十个人扯起一张篷布盖在身上。

霪雨连绵的季节到了。帐篷里，活动板房里，牛棚马厩里，到处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雨住了，里面还在滴滴嗒嗒。一夜之间，有的人床位挪动好几次，也找不到一处不漏雨的地方。有的人索性挤到一堆，合顶一块雨布，坐着睡一宿。第二天一早，积水把人们的鞋子都漂走了。

几场萧飒的秋风过后，带来了遮天盖地的鹅毛大雪。人们赶在冬天的前面，自己动手盖房子。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人，教授和学徒工，工程技术干部和炊事员，都一齐动起手来，挖土的挖土，打夯的打夯。没有工具的，排起队来用脚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垒起了几十万平方米土房子，度过了第一个严冬。

就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沉睡了千万年的大地上，到处可以听到向地层进军的机器轰鸣声，到处可以听到建设者们昂扬的歌声："石油工人硬骨头，哪里困难哪里走！"夜晚，在宿营地的篝火旁，人们热烈响应油田党委发出的第一号通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们朗读着，议论着，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组织油田的全部建设工作。没有电灯，没有温暖舒适的住房，甚至连桌椅板凳都没有，但是，人们那股学习的专注精神，却没有受到一丝一毫影响。

为了全国人民的远大理想

时间只过去了短短四年，如今，这里的面貌已发生根本变化。我们访问了许多最早来到的建设者，每当他们谈起当年艰苦创业的情景，语音里总是带着几分自豪，还带着对以往艰苦生活的无限怀念。他们说，大庆油田的建设工作，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如果不是坚信党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如果没有一股顶得住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闯劲，今天的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许多人还说，他们过去没有赶上吃草根、啃树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经受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考验，今天，到大庆参加油田建设，也为实现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远大理想吃一点苦，这是他们的光荣，是他们的幸福。

深深懂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个革命传统的伟大意义，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临危不惧，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而能把这些看做是光荣，是幸福！这，不正是大庆人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吗？

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老石油工人王进喜，大庆油田上有名的“铁人”，就是大庆人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

当年，这里有多少生活上的困难在等待着人们啊！但是，四十来岁的王进喜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奉调前往大庆油田时，他一不买穿的用的，二不买吃的喝的，把被褥衣物都交给火车托运，只把一套《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到了大庆，他一不问住哪里，二不问吃什么样的饭，头一句就问在哪里打井？接着，他马上就去查看工地，侦察线路。

钻机运到了，起重设备还没有运到。怎么办？他同工人们一起，人拉肩扛，把六十多吨重的全套钻井设备，一件件从火车上卸下来。他们的手上、肩上，磨起了血泡，没有人叫过一声苦。开钻了，一台钻机每天最少要用四五十吨水，当时的自来水管线还没有安装好。等吗？不。王进喜又带领全体职工，到一里多路以外的小湖里取水，保证钻井，这样艰苦地打下了第一口井。

无语的大地，复杂的地层，对于石油钻井工人来说，有时就好像难于驯服的怪物。王进喜领导的井队在打第二口井的时候，出现了一次井喷事故的迹象。如果发生井喷，就有可能把几十米高的井架通通吞进地层。当时，王进喜的一条腿受了伤，他还拄着双拐，在工地上指挥生产。在那紧急关头，他一面命令工人增加泥浆浓度和比重，采取各种措施压制井喷，一面毫不迟疑地抛掉双拐，扑通一声跳进泥浆池，拼命地用手和脚搅动，调匀泥浆。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搏斗过去了，井喷事故避免了，王进喜和另外两个跳进泥浆池的工人，皮肤上都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

那时候，王进喜住在工地附近一户老乡家里。房东老大娘提着一筐鸡蛋，到工地慰问钻井工人。她一眼看到王进喜，三脚两步跑上去，激动地说：“进喜啊进喜，你可真是个铁人！”

像王“铁人”这样的英雄人物，在大庆油田岂止一人！马德仁和段兴枝，也是两个出名的钻井队长。他们为了保证钻机正常运转，在最冷的天气里，下到泥浆池调制泥浆，全身衣服被泥水湿透，冻成了冰的铠甲。

薛国邦，油田上第一个采油队长。在祖国各地迫切需要石油的时候，他战胜了人们想象不到的许多困难，使大庆的首次原油列车顺利外运。

朱洪昌，一个工程队队长。为了保证供水工程赶上需要，他用双手捂着管道裂缝，堵住漏水，忍着灼伤的疼痛，让焊工在自己的手指边焊接。

奚华亭，维修队队长。在一次油罐着火的时候，他不顾粉身碎骨的危险，跳上罐顶，脱下棉衣，压灭猛烈的火焰，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

毛孝忠和萧全法，两个通讯工人，在狂风怒吼的夜晚，用自己的身体联接断了的电线，接通了紧急电话。

管子工许协祥等二十个勇士，在又闷又热的炎夏，钻进直径只比他们肩膀稍宽一点的一根根钢管，把总长四千八百米的输水管线，清扫得干干净净。

……

大庆人都贯注了革命精神，他们的确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历年来，在大庆油田，每年都评选出这样的英雄人物一万多名。

请想想看！在这样一支英雄队伍面前，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征服！

岩心和赤胆忠心

但是，大庆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不仅表现在他们能够顶得住任何艰难困苦，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够长期埋头苦干，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正是他们在同大自然作战的斗争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

在油田勘探和建设中，大庆人为了判明地下情况，每打一口井都要取全取准二十项资料和七十二个数据，保证一个不少，一个不错。

一天，三二四九钻井队的方永华班，正在从井下取岩心。一筒 6 米长的岩心，因为操作时稍不小心，有一小截掉到井底去了。

从地层中取出岩心来分析化验，是认识油田的一个重要方法。班长方永华，当时瞅着一小截岩心掉下井底，抱着岩心筒，一屁股坐在井场上，十分伤心。他说："岩心缺一寸，上级判断地层情况，就少了一分科学根据，多了一分困难。掉到井里的岩心取不上来，咱们就欠下了国家一笔债。"

工人们决心从极深的井底，把失落的岩心捞上来。队长劝他们回去休息，他们不回去。指导员把馒头、饺子送到井场，劝他们吃，他们说："任务不完成，吃饭睡觉都不香。"他们连续干了二十多个小时，终于把一筒完整的岩心取了出来。

这从深深的井筒中取上来的，哪里是什么岩心，简直是工人们对国家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啊！

几年来，就是用这样的精神，勘探工人、钻井工人和电测工人们，不分昼夜，准备齐全地从地下取出了各种资料的几十万个数据，取出了几十里长的岩心，测出了几万里长的各种地层曲线。地质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大量的第一性资料，进行了几十万次、几百万次、几千万次的分析、化验和计算。

想一想吧，是几十万次、几百万次、几千万次啊！那时候，大庆既没有像电子计算机这一类先进的计算设备，又要求数据绝对准确，如果没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没有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没有尊重实际的科学精神，这一切都可能做到吗？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觉、这种毅力、这种实事求是精神、这种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作风，在几万名大庆建设者的队伍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值得珍贵的既是继承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新的风气：他们事事严格认真，细致深入，一丝不苟。大庆人不论做什么工作，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我们要为油田建设负责一辈子！"

大庆的钻井工人们有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纪念日”——“难忘的四一九”。那是指1961年的4月19日。这一天以前，大庆人封掉了一口新打的油井。这口井，如果同老矿区的井比起来，已经不错了，照样可以出油，只是因为井斜度超过了他们提出的标准，原油采收率和油井寿命可能受到影响，建设者们含着泪，横着心，把它填死了。“四一九”这天，大庆人召开万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展开了以提高打井质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四一九”以后，这里的油井都打得笔直。最直的井，井斜只有零点六度，井底位移只有零点四米。打个比方说，这就等于一个人顺着一条直路走，走了一公里，偏差没有差过半米。

一二八四钻井队有一次打的一口油井，发生了质量不合格的事故。这个队的队长王润才和工友们，把油井套管从深深的地层中拔出来，逐节检查，研究发生事故的原因。他们终于发现，有一处套管的接箍，因为下套管前检查不严，变了形。后来，队长王润才就背上沉重的套管接箍，走遍广阔的油田，到每一个钻井队去现身说法，给全体钻井工人介绍发生质量事故的教训。

对油田建设负责一辈子的大庆人，用科学精神武装起来的大庆人，就是这样对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的。从那时以后，油田上打井因为套管接箍不好而造成质量事故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好作风必须从小处培养起”

不仅对待关系到整个石油企业命运的大事情如此严格，即使对待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也同样一丝不苟。大庆人说：“好作风必须从最小处培养起。”

今年春天，油田上召开了一次现场会。会场中央，端端正正放着十根十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梁。这些大梁表面光滑平整，根根长短粗细一致，即使最能挑剔的人，也找不出它们有什么毛病。但是，油田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却代表全体干部在会上检讨说，由于他们工作不深入，检查不严，这些大梁的少数地方，比规定的质量标准宽了五毫米。

五毫米，宽不过一个韭菜叶，值得为它兴师动众地开一次几百人的现场会吗？不，值得！大庆人性格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会上，工程师们检查了他们没有严格执行验收标准，关口把得不好；具体负责施工的干部和工人，检查了他们作风不严不细，操作技术不过硬。人们纷纷检查以后，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抄起铁铲，拿起磨石，把大梁上宽出五毫米的地方，一一铲掉，磨光。人们说：“咱们要彻底铲掉磨掉的，不只是五毫米混凝土，而是马马虎虎、凑凑合合的坏作风！”

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也形成了风气。几年来，他们不分昼夜，风里雨里，奔波万里，为的是找到一个合理的科学参数；他们伴着摇曳的烛光，送走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为的是算准一个技术数据。

青年技术员谭学陵和另外四个年轻人，花了整整十个月时间，累计跑了一万二千多里路，从一千六百多个测定点上测得五万多个数据，找到了大庆油田最正确的传热系数，为整个油田输油管道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根据。

技术员蔡升和助理技术员张孔法，在风雪交加的冬季，身揣窝窝头，怀抱温度计，五次乘坐没有餐车、没有卧铺、没有暖气的油罐列车，行程万余里，在挂满冰柱的守车上实地探测原油外运时的温度变化。

技术员刘坤权，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一连几个严冬，冒着风雪从几百个不同的地方挖开冻土，进行分析化验，终于研究出这里土层的冻涨系数，为经济合理地进行房屋基础建筑提供了可靠数据。

亲爱的读者，你们看到这些事例会想些什么？当我们听到这一切时，都被大庆人这种可贵的性格深深地感动了。

永不生锈的万能螺丝钉

在大庆，我们访问过不少有名的英雄人物，也访问过许多在平凡的岗位上忠心耿耿的“无名英雄”。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大庆人不论做什么工作，心里都深深地铭刻着两个大字：“革命”。

电测中队现任副指导员张洪池，就是大批“无名英雄”中的标兵。

四年前，张洪池是人民解放军这个伟大集体中的“普通一兵”。来到大庆以后，他当过电测学徒工，当过炊事员，样样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在长期的平凡劳动中，他显示了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他在自己的日记上曾经写道：

“共产党员要像明亮的宝珠一样，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发光发亮。”

“我要像个万能的螺丝钉一样，拧在枪杆子上也行，拧在农具上也行，拧在汽车上，机器上，锅台上……凡是拧在对党有利的地方都行，都要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而且要永远保持丝扣洁净，不生锈。”

做一粒到处发亮的宝珠！当好一颗永不生锈的万能螺丝钉！这就是大庆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一天夜晚，在一间低矮的土房子里，我们见到了油田的一个修鞋工人，他的名字叫黄友书，三十来岁年纪，也是个复员军人。他到大庆以后，当过瓦工、勤杂工、保管工，磨过豆腐，喂过猪。后来，领导上又派他去给职工们修鞋。

修鞋！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去当一个“修鞋匠”？对这种平凡而又琐碎的劳动，你是怎样看待的？

黄友书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战士没鞋穿打不了仗，工人没鞋穿也搞不好生产，谁离得了鞋啊？给工人们修好鞋，这也是革命工作！”

他跑遍附近好几个城镇去找修鞋工具。他每天挑着修鞋担子下现场。他经常收集废旧碎皮，捡回去洗净揉好，用它来给职工们掌鞋。

黄友书看到职工们穿着他修好的鞋踏遍油田，心里乐开了花。就是这个并非油田主要工种的修鞋工人，每年都被职工们选为全矿区的标兵，被誉为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

在大庆，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从大城市的大工厂调来不久的老工人何作年，自豪地说：“在咱们大庆，人人都懂得他们做的工作是革命。扫地的把地扫好了，是革命；烧茶炉的把开水烧好了，又省煤，也是革命。一个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做啥也浑身是劲。大家都懂了这个道理，就能排山倒海，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一切工作都是革命，所有的同志都是阶级兄弟。人们精神世界的升华，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去，谱成了多少扣人心弦的乐曲！在大庆这个革命的大家庭中，人们时刻铭记着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的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关心别人胜过自己

在大庆，干部们对工人的关心，关心到了一天的二十四小时。每天深夜，干部都要到工人的集体宿舍中去“查铺盖被”，看一看工人兄弟休息得可好，睡得是否香甜。

一场暴风雪过后，气温骤然下降了十多度。年轻的单身工人张海青，被子又薄又脏，还没有来得及拆洗，没有添絮新棉。支部书记李安政“查铺盖被”时，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趁工人们上班，悄悄把张海青的被子抱回家，让自己的爱人拆洗得干干净净，又把自家的一床被拆开，扯出一半棉花，絮到张海青的被子里。张海青发现他的被子变得又洁净又厚实，到处查问是谁干的，李安政在一旁一声没吭。新从一个大城市调到大庆的老工人王文杰，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暗暗掉下了眼泪。

一二〇二钻井队的十几户家属，听说技术员李自新的妻子死了，遗下两个孩子，争着把孩子抱到自己家里看养。她们说：“孩子没妈了，我们就是她俩的妈。”前任队长王天其的爱人李友英，天天把奶喂给李自新一岁的女儿小英，却让自己正在吃奶的孩子小香吃稀饭。有人为这件事写了一份材料给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李云，李云这份材料转给李自新，同时含着泪给李自新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等两个孩子长大了，告诉她们：在新社会里，在革命大家庭里，人们是怎样关怀她们，养育她们长大成人的。叫她们永远记住，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在地质研究所、设计院、矿场机械研究所这些知识分子干部集中的“秀才”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一次，地质研究所女地质技术员陈淑荪，看到同一个单位的地质技术员张寿宝的被面破了，就把一床准备结婚时用的新缎子被面，从箱底翻出来，

偷偷缝在张寿宝的被子上。张寿宝发现了，怎么也不肯要。陈淑荪对他说："你说说，我们是不是阶级兄弟？是不是革命同志？是，你就把被面留下。不是，你就还我。"这几句话，说得张寿宝感动极了。他含着两眶激动的泪，再也说不出不要被面的话了。

为了实现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远大理想，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为了对国家建设事业负责一辈子，事事实事求是，严格认真，一丝不苟，为了革命的需要，全心全意地充当一颗永不生锈的万能螺丝钉；在革命的大家庭中，人人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这些，就是大庆人经过千锤百炼铸造出来的可贵性格。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性格啊！

也许有人要问：大庆油田的辉煌成就和建设者们身上的巨大变化，这一切是怎样得来的？大庆人的回答很简单："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去访问油田的一个工程队，想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思想在大庆是怎样的深入人心。同路的一位年轻的工人说："那里今天开会，不好找人。"我们问他开什么会，他说："冷一冷！"冷一冷，这是什么意思？年轻工人解释说："我们大庆经常开这样的会，找一找自己的缺点，找一找工作中还存在的问题。找准了，就能迈开更大的步伐前进。"

在大庆人已经为祖国建设立下奇功的时候，在全国都学习大庆的时候，他们还要冷一冷，继续运用毛主席提出的"两分法"，从自己的不足处找出不断前进的动力。这不正是我们想了解的问题的答案，也是大庆人更可贵的性格吗？

人民日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

《人民日报》记者

【题解】1955 年，面对西方的战争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造原子弹”的号召。时隔九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在极端困难的内外条件下，这则消息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精神，进一步高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旗帜。



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状烟云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

毛泽东在 1955 年发出号召，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等

[1] 《人民日报》，1964 年 10 月 17 日。

负责筹建核工业。1959 年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艰巨任务。1962 年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领导机构，在科技人员和国防建设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核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战斗的威胁。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新华社·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

穆青、冯健、周原

【题解】 穆青(1921—2003),河南杞县人,回族,一代名记者,原新华社社长,有《新闻散论》、《穆青散文选》、《十个共产党员》、《穆青摄影》等著述。这篇影响深远的通讯,描写了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和感人精神,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为新中国人物通讯的扛鼎之作。几十年来,焦裕禄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他身上所表现的优秀品质成为各个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的经典教材。正如当年一位省委书记说的:“看焦裕禄事迹不流泪的不是共产党员!”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 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即使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

[1] 《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

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

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

"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齐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杞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有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字上：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

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像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他问青年人看过《万水千山》这个电影没有？他说：“你们看，眼前多么像《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像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

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啊！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

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

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迫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决不相信这个诊断，人像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说：“你赶紧送他回去，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

“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张钦礼：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张钦礼，然后说道：“钦礼同志，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

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注)，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注)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

大公报·香港四千渔民昨海上大示威 四百渔船列阵游行红旗遍海[1]

大公报记者

【题解】1967年5月，香港九龙新蒲岗劳资间发生纠纷，造成警民冲突，导致21人被捕，多人受伤。工人及其支持者随后上街游行示威，警方动用催泪弹等驱散人群，同时拘捕127人。结果，左派劳工与警方之间的流血冲突愈演愈烈，各有死伤。直至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干预，"反英抗暴斗争"方告结束。由于这起事件，香港的社会福利和救济等措施才开始得到改善。

在香港靠东边海湾的渔民，昨日纷纷驶回宝安盐田渔港，参加"声讨英帝国主义对香港同胞镇压大会"。来自香港各个渔港的渔民在到达盐田之前，四百多艘机动渔船、四千多渔民，结集在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海上示威游行，他们高高悬起五星红旗，举着毛主席像和语录牌，红旗遍海，口号喧天，先后经过吉澳、鸭洲和沙头角海面，绕了一个大圈，历时一个半钟头始胜利航返宝安县盐田。他们的英勇行动受到了当地渔民和沿途各乡村居民的热烈赞扬。

来自香港的渔民包括：香港仔、筲箕湾、布袋湾、西贡、粮船湾、滘西、大埔、塔门、高流湾、吉澳、罗箕湾、往湾、沙头角、新楼湾等渔港。渔民们大清早便纷纷开船，有秩序地向盐田驶去，准备参加今天（十二日）早上举行的声讨大会。渔民们满怀着对港英的深仇旧恨，在船上高悬五星红旗，张贴着毛主席语录，有秩序地驶回祖国的海港，有的还在船上挂着巨幅的抗暴横额。他们在到达吉澳之前，集结在附近海面，然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海上示威游行。

走在渔船前头的一艘渔船高悬着："抗暴无罪，爱国有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巨幅横额，渔民们高高举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船上满插着红旗为前导。四百多艘渔船列着整齐的队形，沿着鸡公山，经过了吉澳和鸭洲，沿途各海湾的渔船纷纷加入队伍，声势越来越大。在到达沙头角海面时形成了高潮。渔民们在船上高呼口号。岸上的

[1] 《大公报》，1967年6月12日。

乡民纷纷跑到海边，向渔民们招手致意。渔民们的英勇行动表示了香港渔民团结抗暴的强大力量，使得港英警察胆战心惊。沙头角警署内的港英鹰犬匆匆跑到岸边窥伺一番，又神色仓惶地龟缩回去。当时一艘“水警轮”刚刚驶到吉澳，一眼看见这庞大的阵容，吓得停了车不敢动，然后悄悄缩进吉澳港内。

渔民们从上午十一时半开始游行，到下午一时胜利航返盐田港内。他们纷纷燃放鞭炮，庆祝海上大示威的胜利。他们的英勇行动受到了当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海上岸边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遐迩。当地群众纷纷表示，誓为香港同胞强大后盾，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反迫害斗争，把英帝斗垮、斗臭。

这次海上大示威是香港渔民团结力量的一次检阅，表示了渔民反对港英迫害的决心和力量。

大公报·中苏边界谈判 迄无进展迹象[1]

费彝民

【题解】费彝民(1908—1988),江苏吴江人,记者、报人,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中国记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1930年起,任《大公报》记者。1948年,《大公报》在香港复刊后被任命为社长。1969年珍宝岛危机期间,费彝民北上面见周恩来总理,获悉中苏谈判的真实情况,并在《大公报》刊发这条独家消息,一时被世界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据本报记者最近从北京得到的印象,中苏边界谈判并不像外界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顺利。

中国的立场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方面坚持,为了使中苏两国边境局势能够真正和缓下来,使边界谈判能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中苏双方必须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着手全面解决边界问题。

据认为,如果苏联方面确有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对谈判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不是从实力地位出发,表面上装出和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拖延谈判,利用中苏谈判的名义,追求另外的目的,那么,双方就没有理由不能经过平等协商,就临时措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从而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缔结新的边界条约创造必要条件。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根据本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还看不出谈判有取得进展的迹象。

[1] 《大公报》,1969年11月6日。

参考消息·美乒乓球队进入大陆以后[1]

梁厚甫

【题解】梁厚甫，原名梁宽，广东佛山人，记者、时评家。1959年，移居美国，专擅通讯特写，文章多刊于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香港《明报》，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都具有广泛影响力。这里所选篇目正体现其独特文风。

美国官方的反应，仅是其中一端。球队访问的本身，是一种国民外交，美国国民的反应，倒是值得注意的。

记者为着此事，来到了圣何塞城。圣何塞城是今天美国青年运动的一个中心，美国青年人的反应，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和圣何塞大学青年人谈论的结果，好些青年人，把这一件事作为自己的光荣。在图书馆内边，一位手持借书卡片的小姐说："这充分证明，今天美国的责任，完全落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你看，美联社东京分社的主任罗德里克先生，也只能托我们的余荫，才能到中国来采访，他不是想去看中国，想到口角流涎吗？有了我们，他才有可能发电报，才有可能于今后一两个月之内，出版一册畅销书。"

这一位小姐并不是一位乒乓球的高手，但她因为有一个双喜牌的球拍，而自以为荣。她说："我并不是乒乓球员，但我是美国青年人的一分子。"

另外一位博士候补人的青年人说："中美的关系，给我们上一代的人弄坏了。其实，我们上一代的人，早已弄坏了许多的事情，他们弄坏了黑人和白人的关系，弄坏了男女和同工同酬平等的关系，我们是有力量把他们的错误矫正过来的。"

另外一位博士候补人的女青年说："美国孩子打乒乓球，不能说是十分的高明，不过，美国的乒乓球队，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能保持其业余化的风格。现在，在美国的大学内边，大家谈到足球和垒球，都不大起劲了，这因为，大学内边的球队，都受了职业化的影响。我们是人，而不是墨西哥斗鸡场内边的鸡。当一个人向往于做鸡的时候，还有甚么体育精神之可言呢？中共不邀请我们的足球队和垒球队，那是有道理的。"

---

[1] 《参考消息》，1971年4月22日。

总而言之，在美国内边，对乒乓球队进入大陆，表示欢迎的，计有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内边，曾经出谋献计去改善中美关系的谋士，一种就是青年人。

对这一件事情表示反感的人，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往日共和党的参议员诺兰。

诺兰是《奥克兰城论坛报》的老板，在美国八百多家大报之中，只有《奥克兰城论坛报》，对这一件事情，报道得并不十分起劲，弦外之音，大概可以理解了。

新华社·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1]

新华社记者

【题解】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应由新中国享有的联合国合法席位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长期阻挠。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际地位急剧衰落，第三世界力量迅速崛起。1971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终于得到全面恢复，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

联合国大会10月25日晚结束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辩论并进行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2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在表决上述提案之前，美国和日本佐藤反动政府进行了绝望的挣扎，要求联合国大会首先表决它们联合炮制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即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是一个所谓“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表决的结果，大会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这个所谓“重要问题”提案。这两项提案表决的结果，使美、日合谋炮制的另一项提案，即“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了废案。

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2个国家的提案被通过和美、日提案被否决的时候，会场上都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是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顽固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阴谋的彻底破产，给了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分割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的阴谋以沉重打击。它反映了世界上人心的向背和时代的潮流。说明除了美、日一小撮反动派外，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1] 新华社北京1971年10月26日电。

这次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是从10月18日开始的。经过一周的辩论，约80个会员国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的情况清楚表明：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越来越不得人心，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国际正义的国家强烈反对美国及其一小撮追随者继续玩弄花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立即归还给7亿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把非法窃据这一席位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在发言中竭力为他们合伙炮制的两项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进行鼓吹、辩解。但是他们的欺骗宣传和荒谬论点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有力揭露和驳斥。这些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美、日炮制的这两项提案的实质，都是为了在联合国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以便长期分割中国领土、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省，因此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严正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的论调都是非法的、荒谬的、根本不能成立的。

面对着这一不利的局势，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奔走，对别国施加压力并进行欺骗拉拢活动。直到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路透社）。但美日反动派的这一手法以53票赞成、56票反对、19票弃权被大会拒绝了。接着，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又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被大会否决。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热烈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对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笑、歌唱、欢呼”，“还有一些人跳起舞来”。

这时，“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布什又跳上讲台，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2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立即驱逐蒋帮代表出联合国的一节。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经过大会主席马利克的裁决，布什的这一企图也遭到挫败。眼见大势已去，无法再赖下去，蒋帮的所谓“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并随即领着他手下那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接着提付表决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2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这时大会会场上再次响起了一片热烈欢呼声。

据美国通讯社报道，对于美国在联合国遭到的这样一次“最惨重的失败”，美国政府人士“感到吃惊”和“表示极为失望”。布什在表决结束后发表谈话，对于这一表决结果“感到悲伤”。他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我感到极为失望”。但是，连他也不能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20多年来，美国耍尽种种阴谋，顽固地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

权利，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结果却落得不断失败和日益孤立。在 50 年代，美国操纵表决机器，蛮横无理地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搁置一边。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对美国这种“拖延讨论”的手法的时候，美国从 1961 年起，又操纵表决机器，硬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说成是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但是，在去年第 25 届联合国大会上，出现了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逐蒋帮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18 国提案的多数，美国的阴谋眼看要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伙同日本，在今年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上又炮制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和一个“双重代表权”提案，把它们长期策划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公开端了出来。

据西方报刊报道，为了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罗杰斯和布什大肆活动，在联合国内外和 100 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 200 多次；美国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贿赂或露骨的威胁；美国某些参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2 国的提案，美国将削减给联合国的经费，以此进行要挟。日本也加派要员参加它的联合国代表团，配合美国大肆进行拉票活动。但是美国和日本尽管使出了各种手法并费尽了一切心机，它们的旨在分裂中国神圣领土，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识破，并遭到严重的挫败。

中国人民和主持国际正义的世界各国人民、各友好国家通过长期的共同斗争，取得了在联合国内挫败美、日反动派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这一重大胜利。但是，美、日反动派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它们还在继续加紧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独立”等罪恶阴谋。中国人民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彻底挫败美、日反动派的这些阴谋而继续斗争。

尼克松同周恩来的握手[1]

杜修贤

【题解】杜修贤，笔名杜山，陕西米脂人，1950年代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1960年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有大型摄影画册《人民的总理》、《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等。这幅新闻照片抓住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悬梯，主动热情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传神瞬间，定格了这一"穿越太平洋的握手"，显示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也使这幅照片成为经典新闻事件的经典新闻作品。



[1] 新闻照片，1972年2月21日。

新华社·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1]

安徽日报记者、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

【题解】 这篇人物通讯是“文革”时期为数不多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新闻作品之一。它在表现人物时注意用事实说话，而非生搬硬套地“突出政治”，一件件实实在在的感人故事构成了这部新闻作品的主体，而作品中的李月华医生也没有当时流行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豪言壮语”，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语言对话朴实动人。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辽阔的淮北平原。长空碧蓝。安徽泗县丁湖公社的社员们，一早就踏着露水下地了。

突然，县医院的一辆救护车从公路上穿过，直向丁湖医院驰去。正在附近田里干活的社员们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了？”他们放下锄头，也跟着跑去。

救护车停在丁湖医院的门前，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李月华医生的病危险了。

脸色苍白的李月华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县医院抢救。许多人跟着车子追了好远一阵。

人们焦虑不安地念叨着：“月华啊，你可得好好地回来呀！”……

“她做的好事俺们数不清”

李月华是位普通的乡村医生。她在泗县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

这些年来，李月华走村串户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孩子们称她“李姨”，年青人喊她“二姐”，大爷大娘们，亲切地叫她“闺女”。来找李月华看病的人，看着她那和蔼可亲的笑脸，殷勤体贴的细心劲，都觉得她是自己的亲人。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冬天，李月华的男孩小冠军刚满三个月的时候，她去为邻居赵二姐

[1] 《人民日报》，1972 年 12 月 19 日。

接生。产妇分娩很顺利，刚生下的女孩小金叶非常可爱。当时，赵二姐丈夫不在家，没人照应，李月华从自己家里拿来米面、红糖、鸡蛋，亲自做好送到赵二姐床前。后来，赵二姐突然生了病，经过李月华细心治疗和护理，病是好了，可奶水一滴也没有了。小金叶衔着奶头哇哇哭闹，赵二姐急得直淌眼泪。李月华听着小金叶的哭声，揪心似地难受，她决定给小冠军停乳喂粥，用自己的奶水哺育小金叶。从此以后，李月华每天按时给小金叶喂奶，夜里只要听见小金叶的哭声，天气再冷也要赶来。

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李月华出诊归来，远远就听到小冠军和小金叶都在啼哭，赶紧加快了脚步。但是她没有回家，而是去敲了赵二姐的门："二姐，开门呀！"赵二姐听见李月华的声音，一骨碌爬起来点上了灯。看到李月华背着药箱子走进来，便激动地拉住李月华的手说："她李姨，你家小冠军也在哭呢！"李月华笑着说："没啥，有他姥姥哄着哩。"一边说，一边给小金叶喂奶。赵二姐望着渐渐入睡的小金叶，感动地伏在李月华的肩上哭了，泪水把李月华的衣裳润湿了一大片。……

就这样，冬去春来，李月华整整给小金叶喂了六个月的奶，直到可以断奶喂粥。

李月华一心想着贫下中农，她的家，也成了一个"家庭病室"。贫下中农到李月华的家里看病，不论是一身汗水，还是两脚泥巴，也不论是普通病，还是传染病，李月华总是把他们让到自己的床上检查治疗，甚至还做些小手术。有时候，医院里的病床住满了，李月华就把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接到自己家里，腾出一张床给病人住。这几年，先后在这张家庭病床上住过的病人，往少里说也有一百五十人。李月华家的煤炉子，白天黑夜都不灭，那是李月华为病人准备着的茶水炉子。远路来的病人，就在这个炉子上烤馍做饭。李月华对贫下中农是这样关心体贴，难怪人们说，李医生给俺看病，"药方没开俺的病就好三分"！

李月华的家里养了一条小黄狗。说起这条小黄狗，还有一段来历：

一个夏末的深夜，大雨下个不停，李月华查完病房回到家里。紧张工作一天，躺下就睡着了。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她惊醒了，开门一看，北头生产队的叶大娘正站在雨中，全身上下都湿透了。李月华赶紧把叶大娘让进屋里，原来是她儿子王春得了急病，肚子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当李月华知道叶大娘已经敲过两次门，在雨地里等了好长时间，心里很不安。她背起药箱，来到叶大娘家。检查结果，王春得的是"胆道蛔虫"。李月华给他打了针，吃了药，王春渐渐好些了。李月华坐在床前一边观察病情，一边在想：如果王春得了更紧急的病，我醒得晚了，不是很危险吗？怎样才能不耽误时间呢？想着想着，叶大娘家的公鸡喔喔报晓了，李月华心里一亮：鸡能叫明，狗叫不是也能给人个信号吗？回去以后，她就买了一条小黄狗。从此，只要有生人走进院子，小黄狗汪汪一叫，李月华的屋里就点起了灯。

李月华的宿舍就在医院的院子里。一天深夜，东风大队小彭生产队彭兴汉的小孩得了急病，抬到医院。软床子刚搁下，李月华已站在他们面前，来人都很惊奇："她李姨，你怎么知道俺们来的？"李月华指着身边的小黄狗，笑笑说："是它给我报的信。"

李月华为病人想得就是这样周到，这样细致。正像七十二岁的贫农周廷俊说的："俺们心里刚刚想到的，月华就为俺办到了；俺们心里没有想到的，月华也为俺办到了。她做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俺们天天都看到，可是俺们数不清啊！"

"做医生就要学习白求恩！"

李月华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一个贫苦的农村医生的家庭。一家人随着父亲漂泊行医难以糊口，李月华饱一餐饥一顿地度过十个春秋。苦难的童年，把李月华和千千万万贫下中农连结在一起，使她从小就懂得爱什么，恨什么，也使她从小就看到，贫下中农多么需要自己的医生来为他们解除病痛。十六岁那年，李月华就走上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岗位，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她迅速成长起来。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她爱读的书；毛主席提倡的为人民"救死扶伤"，是她行动的指南；毛主席号召学习的白求恩同志，更是她心目中的光辉榜样。

多少次她读着《纪念白求恩》，认真地领会着毛主席的这段教导："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她到处搜集白求恩的故事、图片。她常说："做医生就要学习白求恩！"

一天深夜，李月华给一个难产的妇女接生回来，一进屋就低头坐在床沿上，红肿的眼睛里凝着泪花。丈夫赵斌问她出了什么事。李月华难过地说："我守了三天三夜，……大人保住了，可是，孩子……没了。"过了一会，她抬起头来认真地说："老赵，我过去认为，学习白求恩只要把一颗赤诚的心交给人民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要把革命工作搞好，还应当像白求恩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从这件事情以后，李月华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她多么渴望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党了解李月华的心思。一九六五年八月，组织上推荐她到宿县专区医院进修。

李月华废寝忘食地学习起来。领导上让她进修的是外科与妇科，但是她除此以外，还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内科、儿科，后来又扩大到牙科、眼科、骨科。她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恨不得把各方面的医疗技术统统学会。有人说："你这也学、那也学，不就成'万金油'了吗？"李月华认真地说："农村缺医少药，贫下中农需要我们成为一个多面手。如果这叫'万金油'，我甘心情愿做这样的'万金油'。"

为了掌握多方面的医疗技术，李月华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就拿外科手术的打结来说，开始的时候，李月华每分钟只能打一两个结。她到处寻找结扎用的废线，用锁扣、床架、板凳腿……练习打结。一天晚上，已经是半夜十二点钟了，李月华还在宿舍里练习打结。一位值班的医生走到她身边，发现她每分钟能打五六个结了，高兴地说："你进步得真快呵！"李月华想了想说："光着手打结，与做手术时戴着手套打结不同。现在能打五六个，戴手套

就打不了那么多了，我还得练。”

一年零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对李月华来说，这是一段多么宝贵的时间啊！她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学习归来，她的医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已经是一个会看妇科、儿科、内科、外科常见病，能做二十多种大小手术的医生了。

离职的进修结束了，她在工作中的学习又开始了。为了学习中医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她把办公桌搬到一位老中医的对面，随时请教；为了掌握针灸穴位，她不知在自己身上扎了多少针；为了寻找一个民间引产秘方，她三次访问一位贫农老大娘；为了学习化验，她把化验员李守信的有关书籍全部看完……

在这短短的几年里，李月华不仅反复阅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写下了不少政治理论学习笔记，而且也读了二十多种中西医学理论书籍，写了六七万字的业务学习笔记。

“是革命的本钱，就要舍得花在革命上”

在专区医院进修以后不久，李月华被调到泗县草沟医院。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旺。

李月华心里也有一团火。她要把在专区医院学到的技术，全部献给贫下中农。她要用自己的革命实际行动，去批判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她像一部开足的马达，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不论是上班，还是在家，病家一叫就出诊，病人一到就看病。正在吃饭时，把碗一推就去；正在喂奶时，把孩子一放就走。她夜间很少睡过安稳觉，有时一夜出诊四五次。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中秋节，李月华家里做的节日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还不见李月华回来。

她是头天晚上深夜出诊的，黎明才回来。刚刚疲倦地躺在床上，就听见有人来找赵斌，低声地告诉说：稻王大队贫农社员王翠侠难产，小孩一天多没生下来，现在抬到了医院，由于出血过多，昏迷不醒……李月华听到外面的低声细语，立即披衣起床。她看见赵斌关切的神色，便笑着说：“我去看看。我不累，不要紧的。”说着，就匆匆走出门去。

经过检查，产妇是横位难产。李月华迅速地给王翠侠做好麻醉，施行内倒转手术，矫正胎位。就这样，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孩子才生下来。但是，大人、孩子都没气了。李月华赶忙抢救大人，大人醒过来，她又把婴儿嘴里的羊水吸出来，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婴儿也终于得救了。

李月华从深夜出诊起，到这时已经连续忙碌了十五个小时。她两顿饭没有吃，低血糖病又发作了，满脸汗珠往下直流，一下就瘫倒在地上……

李月华有多少个节日是这样度过的？贫下中农说：俺们说不全；李月华有多少次像这样带病工作？她家里的人说：俺们记不清。

贫下中农看到她日夜工作，眼睛陷下去了，他们多么心疼！有人对她说："你再不注意休息，俺们以后不找你看病了！"李月华笑着说："过去白求恩同志哪里枪声急、伤员多，他就去哪里。比起白求恩，我差得远哩！"有人劝她说："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呀！"李月华说："对呀！是革命的本钱，就要舍得花在革命上！"

一九六九年一月，李月华生下了最小的女孩冠英。直到临产的前两天，她还在工作；产后第二天，她又坐在床上给人看病。

就在生下小冠英第五天的深夜，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李月华坐在床上看书，直到十一点多才睡下。朦胧中她仿佛觉得有人踏雪走到门外。"是不是有急诊？"她立即起身点灯，问道："谁呀？"外面一位老大娘颤抖的声音回答说："月华，俺外孙子没气了。""我就来！"

大门一开，一阵寒风吹进片片雪花。李月华认出是草沟大队西南生产队的蒋大娘，赶紧让她进屋坐下。老大娘不肯坐，慌乱地叙述着她外孙的病情。

李月华穿上套鞋，背上药箱，拉着蒋大娘就走，并催着说："快！快！"可是走不多远，一阵风传来小冠英的哭声。蒋大娘一把抱住李月华："唉呀，俺想起来了，俺外孙子比你家冠英还大十天，你才是月子里第五天，怎么能在大雪天出来呢？都怪俺急糊涂了。快回去吧！俺找别的医生去。"一边说，一边把李月华往回推。李月华赶忙说："大娘，不要紧，快走吧！"说罢，头也不回地赶到了蒋大娘的前面。

来到蒋大娘家，只见孩子浑身青紫，眼睛紧闭，呼吸微弱。她问了一下情况，断定是孩子妈妈睡觉不慎，把孩子捂得窒息了。她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过了半个钟头，孩子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李月华又给孩子打了针，孩子渐渐安睡。这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

李月华走了以后，蒋大娘母女俩激动得泪流不止。大娘对闺女说："俺孩子金贵，人家孩子不金贵吗？你是月子里十五天，月华月子里才五天哪！可是人家没听到一个'请'字就来了。闺女，你一辈子都要记住，毛主席教育出来的李医生，是你做人的榜样。"

母女俩说到天蒙蒙亮，才渐渐睡着。这时，门外又响起了李月华亲切的声音："大娘，孩子好了吗？"蒋大娘赶忙开门，只见外面雪花还在飘着，李月华深夜前来的两行脚印还没有盖满，一条新的脚印又通到她家的门前。她拉着李月华的手说："好闺女，叫俺怎么感谢你啊！"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的壮丽事业"

一九七一年四月，李月华夫妇调到了丁湖医院。

八月中旬，李月华向丁湖公社党委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天晚上，她异常兴奋，对党无限热爱的激情，在她心中翻腾。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虽然还不是个共产党员，但是我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的壮丽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八月二十七日，她忽然病倒了。

八月三十日是李月华连续高烧的第三天。

这天上午，贫农社员李文用拖车拉着他的爱人，来找李月华看病。一见李月华病倒在床上，就说："李医生，你休息吧。俺们等几天再来找你看。"李月华说："有病哪能等啊！"她让爱人赵斌搀扶着，走到拖车前，仔细地给病人作了检查，开了处方。李文夫妇走后不久，李月华的体温又上升到摄氏四十一度，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

晚上十点多钟，产妇邓彩霞生下婴儿两个小时以后，胎盘还没有下来，大量的出血引起虚脱，被送进丁湖医院来了。郑海泉医生为产妇进行子宫按摩，不见效果。产妇的丈夫丁持东焦急地问："是不是去请李医生？"郑医生为难地说："看来要做胎盘剥离手术，我们医院也只有李医生能做。可是，她高烧三天了，上午休克过一次，我……"

时间在飞逝。产妇的病情越来越危急。丁持东忍不住了，悄悄来到李月华家。看着李月华仍在昏睡中，他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这时刚刚清醒些的李月华觉着来了人，轻声问道："谁呀？""李医生，俺孩子娘快没命了！……"丁持东说着忍不住哭出声来。

李月华强撑着要起床，可是一阵眩晕，又倒了下去……"老赵，快扶我起来，救病人要紧！"李月华的声音十分微弱，但语调是那么刚毅坚定。赵斌把她从床上扶起来，同丁持东一左一右搀着她走出门外。

淮北平原上的初秋深夜，大地沉寂，清风凉爽。持续高烧四十一度的李月华，被凉风一吹，"哇"的一声吐了。从宿舍到门诊室只不过二十来米，可是，李月华接连呕吐了三次。看着这情景，丁持东激动地说：

"李医生，你回去吧！"李月华艰难地走着，轻轻地摇摇头。她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那二十米——这是不能用普通尺子衡量的二十米，这是她生命途中光辉的二十米！

李月华终于跨门进了诊室。她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地坐在椅子上，一面听郑医生叙述病情和抢救的经过，一面让他给自己戴好手套。李月华吃力地站了起来，颤颤巍巍地走到病床边。赵斌扶着她，郑医生为她举着煤油灯，李月华倾注全部精力，为这个贫农女社员开始了胎盘剥离手术。

手术在紧张地进行。李月华的两腿渐渐支持不住了，几乎全靠在赵斌的身上。汗水沿着她的发梢往下流，全身都湿透了。每做一个手术动作，每坚持一分钟，李月华要凝聚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多么巨大的病痛啊！

手术终于结束了。

人们把李月华扶到椅子上，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胎盘……完整……吗？"郑医生立即做了检查，告诉她胎盘完整。这时，李月华的脸上微微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李月华喘息了片刻，向赵斌要过听诊器，让他扶着又为产妇作了一次检查。"心音很好。"说罢，便昏倒在床边。

“李医生！”“李医生！”……

李月华苏醒过来了。大家劝她立即回去休息，她摇摇头说：“等一等，我再观察一下。”郑海泉热泪滚滚，激动地说：“李医生，你回去吧。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李月华回到了宿舍，可她的心还在产妇身上。她对守护在床前的赵斌断断续续地说：“要给病人……打一个星期的……青霉素，服一个……星期的……长效磺胺，防止……感染。”

赵斌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下，他一把攥住李月华的手：“月华，你放心吧，我们会办的。”

三十一日凌晨，李月华正躺在床上输盐水，郑医生来看望她，她不安地说：“这两天我生病，你们辛苦了。等我烧退了，就去接你的班。”李月华，这个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医生，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刻，还是这样满腔热忱地想着工作，想着同志们。谁料到，这几句话竟是她最后的遗言！

半个多小时以后，李月华的病情急剧恶化。尼克剎米注射了。无效！山梗菜碱注射了。无效！肾上腺素注射了。无效！强烈针刺、物理降温都做过了，李月华仍在昏迷中……

李月华病情危急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正在开公社党委会的同志们停止了会议，正在上课的师生们走出了教室。正在田头的社员放下了锄头……人们怀着焦灼的心情纷纷跑来探望。

上午十点，泗县县医院的一辆救护车，载着垂危的李月华，载着丁湖人民的焦虑和期望，疾驰而去。

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但已经迟了。根据诊断，李月华患的是脑型疟疾。由于在持续高烧中劳累过度，出汗太多，抢救无效，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李月华同志光荣殉职，年纪只有三十三岁。

激励千万人前进

下午，不幸的消息传到丁湖公社，许多人痛哭失声。李月华救活的那位产妇邓彩霞，一听到这消息，受到极大的震动，她泣不成声地说：“李医生，李医生！你最后一口气也用来救俺了，你这样好的人怎么能死呢！”这一天，丁湖大队三百五十多户，多少人家晚饭凉了没人吃一口，多少人家屋里传出了哭泣声。噩耗传到了草沟公社，传到了曹场公社……人们想起李月华背着药箱，风里来雨里去，为贫下中农日夜奔波的往事，辗转不能入睡。

丁湖公社召开了追悼李月华同志大会，许多贫下中农自动地来了，草沟公社的贫下中农也从二十里外赶来。追悼会开始的时候，已经到了两千多人，人们还在陆续不断地赶来。

夜已很深，草沟镇的一间草屋里，仍然亮着灯。参加追悼会回来的贫农张成坤，抚摸着

两个被李月华救活的小孙子，想着李医生，止不住泪水纵横。一天清晨，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又默默地来到李月华的墓地。

他围着坟墓走了一圈又一圈，抓起一把坟土，看了又看，攥了又攥，把它紧紧地贴在心窝上："月华，好闺女，俺和俺的全家永远忘不了你，俺的两个小孙子长大后，一定让他们像你一样……。"

李月华同志去世以后，她父母原来想把她的遗体运回原籍安葬。可是，丁湖人民恳求两位老人："李医生是为俺丁湖贫下中农累死的，还是把她葬在丁湖吧！让她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让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教育着俺们的下一代！"李月华的坟墓，现在在丁湖公社村东口的高地上。来这里致哀的人，从她去世以后，一个多月里一直络绎不绝。

中国共产党宿县地区委员会根据李月华同志生前的申请，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安徽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向李月华同志学习。李月华的光辉事迹，越过淮河，跨过长江，传遍了整个安徽。广大群众赞扬她，说她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谱上又一个高尚的人。她短短的一生，是全心全意把健康和幸福送给阶级弟兄的一生；她走过的道路，是共产主义战士所走的道路，正像鲁迅所说的：是"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的道路。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人，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新华社·驯水记[1]

郭超人

【题解】 郭超人(1934—2000),湖北武穴人,当代名记者,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先后任新华社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四川分社记者,1992年任新华社社长。1974年,郭超人沿长江淮河、海河等历史上以旱涝灾害闻名的江河进行实地考察采访,撰写了这篇通讯《驯水记》(初名《万里神州驯水记》)。作品全面反映了建国25年来的水利建设成就,歌颂了新中国治理江河湖海的功业,同时结合历史背景展开深刻思考,内容凝重,思想丰赡,得到广泛称赞。

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上,记录了我国劳动人民与水搏斗的多少可歌可泣的业绩。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既爱水,又怕水。干旱来临了,人们追逐着水的踪迹,哪里有水,那里就有绿洲和生命;而洪水一朝泛滥,人们又逃避着水的到来,哪里有了洪水,那里就出现饥饿和死亡。为了取得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同水展开年复一年的战斗。从古代的"凿龙门"、"疏九河",到近世的"修堤梁"、"通沟浍",尽管人民用劳动和智慧建成许多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在治水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翻开历史的篇章,从公元前二〇六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的两千一百五十五年间,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什么"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什么"洪水横流,尸飘四野",这一桩桩记录中浸透了人们多少血泪!当劳动人民在社会上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大自然面前、在水的面前也必然只能是奴隶。这是历史已反复证实了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试看二十五年前新中国诞生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什么局面?全国河道长期失修,堤防残破不全;"望天田"遍布大陆,水利设施寥寥无几;水旱灾害相继发生或同时出现,几百万人死于灾荒,几千万人流离失所。某些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也幸灾乐祸地等待着人民的新国家在历代政府都不能解决的水旱灾害中崩溃。

然而,无情的历史给予他们的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年来,在

[1] 新华社北京1974年10月15日电。

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中国劳动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在水利建设上进行了一场扭转乾坤的战斗，并夺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战果。在千古成灾的大江大河的两岸，如今矗立起浓荫覆盖的“万里长城”；上百条巨龙似的新开运河正按照人们的需要吞波吐浪，把洪涝之灾变成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在长期焦渴的南国山区和世代少水的北方旱原，如今到处是星罗棋布的人造湖泊，到处是林立的机井和蛛网般的渠道。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千百年来笼罩中国大地的那种“旱则遍地生烟，潦则民居漂没”的历史已经永去不返了。

曾经给水当了千百年奴隶的中国劳动人民，在日益深入发展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正遵循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重整祖国的万里河山，逐步使自己真正成为水的主人。

这就是二十五年来我国水利建设上所经历的最本质的变化。

（一）

最近，当我们沿着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这些曾以水旱灾害闻名世界的江河两岸采访时，大量事实使我们特别突出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广度。

历史告诉我们，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阶级压迫和水旱灾害总是同时并进，反动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使人们既没有同水斗争的客观条件，也看不到同水斗争的主观力量。每次灾害以后，反动统治者一面借兴修水利为名大肆搜刮民财，一面狂热鼓吹孔孟之道的“天人感应”，强逼民工建造龙王庙、镇水牛，拜天祭神，占卜祈祷。在一九三五年长江洪汛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沙市堤工局局长还亲自率领下属在荆江大堤上导演过一出官办的“祭江”丑剧，他们摆香案，读祭文，杀猪宰羊，向江水哀求和礼拜。至今，在荆江大堤，在洪泽湖畔，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只只满身污垢的铁牛蜷缩在泥土之中，与解放后新建的荆江分洪和三河闸坝的宏伟工程成为两个时代的鲜明对照。

解放以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风暴，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砸烂了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桎梏，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涤荡着束缚人们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残渣和余垢。人民从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奴隶状态的旧观念中得到了解放，开始成为主宰大地沉浮的主人。

早在一九五一年，当毛主席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刚刚发表，淮河两岸祖祖辈辈被洪水欺凌的人们，就以最快的速度组成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开上了治淮前线。许多被淮河逼得逃荒要饭几十年的老人，许多被淮河弄得夫亡子散的妇女，许多在水灾中出生又在水灾中长大的青年，都从毛主席的号召里看清了方向，吸取了力量，第一次有信心也有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去征服淮河的洪水。他们说：现在该咱们给淮河当家啦！一些多次申请参加治淮仍未得到批准的人，偷偷背上行李、扛起工具赶到工地劳动，他们自豪地把自

己称为“治淮的后补战士”。就这样，二十多年来，每年冬春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迎着刺骨寒风，冒着鹅毛大雪，奋战在淮河的干流和支流之上，创造了一幅古今中外罕见的群众性治水的壮阔画面。

人们也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全球性的大水季节里，洪水灾害遍及欧亚两洲的许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在美洲，头号工业发达的美国动用了千万吨钢铁、水泥和大量防汛器材，也未能制止洪水闯进它的第二大城芝加哥。当时，位于长江之滨的武汉，遭受着十倍于淮河、黄河、海河三河总流量的江流的威胁。武汉江面水位已超过一九三一年洪水淹没汉口时的水位一米以上，有的地方水头已高出市区一两层高的楼房。敢不敢同这样特大的洪水抗争？能不能保卫住人民的新武汉？对于这里的人民群众来说，这是一场做水的奴隶还是当水的主人的考试，是一场唯物论能不能战胜天命观的斗争。武汉市的劳动人民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一百多个不眠的日夜里，二十多万名防汛战士依靠双手，把郊区的一座陈家山挖成了陈家坪，用三百五十万方黄土和石块把武汉堤防筑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用人定胜天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防”加上物质的堤防，终于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大水。

在淮河流域，苏北里下河的兴化县在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在两个不同时代的缩影。这个县位于著名的“锅底洼”的底部，解放前洪水经常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劳苦人民不得不经常成群结队流浪外乡乞讨。一九三一年的水灾之后，仅一个兴南乡的一万一千多户人家中，饿死的就有两千六百多人，外出逃荒的达六千七百多户。解放后二十多年来，随着淮河洪水威胁的解除，兴化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采用了持续不断的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移动了一亿七千多万土方，初步制服了涝灾。全县粮食总产从一九四九年的两亿七千万斤上升到去年的十四亿三千万斤，增长了五倍多。就在记者来这里采访的前几天，兴化全县范围内普降暴雨，两天时间降雨量达三百多毫米，圩外水位达一人多高，而圩内秧田却一片翠绿。当一些老年人看见强大的机电排灌设备把圩内积水迅速排到圩外时，一个个乐得哈哈大笑。他们指着天空说：现在，老天就是把天河的水全倒下来，我们还照样种庄稼夺丰收。在淮河北岸的安徽怀远县河溜公社，我们访问了公社革委会委员、参加治淮二十多年的老劳模葛士阳。他今年五十六岁，在旧社会的三十一年中，地主的压榨和淮河的洪水使他全家多次外出流浪乞讨。一九三一年淮河泛滥时，他才十三岁，一家人边逃水边挖野菜，逃了一路哭了一路。那时的葛士阳想：什么时候才能治住淮河，让庄稼人不再受苦？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地主和洪水或者轮番或者同时夺走了他的劳动成果，他不得不相信“天命”。解放了，党领导贫下中农斗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又组织群众对淮河进行治理。他同千百万民工一道，在淮河两岸工棚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冬春，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他亲眼看到，就是他和他一样的庄稼人，一铲铲、一车车，堆起了二百多公里长的坚固的淮北大堤，挖出了上千座大小水库，使为害了多少世纪的淮河开始驯服。从此，他认识了人民群众在大自然面前的能动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打败了淮河，也打败了人们头脑中的“天命观”。一九五四年，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共产党

员。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葛士阳，尽管身患多种疾病，仍然英姿不减当年地推着独轮车奔驰在新的治淮工地上。他说：祖先留给了我们一条多灾多难的旧淮河，我们一定要为后代建设一条幸福的新淮河！

（二）

许多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客人，在参观了我国各种水利建设工程以后，常常会惊叹地提出：为什么旧中国几千年无法解决的水旱之灾，新中国只用二十几年时间就初步解决了？

对于这个问题，离开了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具有极大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人民群众，将是无法理解的。

在各种类型的水利工地上，我们目睹人们从事水利建设的主要劳动工具是一柄柄铁锤、一根根钢钎、一把把十字镐、一辆辆手推车，最多还加上他们自制的一台台土机器和一包包黑炸药。除了一些由国家直接投资和施工的大型骨干工程以外，在大多数群众自办的水利工地上，看不到什么大型的现代化施工机械。但是，到处都能看到万头攒动、歌声飞扬的劳动景象，到处都能看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水利战士。

就是这样的劳动者，使用着这样的工具，把多少世纪以来被称为“中国的忧患”的世界最大害河——黄河，初步纳入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曾在华北平原上制造过多少人间悲剧的海河，也正是由这样的劳动者用这样的工具，被改造着为我们的子孙万代造福。旧中国留下的三亿三千万亩易涝农田，已有两亿五千万亩得到了治理；那时，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只有为数不多的靠天灌溉的水地，今天我们已建设起了一批又一批旱涝保丰收、高产稳产的新农田。二十五年，我国已建成大中型水库两千多座，机电排灌动力达三千多万马力，农用电量则超过了解放前全国用电量的总和。许多历代王朝和外国专家无法解决的难题，今天正被这样的劳动者一个又一个地突破。

国民党反动派在统治旧中国的岁月中，乞求帝国主义的“专家”和“权威”来中国帮助治水，什么“开发扬子江水利”，什么“导淮计划”，曾经在报刊上喧闹一时，但结果除了在档案库留下一份份宣告破产的报告书以外，他们未能完成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水利工程。在长江多次成灾以后，国民党才在武汉附近搞过一座三孔的排水闸。这种在今天看来我们的生产大队就能完成的小小工程，国民党竟然恳求了五个国家的“援助”，足足闹腾了三年才算收场。而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便自力更生地在长江上兴修了第一座大型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这项工程包括整修和加固原有的荆江大堤，修建二百零八公里的新围堤，建造共有八十六扇弧形钢闸门的进洪闸和节制闸，以及一个能妥善安置十七万当地居民的安全区。结果，在毛主席“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的亲笔题词鼓舞下，只用了七十五天就全面胜利完成了。

最近，我们访问了南海之滨的广东汕头地区的潮阳县，这里人民围海造田的胜利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为了根治多少个朝代以来的海潮倒灌，同时向大海索取田地和粮食，潮阳人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批判了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以英雄的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短短九个月时间便在海门湾建成了一座拦截龟头海的大型闸坝工程。这是一座全长一千五百多米的银色大闸，顶宽十一米的闸面上可以同时并行两辆大型载重汽车，闸坝下七十二个九吨重的闸板保卫了三十万亩农田免遭海潮的侵袭，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围出三万五千多亩良田。整个建筑中没有一件材料是“外来品”，全部靠土法上马，就地取材。建闸所用的三百多万块石块要从二十里外的采石场运到海上工地，如用汽车装运需要七万车次，全县十多部汽车全部用来装运也得一年。但是，潮阳人民没有要国家一部汽车，没有费国家一滴汽油，主要依靠三千多辆自行车和鸡公车、平板车等民间运输工具，在八个月时间中便全部完成了石料的运输。一部部经过加工的自行车，装载着六百多斤重的石块，日夜奔驰在海滨崎岖的山道上，的确叫人难以想象。但这却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实。难怪潮阳县的老贫农感慨万分地说：“桥闸是自行车载来的，大坝是人的双肩挑来的！”

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感到，我们有着多么值得赞颂的勇敢勤劳的人民，我们有着多么值得庆幸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并迅速转化成一种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计算机也无法算计的，它是我国二十五年来水利建设最有成效的法宝。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旧制度下，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在水利建设上从来就是“以邻为壑”和“分割治理”的。为夺水发生的诉讼和械斗层出不穷，倾家荡产和家破人亡者无以胜计。今天，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一种为全局牺牲局部、为集体牺牲个人、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有效地保证了我国水利建设能统一安排、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和多快好省。

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济宁地区的人民，为了进一步发展灌溉和航运，着手在南阳、独山、昭阳和微山等南四湖进行湖腰扩大和出口控制工程。根据工程的需要，三万多名山东水利战士来到毗邻的江苏省沛县境内挖一条顺堤河，并占去沛县五万多亩土地。对于土地并不宽裕的沛县有关社队来说，这项工程将给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带来很大困难。但是，沛县的贫下中农主动按规划让出了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他们说：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东人和江苏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沛县少种五万亩，济宁多打亿斤粮。咱们要摆全国的棋盘，算革命的大账！

近几年来，为了保证山东境内水利工程能顺利进行，江苏人民还提出了“敞开大门”的口号，利用全部水利枢纽工程接受山东的来水。在洪水到来时，山东人民主动关闭境内微山湖的闸门，截住泻向江苏的洪流。安徽人民为了给河南的洪水开辟新的出路，在本省境

内承担起开挖人工新河的任务；河南人民在暴雨陡涨时，宁可自己受淹，筑堤设坝保护安徽的安全……。今天，在全国各地水利建设工地上，到处都能感受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制度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推动着祖国水利建设一日千里地奔腾向前。

（三）

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八年来，水利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迅速成熟和成长起来。人们不仅彻底清算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水利建设的干扰和破坏，还对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使毛主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思想在亿万群众中空前普及，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水利建设方针进一步深入人心，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

最近几年来，我国亿万群众在大力兴修水利的同时，还注意了正确处理水土之间的辩证关系，开始了大规模的平整、深翻和改土等农田建设活动。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仅去冬今春以来的几个月时间，全国便扩大和改善灌溉面积五千万亩，平整土地七千八百万亩，深翻土地两亿多亩，修梯田一千四百万亩，改造低产田一千一百多万亩。从农田水利建设的实际效益来说，超过了解放以来的任何一年。

在我国辽阔的北方，干旱一直是妨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矛盾。由于全年降雨量很少，地面河经常断流，大量开发地下水便成为北方广大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在旧社会，就有许多村庄请过“风水先生”，算阴阳，找龙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未能找到地下水的踪迹。解放以后，人们在开发和利用地下水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心论先验论的流毒，给不少地区判处了“不能打井”的死刑，长期阻碍着人们真正掌握地下水的规律。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方广大干部和人民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坚信客观世界无论多么复杂和迷茫都是可以认识的，地下水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必然有自己的规律性。他们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科学方法，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终于在陇东、陕北、晋西北等许多长期被判为“贫水区”和“非宜井区”的山丘和高原，先后建成了一批机井。现在，全国已有机井一百三十多万眼，井灌面积达到了一亿一千万亩。

特别可贵的是，在地下水的勘探和开发过程中，我们的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不仅自觉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还十分注意总结经验，把大量零散的初级的感性认识上升为深刻的系统的理性认识，从而在打井工具、打井方法、机井布局和对咸淡水层的鉴别利用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成功的创造和革新。河北省邯郸地区打井指挥部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工人贾福瑞，克服了文化程度不高的困难，在自己正上学的外孙帮助下，花了两年

多时间，写出了十多万字的打井教材，这些教材有的已编印成册在全区推广。这说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一旦掌握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后，就能焕发出更多更大的聪明和才智。

在我国西南部变化多端的岩溶地貌区，水利工作者和各族劳动人民，坚持调查研究开发地下潜流的事迹，特别叫人感动。

岩溶，是指水流对石灰岩区域的溶蚀而造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在这种地区从事水利开发，是世界各国水利学者都感到头痛的问题。在干旱的季节里，土地龟裂，禾苗枯焦，到处看不到一点水迹，而就在这里的地下深处，却能听到流水的淙淙响声。深藏在岩溶地区的潜流，千百年来就这样神出鬼没。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广西水文工程地质队的桂西找水组以唯物论辩证法为武器，对在岩溶地区开发地下水问题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探索。他们在都安、宜山、罗城两千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山[redacted]间，调查了四百二十八个地下水点，勘察了四十四个深洞。他们在当地群众的积极配合下，终于查清了十九条地下河，解决了山区四万多亩农田的灌溉和一万多人的饮水问题。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他们逐步认识了地下岩溶的发育和地下河的运动规律，编制出我国第一张《岩溶地下河系分布图》，总结了一整套在岩溶地区开发地下水的工作方法。从他们身上，人们会喜悦地看到，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正为我们祖国哺育出多么聪明能干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

（四）

人们在水利战线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现实，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伟大的名言："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如果说二十五年前，我们的人民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去抗御洪涝，是为争取生存去同干旱战斗，那么今天，他们所想和所做的则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着眼点不仅早已不是一社一队、一区一县，甚至也不是一个省或一个流域，他们想的是如何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进一步实现水利化，是如何让水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江苏省扬州市东南的江都县，我们访问了我国目前最大的电力排灌站——江都抽水站。这个由三座大型排灌站以及其他十多项工程组成的水利枢纽，已经把长江和淮河流域联接起来。在干旱时，它把长江的水送进苏北里下河地区。遇到洪涝，它又将里下河的涝水排入长江。当我们到达这里时，一个功率更大的新的排灌站正在夜以继日地动工兴建。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豪迈地告诉我们说：长江向东海白流了几百万年，现在咱们要让它回头北上，逼它爬楼梯，翻山岭，去浇灌祖国北方的土地！

从宏伟的理想和总体规划出发，对亿万年形成的旧山河进行新的大规模的改造，使它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水利建设最鲜明的特色。人们难道

会忘记，去年夏季北方干旱，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面临断水的威胁，这时，源源的黄河流水沿着河南的人民胜利渠，经过卫河、卫运河和南运河，穿过河南、山东、河北三个省的九个地区、三十个县市，及时流到了天津的海河和北大港。翻开几千年史册，哪个朝代有过这样的奇事？哪个朝代有过这样的创举？

诚然，把大量的南水调到北方，彻底改变我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的不平衡状态，使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都成为水网密布、绿树成荫的鱼米之乡，这还只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幅理想的画图。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决不是十分遥远的未来，而是正被人们双手逐步创造着的现实。因为我们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亿万为祖国水利建设辛勤劳动的人民！

在四川中部仁寿县的一个山村，我们见到了一个名叫袁泽川的贫农社员。这个一直在生产队担任饲养员的五十五岁老人，为了给世代少水的仁寿县的水利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便自动利用工余和节假日时间，对全县水利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勘察。在一年多时间中，他走过全县十多个公社，爬过一百多个山头，往返行程两千多里。以后，又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把自己调查的水文资料绘成图表，向领导机关提出自己对全县水利建设的建议。袁泽川文化程度不高，更不懂绘图原理，但他没有因此而丝毫气馁。他用一团墨黑代表山丘，用一条蓝线代表河流，用图案加说明来表达自己的设想。年纪大了，拿起笔来手也抖，眼也花，常常画错，错了他就补个疤，补好疤接着再画，在补了六十多个疤以后，终于画出了一张桌面大的水利建设示意图。且不论这张图纸在仁寿县水利建设上有多少实用价值，但它决不是一张普通的水利蓝图，而是一个老贫农对人民赤胆忠心的结晶！

在湖北丹江口水利工地，我们听到人们广泛传颂着一个二十岁女青年为人民的水利事业献出生命的事迹。她是湖北光化县范冲公社的插队知识青年李悦萍，曾在引丹渠道主体工程施工中担任清泉沟工地上的“安全员”。为了让战友能安全地完成施工任务，她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过猛烈喷射的山泉，用自己的双手抱住过冲向战友的滚石。在一次开凿隧道的战斗中，她手打电筒，冒着弥漫的硝烟，冲进黑暗的隧洞去处理一处险情，不幸壮烈牺牲。人们发现，在她的呼吸停止以后，她手中紧握的电筒还继续发出银光，照亮着前进的道路……

还有一位名叫施恩久的老工人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他的老伴在江苏，儿子在上海，而他本人却随着祖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转战了二十三年。目前，他正在淮河北岸一条正在动工的新开运河上，为建设一座新的大型枢纽工程而忘我战斗。二十多年来，每年春节放假他回家探亲一次，有时假期不到便赶回工地。他从不向领导诉说自己家庭的任何困难，也从不为个人生活提出任何特殊的愿望。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我们不能光想自己的小家当，我们要多管社会主义的大江山！”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水利建设者！以这样宽广的胸怀，这样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样坚韧

不拔的革命意志去从事自己的劳动，还会有什么人间的奇迹不能创造出来！今天，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像葛士阳、李悦萍、袁泽川这样英雄的水利建设者又何止千万！他们身上还有半点昔日那种在自然灾害面前一筹莫展的奴隶相吗？完全没有了。正如毛主席早在大跃进年代就英明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人民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

徐迟

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

【题解】徐迟(1914—1997),浙江吴兴人,散文家、诗人,曾任《人民中国》(英文版)编辑、《诗刊》副主编,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地质之光》、《歌德巴赫猜想》等。《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报春花”,将当时“白专道路”的典型陈景润作为正面人物赞颂,鼓舞和激发了一代人崇尚知识的热情。作品刻画细腻,描写生动,人物形象鲜明,语言充满诗意,诸如数学是科学的王冠,而哥德巴赫猜想是王冠上的明珠等,无不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被他们攻击为“白专道路”。

——一九七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

一

命 $P_x(1,2)$ 为适合下列条件的素数 p 的个数:

$$x-p=p_1 \text{ 或 } x-p=p_2p_3$$

其中 p_1,p_2,p_3 都是素数。〔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

用 x 表一充分大的偶数。

命 $$C_x=\prod_{\substack{p|x\\ p>2}}\frac{p-1}{p-2}\prod_{p>2}\left(1-\frac{1}{(p-1)^2}\right)。$$

对于任意给定的偶数 h 及充分大的 x,用 $x_h(1,2)$ 表示满足下面条件的素数:p 的个数:

$$p\leqslant x, p+h=p_1 \text{ 或 } h+p=p_2p_3,$$

其中 p_1,p_2,p_3 都是素数。

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并改进作者在文献〔10〕内所提及的全部结果,现在详述如下。

[1] 《人民文学》,1978(1)。

二

以上引自一篇解析数论的论文。这一段引自它的“(一)引言”,提出了这道题。它后面是“(二)几个引理”,充满了各种公式和计算。最后是“(三)结果”,证明了一条定理。这篇论文,极不好懂。即使是著名数学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个数学的分支的,也不一定能读懂。但是这篇论文已经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公认,誉满天下。它证明的那条定理,现在世界各国一致地把它命名为“陈氏定理”,因为它的作者姓陈,名景润。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陈景润是福建人,生于一九三三年。当他降生到这个现实人间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对他呈现出玫瑰花朵一般的艳丽色彩。他父亲是邮政局职员,老是跑来跑去的。当年如果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飞黄腾达。但是他父亲不肯参加。有的同事说他真是不识时务。他母亲是一个善良的操劳过甚的妇女,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只活了六个、其中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和姐姐;下有弟弟和妹妹。孩子生得多了,就不是双亲所疼爱的儿女了。他们越来越成为父母的累赘——多余的孩子,多余的人。从生下的那一天起,他就像一个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似的,来到了这人世间。

他甚至没有享受过多少童年的快乐。母亲劳苦终日,顾不上爱他。当他记事的时候,酷烈的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打进福建省。他还这么小,就提心吊胆过生活。父亲到三元县的三明市,一个邮政分局当局长。小小邮局,设在山区一座古寺庙里。这地方曾经是一个革命根据地。但那时候,茂郁山林已成为悲惨世界。所有男子汉都被国民党匪军疯狂屠杀,无一幸存者。连老年的男人也一个都不剩了。剩下的只有妇女。她们的生活特别凄凉。花纱布价钱又太贵了;穿不起衣服,大姑娘都还裸着上体。福州被敌人占领后,逃难进山来的人多起来。这里飞机不来轰炸,山区渐渐有点儿兴旺,却又迁来了一个集中营。深夜里,常有鞭声惨痛地回宕;不时还有杀害烈士的枪声。第二天,那些戴着镣铐出来劳动的人,神色就更阴森了。

陈景润的幼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在家里并没有得到乐趣,在小学里他总是受人欺侮。他觉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不,是人,他还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只是他瘦削、弱小。光是这付窝囊样子就不能讨人喜欢。习惯于挨打,从来不讨饶。这更使对方狠狠揍他,而他则更坚韧而有耐力了。他过分敏感,过早地感觉到了旧社会那些人吃人的现象。他被造成了一个内向的人,内向的性格。他独独爱上了数学。演算数学习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

当他升入初中的时候,江苏学院从远方的沦陷区搬迁到这个山区来了。那学院里的教授和讲师也到本地初中里来兼点课,多少也能给他们流亡在异地的生活改善一些。这些老师很有学问。有个语文老师水平最高。大家都崇拜他。但陈景润不喜欢语文。他喜欢两

个外地的数理老师。外地老师倒还喜欢他。这些老师经常吹什么科学救国一类的话。他不相信科学能救国。但是救国却不可以没有科学，尤其不可以没有数学。而且数学是什么事儿也少不了它的。人们对他歧视，拳打脚踢，只能使他更加更加爱上数学。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却使他充满了幸福，成为唯一的乐趣。

十三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是死于肺结核的；从此，儿想亲娘在梦中，而父亲又结了婚，后娘对他就不如亲娘了。

抗战胜利了，他们回到福州。陈景润进了三义中学。毕业后又到英华书院去念高中。那里有个数学老师，曾经是国立清华大学的航空系主任。

三

老师非常渊博，又诲人不倦。他在数学课上，给同学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数学知识。不爱数学的同学都能被他吸引住，爱数学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

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论讨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支，名叫“数论”。十七世纪法国大数学家费马是西方数论的创始人。但是中国古代老早已对数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周髀》是最古老的古典数学著作。较早的还有一部《孙子算经》。其中有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据说大军事家韩信曾经用它来点兵。后来被传到了西方，名为孙子定理，是数论中的一条著名定理。直到明代以前，中国在数论方面是对人类有过较大的贡献的。十三世纪下半纪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潮了。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他的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比意大利大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出了五百多年。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著有《四元玉鉴》。他的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比法国大数学家毕朱，也早出了四百多年。明清以后，我们落后了。然而中国人对于数学好像是特具禀赋的。中国应当出大数学家。中国是数学的故乡。

有一次，老师给这些高中生讲了数论之中一道著名的难题。当初，他说，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大科学家。其中，有意大利大数学家欧拉；有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说到这里，教室里成了开了锅的水。那些像初放的花朵一样的青年学生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师说，你们都知道偶数和奇数。也都知道素数和合数。我们小学三年级就教这些了。这不是最容易的吗？不，这道难题是最难的呢。这道题很难很难。要有谁能够做了出来，不得了，那可不得了呵！

青年人又吵起来了。这有什么不得了。我们来做。我们做得出来。他们夸下了海口。

老师也笑了。他说，“真的，昨天晚上我还作了一个梦呢。我梦见你们中间的有一位同学，他不得了，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生们轰的一声大笑了。

但是陈景润没有笑。他也被老师的话震动了，但是他不能笑。如果他笑了，还会有同学用白眼瞪他的。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

第二天，又上课了。几个相当用功的学生兴冲冲地给老师送上了几个答题的卷子。他们说，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能够证明那个德国人的猜想了。可以多方面地证明它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算了！算了！”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你们这些卷子我是看也不会看的，用不着看的。那么容易吗？你们是想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些没有交卷的同学都笑话那几个交了卷的。他们自己也笑了起来，都笑得跺脚，笑破肚子了。唯独陈景润没有笑。他紧结着眉头。他被排除在这一切欢乐之外。

第二年，老师又回清华去了。他早该忘记这两堂数学课了。他怎能知道他被多么深刻地铭刻在学生陈景润的记忆中。老师因为同学多，容易忘记，学生却常常记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

四

福州解放！那年他高中三年级。因为交不起学费，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他没有上学，在家自学了一学期。高中没有毕业，但以同等学历报考，他考进了厦门大学。那年，大学里只有数学物理系。读大学二年级时，才有了一个数学组，但只四个学生。到三年级时，有数学系了，系里还是这四个人。因为成绩特别优异，国家又急需培养人才，四个人提前毕了业。

而且，立即分配了工作，得到的优待，羡慕煞人。一九五三年秋季，陈景润被分配到了北京！在第 x 中学当数学老师。这该是多么的幸福了呵！

然而，不然！在厦门大学的时候，他的日子是好过的。同组同系就只四个大学生，倒有四个教授和一个助教指导学习。他是多么饥渴而且贪馋地吸饮于百花丛中，以酿制芬芳馥郁的数学蜜糖呵！学习的成效非常之高。他在抽象的领域里驰骋得多么自由自在！大家有共同的 dx 和 dy 等等之类的数学语言。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三年中间，没有人歧视他，也不受骂挨打了。他很少和人来往，过的是黄金岁月；全身心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面。真想不到，那么快，他就毕业了。一想到他将要当老师，在讲台上站立，被几十对锐利而机灵，有时难免要恶作剧的眼睛盯视，他禁不住吓得打战！

他的猜想立刻就得到了证明。他是完全不适合于当老师的。他那么瘦小和病弱，他的学生却都是高大而且健壮的。他最不善于说话，说多几句就嗓子发痛了。他多么羡慕那些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下了课回到房间里，他叫自己笨蛋。辱骂自己比别人的还厉害得多。他一向不会照顾自己，又不注意营养。积忧成疾，发烧到摄氏三十八度。送进医院一检查，他患有肺结核和急腹症。

这一年内，他住医院六次，做了三次手术。当然他没有能够好好的教书。但他并没有放弃了他的专业。中国科学院不久前出版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它摆上书店的书架，陈景润就买到了。他一头扎进去了。非常深刻的著作，非常之艰难！可是他钻研了它。住进医院，他还偷偷地避开了医生和护士的耳目，研究它。他那时也认为，这样下去，学校没有理由欢迎他。

他想他也许会失业？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他节衣缩食，一只牙刷也不买。他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他积蓄了几乎他的全部收入。他横下心来，失业就回家，还继续搞他的数学研究。积蓄这几个钱是他搞数学的保证。这保证他失了业也还能研究数学的几个钱，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命就是数学。至于积蓄一旦用光了，以后呢？他不知道那时又该怎么办？这是难题；这是尚未得到解答的猜想。而这个猜想后来也证明是猜对了的。他的病好不了，中学里后来无法续聘他了。

厦门大学校长来到了北京，在教育部开会。那中学的一位领导遇见了他，谈起来，很不满意，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你们怎么培养了这样的高材生？

王亚南，厦门大学校长，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听到意见之后，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他不同意他所听到的意见。但他认为这是分配学生的工作时，分配不得当。他同意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

听说他可以回厦门大学数学系了，说也奇怪，陈景润的病也就好转了。而王亚南却安排他在厦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又不让管理图书，只让他专心致意的研究数学。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陈景润也没有辜负了老校长的培养。他果然精深地钻研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大厚本儿的《数论导引》。陈景润都把

它们吃透了。他的这种经历却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当初，我国老一辈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熊庆来，我国现代数学的引进者，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执教。三十年代之初，有一个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失了学，失了学就完全自学的青年数学家，寄出了一篇代数方程解法的文章，给了熊庆来。熊庆来一看，就看出了这篇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他立刻把它的作者，姓华名罗庚的，请进了清华园来。他安排华罗庚在清华图书馆中工作，一面自学，一面听课。尔后，派遣华罗庚出国，留学英国剑桥。学成回国，已担任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又聘请他当联大教授。华罗庚后来再次出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和依利诺的大学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罗庚马上回国来了，他主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中也很快写出了数论方面的专题文章，文章寄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一看文章，就看出了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也提出了建议，把陈景润选调到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正是：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

一九五六年年底，陈景润再次从南方海滨来到了首都北京。

一九五七年夏天，数学大师熊庆来也从国外重返清华。

这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熊庆来、华罗庚、张宗燧、闵嗣鹤、吴文俊等等许多明星灿灿，还有新起的一代俊彦，陆汝钤、王元、越民义、吴方等等，如朝霞烂熳，还有后起之秀，杨乐、张广厚等等已入北京大学求学。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涵数论、泛涵分析、几何拓扑学等等的学科之中，已是人才济济，又加上了一个陈景润。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条件具备了，华罗庚作出了战略性的部署。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向那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挺进！

五

要懂得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把早先在小学三年级里就学到过的数学再来温习一下。那些12345，个十百千万的数字，叫做正整数。那些可以被2整除的数，叫做偶数。剩下的那些数，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如2，3，5，7，11，13等等，只能被1和它本数，而不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叫做素数。除了1和它本数以外，还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如4，6，8，10，12等等就叫做合数。一个整数，如能被一个素数所整除，这个素数就叫做这个整数的素因子。如6，就有2和3两个素因子。如30，就有2，3和5三个素因子。好了，这暂时也就够用了。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写信给欧拉时，提出了：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二个素数之和。例如，6＝3＋3。又如，24＝11＋13等等。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行了这样的验算，一直验算到了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表明这是对的。但是更大的数目，更大更大的数目

呢？猜想起来也该是对的。猜想应当证明。要证明它却很难很难。

整个十八世纪没有人能证明它。

整个十九世纪也没有能证明它。

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想证明，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不太多的”数之和。他们想这样子来设置包围圈，想由此来逐步、逐步证明哥德巴赫这个命题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1＋1）是正确的。

一九二〇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法（这是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都不超九个的”数之和。布朗证明了：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9＋9），是正确的。这是用了筛法取得的成果。但这样的包围圈还很大，要逐步缩小之。果然，包围圈逐步地缩小了。

一九二四年，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一九三二年，数学家爱斯斯尔曼证明了（6＋6）；一九三八年，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5＋5）；一九四〇年，他又证明了（4＋4）。一九五六年，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一九五八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又证明了（2＋3）。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接近于（1＋1）了。但是，以上所有证明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其中的二个数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另外设置了一个包围圈。开辟了另一战场，想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他果然证明了（1＋6）。

但是，以后又是十年没有进展。

一九六二年，我国数学家，山东大学讲师潘承洞证明了（1＋5），前进了一步；同年，王元、潘承洞又证明了（1＋4）。一九六五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1＋3）。

一九六六年五月，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升上了数学的天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

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熳开放了。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等之上，他都改进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单是这一些成果，他那贡献就已经很大了。

但当他已具备了充分依据，他就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来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了。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统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

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去一步就是一步！他气喘不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他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真是艰苦卓绝！多少次上去了摔下来。就是铁鞋，也早该踏破了。人们嘲笑他穿的是通风透气不会得脚气病的一双鞋子。不知多少次发生了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明朗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他证明了这个命题，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

闵嗣鹤教授给他细心地阅读了论文原稿。检查了又检查，核对了又核对。肯定了，他的证明是正确的，靠得住的，他给陈景润说，去年人家证明(1＋3)是用了大型的，高速的电子计算机。而你证明(1＋2)却完全靠你自己运算。难怪论文写得长了。太长了，建议他加以简化。

本文第一段最后一句说到的“文献〔10〕”就是这时他以简报形式，在《科学通报》上宣布的，但只提到了结果，尚未公布他的证明。他当时正修改他的长篇论文。就是在这个当口，突然陈景润被卷入了政治革命的万丈波澜。滚滚而来的巨浪冲击了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颗颗的精神原子弹氢弹的成功试验一样，在神州大地上连续爆炸了。

六

无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治大革命。狡诈多变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壮丽的大革命，把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还有圣徒和魔鬼，一古脑儿卷了进去。检举和被检举，揭发和被揭发，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人人触及了灵魂；三千年积污要涤荡。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了；生活中大量的阴暗东西就自行暴露了。渣滓浮上表面了；驱除它们就容易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方

面，光明面，毫光四射了；阴暗东西的危害之大，也就越加明显了。

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论，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中国发生了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一次一次的胜利；一次一次的反复。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重新来过，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提高。它搜索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毫不留情。像马克思说过的要让敌人更加强壮起来，自己则再三往后退却，直到无路可退了，才作罗陀斯岛上跳跃；粉碎了敌人，再在玫瑰园里庆功。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英雄豪杰，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籽播下去，就有收获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

天文地理要审查；物理化学要审查。生物要审查；数学也要审查。陈景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老一辈的数学家受到了冲击，连中年和年轻的也跑不了。庄严的科学院被骚扰了；热腾腾的实验室冷清清了。日夜的辩论；剧烈的争吵。行动胜于语言；拳头代替舌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个筛子。什么都要在这筛子上过滤一下。它用的也是筛法。该筛掉的最后都要筛掉；不该筛掉的怎么也筛不掉。

曾经有人强调了科学工作者要安心工作，钻研学问，迷于专业。陈景润又被认为是这种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确实他成天钻研学问。不太问政治，是的，但也参加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这个朴素的道理他非常之分明。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他的立场站得稳。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在政治历史上，陈景润一身清白。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他曾下厂劳动，也曾用数学来为生产服务，尽管他是从事于数论这一基础理论科学的。但不关心政治，最后政治要来关心他。并且，要狠狠的批评他了。批评得轻了，不足以触动他。只有触动了他，才能使他今后注意路线关心政治。批评不怕过分，矫枉必须过正。但是，能不能一推就把他推过敌我界线？能不能将他推进“专政队”里去？尽量摆脱外界的干扰，以专心搞科研又有何罪？

善意的误会，是容易纠正的。无知的嘲讽，也可以谅解的。批判一个数学家，多少总应该知道一些数学的特点。否则，说出了糊涂话来自己还不知道。陈景润被批判了。他被帽子工厂看中了：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就有这样的糊涂话：这个人，研究(1＋2)的问题。他搞的是一套人们莫名其妙的数学。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 不等于 3 吗？此人混进数学研究所，领了国家的工资，吃了人民的小米，研究什么 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说这话的人才像白痴呢。

并不懂得数学的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说这些话的人中间，有的明明是懂得数学，而且是知道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名题的。那么，这就是恶意的诽谤了。权力使人昏迷了；派性叫人发狂了。

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理解一个数学家也不容易。至于理解一个恶意的诽谤者就很容易，并不困难。只是陈景润发病了，他病重了。陈景润听着那些厌恶与侮辱他的，唾沫横飞的，听不清楚的言语。他茫然直视。他两眼发黑，看不到什么了。他像发寒热一样颤抖。一阵阵刺痛的怀疑在他脑中旋转。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块青一块黑，一种猝发的疾病临到他的身上。他休克，他眩晕，一个倒栽葱，从上空摔到地上。“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二）

七

台风的中心是安静的。

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多少天多少月，“专政队”的生活反倒平静无事了。而旋卷在台风里面的人却焦灼着、奔忙着、谋划着、叫嚷着、战斗着、不吃不睡，狂热地保护自己的派性，疯狂地攻击对方的派性。他们忙着打派仗，竟没有时间来顾及他们的那些“专政”对象了。这时有一个老红军，主动出来担当了看守他们的任务。实际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他保护了科学家们，还允许他们偷偷地看书。

待到工人宣传队进驻科学院各所以后，陈景润被释放了，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住了。不但可以读书，也可以运算了。但是总有一些人不肯放过了他。每天，他们来敲敲门，来查查户口，弄得他心惊肉跳，不得安身。有一次，带来了克丝钳子；存心不让他看书，把他房间里的电灯铰了下来，拿走了。还不够，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

于是黑暗降临他的心房。

但是他还得在黑暗中活下去呵，他买了一只煤油灯。又深怕煤油灯光外露，就在窗子上糊了报纸。他挣扎着生活，简直不成样子。对搞工作的，扣他们工资；搞打砸抢的，反而有补贴。过了这样久心惊肉跳的生活，动辄得咎，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了。工作不能做，书又不敢读。工宣队来问：为什么要搞 1＋1＝2 以及 1＋2＝3 呢？他哭笑不得，张皇失措了。他语无伦次，不知道怎样对师傅们解释才能解释清楚。工人同志觉得这个人奇怪。但是他还是给他们解释清楚了。这（1＋1）（1＋2）只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并不是日常所说的 1＋1 和 1＋2。好像我们说一个人是纸老虎，并不就是老虎了。弄清楚了之后，工人师付（原文如此）也生气地说：那些人为什么要胡说？他们也热情支持他，并保护他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大野心家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下场遗臭万年去了。陈景润听到

这个传达之后，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情况渐渐地好转。可是他却越加成了惊弓之鸟。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唯一的心灵安慰从来就是数学。他只好到数论的大高原上去隐居起来。现在也允许他这样做了。图书馆的研究员出身的管理员也是他热情的支持者。事实证明，热情的支持者，人数众多。他们对他好，保护他。他被藏在一个小书库的深深的角落里看书。由于这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研究所继续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这样几年，也没有中断过；这是有功劳的。他阅读，他演算，他思考。情绪逐步地振作起来。但是健康状况却越加严重了。他从不说；他也不顾。他又投身于工作。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爬，爬，爬了，他要找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

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关心着科学院的工作，并且着手排除帮派的干扰。半个月之前，有一位周大姐被任命为数学研究所的政治部主任。由解析数论，代数数论等学科组成的五学科室恢复了上下班的制度。还任命了支部书记，是个工农出身的基层老干部，当过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的政治干事。

到职以后，书记就到处找陈景润。周大姐已经把她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但他找不到陈景润。他不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没有他的办公桌。他已经被人忘记掉了。可是他们会了面，会面在图书馆小书库的一个安静的角上。

刚过国庆，十月的阳光普照。书记还只穿一件衬衣，衰弱的陈景润已经穿上棉袄。

“李书记，谢谢你，”陈景润说，他见人就谢。“很高兴，”他说了一连串的很高兴。他一见面就感到李书记可亲。“很高兴，李书记，我很高兴，李书记，很高兴。”

李书记问他，“下班以后，下午五点半好不好？我到你屋去看看你。”

陈景润想了一想就答应了，“好，那好，那我下午就在楼门口等你，要不你会找不到的。”

“不，你不要等我，”李书记说。“怎么会找不到呢？找得到的。这是用不到等的。”

但是陈景润固执地说，“我要等你，我在宿舍大楼门口等你。不然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我就不好了。”

果然下午他是在宿舍大楼门口等着的。他把李书记等到了，带着他上了三楼，请进了一个小房间。小小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是刀把形的。显然它的主人刚刚打扫过清理过这间房了。但还是不整洁。窗子三槅，糊了报纸，糊得很严实。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飞进。李书记没有想到他住处这样不好。他坐到床上，说：“你床上还挺干净！”

“新买了床单。刚买来的床单，”陈景润说。“你要来看看我。我特地去买了床单，”指着光亮雪白的兰格子花纹的床单。“谢谢你，李书记，我很高兴，很久很久了，没有人来看望……看望过我了。”他说，声音颤抖起来。这里面带着泪音。霎时间李书记感到他被这声

音震撼起来。满腔怒火燃烧。这个党的工作者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不象话；太不象话了！这房间里还没有桌子。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怎么还有一只煤油灯？他发现了，原来房间里没有电灯。“怎么？”他问，“没有电灯？”

“不要灯，”他回答，“要灯不好。要灯麻烦。这栋大楼里，用电炉的人家很多。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要灯不好，要灯添麻烦了，”说着他凄然一笑。

“可是你要做工作。没有灯，你怎么做工作？说是你工作得很好。”

“哪里哪里。我就在煤油灯下工作；那，一样工作。”

“桌子呢？你怎么没有桌子？”

陈景润随手把新床单连同褥子一起翻了起来，露出了床板，指着说，“这不是？这样也就可以工作了。”

李书记皱起了眉头，咬牙切齿了。他心中想着：“唔，竟有这样的事！在中关村，在科学院呢。糟蹋人呵，糟蹋科学！被糟蹋成了这个状态。”一边这样想，一边又指着羊尾巴似的窗纱问道，“你不用蚊帐？不怕蚊虫咬？”

“晚上不开灯，蚊子不会进来。夏天我尽量不在房间里耽着。现在蚊子少了。”

“给你灯，”李书记加重了语气说，“接上线，再给你桌子，书架，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要不要，那不好，我不要，不……不……”

李书记回到机关。他找到了比他自己早到了才一个星期的办公室老张主任。主任听他说话后，认为这一切不可能，“瞎说！怎么会没有灯呢？”李书记给他描绘了小房间的寂寞风光。那些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人把科学院搅得这样！立刻找来了电工。电工马上去装灯。灯装上了，开关线也接上了。一拉，灯亮了。陈景润已经俯伏在一张桌子之上，写起来了。

光明回到陈景润的心房。

八

〔他写着，写着〕……

由(22)式及上式，当 x 很大时，有

$$M_1 \leqslant (8+24\varepsilon)Cx(\log x)^{-1} \sum_{\substack{x^{\frac{1}{10}}<p_1\leqslant x^{\frac{1}{3}}<p_2\leqslant\left(\frac{x}{p_1}\right)^{\frac{1}{2}} \\ n\leqslant\frac{x}{p_1p_2}}} \left(\frac{\Lambda(n)}{\log\dfrac{x}{p_1p_2}}\right)\Phi\left(\frac{x}{p_1p_2n}\right)。$$

由引理 1，本引理得证。

引理 8，设 x 是大偶数，则有

$$\Omega \leqslant \frac{3.9404xC_x}{(\log x)^2}。$$

〔引理 8 的一句话，读作“设 x 是一个大偶数，则有奥米茄小于或等于 3 点 9404xC_x，除以括弧中的罗格 x 的平方！”请注意，这一公式是解决歌德巴赫猜想的（1＋2）证明的主要关键。〕

证。当 x 很大时，由引理 5 到引理 7，我们有

$$\Omega \leqslant \left\{\frac{8(1+5\varepsilon)xC_x}{\log x}\right\}\left\{\sum_{x^{\frac{1}{10}}<p_1\leqslant x^{\frac{1}{3}}<p_2\leqslant\left(\frac{x}{p_1}\right)^{\frac{1}{2}}}\frac{1}{p_1p_2\log\frac{x}{p_1p_2}}\right\}, \qquad (23)$$

又有：

$$\sum_{x^{\frac{1}{10}}<p_1\leqslant x^{\frac{1}{3}}<p_2\leqslant\left(\frac{x}{p_1}\right)^{\frac{1}{2}}}\frac{1}{p_1p_2\log\frac{x}{p_1p_2}} \leqslant (1+\varepsilon)\sum_{x^{\frac{1}{10}}<p_1\leqslant x^{\frac{1}{3}}}\int_{x^{\frac{1}{3}}}^{\left(\frac{x}{p_1}\right)^{\frac{1}{2}}}\frac{dt}{p_1t(\log t)\log\frac{x}{p_1t}}$$

……

何等动人的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雪岭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可以解释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但是能升登到这样高深的数学领域去的人不多。

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又荡目，迷不知其所之。

闵嗣鹤老师却能够品味它，欣赏它，观察它的崇高瑰丽。他当时说过，“陈景润的工作，最近好极了。他已经把哥德巴赫猜想的那篇论文写出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写得极好。”

“你的论文写出了，”一位军代表问陈景润，“为什么不拿出来？”陈景润回答他：“正做正做，没有做完。”军代表说，“希望你早日完成。”

室里的领导老田对李书记说，“可以动员动员他，让他拿出来。但也不急。他不拿出来，自然有他的道理的。”

李书记问了问他，陈景润说，“有人还在骂我，说我不交论文是因为现在没有稿费了。说是恢复了稿费我就会交了。”李书记追了他一句，“谁这样说你？”他回答，“你不要问了。谢谢你，你可别去问呵！问了我更麻烦了。没有稿费，谢天谢地。我不要稿费。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它。那个稿子我还在做。我确实没有做完。”

九

“我确实还没有做完。我的论文是做完了，又是没有做完的。自从我到数学研究所以来，在严师、名家和组织的培养、教育、熏陶下，我是一个劲儿钻研。怎么还能干别的事？不这样怎么对得起党？在世界数学的数论方面三十多道难题中，我攻了六七道难题，推进了它们的解决。这是我的必不可少的锻炼和必不可少的准备。然后我才能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为此，我已经耗尽了我的心血。

“一九六五年，我初步达到了(1＋2)。但是我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两百多页的稿子。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正确性，(二)简洁性。譬如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儿道，长达两百多页，也还没有发表。国外没有承认它，也没有否认它，因为它没有发表。从那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七年。

“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也是难于被人理解的。从学习外语来说，我是在中学里就学了英语，在大学里学的俄语；在所里又自学了德语和法语。我勉强可以阅读而且写写了。又自学了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到了勉强可以阅读外国资料和文献的程度。因而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成就时，可以从原文阅读，用不到等人翻译出来了再读。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必须检阅外国资料的尽可能的全部总和，消化前人智慧的尽可能不缺的全部的果实。而后我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解答(1＋2)这样的命题。

“我的成果又必须表现在这样的一篇论文中，虽然是专业性质的论文，文字是比较简单的；尽管是相对地严密的，又必须是绝对地严密的。若干地方就是属于哲学领域的了。所以我考虑了又考虑，计算了又计算，核对了又核对，改了又改，改个没完。我不记得我究竟改了多少遍？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最严格的，必须是最严格的。

“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

十

一九七三年二月，春节来临。

早一天，数学研究所的周大姐说，佳节前后，要特别关心一下病号。她说：“那些老八路的作风，那些过去部队里形成的作风，我们千万不能丢掉了。尤其像陈景润那样的同志，要关心他，他很顽强。他病得起不来了，但又没有起不来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挣扎起来，他坚持工作。他为什么？他为谁？为他自己吗？为他自己，早就不干了。不是，他是为人民，

为党工作。我们要去慰问他。也要慰问单位里所有的病人。”

其实，外表看来魁梧，说话声音洪亮的周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力疾从公，患有心脏病，应当受到慰问的人。

大年初一早晨，周大姐和几个书记，包括李书记，一行数人，把头天买好了的苹果、梨子装进一些塑料网线袋子。若干袋子大家分头提了，然后举步出发，慰问病人。他们先到陈景润那里。他住得最近。

陈景润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大家招呼他。他很惊讶，来了这许多的领导同志。周大姐说，“过春节，我们看你来了，你的病好点了吧。”李书记也说，“新年好，给你贺新年。”陈景润说，“噢，今天是新年了呵？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新年好，你们好。”李书记说，“到你屋里去坐坐吧。”

“不，不行，”陈景润说，“你没有先给我打招呼，不能进去。”

周大姐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们就不去了。李书记，你给他送水果上楼吧。我们还上别家去，你回头再赶上我们好了。”李书记说，“好。”周大姐和陈景润握手，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然后转过身走了。李书记把水果袋递给陈景润说：“春节了。这是组织上送给你的。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多给党做点工作。”“不要水果，不要水果，”陈景润推却了，“我很好，我没有病，没有什么……这点点病，呃……呃，谢谢你，我很高兴。”说着说着他收下了水果。李书记说，“上你屋聊聊？”他又张手拦住，“不，不要进屋了，你没有给我打招呼。”

李书记说，“那好，我不上去了。你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我也得去追上他们，到别家去看望看望。”于是握手作别，他返身走。刚走两步，后面又叫，“李书记，李书记！”陈景润又追过来，把水果袋子给了李书记，并说，“给你家的小孩吃吧。我吃不了这么多。我是不吃水果的。”李书记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不过表示表示，一点点的心意罢了。要你好好保养身体，可以更好地工作。你收下吧，吃不下，你慢慢的吃吧。”

他默然收下了。他默默地送李书记到大楼门口。李书记扬手走了，赶上了周大姐他们的行列。陈景润望着李书记的背影，凝望着周大姐一行人的背影消失在中关村路林荫道旁的切面铺子后面了。突然间，他激动万分。他回上楼，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他飞快地进了小屋。一下子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他没有再出来。直到春节过去了。头一天上班，陈景润把一叠手稿交给了李书记，说：

“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李书记看他，又轻声问他：“是否那个(1+2)？”

“是的，闵老师已看过，不会有错误的，”陈景润说。

数学研究所立即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学术报告会。十几位专家，听了陈景润的报告，一致给以高度评价。然后，数学研究所业务处将他的论文上报院部。

十一

显见，我们有

$$P_x(1,2) \geqslant P_x(x, x^{\frac{1}{10}}) - \left(\frac{1}{2}\right) \sum_{x^{\frac{1}{10}} < p < x^{\frac{1}{3}}} P_x(x, p, x^{\frac{1}{10}}) - \frac{\Omega}{2} - x^{0.91}。 \qquad (28)$$

由(28)式、引理 8 及引理 9，即得到定理 1

$$P_x(1,2) \geqslant \frac{0.67 x C_x}{(\log x)^2}$$

的证明。

完全类似的方法可得到定理 2 的证明。

以上就是陈景润的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三)结果”。作为结果的定理就是那个“陈氏定理”。

四月中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武衡同志在会上作报告。他说到数学研究所一位中级的研究员作出了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当时没说人名。李书记在座中，听到了，还不知说谁？旁边的人捅了他一下。“干什么？”他问。那人说，“你听到没有？”“怎么啦？”那人又说，“这活儿是陈景润做出来的呵！”“噢？还这么重要？”那人说，“这是世界名题。真不简单！”

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来访。他见到了陈景润，谈了话，进他房间看了看。回去就写出一篇报道，立即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其中，说到了陈景润的经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重大的科研成果以及他现在还住在一间烟熏火烤的小房间里。生活条件很差！疾病严重！！生命垂危！！！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作出了指示。

当天深夜，武衡同志走进了陈景润的小房间。

他立即被送进医院，由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给他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他患有多种疾病。他们要他立即住院疗养，他不肯。于是，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他一共住院一年半。

在住院期间，敬爱的周总理曾亲自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是副总理)安排了陈景润的全国人民代表席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景润见到了周总理，并和总理在一个小组里开会。人代会期间，当他得知总理的病时，当场哭了起来，几夜睡不着觉。大会后，他仍回医院治疗。

当他出院的时候，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经住院治疗后，一般情况较好。精神改善；体温正常。体重增加十斤；饮食睡眠好转。腹痛腹胀消失；二肺未见活动性病灶。心电图正常；脑电图正常。肝肾功能正常；血沉及血象正常。”

关于他的工作和健康,华主席也非常关怀,并亲自作过几次批示。

早在他的论文发表时,西方记者迅即获悉,电讯传遍全球。国际上的反响非常强烈。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正在印刷所付印。他们见到了陈景润的论文立即停止印刷,并在这部书里加添了一章,第十一章:“陈氏定理”。他们誉之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在国外的数学出版物上,诸如“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等等,不胜枚举。一个英国数学家给他的信里还说,“你移动了群山!”真是愚公一般的精神呵!

或问:这个陈氏定理有什么用处呢?它在哪些范围内有用呢?

大凡科学成就有这样两种:一种是经济价值明显,可以用多少万,多少亿人民币来精确地计算出价值来的,叫做“有价之宝”;另一种成就是在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宇宙天体、基本粒子、经济建设、国防科研、自然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等等之中有这种那种作用,其经济价值无从估计,无法估计,没有数字可能计算的,叫做“无价之宝”,例如,这个陈氏定理就是。

现在,离开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这是最难的一步。且看明珠归于谁之手吧!

十二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得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于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纯数学毕竟是非常现实的材料的反映。“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恩格斯)陈景润通过数学的道路,认识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他在诚实的数学探索中,逐步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没有一定的世界观转变,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这巨大贡献。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抗拒地促使他突变。被冷酷地逐出世界的人,被热烈的生命召唤了回来。帮派体系打击迫害,更显出党的恩惠温暖。冲击对于他好像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得到了锻炼而成长了。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不可能写出如此成熟的论文。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他的进步显著。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今后,可以信得过,他不会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继续改造。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题解】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即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转载,引发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

[1] 《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1 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97 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8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1 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9 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1 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

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5 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42 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新华社·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1]

南振中

【题解】南振中，当代名记者，原新华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中国记协副主席，曾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新闻名篇《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是一篇散文式报道，作品层层紧扣党和人民鱼水关系的主题安排材料，结构疏朗而精致，抒情动人而自然，议论深刻而平实，具有耐人寻味的新闻魅力。

河里的鱼儿啊，
没有水就没有家。
——摘自沂蒙山民歌

这是我第三次踏上了去沂蒙山的路程。

汽车沿盘山公路吃力地爬行着。透过车窗，那奇伟的蒙山群峰，淙淙的沂河流水，一道道绿荫覆盖下的山峪，是那样的熟识，那样的亲切。

我头一次到沂蒙山，是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沂蒙山披上了银装。我背着铺盖卷，从一条山峪到另一条山峪，徒步采访，行程千余里。听到许多过去艰苦岁月里党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故事，我的心深深地被打动了。在沂河西岸，几位被誉为“红嫂”的农村妇女，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的伤员；在红石峪，老区委书记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东洋刀，宁可跳崖牺牲，也不说出我野战医院隐藏的地点；在蒙山深处，有的老大娘为了掩护革命干部，不惜献出亲生儿子的生命。……

可是，当我第二次来到沂蒙山时，这里的人民却在遭受苦难。林彪、“四人帮”在山东的代理人所豢养的“棒子队”，戴着柳条帽，掂着“水火棍”，四出“扫荡”，横行乡里。老大娘抱着老母鸡，提着包袱，到处“跑反”；谁家小孩哭闹，只要说一句“棒子队来了”，就会立即停止了啼哭。后来，“棒子队”完蛋了，然而党群关系却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干部对根据地人民的感情淡薄了，有的甚至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沂蒙山的人民多么怀念革命战争年代

[1] 新华社济南 1978 年 10 月 1 日电。

的好传统啊！

这次，我又有机会在沂蒙山腹地的蒙阴县住了一段时间。旧地重游，强烈地感受到“抓纲治国”给沂蒙山区带来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干部作风的变化。他们自觉地医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所造成的“内伤”，关心群众的疾苦，替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爱戴和拥护。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培育起来的“鱼水关系”，在新的长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还是让我从“水”的故事谈起吧：

在沂蒙山区的崇山峻岭中，竖立着两座雄伟的石崮。抗日战争时期，我鲁中军区十一团八连的九十三名指战员，曾经坚守在这方圆不到十里的崮顶上，扼住敌人进犯沂蒙山区的咽喉。这便是著名的南北岱崮保卫战。

崮顶上没有井，也没有山泉。要守住阵地，必须有足够的水。为了运送战备水，山半腰的岱崮村全民总动员，从十二岁的孩子到六十多岁的老大爷，挑着小泥罐、水壶和铁桶，到离村几里外的山泉挑水上山。三天三夜，把崮顶蓄水洞里的水缸挑得溜满。争夺岱崮的战斗是残酷的。鬼子向崮顶泻下四十万磅的炸弹和炮弹，掩体炸烂了，蓄水洞里的水缸震裂了，水流光了。烟熏火燎，战士们的嘴唇干裂，嗓子眼里直冒火。一些重伤员危在旦夕。

水，成了革命战士的生命。

一天夜里，皑皑白雪覆盖了南北岱崮。岱崮村民兵队指导员伊淑德带领着七名共产党员、四名基干民兵，从十五里外挑着十二担水，上崮来了。山下，是一道道封锁线。日本侵略者的帐篷外面，燃烧着熊熊的篝火。为了不弄出响声，乡亲们用白布扎着罐口，脱掉鞋子，赤着脚在雪地里走。忽然，照明弹亮了，子弹象蝗虫一样向山上猛扫。他们趴在雪窝里，护着水罐，慢慢地往前爬，终于把清凉的泉水送到守崮战士的嘴里。

可是，解放了二十多年，岱崮村却一直缺水。他们修过水池，挖过塘，打过许多小井，都解决不了水的问题。有人说：“头皮割破能淌多少血！在这山顶上，怎么能打出水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蒙阴县委负责同志来到岱崮大队，听了群众的呼声，感到痛心。在艰苦的岁月里，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送水；如今，政权在我们手里，连群众的吃水问题都没有解决。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能够心安理得吗？县委下决心帮助岱崮大队解决吃水问题，把县里最好的一台钻机调到岱崮山上。山区尽是羊肠小道，为了运送机器，县里出钱修了一条九华里长的简易公路；还架设了六华里长的高压输电线路。机井打成以后，又帮助安装了电动深井泵。为了岱崮大队这口井，国家投资达三万多元。

试水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围到机井旁。电闸一推，电机飞转，只见清清的泉水从水泵管里喷射出来，水花四溅。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刘月平，手捧清水热泪滚。他说：“是共产党派人给咱们打成了甜水井，我要告诉儿孙们，世世代代不能忘了党的恩情！”

在县水利局，我看到一幅《蒙阴县缺水大队分布图》，图的左侧附着一张《缺水情况统计表》。哪个村子缺水，准备用什么办法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标得一清二楚。县委的同志说：

帮助山区人民解决吃水困难，是个思想感情问题。想想山区人民在战争年代对我们的支援，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把水送到沂蒙山区的千家万户。

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蒙阴县有些水利设施遭破坏，有些山林被砍伐，老根据地的人民仍然过着比较贫苦的日子。拿孟良崮山前的垛庄公社来说吧，一九七一年以前全社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三百来斤，社员从集体分得的口粮平均只有二百多斤，多数生产队没有现金分配。

一九七一年冬天，济南部队某部拉练来到孟良崮。一些当年亲自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老首长，看到这里还是打仗时的老样子，很有意见。他们找到县委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这里是老根据地。在艰苦的岁月里，人民倾其所有支援我们。现在，我们有责任尽快地把孟良崮建设好。”

这热情而又诚恳的批评，对蒙阴县委触动很大。县委派原副县长丁立润担任垛庄公社党委书记，又调了一名较强的公社党委书记去当第二把手。新党委成立后，丁立润把全体党委成员带到孟良崮烈士陵园，学英雄，忆传统，进行阶级教育，开门整风。公社所有的干部都把确保社员增产增收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几年功夫，全公社就发展了三万多棵苹果，四十五万墩花椒，五百二十万棵桑树，还新开了一千亩茶园。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

我来到孟良崮烈士陵园附近的泉桥大队访问时，正值八月中秋，抢收抢种的紧张气氛同节日的欢乐气氛交织在一起，老远就能听到社员们爽朗的笑声。我走进残废军人苏志庆的家，他一家正在吃饭，小方桌上摆着一盘煎鱼，一盘鸡蛋，一碗熬豆角，一盘炒腰花。苏志庆告诉我，节前他家割了五斤猪肉和二斤羊肉，买了四斤月饼，磨了五十斤白面，还打了二斤白干和一瓶“蒙山大曲”。记者接连串了六个门，家家都有肉、酒、月饼和白面。陪我串门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说：“现在跟先前大不一样了。前几年常常为分救济款的事吵架；今年麦收以后，每个生产队都分了现款。为了过八月十五，第一生产队拿出五百元现金，挨门挨户地问，看谁家需用。打倒了‘四人帮’，咱这老根据地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人民群众才能把心放在革命上”。这是蒙阴县各级领导干部的共同体会。他们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诚意地帮助群众解决吃饭问题、花钱问题、住房问题、生小孩子问题、路和桥的问题。岸堤水库有个“葫芦把”，一百多米宽的水面，把旧寨公社一劈两半。南来北往的行人，夏天撑船，冬天走冰凌，年年有人掉进冰窟窿。县里投资二十多万元，为库区群众修了一座八米宽的十五孔大桥。刘官庄公社出路崎岖，社员运煤，推着小车，爬沟上坡，三十里得走一整天。公社党委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修起了一条环山公路。如今，汽车可以把煤炭卸到社员的锅屋后。前几年，有的干部单纯追求粮食产量，把一些小杂粮砍掉了。近两年来，许多社队从社员的实际需要出发，种了绿豆、黄豆、芝麻、小米和高粱。社员们夏天可以喝到绿豆汤，冬天可以吃到小豆腐。生孩子的妇女可以喝到补养身体的小米粥。庄户人家有吃、有穿、有钱花，解除了后顾之

忧，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岱崮公社贾庄大队，我访问了“愚公治山队”。这些在旧社会饱经风霜的老人，当亲身感受到党的温暖的时候，恨不能把一身的劲全都使到集体上。他们说：“人无千年寿，却有万年心”，决心用自己结满老茧的手，把荒山建设成金山银山花果山。

破坏和糟践一种好的传统，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气力；恢复和发扬一种好的传统，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尽管蒙阴县委反复强调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坦埠公社艾山前大队，去年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把自留地收掉了。社员每五天要赶一次集，购买青菜。五口之家，每人每天二分钱菜金，全年就是三十多元。这不仅加重了社员的负担，也给群众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今年夏收以后，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庆群到这个大队检查工作，发现了这个问题，立即给他们讲解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新宪法中关于自留地的政策规定。十天以后，艾山前大队就把自留地退还给社员，大都种上了茄子、辣椒、萝卜、白菜。人们再也用不着到几里外的集市上买菜吃了。

得民心者治天下，失民心者乱天下。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们凭借着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打垮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天，在新的长征中，只要我们不忘记曾经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民群众，时时处处关心他们的利益，那么，沂蒙山人民将会象战争年代一样，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新华社·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

新华社记者

【题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5日，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重大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为此后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和平反昭雪开启了先河。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 新华社北京1978年11月15日电。

人民日报·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1]

范敬宜

【题解】范敬宜，字羽诜，江苏吴县人，著名报人。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2002年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著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有人提出政策过头了，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了等。面对这种形势，作者选择辽西贫困山区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写出这篇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新闻作品。

【编者按】：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各方面工作向前发展，受到广大群众、干部的热烈欢迎。但是，正如《辽宁日报》记者写的这篇述评所说的一样，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在基层才刚刚开始贯彻，有些同志就叫嚷什么“强调自主权过头”了。有一部分县社干部搞瞎指挥，搞强迫命令搞惯了，现在老办法行不通了，就大喊什么下面“不听指挥”呀，“乱了套”呀。究竟自己指挥得正确不正确？下面的意见有没有道理？根本不去了解。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或者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作为新闻工作者，要象《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本报讯《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述评辽宁省农村形势：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见这样的埋怨声：“生产队自主权强调过头了，现在下面都不听指挥了……。”

[1]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6日，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刊发时原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编者按为《人民日报》转载时所加。

说这类话的，不仅有县社干部，也有城里的机关干部，有的还列举了许多当前农村中出现的问题，似乎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生产队有了自主权。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一些社队。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向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普遍的回答是："活起来了！"这个"活"字，很形象地概括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以后，在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上出现的生动局面。人们对"活"字感受如此深刻，绝非偶然：过去十多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下，生产队自主权遭到肆意践踏、剥夺和侵犯，生产队不用说因地制宜地确定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就连种一亩土豆、一亩谷子都成了犯罪，生机勃勃的千村万户被弄得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深入贯彻，生产队自主权重新摆到了它应有的地位，人们哪能不由衷高兴！但是，不能设想，林彪、"四人帮"在十多年中造成的影响，可以在短短几个月消除净尽。在贯彻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政策的过程中，阻力还是很多的。从目前来看，在不少生产队，自主权还仅仅意味着在作物地块和品种的选择上有了一点余地，其他还谈不上；而有些生产队，连这点权利还没有得到。有的队干部和社员对我们说："我们只有劳动权，没有自主权。"这种现状告诉我们：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已经"过头"。

那么，有了自主权的生产队是不是都"不听指挥"了呢？我们还是多看事实吧！有一个县，也曾被人描绘成自主权多得"乱了套"，可是一调查，今年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都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天下哪有这样"不听指挥"的生产队！后来我们渐渐摸到了一个"窍门"：遇到埋怨下面"不听指挥"特别厉害的干部，就叫叫真，请他提供一个"最不听指挥"的典型，一下子就"将军"了，因为这样的典型确实很难找。这说明，有些干部，特别是上面的干部，并没有亲自调查研究，而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是懂得如何正确行使自主权的，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那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不顾国家计划、不听正确指挥的生产队虽然也有，应当做好他们的工作，处理好自主权同党的领导的关系，但这样的生产队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把支流当作主流。再说，对于"不听指挥"，也要作具体分析：究竟是正确的指挥，还是错误的指挥、瞎指挥？事实上，凡是指挥受阻的地方，一般都事出有因。我们问过一位县委书记，今年在哪些问题上卡过壳，他很坦率地举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某项县办水利工程继续平调生产队的劳力；第二件是不经试验就大面积推广某种作物；第三件是在播种时间上不顾实际情况又搞了"一刀切"。他说："这不能怨下面，应该从上面来检查。过去生产队遇到这种情况，都忍气吞声，现在他们敢说话、敢抵制了，这应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可惜能够这样严以解剖自己的领导干部，现在不是很多。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既然是这样一件大得人心的好事，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多非议？通过调查，我们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十多年来有些干部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

响较深，思想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需要有一个过程。有的老干部忘记了群众路线的老传统，也习惯于那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手段了；有些比较年轻的干部，从当干部那一天起，就没有听说过生产队还有什么自主权，接触的就是“挖修根”“拔修苗”以及“一声雷”“一刀切”那一套，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看到原来唯命是从的基层干部居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就认为大逆不道，“乱套了”，甚至对党的政策也产生了怀疑。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是保证生产队自主权正确行使的关键。

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是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去继续贯彻落实。大量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对客观形势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估计，分清主流与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作“过头”。这是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前提。否则就会左右摇摆，贻误工作，甚至像毛主席讽刺过的那位好龙的叶公那样，天天念叨生产队自主权，等到自主权真正来临的时候，又惊慌失措，迷失方向了。

解放日报·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1]

《解放日报》记者

【题解】这篇消息报道了上海的一起普通交通事故，被评为1979年的全国好新闻。在“文革”及其刚刚结束时期，新闻宣传只报喜，不报忧。正因如此，本文记者“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才显得难能可贵。本文详细交代了事故的后果、原因及善后情况，解答了大家热切关注的问题，澄清了一些谣传。它突破了当时的报道禁区，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也开启新时期媒体公开报道所谓“负面新闻”的序幕。

本报讯 昨天清晨6点20分左右，一辆26路无轨电车驶经淮海中路近宛平路口时，发生了翻车事故，车上近60名乘客内有26人受伤，其中4人受伤较重，并造成车辆严重损坏。

事故发生后，记者赶赴现场。据出事地点淮海中路1720号的同志告诉记者：6点20分左右，只听得“轰”地一声巨响，围墙受到26路电车猛烈撞击，灰砂乱飞，墙上撞开近10米大的缺口，电车立即侧身翻倒在地上；乘客们纷纷从车门和窗口里爬出来，不少人因翻车撞伤，但大部分是轻伤。

据记者向有关方面了解，发生翻车事故的这辆26路电车，车号为08—50604，驾驶员姓陈，是个青年，今年一月才考取司机执照。当时，他从八仙桥发车向徐家汇方向行驶，马路上行人稀少，他的车速过快，当行至近宛平路口时，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两位女同志正沿马路行走，为了避开行人，他立即将车往左驾让，又看到前方马路中心线上有一辆三轮拖车，他又将车往右驾让，然后再往左驾让。刚绕过车子，紧接着他又发现左前方还有一个过路的女同志，眼看要撞倒她。这时，这个年轻的驾驶员由于缺乏经验，连续避让，有点惊慌，当他将车子猛向右驾让时，车子撞倒一棵行道树后，冲上了人行道，撞倒了围墙。由于车速过快，又连续作“S”形行驶，车头撞上墙头后，车身失去平衡，造成了翻车伤人。

事故发生后，市公安局、徐汇区公安分局、市公用事业局、市公交公司、电车三场等部门的领导人员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维持交通秩序，并去医院和受伤者家中慰问受伤乘

[1] 《解放日报》，1979年8月12日。

客。由于这次事故，淮海中路宛平路地段的交通为此封闭了近3个小时，26路电车改由淮海路宝庆路驶往徐家汇。

这次事故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包括4名受伤较重的乘客，包扎后也已出院)，但是上海解放30年来罕见的。据徐家汇区交通队副队长聂启昌称，据初步分析，事故责任主要在驾驶员，待进一步调查后，将对这一严重事故作出严肃处理。

市公交公司和电车三场有关领导表示，将对这一事故作深入检查，并认真吸取教训。

人民日报·伟大的平凡——科龙贝行遐思[1]

朱启平

【题解】 朱启平（1915—1993），原名朱祥麟，浙江海盐人，名记者。1945年由《大公报》派往美国太平洋舰队任随军记者，有《落日》等名篇传世。建国后任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8年调任香港《大公报》编辑部主任。《伟大的平凡——科龙贝行遐思》一文，记录了作者瞻仰戴高乐将军墓地的心灵感触，蕴涵了深层的思索。

汽车停在从巴黎去科龙贝一双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门前，我们下车选购了一盆洁白的菊花，捧上车，继续这往返千里的旅程。

车在田野间平坦的公路上疾驶。十月中旬的这一天，秋阳朗照；法国的农村，恬静美丽。地里庄稼已经收割，不时看见猎人携枪漫步搜索，一条小狗前后欢奔。庄稼地里和边缘上的丘陵丛林中，不知哪里会窜出一只野兔来哩。

然而，我的思绪不太能够使我欣赏田野风光。上了年纪、生于忧患的人，看见这种安适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产生对比。更何况我们此去是专程瞻仰戴高乐将军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早在抗战时期，在四川重庆。那时我在报馆工作，天天接触到国内外战局的发展。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前方节节败退，后方物价飞涨，和谣蜂起，人心浮动。只有西北、华北，人民抗战的烽火遍地燃烧，越烧越旺，鼓舞全国人民打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在欧洲，希特勒侵占波兰，在积极准备后，突然发动西线战事，以强大的机械化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突入法国。法国军方昏庸无能，指挥失当，兵败如山倒。巴黎的政府惊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维希成立贝当政府。半个法国被纳粹占领，另外半个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法国人民奋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乐。他当时不过是个陆军部的副部长，毅然决然，挺身而出，高举民族抗战大旗，发动“自由法国”的抵抗运动。

这是战火纷飞、风雨晦冥的日子啊！

车窗前，远处是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头。翠绿之中，一个棕色的双十字架高耸入云，那是“自由法国”的徽号。戴高乐将军之墓快到了。

---

[1]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5日。

司机没有在小山脚下停车，而是绕向前去，直驶附近一个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建筑物，屋顶墙壁，饱经风雨，有一点败落景象。一道半圆形的短垣，拱绕着教堂。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墓，一个挨一个，稍稍隆起地面，是石头砌的，上面竖着或者浮雕着一个十字架，墓碑上写着死者的姓名。戴高乐将军的墓在哪里呢？我们捧着菊花，沿着墓丛中的小径，缓步寻觅。

真使我惊呆了。戴高乐将军的墓，就在小径尽头，也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上写着："安妮 · 戴高乐，一九二八——一九四八"。右侧的石面上写着："夏尔 · 戴高乐，一八九〇——一九七〇"。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前一个花瓶，插着杂色的花朵，大概是从本村中采撷来的。那白色稍带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就在这小小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达的！

说惊呆了，是由于我对戴高乐将军安葬的情况略有所知。他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全法国一片悲声。将军生前遗言葬在他女儿身边。女儿生来有病，二十岁夭折，作为父亲，是十分痛心的。将军的葬礼俭朴，不吹号，也没有乐队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将军的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三百五十法郎(当时约合六十三美元)买的。……我真没有想到，将军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国人民深深铭记着将军对法兰西民族的丰功伟绩。就在科龙贝—双教堂举行葬礼的同时，巴黎五十多万群众冒着秋雨，自发涌上街头，在雄壮的《马赛曲》乐声中，迈着沉重的步伐，汇集到爱丽舍田园大街近旁的凯旋门广场，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周围是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古树旧屋，没有任何修饰。这地方，离开最近的火车站有十多公里，也没有直达这里的公共汽车。谁要来，只能开车。就在我们徘徊沉思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国人来到墓前，默默注视着墓石，没有人谈笑，说话声音都低低的，生怕惊动了父女的安眠。这时还开来了两辆大旅游车，那显然是外国的游客。他们走路，脚步也特别轻。

离开墓地，我们驶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顶。那双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许多石块垒成，护以钢筋，有十多层楼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独立，睥睨四野。周围林木森森，纵目远眺，田野和森林，交织着伸向天际。这当然是为纪念戴高乐将军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光荣。

戴高乐将军是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为法国政治带来了稳定。政治上的稳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发展。他排除万难，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涛起

伏的，最后一次参加公民投票后，就不当总统了，退居科龙贝—双教堂。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给他的宅邸，他拒绝迁居；他靠自己的稿费度日，还为了纪念夭折的女儿，把自己大部分的钱捐作儿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乐夫人住进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不要政府津贴，不要儿女供养（除早亡的女儿外，戴高乐夫妇还有一子一女），不与外界往来。她已七十九岁高龄。当我们离开巴黎时，她因病入医院，但旋即去世。

“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是戴高乐将军的名言。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然而他还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一个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办事的人，一个不要特权的人，一个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战士，他来得光明，去得清白，丰功伟绩，皎皎晚节，永远是法国的骄傲。

暮色苍茫中，我们驶返巴黎。我们惦记着那盆洁白的菊花。在戴高乐将军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别的花是不让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对面，有一大如圆桌面的平台，上面放着几块戴高乐将军的战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纪念牌。我们的菊花就放在一块镌有将军姓名的石牌前。

中国青年·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1]

潘晓

【题解】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随即引发一场人生观大讨论。其间，《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潘晓"来信提到的一些想法，如"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等，对过去简单化教育进行质疑的同时，也显示了整个社会开始向功利化、世俗化转型的动向与趋势。"潘晓"其实是两个人，男的名叫潘玮，是一名大学生，女的名叫黄晓菊，是一名工人。他们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相似的困惑和思考，于是中国青年杂志社将他们的观点整理成一篇"读者来信"，并将两人名字合为一个笔名"潘晓"。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

[1] 《中国青年》，1980(5)。

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

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了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 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滚,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郎台、涅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 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

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　晓

1980 年 4 月

新华社·飞向太平洋——我国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目击记[1]

黄彩虹

【题解】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这是继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之后，我国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引起世界瞩目。这篇新华社报道突破一般消息的局限，以多种手法生动再现了火箭发射前后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语言简练活泼，节奏张弛有度，在新闻文体尚未从过去的"党八股"桎梏下完全摆脱之际，这样可读性和感染力很强的报道显得尤为珍贵。

天刚黎明，火箭发射场区一片紧张的战斗气氛。人们盼望已久的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就要开始了。

高大的发射塔架，环抱着乳白色的巨型运载火箭，耸立在发射场上。各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对火箭起飞前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操作，随即撤离现场，满怀激情地等待着发射时刻的到来。

在地下发射控制室里，指挥员凝视着电子钟的时间指示，听取各操作手报告的每一个字，作出决断，发出口令："十分钟准备"……"五分钟准备"……"一分钟准备"……。随着最后几秒钟的到来，场区上的各种跟踪测量设备开机，高速摄影机、磁带记录仪等记录设备启动起来。

"点火！"令下。发射控制台上年轻的操纵员沉着果断地按下了电钮。火箭发射场立即传来连绵不绝的巨大轰鸣声。这声音像山崩，像海啸，震颤大地。巨大的火箭拔地而起，冉冉上升，尾部喷着辉煌的火焰，直上云天。

"发射成功了！"人们欢呼着、目送着腾空而去的火龙，心潮像海浪一样翻滚。

多少个日日夜夜，无数战斗在国防科研阵地上的尖兵，为研制、发射大型运载火箭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火箭在蓝天扶摇直上。几秒钟后，垂直上升的火箭开始拐弯；几十秒后，火箭排出的

[1] 新华社北京1980年5月23日电。

燃气在空中凝成烟雾，宛如一条白练在长空向东南方向延伸；最后在茫茫的天际里，渐渐变成了一个小亮点，穿出了大气层，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然而，从我国本土到远洋测量船队，几百套我国设计制造的现代化测量通信设备，却紧紧“咬”住人们肉眼看不见的小亮点，精确地测定、记录和报告着火箭在每瞬间的飞行速度、高度和姿态。每一秒钟都有大量的测量数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测控数据交换中心。测控中心通过各种精密设备和线路，把所有参试单位联接成一个紧密的战斗集体，及时地汇集、交换各参试单位之间的数据资料，不断地向各测量台站报告着火箭飞行数据，引导它们准确地跟踪火箭；并且把各台站所测信息和火箭飞行情况及时转送给发射场区的计控中心和指挥中心。喜讯不断传来：“跟踪良好！”“工作正常！”“飞行正常！”

在飞行控制中心，一排排电视屏幕上，频频变换着五颜六色的数码，自动记录仪在显示板上轻轻地描下了火箭飞行轨迹的曲线。这条曲线，与事前标上去的理论弹道曲线紧密地吻合在一起，它形象地告诉人们：火箭内部仪器工作正常，火箭飞行正常！

火箭在太空飞行了一长段时间后，再次进入大气层，直向太平洋预定海域飞来，一切正常，胜利在望了。人们个个喜形于色。

太平洋上，波光粼粼。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一艘艘测量船、打捞船，宛如迎宾的仪仗队，整齐地排列在火箭预定落区的两侧。人民海军的一艘艘驱逐舰在船队周围巡逻。一架架遥测直升飞机飞上了蓝天，配合测量船上的各种测量设备，捕捉着它的踪迹。

火箭高速向预定溅落海域飞来。

“发现目标！”人们纷纷拥上甲板，目不转睛地向船队西北上空望去。不一会，一个亮点钻出云层，拉出一道耀眼的白光，直向预定海域飞来。亮点越来越大，在距离海面还有几千米高度时，装有火箭飞行重要参数的仪器舱，自动从火箭头部弹射出来，打开降落伞，徐徐飘落洋面。火箭头部则“扑通”一声入海，激起冲天的水柱。仪器舱落水时，荧光染色剂把蔚蓝色的海水染成翠绿色，像一条数百米长的锦带漂浮在洋面上，绚丽多彩，好看极了！

这时，早就在附近等待的一艘工作快艇如离弦之箭向落区开进。我打捞直升飞机迅速向落点飞去。飞机到达仪器舱上空，垂直悬停在离洋面三十米的空中。潜水战士沿着悬梯，跳入海洋，仅用五分二十秒就把仪器舱胜利打捞上来。直升飞机载着仪器舱，安全飞回打捞船的飞行甲板。

至此，我国从本土向太平洋海域发射的运载火箭，飞越万里长空，获得了圆满成功。

“火箭落入预定海域！”“测量回收任务完成！”这胜利的消息，通过测量船上强大的通信电波，迅速传到祖国各测控台站，传到发射场，传到首都北京。船队汽笛长鸣，彩旗飘舞，远离祖国的人们在甲板上欢呼、跳跃，争相握手庆祝。

“我们胜利了！”从陆地到海洋，各参加试验的单位，直到总指挥部的人们，顿时掌声雷动，欢庆胜利。

工人日报·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1]

陈骥、牛凤和

【题解】 1979年11月25日凌晨，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船上74人有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700多万元。经过调查研究，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头版刊登了这篇报道，剖析了造成事故的主客观原因。之后，《工人日报》又以读者来信、编发评论等多种形式对“渤二”事故进行了追踪报道。同年8月2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这次事故的处理决定，并强调“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不得隐瞒和歪曲”。

渤海2号钻井船的翻沉，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参加这次事故调查的同志和海洋石油勘探局的许多职工都认为，这次事故不是偶然的，是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上长期以来坚持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和作法的必然结果。

只讲需要　不讲可能

海洋石油勘探局在钻井勘探作业的安排上，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只讲需要，不讲可能的思想。

渤海湾冬季寒流多，风浪大，钻井船容易位移，造成钻井打偏报废，而且，钻井船都是不抗冰的。但是，因为有关领导机关曾经向局里提出“是站着过冬还是干着过冬”的问题，要求钻井船冬季也要出海打井。局领导往往不顾实际情况，又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冬天也把钻井船轰到海上。职工群众提出不同意见，局领导就说：“要翻船也给我翻到海里去，不要翻在码头里。”

这样做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呢？据“渤2”钻井队职工反映，1978年冬季，“渤2”主机有毛病，甲板有裂缝，应该检修，而局里非让它继续打井，并说：“要干着过冬，不能泡着过

[1] 《工人日报》，1980年7月22日。

冬，要过一个革命化的冬天。”结果在海上打了两口井全部打偏报废，白干了一冬。有的船由于冬季出海打井，不得不在春夏被迫回港检修。

“渤 2”这一次所以要在冬季紧急迁往新井位打井，也和这种指导思想有关。按照规定，钻井船迁移井位，一般应在 15 天以前把任务正式下达到钻井船队，并且必须同时提供新井位的水深、地貌、泥厚等必不可少的资料，使钻井船可以比较充分地进行拖航准备和顺利地在新井位就位。但是这一次“渤 2”迁移新井位的时间很急迫，11 月 20 日确定任务，21 日开拖航会议，24 日就要降船拖航，拖航准备只有三四天时间。而且当时连新井位的水深、地貌、泥厚等资料都还没有弄清楚。由于任务要求过急，拖航准备不得不仓促上阵，为了赶时间，在拖航前，应该排的压载水不排，应该卸的可变载荷不卸，应该捞的潜水泵不捞，使这条本来能抗 12 级以上大风的钻井船，却经不起八九级风（最大阵风十级）的袭击而翻沉。

冒险蛮干　不讲科学

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上往下压生产任务，常常是要求过急，不讲科学，强令下面接受领导上的违章指挥。据“渤 1”职工揭露，有一次在大风警报的情况下，局里强令他们冒险起浮拖航（按规定四级风以上就不得起浮），群众没法子，只好照办。起浮后风浪越来越大，根本无法去新井位就位，只得冒着危险由拖轮拖着顶风走，在海上“大游行”了三天。像这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是领导上从来不认为是个问题，相反却把蛮干没有出事，当作经验来总结，出了事就说是“没经验”，“交学费”。领导上根本不把“安全”二字放在心上。“渤 2”引进已经六年了，该船的《稳性计算书》等外文资料一直没有翻译过来，发生事故后，为了调查案情，才由事故调查组请人译出。

结果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谁要是不问实际情况只按领导要求去做，即使明明是违章作业，也是“有干劲”，“有锐气”；相反，谁要是讲科学，抵制违章指挥，谁就是“怕困难，不听指挥”，就要受批判，调动工作。该局船舶处一位副处长，提出拖航作业应该由拖轮负责指挥，因为钻井船的队长钻井是内行，对航海并不内行。这位副处长的意见至少可以讨论吧，但是不行！因为这冒犯了局里的规定，一位副局长强令按原规定拖航，这个副处长拒绝参加，就被批判三次，后来被调离了船舶处。到底是讲科学、抵制违章指挥的是对四化建设负责的好工人、好干部，还是只知服从，盲目蛮干的是好工人、好干部？这个重要的问题被弄颠倒了。

这种不讲科学的态度，还表现在不尊重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干部、工人的建议和意见。这次“渤 2”拖航前，队长刘学曾几次打电报来要求卸载、捞潜水泵和请求用三条拖轮拖航。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却被搁置一旁。如果按刘学的意见办，这次事故就有可能避免，至少能大大减少死亡和损失。

只讲生产　不顾安全

职工们在事故调查的座谈中，揭露了该局领导上只顾生产，不顾工人安全的大量事实。在海上采油平台上，采油区和生活区、油罐区之间，有不少地方没有走梯和走台，工人们要顶着大风，在一米粗的拉筋管道上来回走，没有扶手栏杆，下面就是大海。职工从交通船爬上平台也总得捏把汗，船在水里晃动，搭上一块一尺宽、几米长的跳板，工人们就在跳板上走上走下。

海上的救生、防火等设备很少配齐过。“渤3”出海半年多以后才配上救生筏。工人们出海换班的交通船上也只有很少的救生设备。

如海上井喷、起火时救生用的耐火救生球数量配备太少，有的有了球，却没有放下海的设备，还是不能起到救生作用。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海上救生设备即使有了，工人也不会使用，因为平时不组织学习、演习。

这个局海上作业的职工只占六分之一，以六分之五的人来保障六分之一的前线职工的生产安全和生活，应该是照顾得比较周到的，但是事实上对海上作业工人的照顾却很差。工人出海换班有的要自带行李，船上又无舱房，冬季在甲板上或过道里任凭刺骨寒风吹打。国产钻井船设备较差，工人们每天一身泥水，二十天才能洗一次澡。进口船上原来配有沙发，但引进后一到码头，沙发就被搬到岸上使用。特别是工人在海上得了重病，或出了工伤，更是难以及时回港就医。一次，“渤4”有个工人在船上摔伤，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钻井船要求局里紧急派直升飞机抢救。飞机来了，机上坐着钻井处处长孙治业和另一位海工处的处长。因为飞机只能坐3个人，队长和指导员说明情况，要求他们下机，先把工人护送到岸上抢救。海工处长下了飞机，孙处长无论如何不肯下机，钻井队队干部说了很多好话，他还是无动于衷。最后，只好派一名工人跪在机舱里护送伤员，而孙处长却端坐舱中，不肯帮一手。

海洋局领导上不去真心实意地关心和爱护职工，却说什么“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一味地要求工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渤2”翻船后，局领导还是用这一套来统一思想。局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在对事故调查组汇报时，竟然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战争年代要付出代价，搞四化也要付出代价，七十二人死的是值得的，他们是英雄，要交学费嘛！”

掩盖矛盾　逃避责任

海洋石油勘探局成立七年多来，发生过许多次大小事故，但是领导上从不认真总结教训，常常用评英雄、追认烈士的办法，逃避领导责任，不了了之。群众批评说：“我们海洋局是事故出英雄，一次事故，一批英雄；事故越多，英雄越多。”

1977年冬，“渤1”断腿事故，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这次“渤2”事故，只是由于工人英勇抢救，侥幸没有造成人身伤亡。可是事后领导上不总结教训，钻井船被抢救回港后，给人们披红戴花，设宴摆酒，评了英雄，就算了事。这次“渤2”翻船后，局领导仍想用这种办法来逃脱责任。在事故后的第三天，就急急忙忙写出不如实反映情况的报告，定了“突遇大风，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的调子，要在全局大讲“渤2”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的活动，绝口不提查清事故责任问题。而且以此在全局强行统一思想，连说“事故”二字都不允许，还宣称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把水搅浑”。其实，局领导所谓的“突遇大风，不可抗拒”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他们说突遇10级至11级大风，但是据查，当天距“渤2”只有三海里航行的“大庆9号”油轮的气象记录是：“11月24日24点，西风9级；25日4点，东北风7级。”天津、山东等气象台的实况记录，也都只有8、9级风，最大阵风只有10级。“渤2”从新加坡拖运进来和送日本大修时，在拖航途中都遇到过11级大风，但是因为照规程办事，钻井船安然无恙。

随后局领导又根据这个报告，向有关领导机关提出追认英雄烈士的要求。职工群众认为，“渤2”船队是有功绩的，72名职工也是英勇的，但是不能允许领导上借此来掩盖自己的责任。职工群众非常担心地说：“如果这次仍然不了了之，我们总有一天要被他们‘指挥’到海里去。”

人们强烈地要求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对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领导人员，同时要求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确实保障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证国家财产不被糟踏，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总是交这些冤枉的学费！一定要从这次惨痛的事故中引出积极的结果来，把海洋石油事业办好，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华社·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1]

郭玲春

【题解】金山(1911—1982),著名表演艺术家和电影导演,在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中扮演屈原,还曾出演《夜半歌声》等影片,并自编自导《松花江上》等。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的这篇报道突破常规,以形象可感的细节展现追悼会的现场氛围,同时穿插对金山艺术生涯和革命经历的回顾,语言洗练,感情深挚,成为新时期新闻文体变革的先声,在新闻界产生热烈反响。

鲜花、翠柏丛中,安放着中国共产党员金山同志的遗像。千余名群众今天默默走进首都剧场,悼念这位人民的艺术家。

“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季蚕老丝难尽;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孺子牛亡汗未消”,悬挂在追悼大会会场的这幅挽联,概括了金山寻求光明与真理,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人们看着剧场大厅里陈列的几十帧照片,仿佛又重睹他的音容笑貌;他成功地塑造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他在电影《松花江上》的拍摄现场,他为演《风暴》与“二七”老工人谈心,他在世界名剧中饰演的角色,他在聆听周总理的教导,他与大庆《初升的太阳》剧组在一道……。他1911年生于湖南。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献身革命,始终不渝。

哀乐声中,人们默念着他的功绩。三十年代,他在严重白色恐怖中参加中国反帝大同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抗战爆发,他担任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副队长,辗转千里,演出救亡戏剧,尔后接受周恩来同志指示,组织剧团远赴东南亚,向海外侨胞作宣传。解放前夕,又担负统战工作。他事事以党的利益为重,生前曾对他的亲人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演员是我的第二职业。”

解放后,他将全副心力献给党的艺术事业,不断进取、探索、求新,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

他遭受过“四人帮”的摧残,但对自己的信仰坚贞不移。近年致力于戏剧教育,并以多

[1] 新华社北京1982年7月16日电。

病之身，担负起繁荣电视文艺事业的重任。

夏衍在悼词中称金山的不幸辞世，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重大损失，高度评价他几十年来的革命、艺术活动，号召活着的人们学习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学习他在艺术创造上认真刻苦，精益求精的精神。

他半个世纪前便结下革命情谊的挚友阳翰笙在追悼会上的讲话中说，是党造就了金山，是党把他培养成革命的、杰出的人民艺术家。

与金山一起工作、生活过的大庆人，惊闻噩耗后，派代表星夜兼程，来和他的遗体告别。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他们说，金山是人民的艺术家，人民将会怀念他。

文化部长朱穆之主持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习仲勋、王任重、胡愈之、邓力群、周扬、贺敬之、周巍峙、冯文彬、罗青长、唐克、吴冷西、李一氓、傅钟、刘导生、赵寻、荣高棠，以及文艺界人士林默涵、陈荒煤、司徒慧敏、艾青、吴作人、李可染、江丰、吴雪、袁文殊、周而复、张君秋、戴爱莲、陶钝等。

光明日报·“飞天”凌空
——跳水姑娘吕伟夺魁记[1]

樊云芳、夏浩然

【题解】这篇特写是1980年代所谓“现场短新闻”的名篇，借用文学式笔法，活灵活现地报道了一场体育赛事，同郭玲春的“金山”报道一样广受关注，为当时新闻变革注入新鲜空气。作者樊云芳为《光明日报》记者，曾获得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她站在十米高台的前沿，沉静自若，风度优雅，白云似在她的头顶飘浮，飞鸟掠过她的身旁。这是达卡多拉游泳场的八千名观众一齐翘首而望，屏声敛息的一刹那。

轻舒双臂，向上高举，只见吕伟轻轻一蹬，就向空中飞去。有一瞬间，她那修长美妙的身体犹如被空气托住了，衬着蓝天白云，酷似敦煌壁画中凌空翔舞的“飞天”。

紧接着，是向前翻腾一周半，同时伴随着旋风般的空中转体三周，动作疾如流星，又潇洒自如，一秒七的时间对她似乎特别慷慨，让她从容不迫地展示身体优美的线条：从前伸的手指，一直延续到绷直的足尖。

还没等观众从眼花缭乱中反应过来，她已经又展开身体，笔直地像轻盈的箭，“哧”地插进碧波之中，几股白色的气泡拥抱了这位自天而降的仙女，四面水花悄然不惊。

“妙！妙极了！”站在我们旁边的一名外国记者跳了起来，这时，整个游泳场都沸腾了，如梦初醒的观众用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来向他们喜爱的运动员表达澎湃的激情。

吕伟精彩的表演，将游泳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她的这个动作五一三六，从裁判手里得到了九点五分。

这位年方十六的中国姑娘，赢得了金牌。

她的娇小苗条的女伴、十七岁的周继红，以接近的分数赢得了银牌。

当一个印度观众了解到这两个姑娘是中国跳水集训队中最年轻的新秀时，惊讶不已。他说：“了不起，你们中国的人才太多了！”

[1] 《光明日报》，1982年11月25日。

中央电视台·《话说长江》[1]解说词（节选）

任卫新

【题解】《话说长江》是一部25集的电视纪录片，反映了长江两岸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得到观众的高度赞扬。新华社报道说，每到星期天晚上，数百万中国人便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系列片《话说长江》。有数据显示热播时的收视率达到30%。这里所选的解说词出自其中第一部《源远流长》。作者以充沛的感情和散文式的笔调，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欣赏性于一体，配合真实生动的影视画面，展现了江山多娇的瑰丽画卷。2006年，中央电视台又制作播出了纪录片《再说长江》。

您可能以为，这是大海，是汪洋吧？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您可能会联想到长长的飘带，洁白的哈达。是啊！多美啊，这也是长江！

如果说是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才从长江的入海处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长江就是从这儿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放的奔向太平洋。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格拉丹冬雪山的西南侧。它由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一点。在从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千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确切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

长江的干流从青海出发，流经西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一共10个省、市、自治区。最后注入东海。

长江的支流洋洋洒洒分布在甘肃、陕西、河南、贵州、广西和浙江。整个长江流域的面积多达18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

---

[1] 中央电视台电视专题片，1983。

自古以来，人们对长江有许多叫法。起初就叫江；后来叫大江。如今的规范叫法是这样的：从源头到楚玛尔河口，叫沱沱河；从楚玛尔河口到玉树的巴塘河口，叫通天河；从巴塘河口到四川的宜宾，叫金沙江；从宜宾直到入海口，叫长江。

长江的干流又分成上游、中游、下游；从江源到湖北的宜昌，叫做上游；从宜昌到江西的湖口，叫做中游；从湖口到崇明岛东面的入海口，叫做下游。

长江拥有700多条支流，其中岷江、嘉陵江、乌江、沅江、湘江、汉江和赣江等7条主要支流的年水流量都分别超过了黄河。

长江接纳了这么多的支流，还把我国四大淡水湖里的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串联了起来，犹如长藤接瓜，形成了庞大的长江水系。长江每年把1万亿立方米的水注入浩无边际的大海，这可是相当于20条黄河的水量啊。长江的水能蕴藏量多达2亿6千万千瓦，它占全国水能蕴藏量的40%；在世界上，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水能蕴藏量的总和刚刚赶上长江。

可是现在长江水能的蕴藏量却只利用了3%。如果翻两番，那也只有12%。假如能达到90%，到那个时候，我国电力能源的供应情况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长江江面宽阔，它的水运量占全国内河水运量的80%以上。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它可以顶替40条铁路。而目前，还只是两条铁路的作用。

长江源远流长，水面辽阔。它是淡水鱼生儿育女、长大成才的好水乡。长江淡水鱼产量可占着全国的三分之二呢。

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流域，尤其是云南北部和四川西部，有着许多森林，是我国第二个大林区。如果大家都珍惜大自然的这个布局，而且不断的培育树木，那么，长江之水就会千秋万代地清清的流淌。

长江流域沃野千里，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它拥有4亿多亩耕地，占我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地。粮食产量占全国的40%以上，棉花产量占全国的33%以上。

长江流域居住着3亿多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从广义上讲，我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同饮一江水"啊！

长江流域矿藏、物产丰富，交通运输便利，粮食产量又高，所以，使长江流域出现了许许多多工业基础雄厚的大、中城市。您知道吗？长江流域的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啊。

长江和黄河一起，共同养育着世世代代炎黄子孙，共同孕育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长江还将为我们中华大地的发展贡献无穷无尽的能量。

在人们以往的概念中，长江流域的文明史远比黄河流域年轻，所以都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1965年在云南省金沙江畔元谋县的一次发现，对这个说法提出了异议。专家们鉴定：在那里找到的两颗猿人牙齿化石，比黄河流域发现的猿人化石提前了一百万年。假如这个鉴定是确凿无疑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说黄河与长江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到了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都已经相当发达。1978 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七千多件文物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这套编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都是青铜铸造的，每个钟上都刻着音乐的铭文，一共 2800 字，可以说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音乐理论专著了。

长期以来，我们祖先在长江广袤而连绵的两岸修养生息、艰难创业，把长江流域变成了肥美富庶的鱼米之乡。是的，长江给我们的中华民族不知带来了多少福利，我们可以借一句老话来评价：长江可真是功德无量啊！但是长江也和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它既有赫赫功绩也存在着缺点以至于错误。

从我国唐代到解放前夕的 1300 多年间，长江就曾经 240 多次发难，平均每隔五年就要发一次水灾。

不过长江的差错永远淹没不了长江的功绩。何况长江的灾害也已经随着东流的江水而成为历史了。

最近 30 多年来，沿着长江的干流和支流，人们已经筑起了 3 万 3 千多公里长的防洪大堤坝；最近 30 多年来，人们已经在长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建筑了一座又一座规模宏伟的桥梁；最近 30 多年来，人们还在长江南北兴建了 40000 多个小型水库，500 多个中型、大型水库。蓄水灌溉、养鱼放波。

在今后的岁月里，经过我们世世代代的不懈努力，长江给我们带来的再也不会是灾难，而永远是温暖，永远是力量。

长江已经奔腾呼啸了几千万年，几千万年是何等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啊！正是这有着悠久而漫长历史的长江，与古老的黄河一起，共同孕育了我们文明的古国。

长江从青藏高原的涓涓细流，出千峡，纳万川，汇集成波涛滚滚的大江，横贯中华大地，万千姿态，雄伟壮观！

您滔滔东去的江水，浇灌着神州华夏；甘甜醇美的乳汁，养育着炎黄子孙。赫赫功绩，无比辉煌！

在您的两岸，有着数不尽的绮丽风光，江山如画；在您的两岸，有讲不完的历史沉浸，传说神话。

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幽觅圣，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

长江，您硕大无比，即使是在遥远的太空，也能清晰的见到您雄伟矫健，跳跃奔腾，勇往直前的身影！

啊！长江！您是东方的巨龙，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您是中华民族的自豪，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中国青年报·别了，0！[1]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题解】1984 年 7 月 29 日，中国选手许海峰以 566 环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男子自选手枪冠军，实现了中国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手把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授予许海峰。为此，《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篇社论。全篇文字行如流水，感情充沛，热情洋溢，显示了新闻评论独特的感染力。另外，标题大胆使用阿拉伯数字，简明活泼，富有新意。诸如此类的报道与当时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女排接连夺冠赛事一样，营造了一种"振兴中华"的社会氛围与时代精神。

是我们，是我们中国人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半个多世纪来背着奥运会"0"的包袱的中国人，从此可以吐气扬眉了！

年轻的中国运动员许海峰、曾国强用百步穿杨的绝技和力举千钧的气概，把零的耻辱甩进了太平洋，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结束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开创了中国人夺取奥林匹克金牌的历史。这是响亮的序曲，是更大胜利的前奏。

当地一家报纸评论说："中国人刚一回到奥运会，就迈出当仁不让的步伐，令人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为他们目光依旧。要知道当今的中国已跨入了"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时代。

自豪吧，健儿们！自豪吧，青年们！自豪吧，炎黄子孙！因为今天，我们当之无愧地向全世界说："别了，零！"

---

[1] 《中国青年报》，1984 年 7 月 31 日。

人民日报·小平您好[1]

王东

【题解】王东，《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拍照。1984年国庆大典的游行队伍里，突然出现北京大学学生打出的横幅标语“小平您好”，集中表达了当时亿万人民的心声。王东迅速捕捉到这个瞬间，拍下这幅获得1984年最佳新闻照片奖的作品。中华世纪坛据此做成了一幅浮雕。



[1] 《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日。

经济日报·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节选)[1]

罗开富

【题解】罗开富,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1984年至198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经济日报》组织策划了记者重走长征路的大型报道活动,由罗开富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徒步行走、采访、报道,从而使他成为继红军之后第一位走完长征全程的记者。其间,368个日日夜夜,他白天赶路,夜晚写稿,用日记体真实记下沿途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不仅追述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而且展示当地人民的生活及其对红军的思念。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样,《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也成为书写红军长征的新闻佳作。

乌江渡口过江难

1985年元旦,记者从瓮安天文区走到了著名的天险——乌江江界河渡口。

乌江以当年红军长征时在此抢渡成功而闻名于世。聂荣臻同志在回忆长征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时,敌人把南岸一些茅屋放火烧光,然后撤到了北岸。红军的先头部队是1934年12月31日赶到乌江边的。红军抢渡的渡口有好几个,仅红一、红二两个师过江的渡口,就有龙溪、江界、黄平。江界河渡口很险要,河面较宽,战斗最激烈,中央机关就在这个渡口,踏着工兵营用竹筏子和门板架起的浮桥冲过乌江。记者在江界河渡口的水落坝村,见到了当年被烧毁的茅屋主人周世昌。他说,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时就在水落坝村附近架起座浮桥。后来又从江底捞起一只沉船,他和一位名叫庹子清(已故)的老人用这只船帮红军抢渡。在渡口附近的犹家坝村,七十四岁的周海云领记者参观了红军渡江前沿指挥所遗址,然后老人又用小船送记者过江,参观当年红军进驻过的火金山和桐梓坡村。周海云还要求记者转达当地群众盼望在渡口早日建桥的愿望。据了解,江界河渡口是沟通湖南、广西、四川的重要通道,虽设轮渡,由于其他设施不足,有所谓"四不开"(涨水不开、枯水不开、夜晚和船坏了不开)。记者坐小船渡江时,看到江边停着正

[1] 《经济日报》系列通讯,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

在修理的轮船，据说已停开四十多天，车辆要绕道二百六十多公里，来往行人则靠小船摆渡。

桐梓坡村有上百户人家。当年红军在村里张贴的标语，一直被乡亲们珍藏着，有的字迹还十分清晰。施厚成家板壁上的一条标语，历经几十年，房子搬迁拆造了三次，这条标语仍保存得十分完好。

“三位女红军现在哪里？”

“记者同志，当年给我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如今你晓得她们在哪里？”一见面，徐解秀婆婆就这样问我。

徐解秀住汝城文明乡沙洲村，今年八十一岁。五十年前的 11 月 7 日至 13 日，中央和军委纵队，先后经过文明乡。别时沙洲村有七十多户，除六户地主、土豪逃跑外，家家都腾房给红军住。徐解秀家也接待了红军。有一天，来了三位红军女战士，和她一起睡在厢房里，向她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宗旨，还把打土豪得来的衣物、粮食分给她家。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为红军磨稻谷，又为红军缝米袋。这三位女红军临走时，见她家只有一堆烂棉絮，就把带来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送给徐解秀家。解秀婆婆对记者说：“同志，你想想，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她们要跋山涉水，风里来雨里去，我哪能要她们的被子？可是她们不依。”六十八岁的乐青松说，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不说，敌人就搜家。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解秀婆婆说，三位女红军和大部队走时，她要送一程，被劝阻了。分别时，这三位女红军一步三回头说：大嫂，胜利后再见！五十年过去了，解秀婆婆更想念这三位女红军。她想告诉远方的亲人：这里的人民生活很好，当初为红军做过一点事的老人，现在都得到政府的关怀。解秀婆婆的孙子朱和荣对记者说，村干部常来看望他奶奶，生病时村里青年人争着为老人买药，送好吃的。

解秀婆婆身体很好，她领我们看了新屋又看老屋。她站在厢房里对我们说，三位女红军当时都是二十多岁，剪短发，长相好。她请记者同志帮忙打问：这三位女红军现在哪里？

人民日报·今日大寨[1]

李克林

【题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20世纪60年代影响全国的运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曾是鼓舞亿万人民的榜样。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记者李克林重游大寨，通过今昔对比采写了这篇“老树新花”的报道，反映了大寨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内容丰富翔实，具有乡土气息，体现了新的时代主题。李克林，河南邓县人，抗战时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为人民日报早期编辑，后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其女儿李银河为著名性社会学家（随母姓）。

金秋时节，我来到大寨。第一个印象是，这里山村静悄悄。虎头山默默无语，大柳树长丝低垂，几条牛在山坡慢悠悠地吃草，小雀在枝头鸣叫……往昔那“红火”的景象，那无尽的人流，都已悄然逝去。那曾经踏上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的千千万万个脚印的大寨之路，如今已长满荒草，只留下窄窄的山道。夜晚，我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偌大一层楼只我一人，静得令人发怵。清晨，我站在虎头山边，遥望蓝天白云，不禁思绪万千：大寨！你为什么这样寂寞?!

然而，当我深入这个山村内部，却发现另一种景象：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与过去那种表面“红火”、内里僵冷的景况，恰成鲜明的对比。过去我来大寨，不能随便和社员谈话，社员们也是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这次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东家串西家，和干部群众任意交谈，和大嫂大娘炕头谈心。我串了七八家窑洞，一种“自由”“解放”的喜悦扑面而来。大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真好！贾忙妮说：“现在可真自由，想甚时去地就甚时去！”吕喜英说：“邓小平真沾！可把咱妇女给解放了！”自由，解放，这本是三十多年前常见的字眼，今天，竟在大寨妇女们口中重新出现，颇耐人寻味。

这个长期在“左”的禁锢中的山村，一旦获得解放，立即显出新的活力。几个大娘谈起过去“早晨五点半，地里两顿饭，有时还加班干”那艰难的岁月，感叹不已！她们说，现在是粮没少打，活也没少干；男的大都去干工副业搞运输去了，干地里活主要靠妇女，一天也干

[1] 《人民日报》，1985年10月5日。

出过去两天的活。一个农民看我好象不大理解，在旁说："过去是伙的，现在是我的，这不是明摆的理儿？"是的，就是这个简单明白的道理，我们却是二十多年没弄懂，硬是把人家捆在一起，"摽着穷"。

大寨是 1983 年初开始实行包干到户的。当时一些老干部想不通，年轻人多数想试试看，昔阳县委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转好这个弯。没想到这一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了百万斤大关。群众反映："这年真怪，种甚收甚！"这里有人的热情，天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大寨田"的作用。要不狼窝掌的高粱怎么长得那么壮实？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的因素。

大寨所显示的勃勃生机，不仅是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因为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路"而紧紧"堵"着的各项生产门路疏通了。大寨当前经营的项目，除粮食种植外，有采煤、运输、烧砖、石子、林果、畜牧、酱醋加工等，近十项生产。后山煤矿绞车隆隆，虎头山下车轮滚滚，大寨人从狭小的"大寨田"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

大寨的后山蕴藏着优质的煤层，过去这里就有"要想富，开黑库"之说。五十年代初，老英雄贾进才曾带头在这里挖过小煤窑。可是后来批判"要想富得快，庄稼搅买卖"，煤窑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来批去，从此黑色金库长期沉睡地下没人敢再提，老贾也因此背了几十年黑锅。如今煤窑重新打开，乌金滚滚，每年产煤约一万七千吨，可收入二十多万元，净交集体七万五千元。几十个新矿工，每人每月收入近二百元。

煤炭的开采，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去年大寨出现一股争买汽车"热"。到今年初，社员个人买大汽车八辆，带斗小四轮七辆。大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批"运输专业户"。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家庭副业和小手工业蓬勃兴起，铁木工匠各显其能。耿艮柱的家庭养鸡场，一年育雏过万只，还为食品商业部门提供了上万斤鲜蛋和大批肉鸡，为周围村提供了一批良种鸡。这个昔阳闻名的"养鸡专业户"，去年人均收入两千元。

大寨果园已有一百二十多亩，一千五百多株开始产果。金黄的"丁露香"，艳红的"甜红玉"，累累满枝，今年预计可收十五万多斤。还有几万株幼苗，共可收入四万来元。"山上绿色银行，山下黑色金库"，这是大寨集体经济的两大支柱。地下还有矾石、黏土等矿藏呢。今日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不再只是金皇后和高粱，而是多彩多姿。丰富的自然资源同勤劳勇敢的大寨人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生产力。农、工、商、林、果、牧全面发展，产业结构、种植结构、以至食品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小米小麦多了，去年人均小麦二百五十多斤，大寨人的食品不再是"老玉米当家"，而是天天有白面了。

短短两三年，大寨开始呈现出集体壮大、个人富裕的新局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1978 年相比，去年总收入达五十四万多元，增长近一倍；人均纯收入六百零一元，增长两倍多。他们最近提出新的目标："奋斗五年，人均两千。"这是有条件、有根据的，当然也是艰巨的。集体经济壮大了，一方面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一方面为家庭经济服务，促使承包后的农户走共同富裕之路。这可不是"归大堆"、又吃"大锅饭"，而是合作经济优越性的新体现。这几年集体经济为农户作了几件好事：一是各户承包土地，由集体提供良种、农药、化肥

等，亩均约五十元，他们叫“以工补农”；二是各项费用，如干部补贴、民办教师、优抚代耕、管理费等由集体统一承担，不再向农户摊派，因此大寨农民不感到负担重的问题；三是集体统一购买一批“昆仑”电视机，以低价分发各户。另外对缺少劳力的困难户用各种办法给以扶助。现在家家有余粮，全村最困难的户也吃饱穿暖，还有电视看，比“农业学大寨”时强得多。

大寨当前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房子问题。如今生活富裕了，家中摆设多了，每家都希望有个独门小院，养鸡喂猪，栽花种树，美化生活环境；可现在那列车似的排排窑洞却很少发展余地。我串过几家门，有些家里广式沙发、大彩电，新式家具一应俱全，可门外却是乱糟糟。正像他们自己说的：“窑内电视电扇，窑外乱成一片。”加以这些年孩子长大，青年结婚，人口发展，矛盾更加突出。大寨现已由前几年的八十多户发展到一百二十五户。住在下边或上边的还可盖间小房房，中间一层的就毫无办法。据说，当年修建这样的“大寨楼”时，有个老社员就提过意见，说这不适合农民生活，却挨了当时大寨负责人的一顿批，以后就再没人敢说话了。如今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大寨楼”的建设反映了当时大寨领导人的思想。有人说这是为了给人参观，成排成行，威武壮观。其实不尽如此。当时一些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平均，集中。生产资料集中，自留地集中，牛集中，猪集中，人也集中。鸡不能集中，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人们改善生活的种种要求都属于“资”，好像无产阶级只能是苦行僧式的苦一辈子。一个时期，大寨青年不得戴手表，不得穿皮鞋，不得下饭馆，甚至姑娘穿件花衣服也被看作带着“资”味，也要批。“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才能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七斗八斗，灭资兴无，这种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所谓“大寨经验”，一段时间里竟能吹遍全国，吹得大地白茫茫一片……多么惨痛的教训！

在这里，我还想为大寨和昔阳人说两句话。现在人们一想到“堵路”“割尾巴”以及“七斗八斗”所造成的灾难，自然联想到昔阳和大寨。“风起于青萍之末”，好象这里就是“风源”，一听说是昔阳和大寨人，好像他们身上就带着一股“左”味儿。这是不公平的！岂不知，大寨、昔阳人在“左”风劲吹时，是首当其害。在那“七斗八斗”、杀气腾腾的年代，昔阳因批斗致死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付出过血的代价啊！大寨现任党支部书记赵存堂，1975 年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会计，就因为给一个外出木匠开个介绍信，被批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而开除党籍，直到 1980 年才得到纠正。历史的转折，给昔阳的任务特别繁重。既要肃清“左”的毒害，又要保护干部群众，昔阳县委为拨乱反正做了艰苦细致的值得称道的工作。

这次到大寨，当我紧握着贾进才老英雄的树根一样的双手，坐在坑头叙谈往事的时候，我带着歉意说到当时的报纸宣传。宋立英连忙说：“也不怨你们，那时候不那样说行吗？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甚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这是对当时历史的简明又实在的概括。当大寨这个山区建设的典型被某些野心家涂上政治色

彩、当作工具利用的时候，大寨是被玷污、被扭曲了！我觉得真正的大寨精神是凝结在老英雄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的。愿大寨的年青一代，能正确认识老一代走过的历史道路，继承发扬这种精神！

历史又翻过新的一页。喜看今日大寨，一派欣欣向荣。当大寨人懂得“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当他们挣脱“左”的绳索找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之后，立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们的欢乐，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欢乐；他们受过的苦难，正是我国众多农村苦难的缩影。经过历史的曲折和阵痛之后的大寨人，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充满活力，充满信心！

人民中国·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1]

段连城

【题解】段连城(1956—1998),云南昆明人,著名记者。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49年回国,历任《人民中国》编辑组组长,《北京周报》编辑部、英文部主任,国家外文局局长等职。一生从事对外传播工作,晚年在北京大学开讲“对外传播学”,完成《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被公认为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权威著作。《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是一篇游记,也是对外传播领域的经典之作。本文以真挚感人的笔调和真实自然的情节,娓娓叙述了重访故乡的见闻与感受,发表后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共鸣。

奔奔忙大半生,而今得清闲。多年来,作为一名记者和编辑,走东闯西,总有任务在身,难得超脱。离休了,决心轻松一番,重访故乡——西南边陲云南的省会昆明。接着赴四川,游省会成都,登名山峨嵋,访山城重庆,东出三峡,畅游武汉,再回到北京,历时共百日。沿途无需拜会负责官员和争访新闻人物,随兴之所至,或在古刹盘桓,或在街头漫步。有时进茶馆,同素昧平生的寻常百姓谈家常,舟车途中,与萍水相逢的旅伴论国事。见闻不少,有喜有忧,只是东鳞西爪,仅供茶余酒后的谈资而已。

返京后,同老友、《人民中国》总编车幕奇君闲叙观感。他却感到兴趣,邀我撰文,并说有些日本读者愿读闲谈式的报道,信手写来即可。“职业病”难愈,刚下决心搁笔种花,我却又摊开了稿纸。

工 地 之 国

“少小离家老大回”,到了故乡,自然感慨甚多。在我的童年时期(三十年代),北京是一个遥远得像梦境一样的地方。赴京考大学,最近便的途径是办出国护照,请法英签证,乘法国人修的窄轨铁路摇晃到越南港口海防,航香港,转广州,再北上。六十年代,连结北京和昆明的铁路修通了,七十年代湘黔铁路建成,不必再绕道华南的广西。如今,京昆直达快车

[1] 《人民中国》,日文版,1986(4)。

天天有，全程 60 小时。近年来民航发展很快，每日都有京昆班机，三个半小时就到了。不过，交通仍很困难。经济活了，千丝万缕的市场联系促使愈来愈多的工商人员全国跑，满天飞。外国游客常常抱怨中国交通不便，哪知中国旅客要买一张机票或卧铺车票，更是加倍困难。交通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确是中国发展的一大障碍，列为建设重点，完全必要。

睽违多年，发现昆明市区大多了，新建筑不少，郊区则工厂林立。二次大战后期，美国空军云集昆明，古旧的城区出现了一条较为现代化的南屏街，号称“小上海”。如今南屏街已相形见绌，显得又旧又窄。但这“小上海”却可爱多了，再没有强颜欢笑的“吉普女郎”、街角擦鞋的少年儿童、哀哀求告的男女乞丐和坐在人力车上一手执酒瓶、一手向行人扔爆竹取乐的外国醉汉了。虽说市容变化很大，昆明离现代化城市的水平差距尚远。大片城区仍是鸽子笼一样的旧式木楼，在通衢大道上也难找到一部公用电话。

令我欣慰的是工地处处有，盖大楼，修公寓，建商店，铺马路。运载建筑材料的卡车，络绎于途，烟尘滚滚，一片混乱，但却使人感到生机蓬勃。北京近年来的建设规模，曾给一些游客留下较深印象。据我此行所见，各地城乡都在建设。在成都，一条横贯城区的宽阔大道 1984 年十月刚刚落成，两旁是一个又一个工地，有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议会）的大楼，有高级宾馆，有各种公司。在重庆，市中心特别喧闹，正在拆除原来的百货公司，准备新建大楼。重庆是一座山城，山上盖楼房，山中凿隧道，“立体作战”，同时进行。武汉地处平原，舒展得开，一些新建筑较有气派。大城如此，尚不足奇。我曾到了昆明和成都附近的一些县城和小镇，几乎无一例外，都在盖商店，修马路，叮叮当当，好不热闹。

用我们惯用的政治术语说，这几年全国工作的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这话听来抽象，其实际影响却很深远。可以说，把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变成了一个“工地之国”了。更形象一点说，正似一条巨龙在更换全身千万片残旧或受伤的鳞甲，准备腾飞。

1947 年 7 月我曾在东京短暂停留。依稀记得，那时的日本还是处处废墟，满目疮痍，道旁的行人面容沮丧，罕有笑容。商贩们向外国人谦恭地推销一些制作粗糙的小玩意，如打火机等等。上面还刻着“在被占领的日本制造”的英文字样，那也许是占领当局的规定吧。曾几何时，日本已跻身于最发达的国家之列。想必也有过一段“全国皆工地”的时期，现代化总是用双手干出来的。

乡亲们告我，蓬勃的建设景象，五十年代也有过，但不久就开始“折腾”了。一位铁路工程师回忆说，1958 年“大跃进”中，有人异想天开，提出用木头代替铁轨筑车路，他被派去参加施工。大片的上好用材林被伐光了，木轨车却总是一走就翻。不过，我也不想一笔勾销“大跃进”，因为我曾亲自了解过一些事例，如现已颇具规模的手表和自行车工业，正是由一批脚踏实地的人，在那些“头脑发昏”的年月里，在上海创建起来的。风光秀丽的高原淡水湖滇池，也留下了无法医治的伤痕。“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权者要求“围湖造田”，增产粮

食。于是“千军万马上战场”，采石挖土，肩挑手推，填入湖里。田是造了一大片，只是长不好庄稼。鱼少了，据说号称“四季如春”的气候有时也不那么温和了。昆明人十分感念周恩来总理，都说是周总理制止了那桩蠢事。自然景观的损害，更是一目了然。城郊有大观楼，是观赏湖光山色的胜地。白日登临，则见西山横翠，碧波万顷；黄昏眺望，红霞映湖，归帆点点。此次我再度登楼，却只见一片稀稀疏疏的庄稼地了。好在滇池共340平方公里，被填的毕竟只是一小块。人们常说，要不是那些年“瞎折腾”，现在日子该好过多了。类似的议论，在其他地方也时有所闻。群众对过去“折腾”的普遍不满，我觉得正是避免今后再度“折腾”的有力保证。

但我感到家乡最大的变化，却是闭塞状态的终止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犹忆儿时，在市中心正义路狭窄的石砌路面上，常常看到深深的蹄印，据说是世世代代运货的马帮踏成的。木楼檐下的石阶，也常有寸许深的小孔，那是岁岁年年的雨水滴穿的。上午十来点钟，店铺才徐徐开门，人们常常坐在街边“烤太阳”，很少见到步履匆匆的行人。每天中午，在城门楼上放一响土炮报时，称为“午炮”。省主席坐轿或乘车（汽车极为罕见）上下班时，军警开道，行人止步。我同小学同学背着书包，垂手肃立道旁的情景，记忆犹新。与世隔绝，消息闭塞，城外枪毙“犯人”的“盛况”，往往是小市民阶层经年累月的谈资。如今大变了。人群熙熙攘攘，忙工作，忙学习。外省人、外国人满城可见，这里一项新建设开工，那里一家新商店开业。常见的标语之一是“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精神状态的现代化同物质建设的现代化在相互推动，同步进行。

初庆温饱

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郊区一个小山村。阔别四十年，当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但一些老农还记得我，热情邀请我到家中作客。我一再婉拒，他们猜测我还认为农村生活艰难，不愿叨扰，就开门见山说：“不怕了，这几年种责任田，差不多家家都有点隔年余粮和隔年腌肉了。”我去了一些家，少数几户盖了两层砖房，比城市居民住得宽敞多了。电视机、录音机等家用电器，也不罕见。有些外国读者不理解我们总说电视机、录音机。须知五、六年前，在昆明这样的中等城市，这些东西还是不入寻常百姓家的奢侈品，在农村更是见所未见的“洋玩意儿”。老年人还保持着中国农民“知足长乐”的传统，一位八旬老人对我说：“总说社会主义好，这几年才真见到社会主义了。你家（即”您”）说呢？”对于他，温饱就是社会主义。

在村里，我还感到人际关系正常多了。过去，几乎每村都有“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等等。实际上，这些人都已在群众监督下劳动了许多年，大多数没有违法行为，但照样戴着“阶级敌人”的帽子。他们的子女以至孙辈也被当作准“阶级敌人”。再加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因这种、那种原因受过“批判斗争”的人就更多了。这一

切就形成了人们相互隔阂和彼此戒备的状态。如今,多数地主富农已经老死,余下者绝大多数已经“摘掉帽子”,享有公民权,子孙不再受到歧视。多年的各种“冤假错案”,几乎全已得到纠正。用我们的政治术语说,这些都称为“落实政策”,即按正确政策重新处理了。这个变化,我觉得比电视进村更加深刻。城市的气氛,同样由于“落实各方面的政策”而缓和、轻松得多了。

共产党当然是相信阶级斗争的,否则那么多年的革命战争、解放初期改造旧社会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斗争,岂不是都不必要了?问题是当那些必要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后,还继续把阶级斗争放到首位,当成中心,那就势必导致人为的“七斗八斗”和普遍紧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近些年的安定,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极左方针的谬误。

政治气氛日益缓和,物质生活初庆温饱,使人们的心情舒畅起来,固有的幽默感也在复生。在昆明附近的石林,我看到一次自发的欢乐景象,久久难忘。石林是两亿多年前形成的方圆数百里的一大片异形石柱,远望好似森林,故名。景观颇为奇丽,中外游人云集。当地许多撒尼族姑娘盛妆打扮成“阿诗玛”,担任导游。阿诗玛是彝族叙事诗中的一个美丽善良的少女,故事曾拍成电影,阿诗玛的形象为群众熟知和喜爱。“阿诗玛”们分别带着一群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穿行在神话世界一样的奇峰怪石之间,作着幽默的解释。“看,那叫望夫石,象不象在等你回去的爱人?”游客兴高采烈,鼓掌邀她唱歌。她唱了,而且是一首少数民族情歌。游客中一个冒失的小伙突然引吭高歌,“哥呀妹呀”地同她对唱起来。蓝天白云,满径鲜花,一路笑声一路歌,情景令我陶醉。一向比较拘束、“非礼勿动”的中国人,竟如此“放肆”起来了。

在昆明远郊的小镇嵩阳,看到一家新开张的私营理发店,门上写了一幅颇幽默的对联。上联是:“理一理,洗一洗,合情合理”;下联是:“剪一剪,刮一刮,容光焕发”;横批:“满面春光”;店名:春光理发馆。“合情合理”者,大概是对早些年把个人美化一下容颜就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超级革命”观点的嘲弄吧。在各地还看到一些颇富人情味的新开店名,如“哈哈好”快餐,“好再来”酒家,“鸿来宿”旅店。天津有名的“狗不理包子”已经恢复原名,无独有偶,成都竟有一家餐馆挂着“耗子楼”的匾额。耗子怎能增进食欲,无暇查考,估计总有个有趣的典故。这些虽属小事,却使我深思。早些年,处处看到的是“国营第×门市部”、“长征饺子馆”、“东方红理发店”之类的招牌,姑不论长征与饺子、东方红与理发何干,那种公式化、单一化和把美好名称庸俗化的风气,就令人窒息。

连建筑工地的告白也似乎“脾气好些”了。传统的用语是:“施工重地,严禁穿行”。在昆明,看到好几处的牌子上写道:“同志,施工给您增加不便,对不起。请注意安全,不要穿行。”那种咄咄逼人的写法,究其根源,不过是封建官府“肃静”、“回避”的虎头牌的变种。从这个意义讲,连告白也开始“现代化”,有点民主气息了。

“衣食足而后知礼义”,这句古语有点道理。游名胜西山,道旁小憩时忘记了一支名牌半导体。它是我旅行必备,随时可报告国内外新闻的“秘书”,丢了未免遗憾。回头去寻,只

见一对中年夫妇匆匆走来，男的高举收音机，呼唤失者。感谢之余，请他留名，不肯。请他喝瓶道旁小摊的汽水，夫人不让。几天后，上街时又掉了脱下拿在手里的一件新毛衣。第二天去找，一位摆水果摊的老太太已把它高挂摊头，等待认领。为表感谢，我买了几斤香蕉，作为酬答，她挑最好的给我。若说路不拾遗，那是吹嘘。几天后看到报载，几名扒窃外宾的小流氓被判重刑。不过，据乡亲们说，社会治安是好多了。1972 年我路过昆明，刚庆幸挤上公共汽车，却发现钱包不翼而飞，最可悲的是丢了包里一张珍贵的夫人旧照。

家乡不如人意的事还多。在我生长的那个小村，童年熟悉的青山已成秃岭，儿时戏水的清溪已成浊流。据说并非个别情况，这些年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严重的。农村内里虽已开始殷实，但外观仍很破旧。昆明多雨，经常是道路泥泞、步履维艰，一似当年。"旧貌换新颜"，还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最恼人的是官商作风和官僚主义。民航办事处前排起购票长队，由于购票制度混乱，纠纷迭起。我目睹两群人对骂，用语不堪入耳，然后挥动拳头，武斗起来。民航办事处的头头却坐在办公室，安之若素。就这件事和另一些见闻，我写了一篇短稿，有批评也有表扬，投寄当地晚报，竟如石沉大海。三次函询稿子收到没有，未获只字答复。

消费"早熟"

从昆明乘快车到成都，一个昼夜。这条路穿越崇山峻岭，工程十分艰巨，据称有三分之一是隧洞，常常出了一洞又进一洞，"暗无天日"，像在城里坐地铁。途中遇到一些日本人和西方人，说是到西南来搞技术合作的。这使我想起一件旧事。1972 年，成昆路已开始营运，但对外"保密"，火车时刻表上不印，车站列车牌上不写。正巧我在北京已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编绘和公开出售的一本中国地图，上面已把成昆路清楚画出。在卫星满天飞的时代，那种"保密"表现了闭关锁国时期的自我愚弄。今天，据说这一带一些曾是严格保密的国防工厂正转产民品，经常接待外国人员，引进先进技术。我想这是明智的。国家当然有机密，但过分的自我封闭，只能使自己总在暗中摸索。

到成都，晚上十点多才出去找饭吃。这些年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和服务行业，已见成效。城镇里餐馆少，关门早，赶客跑的所谓"吃饭难"问题，据我沿途所见，已初步解决（北京每日流动人口 100 万，仍很紧张）。走进一家成都小馆，花二元五角，就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还包括二两四川好酒。各地的私营小餐馆真如雨后春笋，大概是因为投资少，收益快吧。成都最多，而且各色传统小吃不胜枚举。我曾经在小馆集中的街上徘徊，下不了决心品尝什么。每家店主人都大声招呼，延客入座，使我不好意思再继续转游。进了一家，要了一份最贱的小吃——豆花饭，二角四分，豆花和米饭各一碗，麻辣调料一碟，可口之至。店主并未因为我穷酸而白眼相待。这种福分，出入于高级宾馆的外国旅游者大概是难以享受到的。

四川人口上亿，占全国十分之一，素称"天府之国"，人杰地灵，出了象苏东坡、郭沫若、

朱德、邓小平等许多古今名人。但“文革”期间，竟闹得吃不上饭，大批姑娘流到外地，“嫁汉吃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成都饮食业兴旺，根本原因是农副业生产上去了。我不懂行情，听同路的妇女大为羡慕地说，这里瘦猪肉处处可买，一元三四角一斤，而北京只有少数高级自选商场才有，价高近一倍。

旧城区商业鼎盛，门面不大的铺子鳞次栉比。新建的干道两旁，则是时髦的“贸易中心”，公司商行之类大楼。最有意思的是市中心的地下商场。早些年，常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各地“深挖洞”防轰炸。这里挖的很简陋的地道，前几年经过精心整修，成了两列很长的商场。里面挂上璎珞彩灯，设有几百户国营、集体和个体小店。据说商场解决了几千个待业青年，特别是女孩的就业问题。这里还可以称为“成都美女展”吧，售货员中有许多年轻妇女，薄施脂粉，带着耳环，殷勤待客。不过细看一下商品，多是家用电器、各类时装、照相器材，以至戒指、项链等高档商品，同群众日常生活有些脱节。所以观者甚多，而购者寥寥。许多摊上都开着录音机，播放国外和港台音乐，砰砰震耳，好不烦人。

消费水平显然提高了。但我也感到“消费主义”在滋长蔓延。清教徒、苦行僧生活不是社会主义，适当鼓励消费才能促进生产，这没有问题。但一味追求消费，势必导致西方的拜物主义。早些时候，我同一些“正统观点”较多的朋友，对报刊的有些说法就不以为然。有人写道中国人有小农习惯，不会花钱，农民甚至把钞票藏在瓦罐里或压在炕席下，结果霉了烂了，应该“学会花钱”才行。其实，社会风气已经明显改变，完全不必再鼓吹消费了。人们温饱之后，都在为电视机、电冰箱等“几大件”奋斗，买不起小汽车，青年人向往着进口摩托。但对多数人来说，虽然近些年来收入已明显提高，财力还远远不足。其结果，“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日盛，少数人甚至捞昧心钱。假药案、假酒案发生了，谋财害命。同时，不少人还因消费欲望不能满足而牢骚满腹，看到旁人日子过得较好就患“红眼”（嫉妒）病。“消费主义”使人们贪得无厌，沉湎于物欲。照我看，美国社会的“高消费”，并没有带来“高幸福”。不知消费水平也较高的日本朋友以为如何？

途中这方面的见闻使我忧心忡忡。恰好这时，读到北京《人民日报》（11 月 5 日）的一篇头版评论，开门见山就说：“当前，我们应当注意解决一个问题：消费‘早熟’。何谓消费‘早熟’？请看现实生活中的几例：一些企业的生产没有大的发展，奖金、福利却不断增加；一些单位无视财务制度，进口豪华汽车等消费品；‘万元户’目前微乎其微，他们的消费水平，一度成为广播、电视，报刊宣传的热门，刺激人们不切实际的消费欲望等等……消费‘早熟’，生产就会‘早衰’，寅吃卯粮，国家财力、物力难以为继，势必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通过勤俭建国，逐步吃得好一些，但绝不是去大吃大喝；可以住得宽敞些，但绝不能搞超标准住宅；可以穿得舒适一些，但绝不是衣必毛料、绸缎；家用电器也要有一些，但绝不能强求全套化……绝对不能贪大求洋，追求奢侈……我们一定要教育人民继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读后我不禁拍案叫好，并用红笔批注：“清醒一些了，是大好事。”《人民日报》的言论在

全国都是很受重视的。“消费早熟”，照我看还会促成“世风浮靡”。拜物主义必然导致精神空虚。精神空虚，则固有和外来的腐朽文化必然乘虚而入。某日，时近午夜，我漫步成都街头，看到一家餐厅楼上彩色光束旋转，鼓乐之声震耳。那是一家舞厅。曲子“似曾相识”，驻足细听，原来是旧上海流行的一首靡靡之音。在武汉闹市，听到一家商店大放《何日君再来》，那是我年轻时代正派青年也嗤之以鼻的歌曲。在昆明的一辆旅游车上，还听到一首据说正在流传的古词新曲：“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原是南唐李后主(937—978)国亡被囚后怀念宫廷生活之作。其声缠绵，其辞凄恻。“真是亡国之音”！我不禁喃喃自语。议论起来，一些青年人却说我太狭隘了，这也是一种“代沟”吧。在一些偏僻小镇，常见录像馆放映的全是香港来的“功夫片”，青年观众不少。其中是不是夹杂着黄色淫秽的东西呢，很难说。总之，我有些隐忧。再用我们的术语说，“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加强。

古迹新生

“蜀江水碧蜀山青”，成都平原的风光确实秀丽。虽届初冬，极目远望，田野一片葱绿，生意盎然。几乎难以相信，这富饶景象得首先归功于两千二百年前的地方官吏李冰父子，他们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都江堰”工程(在成都附近的灌县)，引岷江水灌溉大片田。后世帝王追封李冰父子王位，建有“二王庙”。同其他经历了“文革”破坏的古刹一样，“二王庙”已经修复，而且更有生意了。二王各有一殿，殿宇宏伟，塑像很新，气宇轩昂，隐含着当前尊重科学和科学家的时代感。焚香膜拜者不少，老妪居多。

成都市内也有许多名胜，如唐代诗圣杜甫(712—770)住过三年多、写诗240篇的“杜甫草堂”，以及奉祀三国名相诸葛亮(181—234)的“武侯祠”。成都附近的眉山县，有纪念宋代文豪苏东坡(1037—1101)及其父兄的“三苏祠”，三苏是眉山人；有以五百尊罗汉的精美塑像闻名全国的新都县宝光寺；还有乐山市倚山临江刻出的大佛，高71公尺，为世所罕见，等等。旅游书上都有详细介绍，无需多说。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几年来古迹修缮工作进展迅速，这既有弥补“文革”过失的政治考虑，也许更重要的是出自发展旅游的经济需要。所到之处，发现塑像石雕、楹联碑刻、亭台楼阁、水榭荷塘大都修葺一新，而且力求保持旧时风格，不搞“现代化”。旅客不挤，处处曲径通幽，令人留连忘返。二王、三苏、诸葛、杜甫等先贤若有灵在天，也该为自己的殿堂新生，为故国再现升平而一展笑颜吧。

“峨嵋天下秀”，值得登临。千峰挺秀，云雾环绕，幽壑深处，清泉淙淙，而且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梵宇很多。我只登到海拔一千公尺、距“金顶”还有两千公尺的万年寺。在寺里看了一千年前铸造的一尊铜佛，高可数丈。长老殷勤，破例引我到一间净室，看了“三宝”，一是三百万年的“佛牙”(一块化石，姑妄信之)，二是两千年的贝叶(写在贝叶上的经书)，三

是三百年的金印(明代神宗皇帝的御玺),眼福不浅。又以精烹素斋相待,大饱口福。

游客络绎于途。西方青年不少,他们身背大背包,步履矫健地向上走。中国旅客中有许多是像我这样的退休人员,拄着价廉物美的竹杖,沿石阶徐行。更多的是年轻人,或三五成群,或男女成双。有旅行结婚的夫妇,有集体度假的工人,有专程来游的农民。农民而能游览名山大川,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遭吧。姑娘们一般都很注意打扮,喜穿红衫,一片苍翠之中,显得格外艳丽。摄影盛行,不带相机者,自有到处招徕的个体户代劳,二元一张,专拍彩色。

此情此景,又使我感慨起来。我们这一代,童年和青年大半都在战争中过去。新中国诞生了,满怀豪情想建设,但道路又很坎坷。如今似逢升平盛世了,却已两鬓斑白。想当年,我们哪有条件,哪有心情登临名山呢?夜宿宾馆,万山静寂,孤灯一盏,不禁自吟:"峨嵋群峰翠,蜀女笑颜红,岁月东逝水,惆怅青春梦"。但愿年轻一代能在一个持续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国内安定局势中工作和生活吧。

漫谈改革

早七时乘火车离成都,晚七时到重庆,一整天饱览天府风光。人烟稠密,哪怕是斗大一片山地,也种着庄稼或蔬菜。家庭经营,精耕细作,作物长势很好。四川试行农村改革较早,赵紫阳总理前些年在此主持工作时就发动起来。改革收效迅速,乃有"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这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起步较早,西南经济重镇重庆是个典型。来到城区,看到市井繁茂,车如流水,行人如织。

重庆人说改革已初见成效。经济问题复杂,我未深入探索,只举几个浮浅的例子。一是打破干好干坏照领工资的"大锅饭"。一批小型国营饮食店,已改由个人或集体向国家租赁经营。简单说,就是每月交租金若干,按章纳税后,盈余自行支配。"大锅饭"一破,立竿见影。当地人举出几家有点小名气的饮食店,劝我去试试。他们说饭菜改进了,环境干净了,最重要的是待客热情了。原来月月亏本,现在多已扭亏为盈。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一位同志颇为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人以勤劳著称。可是你到一些还在吃'大锅饭'的工厂看看吧,有些人吊儿郎当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了。再不改革,不但经济上不去,中华民族勤劳的这个称号也要丢掉了!"这话可谓一针见血。

看来,"一切向钱看"不好,但完全不讲钱也不行。在社会达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道德水平极大提高之前,不讲按劳分配,就会打击勤劳,妨碍进取,培养懒汉。不管你多么厌恶金钱的推动力,它总在那里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另一个例子是"多渠道",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发展工商,提供服务。"蜀道难",自古有名。重庆同附近农村之间的交通也很不便。多年来由国营公共汽车公司独家经营,十分拥挤。经济活了,大批农民每天要进城出售农副产品,国营汽车

更难应付。怎么办？取消国家垄断，鼓励私人买车。现在已有几千辆个体汽车在为公众服务。乘客不需到站，在道旁招手即可上车，原来不许上车的鸡鸭，成笼地搭乘车顶“雅座”进城。农民皆大欢喜，“运输专业户”也发了点财。在昆明，我也看到同样的情况。

峨嵋山旅游服务，也是靠当地农民参加才迅速扩大起来的。近年来中外游客剧增，1984年共120万人，1985年预计达150万。食宿都很紧张。农民手头已有些余钱，就鼓励他们开办小旅店、小饭馆、小茶座，摆摊出售旅游纪念品，设立摄影服务点。现已有从事各种旅游服务的农户800家，从业人员五千多人。人们以使用电子时代的语言为时髦，说他们是“硬件不足软件补”，“硬件”指物质设备，“软件”指服务态度。一些旅舍派人到车站迎客，满面春风，似接亲友，对旅客说：“请到我家住，二元一晚，保你舒服。”这价格比较适应一般消费水平。至于“硬件”，则在逐步改善之中，有些家已备有彩色电视，供住客晚间消遣了。

我不是私营企业的崇拜者，问题是十亿人的衣食住行，从大米饭到小纽扣，从幼儿园到火葬场，都由国家包揽，揽得了那么多吗？过去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的话，说私人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结果是连农民老太太卖几个鸡蛋，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成千上万辆私人汽车在营运，会产生出几个“汽车大王”吗？坦率说，一开始我也有些担心，但后来改变了看法。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管着嘛。全国解放前夕，当私营工商业家还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时，毛主席就曾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今天的私人经营者，一般都是小商贩、修理服务人员和家庭作坊的小生产者，他们很少雇工。认为他们有朝一日会掌握经济命脉，左右政治局势，未免过虑了。有些西方老友，似乎有此隐忧，我曾对他们说：“感谢关心，担忧不必。”至于某些外国作者，他们看见中国姑娘擦口红烫头发，就说“向西方化迈出一大步”，听到查禁黄色录像，又说“保守派维护毛主义”等等，那是一种时髦。不过我觉得也不必多所指责，正确分析一个外国的社会动向，本来并非易事。

不堪回首

在重庆，参观了解放前囚禁革命者的集中营“渣滓洞”和“白公馆”。那是一片荒僻险峻的山区。看了陈列着当年各种野蛮刑具的刑讯室(在白公馆是一个漆黑的山洞)，也看了一间间阴森的牢房。在渣滓洞的院墙上，保存着国民党特务用蓝漆写的对联：“迷津无边，回头是岸”，“青春一去不复返，好好想想。此地此时应回头，再勿执迷”。他们以为对那些青年囚犯，这是感人的招降号召。可是据介绍，囚徒们却贴上了一副红纸春联：“两个出气口出气，一个望风洞伸头”，横批是“乐在其中”。出气口指牢房无窗，只在屋顶留两个小口，望风洞指牢门常闭，仅有一个小洞可以伸头外望。从牢房里陈列的烈士照片看，很多是男女学生。他们没有为了个人的青春幸福而“回头是岸”，宁愿为革命坐牢而“乐在其中”。多么

感人的气概啊！1949年冬，当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炮声隆隆可闻时，特务当局下令杀害全体囚犯。他们英勇越狱，推倒的一面土墙还保存下来。但几百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密集枪弹下倒下了。

接着看了附近的“中美合作所”史实展览。1942年，蒋介石政权同美国签了一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中美合作所”按协定理立。所谓“特种技术”就是特务技术。大战结束后，“合作”就完全是为了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合作所”训练了五万多名特务，美国提供了九千多吨特工器材。展览馆里陈列着多种武器、中世纪式的和现代化的刑具、革命者及家属被杀害后的照片及实物，包括几双幼儿穿的小鞋……气氛阴郁，观众默默无声，只听到轻移的沙沙脚步声。

中美关系中十分不幸的一段终于过去了，值得欣幸。但我想如果有美国人出来为那段“合作”大唱赞歌，那必然会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当夜，登鹅岭山。聪明的重庆人在原来荒凉的山上，修了公园，并新盖了一座很高的“瞰胜塔”，饰以霓虹灯彩。游客极多，爱侣双双。登上高塔顶层，俯瞰在重庆汇合的长江和嘉陵两江四岸，只见万家灯火。前些年建的长江和嘉陵江大桥，彩灯成串，倒映江中，宛如长虹。山城夜景极美。这时，一位旅伴突然感慨说，四十年代他在重庆住过好几年，从无心情看夜景，“日本飞机常来轰炸，老老小小钻防空洞还来不及呢。”战争年月的苦难，深深印在人们心里。如今中日关系好了，大家高兴，总愿“往者已矣”，但“不思量，自难忘”，这里那里，仍难免勾起辛酸的回忆。正是那几天，多次在报端读到中国领导人同日本朋友恳谈，强调要避免伤害人民感情。我觉得这是为了维护中日友好的肺腑之言。“往事不堪重回首，莫使旧恨添新愁”，对吧？鹅岭之夜使我深有此感。

批 评 种 种

四川多茶馆，我爱坐茶馆。付一角五分，任你喝上半天或整日。在成都，我在百花潭公园茶座午休，打了一个盹，被百鸟争鸣之声惊醒。一看原来是一大群退休老人，提着鸟笼来聚会。在眉山县城，又坐茶馆。六七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也围坐喝茶，絮絮叨叨话家常。若说这是妇女解放的一个标志，并不过分。在过去，很难想象妇女能到茶馆这样的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她们旁边坐着三位老汉，一人在用抑扬顿挫的川腔讲《镜花缘》(长篇小说，清代李汝珍作)故事，另二位听得津津有味。上前攀谈，得知是三位退休工人，他们说“每月六七十元退休金，在眉山够过了”。一位读过几年书，另二位识字不多，就经常结伴来茶馆讲故事，真会安度晚年。

不过略为深入了解，他们也不是事事满意。在重庆逛街累了，我钻进闹市的一家极小的茶馆。同我挤坐一桌的是一位退休汽车司机和一位退休铁路工人。问他们日子过得如何，他们说每月退休金近百元，子女已经长大就业，生活可以了。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

毫无拘束地讲了一些。

一是物价涨，大家担心。那位铁路工人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现在仍每天仔细读报。他说他从报上了解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确需改革，有些物价该涨，但问题是有些不该涨的也在涨。二是风不正，以权谋私。有些当官的干，不当官的也干。一个卖猪肉的售货员，凭她手中挑拣猪肉的“权”（由于肉类消费大幅度增加，瘦肉难买），讨好常来采购的某中学校长夫人，结果她那“很不象样”的儿子竟进了那家“重点中学”。（关于当官的搞特权，后来还听到重庆人说句“顺口溜”，叫做“七品芝麻官，争着坐‘皇冠’”。意思是说有些职位不高的官员，也设法用公款购置进口的豪华“皇冠”车）。三是“一切向钱看”，某负责发汽车驾驶执照的单位，自办司机训练班，索取高额学费。然后滥发执照，不顾交通安全。四是另一句顺口溜，“不三不四数钞票”，指不正派的人钻搞活经济的空子，用不正当手段敛钱发财。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要我向上级反映他们这些老工人的意见。

所谓“不三不四数钞票”的问题，引申也就是指少数人发不义之财，导致贫富悬殊。我感到人们对这个问题确实有些担心。好在高级领导人显然能够体察民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抓两条，一条是公有制为主，另一条是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可以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我看这两条抓住了要害。

不久后，在《人民日报》（1985 年 10 月 29 日）读到报道，称东北辽宁省一位高级领导人同工人座谈，也有工人引用一句差不多的“顺口溜”：“不三不四暴发户”。可见“不三不四”发财的问题，已引起了从西南到东北的民间议论。那位负责人对工人解释说，对于发财的个体经营者，要有分析。有些人吃苦耐劳，又善经营，先富起来，是允许的。但也确实有些人走歪门邪道，就要加以清理取缔。我赞成这种分析的态度。我们的舆论多年来有个“刮风”的毛病，一说好就统统好，一说坏就一律坏，为此已经吃够亏了。

三峡奇观

离重庆，乘长江轮东赴武汉。主要是为了观赏三峡风光，否则坐火车要快很多。船上很挤，有所谓“散座”，票价很低，自己在过道上找个地方躺下就是了。同那些乘客攀谈起来，发现他们可不是穷汉，而是专程或顺道来游三峡的人。只因舱位太难得，才买“散座”凑合。

夜泊万县，住一晚，以便次日白天看三峡。船上二等舱（无头等）里几乎全是外国旅游者，日本最多，美国次之，澳大利亚有几个。相处三天，多少看到一些民族性格的差别。美国人开朗活跃，总爱窜出窜进。日本人比较文静，彬彬有礼。但他们一听到经过什么名胜时，便一起匆匆赶到甲板上，匆匆拍照，然后又匆匆回到舱里，显得不够悠闲。记得几年前访问西欧，也见到同样情景。从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雕像到罗马的古竞技场，从巴黎的罗浮

宫到日内瓦湖畔的古堡，凡有名胜之处，总有日本人。他们匆匆而来，匆匆拍照，又匆匆离去。一个美国人对我说：“这些日本人，有钱，全世界跑。他们是‘经济动物’、‘工作狂’，旅游也像工作”。我不同意他说得如此尖刻。“工作狂”好嘛，要不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的竞争那样恼火呢？但旅游中，确可放松一点。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365—427)的名句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境界岂不更符合东方人的气质？“说三道四”，不知日本朋友以为然否？

黎明启航，约九时，进入瞿塘峡。入口处称夔门，滔滔江水，被挡在狭窄的门口，夺路争流，声如雷鸣。两岸悬崖绝壁，一似刀削。八公里的瞿塘峡，景色多与此类似。有时看见江岸绝壁上凿有栈道，是过去船夫拉纤、军旅行进、商贾贩运的唯一通道。真不知古人如何上去开凿，也不知死了多少能工巧匠。纤夫直到解放前还有，他们拉着纤绳，匍匐前进。累倒或病倒时，即使船主好心，也无法靠岸救他。一般就把人留在道边，听天由命。谢天谢地，再听不见纤夫悲凉的号子声了。

“瞿塘险，巫峡秀”。40公里的巫峡两岸，群峦叠峰，屹立着“巫山十二峰”，其中神女峰最为知名。在一座耸入云霄的山上，有一石柱，遥望恰似一个矫健少女，婷婷玉立。十二峰前云雾濛濛，大江面上细雨霏霏，景色如烟似梦。战国(前403—前221)诗人宋玉，写了婉约清丽的《神女赋》，留下了楚襄王梦遇神女的美丽故事，使神女峰更富浪漫色彩。

西陵峡最长，74公里，过去礁石密布，险滩当道。解放后炸掉不少礁石，特别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建成后，上游水位提高，西陵峡江流趋于平缓，昔日的一些“鬼门关”已成为阳关道了。但峡口南津关仍很险峻。出关之后，江面陡然放宽，江岸豁然开朗。进入江汉大平原了，时已傍晚。

葛洲坝在望。这项宏伟工程于1981年正式发电，同年船闸也通航了。电厂装机容量为270万伏，现正建设二期工程。另一座大坝过些年又将出现。船过葛洲坝上游的一个地方，人们议论纷纷，说那就是坝址，工人已开始进驻。谈到大坝修成后的前景，据说发电量将居世界首位，大家很兴奋。有一位朗诵起毛主席1956年的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融会古今，绝妙好词。

尊重历史

在江上度过三天两夜之后，薄暮时分，船抵华中重镇武汉。这里是长江与汉水汇流之处。站在船头瞭望，左有龟山，右有蛇山，一座大桥飞架南北(那是1956年苏联援建的有史以来第一座长江大桥)，气势磅礴。两座新建筑——龟山下24层的晴川宾馆和蛇山上巍峨的古黄鹤楼——为武汉景观大大增色。

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人们才顾得上重建黄鹤楼这样的盛举。黄鹤楼址原是三国时代吴国(222—280)的一个军用瞭望台，经后世修建，成为闻名全国的名胜。在历史上，黄鹤楼

多次毁于兵祸或火灾，1884 年一场大火，完全烧光。此后国运衰微，无力重建，游人仅能临墟凭吊而已。百年之后，名楼重现，而且胜于往昔，武汉人颇感自豪。

为避火祸，这次采用了混凝土建筑。还特地研制了一种赭色油漆，使它能酷似木质结构。要用手敲墙柱，才能辨出。我本担心楼内装饰和风格也“现代化”起来，譬如悬挂一些标语口号式的楹联之类。实际上并不如此。楹联典雅，壁画优美，古色古香，扩音器是现代化了，但只轻柔地播送着古笙古琴乐曲，气氛谐和。逐层攀登，看到有一层的壁上刻着几位古诗人和爱国名将岳飞（1103—1142）咏黄鹤楼的名句和他们的浮雕像。很好，历史又受到尊重了。

武昌（武汉由汉口、武昌、汉阳三城组成）的辛亥起义纪念馆也给我同样的感受。1911年，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推翻了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建立民国，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那场民主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早些年，极左思潮泛滥，历史和文物界受害甚烈。辛亥革命似乎也失去光彩。除个别人物受到青睐外，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被谴责，甚至连民间传诵千年的民族英雄岳飞，也被斥为封建王朝的“义仆”。海内外爱国之士，都为祖国历史和文化被一笔勾销而痛心。现在，纪念馆内的陈列品和解说辞已如实地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和精神。

还访问了秀丽的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看到一个极难得的展览。1978 年，在武汉北面的随县施工时，挖出一个约为公元前 433 年建的楚墓。墓主为曾侯，名乙，死时约 45岁，装入一具巨大的棺椁中。另有中等棺木 21 具，装女尸 21 人，大的约 23 岁，小的仅 13岁，还有一小棺装狗骨一具，显然都是为墓主入葬的牺牲品。墓内出土的乐器、青铜器、兵器、金器、玉器、漆木竹器和刻有文字的竹简共七千多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另 124 件各种乐器，尤其珍贵的是 64 具青铜“编钟”，悬挂在铜木结构的架上。编钟大小不一，最大的一具高 153. 4 厘米，重达 203. 6 公斤。试验性演奏表明，2400 年前的这些乐器性能良好，古今乐曲，均能演奏。湖北艺术家仿制了一套编钟，创作了编钟乐舞，曾到北京和海外演出。博物馆里陈列着全套编钟原件，真是稀世之宝。青铜器皿制作极其精美，使人们为当年就已达到的冶炼水平惊愕不已。

一个姑娘为观众解说，语言朴素自然。我原以为讲到 21 个妇女殉葬时，定会像过去那样来一篇控诉剥削阶级的说教。她没有说。其实不说更有效，让观众自己动脑子嘛。当时我就想到牺牲的就是同她差不多年龄的俊秀女子，竟心酸起来。变，一切在变，口头不那么革命了，实际效果却好多了。

希望所在

从武汉乘火车回到北京，“百日游”愉快结束。在长江轮上的最后一夜，我曾细细回味观感，准备归纳为几句韵文作为谈资，这里引几句：“遍城乡，都在建设。各阶层，生活提高。

庆温饱，人心舒畅。行改革，初见成效。”另一方面，“言路开，批评不少。问题多，确需对策。七年来，变化可喜。宜清醒，戒躁戒骄。”简言之，我看到大片阳光，也看到不少阴影。令人放心的是现在的领导人善于体察民情，既看成绩，也看问题。譬如“工地遍全国”，蓬勃建设，固然可喜，但也孕育着基建规模过大导致经济紧张的危险。一经发现，就坚决纠正。这就好了，革命理想，牢记心间，实事求是，稳步前进，这正是希望之所在。我挥笔写了最后两句：“齐奋进，再展宏图。看长江，东流滔滔。”

政治性议论太多，有些读者可能腻烦了。就旅游来说，这段路程的确风光秀美，古迹很多，值得一走。我愿寄语东邻友人；曷兴乎来！

中国青年报·不要讳言困难和危机[1]

陈小川

【题解】《中国青年报》是一份有权威、有影响的大报，1980年代更是引领潮流，占尽风光。《中国青年报》的许多报道、评论、栏目等都曾独树一帜，脍炙人口，包括以评论员陈小川命名的“小川快评”。现任总编辑的陈小川，一向以家常话讲大道理，快人快语，鞭辟入里，不落俗套，生动有趣。

北京市今年有两件工作是颇有新意的：

一是大抓节约用水。不仅仅见诸行动，而且在报纸上大讲水源危机，一个夏天没断。几场大雨之后，报纸马上如实报告城、郊区降雨量和水库蓄水量，并说明库区上游降水不多，危机未缓，继续大讲水源危机。而且说，如果不节约用水，北京市将面临生活用水管制。

二是永定河上修了一座大桥，过往车辆一律收过桥费，一时间汽车司机怨声四起。于是报纸又开始讲话了，讲建这座桥花了上千万元，国家没有这笔投资，市政府怎样筹了钱。收过桥费一年可收多少，收了以后还要派什么用场，不收费前景是桥坏了没钱修，过往车辆还得在这儿卡脖子。后来人们气消了，主动一次多买几张过桥票，以备后用。

这两件事看起来简单，却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把困难和危机如实告诉人民。

我们的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困难多得很。在困难的时候，过去我们习惯于讲成绩，讲光明，认为这样可以提高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而比较讳言困难，更讳言危机。实际上这样是不行的。困难和危机是客观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讲不讲，而且困难还要靠人民共同去战胜，如果又要人民去战胜，又不讲我们要战胜的困难有多大，就如同要率军出征，却讳言敌人的实力一样。这样怎么能使人们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勇气呢？

我们的国歌是诞生于民族危机时的一首战歌，它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强调成绩，而不是着重向人民揭示整个民族面临的危机，就绝不会产生像《义勇军进行曲》那样巨大的警醒国民的力量。可见，在危机面前首先看到危机，比看到成绩重要得多。讲困难、讲危机，前提建立在对人民的充分

[1] 《中国青年报》，1986年11月14日。

信任上，相信人民群众不会因为知道了困难，知道了危机，就坐以待毙。今天我们的改革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困难再大，也不会严重过国歌诞生年代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那时候，危机感唤醒人民共同抗日；今天，危机感绝不会使人民群众躺倒不干的。

也许有人会说：困难和危机讲多了会使人泄气。不错，困难和危机讲多了会有一些人泄气，但从整体上说，泄气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激发起斗志，所谓“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这样一些故事，都是说明人在意识到危机的时候，会产生摆脱困境的强大动力。相反，过多地、不适当地讲成绩、讲光明，反倒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失望，因为人们身边并不全是成绩和光明。而人们一旦觉得我们的宣传连现实都不正视的时候，何来信心和勇气呢？如果北京市领导只讲节水取得多大成绩，不讲水源危机；只讲过桥要收费，不讲建桥没有资金；市民一定会说：水源丰富，形势大好，节什么水？建桥上边拨款，过桥收什么费？不讲困难、不讲危机会带来坏结果，道理就是这样浅显。

也许有人会说：那么光讲困难就行了么？当然不是。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叫做“成绩讲够，困难讲透”。但是长期以来，事实往往是成绩讲过头，困难全不讲。这在有些人大概和怕否定了成绩，怕面上无光的心理有关，困扰于这种顾虑的精神状态本身就可能使人失望。我们所以现在需要实实在在地讲困难，把困难向人民和盘托出，让大家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战胜危机。不仅困难很多的时候要讲困难，形势大好也得讲困难。成绩有时没讲够，没什么关系；而讳言困难和危机，吃亏的却是自己。

把困难和危机如实地告诉人民，唤起人民共同战胜困难和危机，推动我们的各项改革事业，这才会有真正的同心同德。

中国青年报·大兴安岭的警告[1]

雷收麦、李伟中、叶研、实习生 贾永

【题解】1987年，被新闻界称为“深度报道年”，《经济日报》对“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中国青年报》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等，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关于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三色报道”也是其中一例。所谓“三色报道”，是《中国青年报》连续刊发的三篇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这篇《红色的警告》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篇。记者通过深入的调查，文学化的笔法，揭示了火灾背后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范例。作者之一的叶研2000年获得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贾永现为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

红色的警告

编者按：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作为一段震撼人心的记忆，留在了1987年的中国历史以及人类同大自然相互认识的史册上。

在熊熊的烈火面前，我们顽强的人民，我们英雄的军队以及参与这次扑火的许许多多的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部署指挥下，经过殊死搏斗夺取了这次扑火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他们业绩真正是赴汤蹈火、彪炳史册！

这场悲剧肇衅何时？繁衍于何方？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结论最终将会是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

我们希望尽可能如实地记录这场灾变的史实，献给关心着这场灾变的人们，献给在改革中前进的祖国。

一把火，一把令五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的火；一把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焚毁85万立方米存材的火；一把令五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的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

[1] 《中国青年报》，1987年6月24日。

“这是天火。”——灾区一位老大娘说。

“这与‘尼尔瓦诺’现象有关，北纬 53 度线左右有一道燃烧线。”——一位干部说。

“风再大也刮不出火来。”——大兴安岭林管局长说。

“五个火源都是林业职工违反制度和操作规程造成的。”——迄今一系列的报道这样告诉人们。

是的，现实给人类的答复往往不止一个。今天，大火熄灭了，然而，灾难留给人类的教训却是永恒的。

还是从几个小故事说起吧。

关于火种的故事

A 关于加格达奇的故事

大兴安岭地区共有人口 31 万，是一个以木材和营林生产为主体的森工企业。首府加格达奇——美人松的意思，一个由少数民族语言赋予的美称。

虽说这里人口不稠，工厂不多，但街道整齐，交通方便，大都市里有的这里几乎一切都有。

许多奔扑火而来的记者都想不到有这么一个风姿绰约的森林城市坐落在深山老林里。

然而，你茫然了。这里不叫镇，也不叫市，而被称作“加区”。

“为什么不能叫市呢？”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大兴安岭是林业部的直属森工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

一个媳妇仨婆婆。它不敢称“市”，一旦称“市”，行政归属问题就会扯皮，内蒙古自治区想收回它，黑龙江省又不肯轻易放掉这“碗边的肥肉”，更何况把它视为掌上明珠的林业部呢！于是，加格达奇只好委屈了。

大兴安岭成了真正的“一仆三主”。每年的企业赢利除上缴黑龙江地方财政几千万元外，还要上缴内蒙古自治区几百万元“土地使用费”，上缴林业部几百万元管理费。

1985 年国务院规定，大兴安岭可从企业赢利留成中提留近五千万元育林基金。田纪云副总理曾指示，育林基金要“取之于林，用之于林”。就是这笔经费也要七扣八扣，林业部拿去相当大一部分移作它用。余下的除去上缴能源交通费，扣除维持营林机构经费等，用于森林保护的只剩下 9%。而这部分又要分成林政管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若干项目。其中真正用到森林防火中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道路，是林区的神经和血脉。有了道路，既能作为防火隔离带，又能为快速扑灭山火提供交通条件。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森林道路的建设，这些国家每公顷林地拥有道路已达 5～7.5 公里，我国的伊春林区每公顷拥有道路 2.2 公里，而大兴安岭每公顷仅有道路 1.1 公里。修建道路的报告连年呈到林业部，林业部推到国家计委，计委又推回林业部；林

业部的计划司推到森保司，森保司又推到计划司，人人都当“二传手”，谁也不肯掏腰包。

解决柈子城问题，既是节约木材，减少浪费的一个渠道，又是解决防火隐患的重要措施。以煤代木是一个高明的办法。煤，当地有，位于西林吉的古莲煤矿可提供大量生活用煤。但也苦于没有道路。“要修建道路，连通古莲。”大兴安岭林业局的领导早就下了这个决心，不可能向黑龙江和内蒙古伸手要钱，还得找林业部。可林业部迟迟不下达计划指标，你不给钱，我们自己解决，大兴安岭准备从已被拨去的护林防火基金中挤出钱来修路，林业部又以”无此文件”规定为名不许他们动用这笔钱。他们只好边斩边奏，修通了古莲至图强的一条沙石路。正是这条路竟成了一个屏障，在这次扑火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至今，这笔修路费用还在地方财政的赤字栏上。

同样，森林瞭望塔是林区的眼睛。由于经费不足，大兴安岭的森林望塔仅是伊春的1/3。缺少瞭望，无法判断火灾的方位。”5·7”大火中，由于方位判断的失误，一度影响了正确的指挥。400 名摩拳擦掌的森警指战员受命驰援，辗转奔波了四天，竟然没有找到可扑的火头。

真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这种弊端百出的体制结构、管理模式，不改革怎么得了！

B 钱袋的故事

八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成绩斐然，但旧体制的框架明显束缚着经济的更快腾飞。

由于大兴安岭的体制缺陷所决定，防火工作先天不足。

防火指挥部归属地方政府，森警属于武装森林警察部队，空降灭火队则属东北航空护林局。

又是一个三足鼎立！

三家各有各的经济利益，很难形成一个协调的战斗整体。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1985 年起，大兴安岭建立了护林防火中心，这里也组织了多人去国外培训。主管防火的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副专员张凤鸣说：“我们设想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统一调动、统一指挥、装备现代化、战斗力强的扑火队伍和资源管理中心，可林业部迟迟不表态，直到今年的 5 月 5 日，发生森林大火前夕，还在为资金扯皮。”

漠河县是我国最北部的一个县份，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地方上仓廪充实，县上花钱手脚也大。办公大楼、各项公益设施建造得都很漂亮，可是在防火投资上，他们却抠得令人瞠目。

按理，作为西林吉林业局所在地的漠河县应该建一座气象站，那怕建一个气象哨也好。可他们舍不得花这个钱，也没人操这份心。

记者向县里一位副书记提出这个问题，他吞吞吞吐吐地说：“‘北极村’里有。”

距县城 80 公里的北极村，确有一座气象站，归属国家气象总局，负责全球气象资料的交换工作。站长周汝锵告诉记者，他们没有为漠河县提供气象预报的责任与任务，再说距离 80 公里，小气候也会有差异。话虽这么说，但这个站每年防火防汛期都主动向县里提供

天气情况。谁能想到，漠河县这个“受益单位”却死活不肯掏这几百元的长途电话费。周站长苦笑着：“前些天还与县里一位负责同志为这事扯皮呢。”

扑火过程中，天上是飞机，地上是装甲车，实施人工降雨，开辟生土隔离带……有人计算，这次大规模、大兵团、立体化的扑火救灾，光是军需保障、后勤供给每天就要花掉近百万元。

这笔账应该由谁来算呢？

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平时不肯对森林防护多投资，而到发生火灾，却丢了大本钱。群众说：“防火时扎紧钱袋，扑火时却钱袋朝下，这钱花得冤啊！”

C 两个“马大哈”与四个“酒鬼”的故事

请谅解我们使用了“马大哈”这样不雅的词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机会恰恰丧失在这批“马大哈”手中！

因使用割灌机在林区造成了多次火灾。今春，大兴安岭林管局发出通知，防火戒严期禁止使用割灌机作业。部署是部署了，可没有督促，也没有检查，4 月 28 日，通知到了地区防火指挥部指挥科一位副科长手里，八个林业局他只通知了五个，恰恰是那生灵涂炭、惨遭损失的北三局没有被通知到。

5 月 5 日，漠河县防火办的电话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地区气象台的大风预报和高温警报：5 月 7 日大风可达“火险级”，气温将升高到 23 度。此刻，较漠河境内出现的两处火情早一天，较大火吞没漠河县城早两天！

如此重大的气象变化，居然没触动县防火办主任那麻木不仁的神经。他没有向主管负责同志汇报，而把这预警截留在办公室中了。

玩忽职守，麻木不仁不仅表现在火前，就是扑火救灾中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大兴安岭地区某局参加扑火救灾的小车司机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在西线我们的车经常拉指挥部头头。一天，一位副总指挥去检查火场情况。

“我们穿过火海，来到一个防区，满山那大火呀，烧得呜呜叫，眼看就要烧过防线了，可防线上一个人没有。人呢？正坐那儿喝酒呢。别说头儿了，我都气得慌。

“副总指挥问：‘为什么不打火？谁是领导？’你猜那哥四个咋说：‘咋的呀，这疙瘩我们管，你是干啥的？’”

“一听说是副总指挥，还是省政府领导，这哥四个才紧张了，说马上组织扑打。后来，他们中的一个给我们带路去另一个火场，还是当地林场的呢，硬是把道儿领错了，没法子，调回头重走，又回到了他们喝酒的地方。瞧那哥仨，把我们支走了，没挪窝，还坐那儿喝呢！”

听来两个“马大哈”和四个“酒鬼”的故事近乎荒诞，又都是个别现象，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代表。但在国家机器的链条上，有这么几个齿轮有毛病，那机器还怎么正常运转！

D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让我们把视线缩微到漠河县，只把视点聚焦到防火工作上，或许能从这悲剧发生前的情节里发现些什么。

过去，漠河县驻扎着一支由七十多名干练的小伙子组成的武装森林警察，主要负责富克山的森林防护工作，当然也协助西林局林业局扑灭过不少次山火。

然而，这支被群众称作“森林卫士”的森警队伍竟被“请”出境了。

事情是这样的。富克山里有黄金矿藏，县里为增加经济收入招收了一些社会闲散劳动力开矿淘金。采矿中不免发生一些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要根据有关法规收取费用，因为县里有人多次弄虚作假，被森警队罚款一万二千多元，于是留下积怨。

去年 11 月的一天，值勤森警拦住县黄金公司副经理的小车，检查进山证，并因此发生纠葛。接着县里公安局立案侦察，审计局检查罚款是否有经济问题，物价局也派人检查森警队办理“入山证”是否多收了钱……

这种事本不奇怪，可结果是漠河县领导拍着胸脯保证：“撤了森警，护林防火工作由我们统一管理，保证管好。”经地区有关领导拍板定案，森警队就这样撤离了漠河。

“官司”打完了。至于护林防火工作，县里虽然成立了一支 30 人组成的快速扑火队，可是第一没有一台风力灭火机，第二没进行一天的训练。大火烧来后，人们又怀念起森警来：“要是森警队在这儿，拿起风力灭火机，突突突，早灭了！”然而，晚了。

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县的消防工作。去年春天，县糕点厂着了一把火，消防车拉着警笛来了，水枪手端起水枪摆出架式，谁想，消防车的水箱里没有一滴水。

平时，消防车多用来接站送站，有时接送站竟也拉响警笛。今春以来，不管风势大小，总是拉着警笛兜着圈子呜呜叫，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消防车再叫，也没人当回事了。

一位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说：“这就叫烽火戏诸侯啊！”

从上述的几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体制的不协调，由于某些干部的玩忽职守，由于对特大火灾放松了戒备，在大兴安岭——我们祖国的绿色宝库中，早已埋下了灾变的火种。

烧不散的会议

5 月 6 日下午，漠河县委那栋高高的灰楼里，县常委会正开在兴头上。“噢，怎么远处腾起团团烟雾？”“是不是山上着火了？”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县委一位领导操起电话向县防火办询问，回答是，河湾林场着了一把火。“好了，集中精力继续开会！”会场恢复了平静。“山里着火，就象城里的交通事故一样，年年防，年年有。”正如一位领导说的那样，这把火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在大火骤燃的时刻，在春季防火的危险时期，在已有高温和大风警报的情况下，一个以林为本的县里，常委会开得如此安然。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发现古莲林场方向也腾起烟雾。“怎么搞的，又着了一把火？”

终于——会议原议程不变，只是移到防火办开。边听火情边开会，两不误。

会议照样进行……

8日凌晨二时至四时许，从古莲火场烧来的火焰仍在民宅中肆虐之时，县里又分层次召开县常委扩大会、副科级以上干部会，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此刻，回头的火焰又从容地吞噬了一批民宅。

类似的会议在另一个火区——塔河县盘古林业公司以同样的节奏召开着。这天夜晚，大火从三面包围了拥有全国最大贮木场的盘古林业公司，形势异常严峻。21点30分，被誉为“红孩儿敢死队”的大兴安岭森警空运一大队及时赶到，乡亲们欣喜：这下，盘古有救了。谁知，一下车，教导员张国华就被叫去参加会议。23点45分，几位县里的领导仍围绕“从哪里打、怎么打、打不灭怎么办”在争论。屋外，狂风大作，火光已经烧红了夜空，手持风力灭火机的上百名森警队员望着即将进镇的大火急得直跺脚。屋内张教导员被这种没完没了的会议激怒了：“你们研究，我们打火去了！”他率兵冲向迎面烧来的大火，此刻，大火离弹药库只有几十米远了……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会而议之”。问题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要有特殊的动员方式和工作方法，这就是一个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应变能力。

大火对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是不留情面的！

大火映衬之下

当大火来临之际，我们的干部们都在做些什么？

翻开5月7日的历史纪录，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干部以其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为抢救群众和国家财产而奋战，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然而，在同一时刻和同一地点，有的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另一种角色。

A 在社会责任与自我保全撞击的一刹那

5月7日下午四时，古莲火场狂风大作，火借风势，如同《天方夜谭》中的魔鬼从魔瓶中爬出，可惜，在它刚刚从魔瓶中露出头角时，没人把他堵回瓶中。而这，任古莲火场指挥的县委李副书记原本是应该能做到的。

本来，这把火并不算太大，经过林业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整夜的扑打，7日上午明火已经熄灭。按理，应全力以赴清理火场，消灭战火、余火，打出隔离带。可他们没这样做。

火场上，只留下少许职工看守。千余扑火大军退至公路。李副书记在面包车里吃罐头去了。

老天爷留给漠河人民免受劫难的时间在一分一秒的逝去。

终于，烈火窜跳起来，突破了没人防守的防线，轻而易举地向远方推进。

全军撤退，寻找安全地带——李副书记做出了抉择。

“我去派车，一会儿来接你们。”说罢，他钻进小轿车，一溜烟奔回县城。

群龙无首，被他扔下的扑火大军失去了同烈火最后一搏的机会。火魔狞笑着，摇了摇凶恶的身躯，朝人们扑来。回县城后，他的第一任务便是疏散家人。有人看到，这位年轻干部赶在大火进城前，将自己的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此后，他又去指挥群众疏散了——这是在从他手上放跑的火魔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时候。

B 自信精神与自然规律

当黑烟红火的立体屏障遮天蔽日地推近到县城西侧山梁的时候，县委王书记当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她泼辣果断，当然，她也难以接受哪怕是失败的可能。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她抄起电话，通过广播电视再次下令出击。

“县城里的男女青壮劳力，一律自带工具去西山打防火道。老弱病幼留在家中，不得乱动。要相信政府……”播音员正参加地理气象函授学习，他根据这几天蒙古高压槽的移动，预料到可能有强风。他想在王书记的紧急通知中加进让群众赶快疏散的话，可他没敢——“所有人要听从指挥，不得违反纪律，违者严加惩处！”

留在县城的千余劳力走出各自家门，赶到西山梁子的时候，大火已怪叫着进镇了……

这天，地区每隔一小时来一次电话询问火情，县里都未能如实汇报，昨天，图强林业局已经集结了百余精壮的扑火队员准备前来支援，也被谢绝了。即使刚才，106 名稚气未脱的中学生都被动员上山打防火隔离带的时候，她都未向图强求援，也没有向地区防火指挥部请调空运灭火队。

她相信自己的力量。

直到 7 日下午六时，大火临头了，她才慌张向地区报告：“请上级给予必要的指示和支持。”然而，一切都晚了。

地区张副专员：“今天我几次问你们火场情况，你们都说控制住了。怎么火这么大了才通知我们？”

王：“……”

就一个十多年前的知青来说，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她泼辣果断的作风，但是，在这重大的灾害面前，她的科学精神却令人遗憾地与她的职务不相匹配。

“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你们要地区采取什么办法？”张副专员急切地问。

王：“如可能，马上把图强的消防车调来。”

王书记想到图强的消防车了，却没有想到提醒图强赶快疏散——火浪，正以每小时四五十公里的高速向图强涌去。

图强派去的两辆消防车中途遇火，其中一辆被火吞没，两人遇难。

未几，图强、阿木尔两个林业局葬身火海。

C 废墟上的红瓦房和它的主人

灾后，漠河县城凄凄凉凉的废墟上，奇迹般矗立着一栋红砖瓦房。这里住着四户人家，其中东头，漠河县县长兼西林吉林业局局长高家；西头：县公安局消防科科长秦家。

“这栋房是秦科长用消防车和推土机保下来的。”群众反映，当时消防车呈“品”字形卫护在高、秦二宅周围。

“我保县长？我是保人民啊——！”消防科长说。

“我不把消防科长卡住那儿，人就烧死多啦！再说谁的财产都应该保嘛。”

一个饮食个体户的话：“11点钟火都小了，我带孩子们回来保饭店，见四台消防车和大推土机全力保红旗旅社（县长和秦科长住宅旁）那疙瘩。那时，我前边吉祥旅社还没着，我说你们消防车去把吉祥旅社东边刚起火的小房打灭，这旅社就保住了。可人家不理我，那工夫只要好好组织，不少房子能保住。我家的饭店着了，就是俺爷儿几个救下来的。”

推土机手证明：“那晚都半夜多了，秦科长骑着摩托车喊我去推防火道。先是绕着他们那栋房推了一圈，接着又让我去推靠高县长家的那两栋房。好端端的房子，又没起火，推了多可惜，我不忍心下手。见我犹豫，秦科长就上车来指挥，推倒了那两栋房。周围没什么大火了，还打啥防火道啊！”

红瓦房在废墟中巍然矗立。

烈火借给了人民眼睛。

D“宿命”与大话

“我原籍河南新野。三国时火烧新野，如今又火烧漠河。晦气，晦气！”漠河县高县长对记者来访时的寒暄，竟有一种宿命的味道。

5月31日中午，记者来到高县长家。

县长很热情，他十五岁当兵，十九岁转业到林区。任漠河县县长兼西林吉林业局局长之后，他拿出了更高的热情与魄力。

“1983年我来时木材产量才9万立方米，去年已增加到24万！”高县长自豪地对记者说。这期间，漠河还成了万两黄金县，市政建设也初具规模。

然而林区建设中还有至少与木材生产同等重要的工作。

1958年，刘少奇同志视察伊春林区。他问当地负责人：“在林区什么是第一位的工作？”

“防火。”对方回答。

“对了。”

去年9月11日，田纪云副总理视察漠河时明确指示：“柈子城问题不解决，会火烧连营啊！”高县长当即保证：“我们保证以煤代木，尽快解决柈子城问题！”然而，直到漠河受灾，县里只成立了一个三人的煤炭公司，共拉煤一卡车。县领导家的柈子堆却越来越高。

“这回完了。”高县长对记者说，“最低限度是撤职。我对孩子们说，‘你爸爸可能会服刑

去。’唉，最基层的责任者就是我。”高县长感慨万端。

不知算是可叹还是可悲，多年养成的习惯改不掉了，6 月 2 日，全县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动员大会上，高县长的嗓门又洪亮起来：“同志们——！我们要拿出当年大会战的精神，三个月完成相当于过去十年的建筑任务！建筑总面积 207732 平米！其中平房 364 栋，楼房 40 栋！”

台下听众望着大片废墟苦笑。不论从实际施工期计算，还是从铁路运输能力来看，三个月完成 20 万平米的建筑量根本完不成。

“……火灾震动世界，人人关心着中国的北极——漠河！我们建设的快慢，显示着……”高县长仍在真诚而激动地说着。

大火向人们昭示了这些现象，却未能烧掉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

不是结束语

我们准备结束本篇，但并不希望结束这场灾难留给人们的思考。

此刻，我们要将如下严峻的数字摆在记者面前：

据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文件记载，1966 年一场因吸烟引起的大火，共燃烧了 32 天，毁林 52 万公顷。从 1964 年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到今年五月这场特大火灾之前，森林可采资源减少了一半。其中森林火灾烧毁 4865 万立方米，占可采资源的 30%。按开发 20 年的消耗比，大兴安岭林区只能维持生产 26 年了。大兴安岭开发到 1985 年，22 年间，共发生大小森林火灾 881 起。烧毁森林面积等于这些年来营林更新地面积总和的 164 倍！

大森林——人类的摇篮。

大兴安岭——这个面积相当于浙江省的中国最大的林区，这个生长着祖国未来无数栋梁之材的绿色宝库，竟年年在遭受着如此的戕害！

连年的大火，该烧醒酣睡的人们了！

“我认为这场灾难主要是人祸。”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邱兴亚语调颤抖：“是我们——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而我们僵化的体制，也使得我们成为官僚主义。这场大火，对我们是不烧死的烧死。”

1987 年 6 月 6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代总理万里严肃宣告：“今天的大会，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大会。”

1987 年 6 月 1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常委们代表十亿公民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他们说：

“现在官僚主义相当严重，相当普遍。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大火向我们发出了红色的警告，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人民日报·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上)[1]

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

【题解】《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张建伟认为:“深度报道,发展到《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已经很难再称之为报道(尽管它们写得很精彩),简直就是一种‘精英启蒙’了。”这篇报道曾经风行一时,与1980年代那种思想启蒙、狂飙突进的时代氛围若合一契,无论利弊得失都已成为新闻史和社会史的范本。

“……农贸市场。茄子又涨价3分,猪肉摊前挤满了人,一片抱怨声。转念一想,不过年不过节,一次往网兜里装5斤肉,放进电冰箱,10年前谁曾想过?

“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开了20米,堵住了。街上从来没有这么多车,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灯下,孩子做功课。她姥姥和姨都得陪着,没法子,只两间房。听说单位里要出售商品房了,得赶紧攒钱。

“希望,在明天!”

——摘自1987年5月21日《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来稿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

刚刚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站在落后起跑线上的抉择

世界银行去年公布1984年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指标,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10美

---

[1] 《人民日报》,1987年10月6日。

元，排在128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20位。

这是一个令人难堪又引人发愤的数字（尽管各国统计口径并不一致，数字未必准确，但它们仍足以令人难堪）。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的座次向前挪了几位，开始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摆脱贫穷和不发达状况，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只要审视一下人类居住的这颗小小行星，可以发现富国和穷国的分野就像海陆的分界那样分明。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984年的资料统计，全世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地区有72个，拥有30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却只有1万亿美元。而世界上19个发达国家，人口7亿，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高达8万亿美元。以人均收入计，贫富两者的差距在33倍以上。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是历史造成的，主要是在近代史上错过了工业化发展的早期机会。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陈伟恕举例说，当17世纪初英国推进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正是明王朝末年的党争、战乱与海禁。一步落后，便陷入被动挨打局面；挨打和被劫掠的结果，是步步落后。直到二次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后国家才重新获得在经济上奋起的机会。

但是，这已经远远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其起步之初，就面对着经过了工业化前期历次发展阶段、无论在资金积累还是在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先进工业国。如何缩小穷国和富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距，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难题，也是年年联合国大会上令人头痛的议题之一。

100多个发展中国家，40多年来，都在寻找一条可以通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这条路不容易找到。

能不能沿袭发达国家当初走过的成功之路？去年底，北京某大学的校园里贴出一张小字报："我们应该走自由资本主义的富强道路。"这至少是一个缺乏世界经济史知识的糊涂观点。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副教授、35岁的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陈琦伟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时说：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已走不通了。

17世纪、18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确是"自由"的。近代工业在自然经济的土壤里自然生长起来，资本人格化的企业家在利润目标推动和投资风险约束的双重作用下自由竞争，形成了以"看不见的手"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秩序，政府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如此经过100年、200年、300年，才进入工业化社会。然而，如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已根本不同。面对充分发育、无孔不入的世界市场，任何一个国家封闭起来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使经济赶超先进水平都已成为不可能。本国市场的不发育，企业家的缺乏，不得不由其政府出面组织经济；工业化需要巨额投资与国民收入低的尖锐矛盾，不得不由政府代行资源配置之责；发达国家走了几百年的路要浓缩在短暂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社会

急剧变革，不得不由政府推进和控制。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介入，是与早期的“自由”概念不一致的。所以，战后虽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自称以欧美经济模式为蓝本，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沿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路走通的。他们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开始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摸索一条另外的路。

更何况，无论英、法、德、美、日，其发迹史并不那么光彩。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对本国大部分人的压榨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为条件。英国的圈地运动，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欧美的大规模黑奴贩卖，乃至日本电影《望乡》所描写的那种把本国妇女弄到国外当妓女，都曾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历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道路不应该、也不可能重复，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本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中出现了被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称之为“社会主义浪潮”的动向。在苏联计划经济早期成功经验的示范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从撒哈拉南北、安第斯山两侧到孟加拉湾沿岸，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对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运动，建立起国营经济，有的国家国营经济甚至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力量。有些国家，尽管经济、社会条件同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国家有很大不同，但也模仿后者，实行一党制的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然而，这样的模仿，一般来说甚至未能再现最早实行这种经济模式的国家在早期出现过的有限成功。人们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张望。近年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大部分，先后实行“非国有化”，把部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营，一时成为一种潮流。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33 岁的曹远征研究了这一奇特的经济学现象。他认为：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依靠行政动员、经济管制，有利于将有限的农业剩余用于工业性资金积累，并迅速提高实际积累率；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组织投资也便于获得规模效益的好处。所以，当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条路是有其道理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初步发展，这种代办一切的高度行政化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它窒息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同时，这种僵硬的体制极易忽略发展中国家法制的先天不足、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下、人才和技术的匮乏、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等问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病态。历史证明，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摆脱“前资本主义”烙印的国家内，企图由本身机能尚不够健全的政府来全面代行社会和企业家的职能，往往吃力不讨好。这些国家“非国有化”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历史告诉人们：“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也需要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竭力宣扬和引导发展中国家推进“非国有化”，是想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进一步依附于自己。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整，改善经营管理，发展民族经济。然而，简单的“非国有化”是否就是经济起飞之路？这正是许多发展中

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新的困惑。

战后确实也有由穷致富的例子。一类是石油出口国，那是得天独厚，别人学不来；何况主要靠出售资源的高收入，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另一类就是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上海外贸学院外贸经济系副主任王新奎 9 月中在日本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他强烈地感到我们应当研究“亚洲四小龙”的某些经济发展的做法。但是它们的内外发展环境和机缘却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可以获得的。譬如，它们都很“小”，有的只是一个都市；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碰到了美、日等国结构性的产业转移，于是趁隙建立起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型经济。而近年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类似的机会已经极少；何况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很难效颦，难道能把数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装配车间？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 100 多年来饱经忧患，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广的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改革寻求一条迅速现代化的道路，理所当然地受到全人类的关注。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中国的改革是迄今全部经济史上最伟大的试验。”我们正在探索一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崭新道路。中国经历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相当彻底的社会革命，已建立起独立的有一定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完成改革这一伟大的社会试验，其世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北京，第二次革命的动地炮声

1978 年 12 月 13 日，北京，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上，74 岁的革命家邓小平带着四川口音对一大批参加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高级干部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从 184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布《共产党宣言》算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过了 140 年的历程。1917 年，恰巧在《共产党宣言》发布 70 年的时候，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炮声宣告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成为掌握社会经济命运的主人。时间又过去了 70 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经济一度迅速增长之后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迟滞现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发挥。今年 4 月 5 日的《华盛顿邮报》写道：“西欧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苏联经济和政治模式存在的问题同欧洲选民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事有着明显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正在受到严峻考验。

摆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一个显明的标志，那就是能够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但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都程度不同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设想演变成了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根治了“财富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的资本主义痼疾，却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所设想的那种运行效率和发展方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郑洪庆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很值得研究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诞生，是因为它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狭窄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将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然而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这是历史的飞跃发展。但是，飞跃背后仍然有着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铁一般的逻辑：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成熟与完善，首先要解决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

然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左"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国际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顽症，它强迫实践迁就固定的观念和僵化的思想。所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必然要从冲破"左"的僵硬外壳开始。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6 岁的副研究员杨建文正在研究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史。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以来，苏联东欧相继进行了经济改革的尝试。如果说，1950 年南斯拉夫颁布的《工人自治法令》情况比较特殊的话，那么，1956 年被称为"华沙之春"的波兰经济学家聚会可算最早的公开的改革呼声。1956 年 6 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 10 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其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暴露了传统集权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促使波、匈两国率先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局部改革尝试。1962 年 9 月，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建议引起对于商品经济理论和计划、激励机制的大讨论。1965 年，苏联在国营企业中实行以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60 年代中后期，经济改革的浪潮几乎波及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

苏联东欧从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进行的改革尝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他们采取的"分权"和引进某些市场机制的做法，是对"左"的集权计划模式的先期冲击。但是，这些迁延 20 多年的改革在大多数国家时断时续，甚至出现过摇摆和倒退，改革远不是全面、深入和彻底的，而在总体上带有试探性质。

自从 1979 年邓小平揭开了中国全面经济改革的序幕，尤其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后，苏联东欧出现了新的改革热潮，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共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改革部署。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新纪元，那么，当今改革的势头只要坚持和发展下去，直至成功，就将为开创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新纪元铺平道路。那时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这样评说：改革是第二次十月革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理论工作者最近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匈、南的同行对中国同志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黄金时期'。因为，第一条，中国农村改革非常成功，中国经济增长的局面非常有利于改革；第二条，中国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有强有力的、认

识一致的领导班子；第三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国有着广泛希望改革的群众基础。我们对中国改革的成功充满希望。”

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改革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但同时也充满特殊的困难。

我们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苏联东欧相比，大约只是其 1/7 至 1/15。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象苏联东欧那样脱胎于初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于商品化、货币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极低的半自然经济社会。党中央准确地指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现阶段我们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1 岁的副研究员何家成认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不仅仅是解决“计划与市场”、“集中与分散”这样的一般任务，而且要建立商品经济赖以发育的前提和条件，以便使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样的特殊任务。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着解决发展问题和体制问题的双重任务。青年经济学博士曹远征指出：我们既要克服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运行僵硬、物资的体制性短缺等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又要克服封建残余、行政人员素质差、群众文化水准低、资金不足、人口膨胀、物资的发展性短缺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痼疾。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殊困难。

而中国改革的特殊意义也恰恰在这里。试想：如果贫穷落后的中国通过改革实现现代化，跻身先进国家的行列，岂不是比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初步工业化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成功，更能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么！

是民族复兴，还是被开除球籍

北京航空港海关，每天都要送走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有的去求学，寻求富国强民的知识；也有的去投亲，就此离开暂时还不富裕的故土……

1987 年 7 月，有三位年轻的“博士后”人才，辞去数万美元的年薪，从美国携眷归来了。

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史，但是，一部近代史，却录满了我们民族的屈辱和血泪。从上个世纪末起，外国学者谈论起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认为是无可奈何地衰落了。近几年，却有更多的学者在谈论华夏文明的复兴。中国的改革，给民族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国际竞赛的跑道上，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次赶超的机会。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伊藤博文和中国的严复同在英国留学，都怀着维新救国之志归去。伊藤回国后成为主持明治维新的首相；严复却在鼓吹维新后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日本利用了当时的机会成为列强之一，中国却失去机会从此堕入更深的灾难。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趁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有利时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拉美的一些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可惜，我们当时正陷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中。

让坐失良机的遗憾留给历史吧！那么，我们的面前还有没有新的机会呢？

陈琦伟副教授把他的得奖专著《国际竞争论》摆到我们面前。他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同于昔日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不同于本世纪前半期那种情况的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后、尤其是 60 年代以后第三世界作为一个重要政治和经济力量崛起，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机构的建立；另一方面，是七十七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经济组织的形成，推进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浪潮。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早已冲破国界，成为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自外。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更使得以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为特点的经济竞争空前激烈。一位国际经营专家感叹道：“刚才还是小孩，转眼已是老人，眼睛一眨，市场可能就没有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国际竞争的时代，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机会同时出现了。

世界经济专家陈伟恕、王新奎等认为，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一场激变，新的一轮贫富两极分化正在悄悄进行。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一个标志。国际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在谈论本世纪末可能发生一场特大的世界性经济动荡。尽管经济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这类预测仍值得重视。一旦大的动荡发生，就可能带来大的危机，也可能带来大的机会。如果赶在大动荡前长硬起飞的翅膀，就可能乘风而起；如果耽误了这已经不多的时机，就只能在各方转嫁危机的重压下更加贫弱。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无论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都不约而同地在进行体制或政策调整的深刻背景。

也许有人会想：如果我们沿着建国后 17 年的路走下去，只要不再折腾，不是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么？北京青年经济学会郑洪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国民经济发展以外延扩大、粗放经营为主要形式，传统体制还能显示出一定优越性。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体制的弊端，例如企业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单靠计划指挥生产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僵化的体制必然滋生官僚主义等等，即使在“文革”前的 17 年，就已暴露出来。尤其是 60 年代以后，新的技术革命的世界性潮流已对现代经济发生关键性促进作用，而在我们的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却缺乏不断吸收新技术的基本动力，致使我们在劳动生产率和某些新兴产业方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占有资源并不丰富，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其 1/3，人均可利用草原只占其 30%，人均森林蓄积量只占其 13%。以这样的资源条件，怎能长期支撑那种过分追求数量增长、投入多产出少的粗放发展经济模式？如果我们不另辟新路，及早转向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新的经济体制，我们的

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最近分别在上海、东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讨论会上传出信息：下一批经济起飞、进入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行列的，很可能是泰国、马来西亚……

中华睡醒的巨龙该惊起了！

60年代初，毛泽东就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实现现代化，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可惜，后来的政治运动走上了一条缘木求鱼的歧途。

今年9月12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时，重提“开除球籍”问题。他说：“再不改革，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历经了多少次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民族振兴之路——改革！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激昂旋律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历来有在紧急关头奋起的非凡凝聚力。

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央电视台·河殇(节选)

苏晓康、王鲁湘

【题解】《河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总撰稿人为记者苏晓康和学者王鲁湘,导演为夏骏。六集的标题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河殇》汇集了1980年代的各种思想热潮,特别是文化热的思想成果,播出之后在国内外引起热议,成为透视1980年代及新时期文化政治的范本之一。当然,现在人们已经能对《河殇》的偏颇以及极端化作出更理性更通达的判断了。

第一集 寻 梦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拉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宝洛,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道,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出漂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一百年前西方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

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情感呢?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仅仅只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联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他们匆匆离开祖国,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

竟。同时，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们，又纷纷回到祖国来看个究竟。这两股双向逆反的风潮又说明了什么呢？

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

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本世纪初，有个叫陈天华的中国青年，面对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在日本蹈海自杀。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刻的绝望，也许正是对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

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对中国古老文明命运的反思了！

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

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

那么，这条大河上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

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他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华夏文明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要去作烦琐的考古论证，只从一个在中国最常见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证。

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像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神崇拜的研究也热闹起来，这无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

据说，我们的祖先，从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两个头的巨蛇从大地吸水的壮丽景象。也有人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作。

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河民族的梦。

（演播室。学者谈龙神文化。）

蔡大成（神话学者）：龙啊，在原始人看来，它是原始人按特定的观念，有意识的组装成的，可以说是个组装件。按照什么特定观念呢？那么咱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龙的形象是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鸡的爪。蛇身体现了原始人的生命观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为蛇年岁大了，脱一层皮就年轻了。鸡爪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老太太上菜市场挑鸡，总先看看鸡距，如果短呢，就嫩。马齿也是这样："几岁牙口？"鹿角每年换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长一个叉，猎人一看鹿角有几个叉，就知道有多少岁。鹿角掉了，象征死，萌发象征生命，再生。因此，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着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

谢选骏（《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很奇怪的，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但是他们却以真龙天子自命，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

总而言之，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任性的一条大河。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分；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着。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捧上权力的峰巅；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着实地戏弄这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舞龙的场面）。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正像修建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来。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对水的渴求，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这种神秘的命运至今还徘徊在干旱的北中国。

（电影《老井》片断。械斗。孙旺泉跳井，井塌。）

发生在太行山这个老井村的故事，多么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悲剧性的命运。它的含义几乎可以象征性地涵盖整个民族历史。因此，它才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高度。作者郑义正是从黄河岸边获得这种启示的。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郑义（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骑着自行车从山西和内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到河南，跑完了整个晋陕峡谷，走了几十个镇子，几十个县，跑了有一万多里地。那次经历对我来说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从那次我对黄河有了第一次直接的接触后，我才理解了黄河为什么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跑的这一段，是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故都以及他们的出生地，后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都在这块地方演出了许许多多的活剧。那次经历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在一个小村子里头听到一个故事。原来有一个村子的农民是靠着黄河水边维生的。后来因为航运衰败，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耕地，他们没有生计了。国家把他们搬迁到别处，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过了几年后，这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地回到了黄河边上，又找到了过去的窑洞住下来了，我怎么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甚么样的心理？后来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索后，我感觉到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永远说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联系，血肉般的联系。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的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的多。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黄河孕育的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后人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着非常相似的“亚细亚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著那个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

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著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殒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寻梦）

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始终浸泡在无穷无尽的征服之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倾覆了，许多古老的民族相继从历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时，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在焚毁波斯王的壮丽宫殿了。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隐退到历史中去的一个迷梦，永远浑浑沌沌。忧伤的司芬克斯蹲在这里，仿佛甚么也不想解释。古埃及帝国，在长达数千年的三十个王朝中，也曾经强盛得犹如这金字塔一样无以伦比。但是，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它就沦于波斯人之手。在后来的数千年里，它那被征服的厄运直到近代才结束。

在更靠东方也更加肥沃富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老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人曾经说过，写印度的历史，一直写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个"海"字。然而，当欧洲的海盗出现在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在劫难逃了。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似乎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后来同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结合，产生了突破性的新文明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通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

也正因为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让中国人心理上的传统负担格外沉重。当黄河文明也像埃及和印度一样，终于衰落下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心灵就特别悲凉和痛苦。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终于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忽然又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呢？

在我们的民族感情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都能获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

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后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

据说，有一位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辆一辆地数长安街上的车流。当他数到第一百辆时，只数到三辆国产车，其余九十七辆都是进口的。

这件事，使人可以联想起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浓烟，也可以联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货的风潮。

然而，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不客气地嘲笑了我们。

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码事。

（张明敏身着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

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

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九龙壁，喷火的龙舟。龙盘大石柱。龙年邮票）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里。今天，确实是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我们也许不必计较人家要来漂我们的黄河。江河漂流无非是一项体育运动，用玩儿命的办法去同人家赌这口气，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现。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够找回体育运动的本来意义，该去漂漂他们的密西西比河，那是一种潇洒的娱乐。

我们也不必为输一场球，丢几个冠军而捶胸顿足。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是强国。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文明衰败的根源，不在于外部力量的打击，而在于内部机制的退化。汤因比说，外部敌人的最大作用，只能在一个社会自杀还没有断气的时候，给它最后一击。

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着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再伴随

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

它已经衰老了。

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龙的传人啊，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的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槽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第六集　蔚　蓝　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着整个宇宙，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生命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护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陆地时，反而不适应了。在强迫自己适应大陆环境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文明。复活节岛上的这些谜一样的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又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的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又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朦胧声音。

后来，周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食粮，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无论是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败的命运。

太平洋那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刻就无影无踪了。

当内陆文明在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

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着雅典的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靠着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伽利略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的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什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著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能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所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为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变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驱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在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了，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现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出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它面向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纵使它有千年的珍奇，今天也是难免玉石俱焚了。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朦胧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着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告，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

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必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论政治问题，我很谨慎”；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缺乏政治参与的安全感。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政治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

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也是他们！

（演播室。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又缺乏这种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生活。所以说我在《沉重的主体》一书结尾，用了三句话：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

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底，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止，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说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呢？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解放日报·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1]

皇甫平

【题解】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一些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发生怀疑，姓“社”姓“资”问题一时成为理论争论的焦点。针对这种情况，1991年《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包括《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等，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文章实际上传达和透露了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时发表的有关讲话精神，被视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的先声。“皇甫平”其实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核心人物为《解放日报》社长周瑞金，而支持者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今年上海市春节团拜会上，向我们提出了浦东开发要搞得更好、更快、更大胆的要求；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朱镕基同志在团拜会上也强调：要更高地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更快、更好、更高、更大胆，就是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宏伟事业中，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

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已经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而又实实在在的新思路。

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了要突出“机制转换”的改革新思路。他认为，八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的第一轮改革偏重于放权让利和物质刺激，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九十年代新一轮深层次的改革则应把重点转到经济机制的转换上来，形成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机制、淘汰机制和高效率的宏观调控机制。否则，什么破产法、分税制、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统统都无从谈起。

又如，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提出了“三个先行”的扩大开放新思路。

[1] 《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

他强调，浦东开发并不是前10年崛起的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发区开发模式的翻版，它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围绕局部再造城市功能，着重抓好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推动资金融通，商品流通，城市交通的超前发展。有外电评论：这些做法将"使浦东开发一下子站到按现代化国际经济规律运作的高起点上"。在七中全会闭幕后紧接着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更是就上海90年代经济振兴提出了不少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会强调要敢于冒一点风险，大胆利用外资进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要紧紧环绕适应对外开放，提高城市综合功能的需要，调整改造传统工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把上海建成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等。

这些新思路，有的是前十年未曾涉及过的新领域，有的则反映了改革由浅层次向深层次的转换和拓展，有的则是对前一轮改革中某些已见成效的发展模式的升华。新思路的不断提出，反映了人们对更深层次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思考。同前10年相比，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大大拓展和深化。以搞活经济而言，如果说，前10年我们较多的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等等；那么九十年代的改革则要把重点放到搞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脊梁的大中型国营企业上，要打好这场难度更大、覆盖面更广、意义更为深远的"攻坚战"，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简单地套用八十年代改革中的某些做法也不行。七中全会号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敢于冒风险，就是鼓励我们要勇于创新、敢于开拓，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某些做法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毫无疑问，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阶段涌现出来的种种新思路，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是对七中全会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基本经验的实践、发展、丰富和完善。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

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邓小平同志说过："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让我们以此作为座右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漫长征途上，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解放思想，永远开拓奋进！

中国青年报·我要上学

解海龙

【题解】这是《中国青年报》著名摄影记者解海龙的代表作，1991年拍摄于安徽省金寨县张湾小学。由于这幅照片，从此"大眼睛"苏明娟便成为希望工程的象征，从而深刻影响并推动了当代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



深圳特区报·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1]

陈锡添

【题解】1992 年初，88 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即所谓“南巡讲话”。当时，《深圳特区报》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报道了邓小平的此次南巡，在全国引起震动。“南巡讲话”为十四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92 年 10 月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国春早。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

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各族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到深圳来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小平同志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一）

1 月 19 日上午 8 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

来了！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钟正指 9 时整，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邓小平同志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

[1] 《深圳特区报》，1992 年 3 月 26 日。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同志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

握手时，谢非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

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邓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并向他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

但是，小平同志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1979年4月，他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次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它的发展情况，小平同志当然十分关注。1984年1月，小平同志曾到深圳视察过。一晃，8年过去了。深圳的面貌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人家急不可待要亲自目睹一番。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

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小平同志和谢非等同志在迎宾馆内散步。

散步时，邓楠向小平同志提起他在1984年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同志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1984年，特区建设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办特区持怀疑观望态度。是年1月24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同王震、杨尚昆同志在中顾委委员刘田夫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到深圳视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给了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人们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散步后，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小平同志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小平同志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小平同志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小平同志笑了起来。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 20 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车子不知不觉到了皇岗口岸。皇岗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欢迎小平同志的到来。

小平同志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然后察看皇岗口岸的情况。

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皇岗口岸是 1987 年初筹建，1989 年 12 月 29 日开通的。占地一平方公里，有 180 条通道，最高流量可达 5 万辆次和 5 万人次，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最近每天约通过 7000 辆车次和 2000 人次。小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不断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二）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

1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5 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并齐喊“邓爷爷好！”小平同志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 53 层的旋转餐厅，小平同志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坐下来后，他先看一张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接着，李灏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的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李灏说，深圳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4 年，人均收入为 600 元，现在是 2000 元。改革开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且充满信心……

听了汇报后，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小平同志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小平同志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三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

小平同志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小平同志精神健旺，谈兴甚浓。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谈话约谈了三十多分钟，使在场的人深受教育和鼓舞。

当小平同志离开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秩序井然。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小平同志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反映了群众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

小平同志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整个场面十分热烈，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三）

离开国贸大厦后，小平同志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

先科激光公司，是一间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我国目前

唯一的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江泽民、李鹏、王震、田纪云、刘华清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曾先后到过这里视察。

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

有人介绍说，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小平同志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华明伸出四只手指回答说。

"呵，我们快 40 年没见面了。"小平同志深情地说。

"是的，我那时是小孩，现在 50 多岁了。"

"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小平同志对革命家的后代十分关心。

叶华明说："在海南岛。"

原来，叶挺将军于 1946 年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后，叶华明于当年 5 月离开延安直到 1953 年，叶正光于 1952 年到 1960 年，都是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里。小平同志同聂帅常有往来，所以那时见过他们兄弟俩。

在公司贵宾厅，小平同志听取了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先科激光公司于去年 10 月 12 日正式投产，使我国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能够生产激光视、唱盘的国家。该公司可年产激光唱片 500 万张，视盘 150 万张，激光视、唱盘放送机各 5 万台。

邓楠拿起一块闪光铿亮的激光视盘给小平同志观看。这种恍如镜子般的盘片，能储存 10.8 万帧色彩逼真的清晰图像，可长久保存，永不磨损。小平同志听了，十分感兴趣，问："是什么材料？"公司的同志答："塑料上面镀一层银。"

他又兴味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当他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身旁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今年 88 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 1904 年生的。我是 8 月出生，她比我约大半岁。"

小平同志出生于 1904 年 8 月 22 日，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小平同志接着说："邓颖超同志是河南人。"他女儿邓楠说："不，她是广西人。"小平同志纠正说："她的原籍是河南。广西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平同志对邓大姐十分熟悉。

接着，公司一位四川籍的业余歌手赵敏，为小平同志演唱了一首卡拉 OK《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平同志对他这位老乡的歌喉及音响效果十分赞赏。听完后带头鼓掌。一边起身，一边说："很好，我听得很清楚，不走调，音响效果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经过 30 米长的过道，许多职工在过道侧热烈鼓掌欢迎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问："这些职工多大年纪？"

叶华明答："大多数是 25 岁到 30 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在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小

平同志问："版权怎么解决？"

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

小平同志对此表示满意："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小平同志边走边问，对公司的情况问得很仔细，他还问及原材料是否进口？我国目前能否生产？产品质量怎样保证等等，公司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

当小平同志看到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刚生产出来的激光视盘时，便停下来问："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女工们回答："汕头人。"小平同志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广东人"，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临离开车间前，小平同志问到公司今年的生产目标。叶华明说："今年要生产50万张激光视盘，250部激光视盘电影，国产片和外国片一样多，其中还有科教片和一部分卡拉OK。总产值可达3亿多元，利润8000万元。"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很好，希望你们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小平同志到先科激光公司参观，给了该公司的职工以极大的鼓舞。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对记者说："我是一直在党内老同志关怀抚养下成长的，见到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健康，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决心在深圳第二个十年建设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

（四）

1月21日，是华侨城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小平同志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

上午9时50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民俗文化村顿时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小平同志的到来。

在广场西侧，小平同志登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所到之处，各少数民族的演员都在尽情地跳舞欢歌，敲鼓击乐，充满欢乐祥和的气氛。小平同志一行在这里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而那别具一格的徽州石牌坊群，富有民族特色的贵州鼓楼、风雨桥，云南藤桥，金碧辉煌的西藏喇嘛寺等，又把小平同志一行带进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长河中。

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小平同志致意。小平同志亦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小平同志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

蹈。这时，小平同志的小孙子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小平同志的面颊，小平同志十分开心。

小平同志接着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小平同志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

在"布达拉宫"前，小平同志分别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在驱车回迎宾馆途中，小平同志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当深圳市长郑良玉汇报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时，小平同志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小平同志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五）

1 月 22 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今天，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上午 9 时 45 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随同来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榕和小孙子。随后，邓朴方同志也来了。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接着步入展览厅，观看仙湖植物园模型。小平同志听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介绍后，高兴地说："植物园大有可为。"

杨尚昆主席是 1 月 21 日到深圳视察的。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啰。"小平同志深情地说。

"我们是 1932 年认识的。"杨主席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2，六十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邓伯伯，新年好！"

邓榕说："他是全国摄影协会副主席呀！"

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啰!”全场大笑起来。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一同步入室内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

他们首先观看据说距今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椤。

小平同志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划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覃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7500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境内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小平同志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小平同志说的那棵很大的水杉,是1946年薛纪茹先生发现的,他采集了标本。1948年,由胡先骕、郑万钧先生定名为水杉,公开发表,轰动了当时国际植物界。人们称此树种为活化石。这棵树胸径2.4米,高35米,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利川县谋道这个地方。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

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小平同志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

小平同志指着“光棍树”问:“为什么叫光棍树?”植物园负责人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小平同志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妃子逃难到九嶷山,哭得很伤心,一滴滴泪水滴在竹子上,就成为现在的湘妃竹。

小平同志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植物园负责人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小平同志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观赏植物区里笑语声喧。

小平同志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植物园负责人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植物园的同志说,这种竹芋的叶子,摸上去像绒布。小平同志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杨主席随手捡起一片叶子,风趣地说:“带着留个纪念。”

杨主席也在以极大的兴趣,观赏着各种奇花异草。他观看猪笼草、鸟巢蕨时,鸟巢蕨那活像鸟巢的模样令他十分开心。他问这植物开不开花?靠什么繁殖?植物园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

这里有一种兰花,很奇特,叫“跳舞兰”。植物园负责人指着一朵兰花给小平同志介绍:“这兰花样子像个姑娘。这是头、身子、裙、腿。它在跳的士科哩。”小平同志笑着说:“是,很像个姑娘在跳舞。”

从观赏植物区出来,小平同志和杨主席等人向大草坪走去。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中,满眼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小平同志感到心旷神怡。他高兴地同家人在这里合影留念。

这里，绿色主宰了大自然的风光，使人流连忘返。小平同志说："这里的环境真优美。"杨主席赞叹道："真是天上人间，世外桃源。"

10 时 10 分，小平同志和杨主席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种下一棵长青树——高山榕。小平同志和杨主席挥锹培土。接着，小平同志的家人也拿起铁锹，使劲地将土铲到树根上。邓朴方在旁人的帮助下，也培了几锹土。然后，小平同志和小孙子一齐端起个红色的小水桶浇水。

杨主席同小平同志一家栽好树后，又领着自己一家在不远处种下另一棵高山榕。杨主席和家人一道培土、浇水，动作非常敏捷。

高山榕是一种亚热带植物，桑科榕属，是广东省的代表树种之一。生长快，树冠大，四季长青。

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在这里种下长青树，给深圳增添了无边春色，也将为子孙后代造福遮阴。深圳人民一定会记住这个日子，记住他们为建立新中国、为改革开放所作的卓越贡献，记住他们对深圳特区的关怀和支持，记住他们那长久而深厚的情谊。

种完树后，小平同志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乐也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小平同志精神奕奕地迈着步，表现出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摄影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拍下这令人高兴的镜头。

（六）

1 月 22 日下午 3 时 10 分，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同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合影。合影时，坐在前排的有：小平同志、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市委副书记厉有为。

合影后，人们都围拢过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小平同志亲切地和大家交谈。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向他问好，并邀请他 1997 年访问香港。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

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中将向小平同志敬礼、问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向小平同志介绍说："朱敦法同志在淮海战役中是个连长。"小平同志笑笑说："那时还是个娃子哩。"在淮海战役那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中，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今天，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

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小平同志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小平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还谈到了：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等等。

（七）

时间过得真快，小平同志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 月 23 日，小平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

上午 8 时 30 分，深圳市负责人以及警卫、服务人员，在市迎宾馆热烈欢送小平同志。人们都依依不舍，多么希望小平同志能在深圳多住几天啊。

小平同志和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

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有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

车子在宽阔的笋岗路向蛇口驶去。在车上，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向小平同志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关税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执法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三个郊区，等等。

小平同志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小平同志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谈着谈着，车子到了蛇口。李灏说，南山区管蛇口这一片，南山区发展势头非常好，南山的荔枝很有名。全世界荔枝最好是中国，中国荔枝最好是广东，广东荔枝最好是东莞、增城、深圳等地方。

这时，邓榕插话："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车子里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原来，小平同志平时在家里，常对孩子们夸耀四川的柚子最好。孩子们都不同意，认为沙田柚子最好。

笑声过后，小平同志说，四川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

邓榕说："说沙田柚子好的人多，说四川柚子好的人少。"

车子在蛇口一个地方停了几秒钟，邓榕指着远处"海上世界"对小平同志说："这是海上世界，是您给题的名。"

车子接着到赤湾港，缓慢地行驶。小平同志坐在车上察看赤湾港码头。

李灏介绍说，赤湾港在蛇口里面，可停 3.5 万吨的船，准备建成停 5 万吨船的码头。妈湾港在蛇口外面，可停 5 万吨的。深圳东部、西部都有港口，去年吞吐量达 1400 万吨，将来要达到上亿吨。

车子到达蛇口港码头。下车前，李灏对小平同志说："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我们希望您不久再来，明年冬天来这儿过春节。"

小平同志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

然后，小平同志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

小平同志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小平同志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小平同志心头的一件大事。

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上午 9 时 40 分，小平同志乘坐的轮船离开蛇口港。

1992 年 1 月 19 日到 23 日，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这段日子，是极不寻常的日子，它将永远记载在深圳建设的史册上，永远记忆在深圳人民的心坎里。

"东方风来满眼春"。小平同志来到深圳，使深圳进一步涌起改革开放的春潮。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深圳人民一定沿着您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拜金主义要不得

胡占凡

【题解】这篇评论获得第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者胡占凡现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1990年代初,针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的一些不良现象,作者接连发表《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讨论,对社会风气产生积极影响。

在我们步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这样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还是要讲艰苦奋斗,讲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拜金主义、奢侈挥霍之风要不得。改革开放使人们手里的钱多了,这是好事,可钱怎么花却大有学问。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来说,从国民经济大局来看,"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依然是最动听的旋律,可偏偏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于是人们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2000多元而面不改色;

在长春,一家卡拉OK厅,一个富翁宣布:包下当晚所有的"点歌费",另一位大亨立即声明:买下全市当天所有的鲜花:(?原文如此)你不让我点歌,你也别想献花。

春节时,一个青年富豪仰望着纷纷落下的爆竹纸屑兴奋地流下热泪,因为他刚刚点燃的4个爆竹是用2000元人民币卷成的。

一位北京"大款"用两万元一桌的宴席招待广东"大款"竟遭到奚落,随后广东"大款"用6万元一桌回请,而北京这位"大款"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35万元说:今天这桌就照这个数!

至于某人身上的穿戴价值几十万,某人甩出两万元点一支卡拉OK,30万元一只的哈巴狗"大款"们眼都不眨地牵上就走这类事,也时有所闻。

或许这般挥金如土的人并不多,但这类事所投下的阴影却在平民百姓中日益蔓延:豪华饭店吃不尽的高档宴席;婚丧嫁娶不完的人流车队;160元一张的"粉色情人节"入场券一抢而光,10万元一件的进口大衣买者如云;100元一个的钥匙链卖得很火;18元一碗的日本面条餐馆竟高朋满座。可以说,拜金主义正越来越大胆地牵动人们的衣襟。在许多人

那里，斗富、显阔，纵欲被称为“潇洒人生”、“过把瘾就死”；大款、大亨、大腕被当作崇拜的偶像；金钱、别墅、宠物被看成辉煌人生的象征。

这种种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怎么花钱的问题，它鲜明地反映出一些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这种奢靡之风正在污染着社会环境，污染着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艰苦奋斗、克勤克俭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值得骄傲的美德。从“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到周总理衬衫上的补丁，我们民族的文明史上一直闪烁着这种崇高节操的光彩。如今发展市场经济，我们依然必须清醒，人际关系决不只是金钱交换，等价交换的原则决不能移植到思想道德领域。物质与文明，永远是人类文明进步这架天平的两端，失去哪一端，社会都会出现倾斜。金钱我们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我们更要追求，艰苦的年代如此，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同样如此。如果让金钱的光环遮住了比它更美好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将是残缺的，人格将是病态的。

还应该看到，奢靡之风给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带来的劣性刺激和心理影响是严重的。不少人比吃比穿比享受，就是不比工作、不比创造、不比贡献。东北的一位大学生说：过去觉得上大学光荣，现在，落榜的同学成了大款，作为大学生我很自卑。北京一位教师则急切地呼唤人们听一听中学生在唱什么：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这位教师实际上是在呼唤人们：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警惕奢靡之风吹落了我们未来的精神风帆！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灯红酒绿的宴席移到农舍窑洞，警惕拜金主义的话题会变得更加沉重。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个十一亿人的大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现在还远非黄金铺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榜上，我们的座次远远排在第96位，光是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就有两千七百万农民仍在为温饱发愁，河北一个失学的孩子，天天在家扎扫帚，想凑够不过四五十元的学费；对比这些，那种千金散尽，挥霍无度的“潇洒”该有多么不协调。再进一步说，在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解决这些困难的时候，大款、大亨、大腕们如果能从酒店歌厅转过身来，看看失学孩子求助的目光，看看农民们的满面尘土，把财富的支配与为国分忧、为民造福联系起来，向他们伸出手去，这才叫真正的潇洒和幸福。令人高兴的是，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或正在这样做。

“艰苦奋斗”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在我们奔小康、奔四化的路上，让这面旗帜高高地飘扬！

经济日报 · 开封何时能“开封”[1]

詹国枢、庹震、刘海法

【题解】 本文是一篇别具一格而影响广泛的通讯，是一组系列报道的第一篇。报道以小见大，既解剖了一个典型个案，又揭示了一些普遍事理。詹国枢曾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后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1994 年获得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庹震现任《经济日报》总编辑，2002 年获得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

寄语“落伍者”

昔日排头兵，今朝落伍者。开封市的处境，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落伍怎么办？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或是捂捂盖盖，遮遮掩掩，还是像开封市那样，勇于承认落后，敢于正视现实，不甘落后，奋起直追？

应取的态度，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改革是场拉力赛，竞争必有落伍者。开封的“落伍”及其正视现实、不甘落后的决心，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尤其是在地处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在那些正为差距愈拉愈大而苦恼的省、区、市和地县乡。

“落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已经“落伍”，却还不愿也不敢正视自己的“落伍”。开封市委、市政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敢于自亮其丑，自揭其短。他们不但在 430 万开封人民面前公开承认并宣讲本市的落后及与兄弟地市愈拉愈大的差距，而且反复动员全市人民一起追根究底，寻找根源。正视落后，便有希望。全国其他一些已经落伍的城市和地区，是否也能像开封那样，痛下正视现实、承认落伍的勇气和决心呢？

正视落后，还要进一步找准落后的症结所在。开封市委、市政府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在追根寻源中，既冷静分析了历史的、客观的原因，更着重剖析了现实的、主观的原因，尤其是人的思想观念上封闭落后的原因。提领而顿，百毛皆顺。找准症结，开方下药也就不难了。全国其他一些已经落伍的城市和地区，是否也能像开封那样，多从主观找原因，进而从思想观念上大胆“开封”，破釜沉舟，大干一场呢？

[1] 《经济日报》，1994 年 2 月 28 日。

今年是我国改革进入第十六个年头的一年，十五个春夏秋冬，十五载奋斗不息，省与省的差距、市与市的差距、县与县的差距，都将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差距缩小，而不是相反。寄语全国各地“落伍者”，莫气馁，别自弃，勇于“开封’，善于“开封”，前一赛段落后了，下一赛段追上去，后来居上，再造辉煌！

《开封何时能“开封”》的报道，本报还将继续下去，且容我们慢慢评说。

开封落后了。

人称“郑汴洛”，曾以“豫老二”自居的开封市，在全省 17 个地市中的位次，连连下滑，1992 年再次落入低谷。

经济增长速度——全省倒数第一。

国民生产总值——全省倒数第四。

人均生产总值——全省倒数第六……

统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过去查开封，从上往下看好找；如今找开封，从后往前数好查。

1992 年如此，1993 年如何呢？这一年，河南省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5．2％，开封市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 5．2 个百分点；河南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 21％，开封呢，一半不到，只增长 10．2％！

说到企业效益，更让人惭愧。1993 年，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盈利 9388 万元，比上年增长 28％，亏损企业却亏损 5064 万元，比上年上升 148％！

落后就要被动，落后就得受穷。由于经济没搞上去，市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囊中羞涩。财政局的同志红着脸不断往省厅跑，跑慢了，全市干部的工资就有可能发不出；教育局的同志屡屡为拖欠教师工资而坐卧不安；劳动部门则为职工年均工资比郑州、洛阳低 800 多元而摇头叹息……

口袋里没钱，城市也受委屈。开封的破烂陈旧，在河南各地市“名列前茅”。有人戏称，几十年前的“老开封”回乡探亲，不用问道儿绝不会找错，连厕所都是老样子；有人调侃，开封人上下班是“挤电影院”，“坐车没有骑车快，骑车没有走路快”。为错开拥挤高峰，人们想出了不是办法的办法：学生 7 点半上课，工人 8 点开工，机关干部呢，请稍等等，8 点半上班……

开封落后了，原因是什么？

开封市民在思考，开封领导在思考。记者到开封采访调查，也在苦苦寻求答案。

——有人说，开封落后，主要是前些年地市合并，5 个富县划走了，5 个穷县留下来，“一个讨饭娘，领着 5 个要饭孩”，哪能不穷？

——有人说，开封落后，主要是国家投入太少，多年没有大的基建项目，经济怎么可能搞上去？

——还有人说，开封落后，关键是领导班子换得太勤。从 1983 年以来，10 年换过 5 任

市长、5 任书记，板凳还没坐热就走了。

——也有人说，开封落后，主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会儿以农业为主，一会儿以旅游为龙头，一会儿又要全力以赴抓流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经济岂能持续稳定发展？

……

原因摆了一条条，症结找了一个个。在与开封市领导、企业厂长经理和干部群众的座谈中，记者强烈感到，人们在不甘落后、苦觅对策中，愈来愈把焦点集中到了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上。

市委书记王日新说，“这理由，那理由，都是开封落后的理由。但关键的关键还是开封在思想观念上太封闭落后。不解放思想，打开封闭，开封就不可能摆脱被动，抑制滑坡。”

市长马连兴的话，说得更干脆：“开封人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开封市经济发展的速度。”

开封“三大件”的兴衰经历，为书记、市长的剖析作出了生动注脚。

电视机。早在 20 年前，开封无线电一厂就生产出了“河南第一台黑白电视”，此后又率先生产出了彩电。可是由于求稳怕风险，小富即安，满足于手工作坊式的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成本迟迟降不下来，竞争也就处于劣势。如今，企业固定资产仅 1400 万元，累计亏损欠款已达 9800 万元！

电冰箱。曾是“河南第一家”、“全国第 10 家”，只因为阴错阳差没被“定上点”，只好小手小脚犹犹豫豫干。眼看着别人的冰箱频频进入寻常百姓家，眼看着一些冰箱厂成了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只能用“1993 年实现利润 55 万元”的成绩聊以自慰。

洗衣机。上马时也是“全省第一”，上自动洗衣机时还夺了个“全国第二”，可惜好景不长，没两年就因严重亏损而下马，如今已是风流云散，又成“一张白纸”……

说到开封的封闭落后，自满自足，人们回忆起当初要搞股份制又怕说成是“资本主义”，想发展非国有经济却又怕是搞“私有化”，以致至今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都很弱；人们一面为每天的上下班拥挤而骂娘，骂完又心安理得悠悠闲闲回到自己照样拥挤的小窝；人们最爱向外人夸耀的是“北宋的辉煌”，“汴京的繁华”，动辄就说当年咱是“七朝古都”，如何如何……

说到开封的封闭落后，自满自足，人们吃惊地意识到，精华与糟粕，常常只有一步之隔。辉煌的历史很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古老的文明也许正因其古老而像巨石压住了新生嫩芽。

刚上任的常务副市长梁绪兴一到开封，便对这座四面被古墙包围、长宽不足 4 公里的老城中竟拥拥挤挤住着几十万人而不胜感慨：“城里挤得气儿也透不过来，又破又旧；城外呢，没多远便是新区的高楼大马路，不少人却不愿去住，实在不可思议。”这位中年副市长忙碌一天后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叫司机把车开出城去，在宽马路上跑一圈。“要不然，心里憋

得真难受。”

开封人已经意识到落后。

开封人不甘于继续落后！

就在记者前往开封采访前些天，开封召开了动员全市430万人民“破釜沉舟，大干五年，深化改革，实现翻番”的三级干部会。市委书记王日新坦率中肯的报告，使与会干部激情难捺。这位1992年从许昌调来的书记，一反作报告总是先讲成绩后讲问题的惯例，一上台，开门见山讲问题。他历数开封位次排列情况，寻找经济落后差距，剖析思想观念根源。面对上千听众，刚过50却已两鬓斑白的王日新慷慨陈辞：

“开封已到了拼命干的时候了！痛下破釜沉舟加快发展的决心，是不容退却的历史选择。如果不奋力拼搏，加速发展，不仅保不住应有的位置，人民生活不能得到提高，就是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大问题，我们就会愧对党的重托，愧对创造开封辉煌的先辈，愧对开封430万父老乡亲，也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

宽大的礼堂里，黑压压坐满听众，连门外和后台也挤着人。他们是开封430万人民的带头人。他们一个个神态专注，表情严肃，心里像坠着铅块，沉甸甸的。

开封何时能“开封”？

开封430万人在思考，在企盼。

冰点：北京最后的粪桶[1]

王伟群

【题解】1995年1月创办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一问世即以其独特的风格、引人的故事和出色的文字而为人青睐，在当代新闻界占据一席显著位置。这个每周一期的栏目和一篇约八千字的整版报道，曾经将新闻触角伸到许多不起眼的社会生活领域，即与热点相对的所谓"冰点"，而"冰点"的不少深度报道也曾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包括以"冰点"报道改编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取材于第30期《乔安山的故事》。这篇"粪桶"报道是"冰点"的开篇作和成名作，受到广泛好评。

这是北京仅存的几名背粪工人。他们是老知青，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在靓女如云的橱窗里，在豪华亮丽的大饭店玻璃墙上，极不相称地反射着他们的影子。

跟着他们出车

早晨6时30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时15分出门，天气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八度。

东直门外斜街，沿东北方向往前，不多会儿就到了环卫局的清洁队。进大门，院里的地面结了一层冰。清洁车喷着热水，整装待发。进门找背班，门口的人往后努努嘴，见一门挂企管组的牌子，进屋自我介绍完即有人伸过手来，说是背班班长，姓樊。他四十多岁的样子，穿一件破大衣，劳动布面的，像是有一段历史了。

樊问我："先跟我们领导谈谈吗？"

"不，先跟你们出车。"

上车，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剩下五六人爬上车，斜倚在后面的车罐上，旁边放了四个粪桶。

[1] 《中国青年报》，1995年1月6日。

第一站在东四南大街的少儿出版社宿舍，这条大街是北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再往南，被称为“银街”。

清洁车停在街沿上，边上停着几辆奥迪、蓝鸟、桑塔纳什么的，闪着缎子般的光。几个人从车上卸下粪桶，那粪桶上宽下窄，差不多有一米高，木桶四周用铁片箍得紧紧的，瓷瓷实实。谁也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诧异的目光，他们一人背一桶穿过窄道进楼群里去了。

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是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捅半天，把硬块捣碎，然后用粪杓把它们舀到粪桶里，背桶的人下蹲，把背带背上肩，右脚一使劲站起来，桶就上肩了。粪杓有点长，难免把粪泼到桶的外面，他们的衣服头发上就都溅上一些黄的黑的污点，鞋子上就更免不了。他们穿着一种已经不多见的大头棉鞋。樊说，就这还是争取了半天才争取到的，我们的工作服一年就一身。我问为什么没有口罩，他说原来有，后来就不发了，不戴口罩还喘粗气，戴上就别呼吸了。

每个人背了十几桶后，第一车装满了，司机马师傅去卸粪。樊班长就带我到附近的大杂院看看那里的公共厕所。每进一个院就跟走迷宫似的，绕过各种煤堆、板房，到了院子尽头，对着一个铁皮钉上的破门，樊大喊一声：“里面有人吗？”没人答应，他就径直推开门，让我进去瞧瞧。

我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要屏住呼吸。但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地面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坑，坑里的粪便快溢出来了，没有下水道，坑外一滩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四周是一个到处透风的简易房。樊班长和他的背班每星期必须来清扫一次，否则那院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简直没法过日子。那天，我走了五六个院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是这样的厕所。

我们回到少儿出版社的宿舍院的时候，那里的活已经干完了，清洁车拉着我们又到了东四十字路口东边的一个大杂院，车进不去，停在大街边上。

院里厕所的粪池堵了，樊班长说，要是堵得严重就得下去了。我瞅着黄乎乎的粪便，臭味刺鼻，不敢想“下去”是怎么回事，胃里一阵难受。

见我们进院，居民赶紧招呼孩子回家，关紧了门。

一桶粪约 110 斤，每天每人需要背数十桶。而且这些年要干的活越来越多了。就说刚才去过的少儿出版社宿舍，原来清洁车完全可以径直开进去，后来那条通道成了存车场。还有的通道上盖个铁皮房卖百货，他们就得多背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他们一桶桶往外背，我也跟着一趟趟来回走，见他们把桶卡在一个圆环里，然后摇动手柄，桶就被抬高，等抬到一定高度，一摇把，桶向前倾斜，哗——一桶粪倒进车里了。一位师傅说，站远点，当心溅你一身。

——能溅出来吗？

——当然，我经常被浇得满头满脸。

我往后挪了挪，回头忽然发现，我们的车正停在一家豪华美容厅边上，橱窗里美人头

像，潇洒飘逸。价格表上面写着：皮肤护理 200 元，纹眉 140 元，纹眼线 160 元。

——“樊师傅，背一车粪你们能拿多少钱？”

——“没钱，我们每月开支，多少车都拿一样的钱，现在比过去强点，全加起来差不多能有五六百。要是下粪池可以提成 15%。150 块钱的 15% 是多少？哥儿几个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六百块钱？这甚至不够大款们一顿普通的饭费。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干这样的工作？

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我记住了这三人的名字。他们说一口道地的北京土话，经常把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吃”掉，可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进出北京的大饭店，谁也不认为他们是北京人。就连外地进京打工的农民，也经常斜着眼睛瞧他们，见他们过来，赶紧让开，生怕蹭着自己。而这三个名字打从他们诞生，就记在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直到 26 年前。

当年曾居北大荒

26 年前，8 月的北京，上山下乡的热潮远比秋老虎更热。17 岁的樊宝发和哥哥拎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挤进了北京站月台。同行的人中，大概没有比他们更少的行李了。母亲望着儿子，一阵心酸。家里孩子多，实在没能力给去北大荒的儿子们准备棉衣，听人说北大荒冬天零下四十度，儿子要受委屈了。哥俩安慰母亲：我们是去兵团，部队会想着的。

火车徐徐开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殷健康、蔡三中也先后离开了故乡。

还回来吗？他们盯着缓缓驶过的东便门城楼子，突然心里一阵茫然。

10 月，北大荒下了第一场雪。好大的雪啊，漫山遍野，一片白茫茫，每年打着雪仗过冬的樊宝发看呆了，这就是北大荒。30 连的 6000 多亩大豆被大雪盖住了，天还没亮，樊宝发拿着镰刀下地干活，曾是神气活现的康拜因被冷落在一边。为了自觉磨练意志，颗粒归仓，兵团提出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到了中午，雪开始化了，一脚踩下去，冰碴雪水顺着鞋帮进到鞋里去了。不一会儿，两脚就失去了知觉。

北大荒的地一垄有两千米，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樊宝发一天割六垄，四五亩地，晚上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

26 年后，殷健康坐在北京东城一条小胡同自家窄小的房里，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幕，眼睛凝视着远方说：“我们那时候是小镰刀胜过大机器，人手一把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晃就这么过了 9 年。这 9 年中，他们当了班长或者排长，成了五好战士，年年有各种证书寄回家。9 年，光滑的下巴上长出了胡须，他们分别娶了当地的姑娘，生下了北大荒的儿女。

然而，1978 年，知识青年大返城开始了。

领导找樊宝发，塞给他一张表，说，把表填了，“婚否”那一栏写未婚，回头我们给开个证明，你就能走了。媳妇不相信他会走，每天下地喂鸡，什么也不耽误。“咱是爷们，不能把媳妇搁那儿。”正赶上妻子要临产，偏又是难产，连里的、团里的卫生员走光了，樊宝发急得火烧眉毛，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战友们走了，兵团没了，他真的成了北大荒人。

他一如既往地干着战友们留下来的农活，每天三四点下地，天黑收工。在一望无际的北大荒里，红旗没有了，歌声没有了，樊宝发格外怀念红红火火的兵团生活。兵团改为农场，他成了康拜因手。16 年后冬天的一个下午，在他北京的家中，樊宝发从床底下翻出一个用旧了的小箱子，从箱底抖落出一堆荣誉证书，他在中间翻了老半天，一边翻一边念叨：“我的三等功证书哪儿去了？在东北我年年（先进）”。

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因为年代久了，这个原本质地粗陋的立功证书显得有些破旧，打开它我发现里面用钢笔写的字也已经模糊了。我的录音机正开着，于是我对着录音机磕磕绊绊地念了起来：“4 号康拜因手樊宝发工作积极肯干，能吃苦，起早贪黑，对车的使用比较熟练，对车的……”我卡壳了。“对车的保养检查精心，麦收排除故障，遇到一些较大的故障，为了不影响第二天麦收，连夜修复。”樊毫不犹豫地接了下去。我惊讶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披着一件老棉袄，站着离我二尺远，脸上闪着光。

他心底珍藏着这昔日的光荣。

1978 年，那个难忘的冬天，殷健康为战友们送行，望着那些急匆匆的身影，他对自己说：“赶明儿，等孩子大点，带他们回北京瞧上一眼，这心愿就了了。”

那是 1985 年，洪水席卷了北大荒，农场成了一片汪洋，殷健康承包的 135 亩田里几乎颗粒无收。干了一年，临过年了，手里总得有点买肉的钱吧。殷健康进了深山老林替人扛木头。整整一个冬天，白毛风刮了一场又一场，他想着家里的妻子和女儿，咬牙挺着。三个月过去了，总算熬到了结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包工头跑了，三个月的辛苦全部被风刮走。殷健康流着泪走上了回家的路，在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兜里没有一分钱，回去怎么见妻子女儿？已经是年三十的晚上，远远地看见农场的灯光，家家户户挂起了灯笼，孩子们在场上点燃了爆竹，饺子也准备下锅了吧？殷健康恨自己无能，过年了，不能让孩子吃一口肉馅的饺子。一推门，他愣住了，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饺子正准备下锅，桌上还摆着肉。妻子女儿争相告诉他，北京来人了，来慰问老知青，给了 200 块钱……殷健康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北京没有忘记我！我还是北京人！”

在这片莽莽荒原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压力或特殊的机遇，他们将永远是北大荒人，他们的儿子女儿将是北大荒的第二代，还会有第三代第四代。事实上，孩子中最大的已经 18 岁了，比他们当年下乡的时候还大一些，他们自己的脊背却有些弯曲了。

回来没我们的位置了

1984 年，樊宝发说什么也不打算在北大荒继续呆下去了。农场为了挽留他，把康拜因

优先卖给他，还给了他一套新房子。这一年，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实行改革，将农场全部承包给个人，樊宝发是农场中最看好的致富能手，也是最看好的家庭农场场主。可两个月后，他把地退了，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

“为什么要回来，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希望就在前头，你却放弃了？”1994 年岁末，在他北京家中那间无比窘迫的小屋子里，我不解地问他。

“没人给开支啊！”他瞪大眼睛。

开支？我也睁大眼睛。只一刹那，我明白了一切。

眼前这位中年男人额头爬满了皱纹，那不仅仅是岁月的烙印，更是时代的烙印。在那个时代，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国家。个人是属于国家的，是集体的一分子，国家为每一个劳动者支付报酬。樊宝发喜欢这种活法儿，喜欢与国家、与集体总是以“开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现在承包到户了，每个人只为个人干活，再也感受不到崇高，没有光荣，也没有牺牲。樊宝发忍受不了这种只为自己活着的生产方式。“咱这思想跟不上形势，一承包，当农民了，没人管了。我可不乐意单干，就想跟着集体干。”他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来找“集体”。

殷健康和蔡三中也回来了。

可是，北京还有他们的位置吗？

殷健康没敢带妻子女儿一块回来，因为没有地方住。北京的家只有一间 12 平方的小房子，母亲死后姐姐一家人住在里面，自己再带一大家子过来怎么住啊？直到一年后姐姐终于找到自己的房子，才把这间小屋让给了殷健康一家。

蔡三中的不幸也总是跟房子有关系。当年在北京的小妹妹为了给哥哥留出一间房，跟后妈吵了一架后把原来家中的房子换成了两处，谁知换的是一间私房，落实私房政策的时候，房东执意要收回这间屋子，好说歹说，给换成了一间 8 米的小屋。还是不得安生，只好去郊区租农民的房，一月房租要 150 元。

樊宝发算是最幸运的了，跟父母弟妹住在一套三居室里，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差不多有 10 口人。

他们发现，北京不光是没有他们栖身的地方，更没有他们挣饭吃的位置。他们站在北京的街头上，有时茫然问自己：“我回家了吗？”

他们觉得在北京甚至不如北大荒活得踏实，心里没底，空落落的。可无论如何得活下去，还有四口人得养活呢。扛大件、看大门、卖菜、做工，凡能找到的活他们全干过了。

转了一圈，蔡三中在北京终于没能找到挣饭食的地方，无可奈何地到了平谷县，在一家乡镇企业当电镀工人。算他走运，一位北京来的师傅把自己的电镀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他从此成了这家工厂唯一的技术员。妻子女儿也在平谷住了下来，工作读书各得其所。此时在北京市，蔡三中的姐姐几乎每礼拜都要去一趟劳动局知青科，希望能为弟弟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找一个铁饭碗。

樊宝发没有找到“集体”。他给人蹬三轮，从通县拉铜版纸拉到王府井，那纸卷重 600 多斤，去 70 里，回来 70 里，每次挣九块一毛三。还有一次，货主让他拉古董，那是两个花瓶和几个缸，值好几千块钱。临走，货主叫住他叮嘱一句：当心点，别给碎了。樊宝发不敢骑着走，他推着车，一直走了三个小时，一路小心翼翼地护着车上的宝贝，嘴里不断吆喝着，劳驾，看车！这三个小时高度紧张的劳动只挣了三块七毛五。

干这活不能养家。樊宝发辞了工，买了一辆板车，开始卖菜了。他每天早上两点起床骑着车到北京南端的南苑批发一车菜，下午回来和母亲一起在家门口的街上摆摊。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的菜摊前就围满了人。娘儿俩卖的菜特干净，秤又高，分量足足的，人也和气。樊宝发的名气一下子传开了，一车菜用不了俩小时就卖完了。干了两三年，樊宝发挣了两万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樊宝发俨然也是一个万元户了。可他还在期待着什么。

1989 年秋天，一个街坊的孩子找到樊宝发，悄悄地问他，环卫局招人，招背粪的，去不去？去，当然去！樊宝发一阵兴奋。

头些年北京环卫局的背粪工大都雇的是外地临时工，惹了不少麻烦。到了 1989 年，最后一批老知青要回来，不好安置，环卫局提出愿意来背粪就给老婆、孩子办户口。最后，劳动局选了 14 个人给了环卫局，6 个人留在了背班。半年试工期，一天 6 块钱，先交 500 元押金。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和另外三位老知青就这样当了背粪工。

每月有单位给开支心里踏实

三十多年前，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走到背粪工人中间，背起了这 100 多斤重的粪桶，还让儿子也来背粪，也来体察一下背粪工人的甘苦。那张刘少奇主席和背粪工人握手的照片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一页。那时候的人仅仅有歧视背粪工人的念头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在今天的北京，人们经过他们身旁时，无不掩鼻而过。

——“为什么放着万元户不当，非要去背粪不可？”

——“我有单位，每天上班、下班，到月初就开支，心里踏实。”

……

1985 年春节的那个风雪之夜，一直铭刻在殷健康心底里，就冲这个，他说他要为政府好好干。“咱也是人，干这活看了也恶心。刚一开始老吐，现在也吐，吃一口东西全吐，早起不敢吃饭。也就是习惯成自然，五年了。”后来他终于有一次机会离开了背粪班，队里调他去当木工，他去干了一礼拜，死活要回来。他觉得背班的人义气。

这个感觉蔡三中最强烈了。背班的 6 个人中他最瘦，两眼深凹，体重还不到 100 斤，身体也不好。都是老知青，班上的人能帮就帮他一把，别人的粪桶盛三杓，只给他装两杓。

蔡三中有一个聪明任性的女儿，自打爸爸干上了背粪工，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和面蒸馒

头包饺子了。爸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他赶紧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家里的馒头必须到粮店里去买,要不就自己到外面买早点吃。粮店的馒头1块5一斤,对蔡家来说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不计较这事,孩子也不容易。"蔡三中说。

曾经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叫"理解万岁",在采访的时候我提起这个话题。他们给我讲了一堆故事,然后说:"无所谓!"

——"那次上港澳中心,化粪池堵了,我下到底下去抠,底下特窄,得弯着腰干,那些污水脏东西全顺着袖子进衣服里面去了。那底下有沼气,说把人撂那儿就撂那儿了。化粪池通了,还得把粪背上来,那池子在饭店地下室的最底层。那天我们晚上去的,直到早上8点多钟才出来,胳膊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可早上还得出车,要不出车费就没了,奖金也得扣。给这些大饭店干活最麻烦,收了他们的钱,就跟把我们卖了似的,怎么干也不满意,张口闭口就是我们给钱了呀,我们就不爱听这个,其实我们还是照样每个月拿工资。"

——"前些日子在外馆(斜街),干完活,人家给了250元,说100块钱你们自己留着,150交上去,发票只开150元。那不行,咱是工人,车是公家的,一分钱我们也不能要。"

——"您瞅见了没有,大街上尽有这样的人,指着我们教育孩子说,臭不臭,再不好好学习,赶明儿你也得背粪去。其实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朝心里去了。我们自个儿还挺看重自己的。"

那天在樊宝发家,看见一张集体的合影,是20多年前兵团的那个集体在今天又一次的集合。照片是一群四十多岁的人,都在笑着,笑得很灿烂,比之于他们下乡前那张照片上的严肃表情,仿佛这20多年他们没有受苦,而是每人捡了一块金子。

樊宝发坐在这群人的最中间,他非常自豪。"我自己觉得比较幸福。您甭说这工作不好,是工作就得有人干,我不干,别人不是也得干吗。有这行我就干,组织上把老婆孩子户口办回来了,我就踏踏实实给北京市干活。"

都以为他们挣得很多

跟背班的清洁车采访,他们对我提起上电视的事,说北京电视台拍了一个电视系列剧,叫《真情曲》,第一集就是拍的他们自己。让我播出的时候别忘了看。

蔡三中挨个给姐姐妹妹打电话,通知她们播出的时间。三姐埋怨他,说别再打电话了,都快臭遍北京城了。他不在乎,连街坊邻居都通知一遍。

殷健康家的那台黑白电视机被冷落了好些日子了,不让女儿看,怕影响功课。可是那天晚上例外。12月7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真情曲》第一集——"时传祥新传",一家人早早地就守在电视机边上了。

那是他们自个儿演的电视剧,演的都是每天发生过的事。第一次看见自己出现在屏幕

上，全家人都觉得新鲜还有些激动。殷家两个女儿是爸爸的骄傲，殷健康不想让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从不在家提班上的事。女儿只知道爸爸是掏粪工人，却从没去仔细想过掏粪工意味着什么。看着看着，女儿哭了，爸爸太不容易了。

他们听说电视台原打算找演员来演，后来说是钱给不起，只好还用生活中真实的人物自己来演。半个小时的片子，他们每人拿到了100元钱的报酬。

“人家说了，请演员简直不敢想，谁演啊。”殷健康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挺复杂的。

蔡三中在电视中的台词最多，戏也最多。人家问他：“哥儿们，干这活挣多少钱？”

“两千。”说的跟真的似的。

“台词这么写的，现在谁见谁骂我，队里的人气得都关电视了。其实平常我就这么说，两千。总还得壮门面吧，免得跟人家抬杠。我们那儿一工地都是农民工干活，那厕所根本就脏得没地儿下脚。我们去掏粪，人家问我挣多少，我张口就是两千，人家不信，两千？给我五千我都不干。还有一次，一个换啤酒的问我挣多少钱，我问他背一桶给你20干不干？人家说给50也不干，四五百块钱就干这个，还北京人呢！”

电视剧播完了，环卫局宣传科的同志到区委走访，想听听反应。区里干部说：“瞎编的吧，这年头哪还有背粪工？”听说是真的，接着又问：“就算有，那每月还不得挣两千？”

……

蔡三中的女儿16岁，在北京一所市属重点中学读初三。好多孩子交足了赞助费，找遍了关系才能进这所学校，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凭真本事考进来的，这是蔡三中最大的欣慰。

跟他一样，樊宝发、殷健康都有着令人自豪的女儿们。在吃了二十多年的苦之后，这些出生在北大荒的孩子们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觉得苦没白吃。

樊宝发说，什么是强者？强者就是什么都能忍，在别人面前挺得直腰板！

他们忍受着，忍受着生活上的窘迫、工作中的重负和心灵上的委屈。因为他们虽然还背着时传祥的粪桶，而时传祥的时代氛围已不会再现。他们也许是粪桶最后的北京传人了。可他们挺直了腰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26年前，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灾难，分担忧愁，分担痛苦。这是这一代人独有的活法儿。

他们还将这样走下去。

人民日报·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1]

江泽民

【题解】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讲话。其中，江泽民提出了著名的"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

我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老读者，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但是到人民日报社来，同报社的这么多同志见面还是第一次。首先，我向人民日报社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慰问！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全国第一大报，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几十年来，人民日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办报思想和办报方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报社的许多老同志为办好人民日报献出了自己的宝贵年华和毕生精力。他们的功绩和精神值得赞扬和学习。近几年来，人民日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全面准确地宣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及各项决策，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业绩和精神风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在全国报纸中确实起到了排头兵作用。人民日报编委会和全社同志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精心办报，报纸舆论导向正确，内容更丰富了，办出了新的特色。报社内部建设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保持了团结稳定、积极向上的好势头。中央对人民日报社的工作是满意的。人民日报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信任和威望。希望大家珍惜这种信任和威望，不断改进工作，把报纸办得更好。

今天，我想和同志们着重谈谈舆论导向问题。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我曾经讲过四句话：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和单位，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人民，用最好的东西去"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新闻单位在这四个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方面负有重大而光荣的使命。

[1] 《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1日。

大家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新闻传播手段还不够发达的时代是如此，在新闻传播手段越来越现代化的今天更是如此。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因此，我们党一贯强调，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舆论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模糊，不能动摇。

我们党的老一代革命家都非常重视新闻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省报是如此，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更是如此。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些指示的精神，用以指导我们的新闻工作。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所确定的宏伟蓝图而奋斗，开局不错，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有待克服和解决。敌对势力没有也不会放弃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居安思危，顺利的时候要有防范风险之备。

人民日报办得如何，对全国的报纸和整个新闻界有重大的示范作用、导向作用。因此，同样是实行舆论引导，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就显得担子格外重，责任格外大。在这方面人民日报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深刻的教训。经验和教训总结了，都是宝贵的财富，都不应该忘记。希望人民日报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热情歌颂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建设中的奋斗业绩，鼓舞人民群众为振兴中华而艰苦奋斗。同时，对消极腐败现象也要进行批评和揭露，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社的同志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坚持政治家办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新闻事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我们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各新闻单位要加强协调，形成强大的合力，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近几年来，中央宣传部门和新闻界在形成合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希望加以总结提高，以便做得更好。

邓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类灵魂工程师是一种很高的评价，是一项很高的要求，要真正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新闻战线的同志，特别是中青年同志，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在打好思想政治和业务根底上，老老实实地下一番真功夫、苦功夫。

要打好理论路线根底。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理论路线根底打好了，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形势怎样变化，都会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要打好政策法律纪律根底。要牢牢掌握中央的方针政策，牢牢掌握国家的法律法规，严守新闻工作纪律。新闻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如果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懂不熟悉，那就宣传不好，甚至出现误导，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要打好群众观点根底。新闻工作、党报工作，说到底，也是群众工作，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密切联系群众，是新闻工作者的必修课和基本功。大家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做调查研究工作，紧扣时代的脉搏，倾听群众的心声，多写出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作品来。

要打好知识根底。知识就是力量。首先要努力掌握与自己的业务工作直接有关的知识，同时，还要博览群书，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都应读一些，科技知识也应尽可能多学一些。希望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多出一些既懂政治、学识又渊博的编辑、记者、评论员。

要打好新闻业务根底。新闻工作，无论编辑、采访，都需要有业务能力，特别是要有很好的文学修养。现在，报纸上刊登的许多报道，主题好，内容好，语言也很精彩，使人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得到美的享受。但是也有一部分新闻作品，不讲究辞章文采，文字干巴巴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句套话，也有的哗众取宠，乱造概念，词句离奇，使人看不懂，这种不良文风应加以纠正。要大力提倡新闻工作者苦练基本功。

在新的历史时期，仍要坚持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作风。一是敬业的作风，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献身党的新闻事业。二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报实情，讲真话。三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苦，不怕累，有时还要不怕危险、不怕牺牲。四是清正廉洁的作风，自觉抵制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恪守职业道德，坚决反对搞有偿新闻。五是严谨细致的作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严防差错。六是勇于创新的作风，新闻事业是常干常新的事业，是有着广阔的驰骋空间的事业，在坚持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的前提下，新闻工作者应当不断开拓新的报道领域，不断探索新的报道形式，不断采用新的报道手法，不断写出富有新意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编委会鼓励和组织大家钻研业务，多出精品，这是值得提倡的。

人民日报社人才济济。现在，许多老同志退下来了，在岗位上的大多数是中青年同志。中青年同志思想活跃，创新意识比较强，党的新闻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中青年新闻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点和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自觉地扬长补短，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好传统、好作风，在政治上、业务上尽快成熟起来。报社的领导要更加重视中青年工作，给他们压担子，努力为他们奉献才华、尽快成才创造条件，努力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结合新形势、新实践，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在集中精力办好报纸的同时，要努力搞好经营和管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加关心人民日报、支持人民日报，为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做出积极的贡献。

新华社·别了，“不列颠尼亚”[1]

周树春、胥晓婷、杨国强、徐兴堂

【题解】本文为散文式新闻的代表作之一，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全球瞩目，举国欢腾。在这一重大的新闻报道活动中，新华社的这篇特稿别具一格，通过鲜活的细节和传神的文字，生动刻画了这一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大气深沉，耐人寻味。

在香港飘扬了 150 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总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 30 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濛濛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 25 任港督的庭院。

四时三十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四时四十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 5 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 1885 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晚六时十五分，象征英国管制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里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在香港上空。150 多年的英国管制即将结束”。

---

[1] 新华社香港 1997 年 7 月 1 日电。

七时四十五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 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零点四十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 28 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 1997 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 1841 年 1 月 26 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 1997 年 7 月 1 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 156 年 5 个月零 4 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工人日报·九江城哭了……[1]

于文国

【题解】1998年9月15日，为九江抗洪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民子弟兵撤离九江，《工人日报》摄影记者于文国一边拍摄九江人民欢送子弟兵的场景，一边完成这篇报道。报道简洁而充满感情地将十余个惜别场景历历呈现在读者面前，配合拍摄的照片，生动表达了军民鱼水深情，感人至深。

9月15日。子弟兵走了。九江城哭了。

整夜未眠的数十万九江市民，天没亮就倾城出动，等在街道两旁，挥泪告别和他们生死与共，与洪魔搏斗了长达50多天的子弟兵凯旋。

九江人说：在江堤决口的日子里，是战士们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滔滔洪水，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的生命！

就是这些战士，临行前还把九江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节省下来的31.45万公斤大米、9万件衣服悄悄地运到大堤上留给了灾民，又从自己仅有的几十元津贴和并不高的工资中，挤出了162.96万元交给了灾区……

为了怕部队夜里开走，市民们自发组织起来，从9月10日开始就轮流在部队宿营地门口“值班”：不能让子弟兵们悄悄地走了啊！

今天早晨5点，军车出来了。可当车刚出门口，就再也开不动了。一拥而上的上千名九江人急急地将手中的苹果和鸡蛋等礼物掷投到军车上。

此刻，士兵们都把手抬到了帽沿处——敬礼！

此刻，士兵和市民们的胸膛起伏着，眼里含着泪水。

敬礼的士兵们雕像一般。

市民们则仍是忙不迭地往车上掷投礼物。

人群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手中举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大字：“长大我要去当兵。”他叫赵框喜，是子弟兵们8月5日深夜江新洲决堤时救出的那群孩子中的一个。

[1] 《工人日报》，1998年9月16日。

九江师专的一群女学生，这几天早就商量好了。在军车路过时，她们拥出校门举起了她们的标语："兵哥哥，真的舍不得您走！"一位身穿太阳裙的女青年则鼓足勇气冲到近处，把一条香烟扔到了车上。

到九江交通大厦时，30岁的职工胡民礼情急之下奔回厂里，扛着国旗爬到高处，狂舞起来。

在市民们搭起的凯旋门处，人山人海。鲜花、彩旗、标语，车声、歌声、鞭炮声，汇成一片："兵哥哥再见！""解放军万岁！"

挥手。握手。含泪的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咱当兵的人》、《说句心里话》。

一位20岁姓姚的女青年向车上的两位战士高喊："大李、大江，以后来九江还认识我吗？"

透过长焦镜头，记者看到，两位战士泪水已挂在腮上。

8时30分，第一辆军车到达九江西站。不足5公里的路，竟走了整整3个半小时！

8时45分，距列车开动还有5分钟。九江水泥厂职工54岁的刘和平和50多位妇女突然挤出沸腾的人群吹起了笛子。人们大声伴唱《送别》和《北京有个金太阳》。

站在一旁与士兵们道别的董万瑞中将哽咽了："我为有如此受人民爱戴的士兵感到骄傲。"泪水从将军的脸上流下。

8时50分，列车启动。站台上哭声一片。

南方周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

南方周末 1999 年新年致辞

【题解】从 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南方周末》紧扣现实政治和社会焦点,扛起"舆论监督"的大旗,以"反对腐败"和"关怀弱势"为诉求,吸引了一批读者。这篇新年献辞集中体现了其风格。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这是我们与你见面的第 777 次。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作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

[1] 《南方周末》,1999 年 1 月 1 日。

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颜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人民日报·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使馆[1]

吕岩松

【题解】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犯下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导致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与朱颖夫妇罹难的惨剧。当时，作为使馆内唯一幸存的中国记者吕岩松，从烈火熊熊的现场，在事件发生后15分钟，用手机第一个向国内发回了使馆被袭的消息，在全世界产生强烈震撼，并为中国的外交赢得主动，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重要作用。

本报贝尔格莱德5月8日电 记者吕岩松报道：当地时间7日午夜（北京时间8日早5时45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至少使用3枚导弹悍然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到目前为止，至少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

当地时间7日晚，北约对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市区，进行了空袭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轰炸。晚9时始，贝尔格莱德市区全部停电。子夜时分，至少3枚导弹从不同方位直接命中我使馆大楼。导弹从主楼五层楼顶一直穿入地下室，使馆内浓烟滚滚，主楼附近的大使官邸的房顶也被掀落。

当时，我大使馆内约有30名使馆工作人员和我驻南记者。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不幸遇难。据悉，这是外国驻南外交机构第一次被炸。

爆炸发生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许多华侨对使馆给予了极大帮助。潘大使在被炸毁的使馆废墟前，愤怒地指出："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

南联盟外长约万诺维奇说："使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北约炸弹是对外交的轰炸。"

当地时间8日下午，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数百名华人举行抗议游行，数千南斯拉夫人参加了游行。

[1] 《人民日报》，1999年5月9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贸易组织决定接纳中国为世贸成员[1]

赵健夫

【题解】这篇广播稿是对中国"入世"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忠实记录。报道风格沉稳，语言简洁，同时发挥广播的优势，即时迅速，让公众在第一时间得到真实信息，现场感很强。

主持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10日一致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接纳中国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现在请听本台记者赵健夫从现场发回的录音新闻。

记者：

卡塔尔时间10日下午18点20分，即北京时间当晚23点20分，举世瞩目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性时刻终于到来了。

（音响1，卡迈勒宣布开始审议中国入世协议，英语，混）

大会主席、卡塔尔财政经贸大臣卡迈勒宣布大会开始审议《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音响1突出，渐隐）

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主席、瑞士贸易代表吉拉德首先向大会报告了工作组的工作情况，并向部长级会议提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和工作组代拟的部长级会议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音响2，吉拉德讲话，突出，法语，混）

吉拉德说，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自1996年3月22日起，共举行了18次会议。工作组于今年9月1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18次正式会议通过了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中国工作组也随之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全部结束。

随后，大会主席提请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在确定与会成员没有异议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01年11月10日。

后，大会主席击槌宣布，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音响 3，卡迈勒宣布决定，英语，接掌声)

接着，大会主席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发言。

(音响 4，石广生讲话)

石广生说："加入 WTO 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所有 WTO 成员，有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它必将对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石广生表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将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基础上，在享受权利的同时，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履行自己的承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一道，为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石广生发言后，与会的世贸组织成员代表纷纷发言，对世贸组织通过中国入世的决定表示热烈祝贺。他们希望中国在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为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作出自己的贡献。

(音响 5，掌声突出，渐隐)

据安排，当地时间 11 日晚 19 点 30 分，即北京时间 11 月 12 日凌晨 0 点 30 分到 1 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签字仪式将在多哈喜来登酒店会议大厅举行。石广生部长将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上签字。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

【题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闻界的全国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同新闻界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记协前身是在周恩来同志倡导和支持下，于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2000年由国务院确定每年11月8日为中国记者节。1910年7月在北平（现称北京）组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胡乔木任主任，胡愈之、廖承志任副主任。中国记协筹备会同工人、青年、妇女等15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及民主党派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推举12名新闻界代表独立组团参加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同年9月，筹备会被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接纳为会员。1954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1957年3月14日，联谊会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并通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新闻工作者自律的行为准则，为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规制和道德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闻法制与新闻职业道德自律的进程。

中国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工作者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维护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声誉，对于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对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保证新闻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应该是每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操守和富于敬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1] 2003年10月14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97年1月27日修订。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

新闻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对党、对国家负责和对广大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努力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为人民群众提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以及了解世界所需要的新闻和信息，热情宣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和奉献精神，准确反映他们的愿望、呼声和正当要求。

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思想和行为，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消极腐败现象，积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满腔热情地做好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重视群众来稿，妥善处理群众有关建议、批评、申诉和检举的来信、来访，开展多种多样为群众服务的活动。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新闻工作者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新闻报道中，要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投身到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来。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造成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新闻报道不得宣扬色情、凶杀、暴力、愚昧、迷信及其他格调低劣、有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容。

三、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

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

坚定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得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内容。

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

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

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

严格遵守和正确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决维护各民族的团结，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四、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报实情、讲真话，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

力求全面地看问题，防止主观性、片面性、努力做到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

采写和发表新闻要客观公正。不得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发泄私愤，或作不公正的报道。

工作要认真负责，避免报道失实。如有失实，应主动承担责任，及时更正。

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发扬清正廉洁的作风，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反对“有偿新闻”等不正之风，树立行业新风。

新闻工作者不得以任何名义索要、接受或借用采访报道对象的钱、物、有价证券、信用卡等；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不得索取和接受任何形式的礼金；不得在企事业单位兼职以获取报酬；不允许个人擅自组团进行采访报道活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新闻报道和经营活动要严格分开。新闻单位不得用新闻形式做广告；不得向编采部门下达“创收”任务。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

坚持廉洁自律，提倡勤俭作风，记者不得向被采访地区或单位提出工作以外的个人生活方面的特殊要求。要自觉遵守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严禁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

六、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团结协作，形成合力，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一大优势。新闻界同行之间应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关系。提倡互相学习、相互支持，开展正当的业务竞争。

尊重同行和其他作者的著作权，反对抄袭、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

在同国外新闻界交往中，要维护祖国的尊严，维护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尊严。

（本准则于 1991 年 1 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1994 年 4 月第一次修订，1997 年 1 月第二次修订）

中国青年报·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两千余军民奋力抢险[1]

贺延光

【题解】这篇报道获得第九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1998年夏季，正当长江洪水肆虐之时，8月7日九江大堤突然决口。面对这一严峻情况，《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深入一线采访，并用手机向北京发回了8条短消息。这些消息简洁明快，要言不烦，从不同角度及时而如实地报道了险情。另外，作者拍摄的照片《大江决堤》同样惊心动魄，令人难忘。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6时5分电（记者贺延光）今天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4号闸与5号闸之间决堤30米左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九江市区漫延。市区内满街都是人。靠近决堤口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6时35分电（记者贺延光）现在大水已漫到九瑞公路。据悉，决堤时，一些居民还在睡午觉。现在在堤坝上被洪水围困的抢险人员大约上千人。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7时5分电（记者贺延光）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有关专家正在查看缺口。专家们决定用装满煤炭的船沉底的办法堵缺口。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7时15分电（记者贺延光）记者已赶到缺口处。汹涌的江水正从30米宽的缺口涌向市区。南京军区两个团正在国家防总、省防总有关专家的指挥下现场抢险。现在有一条100多米长的船无法靠近缺口，抢险队正在想办法。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17时40分电（记者贺延光）专家们拟定了三套抢险方案：1. 将低洼处的市民转移到安全地带。2. 市区内的军队、民兵组成一道防洪线。3. 全力以赴堵住缺口。

现在，一条大船装满煤，正由北向南岸靠近，准备堵缺口。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22时5分电（记者贺延光）截至记者21时撤离时，决堤口还没有堵上。一条装满煤炭的百米长的大船已横在距决堤口20米处，在其两侧，三条60米长的船已先后沉底。数千军民正在沉船附近向江里抛石料。水势稍有缓解。

[1] 《中国青年报》，1998年8月8日。

目前，留在决堤处抢险人员总计有2000多人。防汛指挥部组织抢险人员正在市区的龙开河垒筑第二道防线。

据悉，市中心距决堤处的直线距离约5公里。市区内目前还未进水。记者赶回市区时看到，一些店铺还在营业。市民们的情绪较下午平稳了一些。

路上，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市政府已在电视上发出紧急通知，告诫市民，凡家住低于24米水位的住户，要迁到更高的楼上。

本报江西九江8月8日零时15分电（记者贺延光）记者刚刚与前线指挥人员通话：现在沉船部位上端水流有所减弱，但船下的漏洞水流仍然很急，缺口处洪水不见缓解。抗洪军民仍在连夜奋战。

本报江西九江8月8日零时45分电（记者贺延光）记者刚刚得到消息，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万余名解放军战士正在龙开河连夜奋战，构筑一道10公里长、5米宽的拦水坝，作为市区的最后防线。至发稿时止，仍有大批军车赶往此地。

中央电视台·钟南山：直面“非典”[1]

王志、张士峰、王扬、孙海南、陈洪奕

【题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报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面对面”以及新闻频道开播等等。其中，“面对面”借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形态，开播以来同样产生良好效果。主持人王志以其新闻人的敏感和敏锐，赢得观众的好评。

他是一名院士，但现在他更像是一名战士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他殚精竭虑，勇于直言

作为一个67岁的老人，到底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在这场和疫病的战争中，是什么在支撑着他的全部精神？

人物背景：

钟南山，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生于南京，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92年到2002年任广州医学院院长，现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荣获200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精彩同期：

王志：你第一个提出来要跟省卫生厅说，把最重的病人送到呼吸所来，什么情况下做的这个考虑？

钟南山：既然是肺炎，就是我们搞呼吸的，搞胸肺科医生的首要责任。

王志：你说靠一个团队，你怎么凝聚这个团队，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服你？

钟南山：你想让人家干一个事儿，你自己先去干。

王志：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身体，但是你也应该相信自己的年龄。

---

[1]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2003年4月25日。

钟南山：但是占我头脑比较多的，还是找到这个未知数。

王志：作为从其他方面考虑来说。

钟南山：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跟权威的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王志：那当你听到你的同志倒下去，甚至病死，你的心里感受是什么？

钟南山：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钟南山院士的忙碌让很多人跟不上他的节奏，为了采访钟南山，记者从北京赶到广州，又从广州追回北京。利用钟院士在北京工作的间隙，《面对面》栏目的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此前，卫生部刚刚重新公布了中国大陆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例数。

王志：钟院士，面对你这样一位专家，我很想让你告诉我，非典的疫情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钟南山：要看你观察按哪一个地区来考虑。假如说在广东，就是非典发现最早的地方，那么现在病情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所谓的遏制就是说它的发病率明显的减少。

王志：但是全国的情况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风声鹤唳，愈演愈烈了。

钟南山：我看不完全是这样。只要说我们没有完全的，对它像广东那样，一开始完全不意识到，或者不知道它是一个传染病这样的话，就会重复像广东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到医疗卫生部门各方面全民都很重视，而且采用了适当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那么它会不会像广东那样，一定要发展到多大多大的数量，那倒不一定。

王志：那是不是意味着民众对于这种病的恐惧，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钟南山：我想民众应该对这个病有一个思想准备。但是我并不同意你所说的恐惧。因为恐惧是来自于一个对疾病的无知。只要是知道这个病的话，它应该可以防，可以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它是恐惧，而是应该来正确的对待它。

对于民众谈之色变的非典型肺炎，钟南山一直呼吁大家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从 2002 年年底开始，钟南山这个名字就与非典型肺炎联系在一起，作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专家组组长，他参与会诊了第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并将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命名为非典型肺炎，他主持起草了《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并提倡国内国际协作，共同攻克 SARS 难关。作为一名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从接触第一例非典病例开始，67 岁的钟南山就以一个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民众和媒体面前。

王志：那这个抗击非典的这个战役，可以说是从接诊第一例非典病人开始。你是什么时候接诊第一例非典病人的。

钟南山：第一例非典病人应该是在佛山，那是在 11 月底。那么第二第三例是在河源，

河源的是 12 月初，我接诊的是第二例。

王志：那能不能够跟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接诊河源病人的情况。

钟南山：我想在 1 月初当时我是按照常规到 ICO 查房，就是有一些医生向我谈到了在 10 病床有这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很奇怪，他是从河源来的，那么当时他呼吸困难，非常明显，到了呼吸病研究所的时候，他已经是垂危的状态。

王志：当时是抢救了吗？

钟南山：当时我对病人进行了一下体察，进行了一下分析，发现这个病人发烧并不很严重，其他的器官没什么事儿，那么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肺很硬，我们知道肺平常就像橡皮球那样，有气吹进去就胀了，气一出来就缩瘪了，肺也是一样。但是他这个肺就像一个硬邦邦的一个塑料一样的东西，吹也吹不胀，缩也缩不扁，没有弹性，所以用一般的办法来进行通气很容易就产生气胸，肺就破了。在我们会诊以后用了很多抗生素，还是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会不会是一个急性肺损伤，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试用了一下大剂量皮质激素来进行静脉点滴治疗，当时觉得是中末期，胜算不大。但是就很意外地发现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病人的情况明显的好转，这使得我们非常惊奇，这是河源的病人，后来我们发现在河源这两个病人陪他来的或者说陪伴他的又有 8 个人感染了，当时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这个病非同一般。

王志：8 个什么样的人被感染？

钟南山：8 个人都是跟一块儿，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家属，就发现过了几天以后凡是跟他接触的这些医生和护士都得病了，那么后来还有趣的是，这个病人因为后来觉得是有感染的，就送到另外一个医院，在救护车上护送他的医生和护士过两天也病了，还有开这个救护车的司机。所以这个时候就使我们强烈感觉到这个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同时正因为都感染到年轻人，有一些人不治，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有很强的致命性。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我们并不了解这是一个特别的肺炎。

就在钟南山为这个非同一般的病例寻找救治方案的时候，广东省的中山市也出现了相同的病例，1 月 21 号晚上，广东省卫生厅派出以钟南山为组长的专家组赶赴中山市，通过对三十几个病人的会诊和抢救，第二天，专家们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这种病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

钟南山：当时命名一开始是由于不明原因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不明原因肺炎，不明原因肺炎当时也在省卫生厅向一些媒体还有向一些各个医疗卫生部门都提了一下，但是由于它是不明原因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误会，特别在香港就报道到这是个炭疽性肺炎，或者说是一个鼠疫，腺鼠疫性肺炎，所以这样情况实际上它并不是。

王志：你怎么排除炭疽呢？

钟南山：我想是完全可以排除，不是炭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很容易发现的。

王志：怎么排除鼠疫呢？

钟南山：鼠疫也是，病原菌也是很容易可以发现的，通过肺组织、通过分泌物都能够发现，通过血清学测定，那么这些都做过都没有发现。

王志：最初还怀疑是禽流感。

钟南山：是的，但是后来从病人的分泌物，从血清，从各方面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有禽流感，有个别的，但是它并没有跟这个可以联系上，所以是可以排除的。所以后来我们觉得，提出来一个非典型性肺炎，可能更实际一些。那么到了后来，由于他的传染性很强，在卫生部把它补充为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

尽管钟南山了解了这种病基本的传播规律，但疫情的变化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从一月下旬开始，各家医院不断收到非典型肺炎病例，广州地区发病人数急剧增多。2003 年的大年初三，钟南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被推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沿。

就在钟南山为不断增加的病人忙碌时，广州市的市民中间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正月初八到初十，各种关于怪病的传闻达到了最高潮，还没从春节的气氛中走出来的整个城市又陷入到了恐慌之中。2 月 11 号，广东省卫生厅举行记者见面会，钟南山以院士的声誉做担保，告诉大家，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王志：当时在发布会上，你的发言给大家起到了一个非常稳定人心的作用，发布会之后，形式是好转了还是在继续加重。

钟南山：发布会以后我想形势还没有得到很好控制，病情还是在继续增加。

王志：那当时病人怎么越来越多呢？情况是怎么样的。

钟南山：按照每天来算的话，当然这个数量是更多的，但是这个可能是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每天他由于互相感染这个机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病人多了。

王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

钟南山：我想第一个，既然是肺炎，就是我们搞呼吸的，搞胸肺科医生的首要责任，就是我们首先应该搞清它是什么，应该这个是我们的本行，我们本身的责任。

于是，就在疫情愈演愈烈的时候，身为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的钟南山主动请缨，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大胆要求。

王志：那当医务人员大量的被感染的时候，你第一个提出来要跟省卫生厅说，把最重的病人送到呼吸所来，什么情况下做的这个考虑？

钟南山：我考虑到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我想在呼吸，因为我从事了三十几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还有我们所里面的，估计要抢救这些病人，不是所有医院能做到的。

我们就是在这一方面比较专长。所以病人来的话，我想他们得到的抢救成功的机会会多得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想这些病人是感染比较重的病人，他的传染

性会比较强，那么只要传染性比较强，只要任何医院都在搞的话，那我想感染的机会比较多，集中在一个地方相对来说就使感染的面积会减少。

王志：那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钟南山：我想有考虑，但是更多地我想我们会搞好，因为从这几例的治疗我们不觉得十分困难，所以首先我觉得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只要有一定的把握的话，我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一定的把握性的话我首先考虑成功，而我首先不是考虑失败。

王志：那你怎么跟同事交代呢？怎么跟属下交代呢？

钟南山：我想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好像比较少的考虑这个东西，我还是从学术的角度，那么这次实际上对我们来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更做一个探讨，能够搞一些，能够有一些创新，所以这个跟救死扶伤是一致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去探索这个工作，你探索这个工作你不接受更多的病人，你能探索吗？只能理论上探索。

于是，钟南山领导的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了广东省非典救治工作的技术核心和攻坚重地，短短的几天之内，60 多名危重病人从各家医院转送过来。

钟南山：什么叫重病人？就是呼吸很困难的病人，需要抢救的病人都转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以在 2 月份我们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抢救病人。

王志：那最忙的那一段我们在广州也看到过你的工作节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钟南山：我想因为病情发展得很快，另外一个病人医务人员发病的很多，所以这两个问题就使得我要考虑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了解病人的情况，每时每刻也要了解我们医务人员有没有受感染。

王志：小陈告诉我，你原来是不开手机，不太用手机，从什么时候开始 24 小时开机？

钟南山：这个应该是在 1 月下旬开始就一直在工作状态了，因为这个时候随时有变化的时候就必须，特别是后来很多医务人员，因为这些医务人员很多都是各个医院的负责人，而且他本人就是抢救非典型性肺炎的负责人，他病了，他要转到我们这儿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就随时要了解病人的情况。

王志：你说靠一个团队，你怎么凝聚这个团队，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服你？

钟南山：第一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意图，或者我们要做什么，要让大家都知道，不要不透明，干一些事儿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怎么干？他就会有一个主观能动性来做好，这就是要相信大家，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想让人家干一个事儿，你自己先去干，也就是说不管是检查病人，看病人或者到哪儿，因为很多医院是敬而远之，但是你假如说你要去看病人，你又要别人去看，你自己又不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调动大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更加要到第一线。而我自己就是对每一个病人都要观察，因为我始终想找出他的规律，所以，对所有的病人的口腔、咽部，我都进行仔细的检查。

王志：到你挨个儿去看他们口腔的时候，你应该是已经知道这个病有强烈的传染性了。

钟南山：是的。

王志：即便你是专家，但是非典肺炎对于你来说同样也是很不可知的，而且危险是一样的，你应该比大家更知道它的危险性，你是怎么考虑你对个人这种风险。

钟南山：我知道它是有强烈的传染性，从学术的角度我更想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你不做一些了解的话，你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光是听人讲，另外一个我也有点相信自己，我想身体好的人，不会每个人得病的。

王志：你身体确实是好，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身体，但是你也应该相信自己的年龄。

钟南山：我也想过，但是想得不太多，但是占我头脑比较多的，还是找到这个未知数，我想比较多是这个。

虽然钟南山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但病魔还是悄悄地向他袭来，2 月 18 号，连续 38 个小时没有合眼之后，由于过度劳累，钟南山病倒了，但是，作为广东省与非典战斗的关键人物，钟南山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王志：当你自己病倒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呢？

钟南山：我想在那个时候因为任务比较重，各项工作特别是抢救工作也比较繁忙，那么我那个时候确实比较疲劳。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不觉得是很重，另外一个我想不要影响大家的情绪，而且我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一个过度疲劳以后出现的一些不大舒服，所以休息两天就好了，那么我想没有必要向大家讲得太多，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王志：但是对于你一个 60 多岁的人来说，应该是件严重的事情。

钟南山：我想人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自己的情绪和信念，假如一个人比较超脱，他正在很热衷或者是一心一意去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其他很多东西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包括身体，所以我想我就在那样的一个思想的支配下，好像身体也比较快复原了。

王志：你的家人对你的工作支持吗？

钟南山：我的家人对我，我想应该是非常支持的，她一方面非常害怕我得病，所以每次回来总是进行严格的（询问），首先问一问我有没有去病房查病人，要是有的话在门口就得截住，完了，脱下衣服，完了，洗澡，把所有衣服拿去洗，但是尽管她知道我有，我们整天接触，而且包括他们有时候到其他地方都被别人所认为你不要过来了，因为什么？你的家人是整天接触这个病的，这个都知道，但是我想他们很理解我，所以从来没有对我做这个工作有任何的阻拦。

在钟南山所长的带动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空前地团结起来，为了探寻非典型肺炎这个未知数，一共有 14 名医务人员自己也受到了感染。

钟南山：特别在我的研究所里头，面临着这么严重的一个病，生与死的这种考验面前没有一个要求转换过程，没有一个要求要休假或者什么，他们都在做。特别是有一些医生

这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我们有一个医生到现在还没出院，他就是在抢救一个做气管进插管抢救一个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时候，因为他比较严重，要赶快抢救，所以要给他插管，要从气管进。所以他是带了4层口罩给病人做，但是过了3天他自己病了，那么还有两个护士也病了，他发展很快，那么他发展的很重，他到了后期的话，呼吸很困难，心跳只有40次。当时他看见我流下了眼泪，他非常痛苦，但是在他恢复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说我后悔我做了这个工作。我们现在正在抢救一位主任，今天的情况很不好，因为他由于比较拖延的治疗，刚才打电话给我情况很不好。那么这个病人都是我的同道，而且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是很伤心的。

王志：那当你听到你的同志倒下去，甚至病死，你的心里感受是什么？

钟南山：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我想我们以后，我相信对这次是非典型肺炎，说不定下一次是传染性心肌炎，我相信搞心脏的那帮人也会像我们一样会站在最前线的，他不会因为怕传染他就不来了不做了。

在钟南山的指挥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同时，在钟南山的主持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也很快出台。

王志：整个广东省的防治非典肺炎的诊断标志是怎么出台的？

钟南山：因为我们发现送来的病人里头，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去会诊的病人，诊断的标准差异极大，有的已经很晚期了，还搞不清楚是什么，有的根本就不是，所以当时就觉得有必要有一个共识。我想真正的从书本上参考，没有的参考。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我想主要还是积累了大家共同的经验。

王志：你在中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钟南山：我想真正的执笔写的，不是我写的，但是我们整个的指导思想，诊断治疗我在这里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另外在成文了以后，稿子成文以后我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修改。

王志：那这个标准在后来治疗非典的过程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钟南山：我想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在3月份以后我们死亡的病率是很少的，死亡的病率要么就是以前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或者说他原来有基础病的，以后比较少，而且不少病人比较早期的康复健康在最近我们跟香港东区医院代表团，东区医院他所采用了我们三种手段，包括皮质激素治疗，包括面罩通气，包括及时的治疗二重感染，他说他收治的75个里头，没有一个死的，只有一个插管，他认为这个经验是很可取的。

除了组织广东省的优势力量对抗非典疫情之外，钟南山一直都没有停止对非典病源的寻找，在钟南山的倡议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等8家单位与香港大学医学院组成联合攻关组。另外，钟南山还大胆的提出，攻克SARS难关需要国

际援助，国际协作。

王志：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要协作？

钟南山：这个病，本身的病源搞不清楚，他的传播途径搞不清楚，那么到现在他也没有一个更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这么多环节搞不清楚了，我们需要两个层面的一个协作，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是流行病学的，病原学的和临床方面的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他的病原。第二个层面的协作是什么？是国际上的大协作，因为这个病是人类的疾病，这个病是致命的，需要综合各国它的优秀的科技的成果和技术，共同来攻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王志：那现在看起来你说的协作是对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你提出来是很有压力的而且对你个人来说有非议你知道吗？

钟南山：而且当时我们首先跟香港大学协作，协作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反对的，当然并没有直接的责备我。

王志：那这种批评和压力对你没有影响吗？

钟南山：有影响，但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我要做的，也是在做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互相支持，同时我们希望把这个病更快地搞清没有什么错。

王志：你关心政治吗？

钟南山：我想我们搞好我们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像你们作为一个采访，作为一个工作，你把你的采访工作做好，而且人民喜闻乐见的，对你们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你在你本岗位上，你能够做得最好，你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

4 月 12 号，钟南山主持的联合攻关组宣布，从广东非典型肺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离出 2 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原因，4 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认。

王志：那你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从你的专家的角度来说，要控制这个或者说能够有效的治疗。

钟南山：我想我只不过是一个临床大夫。我不能够用我的，我自己的单纯的知识就能够对它提出一个预料，或者预计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够控制，能够怎么做好。但是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说，我想寻找出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我相信时间不会很长。

王志：其实对于你个人来说我觉得荣誉不是问题，学术地位也不是问题，那你这样拚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钟南山：我想是不是就想追求一个未知数，就是这个目的。这个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病源，是什么源头怎么治，那么这就是我这个领域的，所以我希望搞清楚，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动力。

新闻战线·近点，再近点——兼谈通讯《热血铸雄关》采写体会[1]

王慧敏

【题解】 本文是一篇记者的采写心得，有内容，有思想，有感情，对一线的新闻记者颇有启发和借鉴。作者现任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站站长。

2003年11月4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的我写的通讯《热血铸雄关——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军民戍边纪实》，获得了人民日报社好新闻一等奖，王晨社长、张研农总编辑给予了鼓励，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好评，《新闻战线》的编辑嘱我谈谈采写《热血铸雄关》的体会。说实在的，这篇稿子就题材而论，不算新。至于写作，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有遗憾：尽管文章不短——7000多字，但仍没能将克州军民守边的感人事迹传神地表达出来。很多东西，眼里有，心里有，但落实到纸上，总觉得还不到位。

如果说这篇稿子还有可取之处的话，可能就是离生活近了点儿——克州军民在严酷的条件下守边的事迹感染了作者，作者的笔端才有了些许色彩。

采访与写作

采访前，克州州委、军分区曾准备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座谈会也开了好几个，但大家说来说去无非是部队帮群众做了哪些好事，或是群众帮部队做了哪些工作等，琐碎得很。

如果仅仅把这些东西诉诸文字，任你有生花妙笔，我想恐怕也很难打动读者。我向军分区领导请求：能不能沿边境线实地走一走？军分区领导不同意，理由是“边防连队住宿很困难，有的地方压根儿就没有路”。我向领导保证：“绝对不给部队添麻烦。没有住的地方，就和战士们挤一挤；没有路，战士们怎么走，我也怎么走！”禁不住我软磨硬泡，领导终于放行了。

克州位于祖国西陲帕米尔高原，山地占全州面积的95%，平均海拔3000多米，是新疆

[1] 《新闻战线》，2004(1)。

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州。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背景就是这个地方。

出发前，尽管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身临其境后才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环境的严酷程度。先不说这里的三四千米的海拔和刺骨的寒冷，光那份荒寂，就压抑得让人难受。在边境线上奔波了半个多月，只看到过 3 个游牧的老乡。四周除了山还是山，而山体寸草不生，永远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单调的灰黄色。这里的绝大部分官兵，从入伍到退伍，没有离开过大山一步。一个浙江籍战士告诉我："在这里，就是看到一只野兔、一只老鼠都会让你高兴得跳起来。"

在某部边防六连，战士们吃饭时，大多得站着或蹲着——因为凳子不够。一个宿舍 8 个人却只有 6 张铺板，战士们只好把床并在一起打通铺。住在战士宿舍里，睡在战士们单独为我腾出来的床上，我心里愧疚得很。我在文章中写了个"与鼠共眠"的细节，不少内地的朋友打电话表示慰问。其实，当夜的情景比我文章中描绘的还要可怕。

那夜临睡前，辽宁籍战士小谭从箱里拿出一只甜瓜，执意要让我尝尝。说这只瓜是过"八一"节的时候，连里发的，自己一直舍不得吃。瓜打开后就放在我床头的一块板上。那夜老鼠肆虐，就是这只瓜惹的祸。先是一只老鼠钻进了被窝，因为跑不出去，在被子里左冲右突，在我的腿上、胸口抓了几道血印子。我打开手电一照：地上有 20 多只老鼠在乱窜。最可怖的是那块放瓜的板，七八只老鼠蹲在那里围着瓜贪食。老鼠离我近在咫尺，有一只老鼠后腿就跷在枕头上。我一挥手，老鼠们蹭地跳到了地下，但随即又争先恐后地爬了上来。如是者再三。后来，老鼠看我拿它们没招儿，干脆不往下跳了。我一挥手，顶多挪一挪后腿。到最后，连挪都不愿意挪了。那夜，从 4 点钟到天亮，我拥着被子任凭老鼠在我枕旁咯吱咯吱嚼个不停。

在一分一秒数时间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全面的拷问。我们太幸福了！前几天，人民日报经济部一位退休老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说："在都市呆久了，很多人的思想都麻木了，老是怨这怨那。看了这篇文章，我很受震动，在饭桌上我把文章念给了全家人听。"

有了这样的体验，笔下能不出"彩"？确实，采访是写作的基础。没有深入细致的采访，要想写出生动的文章，那是奢谈。

不过，光有深入的采访，恐怕还远远不够。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杨振武夸我是"快手"。这话，让我汗颜。

其实，我写稿子非常吃力。以前在报社编辑部办公时，晚上遇到写稿子思路不畅，总爱绕着门口那棵大松树转圈圈。有时候会一连转上一两个小时。

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功底不够，写作技能有待提高。拿《热血铸雄关》来说，整整写了一个半月，前后改了 6 稿。现在看来，也顶多只能说是成品，远远谈不上精品。就这，文章的题目还是别人"赞助"的。为了起个像样的题目，我请教过人民日报甘肃站的李战吉站长、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张毅编辑、农民日报总编室的瞿长福主任等十余人，最后还是经济日报农村部的高以诺主任为我圈下了现在这个题目。

大学上新闻写作课时，谈到采访与写作的关系，老师说“七分跑，三分写”。因为有多次写稿碰壁的体验，对老师的这个观点，我一直不敢苟同。采与写，如果硬要按比例划分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五五分。因为采访到的一切，毕竟是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无论新闻事件多么让你感动（或是你的见解多么高深），如果不能通过文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恐怕一切都是枉然。

刚到人民日报社不久，一次在食堂吃饭，正好和时任总编辑的范敬宜同桌。范总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说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记得当时范总用指头在桌上写了4个字：敬惜文字。

说到“敬惜文字”，范总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告诉我，他的任何一篇稿子都经过了反复修改，就是写一篇小消息，他也不轻易放过。《留给后代碧水蓝天》这篇消息不足500个字，他说他从晚上10点钟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了次日凌晨5点多钟，先后换了7个导语。

微观与宏观

写下这个插题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位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农村组的老组长黄彩忠，另一位是人民日报农村部的老主任李克林。

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对农民外出打工还存有偏见，认为盲流搞乱了城市，搞乱了交通。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农民农民，种地为本。”1994年前后，局部地区粮食生产出现了滑坡现象，当时为赶时髦，我写了篇稿子《走，回家种地去》。

稿子临上版前，上夜班的黄彩忠同志打电话找我，他说：“单就这篇稿子来说，符合当前的政策，写得也不错。不过，你的观点我不赞同。我是农村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我认为，如果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那么，中国农民就永远富不起来。这篇稿子你是不是拿回去再考虑考虑？”

当时，由于自己对农村问题知之甚少，老黄的这番话，并没有真正打动我。我低着头没吱声。老黄叹了口气：“也许过几年，你会后悔发了这篇稿子。”

此后，随着对农村了解的加深，尤其是在农村挂了两年职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老黄当时的教诲是多么的中肯，而自己当时又是多么的浅薄。这件事，让我以后在写稿子时，多了一份清醒！

确实，用一个极端例子来说明一个观点，或图解一项政策，并不难。但这种微观的真实，放在宏观背景下去考量，往往未必真实。所以，作为一个有道德良知的记者，在取舍新闻时，绝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既要把握微观真实，又绝不能忽视宏观真实。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的统一呢？写到这里，我想说说李克林同志。

李老是人民日报原农村部的老主任，延安时期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我到人民日报工作时，李老已经退休了。1995 年我写了篇反映农民种棉碰到众多“沟坎”的文章——《听俺唠唠种棉经》。文章刊出不久，一位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老太太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篇稿子离农民比较近，好读。但她同时指出，文章还可以写得更全面一点。她说：农业增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你文章中提到的农民种棉不增收这个情况，除了文中提到的“政策障碍”，恐怕还有“科技制约”这个因素。她说：文章只有全面、客观，才能使读者信服。她告诉我，她收集了不少农民依靠科技致富的文章，可以推荐给我。第二天，我便收到了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里面共有 37 篇文章，还有一封短笺，署名“李克林”。

此后，我经常得到李老的指点。1999 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开专栏《下乡手记》。其中有些文章因为比较尖锐，受到被批评单位的非难。这时，李老又给我写了封长信，勉励之意殷殷。记得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文革’中，迫不得已写了些偏离实际的新闻。直到现在，我都后悔得不行。你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记者，我的原则是，宁可不做官，宁可挨批评，决不再说假话。”

2000 年春节，我和人民日报经济部负责农村报道的何加正、江夏到李老家拜年。当时李老已不能下地走动了，她倚在轮椅上忧虑地对我们说：“听家里的保姆讲，现在农民的负担重得很，有些基层干部作威作福很不像话。这样下去，老百姓怎么会拥护我们呢？这些问题，你们跑农村的应该好好反映一下呀。如果连咱们都不正视这些问题，还有谁替老百姓说话？”

现在我们再来回答刚才的那个设问：怎样才能做到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的统一呢？前提就是：像李老那样，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人做文！像李老那样，用拳拳之心去爱民！

话题再回到《热血铸雄关》的采写。克州是有名的“拥军模范州”。起初，我的着墨点是，这些年来地方如何拥军、如何为部队解决后顾之忧。边界走了一圈之后，尤其是有了“与鼠共眠”的经历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边防战士、守边员在那样的环境中为国守边关，作为我们的地方政府，作为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任何一个人，为他们做再多的工作，也是应该的！于是，我的报道的主调转向了那些守在边界上的最可爱的人。

记得离开边防六连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为了不打搅战士们，我们特意起了个大早。谁知还是走漏了消息。战士们列队站在营房门口为我们送行。晨曦照着战士们那一张张被高原的风霜打磨成的黑红色的脸膛，他们身后的山坡上用鹅卵石镌着几个硕大的字：“祖国在我心中”。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该怎样做记者，我明白了许多许多……

附： 热血铸雄关——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军民戍边纪实[1]

王慧敏

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7个小时过去了，满目除了山还是山！连绵起伏的山峰似乎永远没个尽头，山体也永远是那种单调的灰黄色。

终于，在转过又一座山峰后，眼前豁然开朗，一块足球场大小的草地突兀横在眼前，草地左侧山体上几个白色大字耀眼夺目："祖国在我心中"。草地尽头山的褶皱里一排房舍若隐若现。玉其塔什边防连到了。而再往前走呢，不到1公里，便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线了。

玉其塔什位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境内。克州素有"祖国西陲第一州"之称。这里地处"万山之祖"的帕米尔高原，山地面积占全州总面积90％以上。

这是一块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土地：境内高峰林立，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15座。山顶常年戴雪，积雪与冰川厚度达百米以上。这又是一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圣土，全州边境线长达1170公里。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战略位置，使克州处在新疆反对民族分裂斗争和国际反恐斗争的前沿阵地。几十年来，克州军民携手并肩，生死与共，在千里边境线上谱写着一曲曲卫国戍边的不朽乐章。

"一脚踏下去，雪齐胸深。想再迈腿，必须先伏下身把前面的雪压平。走不了几步，就筋疲力尽。"

8、9月间，山下还是30多摄氏度的酷暑，然而，车到玉其塔什边防连，一跨出车门，宛如跌进了冰窖。营房四周的山体上白雪皑皑，站岗的士兵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这里海拔3400多米。

穿上军大衣，仍觉寒意刺骨。指导员段增福说："在这里当兵，一年四季离不开大衣。冬天气温一般都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呐。到了严冬，常常连温度计的水银柱都冻裂了。每年的9月中旬这里就开始下大雪，一直要下到第二年的5月底。"

[1] 《人民日报》，2003年11月4日第1版。

段指导员指着外面陡峭的山峰说："每年新兵入伍，连里给新兵上的第一课是辨识营房周围的标志物，譬如：电线杆在什么方位，峡谷口哪块岩石突出，路傍着哪座山峰走等。因为到了冬天，一切都被埋在了雪下面，不少沟壑被旋起的大雪填平，如果不熟悉地形，一脚踏进了深沟，那肯定是灭顶之灾。"

厚厚的积雪给巡逻、值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冬天战士们从一个哨位巡逻到另一个哨位，1 公里多的路，往往要走上几个小时。"严格地说，那不能称得上是走，实在是连滚带爬。"二排四班战士谭文涛诙谐地向记者形容。他说："一脚踏下去，雪齐胸深。想再迈腿，必须先伏下身把前面的雪压平。走不了几步，就筋疲力尽。"

一次，一位战士下岗归来，正碰上大雪。走到离营房不到 1 公里的地方，再也走不动了。焦急的战士们沿路寻找，发现他已如雕塑般凝固在茫茫雪原上——双腿呈弓步状伏在雪地里，臂弯里紧紧抱着枪，眼睛直视着前方。这位共和国的卫士和帕米尔高原永远融成一体了。

大雪，给战士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困难，非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这里，一年有 9 个月大雪封山。如果在封山前把给养全运进来，容易霉变。而封山之后再运呢，难度可就大了：车辆不通，从粮食、蔬菜到油盐酱醋全靠马驮人扛。年年冬春全连都要为运给养和冰雪展开一次次较量。今年 3 月，副指导员李运敬带 4 个战士用马匹从团部往回拉给养。走到离连部 10 公里处的冰大坂时，面对硬邦邦滑溜溜的冰面，战马怎么也不肯过。他只好和战士们把给养从马背上卸下来，一箱一箱抱过去。在运最后一箱醋时，他脚下一滑人便朝悬崖下滚去。眼看就要跌下百丈悬崖，两个突起的冰柱子帮了大忙，把他卡在了中间。他虽然被撞得头昏眼花，那箱醋却仍被他牢牢抱在怀中。记者问他："当时那么危急，你怎么不把醋扔了?"李运敬说："这全是下意识的。你不知道，这里冬天解决吃的问题有多难……"

几年前的冬天，连续下了 40 多天大雪，所有的交通都中断了。团部想尽了办法也没能将给养送进来。先是没了蔬菜，战士们只好把原先扔在伙房外的烂萝卜和大白菜的菜根捡回来，洗洗切切当菜吃。后来连这些东西也没了，全连就剩下了一袋米和一瓶香油。没办法，连里一位参谋带着两个战士到雪地里套呱呱鸡来为大家改善生活。谁知遇上了雪崩，3 个人全被埋在了几十米厚的雪堆里……

连领导告诉记者，战士们从当兵走进大山那天开始，一直到退伍，没有谁离开过大山一步。因为最近的居民点离这里也有 200 多公里。除了营房和哨位，终日面对的就是那无边无际的群山和茫茫雪原。

长年累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战士们的心态如何？入夜，记者住进了 2 排 4 班战士宿舍。来了客人，战士们都很兴奋，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的军大衣盖在记者身上，床上一下子多了 5 件军大衣。班长石磊来自陕西榆林，这位长得又高又壮的小伙子，在玉其塔什已经 5 个年头。他说："我们村附近有一个煤田，这些年，村上不少人家靠搞运输过上了好日

子。父母也想让我早点退伍回去搞运输，连拖拉机都买好了。我也不是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可只要一站到界碑前，这个念头就无影无踪，只觉得热血沸腾。我们连长说过，'选择了边防就是选择了奉献'这句话，已经成了我们所有戍边战士的座右铭。只要祖国需要我，我会无怨无悔地干下去。"

熄灯号响了，在战士们均匀的鼾声中，记者也进入了梦乡。睡梦中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耳畔抓挠，记者下意识一挥手，只听"吱"地一声，一个东西撞在墙上——原来是只老鼠。快天亮时，觉得又有什么东西钻进了被子。记者紧张得赶紧抖被子，入侵者也紧张起来，上下乱窜——又是只老鼠。睡觉前，石班长说这里跳蚤多，建议记者将衣服脱了吊起来。这下可糟了，那只左冲右突跑不脱的老鼠毫不客气地在我的腿上、胸口抓了几道血印子。打开手电一照：地上有 20 多只老鼠在乱窜。早上，当记者心有余悸地和战士们说起当夜的遭遇时，战士们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石磊开玩笑："来了客人，老鼠也想凑热闹呗！"他说："冬天草原上没了吃的，那时，老鼠才多呢。"

如果说玉其塔什边防连的官兵们该诅咒大雪的话，那么木吉边防连的官兵最该诅咒的恐怕是这里的海拔了。

海拔还不到 4500 米，记者已经感到头疼欲裂。这里是克州的木吉边防连。

木吉边防连守防 258 公里，平均海拔 4800 米。战士们巡逻，人在山上走，云在山下游。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路，靠攀岩而行，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巡逻一趟下来，要十几天。这里人迹罕至，官兵们不得不经常风餐露宿。该连防区的 9 号点位，海拔超过了 5000 米，这里有三个梯形台阶，每个台阶 200 多米长。战士们巡逻到这里，每向上爬十几米就要头朝下脚朝上躺下休息一次。因严重缺氧，官兵都要用背包绳将头缠紧。600 多米的距离，每次要爬上四五个小时，尽管是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冬，衣服也要被汗水浸个透。最要命的是这里的天说变就变，而且一时几变，风、雨、雪、冰雹随时会来。连领导告诉记者：尽管如此，每次巡逻官兵都争着要去这个点。

在这里，守边军人奉献出的不仅是青春年华，也在奉献他们的健康和亲情。克州所有的边防哨点都在海拔 3000 米以上，阳光的强烈紫外线穿过稀薄的空气，在银白的世界里交叉反射，极易将人的肌肤灼伤。在这里，不消几天，皮肤就由红变黑，层层掉皮。

如果不是他亲口说，很难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位"老年人"只有 39 岁。黧黑的面孔上，一道道的皱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头发基本上全白了。他就是布伦口边防派出所所长阿里木。阿里木在布伦口边防派出所已经工作了 18 年，巡逻执勤的足迹绕地球一周有余。他很乐观："现在城里不是流行染发嘛，这个钱，我就省了。"他说，在边防连队呆上几年，很多人的头发都会变细、变白。同时，许多人会轻重不同地得上心律不齐、心肺肿大、记忆力衰退等高原病。

在木吉乡，记者听到了一个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的真实故事。边防派出所艾力木江的妻子阿依努难产险些丢了命。妻子难产时，艾力木江正在哨卡值勤。儿子满月后，妻子带上

儿子去看望丈夫，却又正赶上山洪，车子无法通行。阿依努对边防大队领导讲："能隔河看上丈夫一眼，让他听一听孩子的声音，我就知足了。"于是，大队长通知艾力木江准备好对讲机等在对岸。妻子到时，夫妻对岸互望，竟无语凝噎。突然，怀里的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妻子激动地用对讲机喊道："你听见了吗？这是咱们儿子的声音呀！"泪从艾力木江脸上流了下来，在场的官兵们无不动容。

"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条件再差再苦，也得有人守。我老了，还有儿子、孙子呢！"

斯姆哈纳边防连连长杨福全带着两名新战士在大山里艰难地跋涉。离冬古喇嘛山口还有十几里地，可他们实在走不动了。离开连队已经 11 天了，按照原计划，他们该在 4 天前到达冬古喇嘛山口。一场不期而至的大暴雪阻断了他们的行程。两天前，带来的干粮、水已悉数告罄。更糟的是，一匹战马摔伤了腿，只能牵着它慢慢地挪动。

如果冬古喇嘛山口的守边员已经不在那里，后果将十分可怕。因为离下一个打尖的地方还有 5 天路程。人如果 7 天不吃不喝，那意味着什么？

不过，战士们心里明白，守边员在的可能性很小。按照约定，如果 4 天前巡逻的战士还不到，守边员就可以带着牛羊转场。

冬古喇嘛山口的守边员是一位 60 多岁的柯尔克孜族老大娘。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确切名字，因为她长期守在冬古喇嘛山口，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冬古喇嘛老大娘"。

抱着一线希望，大家慢慢朝冬古喇嘛山口挺进。随着夜幕的降临，气温更低了，大家身上残存的热量似乎已消耗殆尽，步伐也更加迟滞。而那群已经尾随了他们整整一天的狼，却越逼越近，绿莹莹的狼眼仿佛伸手可触。边境不能轻易开枪，大家把匕首攥在手里，背靠背朝前慢慢挪。

"前面有火！"战士小王高兴地大叫起来。近了，近了，大家看清楚了：那位不停地往火堆里添柴的，正是冬古喇嘛老大娘。

原来，面对突降的大雪，老大娘担心战士们巡逻时碰到意外，冒着牛羊被大雪冻毙的危险，毅然留了下来……

柯尔克孜以"山父水母"民族自誉，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克州 1000 多公里的边境，有大小通外山口 256 处。为了守好这些山口，20 世纪 60 年代初，州上决定选出优秀青壮年担当守山员。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没有路，没有电，烧牛粪，住地窝子，基本上是一种半原始的生活状态。但一代又一代的守山人甘愿忍受寂寞，忍受清贫，与边防战士一起用热血和青春在帕米尔高原铸起了一道道雄关。

1962 年，刚新婚不久的艾山主动要求到环境恶劣的冬古拉守边。艾山和妻子帕夏尔古丽自己动手制作，沿边境线埋下 200 余块刻有柯文"中国"字样的砖块和其它标志。1992 年，组织上考虑到艾山老人年岁已大，动员他一家人搬到县城附近定居，并为他修建好包括住房在内的生活设施。但老人谢绝了，他说："时代再发展，国家不能没边防。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条件再差再苦，也得有人守。我老了，还有儿子、孙子呢！"近年来，艾山两个儿子已

承担起父亲的守山任务，每当部队官兵到冬古拉时，兄弟俩轮流协同官兵巡逻执勤，艾山则和老伴为官兵忙活后勤。

库鲁木都山口守山老人莫依丁已年过70岁，在40年守山戍边中，老人曾6次救起冻伤、摔伤官兵23人。一年深秋，边防连长郭汉民带队巡防遇暴风雪，官兵被困两昼夜，郭汉民和3名战士的脚严重冻伤，跟官兵一起巡逻的莫依丁解开自己的上衣，将冻伤官兵的脚一个个轮流放在自己的胸口去暖。

在克州千里边境线，像冬古喇嘛老大娘、艾山、莫依丁这样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义务守边的柯尔克孜牧民，比比皆是。祖国西陲第一村——斯姆哈纳村86岁的巴鲁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国家守好门户，是我们柯尔克孜人的责任，遭点罪，吃点苦，我们无怨无悔。"

"军民关系就好比一个人，经济是人的两条腿，国防是人的脊梁。没有腿，人走不了路。而没有了脊梁，人就连站起来也困难。"

克州驻军的前身是延安时期的老模范359旅，这支由王震将军领导过的军队，正是60年前双拥运动的发起者。60年的薪火相传，使"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思想，在克州各族群众的心中，深深扎根。

克州的军民关系，是以卫国戍边的共同信念为基础的。克州历届党委、政府明确提出：不重视边防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不关心边防的干部不是好干部，边防意识不强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

为了边防事业，克州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宁苦自己也不苦部队。克州州委书记王新怀讲得掷地有声："军民关系就好比一个人，经济是人的两条腿，国防是人的脊梁。没有腿，人走不了路。而没有了脊梁，人就连站起来也困难。"州长买买提艾山更是坦言："只要部队有困难，州上哪怕不发工资也必须解决。"

克州是个吃国家财政补贴的贫困州，地方财政收入自给率不到10%，发不上工资是常有的事。然而，近5年来，州、县（市）为驻州部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近千万元。乌恰县年财政收入只有四五百万元，然而，5年来，他们共投资260多万元为驻县部队建了办公楼、住宅楼、武器库、供排水设施。阿合奇县出资60多万元为4个边防连安装卫星电话，并规定：官兵打电话一律免费。

为了让战士们安心守边，克州专门制定了《自治州军人抚恤优待办法》，明确提出："选送好入伍的，服务好在伍的，安置好退伍的。"1996年以来，全州做到了5个100%，即征兵任务完成100%，义务兵奖励率100%，义务兵优待面100%，退伍兵安置率100%，优扶对象定补面100%。全州多年来没出现一例退兵。

"再穷不穷军烈属，再难不难革命功臣。"全州每年发放优抚金超过百万元。近几年，就业压力不断加大，但退伍军人的安置始终得到了保证。从1996年以来，全州共安置复员军人1080人，不仅本地子女当兵复转如期如数安置，并且为其他省区367名退伍留疆人员安

排了工作。

为了边防事业，克州广大群众视子弟兵如同自己的子女，备加关爱。大雪封山部队生计有困难时，驻地群众就是自己不吃也把最好的食物送到部队；部队缺草料，群众宁让自家的牲畜挨饿，也会把草料送给部队；官兵巡防到任何一个点，牧民都像迎接亲人一样招待他们，把最新的被褥让官兵铺盖，让官兵睡床而自己的家人却睡地铺；不少牧户成年累月舍不得杀只羊，但发现巡逻官兵脚冻了，会毫不犹豫地宰羊，用热羊血为战士洗脚，用热羊皮为战士焐脚……边防七连连长杨福全感慨地告诉记者："驻军和地方群众早已成为一家人了，我们有事情就直言相告。群众家中遇到婚丧嫁娶，都会通知连队，开口就是'家里有事办，回家来看看吧'。"

"爱民情不钟，愧当子弟兵。"

斯姆哈纳是一个位于中吉边境的小村。忆起往昔的岁月，村民委员会主任夏木沙紧锁眉头："以前，村民祖祖辈辈靠天养畜。年年夏秋村里人都得赶着畜群不停地追撵水草。到了冬天，草料不够，哪一年都会有牲畜饿死。"

说起眼下的光景，夏木沙来了精神，他指着房前屋后的一畦畦农田说："去年春天，驻军7连帮我们在定居点周围修了塘坝，引来了水，教会了我们种洋芋、青稞。今年春天，战士们又帮我们建了个小型畜产品加工厂。我们的日子和以前相比，真是两重天。"

克州军分区司令员赵华业说："无论什么时候，部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但是，军政军民关系也必须与时俱进。新时期，我们既是守边勇士，也是经济建设的勇士。"

据悉，仅1985年以来，部队官兵参加地方重点建设48项，投入军力150多万人次，出动车辆机械8万多台次。1996年在南疆通信光缆建设中，驻军十一团承担了50公里挖沟铺缆任务，官兵每天苦干14个小时，仅用20天就铺设完毕。乌恰县武警中队十多年如一日致力于驻地的绿化，在乱石戈壁上植树10多万棵，被评为"全国部门造林400佳"。去年，自治州启动万亩葡萄园基地建设，州军分区官兵出动6000多人次参战，司令员赵华业、政委魏秉贤等军分区领导身先士卒战风沙，斗寒暑，开荒4000余亩，种植葡萄2万多株。

为扶贫帮困，驻军官兵情洒高原。从机关到边防连，层层抓扶贫工作，人人有扶贫任务，级级有扶贫对象，扶贫人口累计上万人，捐款捐物上百万元。魏秉贤说："'爱民情不钟，愧当子弟兵'已成为驻州部队官兵的行为准则。"

为了人民利益，部队官兵危难之处显身手。哪里有险情，最早赶到的是部队。1996年至1998年，阿图什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23次，驻军部队出动官兵1.4万人次，出动车辆8000台次，抢救物资2.5万余件，价值6500万元。1999年8月2日，暴雨成灾，阿图什托卡依水库决口80多米，部队、武警官兵3500多人参加抢险，56名官兵组成"敢死队"跳进决口，最终让洪水低头保住了水库……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通过几天的采访，记者对这句人人耳熟能详的

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生死与共的军民关系，为克州千里边防线铸造了一道任何敌对势力都无法逾越的雄关；也正是这种生死与共的军民关系，为克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这个新疆昔日的经济小州，如今正向经济大州迈进——连续 5 年，克州经济发展速度位居全疆前三位，全州农牧民人均收入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与 1980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22.3 倍、108.7 倍。

解放军报·惊心动魄35分钟
成功追降价值上亿元人民币样机[1]

卢锋、郭凯、谭洁、张金玉

【题解】这篇通讯获得第15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记者采用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将一幕幕精彩的片段像放电影一样展示在读者眼前，用语简洁有力，叙事清晰流畅，张弛有度，引人入胜。

今年7月1日13时40分，成都某机场被紧张气氛所笼罩。塔台上，机场边，飞机设计单位领导、空军某试飞大队领导、飞机总设计师、科研技术人员……数百人一齐把焦灼的目光投向骄阳似火的万里晴空。

此刻，一架失去动力的战机在万米高空正以极大的俯角高速向机场滑降而来！

这不是一架普通的飞机。它是我国正在研制的一种新型战机的科研样机，价值上亿元人民币。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飞行。它是该型飞机在定型关键阶段的一次试飞，结论对飞机改进意义重大。

这更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飞机在12000米高空试飞，因意外情况燃油漏光，飞机发动机停车。为保全科研样机，试飞员决定从距机场20多公里远的地方空滑追降。

下落航线与跑道呈70度夹角，下落速度400公里/小时左右，一旦失误，飞机就可能冲出跑道坠毁。

惊天一落，危险空前。驾驶战鹰追降的，就是空军某试飞大队副大队长、特级试飞员梁万俊。

"近了，近了……"转眼间，梁万俊驾驶战机俯冲直下。地面上，所有的人一齐屏住了呼吸。

13时44分，战鹰陡然降落，在进跑道450米处接地。在接近跑道的一刹那，机头一昂，"哧！"轮子在水泥跑道剧烈磨擦，划出两条刺眼的火龙！

[1] 《解放军报》，2004年11月8日。

500 米、800 米、1000 米…… 飞机一气冲出 1700 米，在距离跑道尽头 300 米处戛然停住。

“成功了！”欢呼声震动机场。梁万俊走下座舱，飞机总设计师与他紧紧拥抱，激动地说：“你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

惊天一落救新鹰！

这一落，挽救了价值上亿元的科研样机；这一落，为试飞员处理类似险情创造了成功先例；这一落，飞出了新机优异的空滑性能。

让我们把时钟倒拨 35 分钟。

这一天 13 时 09 分，梁万俊驾驶着该型国产科研样机跃升到 12000 米高空。当他按照预定的科研试飞计划刚刚做完一个规定动作后，突然发现油泵指示灯急剧闪烁。紧接着，油量表指针一路下跌。两分钟之内，指针指向“0”刻度。

梁万俊报告：“发动机空中停车！”

一级空中特情！空军相关条例规定：此时，作为试飞员梁万俊可以视情做出不同选择——跳伞或迫降。

面对这种极为罕见的危险情况，跳伞无可指责，只需 0.01 秒，便能远离危险。但是，凝聚科研人员无数心血的战鹰就会坠毁，故障原因就难以准确查找，新机型的改进就缺乏依据……没有任何犹豫，梁万俊便做出抉择：危险再大，也要尽一切可能把科研样机保住。

决心定下，梁万俊很快镇定下来，他娴熟而机敏地调整飞机的位置和高度，以争取每一秒的时间。

飞机像大铁砣似地向机场上空逼近。机场上，所有应急车辆全部到位，所有人的心都吊到了嗓子眼。指挥塔台里静得让人窒息，只听见指挥员下达指令的声音：“保持好飞机状态，控制高度、速度，做好迫降准备。”

梁万俊心里很明白，要想将飞机空滑回去，必须准确地通过高度来换取速度，用势能来换取动能。他根据地面指挥员的命令，随时判断飞机状态，修正速度和高度偏差。

飞机滑到机场 1100 米上空。梁万俊下降飞机高度加入航线，在跑道头 3 公里，放起落架，操纵飞机对正跑道，100 米、50 米……

“准备迫降！”“明白！”天地间，惊人地默契。

于是，机场上出现了惊心动魄的成功一落！

英雄壮举绝非偶然。仰望蓝天，人们看到了梁万俊出生入死、挑战试飞极限的一道道闪光航迹。

1998 年，拥有丰富飞行经验的梁万俊，从成空某飞行团副团长的岗位上来到空军某试飞大队。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群体，承担着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战机科研试飞重任，曾有多名试飞员壮烈牺牲。梁万俊自觉学习老一辈试飞员迎难克险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每次执行高

难度高风险试飞、参加飞行表演等重大任务，都主动请缨。几年来，他先后自学了飞行力学、空气动力学、航空发动机、自动控制、航空电子等多个学科专业，成为熟练驾驶多种机型的高素质试飞员。在试飞中，他先后遇到惯导故障、航电故障、供氧故障等险情数十次，都以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飞行技术化险为夷，圆满完成了国产最新型战机火控系统定型、某型系列战机鉴定、国产某新机首飞等数十项重大科研试飞任务，先后荣立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4 次。

此次，梁万俊成功处置国产某新型科研样机重大特情，成都军区空军党委为他报请一等功，并作出向他学习的决定。军委首长称赞他是“一个思想、技术双过硬的优秀试飞员”。

解放日报·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1]

吉方平

【题解】2004年，英国《前景》月刊(Prospect)为纪念创刊100期，选出100位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随后，国内的一些报刊也起而效法，掀起了评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浪潮。针对这种现象，《解放日报》评论员吉方平撰写评论《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舶来”的概念进行了尖锐批驳，指出“‘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貌似“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警示人们在“多元化”的态势中保持冷静和清醒的认识。文章发表后被广泛转载，产生重大的社会反响，从而有效地遏止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浪潮。

一个舶来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被接了过来，成为炒作一时的衔头。先是出现在一些出版物上，进而挂在网上、见于某些报刊。因为英国的一家《前景》杂志评出了他们的100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的杂志也来效颦，推出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引出舆论哗然。

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按照一种漂亮的说法，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具有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识分子的“意见”，从来是由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决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一部中国现当代史证明，只有当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走、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时，知识分子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历史

[1] 《解放日报》，2004年11月15日。

和现实中，出现过一些貌似“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他们的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其实并不“独立”，也无“批判”。这一点奥秘，今天已是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了。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把“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同时又把我们的社会说成是“万马齐喑”，广大人民群众只是“普遍失语的沉默羔羊”，唯有他们才是“众醉独醒”，唯有乞怜他们才能“代言”。这不仅是对当今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和舆论现状的武断错判，而且是一种新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在一笔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和所长，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振聋发聩的意见”，成为公众的“意见领袖”。于是“公共知识分子”变为“万能知识分子”，一些专家学者包打天下，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领域中横冲直撞；另一些人则再也不甘寂寞，不屑于做学问，成为电视明星、媒体人物，“公共知识分子”又变成了“作秀知识分子”，成为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比肩的时髦人物。十分明显，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无疑是要把知识分子引上邪路。

类似“公共知识分子”论这样的概念，只是一点噪音和杂音，并不能影响我们社会舆论的主调，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面对着一个多元化的态势，关键是要清醒、坚定，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在林林总总的思潮前迷失方向。

光明日报·培养深爱国家和人民的当代大学生[1]

中宣部、教育部联合调研组

【题解】2005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的复信中，对学院大二学生李强的《乡村八记》和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人们在关注这名当代大学生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培养他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日，中宣部、教育部组成联合调研组对该院进行的调查表明，李强的成长与他所受的新闻教育密不可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坚持"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方针，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道路，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建立了教师与学生的沟通渠道、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课堂教学、把课堂教育延伸到社会基层、认真安排学生专业实习、上好社会实践这门必修课、将开展社会实践变成学生自觉行动，在提高新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本报今天特别刊出这篇调研报告，期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走的道路，对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人才培养有所启迪。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几年坚持"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院方针，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道路，在培养新闻专业人才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去年4月28日，温家宝总理对该院学生李强的农村调查《乡村八记》做出批示，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也对新闻教育事业作出明确指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于2002年4月，现有在校生362人，其中硕士、博士生176人；教师23人，另有兼职教授7人，校内双聘教授3人。学院注重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新闻与传播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知识，引导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手抓认真读书，一手抓深入社会实践，并努力使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1] 《光明日报》，2006年2月7日。本文"题解"为原文编者按。

1. 建立教师与学生的沟通渠道。

学院在办学实践中，紧紧抓住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这两个基本环节，让学生在学习新的知识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刻内涵，使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中坚。

范敬宜院长在讲新闻评论课时，对经常被学生们错误理解的“喉舌”、“导向”、“框子”等，以旁征博引的比喻，做通俗易懂的解释，对中西方文化在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析，使学生们悟出其中的道理。他要求教师不但要教知识，而且要注意为学生寻找正确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正确认识问题的方法。通过这些入情入理、循序渐进的讲解，把学生们带出了认识的误区，他们对“以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作党和政府的喉舌”等有了正确的认识，读党报、研究党报的人多了，有的同学还把研究中央党报作为毕业论文的课题。

学院要求教师把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专业课的讲授中，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贴近的语言，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概念。为了解开学生对“西方新闻自由”、“民主”、“自由化”的认识疑团，王君超老师采取谈心举例或网上交流的方式加以疏导。全院教师都始终把教书与育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进行深入探讨。他们研究出“学生当运动员，老师当教练员”的教学模式，让师生们同在一个场上训练，共同参加“比赛”。由于把教学相长的理念贯穿在整个教学当中，使老师与学生真正成为教育与求知的共同主体，对一些敏感问题师生们一道进行分析，对一些社会现象共同进行探讨。教师为学生的坦诚而感到欣慰，学生们把教师当作倾诉真实思想、能够解疑释惑的朋友。

实践是新闻教学的基础，为了让学生在研习专业课期间尽早接触新闻业务，他们通过组织“中外名记者研究”课和“传媒业界前沿讲座”等形式，从新闻单位聘请有丰富经验的记者、编辑讲学，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学院还与中央主要媒体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加强实践基地建设，采取“走出去”的方式，带领学生到中央党报实习，参加编辑部门的编前会、策划会等，使同学们体会到记者所担负的责任，同时做好了参与社会实践的思想准备。

2.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课堂教学中。

新闻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实践是新闻工作者事业成功的力量与源泉；深入社会实践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体现。但是理论学习对于指导实践，使学生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近两年来，学院对教学计划做了科学的调整，一方面使通识课占到约50%的比例，在拓宽基础的同时通过新闻史论课，夯实基本专业理论基础。为实现这个目标，李彬教授给学生开列了一百本博通类和专业类的参考书目，对有的书还要求学生写出读书笔记，开展课堂讲评和讨论，对学生起到了打好理论根底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激发了学生深入基层，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热情，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实情，把握真知。另一方面，抓住学生可塑性强、阅历浅、易激动、有热情的特点，把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在

业务教学当中，让学生在循循诱导与潜移默化中悟出深刻的道理，立下做人的标准。讲授新闻史和新闻理论课的教师围绕新闻事业传承问题设计了一些课程：讲史实，为学生理清中国乃至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讲传统，激励学生继承发扬党的新闻事业优良传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讲责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新闻观，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范敬宜院长提出：教学中要举实例、说实话、动真情。例如，在穆青同志去世的第二天，他在讲授新闻评论课时，以亲身体会，讲了穆青同志为党的新闻事业倾注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精神，讲穆青同志怀着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写报道的情况，讲他与吴吉昌等普通群众难以割舍的情谊……同学们含泪听完了这节课。课后，同学们就自发地组织了一次主题团日活动，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踊跃，并纷纷写下体会文章，汇编成“专刊”。一周后，一本42页的文字材料“做人民的好记者——追忆穆青同志”，便摆在范敬宜院长和老师们的办公桌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份材料后，在电话中讲：这份材料非常好，把政治思想工作生动地贯彻到新闻教学中去了。想不到清华大学学生的观念能和我们这样接近，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虽然字面上没有讲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讲的都是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活动应该推广。

3. 把课堂教育延伸到社会基层。

为了使学生真正从书本中跳出来，实现“三深入”，学院老师把“新闻采访写作”课从课堂延伸到社会，让学生到社会最基层认识生活，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感情；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捕捉新闻，提高新闻写作的能力与水平。他们有时把“五一”、“十一”长假利用起来，安排学生到外地上新闻写作课。出发前，教师们做好充分的案头准备，并聘请有经验的记者作辅导员。时间紧，他们就在列车上、牧民的毡房里讲课，到农村、工厂、学校等群众的现实生活中选择报道题目。仅两年时间，他们就组织过八次这样的现场教学。学生们写出许多有关太行老区、罗布泊沙漠、红军长征路、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报道。为了让学生练习独立采访写作的能力，他们以“放单飞”的办法，让学生自己寻找线索采访，晚上集中上课，对学生捕捉到的新闻线索或写出的稿件逐一讨论，请记者辅导员做分析点评。学生们说，在深入社会的实践中写新闻，拉近了我们与群众的感情；这样的新闻写作课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个具有独特创意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受到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和教育专家的充分肯定，2004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

学院副院长李希光对课堂教学进行改革，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从当“教师”到做“教练”，从“学而知之”到“惑而知之”，积极尝试了对话式练习、作坊式教学、大篷车课堂、情景模拟教学、案例教学、新闻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同学们感到，老师把书本上的知识讲活了，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自己不仅融入了现实生活，同时也进入了新闻记者的角色。

4. 认真安排学生专业实习。

学院与中央新闻媒体合作，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

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积极支持，为学生设立了良好的实习平台。在每次专业实习中，80%以上的同学都安排到主流媒体实习。学生们虚心求教，编辑记者们耐心指导。经过三个多月的实习生活，同学们体会到新闻工作者所肩负的责任，他们按照学院要求在实习日记和总结中，写出自己的感想和切身的体会，记录了在基层采访中的所见所闻。

专业实习提升了学生的新闻业务水平，缩短了与新闻单位感情上的距离，使学生专业实战能力明显提高。新闻1班的36名同学在实习期间就发表中文稿件346篇，英文稿件57篇。仅在人民日报实习的8位同学就发表各类消息、特写、通讯、评论等80余篇，其中30余篇作为重头稿件在显著位置发表。

为进一步扩大学生视野，培养熟悉境外传媒机构的国际化人才，最近他们还与境外媒介机构进行探索性的合作，如选派学生到《南华早报》、路透社北京分社和韩国放送公社(KBS)等媒介机构实习。

5. 上好社会实践这门必修课。

做新闻要有一种社会责任，作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更要有对国家、对人民一颗真诚的爱心。学院认为，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基层，这是使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的重要方式之一。他们鼓励学生走向工厂、深入农村进行社会实践。学院明确提出本科学生在一、二年级期间至少参加一次暑期社会实践，并作为教学的必修环节，计入学分。

对于每一支社会实践小分队，学院都配备了教师或辅导员带队，院团委还对小分队干部进行专门培训，每一个支队都制定了完整的社会实践计划，其中包括：实践的目的、内容、预期成果、经费情况、食宿安排及突发事件的预案等。

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支教、调研和采访。新闻专业的学生运用专业技能，通过深入采访，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和采访对象，从而对社会的感悟更为深刻。

在社会实践地点的选择上，他们在强调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到条件艰苦、有代表性的中西部地区。社会实践小分队在对黑龙江知青农场、内蒙古某军营、湖北省利川农村中学和安徽金寨县的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的调研中，同学们看到了基层群众真实的生活；采访了默默奉献的各行各业的建设者；感受到加快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与使命……同学们说，这些是在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

2002年和2004年暑假，学院组织了6支社会实践小分队奔赴几个省进行社会实践，其中赴四川黑水和湖北利川的两支小分队，分别获得清华大学社会实践"金奖支队"称号，学院团委还被学校评为"社会实践优秀团委"。

6. 将开展社会实践变成学生自觉行动。

几年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坚持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开展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也成为学生自觉的行动。他们把寒暑假作为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的好机会。学院因势利导进行鼓励，假期中，一些老师与学生仍然通过打电话或电子邮件保持密切联系，有的教师还到学生实践地进行指导。学生返校时，带着丰硕的收获相互交流

调查报告、谈感想体会。学生们已经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生活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去年寒假，大二学生李强同学到晋中农村地区进行调查，写下了长篇农村问题调查报告——《乡村八记》。范敬宜院长对该同学的调查报告给以高度评价，他说："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能够利用短短的假期，如此深入地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写出这样一篇客观、深刻、翔实、生动地反映当前农村现状的报告，令人振奋，也令人深思。"老院长当晚把这份调查报告转给全院师生阅读，又赶印报送中宣部、农业部的领导同志和人民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后来又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汇报。温总理在回信中写道："《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当温总理的回信和《乡村八记》节选，在 6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后，全院师生深受鼓舞，认真学习总理的来信，深刻领会来信中关于"责任"与"四心"的论述，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走"三贴近"之路，把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搞得更好。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里，像李强这样的同学不在少数。仅 2005 年寒假就有几十名同学以不同形式进行社会调查。如大一学生陈天晗就到兰考县调查了一个焦裕禄式好干部的事迹，撰写了长篇报道《一个清华学生眼中的村支书》，在《河南日报》和《科技日报》等媒体上刊发。陈天晗同学开始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兰考调查的，他原先觉得现在农村不会存在焦裕禄式的干部了。但经过调查采访，他被这位村支书的事迹所感动，心灵受到震撼。他了解到了党的基层干部勤恳为民的感人事迹，看到了普通党员的光辉形象，从而更热爱我们的党和国家，更敬佩那些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党的好干部。这种思想的转变是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达到的。

新华社·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1]

张严平、田刚

【题解】这篇人物通讯获得2006年第16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播发后被120多家报纸刊用，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网等各大网站相继转载，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的事迹由此传遍万里城乡。全文内容真切，情节引人，真挚的情感、对人物细腻的观察以及传神的叙述，无不深深吸引和打动了读者，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新闻报道的上乘之作。

眼前这位苗族汉子矮小、苍老，40岁的人看过去有50开外，与人说话时，憨厚的眼神会变得游离而紧张，一副无助的样子，只是当他与那匹驮着邮包的枣红马交流时，才透出一种会心的安宁。

整整一天，我们一直跟着他在大山中被骡马踩出的一趟脚窝窝里艰难地走着，险峻处，错过一个马蹄之外，便是万丈悬崖。

傍晚，就地宿营，在原始森林的一面山坡上，大家燃起篝火，扯成圈儿跳起了舞。他有些羞涩地被拉进了跳舞的人群，一曲未了，竟如醉如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他嘴里不停地说着。"今晚真像做梦，20年里，我在这条路上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如果天天有这么多人，我愿走到老死，我愿……"忽然，他用手捂住脸，哭了，泪水从黝黑的手指间淌落下来……

这就是那个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在大山里默默行走了20年的人吗？

这就是那个20年中行程26万公里——相当于21趟二万五千里长征、绕地球赤道6圈的人吗？

这就是那个为了一个简单而又崇高的使命，在大山深谷之中穷尽青春年华的人吗？

我流泪了。

在这个高原的夜晚，我永远地记住了他——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苗族名字：咪桑。

---

[1] 新华社2005年6月2日电。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中国邮政史上的“绝唱”，他就是为这首“绝唱”而生的使者。

王顺友的话不多，却见心见肝。他说，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走邮路才来到人世上的。

马班邮路在正式文字中被定义为“用马驮着邮件按班投送的邮路”。在21世纪的中国邮政史上，这种原始古老的通邮方式堪称“绝唱”，而在木里人的眼里，这却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紧接青藏高原。这里群山环抱，地广人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只有9个半人。全县29个乡镇有28个乡镇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以马驮人送为手段的邮路是当地乡政府和百姓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全县除县城外，15条邮路全部是马班邮路，而且绝大部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

王顺友至今记得，他8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做乡邮员的父亲牵着马尾巴撞开家门，倒在地。“雪烧伤了我的眼睛。”母亲找来草药煮沸后给父亲熏眼。第二天清早，父亲说，看到光亮了。他把邮件包往马背上捆。母亲抱着他的腿哭。父亲骂她：“你懂什么！县里的文件不按时送到乡上，全乡的工作就要受影响。”

11年后，父亲老了，他把邮包和马缰绳交到了19岁的儿子手上，那一刻，王顺友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邮路启程，负责木里县至白碉乡、三桷亚乡、倮波乡、卡拉乡的马班乡邮投递，邮路往返584公里。

年轻的乡邮员第一次感受到了马班邮路的遥远和艰辛。他每走一个班要14天，一个月要走两班，一年365天，他有330天走在邮路上。他先要翻越海拔5000米、一年中有6个月冰雪覆盖的察尔瓦山，接着又要走进海拔1000米、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雅砻江河谷，中途还要穿越大大小小的原始森林和山峰沟梁。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饿了吞几口糌粑面，渴了喝几口山泉水或啃几口冰块，晚上蜷缩在山洞里、大树下或草丛中与马相伴而眠，如果赶上下雨，就得裹着雨衣在雨水中躺一夜。同时，他还要随时准备迎接各种突来的自然灾害。

有一次，他走到一个叫白杨坪的地方，下起了暴雨，路被冲毁了，马一脚踩滑跌向悬崖间，他想伸手去拉，也掉了下去，幸亏双双被一棵大树挡住。他摔得头破血流，眼睛和半边脸肿得没了形。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盼望着有个人来帮一下多好啊！可是除了马、邮件，什么都没有。

这些艰辛在王顺友看来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心头的孤独。邮路上，有时几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特别是到了晚上，大山里静得可怕，伸手不见五指，他能感觉到只有风声、水声和不时的狼嚎声。家中操劳的妻子、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儿女……此刻就会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脑子里转，泪水落下一行，又落下一行。于是他便喝酒，让自己的神经因麻木而昏睡过去，因为明天还要赶路。

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王顺友在这条马班邮路上或许早就坚持不住了。让他最终

坚持下来的，是这条邮路传达给他的一种神圣。

“每次我把报纸和邮件交给乡亲们，他们那种高兴劲就像过年。他们经常热情地留我住宿，留我吃饭，把我当成共产党的大干部。这时，我心里真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个少不得的人！”这是王顺友最初感受到的乡邮员工作的价值。

白碉乡乡长王德荣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的工作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白碉乡离不开你。因为你是我们乡唯一对外的联络员，是党和政府的代表。藏民们有一个月看不见你来．他们就会说：‘党和政府不管我们了’。你来了，他们就觉得党和政府一直在关心着他们！”这话让王顺友心里滚烫。

一次，王顺友把邮件送到保波乡政府，就在他牵着马掉头的时候，看见乡干部正翻阅着报纸说“西部大开发太好了，这下子木里的发展要加快了！”一时间，王顺友高兴得像是喝了蜜，因为乡干部看的报纸是他送来的，这薄薄的一张报纸竟有这么重的分量?！他越来越觉得乡邮员工作了不起。

于是，王顺友在马班邮路上一年一年地走下来，至今已经走了 20 年，而且还在继续走着。邮路上的每一天，他都是穿着那身绿色的邮政制服，他说：“山里乡亲们盼望我，其实是盼望穿这身制服的人。”邮路上每一天，他都像保护命根子一样保护着邮件，白天邮包不离身，晚上邮包当枕头，下雨下雪，他宁肯自己淋个透，也要把邮包裹得严严实实。邮路上的每天，他都会唱起自编的山歌，雅砻江的苗族人本来就爱唱歌，他说：“山歌是我的伴，也是我的心。”

翻一坡来又一坡，
山又高来路又陡，
不是人民需要我，
哪个喜欢天天走。
太阳出来照山坡，
照亮山坡白石头，
要学石头千年在，
不学半路草鞋丢。

这是王顺友无数山歌中的一首，邮路成为他心中一道神圣的使命。既然他深爱着自己大山连大山的故乡，既然他牵挂着山里的乡亲们，既然他崇敬着像太阳一般照耀着大山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既然他生在中国邮政史上马班邮路的“绝唱”之年，那就上路吧！一个心怀使命的人，才是个有价值的人。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种“心”的冶炼，他在这冶炼中锻铸了最壮美的词句——“忠诚”。

王顺友爱看电影，特别爱看关于英雄的电影，他说，这是父亲给他的遗传。父亲年轻时参加过“剿匪”，打仗不怕死，常教导儿子不要向任何敌人投降。当王顺友第一次在电影《英雄儿女》中看到那个高喊“向我开炮”的王成时，便敬佩上了他。“王成和我一个姓，他不怕

死，为了党，命都敢丢。现在没有打仗的机会了，把信送好就是为党做事。”

1988 年 7 月的一天，王顺友往倮波乡送邮件，来到雅砻江边，当时江面上还没有桥，只有一条溜索。他像往常一样先把马寄养在江边一户人家，然后自己背上邮包，把绳索捆在腰上，搭上滑钩，向雅砻江对面滑去。快滑到对岸时，突然他身上挂在索道上的绳子断裂了，他大叫一声，从两米多高的空中狠狠地摔下去，万幸，落在了沙滩上，但邮包却被甩进江里，顺水漂去。王顺友疯了一般，不识水性的他抓起一根树枝就跳进了齐腰深的江水中，拼命地打捞邮包，等他手忙脚乱地把邮包拖上岸后，人一下子瘫倒了。岸上有人看到这惊险的一幕，连说他傻，为了一个邮包，命都不要了。他说：“邮包比我的命金贵，因为那里面装的都是政府和乡亲的事！”

2000 年 7 月一天的傍晚，他翻越察尔瓦山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两个劫匪，嚎叫着要他把钱和东西都交出来。他本能地向前跨出一步，用身体护住了驮在马背上的邮包，大声喝道：“我是乡邮员，是为党和政府服务的，是为乡亲们送信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说着，他抽出随身携带的柴刀，死死地盯着劫匪。两个劫匪一时竟被这个一身正气的乡邮员吓呆了。趁他们出神的空当，王顺友疾步上马，冲了过去。事后有人送他一个绰号“王大胆”，他说：“其实我心里也怕得很，是这身邮政制服给我壮了胆。”

这身邮政制服给予王顺友的何止是胆？它给了他一个马班邮路乡邮员的最高品质——忠诚。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忠诚洒满了他邮路上的每一步。

1995 年的一个秋天，王顺友牵着马走过雅砻江上刚刚修建起的吊桥，来到了一个叫“九十九道拐”的地方。这条由马帮踩出的羊肠小道陡峭地盘旋在悬崖峭壁之间，走在这条路上，马的粪便可以直接落在后面的马和人身上，跟在后面的人只能看到前面马的尾巴，路的下面便是波涛汹涌的江水，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马摔下悬崖，掉入江中。

王顺友小心翼翼地跟在驮着邮件的马后边，一步一步地向前迈，眼看就要走出“九十九道拐”了。突然，一只山鸡飞出来，吓得马一个劲地乱踢乱跳，他急忙上前想拉住缰绳，谁知刚一接近，受惊的马抬起后脚便朝他蹬来，正蹬中他的肚子，一阵剧疼之后他倒在了地上，头上的汗水大颗大颗地往下落。

过了很久，受惊的马终于安静下来，它回头看着主人痛苦的样子，眼神变得悲哀而凄婉，用嘴一下一下不停地蹭着王顺友的脸。王顺友流泪了，他抬起手向马做了一个手势，告诉它不要难过，他不怪它。他忍着疼痛慢慢地站起来，牵上自己的伴儿，继续上路了。一路上疼痛不断加剧，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实在挺不住了，就倒在地上躺一会儿，就这样，坚持把这班邮件全部送完。

9 天以后，他回到木里县城，肚子已经疼得受不了。邻居用拖拉机把他拉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大吃一惊：大肠已被踢伤，由于耽搁时间太久，发生严重的肠粘连。医生说，再晚些时间，命就没了。经医院全力抢救，王顺友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但他的大肠从此短了一

截，留下终身残疾，肚子经常作痛。

我直截了当地问王顺友，有没有想过不干这份工作了，哪怕去打工。他认真地告诉我："不可能。乡亲们需要我，他们等着我带给他们亲人的消息，乡政府盼着我带给他们党的声音。我做这个工作是给党和人民做事，有人喜欢我；如果我打工，只是个人挣钱，没人喜欢我。我只有为党和人民做事，心里才舒坦，好过。"

这个苗族汉子的话，句句都是从心窝里淌出来的。正是凭着这样一颗心，20 年来，他没有误过一次邮班，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和一份报刊，投递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

"山若有情山亦老"。如果王顺友走过的邮路可以动情，那么，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道岭，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将洒下如诗如歌的泪水，以敬仰这位人民的乡邮员，用 20 年虽九死而不悔的赤心，锻铸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最高贵的品质——"忠诚"。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条连接党和人民的纽带，他就是高原上托起这纽带的脊梁。

跟着王顺友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了他邮路上的第一个大站白碉乡。路边等候着一群乡亲，见到他，都围了上来。有人给他递茶，有人往他口袋里塞鸡蛋，还有一个乡亲竟抱来一只活生生的老母鸡捆到了他的马背上。王顺友像个远道回家的大孩子一样，高兴得牙龈都笑得露了出来。晚上，坐在一户乡亲家的小院里喝酥油茶，他对我讲："每次走到乡上都是这样，乡亲们需要我，我也离不开他们。"

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换心。他们对这位乡邮员的情意，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王顺友的一颗心。

1998 年 8 月，木里县遭受百年罕见的暴雨和泥石流袭击，通往白碉乡的所有大路、小路全被冲毁，这个乡几乎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孤岛。按规定，这种情况王顺友可以不跑这趟邮班。但是，当他在邮件中发现了两封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便坐不住了。他清楚地知道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这两份通知书意味着什么。"我决不能耽搁娃儿们的前程！"他上路了。

王顺友是怎样拽着马尾巴连滚带爬地走到白碉乡，他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当年接到通知书的布依族女孩海旭燕和藏族女孩益争拉初的家人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他们在连日的绝望中打开家门，看到一身水、一身泥、腿上流着血的王顺友，从怀里掏出那封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滴水未沾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全家都哭了。

现在，这两个女孩都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益争拉初的父亲王八金红着眼圈说："咪桑是一个最忠诚的人，是我们这里离不开的人！"

王顺友的确是大山里离不开的人。因为他的付出，乡亲们更多地感受到了大山外面世界的温暖。

邮路上的深山里零零星星地散居着一户户人家，他们附近没有集镇，更没有邮局，王顺友就成了这条路上的"流动邮局"。20 年中，他代收、代发信件和包裹不计其数。他走邮路的时候，总有一些乡亲拿着信件和包裹早早在路边守候着，请他代寄到外地。很多山里的

人不知道邮寄信件和包裹是需要邮资的，每次王顺友都是一声不响地收下，回到县城后，再自己掏钱贴上邮票或付上邮费，把它们寄出去。

山里的居民，生活大都十分贫困，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常常仅仅是买些盐巴、茶叶，而就这点东西也得在大山里往返三四天才能买到。看到这些情景，王顺友心里很难过，便在每次跑邮路时，装上几包盐巴、茶叶和药，山里人谁需要了，他就递上一包。看到他们接过包包时脸上绽放出的笑容，心头便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好事做多了，乡亲们都说王顺友是雷锋。他说："我比不上雷锋，但我要学雷锋。"

按照规定，乡邮员只要把信件送到每个乡的乡政府就算圆满完成任务。但王顺友总是坚持把信件直接送到农户。他说："乡里的干部忙，没时间送信，让乡亲们跑老远的路到乡上来取信，我不忍心。我多走几步，大家都方便了。"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王顺友从木里走到白碉乡已经是第三天了，他的手上有一封寄给白碉乡呷咪坪村陶老五家的信，猜想可能是陶家十多年没有音信的女儿写来的。他放下乡里的报纸，水没顾得上喝一口，又上路了，在雪地里走了 10 多公里，把信交到了陶老五的手上。信果然是陶家女儿写来的，说她已经在外面结婚生子，还附了一张孩子的照片。陶家人喜极而泣，王顺友也高兴地流泪了。

1997 年，从木里县城到白碉乡的公路全线贯通，乘车只需要 4 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王顺友完全可以改道走公路直达白碉，既安全又省力。可他依然牵着马，翻山越岭步行两天到白碉。有人想不明白，说他傻。他却说："不是我傻。如果改道，我是方便省力气了，可雪山下那些托我带信、带包裹的乡亲们就不方便了。所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路！"

2004 年秋天，国家组织的为老少边穷地区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的"健康快车"驶进木甲。木里县残联的同志把通知书交到王顺友的手上，希望在"健康快车"离开木里之前能把它送到倮波乡，因为那里有因白内障而失明的老人。

当时王顺友正患胃痛，可他什么也没说，牵着马上路了。他几乎是一路急行军，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两条腿能动，他就不停歇地走，结果，7 天的路，竟用 4 天赶到了。这时，他已经被病痛和过度的劳累折磨得不成样子，两手捂着胃，脸白得像纸，虚汗不停地往下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被送进了乡医院。

当天晚上，"健康快车"的消息传遍了倮波乡每一户人家，王顺友为送通知生病的消息也随之传开了。第二天一大早，乡亲们涌到了医院，一位双目失明的藏族老阿爸，拿着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让人搀扶着来到王顺友的病床前，拉着他的手，不停地抹泪，嘴里反复地念叨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一颗金子的心，换来的是金子的情。马班邮路沿途的乡亲们都把王顺友当成自家的亲人，每当他要来的日子，许多人家就会等在路边，拉他到家里喝茶吃饭，走时，他的口袋里会塞满鸡蛋、核桃、水果等各种好吃的东西。

2003 年冬天，王顺友送邮途中胃病犯了，躺倒在倮波乡一户叫邱拉坡的人家。他歇了

半天,坚持要继续上路。邱拉坡劝阻无效,又放心不下,于是就把手头上的活交代给家人,陪着生病的王顺友一起上了路,走了整整 6 天,直到把邮件送完,又把王顺友送回木里家中。

王顺友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自于他的工作。尽管他长年一个人默默地行走,但是他的胸膛间却激荡着大山内外的心声;尽管他身躯矮小,但是他却在党和人民之间托起了一条血脉相连的纽带;尽管他朴实如石,但是他又挺立如山。他就像高原上的一道脊梁,用无声的力量实践了自己心中一个朴素的信念:为党和政府做事了不起,为人民做事了不起!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个人的长征,这条长征路上凝结着他全家人崇高的奉献。

一提到家,王顺友总是说:“我有三个家,一个在山上,一个在路上,一个在江边。”

江边的家是他住在雅砻江边白碉乡老家的父母的家。这个家厚载着对他的养育之恩,他本当在父母的膝前尽忠尽孝,然而,老父亲在把马缰绳交给他的那一天告诉他:“你只有为政府和乡亲们把这件事做好了,做到底,才是我的好儿子!”一句话,交给了他如山的使命,也让他永远地负了一份做儿子的心债:是他的弟弟们在替他这个长子孝敬着老人,最疼他的老母亲活着没得到他一天的照料,临病逝前,喊着他的名字,见不到他的身影。那一刻,他正在邮路上翻越雪山。从此,顶着蓝天的雪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山上的家是他和妻子儿女在木里城外一个叫绿音塘的山腰间建起的清贫小窝。他和妻子韩萨结婚那年,也正是他从父亲的手里接过马缰绳的那年。他们结婚 20 年,他在邮路上跑了 20 年,20 年算下来在家的日子不到两年。三亩地,三头牛,十几只羊,四间土坯房,一双儿女——这个家全部是由妻子一个人苦苦撑起来的。韩萨说她自己是“进门门里没人,出门门外没人”,想得太苦了就拿出丈夫的照片看看。由于操劳过度,她的身体很坏,长年生病。而这样的时刻,王顺友总是在路上。

有一次,韩萨病了,因为没有钱,去不了医院。当时儿子在学校,女儿去了亲戚家,她只好一个人躺在家里苦熬着。不知道熬了几天几夜,当王顺友从邮路上回来时,她已经说不出话来,望着丈夫,只有眼泪一股股地往下流。王顺友向单位的工会借了 1000 元钱,把妻子送进了医院,服侍了她 3 天。3 天后,妻子出院,他又要上路了。握着韩萨的手,他心头流泪,轻轻说:“人家还等我送信呢!”善良的女人点点头。

这样的记忆,又何止一次两次。那一次,是邻居发现了几天不吃不喝、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的韩萨,撒腿跑了两个多小时,赶到县邮政局报信,才保住了她一条命。而那时,王顺友离家还有 3 天的路程。

有人曾问韩萨,想不想让王顺友继续跑邮路?她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只要他天天在家,哪怕什么活也不干,我也高兴。可他送信送了 20 年,你要让他不送,他会受不了的。邮路是他的命,家是他的心哪!”

韩萨真的是最懂得王顺友的女人,这个家的确是他放不下的心。他有一本发了黄的皱

巴巴的学生作业本，每一页上面都记满了他在邮路上唱的山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相思相盼的情歌。他说：“那是唱给韩萨的。”说这话时，他眼里有泪。

高山起云遮住山，
马尾缠住钓鱼竿，
藤儿缠住青岗树，
哥心缠住你心肝。
獐子下山山重山，
岩间烧火不见烟，
三天不见你的面，
当得不见几十天。

优美哀婉的歌词里，蕴满了多少离别之苦。

幸福因为稀少而珍贵。王顺友对家人的每一点细微处，都流淌着这个情重意重的苗族汉子的挚爱。邮路上乡亲们塞给他的好吃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果子，一颗糖，他从来舍不得吃一口，总是带回家，让妻子儿女品尝；每一趟出门，他总是把家里的事一件件安排好，把妻子要吃的药一片一片地数好，包好，千叮咛，万嘱咐。他对记者说：“每次邮路上回来，当老远能看见半山腰的家时，心里就开始慌得不得了啦，巴不得一纵身就跳到家里，剩下的两个小时的路，几乎是一路小跑……”

扁担挑水两头搁，顾得了一头，顾不了另一头。王顺友对家人的愧疚或许是他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他说：“马班邮路总得有人去走，就像当年为了革命胜利总得有人去牺牲。为了能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为了能让更多的乡亲们高兴，我这个小家舍了！”小家舍了，路上的家却让他付出了几乎生命的全部。在这个家，马是他的最爱。他说：“这么多年，跟我度过最苦、最难、最多的日子都是马，我跟我妻子儿女在一起的日子还没有跟马在一起的多，我心里所有的话都跟马说过！”

20年里，王顺友先后有过30多匹马，他能说得出每一匹马的脾气性格，还都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其中有一匹叫青龙的马，一身雪白，跟上他的时候只有5岁，一直伴他走了13年。这匹特别有灵气的马，能记得王顺友在邮路上每一处习惯休息的地方，每当天色渐晚，看到主人因疲倦而放慢了脚步时，它就会用嘴咬咬他的肩头，意思是说快点走。然后，便会独自快步向前走去，等王顺友赶到休息的地方时，它早已安静地等候在那里了。

让王顺友最为刻骨铭心的是，这匹马救过他的命。

2005年1月6日，王顺友在倮波乡送完邮件后往回返，当他牵着马走到雅砻江边直奔吊桥时，不知怎的，青龙四个蹄子蹬地不肯走了。仅差十几米远，王顺友看到一队马帮上了吊桥，他想同他们搭个伴，便大声喊：“等一等……”可他的青龙一步不动。正当他急得又拉又扯时，一个景象让他惊呆了：吊桥一侧手臂粗的钢缆突然断裂，桥身瞬间翻成九十度，走在桥上的3个人、6匹马全部掉到江中，转眼间就被打着漩涡的江水吞没了。半天，他才回

过神来，抱住他的青龙哭了。

这匹马现在已经18岁，他把它寄养在了一个农户家，隔上一些日子就会去看看。他说，平原上的马一般寿命30年，而天天走山路的马只能活20年。像青龙这样的好马，他还有过几匹，但有的老了；有的伤了，也有的已经死了。县上和省里的电视台拍了不少他和马在邮路上的片子，他从来不看。因为一看到他的那些马，心头就会流泪。20年里，他给了马太多的爱。

在他每个月拿到手的800多元工资中，光买马料就要贴上200元。尽管单位每月发的70元马料费够吃草，可他还要给马吃很多苞谷。他常说，马只有吃得好，身上才有力气，走路才走得凶。

邮路上，即使走得再苦，他从来舍不得骑马，甚至当看到马太累时，他会把邮包从马背上卸下来，扛在自己身上。

马给了王顺友太多的安慰。

他最愿看的电视节目是赛马；他最愿去的地方是马市；他最感激的人是北京密云邮政局职工哈东梅和凉山州委书记吴靖平，还有几位他叫不出名字的捐赠者，他现在的两匹马就是他们送的。记得他第一次接过吴书记送的那匹马时，来不及说一句感谢的话，一把拉过马头，双手扳开马嘴看牙口，连声道："好马！好马！"说完就流泪了。因为他没有想到，20年，他只是干了自己应该干的事，却得到了这样贴心的鼓励。他说："只要能走得动，我就一直走下去！"

真的无法想象没有马的日子王顺友该怎么过。前不久，他作为全国劳模去北京开会的那几天，每天晚上躺在宾馆松软的床上，就是睡不好。他说，和马在一起睡惯了，有马在，心头就安稳，没马在，心头空落落的，即使眯一会儿，又梦见自己牵着马走邮路。

三个家，三重情，三份爱。王顺友因它们而流泪，也因它们而歌唱；因它们而痛苦，也因它们而幸福。有人问，这三个家哪个最重要？他说："哪个都放不下。"放不下，是因为连得紧。三个家，家家都连着同一颗心，一颗为了马班邮路而燃烧的心！

如果说马班邮路是高原上的彩虹，他就是绘织成这彩虹的索玛。

王顺友牵着马一步一步专注地走着，从后面望过去，他的背驼得很厉害。

在一般的工作岗位上，40岁正是一个黄金年龄，但对马班邮路上的乡邮员来说，40岁已经老了。和其他的乡邮员一样，王顺友患有风湿，头痛，胃痛等各种病症，另外，他还患有癫痫病，现在每天要靠吃药控制病情。

这位在木里的马班邮路上走得年头最长的人，还能走多远呢？

他说："走到走不动为止。"

记者问："如果让你重新做一次选择，还会走马班邮路吗？"

"那不会变。"

"为什么？"

“马班邮路把我这一辈子的心打开了，为党和政府做事，为乡亲们做事，让我活得舒坦，敞亮！也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大山里是个少不得的人呢！”

“在一般人看来，一个牵着马送信的人能有多重要？”

“我们木里山太大，太穷，没有邮路，乡亲们就会觉得心头孤独了。现在我们有十几条马班邮路，十几个乡邮员，每个人跑一条路，不起眼，可所有这些路加起来，就把乡亲们和山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了，就把党与政府和木里连在一起了！”

记者的心被一种热辣辣的东西涨得满满的。

5 月的凉山，漫山遍野盛开着一片一片火红的花儿，如彩虹洒落在高原，恣意烂漫。同行的一位藏族朋友告诉记者，这种花儿叫索玛，它只生长在海拔 3800 米以上的高原，矮小，根深，生命力极强，即使到了冬天，花儿没了，它紫红的枝干在太阳的照耀下，依然会像炭火一样通红。

噢，索玛花儿……

新华日报·警惕“专家观点”成为“利益俘虏”[1]

李扬

【题解】这篇地方媒体评论曾被新华社全文转发，《新华每日电讯》等多家媒体转载，并被评为第16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随着市场大潮的涌起和学术浮躁的泛滥，学者与利益集团的纠缠越来越突出，从而成为公众深恶痛绝的社会公害。本文抓住这一“习焉不说”的现象，以事实为依托展开评析，鞭辟入里，犀利深刻，是一篇彰显党报风范的优秀时评。

动辄搬出“专家观点”如今似乎成了一种时尚。然而，无可回避的是，专家意见的可信度似乎也在大幅度地滑坡。比如，最近有好几件事让人对某些专家学者的所言所行不敢恭维。

在调控政策之手逐渐引导房价理性归位的时候，不少专家学者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力挺房价的高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先后有两个楼盘恰在此时盛大开盘，房地产商竟推出了“同质化”的气派庆典，不是大搞那种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而是盛情邀请专家学者作现场演讲，请他们在论坛上发布“房价不会下跌”之类的观点。不管说得如何动人，其实都只不过是转弯抹角地引你掏钱罢了。试想，他们跟推销的售楼小姐比起来，恐怕只是多穿了一件叫“专家”的外套。

前不久，国内一家专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研究竟然能得出一个“科学结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当这个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敢相信的“科研成果”公诸于世时，立即遭到了各方的质疑。很快，有报道“揭开了盖子”——原来，这个环境研究课题是由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此外，在“苏丹红”、“雀巢奶粉”事件风波中，专家的表现忽左忽右，有位学者竟抛出了“一支烟就含多少苏丹红”的袒护之辞，难怪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感言：专家“别卖了科学精神”！

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学者是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受尊敬的群体。但以上这些专家学者的表现，更像是表演。这种“专家秀”直接玷污了专家学者得以安身立命的良知道义和学术操守。

[1] 《新华日报》，2005年7月3日。

专家观点失却公信力的背后，是部分专家与某些利益没有了距离。少数专家学者与开发商等利益团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所谓学术研究的公正与科学自然蜕化变质了。诸如此类的“专家观点”，尽管有“专家”在场，但知识分子保有的理性与操守却缺席了，这实际上是学术的失语，发生了腐败的“学术寻租”。这些学者凭借自己耀眼的学术头衔，手中的鉴定权、论证权、签字权去堂而皇之地攫取一笔可观的评审费、润笔费、讲课费。但实际上为利益驱使，玩“学钱交易”，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结果是，受利益主宰的专家意见又主宰了不知就里的善良听众。从股市到房市，站在利益集团前面做代言人、吹鼓手的学者专家并不鲜见；还有，某些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一次次说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误人误市的言论。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愤言提出封杀“社会活动院士”，剑指的正是这类“利益的俘虏”。

如果最信赖的专家把屁股坐到“利”字上去了，日后谁还听专家的话？学者自贱，导致的将是学术自戕、文化自贬。专家不能不自重，要切实担负起专家应有的责任。什么是专家的责任？一是尊重科学的求真而独立的品格，二是全心服务公众的义务。做到了这两点，也就自然远离利益集团的金钱诱惑。

当越来越多的专家走进百姓生活、进入公众视野时，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自律，而且更要善用制度性的他律来共同维护专家观点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只有制度性地剔除那些“利益专家”，实现专家观点的“去功利化”，才能从“专家意见”中聆听到坚守科学精神又为公众服务的“专家观点”，如此既有益于社会又裨益于学术。

新闻记者·2007年十大假新闻[1]

贾亦凡、陈斌、阿仁

【题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媒介的低俗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新闻人的职业道德面临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虚假报道层出不穷。为此，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从新世纪以来，每年的岁末年初都对过去一年的虚假报道进行盘点，并“评选”当年的十大假新闻。这一活动引起新闻传播界广泛重视，被视为新闻打假的标志。

【编者按】：又是年终岁尾时。每年此时，正是我们深感无奈、痛苦难熬的时光。本刊的新闻打假已历经7年，虽然使我们的神经多多少少有些麻木，但面对又一个年度里如此众多的假新闻，作为传媒人，我们仍然痛并羞愧着，这样的“年度十大假新闻”评选何时是尽头？

尽管如此，也有让我们感到些许兴奋的，这是因为我们发现，评选2007年度假新闻有三大历史性的突破：

1. 电视假新闻终于落网

在历年评选出的假新闻中，主要的刊播媒体无一例外都是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似乎新闻造假已成为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专利”，而电视媒体和广播媒体则成为“世外桃源”。其实不然。传媒人都知道，在新闻造假方面，电视和广播并非没有作为，只不过囿于技术手段，难以直接取证，因此往往只能眼睁睁地让广播电视炮制的假新闻逍遥法外。今年，电视假新闻终于落网，而且一逮就是两条！现在唯一的缺憾，就是广播假新闻尚未被“活捉”。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胆敢继续造假，就终有被捉拿归案的那一天。

2. “正面”假新闻终于现形

2007年8月7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马长军的文章《“正面”假新闻必须杜绝》，指出：“这些年负面假新闻并不鲜见，它们炮制噱头、哗众取宠、颠倒黑白，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对假新闻依法处理值得赞许。但是，倘若这假新闻挂着‘正

[1] 《新闻记者》，2008(1)。

面’的旗号，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这样的‘正面’假新闻，在一些地方几乎占据主要版面，有的更是头版头条，谁又听说过这些‘正面’假新闻的制作者以及发布媒体遭受处罚。”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本刊历年来评选出的假新闻中，几乎不见“正面”假新闻的踪影。并不是我们工作疏忽或不作为，而是这类假新闻往往无人举报，被“正面报道”的个人和单位更不会出面澄清，因此对认定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今年，这块心病终于开始化解，一篇报道先进人物的“正面”假新闻终于现形。但说句老实话，若不是造假者造得太离谱，若不是被表扬者实在无法忍受而出面澄清，要揭露这类假新闻绝非易事。

3. 造假记者终被绳之以法

2007年8月12日，制造“纸箱馅包子”假新闻的北京电视台“临时人员”訾北佳，以损害商品声誉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据我们所知，因新闻造假被判刑，訾北佳可谓中国记者第一人。虽然罪名是“损害商品声誉罪”，其实这正是现行刑法的无奈，因为没有合适的法律条文可以判定訾北佳的“新闻造假罪”。中国著名刑法学家苏惠渔教授认为，本案是全国首例，在刑法上还没有完全适合的条文给其行为定性，要全面解决同类案件，就要采取英美等国“判例制度”，以判例补充成文法的不足。但不管怎样，造假者终于锒铛入狱，无疑会有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

除了上述三大突破，2007年度的假新闻还呈现三大特点：

1. 两头少，中间多

综观本年度假新闻的“发病”频率，明显呈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态势。头三个月，假新闻几乎绝迹。而从4月到7月，则可以说是假新闻的爆发期，全年重量级的假新闻，如“美国校园枪杀案是中国留学生制造”、“河南新郑市原副市长出狱后卖烧烤”、“纸箱馅包子”、“史上最恶毒后妈虐童”等，都发生在这段时间。及至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就北京电视台播发虚假新闻发出通报，要求严肃新闻出版工作纪律，建立重大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有错必改、有责必究后，假新闻现象大为收敛。但“风头”一过，年底假新闻又卷土重来。由此可见，不建立长效机制，单靠一事一抓，就事论事，短促突击，权宜之计，是无法有效遏制假新闻的。

2. 即时删除，蒙混过关

网络的一大特点，就是可以即时修改、删除信息，这种特点，固然可以及时发挥纠正错误、澄清事实的作用，却同时也被造假媒体普遍用来隐瞒罪证，蒙混过关，甚至嫁祸于人。我们这次认定的多数假新闻，几乎都是在被证实为造假后，其“原生态”便迅速从当事媒体的网站上蒸发，有的则被链接到更正后的报道，让人难以觉察。更有甚者，则直接明示自己的报道来源于哪家媒体，试图转嫁祸水，逃避责任。凡此种种，说明不少媒体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反而想方设法予以掩盖。

3. 娱乐假新闻比往年有所收敛

在历年的假新闻评选中，娱乐新闻可谓是重灾区。与往年泛滥成灾相比，今年娱乐假

新闻有所收敛。特别是《武术巨星洪金宝去世》的假新闻，当时许多娱记都曾收到消息，而中招者仅《现代快报》一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少娱记还设法求证，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揭穿了这则假新闻。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为娱记们的觉悟和进步感到欣慰。不过，娱乐圈的虚假报道仍不鲜见，在绝对量上还是不在少数，对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在本刊即将付印之际，看到一则报道称，韩国的通讯社韩联社驳斥《新快报》造谣说韩国为汉字申遗。这家通讯社报道说，此前，中国媒体曾误传无从查明身份的一位韩国学者主张“汉字发源于韩半岛”，并且毫无根据地说韩国试图独占汉字。这种闹剧一般的煽风点火，影响到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由于时间仓促，我们难以在短期内核查这则报道的真伪，但未免担忧，一旦虚假新闻“涉外”引起了国际纷争，后果将不堪设想！

看来，只有不仅当假新闻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且为制止假新闻建章立制、有法可依时，减少乃至杜绝假新闻才指日可待。（贾亦凡 陈斌 阿仁）

2007 年十大假新闻（1）：美枪击案凶手认定为中国留学生

【刊播媒体】 中新网

【发表时间】 2007 年 4 月 16 日

【作者】 邓悦 刘小青

【“新闻”】 今天发生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特大枪击案凶嫌身份初步认定：该行凶男子是一名持学生签证来美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现年 24 岁。但警方称他不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消息源《芝加哥太阳报》透露，他于去年 8 月 7 日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飞机从上海出发，在加州旧金山登陆美国，持学生签证入境。



【真相】 北京时间 4 月 17 日晚 9 时 40 分左右，美国 CNN 直播了案情新闻发布会，在会上，警方宣布，经过有关部门的细致调查，凶手的身份水落石出——23 岁的韩国学生赵承辉，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

【点评】 对于这则有损国人形象并令国人义愤填膺的假新闻，网民“子美老人”当天晚上便在西祠胡同上发帖，指出中新网发布的关于“枪击事件的凶手是 24 岁中国人”的新闻

有几点不足："第一，稿子不是自己的采访，通篇翻译，却署名中新网记者；第二，信源没有仔细核实，并且也没有说明信源出处；第三，翻译有误。鉴于这些，我对中新网的稿子不敢苟同。作为一个国家级通讯社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让人难以原谅。"此言极是。

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太阳时报》是家美国地方小报。事后查明，"枪手是中国留学生"报道的始作俑者，正是该报的专栏女作家迈克尔·斯尼德(Michael Sneed)，尽管随后该网站就删除了这篇报道，但《中国青年报》记者还是辗转得到了原文，比较准确的译文是："2007 年 4 月 16 日，太阳时报专栏记者迈克尔·斯尼德得知警方正在调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杀害 32 人的凶手是否是去年持学生签证来到美国的中国公民，消息来源称，这个 25 岁被调查的男性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于去年 8 月 7 日拿着从上海签发的签证到达美国旧金山。调查者并没有把他归为任何的恐怖组织。"即使在这篇报道中，也没有明确说行凶者就是中国留学生，不知中新网的"初步认定"从何而来？

据说，在这次美国校园枪杀案的报道中，中新网的报道不仅速度快而且数量多，让其他媒体大叹弗如。这里，特选摘一条 BBC 的新闻规范以为共勉："正确比速度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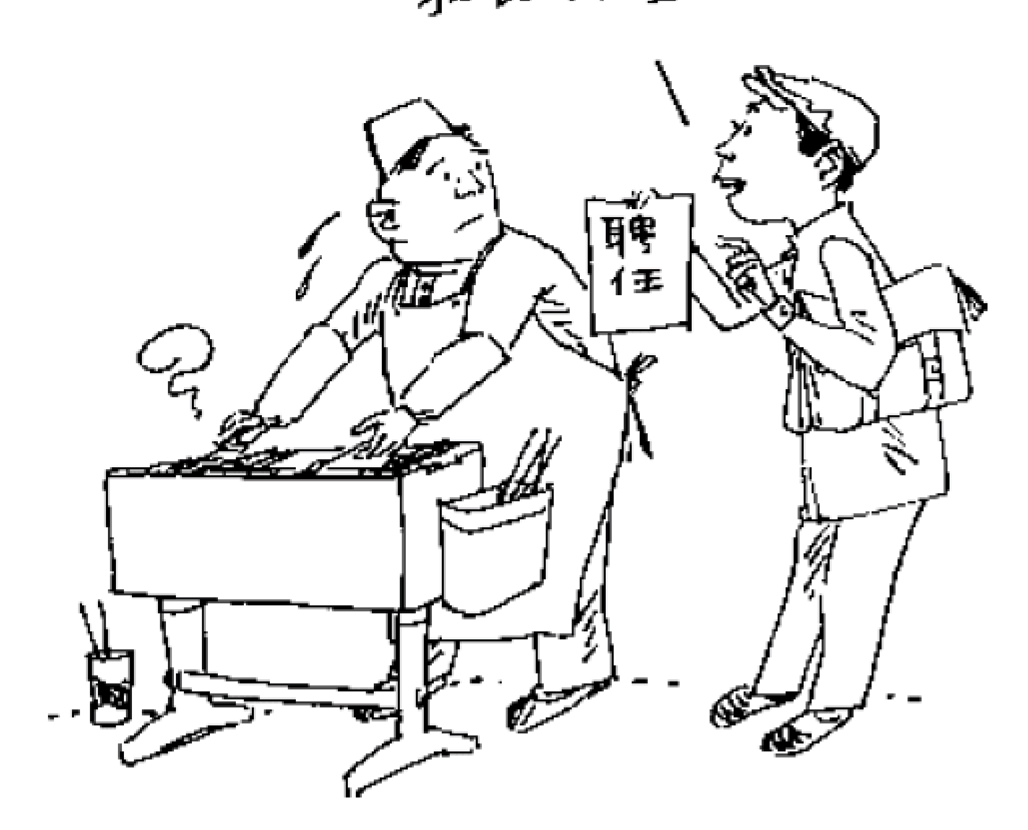
2007 年十大假新闻(2)：河南新郑市原副市长出狱后卖烧烤

【刊播媒体】 《廉政瞭望》杂志

【发表时间】 2007 年 4 月

【作者】 王发坤

【"新闻"】 在郑州市政局和旅游局交汇路口，有一家"李记烧烤店"生意特别火爆。人们经常看到：一位肩搭毛巾的主烤倌熟练地翻动着肉串，他就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个烧烤匠竟然曾经是河南省新郑市的副市长！李兆才出生于河南省新郑市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考上了河南农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两年后就被破格评定为副教授。2000 年李兆才挂职锻炼，来到了家乡新郑市担任副市长，后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刑满释放后，他拜师学艺，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风味羊肉烧烤匠。



【真相】 4月28日，新郑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就《河南新郑市原副市长李兆才出狱后卖烧烤》一文郑重声明："最近，一些网站在未经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对四川《廉政瞭望》杂志刊登的关于《河南新郑市原副市长李兆才出狱后卖烧烤》一文进行了转载，对此，新郑市郑重声明：1.《河南新郑市原副市长李兆才出狱后卖烧烤》一文纯属作者王发坤杜撰，没有事实依据；2.新郑市根本没有李兆才担任副市长一事；3.请相关网站删除相关内容；4.四川《廉政瞭望》杂志社以及王发坤本人刊登道歉声明，新郑市将保留采取法律诉讼的权利。

【点评】 其实，《廉政瞭望》杂志很冤啊，他们并非始作俑者，早在2005年，《打工》、《现代女报》就已刊发过此文，只是当时影响不大。据《廉政瞭望》杂志处理这篇文章的编辑孟盛所言："因为我们比较信任这些知名报刊，所以当作者主动给我们供稿的时候，只是简单向作者核实了一些东西，没有进一步调查。"对给新郑市造成的影响和对读者造成的误导，孟盛表示了歉意。而作者王发坤的解释更荒唐："现在社会上挂职副教授当副市长的事不是常有嘛，出狱后重新做人的事也是常有的嘛，这些都是有现实基础，况且我杜撰的目的本来就是感化人的灵魂。"王某承认根本没有李兆才这个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有的转载都源自《廉政瞭望》杂志，恶劣影响也由此产生，因此，尽管这则虚假报道的"首发权"属于《打工》等媒体，但我们还是将板子打在《廉政瞭望》杂志身上，谁让你造成的影响大呢？何况把两年前的"冷饭"、"馊饭"端出来"回锅热炒"，也真是咄咄怪事。这也是本刊这些年来认定造假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则：既拍苍蝇更打老虎。

2007年十大假新闻(3)：武警苦练船艇操作技能

【刊播媒体】 《安徽日报》

【发表时间】 2007年5月25日

【作者】 何锐　吴春九

【"新闻"】 该报在头版刊发新闻图片，图片说明为："近日，武警安徽省总队官兵在紫蓬山水库劈波斩浪，苦练船艇操作技能。随着梅雨季节临近，抗洪形势严峻。该总队未雨绸缪，积极做好抗洪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围绕冲锋舟和橡皮艇的组装与操作、水上编队、水上过障、水上救援等内容展开集训，提高官兵水上抢险、营救能力。图为船艇编队纵向队形训练。"



【真相】 仔细观察该图，就可以发现图片上方第三、第四艘船以及激起的水波丝毫不差。很明显，这是采用复制、粘贴方法，移花接木合成的照片。

【点评】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人却可能淹死在同一口井中。此话怎讲？在2006年十大假新闻评选中，《今日早报》因刊发经过电脑后期制作、将影像复制组合而成的新闻照片《大雨袭杭百舸归》而入围，这也是假新闻图片首次进入年度十大假新闻之列。本以为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谁曾料想又有人舍身造假，而且造假手法如出一辙。或许造假者不服，不就是为了增强画面效果而复制了一艘船嘛，何至于成为假照片？但是请看：新华社中国图片总汇、人民图片网、中国新闻图片网、五洲传播图片库及东方IC图片中心联合发出《五大图片网站抵制虚假图片联合公告》，其中明确规定："不允许摄影师对拍摄的原始数码图像文件的数据做任何修改。决不允许在照片上随意增加影像或删除局部影像，甚至改变画面内容（剪裁画面中无关部分除外）。"（详见《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9月5日）这也是国际新闻摄影界公认的职业道德规范。

不知明年是否还会有人淹死在这口井中？

2007年十大假新闻（4）：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

【刊播媒体】 《杂文月刊》

【发表时间】 2007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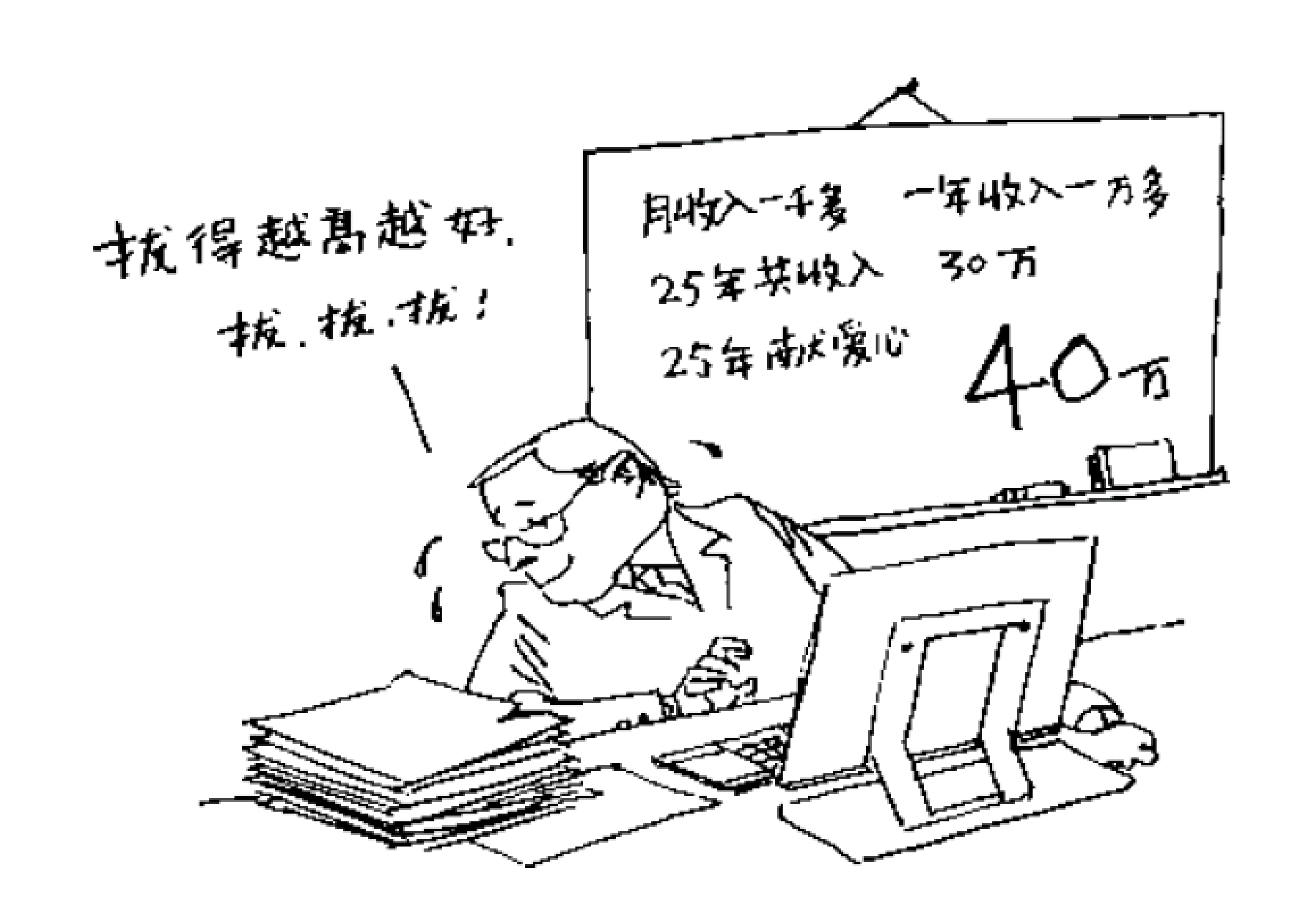
【作者】 张鸣跃

【"新闻"】 2000年，我写过一个兵妈妈乔文娟的故事……在（1998年）抗洪中，她用为女儿借来的上大学的2000元学费给一线子弟兵买了雨衣。时过6年，再回洛阳，兵妈妈的名字竟如雷贯耳……她认了176个兵儿子，她救助了700多个灾民和患病战士……我去了她家……屋里比6年前更寒酸，简陋得连一般家庭都不如。她不在，她那退休又打工的丈夫张建民在用煤球炉做饭……50多岁的老人，在兵妈妈背后苦苦撑着这个穷家的老人，他的脸上褶皱纵横，他的两手肿大皴裂，他憨憨地笑着……老人把一个上了锁的大木箱打开给我看，里面是全国各地的火车票汽车票、汇往全国各地及几十个部队的汇款单、爱心捐款的证书。老人告诉我，这些凭据的总数是43.8656万元。也就是说，月收入从未上过千元的一对夫妻，25年献爱心40多万元。我真的感动了……

【真相】 这篇被职业写手肆意拔高而写就的《一次感动》，经《杂文月刊》刊发、《读者》转载，使得"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陷入重重误解之中。事实是：

——1998年，乔文娟听说前方抗洪的"铁军"战士吃不上饭、喝不到水，于是匿名将2000元钱送到防汛指挥部以助其救急。这2000元钱确实是她为女儿上大学准备的，但不是借来的，而是女儿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送的。

——她是救助过一些困难群众和患病战士，但救助人数没有多到"700多个"，也从没救助过"灾民"。



——她家住的是原单位河柴集团1996年盖的家属楼；当年入住时，在亲友的资助下，她家里几乎换了全套的新家具。

——她爱人张建民今年55岁，身体健康，是河柴集团的一名中层干部，根本没有“退休又打工”，也不是“脸上褶皱纵横，两手肿大皴裂”的样子。

——所谓“月收入从未上过千元的一对夫妻，25年献爱心40多万元”，完全是无稽之谈！她和爱人都是工薪阶层，就算平时不吃不喝，也难攒下40多万元积蓄去做好事呀！

《洛阳晚报》8月15日刊登《虚假报道困扰“兵妈妈”》一文，对此事进行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8月25日，《杂文月刊》有关负责人专程赶到洛阳，就该杂志刊登失实文章一事登门向乔文娟致歉。转载该文的《读者》杂志也发表更正并道歉。8月17日，当事人张鸣跃在网上回应网友的质疑和指责时承认，《一次感动》的初稿“开始不是投给《杂文月刊》的”，此前“接连投给三家（刊物），人家都说不用”，原因是“感人的分量及细节不足”。其间，“每当一家（刊物）说不行，我就改一点，先后改了4次，最终，稿子被《杂文月刊》留用了”。“事后，我和乔文娟通过几次话，才觉得文中有几处拔高描写确实对她有负面影响……这件事我确实有错。”

【点评】　评选假新闻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块心病，就是没能抓到一条“正面报道”的假新闻，这也常为业内人士所诟病。其实我们深知，在正面报道、先进典型报道中，多年来普遍存在着任意拔高、随意放大、刻意求全的问题。作为被拔高放大者，出于种种考虑，未必肯吐露实情；而作为媒体，民不举官不究，也就蒙混过去了。这次《一次感动》自投罗网，填补了“正面报道假新闻”之空白。

平心而论，职业写手张鸣跃造假固然可恶，但是一些编辑追求高、大、全的报道模式恐怕更是问题的关键：说真话不感动，讲假话却感动得忘乎所以；说老实话的文章不用，讲了假话却抢着发表。正是这种病态畸形的新闻观，唆使众多新闻造假者投其所好，更为假新闻传播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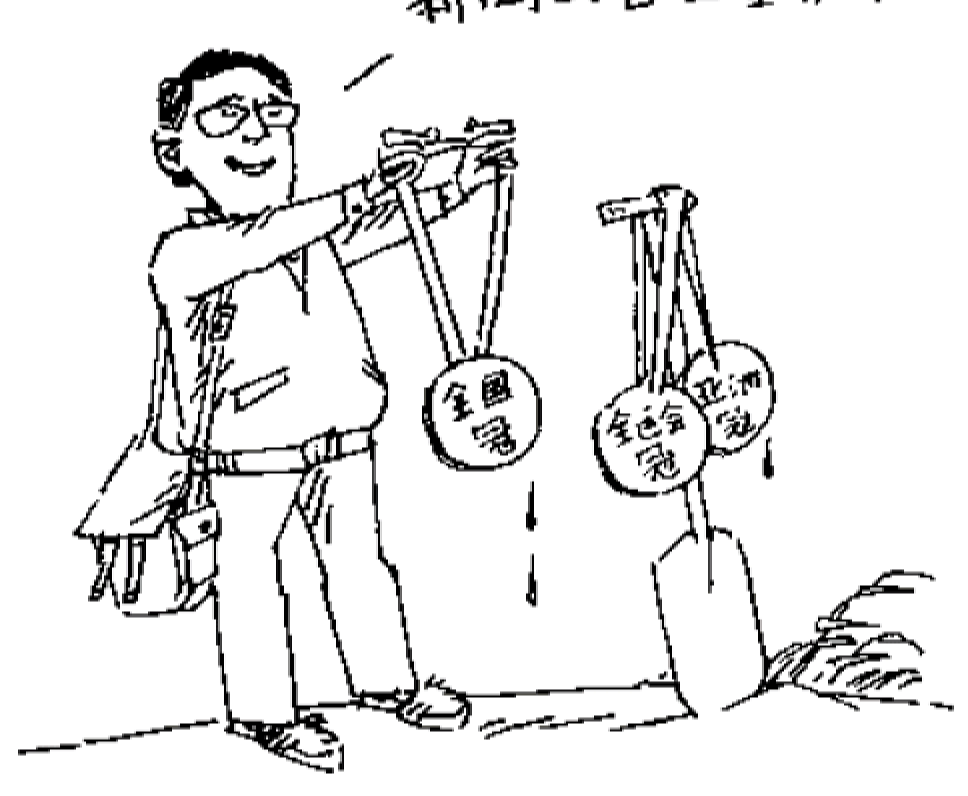
2007 年十大假新闻(5):退役冠军摆摊为生

【刊播媒体】《家庭导报》

【发表时间】 2007 年 6 月 15 日

【作者】 王志君

【“新闻”】 唐颖今年 24 岁,而在 12 年的体育运动生涯里,她每天除了训练还是训练。唐颖的运动成绩也在不断提高,先是获得了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接着是全运会冠军,再然后是亚洲锦标赛冠军。2004 年雅典奥运会,唐颖参加了国内选拔赛,可惜成绩不理想没被选上。按照唐颖的说法,如果能拿到奥运会冠军,这一辈子她就衣食无忧了。2006 年 10 月,唐颖和她的队友们被“一刀切”退役了,每人拿到了 3 万到 5 万元的退役安置津贴。退役后为了生存,不得不摆地摊;有男人想一年出 10 万元包养她,但她坚决拒绝(尊重当事人意愿,文中人物均用化名)。



【真相】 2007 年 7 月 6 日,中共湖南省省委宣传部下发《关于对家庭导报刊登严重失实报道的通报批评》。指出《家庭导报》刊登《一个退役冠军的艰难生活》一文,出现严重失实,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经核实,文章主人公并非亚洲锦标赛冠军、全运会冠军和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只获过全国青年锦标赛亚军和湖南省相关项目的冠军。该文虽然希望通过当事人的真实经历唤起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对退役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更好地帮助其实现再就业,但由于记者采访不深入、作风不扎实,编辑工作不细,报社领导把关不严,这一混淆主人公获奖级别的报道,违反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也对当前营造喜迎北京奥运会的和谐气氛产生了不利影响。事情发生后,湖南省委宣传部十分重视,当即要求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专门召集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开会反思,迅速进行自查自纠,由《家庭导报》向读者公开致歉。在责成集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的同时,在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内部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点评】 “采访不深入、作风不扎实,编辑工作不细,报社领导把关不严”,不错,这几乎是绝大多数假新闻的成因。但是,这里还暴露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潜意识问题,那就是

片面追求新闻的“显著性”和“轰动效应”。试想，如果主人公只是一个校运会的冠军，即使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又有哪个记者愿去采访？还有哪个老总会签发？因此习惯成自然，记者写稿、编辑编稿、老总发稿时，往往有意无意地要凸显其“显著性”、“轰动性”，于是，普通艺人升格为著名艺术家，小老板摇身为著名企业家，助教破格成专家……依此类推，亚军非得改成冠军不可。这无疑是假新闻屡禁不绝的病根之一，若不革除，假新闻的频频出笼就是必然的。

2007 年十大假新闻(6)：纸箱馅包子

【刊播媒体】 北京电视台

【发表时间】 2007 年 7 月 8 日

【作者】 訾北佳

【“新闻”】 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了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点使用废纸箱为馅制作小笼包出售的节目。



【真相】 节目播出后，北京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王岐山市长批示：“如属实要严办，如属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赵凤桐副市长要求：“请市工商局即派人检查并报情况”。7 月 15 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成立专案组对此进行立案侦查，案情大白：今年 6 月初，訾北佳在《透明度》栏目组选题会上提出，曾接到过群众电话反映“包子有掺碎纸”的问题，引起栏目制片人的兴趣，遂被确定为报道专题。此后訾北佳先后在北京四环路一带进行调查，但始终没有发现包子的质量问题。由于选题已上报，压力很大，加之刚到北京电视台，既想出名又想挣钱。期间，栏目主编以时限为由，催促其抓紧拍摄专题节目。于是，他化名“胡月”，以为民工购买早点的名义，要求来自陕西省华阴市的卫全峰、赵晓彦、赵江波、杨春玲等人为其制作包子。6 月底的一天，訾北佳携带秘密拍摄设备，邀请其朋友、无业人员张沄江假扮工地老板，在朝阳区康家沟市场购买了肉馅、面粉等物后要求卫全峰等四人做包子。拍摄过程中，訾北佳要求卫全峰等人将其捡来的纸箱经水浸泡剁碎掺入肉馅中，制成包子

喂狗。因效果不佳，便随机找到一名农民工，授意其编造了有关“肉和纸比例关系”的谎话，并编造使用火碱的台词，以增加视觉、听觉效果。

8 月 12 日，制造“纸箱馅包子”新闻的北京电视台临时人员訾北佳，以损害商品声誉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1000 元。

【点评】 事情虽已水落石出，但 7 月 18 日晚间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新闻》中向社会深刻道歉时使用的一个词却颇可玩味，即造假者訾北佳乃“临时人员”。言外之意，就是此人非北京电视台正式职工，因此和北京电视台没有任何关系。无独有偶，8 月间，郭峰、斯琴格日乐等明星称，被“央视导演”刘楠骗到美国，从事非法商演。在被拒绝后，刘楠竟将明星们赶出酒店，使其流落街头。对此，央视《艺苑风景线》制片人赵宝乐表示，刘楠不是《艺苑风景线》正式员工，属于外聘人员，刘楠的任何行为都应该由其个人负责，与《艺苑风景线》栏目没有任何关系。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没有查到“临时人员”、“外聘人员”之说。不知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聘用劳动者依据的是哪部法律？这番为自己开脱的说辞又是什么逻辑？

2007 年第 8 期《中国记者》发表曾革楠的文章《假新闻的出炉不是偶然》，尖锐地指出：“某种程度上讲，‘纸馅包子’这条假新闻的出炉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体制根源。说实话，我没有因为假新闻的炮制者是‘临时人员’而稍感轻松，相反，在我看来，正是‘临时聘用制’这一不合理的机制造成了假新闻的泛滥。”这个观点很到位。

2007 年十大假新闻（7）：史上最恶毒的后妈虐童

【刊播媒体】 江西电视台

【发表时间】 2007 年 7 月 15 日

【作者】 都市频道记者

【“新闻”】 7 月 15 日，江西省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情缘”栏目播发专题节目《为什么这样对她》，报道中六岁女童丁香小慧躺在病床上狂吐鲜血、身上到处是瘀血青紫。



在片中，记者采访医生以及居委干部，得出的结论是："小孩身上的伤肯定是他伤！"什么人会对如此可爱的孩子下此毒手？最后片尾出现了一个镜头，孩子对着记者的话筒说，身上的伤是后妈打的。

7月17日，题为《我所见过的最没人性的事情！后妈毒打6岁继女，治疗现场千人哭成一片！！！》的文章在各大网站、论坛上传播。在更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下，"史上最恶毒后妈虐童事件"被广泛传播。

【真相】 7月24日，江西省鄱阳县公安局向公众通报了丁香小慧被虐事件情况权威调查通报：现在事实已查清：一、陈彩诗没有虐待丁香小慧的行为；二、丁香小慧体表初始伤是自己跌倒造成的。

上海瑞金医院组织神经内外科、儿内科、感染科、呼吸科、血液科，对遍体鳞伤的江西6岁女孩丁香小慧进行了全面检查，初步诊断小慧患有肺炎、脊髓病变、凝血功能障碍、严重贫血、褥疮和二度营养不良等病症。但对于小慧身上多处淤斑是否是外伤所致，专家组尚无定论。袁克俭教授称，从客观检查结果看，应该还是凝血功能引起的。

【点评】 不可思议的是，时至今日，只有极少数有正义感的媒体如《中国青年报》、东方卫视、《九江壹周》等最后澄清了事实，还"后妈"陈彩诗以公道，而绝大多数当初报道"恶毒后妈"的媒体却始终沉默失语，并做贼心虚地删除了各自网站上的相关报道。这种漫不经心、若无其事的态度，与当初全国媒体一窝蜂地狂热报道形成鲜明的对照。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或作者为此向公众及陈彩诗本人道歉。冷漠至此，夫复何言！

事实上，"后母虐童事件"的真正黑幕根本没有揭开，其诡异之程度，令任何一部好莱坞悬念电影都逊色不已——整个事件的背后操纵者究竟是谁？最先在网上传播"恶毒后妈"的神秘的发帖人 vera_19851118 是谁？为何江西电视台的专题节目还未播出的镜头却已全部上网，而且截图异常清晰？丁香小慧为何要撒谎……正如试图揭露黑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李菁莹所言："我没能做到还原整个新闻事件来龙去脉的全部真相，仅仅是在自己了解的范围内还原了事实，是局部的真实，而非全部的真实。稿件刊出的结果是，读者依然没有最大程度了解事实本来面目。甚至可以说，这篇新闻稿是真实的，却不是足够客观公正的。"

2007年十大假新闻(8)：华科大3000学子获赠安全套

【刊播媒体】 《楚天金报》

【发表时间】 2007年9月17日

【作者】 赵飞　万多　熊晓艳

【"新闻"】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18岁成人之际，面对国旗庄严宣誓：从此刻起，我已懂得承担责任……"昨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近3000名男生在校内举行成人仪式，而面对活动现场赠送的安全套，众大学生却显得有些拘谨。

仪式结束后，参与主办活动的一家企业，现场为参加宣誓活动的大学生代表们每人发放了一本宣传责任意识的“成人手册”和一个安全套。参加成人仪式的都是该校机械学院大一、大二男生，年龄都在 18 岁左右。不少大学生领到安全套后显得十分拘谨。

【真相】《楚天金报》于 9 月 19 日更正：本报 9 月 17 日 2 版《华科大 3000 学子宣誓“成人”》一文有误。文中“为参加宣誓活动的大学生代表们每人发放了一本‘成人手册’和安全套”，应为“在随后进行的‘励志报告会’结束后，参与活动协办的某企业私自给极少数学生发放安全套，校方发现后立即制止并予以收回”；文中“近 3000 名男生”应为“约 980 名男女学生”。由此带来不便，特向华中科技大学致歉。



【点评】 短短 500 字的新闻，竟然三处严重失实：一是到场的新生老生加在一起，尚不足千人，却号称三千；二是到场的明明有女生，却大笔一挥让女生统统“消失”；三是私自给极少数学生发放安全套，却变成人手一个。

报道这则消息的记者据说到了现场，但不知他是如何采访的？一方面是记者的不负责任；一方面是编辑盲目轻信，并暧昧地将“安全套”置于标题中；另一方面是时评写手们不问青红皂白地一通乱批。正是在这种浮躁中，新闻的道德底线失守了，新闻的价值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亵渎。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有个帖子问得好：“成人仪式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人格的质变，真正实现由懵懂少年向责任公民的转变。也就是说，成人礼意味着卸下幼稚披上责任，以责任唤醒自律，以责任约束行为。素来自诩为‘无冕之王’的记者，是否真在心智上戴上了王冠，真有了行使权力的成熟？对于某些记者和媒体来说，是否也需要一场自律的‘成人礼’？”请当事人扪心自问吧！

2007 年十大假新闻（9）：社科院公布城市白领工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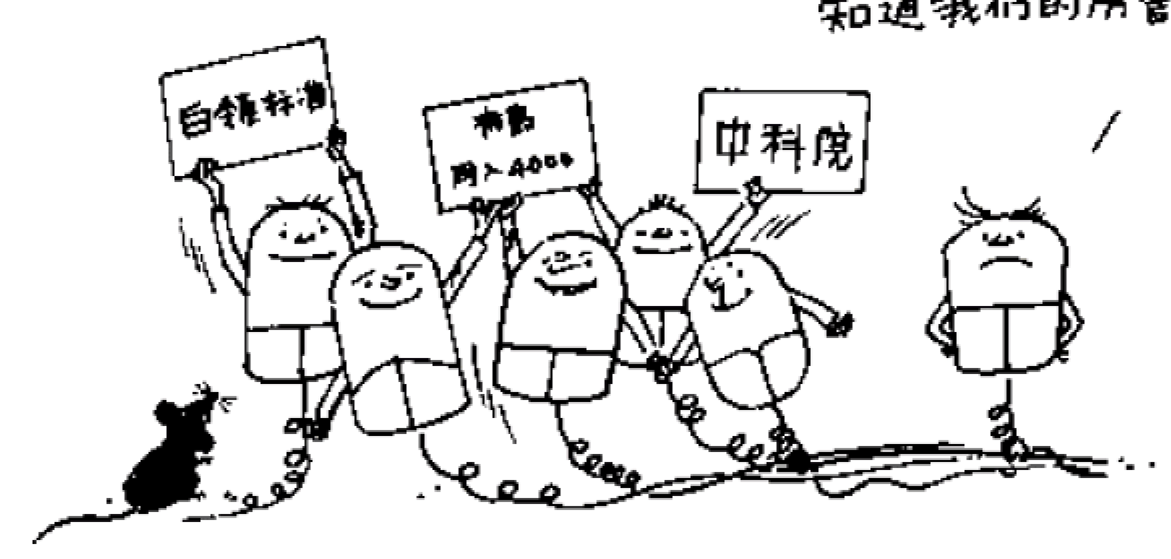
【刊播媒体】《半岛都市报》

【发表时间】 2007 年 11 月 3 日

【作者】 未具名

【“新闻”】 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公布了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包括各城市物价水平、居住成本、交通成本、城市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单位：人民币。外地务工者在以下基础上增加1800元。共分七档。一档：香港18500，澳门8900；二档：上海5350，深圳5280，温州5020，北京5000；三档：杭州4980，广州4750，苏州4300，厦门4100，青岛4000……

【真相】 1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发表正式声明，“我院有关研究所和课题组从未发布过所谓的‘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也没有进行过有关研究工作。我院发布的研究报告都会通过正式的宣传渠道，并标明相关研究单位或课题组。我院专家学者一向学风严谨，不会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目前，对这一消息的确切来源我们正在调查之中。对于此类给我院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我院将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记者经过调查，披露了这则假新闻的前世今生：

- 2005年10月11日，有网友在某论坛发帖《在其他城市挣多少钱可以过上北京月薪5000的生活》。帖子完全没提白领，只是“拿一个在北京月薪为5000元的人可以达到的生活水平作为参照点，来看达到同等的生活水平在其他城市需要多少月薪”；
- 2005年10月14日，某网站转载了这个帖子，当天就引起了关注，很多论坛广泛转载；
- 2006—2007年，这个帖子被以各种不同的题目广泛转载流传；
- 2007年1月，有网友把原帖进行了一下编辑，以《社科院公布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为题重新发了出来；
- 11月2日，某网站今日话题栏目刊出《你的工资够“白领”吗》的专题策划，将网帖数据附在《北京晨报》一篇白领题材报道后面；
- 11月3日，《半岛都市报》以“据北京晨报报道”的名义转载了那份数据。
- 11月4日～5日，全国各大媒体、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并针对本地情况对有关数据提出质疑。

【点评】 当今时代，新闻传播不借助网络肯定不行，但完全依赖网络却万万不行。近年来不少假新闻的出笼，均和网络密不可分。但是，现在不少记者已经“进化”到只会在网

络上搜索“新闻”，而智力则退化到不知世间竟还有谎言。令人发噱的是，正当全国媒体纷纷转载“《北京晨报》的报道”时，本来是被人强加“电头”充当“信源”的受害者《北京晨报》也不甘人后，11 月 5 日居然也刊登了这篇“本报讯”。这就是网络时代的魔力“创造”的荒唐而苦涩的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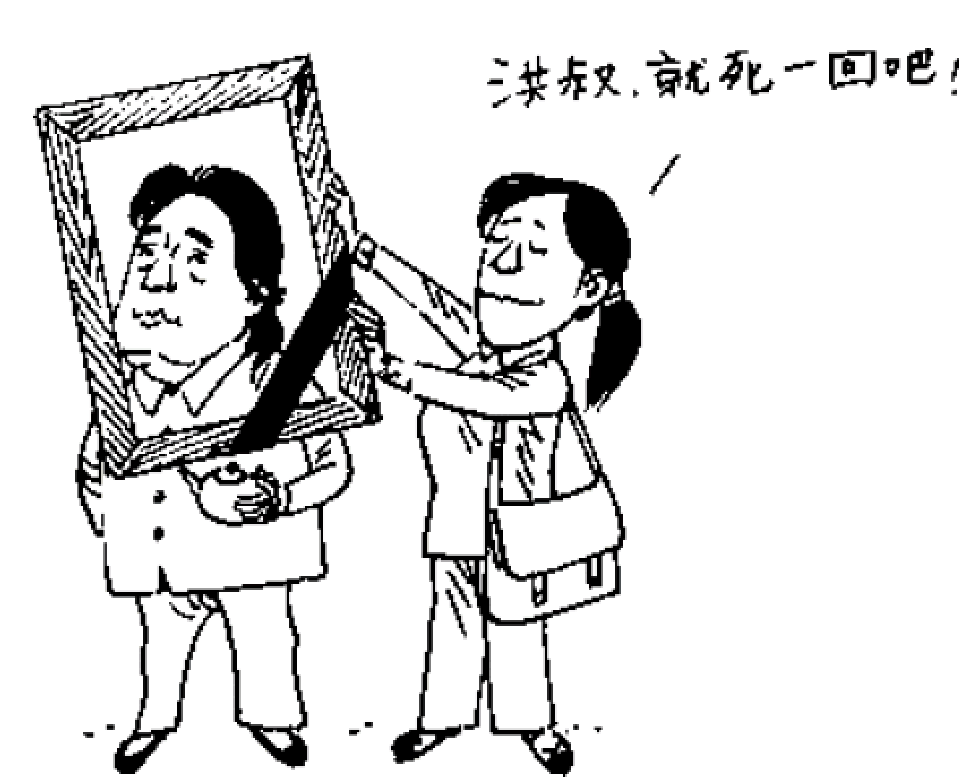
2007 十大假新闻(10)：英皇证实功夫巨星洪金宝去世

【刊播媒体】《现代快报》

【发表时间】 2007 年 12 月 9 日

【作者】 孙伊

【“新闻”】 一代功夫巨星洪金宝昨夜突然去世。记者从香港同行处获悉这一噩耗后，紧急联系上香港英皇的某位高层，对方证实了这一消息。到记者截稿时止，洪金宝的死因尚未明朗，只知道他不是在香港去世。据悉，11 月 30 日，洪金宝在广州参加活动时身体还非常健康，并无异样。洪金宝出生于香港，十岁之前就已经跟随名师于占元学习京剧，后来他和师兄弟们用七小福的称号，活跃在银幕和舞台之上。洪金宝涉足影视圈后，主要从事武打与动作表演，随后又从事武打指导工作，是功夫喜剧的代表人物之一。



【真相】《现代快报》发布洪金宝“死讯”后，网易娱乐一直和成家班、洪家班的武师保持联系。10 点左右，网易娱乐致电前成家班成员，洪金宝好友郑志豪，他听到消息后，立即致电多位洪金宝好友求证。15 点，郑志豪终于打通洪金宝电话，洪金宝表示，自己正在山东，同时感谢所有关心他的人。他还说自己正在悠闲地喝普洱茶，完全没有事情。记者询问了报道该消息的记者，她回复记者的短信上就是“我被整了”四个字，再问她，就不愿多说了。而一位港台媒体的同行则表示，他们也收到这样的消息，但证实后却发现是假新闻，所以并未作报道。

【点评】 新闻记者以笔“杀”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早几年就已经把比尔·盖茨“杀”过两回。至于娱乐界人士，被“杀”者更是不计其数：李雪健、琼瑶、张柏芝……但这次的新闻眼却是，“杀”人的娱记非但不思反省，出面道歉，却愤愤地吐出“我被整了”四个字，仿佛比窦娥还冤。如今这世道，连造假者都敢喊冤，那么，洪金宝和广大读者岂不更冤？

北京日报·赤脚医生
——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1]

李砚洪

【题解】赤脚医生制度曾是新中国一项伟大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事业,惠及千千万万的广大农村居民,也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这篇深度报道对此做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反映,既有宏大的背景,又有真切的细节,既有历史的回顾,又有现实的反思,内容翔实,内涵丰厚,情感真挚,叙事生动,显示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的岁月里,数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

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也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六·二六"催生赤脚医生

1969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纪录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微风拂起他的头发,初秋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一个个训练有素的方队高呼着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一个特殊的方队进入他的视线时,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队列的前边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巨大的汉字,用特制的轮车推着。

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农村医护人员。

---

[1] 《北京日报》,2008年1月22日。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是欣慰的，他看到了4年前他倡导的赤脚医生运动已成磅礴之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焦虑的问题。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的李长明说。李长明曾经是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司长。

“然而，医疗队密度再大的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的求医渴望相比，仍无异于杯水车薪。治疗周期所造成的暂时性还只是个表面理由，使医生无法居留乡下的深层原因却是致命的”，对中国赤脚医生做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这种流动性医疗措施只有雨过地皮湿的效果，农民怎样才能拥有固定的医生？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

李长明曾问过钱信忠，据他转述，毛泽东当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李长明是这样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他说：“毛泽东一方面很清楚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但他也知道，医学是科学，不可能让一窍不通的农民自己给自己治病，他多次表示要培训农村有文化的青年人为农民看病。”

杨念群补充说：“同时毛泽东以自己乡村生活的经历，认为存在于中国基层的中医、草药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赤脚医生”称谓首次出现在1968年

1965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实施速成培训，王桂珍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卫生员之一。在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

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1953 年从苏州医专毕业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卫生院，经过两年的乡村医疗实践后，1965 年底开始参与培养当地赤脚医生。他成了王桂珍从医的第一位老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1968 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文章实际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 9 月 14 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作“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 1977 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黄钰祥说，这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1966 年 8 月 10 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 1 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 5 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 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泽东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该制度在全国 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没有人能说清楚中国的农村医疗体制是如何演变的，但作为农耕大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一直是国家关注的大事，据史料记载至少从唐朝，中国就出现了送医下乡的国家制度，唐玄宗时在各州设置医学博士的做法，对唐代医学事业尤其是对农村的巡回医疗队伍的组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宋代的“惠民药局”免费为病人诊断并提供处方，普通老百姓看医用药比较便利。

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陈志潜的“定县模式”。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陈志潜，1932 年揣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证书，坐上了去河北定县的骡车，具有世界影响的“定县模式”由此发端。陈志潜先在农村培训保健员，从事预防疾病的宣传，种痘，井水消

毒，用保健箱里的几种药品治疗沙眼、头癣，急救伤员，改良自家的水井、厕所，并向乡邻示范，还要对村里死亡、出生情况进行登记，对需要医生诊治的病人及时介绍转诊到区保健所或县保健院，构筑村、乡、县三级卫生网络。不过，这项享誉世界的实验随着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被迫终止。

而在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的记忆中，赤脚医生是红军做法的一种延续，当年苏维埃的医务学校，仅以七八个月的速成时间就培养出一批医务工作者。他回忆：“在解放区和红军里，曾经受过近代、大学训练的医生，只用两只手的手指就数完了。几乎所有的医务工作，都是这些短期培训班出来的人负担。因此，训练各种半医务人员是个老传统，‘赤脚医生’的概念在那时就存在了，只不过名称不一样。”

培训贫下中农子女当医生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赤脚医生？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其次还要读过书，最起码要小学毕业。较低的文化水平、乡村生活造成的见识缺损、简单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异，使得这些学员坐进教室就打瞌睡，如何让他们有兴趣，在短时间内掌握必要的医学知识，成了教员授课必须要研究的问题和技巧。

1965 年，秋色正浓的 10 月，刘仲毅随医疗队下放湖南农村，成了培训乡村卫生员的教师。刘仲毅十分了解这些青年农民学习的特性，有热情没耐性，一堂课开讲不到 10 分钟，就有学员睡眼惺忪，头不断地像鸡啄米似地向下点。医学院里那套不管用。在一次传染病的病理课上，刘仲毅让学员把教材放回书包，开了一个关于谋杀案的侦探故事会。故事说，在湖南一个小火车站旁的小客栈内，服务员早上打扫房间时，发现旅客被杀，房间里到处是血迹，公安人员利用血迹展开了案件侦查。课堂气氛顿时不一样了，在刘仲毅主持下的“课堂侦查”中，“血型”概念被自然引入，作为侦破工具的血抹片上，发现了疟原虫和血吸虫，结合疟原虫和血吸虫的生活习性，不仅可以肯定死者来自疫区，也明确了凶杀案发生在午夜，因为血吸虫的蚴只会午夜出现在周围血流中，血吸虫生活史又被引入。“破案”过程中，血液生理、病理和寄生虫病知识被有机糅合在一起，哪里还有瞌睡。

生动性、通俗性、实用性、针对性是课程讲授必须考虑的。教授营养学知识，应避免“碳水化合物”是“能力的能源”这样的讲法，要说“糙米比白米补，焖饭比蒸饭补，吃蒸饭要吃米汤”等；教授“急救”办法时，头皮破伤出血的处理，要比人工呼吸重要，因为前者在农村极为常见。

简单外伤的处理、常见小病的治疗、基础防疫工作如何开展、常见慢性病如何防治、简单药品的药理特性等成了速成教材的主要内容。

发行量仅次于“毛选”的《赤脚医生手册》

【预防疯狗咬伤】

一般的疯狗大都颈硬，头低，耳垂，尾向下拖，直向前行，不能返身顾后。见到疯狗，应设法捕杀，火葬。一旦被狗咬伤而不能辨别是否为疯狗时，应及时正确地处理伤口，并给予必要的疫苗注射。

……

虱子是过去农村常见的寄生虫，“不但咬人吸血，还能在吸血时传播回归热、斑疹伤寒等传染病。防生虱子最主要的是注意个人卫生，勤换衣服、勤洗澡。”

【灭头虱】

（一）把头发加醋浸洗，使虱子卵容易脱落。再用竹篦把头发上的虱卵梳干净，然后用百部水煎液（百部一两放水二斤，煮沸半小时，过滤而成）擦头发，并以毛巾把头发包起来，过一夜就能杀死虱子。

……

咳嗽痰多，喉痒咽干，怎么办？“鲜萝卜一斤，洗净，带皮切丝，绞汁内服。”

“生姜捣汁涂舌尖或生姜汁内服。”“冲酱油汤内服。”可以治疗呕吐。

这是1969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里介绍的几种土方、草药预防、治疗方法，简单易行，即使不是专业医生也可按此介绍操作。

这本图文并茂的手册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68岁的退休教授金滔告诉记者：“《赤脚医生手册》不仅是农村医生的读物，那时候，城市居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本书，很方便。当时孩子小，经常犯些小毛病，习惯从手册里找对策，像积食了怎样捏脊；出水痘了怎么办；得了口疮用什么药，都是从手册里学的。看，这本书都被我翻烂了。”金滔手里这本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书页泛黄，有些撕裂的书页被仔细地粘合起来。

1969年，黄钰祥所在的江镇公社卫生院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编写一本适合南方地区使用的赤脚医生实用教材。除了对赤脚医生定期进行轮训外，大量简单通俗的医学读物成为提高他们医术的有效手段，黄钰祥当初的讲义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教材的蓝本。半年后的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万册，一抢而空，后来数次加印，最后印了118万册。

教材给赤脚医生们提供了最浅显的入门方法，此后，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不断改进、再版。1969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

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可以想象的是，在当时每一位赤脚医生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本宝书，他们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在收工休息的空隙，完成着边学边干的特殊使命。今天，当这些发黄的书籍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斑驳出现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年他们的主人爱不释手的神情，似乎可以回到那个人人身边有医生的旧日乡村。

在长达 30 年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

《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 50 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1975 年 4 月 3 日，16 岁的姜桂玲初中毕业，经过全村社员推选，参加了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三个月后，姜桂玲背着药箱回到了良各庄村，成为村里惟一一名赤脚医生。

一个 16 岁的孩子，会看病吗？“全仗着胆子大。”姜桂玲说。因为胆子大，第一个病人就让她树起了在乡亲们间的威信，“那是个老太太，爱喝酒，还有高血压，一天中午，酒后上厕所，晕倒了，房山农村的厕所都是石头垒的，晕倒时，她的下巴磕在了石头上，一条 4 厘米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来喊我，我去一看吓坏了，说不敢做，光拿药是止不住的，建议她去公社卫生院，老太太说，去卫生院还不流血流死。我赶紧翻书，看这种情况如何处置，拿出缝合工具，壮着胆子赶紧干了起来，像缝衣服，也不管针脚大小，出了一头汗，但缝合后血就止住了”。

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说，桂玲这丫头是个干医生的料，才学了几天就能缝伤口。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于进明那年 50 岁，在山上垒石头，突然就倒下了，是突发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时候，据说已经休克 20 分钟了，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一会儿，于进明就醒过来了。要是不及时，恐怕人就没了。我们村离最近的医院也有 26 公里的山

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行了。”从1965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延庆县珍珠泉乡南天门村的于元堂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而这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农民最近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

姜桂玲当上赤脚医生的第一天，父亲就告诉她：“过去医生上门看病，要先吃饭，病人家为请医生这顿饭要精心准备，医生进门不看病人，要先把这顿饭吃好，有时候吃饭过程中病人就不行了，你当上医生可不能这样。”姜桂玲牢记着这句话，32年的从医生涯中，没在患者家吃过一顿饭。“每当看到病人在自己手下好起来，听到他们说谢谢，我就感动得想哭，一句谢谢比什么都珍贵，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与胡玉英一起在延庆县永宁镇利民街村做赤脚医生的周平，服务过这个1700多人大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周边的村子也跑了无数个。在永宁镇，也许有人不知道镇长，但没有人不知道周平。2005年，给人看了30多年病的周平患了尿毒症，昂贵的透析费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村民知道后自发捐款，一周内就捐出6000多元，周平说：“我不能要啊，自己已经不能给人看病了，没办法回报，这样让我不安心。”而为全村接生过300多个孩子的胡玉英，却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温情的回报，“这些孩子大了，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叫我去喝喜酒，在街上我见了他们也要摸摸他们的脸”。

“都是村里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很熟悉，平日里他们为我们，他们有了难处了，一定要伸把手。”周平的邻居韩少成说。

“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杨念群这样解释乡村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于元堂是个很小就失去父母的孩子，是乡亲们把他养大的，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温情回报的循环体系，“没有乡亲们就没有我，是他们把我养大的，我学了医就要无私地为他们看病”。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就是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工作。

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

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16岁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

为什么？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这样的现状逼得赤脚医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寻药。

“1974年采药、制药的情况。采药情况：小蓟干品10余斤，车前草9斤，马齿苋5斤。去北山采药：黄芩20斤，赤芍10斤，苦参4斤，桔梗3斤，柴胡3斤，苍术2斤，玉竹3斤，防风1斤。制药：藿香正气丸：制水丸6斤，成人每次2钱，每日三次。十滴水：95%酒精一瓶，75%乙醇3500毫升，樟脑一两六钱，干姜，薄荷酊，茴香，桂皮，辣椒，大黄。共制4000毫升，麦收田间场院等地用去2500毫升。”这是胡玉英一个泛黄的本子上记录的内容。

这位当年的赤脚医生说：“上面写的斤数都是干品，采回来的鲜草药要晾晒。都是大队组织社员集体采的。”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式，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而当时覃祥官所在的湖北长阳乐园公社，已是全国的典型，纪录片《合作医疗好》主要讲述了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其中有这样一段解说：“乐园公社山高林立，药源丰富，公社党委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精神发动群众和赤脚医生大搞中草药运动，他们采取‘田间生产结合采，早晚休息自动采，假日农闲集中采，遇上旺季突击采’的办法，每年采集野生药材一万多斤。”

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使得普通群众也知道了草药能治什么毛病。马齿苋，以前总以为是喂猪的，现在老百姓知道了可以用它治疗泻肚子。草药，不认识的时候是草，认识了是个宝。覃祥官说，当时有300多亩药地，种了人参、田七、贝母、黄连等，还喂养了獐子、蛇。还办了一个药材加工厂。每年的6月26日，长阳都以公社为单位开展群众献药活动。

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

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农忙时节为全村劳力熬上一锅预防疾病的草药汤，成了赤脚医生的集体记忆。而更深层的背景是，早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针对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旦疫情爆发就难以控制的特点，便确定了以预防

为主的农村卫生工作方针，以后的数十年里，赤脚医生就成了这一方针责无旁贷的执行者。

“1976 年，流脑发作，我先带人到处喷药，然后再挨家挨户去送防疫糖丸……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事情，赤脚医生不光是看病，这样的工作更多，也更重要，预防是公共卫生领域里最重要的环节。”现在成为乡村医师的姜桂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包括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仍是西医，他排斥中医，因而无法推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这就维系了一种良好的人脉，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20 世纪 70 年代，赤脚医生进入鼎盛时期，连西藏阿里地区的牧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纪录片《北京医疗队在阿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而此时，赤脚医生在村民的眼里愈加亲切和温暖，而能够背起药箱当赤脚医生也成了当时农村青年最时髦的人生理想。

1972 年，一部 52 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在这部影片的宣传海报上，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赤脚走在田埂上的形象成了“第三世界医疗界”的偶像。

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她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1976 年 9 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黄钰祥和覃祥官一起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别人只发言 10 分钟，10 分钟之内，执行主席锤子一敲，就必须停止发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对覃祥官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 1980 年至

1981 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那是个封闭的时代，但是中国赤脚医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说，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赤脚医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覃祥官大会发言的这一天，是公元 1976 年 9 月 9 日，就在他在国际讲坛上展现中国赤脚医生风采的时候，倡导赤脚医生运动的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远在马尼拉的覃祥官、黄钰祥参加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追悼会。

赤脚医生的黄昏

1982 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广西南宁附近的邕宁县伶俐公社女社员黄华娇正在田间干活，突然感到腹内剧痛，顿时昏倒在地。旁边的社员以为她得了危重急病，立刻忙乱起来，有社员第一反应是赶快叫赤脚医生，有人回答说，赤脚医生早就解散回家了，赶快给医院打电话吧。当急救车呼啸着把病人送到南宁市第一医院后，病人只花了 6 角钱注射了 40 毫升葡萄糖和一支维生素 B6，就恢复了，而急救车来回 40 公里的费用 10 多元，还不算陪送占用劳力的浪费。事后有社员感叹，要是大队卫生室不解散，赤脚医生还在的话，就不用跑那么远，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同是这个县，还发生了另一个相反的事例，坛乐公社一个小孩，右脚背被开水烫伤了一小块，因没有及时治疗，伤口严重感染化脓，送到南宁市医院医治时已太晚，虽治愈，但脚已残废。这是 1982 年 7 月 11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不该解散》的署名文章中举的例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村土地的再分配终于使得赤脚医生成为夕阳职业，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公社时期，生产队长统一安排全村农民的劳动。劳动安排是村里一件敏感、极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须制定种植计划，选择作物，配置劳力，购买生产资料，考虑产品出路，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

“‘工分计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脚医生体制遭受了沉重打击。赤脚医生服务村民的动力，固然有邻里乡情这些朴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脚医生的服务精神和回报心理更多的是因为其医疗行为被有意区别于一般的劳动形态，无形中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评价。这种评

价隐含着自古以来对郎中的尊重，这种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艺视为高于田间劳作的职业，因此在乡间，赤脚医生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这是个不小的优势，但是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这种优势荡然无存，反而在田野里劳作的个体劳动者的身影成了赤脚医生羡慕的对象，务农的诱惑开始难以抵挡。”杨念群说。

“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李长明说。

赤脚医生报酬的急剧下降，也使得这些曾比大队干部更体面的群体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乡土感情和道德评价并没因此降低，但报酬上的不平等仍难维持赤脚医生的尊严。

“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长明说，“赤脚医生运动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高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有许多成为了赤脚医生，但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出现知青返城现象，1977 年恢复高考，他们又成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流失，加速了整个队伍解体的步伐。”

1985 年初，卫生部做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但是，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涵盖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从 1965 年到 1980 年，中国约有 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 51 万正规医生、146 万赤脚医生、236 万生产队卫生员和 63 万农村接生员。

即使现在，许多昔日的赤脚医生经过再培训，“穿上了鞋”，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框架下，又成为乡村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附　录

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存目(100 篇)

1. 王韬:《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申报》,1878 年 2 月 19 日
2. 陈炽:《庸书·报馆》,1893 年
3.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1896 年 1 月 12 日
4. 谭嗣同:《壮飞楼治事十篇·治事篇第一》,《湘报》,1898 年 4 月 15 日
5. 严复:《天演论》,《国闻汇编》,1898 年
6.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7. 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1902 年 2 月 8 日
8.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 年
9. 林白水:《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 年 12 月 19 日
10.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 年
11. 陈天华:《猛回头》,1903 年
12. 彭翼仲:《演说》,《京话日报》,1905 年
13. 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1907 年 1 月 2 日
14. 于右任:《中国万岁、民立万岁》,《民立报》,1910 年 10 月 11 日
15. 宋教仁:《东南各省水患论》,《民立报》,1911 年 7 月 1 日
16.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 年 1 月
17. 瞿秋白:《饿乡纪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年
18. 俞颂华:《游记第二集》,北京晨报社,1924 年
19. 萧楚女:《中国青年与文学》,《中国青年》,1924 年
20. 《辟〈诚言〉》,《新闻报》、《申报》,1925 年 7 月 17 日
21. 恽代英:《怎样做一个宣传家》,《中国青年》,1925 年 7 月 25 日
22.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武汉《中央日报》,1927 年 4 月
2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年
24. 徐凌霄:《古城返照记》,《时报》,1929 年至 1931 年
25. 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1930 年 5 月 1 日

26. 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社会与教育》，1931 年
27. 顾执中：《东北吁天录》，《新闻报》，1932 年
28. 邹韬奋：《萍踪寄语》，上海：生活书店，1934 年
29. 范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大公报》，1937 年 2 月 15 日
30. 陈布雷：《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1937 年 7 月 17 日
31. 陆诒：《卢沟桥前线》，1937 年 7 月
32. 恽逸群：《异哉汪精卫之言》，《导报》，1938 年 11 月 24 日、25 日
33. 徐铸成：《无题》，《文汇报》，1938 年 3 月 29 日
34. 爱泼斯坦：《人民之战》，1939 年
35. 朱惺公：《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1939 年 6 月 20 日
36.《请看今日之域中 竟是谁家之天下》，《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18 日
37. 陶菊隐：《显微镜下之国际形势》，《新闻报》，1941 年
38. 浦熙修：《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新民报》，1941 年 12 月 11 日
39. 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1943 年 1 月 26 日
40. 王芸生：《看重庆，念中原！》，1943 年 2 月 2 日
41. 乔冠华：《形势比人还强》，选自《新华日报》，1943 年 8 月 28 日到 9 月 10 日
42. 羊枣：《德意志的悲剧》，1945 年，《国际时事研究》期刊
43. 穆之：《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人民日报》，1946 年 4 月 20 日
44. 赵敏恒：《伦敦去来》，《新民报》，1946 年
45. 新华社记者：《英勇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从容就义》，1947 年 2 月 7 日电
46. 新华社记者：《托炸药箱毁敌碉堡 优秀共产党员董存瑞英勇牺牲》，1948 年 9 月 13 日电
47. 华山：《英雄的十月》，1949 年 1 月 16 日电
48. 刘白羽：《沸腾了的北平城——记人民解放军的北平入城式》，1949 年 2 月 15 日电
49.《大公报新生宣言》，《大公报》，1949 年 6 月 17 日
50. 李普：《开国大典》，1949 年 10 月 1 日电
51. 李庄：《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12 日
52.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20 日
53. 戴煌：《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新华社，1952 年 2 月 4 日电
54. 郑大藩：《伟大的战士邱少云》，新华社，1952 年 11 月 20 日电
55. 新华社通讯员：《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21 日
56. 田流：《金星奖章获得者——陈国栋》，《人民日报》，1953 年 2 月 21 日、22 日
57.《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23 日
58. 周立波：《会场的一角》，《中国青年报》，1954 年 5 月 30 日

59. 钟惦棐：《电影的锣鼓》，《文艺报》第23期，1956年
60.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61. 王中：《论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评解放日报1957年6月16日社论》，1957年6月
62. 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工人日报社，1957年
63. 袁木：《他们是普通劳动者》，《人民日报》，1958年6月25日
64.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65. 陈秉彦、刘光辉：《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新华社，1958年6月29日电
66. 郭超人：《英雄登上地球之巅》，新华社，1960年6月3日电
67. 邓拓：专治"健忘症"，《前线》，1962年第14期
68.《解放军报》记者：《艰苦作风 代代相传——记"南京路上好八连"》，《解放日报》，1963年3月30日
69. 李峰、林俊卿：《九龙江上的抗天歌》，《人民日报》，1963年6月21日
70.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71. "两报一刊"：《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72. 穆青、陆拂为、廖由滨：《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新华社，1978年3月13日
73. 王金凤：《在中国农村三十年——记美国朋友阳早和寒春》，《人民日报》，1979年3月19日
74. 李洪林：《读书无禁区》，《读书》，1979年4月
75. 阎吾：《战后凉山》，新华社，1979年3月6日电
76. 刘宾雁：《人妖之间》，《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
77. 张友鸾：《胡子的灾难历程》，《文汇月刊》，1980年
78. 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日、22日
79. 赵丹：《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80. 鲁光：《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中国青年报》，1981年11月19日
81.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年3月7日
82. 刘宾雁：《向命运挑战——记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人民日报》，1983年3月8日
83. 柏生：《吴晗和他的一家》，《柏生新闻作品选》，1983年
84. 张建伟：《第五代》，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
85. 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1988年

86.《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人民日报》,1989 年 4 月 26 日
87. 张新民:《深圳 8·10 股潮》(照片),1992 年
88. 何平、刘思扬:《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新华社,1997 年 3 月 2 日电
89. 梁衡:《大有大无周恩来》,1998 年 2 月
90.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法轮功"就是邪教,新华社,1999 年 10 月 27 日电
91.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 年 12 期
92. 王克勤:《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中国经济时报》,2001 年 2 月 3 日
93. 陈峰:《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方都市报》,2003 年 4 月 25 日
94. 徐滔等:惊心动魄 22 小时,北京电视台,2004 年 2 月 8 日
95. 吴立波:《中国十大学者背后的财团》,《瞭望东方周刊》,2004 年 2 月 12 日
96.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6 年 1 月 11 日
97. 高赛:《〈人民日报〉手机报创刊》,《光明日报》,北京 2007 年 2 月 28 日
98. 付振中:《罪恶的黑人之路》(关于"黑砖窑"),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报道》,2007 年 5 月 19 日
99. 潘智云等:《大漠胡杨》,新疆电视台,2007 年 6 月 19 日
100. 范敬宜:《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解放日报》,2007 年 7 月 20 日